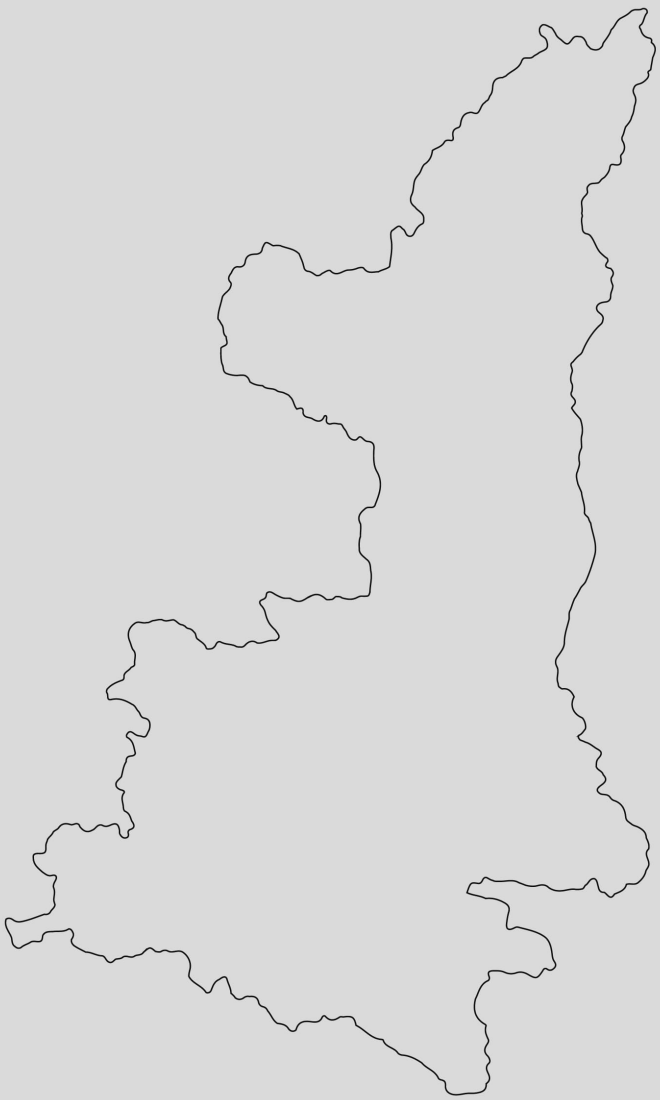
— 陕 西 地 情 丛 书 —

陕 西 故 事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编

黄留珠　主编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西故事/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黄留珠主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518-1647-2

Ⅰ. ①陕… Ⅱ. ①陕… ②黄… Ⅲ. ①陕西-地方史
Ⅳ. ①K2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2323 号

陕西故事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编
黄留珠 主编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中煤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5.75
字　　数 69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647-2
定　　价 98.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陕西故事》编纂委员会

主　任　雷　湛　　秦向东

副主任　史天社　　吴玉莲

委　员　李保国　　张世民　　李　川　　李洪林

　　王　莹　　潘　斌　　鲁　文　　王　斌

主　编　黄留珠

目　录

前言

第一编　国　政

周人图商与灭商　/　3
周公东征及制礼作乐　/　8
秦国商鞅变法　/　12
短命秦帝国　/　20
汉代察举制度　/　30

二十七天的汉帝　/　38
王莽其人和新朝其事　/　44
东汉五斗米道与汉中张鲁政权　/　57
南北朝关中政权的更迭　/　62
隋唐治世面面观　/　70

隋唐积极外交政策与长安大都会地位确立　/　79
一代女皇的文治武功　/　86
唐代科举的进士科　/　92
忽必烈汉法治关中　/　98
慈禧西逃与“回銮新政”　/　104

20 世纪 30 年代陕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　/　111
红军陕北会师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　118

瓦窑堡会议 / 124
西安事变 / 130
洛川会议 / 136
确立毛泽东思想的“七大” / 141
模范的陕甘宁边区 / 147

第二编 文 治

从崇尚黄老到独尊儒术 / 157
汉代兴建太学、郡国学与校理群籍 / 161
司马迁著《史记》 / 166
班固撰《汉书》 / 171
唐长安与外来文明 / 176

唐代史馆和官修八史 / 182
隋唐时期的两大地理名志 / 192
隋唐宗教中心与寺观文化 / 197
隋唐宫廷藏书制度 / 203
隋唐关中节日风俗 / 213

丝路影响下的隋唐长安胡风 / 220
宋敏求的《长安志》 / 226
关中书院与陕西书院教育 / 233
明修“关中八志”与《陕西通志》 / 240
毕沅与清代陕西修志 / 243

味经书院及其刊书处 / 249
百年沧桑话西大 / 255
驷驖车辚话秦声 / 262

第三编　民　生

秦直道　/　271
郑国渠与关中六渠　/　278
隋唐关中的水利工程　/　283
隋唐时期秦岭古道与关中交通　/　290
千年沧桑耀州窑　/　296

宋元明清四代的关中水利　/　304
丝绸之路与陕西人的情缘　/　310
明代关中大地震　/　319
明清陕南移民　/　324
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　/　330

民国十八年陕西饥馑　/　336
陇海铁路与民国西安建设　/　345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西工商界　/　352

第四编　人　物

坚贞不屈志不移——苏武　/　363
药王孙思邈与唐代医人群体　/　366
颜真卿——刀光剑影度一生　/　371
关学创始人张载　/　378
北宋蓝田四吕　/　384

鸦片战争中陕人“死战”与“死谏”　/　392
陕西维新领袖刘古愚　/　397
戊戌维新时期的陕籍京官　/　404
李仪祉与“关中八惠”　/　413

第五编　武　事

安史之乱击碎长安盛世　/　421
宋夏三川口、永乐城之战　/　428
宋金富平、和尚原、饶风关之战　/　435
明末陕西农民大起义　/　444
太平军、捻军在陕的活动　/　449

辛亥革命在陕西　/　458
陕西靖国军　/　465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陕西武装起义　/　472
转战陕北与西安解放　/　477

第六编　都　邑

神木县石峁古城及其主人推测　/　485
西汉定都关中及京师长安建设　/　492
隋唐两代经营长安城　/　499
帝京长安孕嘉名　/　506
西安鼓楼与钟楼　/　511

西安城墙　/　517
陕、甘分治与再度携手　/　527
桥山黄帝陵　/　532
骊山秦始皇陵　/　539
西汉帝陵　/　550
唐十八陵　/　557

后记　/　562

前　言

本书名曰《陕西故事》。不过这里所说的“故事”，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侧重于事件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合于口头讲述的文学体裁，而是取其古义“旧事”使用之。这就是说，本书讲的是陕西旧事。

故事指旧事的用法，论者常举的例子是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史记》中《太史公自述》里的一句话：“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此话中的“故事”，指的就是“旧事”。而这样的旧事，用更通俗并典雅的话来概括，无疑“历史”是最为合适的了。准此，上文说的“陕西旧事”，换言之也就是“陕西历史”。

当然，“故事”里面还含有另外的义项，如成例、旧日的典章制度等。如此用法，秦汉时也颇为常见。《汉书·苏武传》“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句，即其典型用例。然而无论成例也好，抑或旧日典章制度也罢，似都可以包含在“历史”之内，所以把“陕西故事”解作“陕西历史”，应该是较为准确的。

如果从蓝田猿人算起，陕西历史长达百万年以上；如果从传说的黄帝算起，陕西历史也有五千多年之久。如此漫长的历史，全部表述出来自然困难很多，所以我们只好采取一种择优法，即辑选其精粹者编为一册，以供人们学习陕西历史之需。

《陕西故事》全书按内容性质分为六编：

第一编，国政。这说的是政治类故事，凡与政事有关者均列入此类。

第二编，文治。一般说“文治”与“武功”相对应，而此处的“文治”含义要更宽泛些，举凡文化、教育、思想、学术、宗教、著述、风俗以及交往交流等等都涵盖在内。

第三编，民生。这主要是说水利、交通、灾害一类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故事。

第四编，人物。讲重要历史人物其人其事。

第五编，武事。讲与“武”有关的故事，主要包括内外战争、民众起义、革命战争等。

第六编，都邑。此讲城市的故事，并旁及政区变更、市政建设、帝王陵墓等。

在各编中，故事均按时代顺序排列。而每编故事的多少不一，多的超过 20 条，少的则不足 10 条，这全按“择优”的结果来定，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每个故事最后，均署

撰稿人姓名，一则表示对其著作权的尊重，再者亦有文责自负的含义。

以上的编排，颇似志书的写法。其实，这是我们有意为之。因为本书毕竟是陕西省方志办组织编写的一部书，多一些方志的色彩和印迹，有助于彰显其个性与特点。然而，这种以地方志的章法去写地方史，是耶？非耶？我们衷心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第一编

国政

周人图商与灭商

一、周人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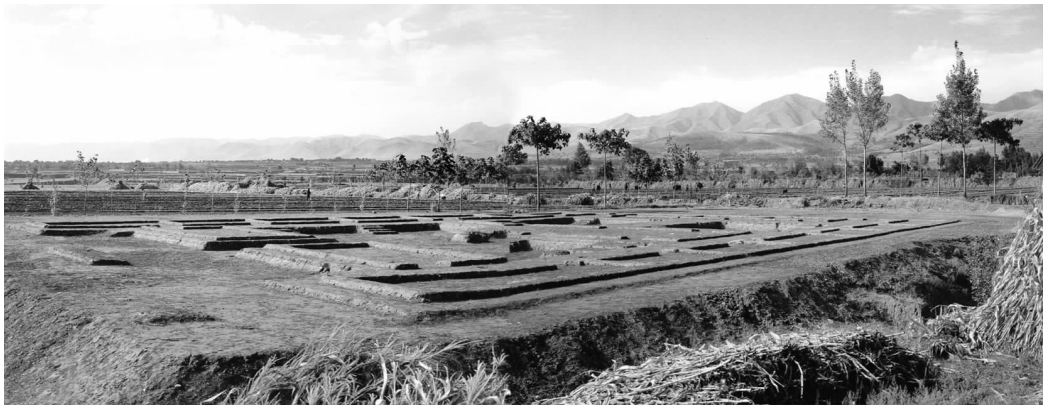
周人始祖后稷，相传为黄帝正妻子玄嚣的曾孙，姬姓。他的母亲姜嫄，本是有邰氏女，姜姓。据说姜嫄在野外践巨人足迹，有孕生子，以为不祥，遂先后把孩子弃于街巷、树林及渠中冰上，但均被救起。“姜嫄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并为他起名叫作“弃”。

这些传说看似神话，但却事出有因。一般认为，践迹生子出于原始社会母系时代“圣足迹崇拜”，与图腾制度有联系。而关于三次弃子，或认为是怕见罪上帝，要再三验试才可放心；或认为是一种积极的图腾考验仪式，经过三弃证明婴儿确为姬、姜二姓之子，如此方能合法生存。

弃在儿时便长得如同巨人一般，酷爱以种植庄稼为游戏。长大后传授姬姓民众播种百谷，成为周人的始祖与“农师”，被尊为“后稷”，意为农神。

后稷之子不窋时代，正值夏朝内乱，不窋失去农师的官职，周人被迫迁到西北游牧民族之间（今甘肃庆阳一带）。

不窋之孙公刘立志恢复祖业，率周人迁至豳（今陕西彬县），重新垦荒种植。史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周原遗址

其后九传到古公亶父，率族人迁至岐山脚下丰饶的周原，正式建国，定号为“周”。并把都城建在岐山京当一带，称作京邑。自此之后，周族日益发展强大，而古公亶父也被尊称为“太王”。

二、图商计划的推行与辅臣姜太公的贡献

古公亶父之子季历在位期间，周的国力有所发展，后世称作“王季”。世上之事，实力与野心往往是同步增长的。不过，当时的周毕竟是个小国，地不足百里，自称为“小邦周”。由于商周力量对比悬殊，季历只能采取臣属于商的亲商政策，如亲自朝拜商王，受命为商讨伐敌国，娶商女为妻结成甥舅关系，等等。此间，周特别努力地吸收先进的商文化，以迅速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

随着周人日益坐大，商王的疑忌也越来越多，于是采取抑制措施，借故杀掉季历。其子姬昌继立，是为周文王。

初始，文王仍保持与商的友好关系，甚至娶商莘君之女以示亲附，如此被商封予外邦的最高爵位——西伯。然而文王是比其父更有志图商的君主，他四处求贤，终于得到能人姜太公的辅佐（详后文），从而使他的图商大计更稳健地向前推进。

商纣王时期，商周关系开始明显恶化，以致商“囚西伯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周以美女、宝马、珍奇营救文王回归后，虽然表面上照旧“以服事殷”，但却“阴行善”，暗中加紧翦商。文王先后伐灭了周边的一些小国，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把都城由岐下东迁到新建的丰京，以表示向东灭商的决心。当文王晚期，已经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



沣西车马坑

辅佐周文王的重臣姜太公，姜姓，名尚，字牙，又叫姜子牙。在古文字里，“姜”与“羌”声同、形似、义近，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姜姓是与周族共处关中的古羌族。

姜尚祖先曾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故又名吕尚。他曾卖肉售酒，大半生怀才不遇，到老年整日坐在岐山西南兹泉的源头钓鱼，恰好被周文王发现，拜为太师，尊为

太公望，意谓周先祖太公所盼望辅佐子孙的圣人。

姜太公积极佐周，出谋划策，发展国力。当年文王罹囚禁之难而被赎回，他是主要谋划人之一。及文王末年，出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据司马迁讲，亦是“太公之谋计居多”。文王子武王即位后，尊姜尚为师尚父，并娶其女邑姜为妻，双方结为姻亲。

伐纣前夕，武王卜卦不吉，群臣畏惧，唯太公力排众议，主张出师，为武王所采纳。在伐纣之役中，他担任全军前锋，以4万多甲士击败17万商军，功居第一。由此受封于泰山渤海间的薄姑氏故地，建立齐国。

由于姜太公非凡的经历和辉煌的业绩，他成为传奇英雄。早在战国时便有人依托其名，写出一部兵书叫作《六韬》。民间有关他的传说非常之多，尤其明代章回小说《封神演义》更把他描绘成了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

三、伐纣之役

周武王姬发，继承父亲文王事业，以岳父姜尚为师，弟周公旦为辅，迁都于镐，图谋东进。即位第二年，便观兵盟津（今河南孟津），作了一次伐纣的试探性阅兵演习。当时众多仇商的诸侯“不期而会”，要求伐灭商纣，但武王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于是下令还师。

两年后形势急剧变化。纣王奢侈腐化更甚，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大小官吏及不少平民也沉湎于酒。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奴隶逃亡，百姓怨望，“如沸如羹，大小近丧”。在纣王高压之下，忠臣比干被剖心，贵族箕子被逼佯狂，纣兄微子被迫出走，大批贵族纷纷叛商奔周，殷商统治集团内部彻底分崩离析。周边邦国也不断反叛，尤以淮河流域的东夷抗争最剧烈，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把军队主力包括最强的“三百六十夫”调去征讨东夷。



利簋

武王看中了这是一个灭商的好时机，遂下定决心，大会诸侯，发动伐纣之役。当时集师计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 000人，并联合蜀、庸、羌、髳、纑、微、彭、濮等部落与方国共同兴兵。

武王亲作《泰誓》，激励部众。又举行誓师大会，历数纣王罪状，鼓励全军决一死战，《尚书·牧誓》即周公代武王所作的誓词。甲子日，双方在商都郊外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决战。当时商军主力远征东夷，纣王仓促应战，虽然临时拼凑了十多万军队，但士气低落，皆无战心，以致阵前倒戈，战斗很快以周联军的胜利而告结束。纣王见大势已去，逃回都城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商亡。

灭商之后，武王对殷遗民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笼络安抚，如封纣子武庚于殷，释放被纣囚禁的箕子和百姓，修葺被纣杀害的比干之墓，打开府库散发财物、粮食赈贫救饥，以及宣布保留殷人的氏族组织和归顺的氏族首领的社会地位，等等。另一方面则监视控制。其最主要的措施就是设立三监，即把原来的商王畿分为邶、鄘、卫三国，由武王之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别统治，以监控武庚。

四、周兴灭商的影响与启示

如上所述的周武王以武力灭掉商纣王、取而代之建立西周的历史，与其前商汤武力灭夏桀、取而代之建立殷商的历史，如出一辙，被古代儒家视为是“正义”战胜“邪恶”的“革命”事件，称作“汤武革命”。“革命”一词，由此而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有如下的记载：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可见战国时代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于“汤武革命”已经进一步做出了极富理论性的诠解。在他们看来，桀、纣这类君王只是“残贼”的“一夫”而已，诛杀一夫为民除害，不算是“弑君”。应该说，这实际为“革命”行为奠立了一个理论依据。

当然，儒家以外的学派如法家，对于上述的“革命”的看法是很不相同的。儒、法两家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这样的争论，直到汉初不仅仍然继续而且对立十分尖锐。《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景帝时辕固生与黄生之间发生的一场争论云：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

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这场争论是在景帝面前进行的。当争论触及敏感的现实政治时，景帝便出面干涉了，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上述引文最后一句，颇值得深思。何以“学者莫敢”，显然是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的结果。不过随着武帝朝“独尊儒术”的确立，孟子、辕固生一派的“受命”论自然占据了主流地位。此后，汉代秦一类的王朝更迭，皆被冠以如“汤放桀”“武王伐纣”一样“受命”的桂冠粉墨登场，而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一般人反而并不那么关心了。

这些，虽然只是周灭商所产生历史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由此不难看出这一事件影响之深远。至于周人崛兴的历史启示，无疑也是多方面的。这里，仅谈两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一个弱小力量在其发展成长过程中，面对强大力量做出一定的妥协、让步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而决不能硬碰硬。换言之，即需要实行所谓的“韬晦之计”。“小邦周”当年如若不臣服于“大邑商”，学习先进的殷商文化，岂不早就被强大的商吃掉！如此何来日后的“三分天下有其二”，何来武王伐纣的大文章？对于正在和平崛起的今日中国来说，这样的历史智慧，如此的历史经验，显然具有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第二，历史上以弱胜强、落后战胜先进，虽不能说是必然的规律，但其实例却比比皆是。不过在此过程中，弱者、落后者需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要心存大志，有图变、图强的强烈愿望；二是还要有脚踏实地认真工作、努力拼搏的奋斗精神。历史上的周人，应该说在这两方面做得都很出色。特别是周人善于团结一切力量结成反商联盟的做法，更值得称道。唯其如此，所以他们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一点，对今天来说，同样也是具有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的。

（撰稿人　黄留珠）

周公东征及制礼作乐

一、周公东征



周公

周公，名旦，为武王之弟。他辅佐武王伐纣，功绩卓著。灭商后不久武王病死，成王继位，由他称王摄政。尽管周公兢兢业业治国，史称所谓“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唯恐失掉天下贤人的支持，但管叔、蔡叔对此却十分不满。

管、蔡与霍叔亦武王弟，被封于商朝王畿之地，负责监视受封于殷的纣王子武庚，称为三监。管、蔡的不满竟最终导致他们同被监视的对象武庚联手，发动东方十七国俱反，使新生的周朝政权受到严重威胁。

面对严峻的形势，周公坚决兴师东征。当时有些贵族担心害怕，周公以天子身份作《大诰》，鼓励之。为了分化敌方力量，他亲赴楚国说服他们不要参加叛乱。

这是一场规模远远大于伐纣之役的战争。据《尚书大传》等记载，东征分三阶段进行，先灭三监，次灭武庚，再灭东夷。战争历时三载，才最终平定了叛乱。现存于《尚书》中传为周公所做的《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康诰》等篇章，应该说就是东征的实证材料；另西周青铜器如大保簋、斑簋等铭文也有关于东征的记载。

经过这次战争之后，周人才真正成为关东地区的统治者。

二、制礼作乐及其政治内容

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周公在洛邑（今河南洛阳）营建东都成周，作为控制东方的中心，并将参加叛乱的殷顽民迁到成周附近，直接监控起来。同时又“制礼作乐”，推行礼乐制度，营建礼乐文明社会。其核心思想是以“礼”治国，政治内容一是大规模“封藩建卫”，实行分封制；二是实施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体的宗法制。

所谓分封制，就是古人讲的“封建”（注意：这与人们平常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封建”，不是一回事），即“封邦建国”，是西周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西周的一个显著特点。

周灭商后，为有效地统治被征服的广大地区，派遣王室弟子或其他贵族（主要是功臣）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代表周天子行使对地方的统治权，以拱卫王室。西周一代分封的诸侯国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如卫——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鲁——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都奄（今山东曲阜）；齐——异姓功臣姜太公的封国，都营丘（今山东淄博）；晋——成王弟叔虞的封国，都唐（今山西翼城西）；宋——异姓贵族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燕——召公奭的封国，都蓟（今北京）。

除天子分封诸侯外，诸侯在其国内也进行分封。封其子孙或其他贵族为卿大夫，给予一定的土地；卿大夫在其封地内也实行分封，封其后代为士，分给采邑；士以下不再分封。

所谓宗法制即宗族法规，是一种权利继承制度，与分封制密切相关，其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简言之，就是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宗主地位，庶子分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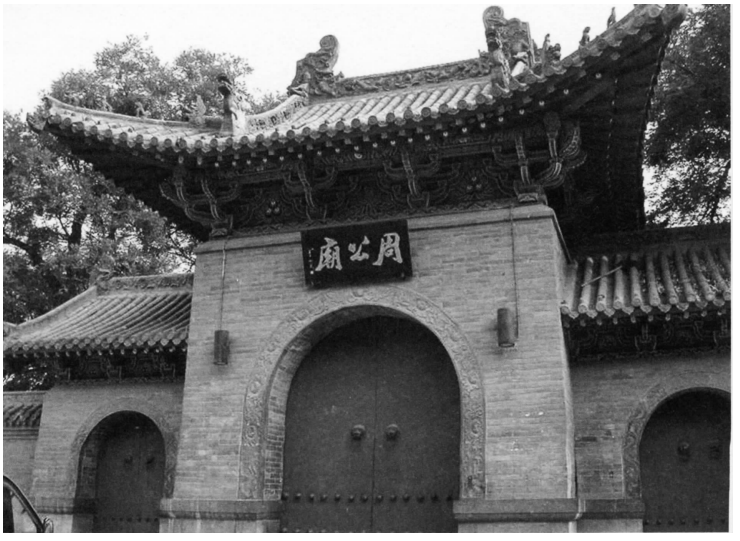
在宗法制下，有大宗小宗之别。具体而言，周天子为天下的共主，是所有姬姓贵族的大宗；诸侯对周天子来说是小宗，在封国内对卿大夫来说又是大宗；卿大夫对诸侯来说是小宗，在封地内对士来说又是大宗。如此一种划分和区别，明确了下级贵族臣服上级贵族、全体贵族服从天子的政治隶属关系。

宗法制把君位的承传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确定下来，完善和巩固了分封制，防止了贵族之间因权力继承问题而发生争斗。不过，宗法制只适用于同姓贵族之间，与异姓贵族之间的关系则以婚姻为纽带联结起来。周代姬姓贵族与异姓贵族互为姻亲的密切关系，成为当时宗法制的重要补充。

分封制和宗法制，把政权与族权紧密结合起来，使周天子成为金字塔式政权和族权的顶峰。因宗法分封而形成的一套完整、严密区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等级的周制，以及相应的礼制思想和宗法意识，影响了中华民族三千年。

当然，周公推行的礼乐制度还有其外在形式，即制定礼仪。据后世儒家所著《礼记》记载，周公在吸取殷商亡国教训和周人兴国经验基础上，先后制定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经礼三百”“典礼三千”，目的在于以礼仪形式来体现道德本原和宗法制度的亲疏等级关系，用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地位。不过从客观上讲，这一做法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举止，对于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后来，周公还政于成王，又作《多士》《毋逸》以训诫之。他最终病死于宗周（即丰镐），葬于毕原上。成王为褒周公之德，特命他的封国鲁国得享天子礼乐。唐时仰慕周公，特为之建庙，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境，至今仍存，为名胜之地。



周公庙

三、成康之治

西周成王、康王统治时期（前1042—前996），出现了古代社会的盛世，史称“成康之治”。

作为盛世的标志，一是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社会出现繁荣景象；二是统治者生活相对比较节俭；三是天下稳定，刑措不用。具体言之，成王之世的繁盛，出自周公直接奠定，尤其东征以后，制礼作乐，推行两制（分封制、宗法制），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使社会出现了空前的安定局面。而康王之世，按当代史家许倬云的说法，“是一个休息的时代”。有研究者考证，认为召彝铭中的“休王”即康王的生号，“康”则是谥号。

“休”在周代铭辞中为“休养”的意思。实际上，这应该是由周公所奠定的成王时期安定局面的继续和发展。

古代史家对“成康之治”的评论，或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或曰“成康之日，政简刑措”。这些论述尽管比较原始，但却也为后人树立了衡量盛世的标准尺度。而这些，自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西周礼乐文明所达到高度的标志，反映了周公东征、制礼作乐对西周社会影响的具体化。

四、巩固政权更是“任重而道远”

周人崛兴后，灭掉殷商，建立了政权。这一过程虽然漫长，也相当曲折，但当一切条件成熟之后，伐纣之役则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是一鼓作气完成了；新政权建立也不过是举行一个仪式昭告天下而已。相比之下，取得政权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却要复杂得多。

武王于灭商之后过早离世，继立的年幼成王由周公辅佐，这势必引起王族内部一些人心理的不平衡，从而引发争夺王权的斗争。管叔、蔡叔联合武庚造反，即属这种性质。如此的情况，在周灭商之前是不曾发生的。应该承认，周公不失为一位既有魄力又有能力的政治家，他对管、蔡等予以坚决的镇压，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周政权。在政治斗争中，需要这样的铁腕手段，而任何心慈手软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用武力镇压，固然可解燃眉之急；但要长治久安，还需从制度建设入手，做扎实细致的工作。在这方面，周公“制礼作乐”，为我们提供了极典型的范例。

古人把“礼”看成是限制人民逾越的堤防。其不仅是社会生活中制约性规定和仪式，还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内。而“乐”，就是音乐。不过古人把音乐高度政治化，认为“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在古人心目中，“礼”“乐”“政”“刑”构成所谓的“治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历史上周公“制礼作乐”，翻译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制度建设。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有效地调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保证了社会各领域的正常运行，使西周社会稳定向前发展，营造了一代辉煌的礼乐文明，体现了那个时代治国者高度的政治智慧。这些，对于今天政治家们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显然有借鉴意义。而从周公东征及制礼作乐的史实，似也不难看到，巩固政权是比夺取政权更“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需要我们更加认真、细致、精心、智慧地去完成。

秦国商鞅变法

一、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形势

秦自襄公受封为诸侯正式建国之后，由西而东占有富饶的关中地区，在穆公时期达到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史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然而，此后秦的发展陷入了低谷。特别是当时代的巨轮驶入战国之后，在东方一些诸侯国内，新兴阶级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并先后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革，建立了新制度。与此相适应，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这时的秦却一直是名落伍者，呈现出日渐衰败的走势。其集中表现便是对外战争的连连失败。不过应该看到，由于受风云激荡时代大潮的影响，秦的社会亦并非绝然没有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相对迟缓许多罢了。

公元前409年在秦史上是个值得注意的年份。史载此年秦“令吏初带剑”——或记作“百姓初带剑”。剑在古代不仅是防身武器，而且是表示身份的一种标志。春秋以后，礼坏乐崩，东方各诸侯国早已“官吏得带剑”。而秦直到战国之后，才颁布允许一般“吏”“百姓”带剑的法令，尽管时间上晚了许多，但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破旧立新之举。这说明秦原来的等级制度已经崩溃。

翌年，在秦又发生了一件更加不寻常的事。这一年，秦开始按土地亩数征税。此事史称“初租禾”。“租”即土地税。这里用作动词，意为征收土地税。“禾”原指粮食，此处引申指地亩。“初租禾”与一百八十六年前鲁国的“初税亩”名异实同。二者都反映了“私田”发展已为统治者所承认的客观事实，说明国家依据私田的亩数而征收土地税的新制度的诞生，表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公元前384年，公子连即位秦国君，是为秦献公。他进一步顺应时代潮流，实行一系列重要改革：

首先，废除人殉制度。史书写作“止从死”。

其次，将国都自雍迁往栎阳，并推广县制。

第三，“初行为市”。即政府建立正规的市场，设专职官吏主掌管理。

第四，“为户籍相伍”。即规定每5家为一“伍”，编制户口。

上述的改革，大大增强了秦的国力。这从献公后期对外战争获得的一连串胜利，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特别是献公二十一年（前364）的石门大捷，一举扭转了秦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失败者形象，连天下共主周天子也“贺以黼黻”，由此“献公称伯”。当然，上述改革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拉开了秦变革的帷幕，从此一个大变革的新时代开始了。

二、孝公求贤与商鞅入秦

当秦献公揭开了秦大变革的序幕之后，便离开了人间。秦大变革的重头戏，是由他的儿子孝公最终完成的。

孝公名渠梁，即位时年仅21岁。当时秦国经过献公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地位、声望均有明显提高，但落后的帽子仍然没有最后甩掉。史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山东各国似乎还是有些看不起秦。

富于进取精神的秦孝公，自然不能忍受秦国的这种现状，于是在采取“布惠，赈孤寡，招战士，明功赏”等一系列措施的同时，又下令求贤，希望得到贤者、智能的帮助。其求贤令这样写道：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求贤令首先回顾了当年穆公的霸业和自厉公以来秦国衰落的事实，接着叙述了献公朝的政绩和本人打算继续完成先父未竟之业的决心，最后公布了求贤的具体要求和赏格。从求贤令的字里行间，至少可以看出这样三点：

1. 孝公向往当年穆公的霸业，急切希望“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

2. 孝公对长期以来秦国落后的局面深感可耻，以为“丑莫大焉”。这正是促使他力求改变国家现状的强大动力之一。

3. 孝公求贤的核心是“出奇计强秦”。为达此目的，他不惜“尊官”“分土”予以重赏。

一位刚刚20岁出头的年轻人，能有如此见识、胆略和气魄，着实值得称道。古往今

来，“凡是有便于杰出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杰出人物出现的”。秦自建国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至此已为杰出人物的出现创造了合宜的条件，同时秦社会也迫切需要出现杰出人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孝公应运而生。

当然，由于社会已经前进，秦孝公希望完全恢复穆公时代的“政令”，已不可能；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是远较穆公更加宏大的事业。

俗话讲，竖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孝公下令求贤后，有位青年人应召来到秦国，并最终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印迹，他的名字就叫商鞅。



商鞅画像

商鞅本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姓公孙，名鞅。古代贵族常以国为姓，故又称卫鞅。他“少好刑名之学”，又曾向鲁人尸佼学习过。公元前 365 年，商鞅来到魏国。这里曾是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活动的地方，受法家思想影响很深。这样的环境，对爱好刑名之学的商鞅来说，十分理想。但可惜他得不到重用，仅在魏相公叔痤门下做一名不起眼的中庶子。

当商鞅闻知秦孝公求贤的消息后，便怀着极大的希望，西行入秦，打算在这里碰碰运气。



三、“卒定变法之令”

商鞅到了秦国之后，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求见孝公。

商鞅第一次面见孝公，向他说以“帝道”。这是道家学派的一种学说。尽管商鞅滔滔不绝，“语事良久”，但孝公不感兴趣，“时时睡，弗听”。事后孝公怒责景监，说他推荐来的“客”是位“妄人”。

后五日，商鞅第二次面见孝公，向他说以“王道”。这是儒家学说，孝公仍然不感兴趣。事后孝公再次责备景监，景监则责备商鞅，而商鞅却要求再次面见孝公。

商鞅第三次见秦孝公，向他说以“霸道”。这是代表当时新兴阶级力量的法家学说。孝公听罢非常感兴趣，事后对景监说：“汝客善，可与语矣。”商鞅也向景监讲：“吾说

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果然，秦孝公第四次会见商鞅。这次商鞅讲述的“强国之术”使秦孝公听得入了迷，“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一连数日也不厌倦。就这样，孝公决定按照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改革秦的旧制度，实行变法。

商鞅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千里迢迢来到秦国，向秦孝公献强秦之计，至此已初步打开了局面。不过，当准备进行变法时，秦孝公仍有些犹豫，“恐天下议己”。按秦的惯例，凡国君一时不能决断的军国大事，则交付廷议——即由大臣在朝廷上就问题展开讨论，最后国君再做裁决。于是孝公召集反对变法的代表性人物甘龙和杜挚，同商鞅进行辩论。这对商鞅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他要为变法扫清思想障碍，进行一场特殊的斗争。



商鞅舌战保守派

双方争论的重点，集中在应不应该变法这个问题上。商鞅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甘龙、杜挚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据理一一批驳了甘、杜二人的观点。由于他能紧紧抓住秦孝公急切希望图强的心理，所提主张切实可行，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适应了秦国当时新兴阶级的需要，故而受到孝公的赏识并得到其全力支持。

经过辩论，秦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命商鞅为执掌国政的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四、大刀阔斧的变法运动

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在颁布变法令之前，先搞了一次颇具故事性的“徙木赏金”。

某日，商鞅在国都市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宣布，如有人把木头徙置北门，便赏予十金。民众感到奇怪，没人敢动。接着，商鞅又宣布，“能徙者予五十金”。结果真有一人把木头移到北门，商鞅立即赏给他五十金，“以明不欺”。据记载，当年吴起在魏国主政时也有类似的做法。这里，体现了先秦法家学派立法必行、说话算数的思想和精神。

通过“徙木赏金”，商鞅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大大强化了人们关于法令必定兑现的观念。在此基础上，他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变法活动。其相对集中者有两次。

第一次变法开始于秦孝公三年（前359），主要内容有：

1. 颁布垦草令。所谓“垦草令”，即开垦荒地的命令。这是商鞅颁行的首道政令，其目的在于发展农业生产。此令原文已佚，具体内容不可确知。传世的《商君书》中有一篇《垦令》，很可能即“垦草令”最早的方案，从中似可以推见该令的大体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有实行“訾粟而税”的地税制度；压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重关市之赋”；整顿吏治，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推行愚民政策等。

2.“令民为什伍”，定“连坐”之法。据前所述，秦献公新政中就已经“为户籍相伍”，商鞅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更加严密的户籍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制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把全国人口按5家为伍、两伍为什的形式编入户籍；二是令什伍中各家互相纠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其具体的奖惩规定极其严格：“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与献公时的户籍制相比，新制度对民众的控制明显加强了。

3. 推行小家庭政策。变法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就是说，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能立户的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国家运用经济手段促使民众分户，建立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这利于充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大有好处。

4. 重农抑商。此为法家学派的一贯主张。当时，把农业称作“本业”，将从事商业称作“末业”或“末利”。商鞅变法令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其意是讲，凡努力从事农业，经过辛勤耕织收获粮食纺织品多的，免除徭役；从事工商活动及因怠惰而贫穷的，全家一并没为官奴婢。

5. 奖励军功，严惩私斗。商鞅大力倡导民众为国家勇敢打仗，而对于个人间的私

斗，严加禁止。变法令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意即凡立有军功的，各按其功劳大小授予爵位；为私斗的，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又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意思是说，宗室如果没有军功，则不得入属籍——即除去其宗室的属籍。

6. 制定爵制，规定各级爵位占有田宅、臣妾奴婢的数量和衣服的等次。商鞅为激励民众的积极性，制定了一套爵制，用以奖励有功者，特别是军功，故这套爵制被称作“军功爵”。此制经过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固定为《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载的二十等爵。兵士在战争中斩敌首 1 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 2 级，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有功的，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无功的，虽家资丰厚，也不得芬华。

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秦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这里北依高原，南对秦岭，渭水流贯其间，地理位置更有利于向东方拓展。就在这一年，第二次变法开始，主要内容有：

1. 改革陋习，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2. 普遍实行县制。献公实行新政，即有推广县制的内容。尤其那时在国都栎阳置县，实际就已透露了秦将把县作为一级行政机构推向全国的意图。孝公时，这一目标终于实现。变法令规定：“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即将以往的乡、邑、聚等组织合并为县，每县设县令、县丞负责管理。令为全县最高行政长官，丞为令之佐官。当时全国共置 41 县。

3.“为田开阡陌封疆”。即破除土地上原来的疆界封记，重新设置田界。实际上就是实行土地私有制，准许土地买卖。

4. 统一度量衡。变法令规定：“平斗、桶、权、衡、丈、尺”。

5.“初为赋”。古代注家或解释为“制贡赋之法”，或解释作“初为军赋”。今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按户按人口征收的军赋，就是云梦出土《秦律》所说的‘户赋’，也称‘口赋’，为汉代‘算赋’的起源”。

如果把眼光稍微放宽一些，似也可把迁都咸阳算作这次变法活动的一项内容。

五、商鞅变法对秦的影响

不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商鞅变法在秦史上都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对秦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商鞅在秦掌权近 20 年，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他的新法得到比较彻底的推行。通过变法，秦实现了由落后变强盛的巨大飞跃。应该说，这是变法对秦影响最直接也最集中的

体现。

新法鼓励农耕，这使秦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局面。

新法推崇战功，这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史称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事实上，重战已凝固为秦的一种文化心态和文化价值。这种精神力量的巨大，是难以用数量表示的。

以新法中的县制、爵制以及什伍连坐制等为支柱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新统治秩序，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富国强兵，给民众带来相当的安定，因而受到多数人的欢迎。史书所谓的“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应该说是基本可信的。

变法还使秦人普遍树立了较强的法令意识。商鞅等法家视法令为“民之命”“治之本”。出于“明法”的需要，秦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置法官法吏，负责核对和解释法令，对民众进行法令教育。这就使得法令观念深入人心。史载变法后“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是其明证。在中国历史上，像秦人这样具有强烈法令意识者，实属仅见。加之商鞅执法，无私无畏，“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法令的公正性，使“法大用”“秦人治”。

变法除了在上述经济、政治、法治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外，在对外战争上也有明显影响。它彻底扭转了秦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使之获得一连串对外战争的重大胜利。其中不少战争，还是由商鞅本人亲自指挥的。

总之，商鞅变法在秦国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是重要的里程碑。此后，秦“兵革强大，诸侯畏惧”。一个“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的新秦国，出现在以关中为主体的西部大地上。



当然，考察商鞅变法对秦的影响，还可以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里，需要先简单回顾一下秦孝公去世后的那段骤变的政治风云。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商鞅在秦国的成功，使他由最初担任的左庶长，升职为大良造，最后被封以於、商 15 邑，号称商君，权势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商鞅”之名，即由此而来。

公元前 338 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惠文王）继位，情况随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太子驷原是商鞅的反对派。秦推行新法过程中，太子犯法，商鞅曾“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以示惩处。第二次变法时，“公子虔复犯约，劓之”。这样，商鞅同太子党就成为死对头。所以太子驷刚一即位，“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新君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至关下，准备投宿客舍。然而客舍主人不知来客就是商鞅，遂拒绝接纳这位没有凭证的客人，并说这是“商君之法”。商鞅无奈逃至外国，反被赶回秦国。

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或说今陕西华县南）”，试图对抗。秦惠文王发兵很快便消灭了商鞅的武力，杀鞅于郑之黾池，又车裂以徇，并族灭其家。

由于商鞅变法是符合秦国社会变革潮流的政治改革运动，它给秦国的社会进步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为秦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变法的各项措施代表了当时秦新兴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尽管商鞅本人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惨遭非命，但商鞅为秦制定并付诸实行的一整套新法，却没有因其本人的死去而废止。惠文王虽是商鞅的政敌，但他并不想在秦恢复变法以前的旧礼乐法度。他同商鞅之间的矛盾斗争，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内部的恩恩怨怨；在使秦富强兴盛起来这一基本点上，在压迫剥削劳动人民这一基本方面，二者并没有根本性的对立。所以，当把商鞅从肉体上消灭之后，对于商鞅的那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不仅没有废除，反而予以保留、巩固与发展。

从上述这种“商君虽死，其法未废”现象，似可以更深刻地看出商鞅变法对秦影响的巨大和深远。唯其如此，秦一直保持着由变法所开创的强劲势头，直到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集权制国家。

六、商鞅变法对当今的启示

商鞅变法不仅是秦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大事之一。它告诉我们，一个政权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完全可以达到图强求变之目的。与革命相比，变法一类的改革是损失最少而更为可取的推动社会前进不容忽视的重要途径。秦之商鞅变法树立了中国古代图强求变成功的范例，它为一切变革者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由于这场变法发生在古代陕西大地上，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陕西历史上的大事，其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仍能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并深化改革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短命秦帝国

一、实现统一与帝国诞生

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蒸蒸日上，蓬勃发展，至秦王嬴政时期则正式开始了扫灭六国、实现统一的战争。

灭韩。秦首先从六国中最弱小的韩国开刀，于公元前230年灭之。

灭赵。公元前229年，秦利用赵国发生大地震和大灾荒之机出兵进攻之。次年秦军陷赵都邯郸，赵王投降；赵公子嘉逃至代郡，自立为代王，于前222年被秦消灭。

灭燕。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未遂后，秦即发兵攻燕。次年，秦军陷燕都蓟，燕王喜逃至辽东。前222年，秦军陷辽东，俘燕王喜，燕亡。

灭魏。公元前225年，秦出兵攻魏，引黄河、鸿沟水进灌魏都大梁。三月后大梁城破，魏亡。

灭楚。秦灭楚过程比较复杂，也颇具戏剧性。原来年少壮勇的秦将李信，曾率兵追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并将其俘虏，秦王以为贤勇，遂向他询问攻伐楚国所需之兵力。他回答说："不过用二十万人。"秦王问将军王翦，翦回答称："非六十万人不可。"秦政听罢说道："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于是遣李信等将20万军伐楚。王翦的意见被否定，因而谢病归老故里。李信军开始进攻比较顺利，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殊不知这是楚人施的骄兵之计，不久，楚军进行反击，"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嬴政得知李信败北的消息后大怒，亲自赶往王翦老家道歉见谢。王翦道："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答曰："为听将军计耳。"公元前224年，王翦率60万秦军伐楚。出兵之日，秦政亲自送至灞上，王翦则多次向秦王请美田宅园池为子孙业。有人不解，认为如此做法太过分。王翦则回答说："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很明显，王翦这里的良苦用心在于力求自保，不让秦王对自己有所怀疑。王翦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采取坚壁而守、步步为营的战法，力挫楚军锋芒，然后抓住有

利战机，一举而破楚军，杀楚将项燕，乘胜略定楚地城邑，岁余即虏楚王负刍，平楚地为郡县。其后又乘势南征百越之君，略定南方边地。

灭齐。在“远交近攻”策略指导下，秦对齐一直实施笼络政策。齐王建在位数十年间，也谨慎事秦，不设武备。及五国灭亡后，齐国当政者才着了忙，派兵守卫边界。公元前221年，北灭燕、代的秦军乘势南下，很快就攻陷齐都临淄，齐亡。

至此，秦用短短10年多一点时间，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大一统多民族中央集权型的专制主义帝国。最盛时，其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



秦始皇

二、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

秦统一后，于政权建设上首先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即确立最高统治者的名号。

嬴政自认为“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令臣下议帝号。群臣建言：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嬴政裁定：“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这样便有了“皇帝”的称号，产生了皇帝制度。

皇帝制度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既是国家的代表，也是国家的化身。嬴政当时还特别规定，皇帝按照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则以二世、三世计，“传之无穷”。

自此以后，中国跨入“帝国时代”，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

与皇帝制度相配套，秦朝廷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实行郡县制。

通常认为，秦之中央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习称为三公；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习称九卿。丞相为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太尉是中央主管武事的最高官员。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为全国最高监察和执法之长官。奉常掌宗庙礼仪，凡宗庙祭祀及朝会、丧葬礼仪，充当主祭人皇帝的助手。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实为皇帝卫队长。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守卫宫禁。太仆职掌皇帝专用马车，遇皇帝外出则为之驾车。廷尉主管全国刑狱。典客掌诸归义蛮夷，即职掌少数民族事务。宗正主管宗室名籍。治粟内史掌谷货，负责粮食、财政等工作。少府职掌山泽陂地市肆之租税收入，名曰禁钱，供皇帝日常生活和祭祀、赏赐开支，为皇帝私府；兼管皇帝衣食器用、医药娱乐丧葬等事宜。

秦统一后，关于地方行政曾有过争议。丞相王绾等建议实行封藩建卫的封建制（分封制）。群臣廷议皆以为便，惟廷尉李斯反对，认为郡县制才是“安宁之术”。始皇肯定了李斯的意见，决定维持郡县制不变。

最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来随着边境的开发与郡治的调整，总郡数增多达四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守”即郡守，为一郡最高长官。“尉”即郡尉，佐郡守“典武职甲卒”。“监”即监御史，“掌监郡”。郡之下有县，万户以上县设令，万户以下置长。县之下有乡、亭、里的组织，各有管理人员。

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及郡县制，构成了秦所创立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具体内容，对后世影响至深。



三、五德终始论下的水德制度

战国末出现了一种学说，叫作五德终始论，或简称五德论。它认为：人间天子一定要得到五行（德）中的一德，并由上天显示符应；当他的德衰了，有在五行（德）中得到足以胜过前一德的另一德者，就起而代之；如此按照土、木、金、火、水的五行相胜次序运转下去，便形成了历史上的改朝换代。

秦统一后，采纳五德论之说，将其付诸政治生活当中。以此向天下表明帝国政权的合法性。

按五德推演，周为火德，火后是水，故秦便是认定自己是以水德而得天下，并称说500年前秦文公出猎时所获的黑龙（蛇），即水德的符应。依五德说理论，秦制定了一整套的水德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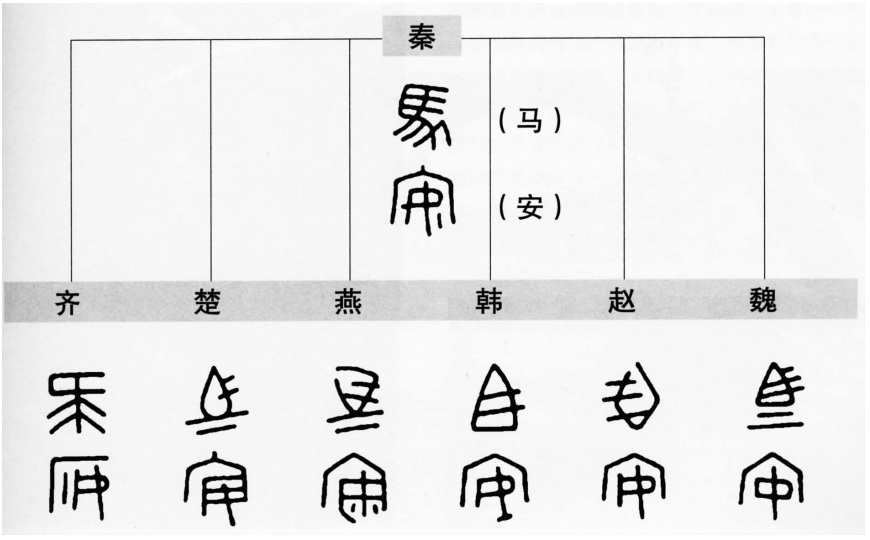
年始、朝贺　　十月朔（以十月为岁首）

衣服旄旌节旗	上黑
数	以六为纪
符、法冠	六寸
舆	六尺
步	六尺
乘	六马
音	上大吕
河	更名德水
政术	刚毅戾深，事决于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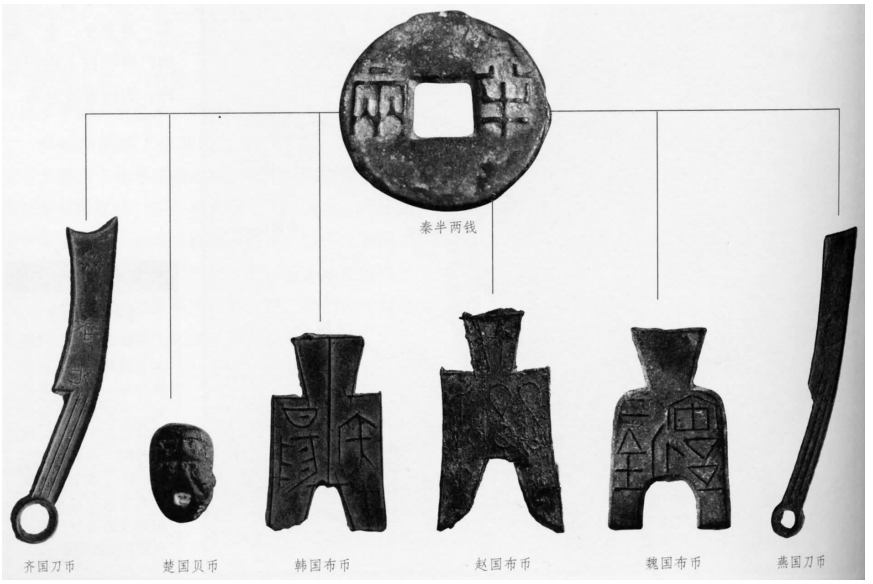
今天看来，这样的水德制度很神秘也很奇怪，大多属于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不过在当时人心目中，却是一种神圣的信仰。他们用这样一种形式把应天受命具体化、制度化，作为统一民心的工具。特别是政术方面，因水主阴，故专刑杀，“刻削毋仁恩和义”。

四、巩固统一诸措施与秦都咸阳

秦统一天下后，为了巩固统一的胜利成果，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传统的观点认为秦巩固统一的措施，主要是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即所谓的三大统一。



统一文字



统一货币



统一度量衡

著名秦汉史专家陈直认为除了三大统一外，还有郡县统一、律令统一、官制统一，共为六大统一。

今之论者又补充以祭祀制度统一、礼制统一，成为八大统一。另有研究者将“令黔首自实田”、焚书坑儒亦列入，则为十大统一措施。

以上诸多措施，虽说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但其制定却运筹帷幄于都城咸阳，是从

这里发出号令而推向全国的。

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的首都咸阳，位于素有“天府”“陆海”美誉的关中地区中部，其范围大致在今咸阳市到西安市之间的渭河区域，这里自秦孝公时即作为秦国的都城。统一后，秦始皇按照“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天体结构模式扩建与重建帝都。可惜由于王朝的短命，工程未能完成，从而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关于秦咸阳城的历史谜案。

考古工作者在今咸阳东北黄土原上发现了大区域的秦宫殿建筑遗址，从而向人们展示了秦宫殿建筑的风貌。以 1 号宫殿建筑为例，它建在一座夯土台基上，高约 17 米，共三层，为四阿顶的宫观形式。台基顶层中部的两层楼阁是主体宫室，最上层阁楼可向四方远眺。主室四周设卧室、盥洗室及露台、曲阁、榭等，底层绕夯土台基建有 7 间单独宫室，室外出檐造廊绕台基一周。主体宫室皆立都柱（将军柱）。室内隔墙用夹竹抹泥墙，表面粉成红色、白色或彩绘壁画。地面坚硬光滑，呈深红色或青灰色，少数用方砖铺地。室内设取暖炭炉，室内外有竖井式储物窖穴，并有完整的给水、排水系统。宫室的通风、采光、通道设计科学，门窗装饰有青铜铺首，使用铰链、合页等铜构件。整座建筑结构紧凑，设计巧妙，布局合理，错落有致，主次分明，外观雄峻庄严，内部华贵美丽，充分体现了秦代建筑工艺的高超水平和秦建筑文化风格。

秦始皇晚年，因嫌咸阳宫狭窄，在上林苑新建阿房宫，第一期工程是修造前殿。有关情况，后文将详细介绍。

除巨大的宫殿区外，秦都咸阳还有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商业区、旅馆区等。其交通四通八达，全城常住人口约在 50 万左右。这里，荟萃六国都城建筑艺术之精华，凝聚天地渭水之神韵，是秦文化集大成的辉煌巨制，是当时世界上最繁盛的都城之一。

五、修直道，筑阿房，造陵墓

直道系公元前 212 年由蒙恬主持修建。自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是沟通关中平原与河套地区的主要通道，军事意义似更为主要，以致被喻为军事高速公路。这是秦帝国在陕西大地上搞的一件大工程，今遗址犹存。

造阿房宫事记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条：“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

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始皇三十五年为公元前212年。工程自这年开始后没太久便因始皇死去而停工，至二世元年（前209）四月，“复作阿房宫”。但很快反秦起义爆发，秦帝国被推翻，阿房宫工程也不了了之。

大体自汉代开始，阿房宫的规制就有被放大之嫌疑，至唐代杜牧作《阿房宫赋》则达到了极致。不过杜氏所赋是借秦之喻，讽谏当朝帝王，多有想象夸张，并不可视为信史。今在陕西西安三桥以南，东起巨家庄，西至古城村，还保存有面积相当可观的阿房宫遗址。2002至2007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和局部试掘，基本搞清了“前殿”夯土台基的范围，以及殿北部边缘三层台面结构，还在殿南部边缘以南发现了一处较完整的铺瓦遗迹。考古发掘情况表明，正如文献记载的那样，阿房宫没有建成，相传的“项羽火烧阿房宫”当为历史的误传。

造陵墓事亦见《秦始皇本纪》：“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秦始皇陵今仍屹立于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枕骊山而望渭水；以始皇陵为主体，建成了庞大的骊山陵园。骊山陵园古称“丽山园”，亦称“丽山”，是中国保存至今规模最大的古代帝王陵园。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遗产保护目录。陵园以始皇陵为中心，由城垣、寝殿与便殿、园寺吏舍、陪葬坑、陪葬墓等文化建筑群体构成，它们有机地组合排列在一个5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并与周围的山、原、河等自然地理环境融为一体，开创了中国皇帝陵园建筑的新时期。



秦兵马俑

今在陵区发现了众多的秦文物遗存，其中最具代表性并引起世界轰动的，如兵马俑、铜车马、石铠甲、百戏俑、铜禽等。

六、焚书坑儒

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再次奏请推行分封制，丞相李斯驳其议，提出禁私学与焚书建议，为始皇认可。所焚之书包括各国史记和民间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秦史记、博士官收藏的图书和民间医、卜、种树之书则不烧。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次年又发生坑儒事件。为始皇求仙药的侯生、卢生，以始皇贪于权势，专用刑罚为由，相约逃亡。始皇闻讯下令追究，受到株连的儒士四百多人皆被活埋于咸阳。长子扶苏谏劝，亦被遣至上郡监军。



焚书坑儒

坑儒还留有一些传说。如一种传说讲：始皇下令焚书之后，恐天下人不服，遂招诸生七百人拜为郎。他暗地里派人在骊山陵谷温暖处用温泉水浇灌种瓜，待瓜结出后令诸生讨论瓜生长的原因。众人议论纷纷，始皇便令到种瓜现场察看，暗中却伏下了弓箭手。当诸生到达正在争论不休之际，全遭乱箭射杀，并被埋在谷中，此谷相传即临潼温汤西

南三里的马谷云云。

七、秦之败亡

公元前210年，始皇最后一次出游，少子胡亥与丞相李斯、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赵高随行。返抵沙丘（今河北广宗县西北）时，始皇病危，令赵高作书，命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至咸阳会丧。始皇死后，赵高扣压玺书，唆使胡亥篡夺帝位。遂胁迫李斯矫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迫令扶苏自杀。胡亥至咸阳发丧，即位称二世皇帝。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七月，戍卒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秦，天下响应。后形成以项羽、刘邦为首的两支反秦主力军。项羽在河北巨鹿消灭了秦军主力，刘邦则先入关中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威显一时的秦帝国就这样匆匆退出了历史舞台。

八、秦帝国的影响及其速亡的教训

秦帝国在历史上，犹如昙花一现，匆匆而去，但其影响——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影响却非常巨大。总括来看，有两点值得格外重视：

第一，秦帝国开创了大一统多民族专制主义的国家形式。

我国的国家形态，夏商周三代可统称为方（邦）国时期，其以小国寡民为主要特征。秦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方（邦）国时期而开始了帝国时期。此一新时期的国家形式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大一统，二是多民族。三是专制主义。而这样的国家形式，正是秦开创的，并深深影响整个帝国时期。自秦至清两千余年的国家形式，莫不如此。

第二，秦帝国奠定了历代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秦是一个分水岭。其前夏商周处在神权政治时期，政治制度相对简略而松散，事神重于治人。秦完全改变了这样的政制格局，代之以一整套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其最高领导者称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大臣主要有三公九卿，各自掌管一定的部门；地方设郡、县两级行政机构，长官直接由中央任命。如此一种“皇帝——公卿——郡县”的官僚科层结构及其制度，自秦到清，除了职官名称因时有所变化之外，基本模式并无更改。故论者叹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就连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亦挥毫写下了“千年犹行秦制度”的著名诗句。

记得列宁曾有一句名言，意思是说历史喜欢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用这句话来看秦帝国，岂不正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帝国的开创者本

欲万世无穷的江山，不想仅仅传至二世、不到15年时间便完蛋了。如此一个历史玩笑留给我们了太多的沉痛教训，令人无限深思。这当中，三方面的问题似更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面对胜利不可骄傲的问题。秦用了10年多一点时间，平灭六国、实现统一，无疑是巨大的胜利。在胜利面前，嬴政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请看他议帝号时说话的神气，什么“兴兵诛暴乱”，什么“六王咸伏其辜”，什么“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等等，完全是居高临下，目空一切。在这种骄横情绪支配下，他行事的随意性空前增加。如此就导致统一后他一系列的瞎折腾，从而给帝国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汉初著名政论家贾谊把秦皇称为“淫骄之主”，是很准确的。秦政之失，因胜利而骄傲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尽管“胜不骄”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却少之又少。古今中外许多伟大人物，差不多都栽在这里，确实值得我们引以为戒鉴。

二是形势变化之后政策也需要应时而变的问题。对此，贾谊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曰：“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这就是说，秦统一之后，形势变化了但统治者却“道不易”“政不改”，“取之守之无异”，完全不懂“攻守之势异”的道理，所以其败亡便是指日可待的了。特别是秦当局以“取”“攻”时期“烧”“杀”的办法处置文化问题的举措——焚书坑儒，应该说是最大的失策。后世诗人留下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坑焚若为防遗患，可笑秦王计也疏”“刘项不识字，硕儒徒坑焚”“坑焚渗漏笑强秦，刘氏功凭马上臣”等诗句，既是对此举的嘲讽，也是对它的批判。

三是不可将法治绝对化、极端化的问题。大家知道，自商鞅变法后，秦以法家学说治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秦推崇法家，推崇法治。统一后，其更是将这种“繁法严刑”发展到绝对化、极端化的程度——“事皆决于法”“急法，久者不赦”。结果造成“蒙罪者重，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世上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限，如果过了度，事情必然要向反面转化，本来的好事也会变成坏事。所以单一的法治并不可取，需要与德治相辅相成。这也就是贾生所说的施“仁义”问题。秦纯任法治而“仁义不施”使帝国速亡的沉痛教训，为汉代统治者所汲取，改用“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道，显然比秦要聪明多了。

汉代察举制度

一、察举制的产生与完善

我国传统史学中，习惯将选拔人才的制度称作“选举”。迄今我国有文字记载的选举制度，最早的是西周的乡举里选。至西汉，产生了以察举为主体的新选举制度。

所谓“察举”，通俗地讲，就是考察后予以荐举。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了一道求贤诏，令郡国向中央举荐人才。一般认为，这道诏书已显露了察举的端倪。不过，严格意义上的察举之产生，是文帝朝的事儿。当时，出现了一种选举新方法，其步骤是：

1. 皇帝下诏，指定举荐科目；

2. 丞相、列侯、公卿及地方郡国按科目要求举荐人才；

3. 皇帝亲自对被举者进行策问；

4. 据对策的高第、下第不同，区别授官。

这些步骤体现了察举制的最基本特征，故研究者普遍认为，汉文帝时才有了正式的察举制度。

察举制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举制度，并得以真正确立其在两汉选举中的主体地位，乃是武帝时期完成的。

首先，这时察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新规定，即以儒术取士。

其次，这时察举取士的范围有所扩大，即不仅从现任官吏中察举人才，还从布衣之士中选用人才。



汉武帝

再次，这时察举科目有所增加，即除了文帝时已有的“贤良”之外，又先后增加了“孝廉”“秀才”等新科目。

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这时产生了岁举性的科目。据《汉书·武帝纪》可知，两汉察举最重要的岁举孝廉一科，是从元光元年（前134）开始实行的，而且人数还有具体规定。如此，察举制以岁举的孝廉科产生为标志，既表明它本身已经发展为一种比较完整的仕进途径，也表明它作为两汉选举制度主体地位的确立。所以曾有学者指出，认为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政治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年”。

二、察举的常科

由于察举的第一步要诏定科目，故科目在整个制度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时科目名类很多，不过倘做归纳，无非常行科目与特定科目两大类。

常行科目即经常性的科目，简称常科，一般指岁举性科目而言。两汉岁举科目主要有：

1. *孝廉*

此为按照孝子廉吏的标准察举人才的科目，为两汉最主要的察举常科。具体要求一是岁举，二是一定要由郡国（地方）向朝廷（中央）举荐，三有人数的限定。

至东汉和帝时，改变了孝廉制度原来规定的每郡岁举二人的旧典，实行按口率岁举之法，即“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一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后又对缘边郡给以特殊照顾，规定“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一人”。实行上述按口率察举新规定后，每岁所举孝廉数约为288人。

经对今可考见的汉代孝廉进行统计，其官贵及富豪子弟所占比例在75%以上。孝廉本人资历，以儒者最多，大体上儒生和兼有儒、吏两种身份的人可占到1/2左右。另外，孝廉多数是从未仕者之中察举的。这一点，特别值得重视。孝廉的任用，绝大多数被授予郎官，亦有少部分任为其他职务（秩多在六百石以下，最高仅为千石），还有举孝廉后被辟除或被再察举者。

东汉顺帝时，实行左雄建议的限年考试法，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这就是著名的“左雄改制”。单就左氏所提考试法而论，在古代选举史上无疑是重要事件之一。不过当时的考试，仅仅作为察举的辅助手段，而且总是察举在先，考试在后，并不完全同于后世的科举考试。

2. 茂才

茂才或作茂材，也是汉代较重要的察举常科。西汉时原称秀才，即秀美之才

的意思，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之讳而改茂才。此科也为汉武帝所创，不过时间稍晚。一般认为，东汉时茂才始为岁举；但也有研究者考证，言其西汉已为岁举。

茂才举主的情况比较复杂。西汉时茂才既有州举，又有郡举，还有派员专举，以及列侯、丞相、光禄勋、御史、中二千石察举等。东汉茂才举主则有三公、将军、光禄、司隶、州刺史等。这种举主的多元性，是两汉举茂才的第一个显著特点。

茂才的资历，情况也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已仕之官员（包括三署郎，三公府、将军府属员），又有州郡吏与孝廉，还有太学生等。相对而言，已仕官吏与孝廉所占比例较大（西汉达70%以上，东汉约占60%左右）。再从茂才的任用情况来看，其绝大多数被任以县令或相当于县令一级的官职。所以，资历高、任用重，这是举茂才的第二个特点。在两汉所有的察举史实中，全是先举孝廉而后察茂才，决然找不到一个先察茂才后举孝廉的例子。可见茂才在汉代是比孝廉更高一级的察举。

茂才虽是较高一级的察举，其举主又具有多元的性质，但每年察举的人数却十分有限——大体在20人左右。这样，人数少就成为举茂才的第三个特点。

3. 察廉

察廉又称廉吏科，是一种长官按年选拔廉洁优秀属员予以升迁的科目。所选

择的对象大体限于斗食（东汉桓帝后改为秩满百石）至六百石之官吏，一般均根据本秩直接迁补，而且一次被察举之后，还可以再次被察举，具有明显的考课性质。其举主广泛，自中央公卿，到地方郡县，以至率军将军，均可察举。东汉初有一道诏书，规定当时三公岁察廉各二人，光禄岁举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各二人。由此来看，廉吏科每岁所举人数相当可观。廉选后的任用，一般较茂才低，而与孝廉相近，基本限于县长至县丞，或相当于这一级别的职位。过去学人把此科误作孝廉，或附于孝廉，均是不对的。

4. 光禄四行

光禄四行又称四行，也是限于已仕官吏范围内的岁举性科目，始设于元帝永光元年（前43）。所谓“四行”，指“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或作“敦厚、质朴、逊让、节俭”）。此科的举主只限于光禄勋。这就是说，光禄勋每岁在三署郎及从官中，以“四行”的标准，选拔人才以擢用之。值得注意的是，史籍中每将四行与茂才相连，称作“岁举茂才四行”，故不少人误将“茂才四行”视为一科。其实，汉代光禄所举茂才与四行并不相混，前者称“光禄茂才”，后者则曰“光禄四行”。即令是汉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对此也不相混。

三、察举的特科

察举的特定科目，简称特科。其又可细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两大类，主要有：

1. 贤良方正

贤良方正是指德才兼备者而言，为常见特科中最主要的科目。后人曾有“炎汉得人自贤良之选”的说法。此科大多是在遇到日食、地震、奇特星象及各种自然灾害之后举行。另外，也有个别特典，如新皇帝登基，为表示励精图治的决心，亦诏举之。

贤良方正作为举目，形式变化多端。它既可分开单言“贤良”或“方正”，也可以在“贤良方正”或“贤良”或“方正”之后，根据临时需要再粘连其他名目，最常见者为“直言极谏”或“直言”。就此科举主来看，基本上限于从诸侯王、列侯、特进、三公、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司隶校尉、州牧、郡国守相之中，由皇帝指定。诏举贤良方正的人数，大多情况下为“各一人”。被举者绝大多数均为现任官吏（或故官出身者），以及州郡属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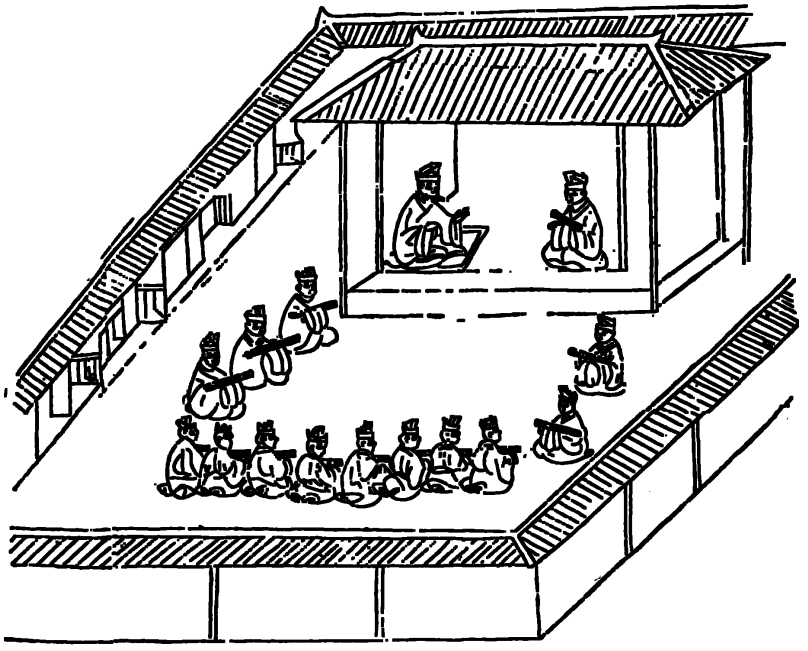
察举出来的贤良方正，送到京师后还需经过皇帝亲自主持的对策。武帝时规定“受策察问，咸以书对”，即采用书面回答。被举者的对策，如引起皇帝的特别注意，还要“两策”或“三策”，即反复进行策试。对策的内容，多问以治国之道或历代兴衰变化之端，由应策者回答。对策后授官情况，大率高第者所授均秩六百石以上。个别特殊者，起家即为九卿。下第者的任用，最低亦与孝廉相同。

2. 贤良文学

“贤良”与“文学”相连称作“贤良文学”，也是常见特科中较重要的科目。汉世文学与儒学基本是同一概念，自汉武独尊儒术后，此科诏举不断升温。昭帝时，文学又单独作为察举科目出现。至王莽时，则将单独的文学归入四科之举。所谓“四科”，即“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

3. 明经

明经即通晓经学，是两汉察举的一般特科。由于通经可以入仕，故当时邹鲁一带流传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一般情况下，郡国所贡举的明经，还需按射策（一种抽签考试）加以复试，故有明经射策之科。东汉时，又产生了按郡国口率贡举明经的规定：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另还实行限年诣太学之法，规定：“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顺帝时因太学新成，遂令试明经下第者补博士弟子，让他们在太学重新学习一年，以便来年复试。为此，又特增加明经射策甲、乙科员各十人。



汉代讲经图

4. 明法

明法即通晓律令文法的意思，为两汉察举的一般特科。汉代统治者表面上号称尊儒，但实际上却“霸王道杂之”。其选举除重儒生外，把通晓律法也作为察举科目。

5. 至孝

两汉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故选举尤为重“孝”，除岁举孝廉之外，还有名为“至孝”的一般特科。

6. 有道

有道又称“有道术之士”或“有道之士”，为汉代察举的一般特科。这里的“道术”，主要指治道的方法。不过，汉代道术概念应用很广，有时也指天文（包括占候、星占）、医学（包括巫医）、神仙术、相术、命相、遁甲、堪舆等；有时似还可指精通谶纬之学；在某些地方，“道”又作“道德”讲，“有道之士”即“有道德之士”。

7. 敦厚

两汉察举敦厚（或作“淳厚”“淳朴”“敦朴”），大概分三种情况：一是敦厚与质朴、逊让、有行连在一起，构成岁举性科目光禄四行；二是敦厚粘连在其他科目之后，仅仅作为一种附加成分；三是敦厚单独作为科目（多数在敦厚之后还粘连附加成分）。这里所述，系指第三种情况而言，亦属察举的一般特科。

8. 尤异

汉代官吏治绩特别好称作尤异。把这样的现任官吏察举出来，使之担任更高一级的职务，便是所谓的“举尤异”，亦属察举一般特科。

9. 治剧

治剧是与尤异十分相似的察举一般特科。两汉时，郡县因治理难易程度有剧、平之分。能治剧者，用现代话讲，即能治理老大难郡县之意。其察举亦限于现任官吏范围之内。

10. 勇猛知兵法

勇猛知兵法或称举勇猛士，亦为察举的一般特科。这是因军事需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多见于“灾变不息，盗贼众多”之时。

11. 明阴阳灾异

即察举明习阴阳灾异学说之人，属一般特科。这是当权者为解决某种危机而乞灵于术数迷信的措施。

两汉察举科目，由于往往只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故新科目不时有之。限于篇幅，以上仅罗列了最主要者和最重要者。

四、察举制对汉代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汉代选用人才的途径于察举之外还有一些，不过，察举却是其选举的正途。换言之，即最具时代标志意义的仕途。它反映了汉代政治文明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那么，察举制对汉代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起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以下的两点尤其值得重视：

其一，汉察举选拔人才具有对体制外的开放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汉的政治肌体能够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保持其活力与稳定。

一个政治肌体，能否稳定、能否具有活力，与其是否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从体制外广选人才、与其是否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大有关系。在这方面，汉代政治制度颇多可称道之处。

前文叙述汉世察举最重要的岁举科目孝廉时曾特别强调指出一点，即孝廉多从未仕者之中选出。换言之就是说，岁举的孝廉多数是从体制外的平民里面选拔出来的。据研究者的统计，其比例接近60%。这充分反映了当时选举所具有的对体制外的开放性。而如此一种开放性所带来的社会流动，令官吏队伍不断吐故纳新，具有一定的生气。

其二，汉代察举的标准，多伦理、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这对于引导当时的社会

风气，规范时人的行为准则，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具有借鉴价值的。

政治行为对于社会风尚的引导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选用人才所制定的标准，对全社会来说，就是一个导航的灯塔。汉世察举选人，重孝重廉，并把这二者具化为一系列可操作的制度付诸实施。例如当时察举最重要的岁举性科目“孝廉”，即把“孝”与“廉”合并一起做标准来选拔人才。此外，“孝”与“廉”又都各自独立成科以选用人才，前者称“至孝”，后者名“察廉”。这些做法，自然有力地推进了汉代社会崇孝崇廉风气的形成与发展。唯其如此，汉代史书中便有所谓“孝子传”的出现，便有众多官吏死后“家无余财”、甚至无以为葬的记载。

我们且莫以为史书所述说的是在作秀或在骗人，实际上，这些记载已经得到今天考古发现的证明。例如西汉著名的酷吏张汤，官至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汉书》本传记云：“汤死，家产直（值）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2002 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发现了张汤墓。其出土随葬品十分简单，多为小件器物，且多为日常生活用具。故发掘简报得出结论称：“这些均与文献记载相合。”此例充分证明，汉代官吏廉洁的程度足令今人刮目。而这种世风的形成，显然同政治制度相关规定的引导密不可分。

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汉代察举制对于“赃吏”所做出的种种严厉限制措施，例如规定“赃吏子孙不得察举”之类。如此严格限制并殃及子孙的举措，从另一个方面有力地促成了汉世广泛的崇廉风尚。在两汉人心目中，“贪汙坐赃”实为最可耻的事情。总的来看，汉代历史上出现的大贪污犯相对较少，当是不争的事实。这应该说与察举制规定严密、执行力度大有绝大关系。



五、察举制的影响与启示

在整个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发展的历史上，察举制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承上启下，不仅为汉代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人才，对稳定两汉的政权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的科举制，成为自隋唐至明清各代选用人才以巩固统治的主要途径。大家知道，科举制是较察举制更高一级的人才选拔制度。它将察举制中本已具有并不断强化的考试因素更加扩展，使之成为人才选拔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而这种通过考试选用人才的科举制，后来被西方社会所借鉴，发展为所谓的“文官制度”，成了支撑西方政治文明大厦的最强大的支柱之一。从这样的视角去看，察举制的深远影响不仅限于中国社会，而且远及西方世界。

古人认为人才的选用直接关系国家的盛衰。例如《吕氏春秋·求人篇》讲："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墨子·亲士》讲："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应该说，这些大抵都反映了重视人才选用的认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古人相当自觉地将之具化为一定的制度，如汉代产生的察举制便是如此。从前述关于察举的过程可知，其第一步诏定科目和第三步对策考试，都是需要皇帝亲历的。这充分表明最高当政者对选用人才的高度重视，他们把选用人才当作治国者的头等大事来抓。仅此而论，对今天就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然，从前文叙述的察举制对汉代良好政治生态所起的作用来看，无论是察举选人对体制外的开放性也好，抑或察举标准对引导社会风气、规范世人行为准则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好，应该说，对于今天同样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这些地方，我们似都可以向古人学习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二十七天的汉帝

西汉昭、宣两代，号称“中兴”，是又一治世。不过在昭帝去世后发生了一场短暂的最高层政治动荡——虽然它并未引发什么危机，但却留下了一个迄今也难解的历史谜团，令人无限遐思。这就是那时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只做了二十七天的大汉皇帝刘贺。而此事的缘由，还需要从昭帝朝的一场未遂政变说起。

一、燕王旦谋反失败

巫蛊之祸打破了汉武帝在接班人方面的布局，原太子刘据死后按次序储君的空座应由燕王刘旦继承。史载旦“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颇有才干。但他继位心切，竟上书求入京宿卫，俨然以武帝继承人自居。不料武帝对此举十分厌恶，遂将燕王使者下狱，并借其藏匿亡命犯法，削三县之地，使刘旦大失所望。



昭帝刘弗陵，钩弋夫人所生，是武帝的少子。当他被选定为太子后，武帝即赐死其母，以防子幼母壮出现女主专权，这一做法被称为“钩弋故事”，为后世统治者所称道。昭帝即位时年仅 8 岁，依武帝生前安排由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同辅政。燕王旦得到武帝驾崩的消息及昭帝玺书后，怀疑京师有变，上书“请立庙郡国”，未获准，于是大怒称：“我当为帝。”遂与宗室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结谋，伪称曾受武帝诏，“修武备，备非常”。他们散布“少帝（即昭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积极准备起兵讨伐。由于罢侯刘成告发，始元元年（前 86）八月，青州刺史隽不疑收捕刘泽，并上报皇帝。朝廷审讯中连出燕王刘旦，因至亲之故，有诏特许勿治，而刘泽等皆被处死。此后刘旦的野心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同盖长公主、上官桀等勾结，更变本加厉地策划夺权。

盖长公主为武帝长女，燕王旦之姊，食鄂邑，故又称鄂邑盖长公主。年幼的刘弗陵始立，盖主居禁中共养帝。其男宠丁外人与左将军上官桀之子上官安相友善。安娶大将军霍光女为妻生有一女。此女刚 5 岁，安就打算送其入宫。秉政的霍光认为外孙女尚幼，

不许。上官安便通过丁外人使盖主在宫中活动，结果其女被召入为倢伃，不久又立为皇后。上官安以皇后之父封桑乐侯，迁车骑将军。上官父子并为将军，有椒房中宫之重，而桀早在武帝时已为九卿，位在霍光之上，他见霍光专制朝政，遂心怀嫉恨，与光争权。上官氏为报答丁外人恩情，为其求侯，屡为霍光所阻，从而盖主与光有怨。加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因政见不同，也对霍光不满。这样，反霍的各种力量便很自然地纠集在燕王旦的旗帜之下。

当时盖主、上官父子及桑弘羊与燕王通谋，暗中指使人为燕王上书皇帝，控告霍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请求入京宿卫，以察奸臣之变。上书者趁霍光休沐日，上官桀当值时将书奏上。上官桀、桑弘羊等原打算借昭帝名义将霍光执退。不料年仅 14 岁的昭帝竟看出奏书的破绽。次日霍光上朝，闻知此事，止画室中不敢入。昭帝诏召大将军，亲自宣布其无罪，并下令逮捕上书者。上官桀等害怕事情泄漏，便极力阻止追捕，说小事不须穷究，昭帝不听。后桀党又有人谮陷霍光，昭帝大怒说：“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

反霍派不甘心失败，于是进一步密谋由盖长公主宴请霍光，乘机以伏兵杀之，然后废昭帝，迎燕王旦为天子。当时燕王旦亦与上官桀等密书往来，暗许立桀为王。上官安的野心更大，甚至计划诱杀燕王旦而立父桀为帝。有人问他：“当如皇后何?”他竟回答：“逐麋之狗，当顾菟邪!”正当反霍派紧锣密鼓积极策划之时，盖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仓向大司农杨敞揭发了他们的密谋。杨敞一贯谨慎怕事，得讯后吓得装病不出，而将此消息告知谏大夫杜延年，杜则向昭帝上奏。结果，上官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等被捕并族灭之。时在元凤元年（前 80）九月。燕王、盖主亦自杀。一场谋划多时起伏跌宕的政变，终于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二、昌邑王刘贺入主汉廷

燕王、上官桀等谋反被粉碎后，霍光声望进一步提高。原来的四位顾命大臣中，金日磾早死，上官桀、桑弘羊伏诛，唯一剩下霍光，大权独握，“威震海内”。

元平元年（前 74）四月，年仅 22 岁的昭帝病逝，无嗣，群臣咸举武帝子广陵王刘胥继位。“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正当霍光“内不自安”时，有一郎官上书言“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霍光如获至宝，以其书遍视大臣，于是改迎昌邑王刘贺继位，那位郎官也被超擢为九江太守。

刘贺系武帝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生于昌邑（今山东菏泽市巨野县）。刘髆是武帝宠姬李夫人所生，自幼深受武帝喜爱，特聘名儒夏侯始昌为其施教，寄予希望。可



昌邑王画像

惜刘髆是武帝六个儿子中最平庸的一位，既无政治抱负，也没有什么政绩，所以在《汉书》本传中仅有九字的记述："天汉四年（前97）立，十一年薨"。研究者估计，髆在封王时所得赏赐特别优厚，武帝借此表达他的一片爱子之心。髆去世后，贺于始元元年（前86）嗣立为昌邑王，时年五岁左右。如此孩童便身居王位，刘贺自然容易养成目空一切、恣意妄为的性格，所以史书记载说他"在国素狂纵，动作无节"。甚至在为武帝治丧期间，他依然"游猎不止"。这在当时是有失礼仪的重罪，只是因为无人举报，遂使刘贺更加任意胡为。昌邑国中尉王吉劝诫他要停止游猎，认真读书，"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让他注意养生，使"体有乔松之寿"，还暗示他与当今皇帝（昭帝）最亲，可能有继承帝位的机会云云。对此，刘贺表面上赞同，并厚赏王吉，但实际上仍我行我素，放纵如故。昌邑国郎中令龚遂针对刘贺"久与驺奴、宰人游戏饮食，赏赐无度"，当面涕泣劝谏说："今大王亲近群小，渐渍邪恶，所习存亡之极，不可不慎也。"并聘请"通经有行义者"陪他学习，"坐则颂《诗》《书》，立则习礼容"。刘贺表面上予以接受，但数日后便把这些人赶走。

前面指出，昭帝逝后辅政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商议立帝之事，最终确定人选为刘贺。于是霍光奏明皇后，请下诏遣少府兼代理大鸿胪职事的乐成等大臣迎接昌邑王进京主持昭帝丧事——这实际就是要立刘贺为帝的代名词。刘贺接到征书后，于当天中午便出发，黄昏时即赶至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半天走了135里，可见其急切的心情。王吉上书劝诫道："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意谓不要过急乱生事。书中还说霍光辅政，有仁爱、勇智、忠信之德，为武帝所信任，故以天下托付之；希望刘贺对霍光"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刘贺对这些忠告，全当耳旁风，一路上不断扰民生事。例如到济阳（今河南兰考）时，求长鸣鸡，买积竹杖；过弘农（今河南灵宝）时，令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供其淫乐等等。朝廷的使者责问昌邑国相安乐有无此事，刘贺谎称无；后遂以处置大奴善为幌子，遮掩丑闻，使事情不了了之。刘贺到了霸上（今陕西西安东），有司至郊迎接，驺官请换乘舆车，他即命昌邑太仆寿成赶车，郎中令龚遂参乘。行至长安东郭门（东都门），龚遂说"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刘贺称喉咙痛不能哭。至长安城门，龚遂说"大王宜下车，

乡（向）阙西面伏哭，尽哀止。”这次刘贺倒是答应了，“哭如仪”。

贺被征入朝后，先立为皇太子，六月丙寅受皇帝玺绶，即帝位。然而这位新皇帝并未因身份改变有所收敛，仍然放纵、淫戏无度，日与近臣饮酒作乐，斗虎豹，或召皇帝专用的皮轩车与亲信各处游荡，违背圣道。龚遂哭泣着对昌邑相安说：“君，陛下故相，宜极谏净。”而刘贺对所有谏言一概不听。更为严重的是，刘贺将原昌邑国的官属200余人调至长安，越级提拔以掌握朝廷实权。太仆张敞上书谏阻道：“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辈先迁，此过之大者也。”意谓刘贺的做法有违政治规矩，犯了官场大忌。刘贺对此依然不听。

三、新帝被废黜

面对新帝刘贺的胡作非为，主政大将军霍光深感忧虑，遂问最亲近的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应该怎么办。田回答说：“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于是霍光暗中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商量废黜刘贺的计划，然后又与田延年找丞相杨敞说明情况。

杨敞其人，前面已有叙述。当年他得知上官桀等谋反的消息后，被吓得装病不出，幸亏他把此事告诉了杜延年，由杜上报朝廷，才避免了一场政变发生。这次他的反映与前相似而略有进步：初时惊惧不知所言，后经夫人开导，才表示“请奉大将军教令”。在征得丞相同意后，霍光召集群臣在未央宫开会，问道：“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听后“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田延年见状遂离席按剑说：“先帝（武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当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今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霍光谢道：“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田延年与霍光两人这近乎问答的一席话，可谓醍醐灌顶，让群臣们顿时明白过来，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

会后，霍光即率群臣向皇太后奏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太后遂下诏不许昌邑群臣进入宫门。刘贺入朝太后，想回未央宫温室，宦官闭门不许昌邑群臣进入。刘贺问原因，霍光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刘贺道：“徐之，何乃惊人如是!”霍光令驱赶昌邑群臣放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派羽林军逮捕昌邑群臣200余人送入廷尉监狱。霍光又命中常侍看守好刘贺，不要让他自杀，以免落下杀主之名。

当时刘贺傻乎乎地还不知道自己要被废黜，向左右问道：“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很快太后有诏召刘贺。贺恐惧地说：“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只见太

后披珠襦盛装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器，期门武士执戟以卫。群臣依次上殿，召刘贺伏前听诏。霍光等大臣联名陈奏昌邑王受诏入朝后的劣迹，主要如：

——居丧时无悲哀之心，废礼仪。

——在进京路上不素食，掠取女子纳所居传舍。

——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

——受皇帝信玺后，在昭帝灵前发玺不封。

——在宫中召引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敖戏。

——亲自到符玺署取节十六，朝暮哭临，令从官更互执节，从至哭临之所。

——为书问候昌邑侍中君卿，奉黄金千斤，赐娶十妻。

——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纳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

——昭帝下葬后，不居丧位而处前殿，击钟磬，召纳乐人于辇道，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大牢具祠阁室中，祀已，与从官饮啗。

——驾法驾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

——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

——与昭帝宫人淫乱，并命掖庭令保密，有泄言者腰斩。

——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给昌邑国郎官、免奴为良人者佩戴。

——变易节上黄旄为赤色。

——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

——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

——违背未释服未可御故食规定，诏太官上乘置舆食如故；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入以为常。

——独夜设九宾礼于温室，延见秫夫昌邑关内侯。

——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令使者持节，以三大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

——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交横，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

——拒绝纳谏，簿责、系狱进谏大臣。

——荒淫迷惑，失帝王礼仪，乱汉制度，日以益甚，危社稷，使天下不安。

根据以上的过失，联名奏诸大臣认为新帝“当废”。皇太后诏曰“可”。就这样，刘贺做了27天大汉皇帝即被废黜。尽管当时刘贺以“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之辞进行抗争，但在霍光持执下，解其玺组，扶出金马门，送至昌邑邸。霍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等驽怯，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并“泣涕而去”。

四、两千年后的风光

27 天皇帝刘贺，史称汉废帝。从霍光等人联名奏所列刘贺的过失来看，大体都是荒淫无度、违背礼仪制度方面的，有些甚至属于鸡毛蒜皮之类。当然，这些在当时人眼中可能都是天大的事，不过因此就废黜皇帝总令人感到费解。一些研究者曾指出，此中真正的原因当为擅权的霍光与“昌邑群臣”间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如果细译前面所陈奏的二十多条刘贺的罪状，不难发现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均与昌邑国的人和事有关，由此使我们不能不觉得这样的权力斗争说似乎确有一定的道理。前面已经说过的张敞谏言，“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辈先迁，此过之大者也”，似也点明了这样的矛盾症结所在。

按照群臣的意见，被废黜的刘贺应当流放到汉中房山县。太后不同意，命刘贺回昌邑，免去王爵，而原昌邑国的财产仍归贺所有，另赐汤沐邑两千户。由此昌邑王国被废，改为山阳郡。宣帝即位后，对刘贺颇有顾忌，暗中派人监视。后得知贺并无复辟野心，只痴迷于腐朽生活，且体弱多病，遂感到放心，于元康三年（前 63），封刘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后削为三千户）。当年四月，刘贺前往豫章郡海昏县（今江西南昌）就国。神爵三年（前 59），刘贺卒。



海昏侯墓出土刘贺印

2011 年以来，位于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的海昏侯刘贺墓被发现并发掘。此墓被公认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葬，所出土的大量金银财宝令人咂舌，一时间媒体刮起了海昏侯墓旋风，2015 年入选为“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历史似乎是在开玩笑。刘贺生前只不过是一介废帝，不想死了两千多年后却又如此大大风光了一把。

（撰稿人　秦　客　黄倩茜）

王莽其人和新朝其事

一、王政君的发迹史

要讲王莽和他的新朝那些事儿，必须从王政君的发迹史说起。

王政君，史称“元后”，即汉元帝皇后的意思，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以东）人。其祖父王贺，武帝朝官绣衣御史；父亲王禁，少学法律，为廷尉史，有四女八男，政君为其次女。

宣帝五凤年间，政君入掖庭为宫女，时年 18 岁。恰巧此时皇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所爱幸的一个姬妾病死，太子悲愤发病，忽忽不乐。宣帝疼爱儿子，便令皇后在后宫宫女中挑选五人侍奉太子，政君即在其中。当时太子对这些宫女并不感兴趣，但碍于皇后的面子，不得已勉强答应说“此中一人可”。刚好政君坐近太子，而所穿衣服的颜色显眼特别，于是就被送入太子宫中，并得御幸而有身孕。甘露三年（前 51），生一男为世嫡皇孙，深受宣帝喜爱，亲自为之取名骜，字太孙。政君自然也母以子贵，地位非同一般了。



此后三年，宣帝去世，太子即位，是为汉元帝。立太孙为太子，以母王政君为婕妤，封政君父王禁为平阳侯。过了三天，王婕妤被立为皇后，王禁位特进，禁弟王弘官长乐卫尉。就这样，王氏家族成为朝内的政治新星。永光二年（前 42），王禁逝世，其长子王凤嗣侯，拜官卫尉侍中。

及元帝驾崩，太子立，是为汉成帝。尊王皇后为皇太后，以太后兄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全面掌有朝廷的大权，史称“王氏之兴自凤始”。河平二年（前 27），王凤诸弟谭、商、立、根，逢时五人同日封侯，世谓之“五侯”。是时，“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其间虽有朝臣如王章者曾借日食之类天变弹劾王凤，但在以太后王政君为首的王氏集团反击下，王章等以彻底失败告终。著名学者杨树达曾指出：“王凤见留，王章罪死，此事为刘王二氏消长之枢机。”史称：“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将刺史皆出其门”。

王凤专政长达11年之久，临死前把侄儿王莽推荐给太后和成帝。这位王莽是外戚王氏集团中更为出类拔萃的权谋高手，他的出场为日后王氏取代刘汉埋下了一颗特别强壮的种子。至成帝末年，他已任职大司马，成为当政的实权人物。

汉成帝无子，死后由定陶恭王子继嗣，是为汉哀帝。这时王政君虽被尊为太皇太后，但王氏集团的权势已有所下降，王莽甚至被罢退回到自己的封国。不过哀帝在位仅6年多，如此短暂时间内王氏势力尚不致全然消退。当哀帝一死，王政君即召王莽入朝复任大司马，共议征立平帝，并临朝称制，委政于莽，最终上演了一幕王氏代汉的历史大剧。

二、王莽的政治钻营

王莽，字巨君，自称是黄帝的后代。他的亲姑姑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他家算是正宗的外戚。不过，他的父亲死得较早，也未曾封侯，家境相对孤贫一些。这样的客观环境，使他养成了一种既折节恭俭，又自我奋斗的性格。同时还练就了一套善于察言观色、曲意奉承、伺机钻营的本领。他曾拜沛郡（治今安徽淮北市西）人陈参为师，学习《礼经》，“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在家中“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对外广交“英俊”；在族内悉心“事诸父，曲有礼意”。成帝阳朔年间，他的伯父，权倾当朝的大将军王凤患病。他觉得这是一个能够改变自己现状从而飞黄腾达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下大力气精心护理生病的伯父。“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不想这一手还真灵验，王凤终于被感动，临死前把他推荐给太后和皇帝。那太后王政君，就是王凤的亲妹妹；而皇帝（汉成帝），则是王凤的亲外甥。他们对王凤举荐的人，岂能不用！于是乎王莽由此步入仕途，先拜黄门郎，不久即迁官射声校尉。



王莽像

永始元年（前16），30岁的王莽继嗣了补授给其亡父的新都侯的爵位，并担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的官职。随着官爵的升迁，他更加以谦谨的方式来“匿情求名”。“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果然，又有一个机会被他抓住了。原来太后姊子淳于长，与王莽一样也是个极善于钻营的人物。由于他为立

赵飞燕为后之事卖过力气，所以得到汉成帝的赏识，不仅受封列侯，而且位居九卿。此人显贵之后，“淫于声色，不奉法度”，十分猖狂。王莽对他一直看不惯，尤其是嫉妒他的官比自己升得快，地位比自己高。于是王莽便“阴求其罪过”，亦即秘密搜集淳于长的过错乃至隐私，通过大司马曲阳侯王根向太后告密，并最终置他于死地。这样一来，王莽不仅铲除了竞争对手，而且获得了“有忠直节”的更大名声，真可谓一举两得。绥和元年（前8），王根上书告老“乞骸骨”，并推荐由王莽接替他所担任的大司马职务，被汉成帝批准。如此王莽终于爬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利高峰，时年38岁。

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人，便口含天宪，手握大权，应该说是人生的极大成功。不过王莽此时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需要继续付出代价。“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吏，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遮膝。见之者以为童使，问知其夫人，皆惊。”就这样，王莽小心翼翼地辅政一年多时间，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不想成帝这时却撒手人寰，离世而去。继立的哀帝似乎对王莽不感兴趣，出于外戚间的复杂斗争，他被罢官回封国杜门自守。此时，他更加小心谨慎。一次，他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奴隶，他便毫不客气地责令其自杀。这件事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多年来王莽恭俭克己给人们留下的好印象，所以他在封国的三年之中，“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前2），刚巧发生日食，参加对策的一些贤良也乘机颂莽功德。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哀帝不得不把王莽征还京师。岁余哀帝驾崩，无子，而莽的主要政敌傅太后、丁太后等皆先期死去，这样汉廷的大权又全部落入太皇太后王政君及其侄王莽之手。



此次王莽重新上台，完全今非昔比。他先诛灭了哀帝的宠臣董贤，接着迎立年仅9岁的汉平帝即位作为傀儡，自己则以辅政大司马的身份掌握着实权。“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把自己的亲信全部安插在要害部门，层层加强控制。当然，王莽毕竟是王莽，他的所作所为有其非同一般的特色。“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于众庶”。显然，王莽政治手法较其他人更为隐蔽狠毒，他的权术手段较其他人也更加阴险狡猾。当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王莽便向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挺进了！

三、代汉三部曲

王莽取代汉政权建立新朝，归结起来，大体演出了如下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晋位安汉公，宰衡，加九锡。

平帝元始元年（1），王莽示意益州塞外的夷族，自称越裳氏，重译到汉廷献白雉。那么，为何要搞这种名堂呢？原来《尚书大传》里讲，交趾的南面有一个越裳国，当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太平之后，他们骑着大象，带着几重的翻译，到中国来献白雉，以歌颂中国出了圣人。这就是所谓的“周成白雉之瑞”。而今，祥瑞重新出现，那王莽就是活脱脱的周公了。周公托号于“周”，王莽也当托号于“汉”，于是乎拥莽的群臣强烈要求太后给有定国安汉大功的王莽赐号“安汉公”，以顺天心。王莽假惺惺地克让了一番之后，便堂而皇之地戴上了安汉公的桂冠。

居位安汉公后，王莽的权力欲并未到此为止。元始四年，他又变着花样让自己的女儿做了皇后，以强化其权势。这时，太保王舜等向太后奏言，称赞王莽是至德大贤之人，生当有大赏，死当为宗臣（配享太庙），应该像殷的伊尹称阿衡、周的周公称太宰那样，有更高的尊号才对。民众中附和者八千多人，也纷纷上书强烈要求这么做。太后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从“阿衡”和“太宰”中各摘取一字，赐王莽以“宰衡”的称号，以表示他更崇高的地位。同时，又加增了他在新野的封地。王莽接受了宰衡的称号，却推辞了增加的封地。不料这么一来，又让他扮演了周文王却虞、芮之讼的角色。原来传说周文王多行善事，诸侯之间有了不能解决的事情就请他评判。一次虞国和芮国的人发生了官司纠纷，便来找周文王决平。谁知他们一进周的国界，只见“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尽管还没见着文王，自己就先惭愧起来，彼此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如此这纠纷也就解决了。王莽辞封地之后，果真就有蜀郡男子路建等撤销诉讼自称惭怍而退的事情发生。王舜等又赶紧上奏，着实把王莽大加吹捧了一番。

那时候，为王莽不受新野田地之事先后给朝廷上书诉不平的“吏民”多达 487 572 人（请注意：史书记载的就这么精确），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也都叩头进言，纷纷要求加大对安汉公赏赐的力度。而王莽却是一个劲儿地苦苦辞谢。太后一看这架势，只好来了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一方面暂且听从王莽“不受赏”的意见，另方面让群臣议“九锡”的礼典，即赏赐九种物品或待遇，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把这种相传的古代最高赏赐授给他。很快，以张纯为首的 902 位大臣便根据《周官》《礼记》的有关记载议定了“九锡”之礼，王莽也就顺顺当当地接受了这项特殊的恩宠。

第二部曲，居摄，称假皇帝。

元始五年，汉平帝已经 14 岁。随着平帝年龄的增加，王莽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尽管一年多以前，他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亲儿子王宇为代价，铲除了平帝生母卫姬的家族势力，阻止了朝中一些大臣策划归政卫氏的企图，但是眼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平帝，他似乎总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于是决定加快代汉的步伐。

是年冬天，平帝生了病，王莽认为除掉这颗眼中钉的机会到了。他一面故作姿态，

以周公为榜样，依样画葫芦地请命与泰畤，声言愿代平帝而死，并将策文藏于殿前，有意命令大臣们不得向平帝走漏消息；另方面竟利用腊月“上椒酒”祝寿的机会，“置药酒中”，毒死了平帝。事后，他又大卖关子，宣布全国实行大赦，命令凡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要服丧三年。当时元帝的嫡嗣至平帝已断绝，而宣帝的曾孙封王并健在的有 5 人，封为列侯的尚有 48 人。王莽见他们均已成人，难以驾驭，于是打出“兄弟不得相为后”的旗号，将他们统统排斥在一边，却从玄孙辈中挑选了年仅 2 岁的广戚侯子婴为平帝的继承人，借口是这个孩子的“卜相最吉”。

就在这时，前辉光郡（当时京师辖地分为前辉光、后承列二郡）郡守谢嚣上书，说武功（今属陕西）县长孟通挖浚水井时，挖出了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面有一行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让大臣们赶快把此事上报给太后。不料太后听罢立刻表态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见势不妙，连忙劝谏道：“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正；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太后一听这话，也意识到自己的侄儿的羽翼已丰，想阻止他是不可能的了，只好“听许”。在王舜等的催促下，太后降诏：“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为了自圆其说，又特别把武功“白石”上的“为皇帝”解释作“摄行皇帝之事也”。这样，王莽便名正言顺代表汉天子临朝听政，做了“假（代理）皇帝”——臣民则称之“摄皇帝”，并改年号为“居摄”，而把子婴立为皇太子，号曰孺子。

第三部曲，即真，建立“新”朝。

王莽做了假皇帝后，总感到这个“假”字别扭，一心想要尽快当“真”皇帝。西汉后期盛行图谶、符命，王莽在当假皇帝前搞的武功丹书白石，使他尝到了玩弄这类把戏的甜头，于是乎“符命之起，自此始矣”。居摄三年（8）又出现了几宗符瑞。一是广饶侯刘京所言齐郡新井。原来齐郡临淄县有个名叫辛当的昌兴亭长，一夜里几次做梦，梦见一个人向他说：“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第二天亭长起来，果然发现亭中有口新井，深且百尺。二是车骑将军千人扈云报告的石牛。三是太保属臧洪奏报的扶风雍地的石文。而且石牛、石文都被送到了长安，王莽、王舜等去看时，忽然狂风大作，对面不见人，待风停，石前竟有一幅铜符帛画，上面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王莽立即将此事奏上太后，大讲所谓汉的三七厄运，意谓汉王朝历经十二帝二百一十年，气运已尽，该遭厄难，天命不可不畏。从此，这位摄皇帝便去掉了一个“摄”字，并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

当王莽进一步为如何再去掉头上的“假”字煞费苦心的时候，正在长安游学的广汉郡梓潼（今属四川）人哀章，见有机可乘，便精心伪造了一个铜柜，内放两份书简：其

一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表示是上帝的命令；另一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这里的“某”指汉高帝的名字，书谓高皇帝刘邦授意应该把帝位让给真命天子王莽，皇太后应该顺如天命转移国祚。图书上还写明八个在位大臣和哀章本人以及杜撰的王兴、王盛等11人的官爵，作为新的真命天子的辅佐。这位哀章尽管品性差劲、好吹牛皮，却极善于揣测王莽的心理。他听到“齐井、石牛事下”，遂于当天黄昏时候，身穿黄色衣服来至高庙，把所带来的铜柜交给了那里的负责人。王莽闻讯如获至宝，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亲临高庙拜受这上天赐予的金匮策书。他以应天承命为名，逼使太后交出了传国玉玺，终于登上了真皇帝的宝座。其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年号为始建国。然而，直到这时王莽仍不失其一贯作风，他亲切地拉着被废的孺子婴的手，满面流泪地说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人意!”其表演情真意切，令在场的“百僚”“莫不感动”。

至此，王莽总算借投机家哀章一手炮制的上天符命，完成了他代汉的三部曲。

四、托古改制

王莽登上新朝皇帝宝座后，面对长期以来积累而成的天下汹汹、民怨鼎沸的社会现状，为显示新朝政权是承天受命、顺应民心的合法政权，他本人是能解民于倒悬的真命天子，遂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托古改制”活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王莽从当时社会最为关注但又最为棘手的土地和奴婢问题着手，宣布实行所谓的“王田”“私属”制。这是新莽改制中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其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 全国田地均归国家所有，不得买卖，称作“王田”。

2. 凡一家有8个男丁者，可有田一井，即900亩。

3. 原有田地超过规定亩数，即一家男丁不够8人而田超过900亩者，将超过部分分给宗族或乡邻无田而应受田者。

4. 无田之家，应按有关规定从政府受田。

5. 奴婢不得买卖，改称为“私属”。

6. 凡攻击井田制度，煽动他人破坏法令者流放至边境。

大凡对汉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沦为奴隶，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哀帝朝以大司马师丹为代表的一批官僚，曾提出一个“限田限奴”的建议，以缓和社会矛盾，却未能实行。王莽的“王田”“私属”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可视为当年师丹建议的延伸和扩展。据著名秦汉史专家陈直教授考证，王

莽的王田制曾部分实行过。然而，由于大地主和中小地主联合抵制，此制无法进一步推广，并引起“自诸卿大夫至于庶民”的广泛反对。这是因为：首先，以土地买卖为杠杆的土地私有制，自战国后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经济运动的主旋律，至秦汉时期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基本适应，绝不是任何个人的一纸空文能够取消得了的。其次，农民既是土地私有制的受益者，也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他们受土地买卖天公地道时代观念的束缚，从来也没有正式向土地私有制发出挑战；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集中反映在其自身对土地的拥有上，而不是要取消土地私有制。第三，王莽的土地改革关键在于保证政府的土地税征收，以维系帝国庞大的财政开支，从来也没有真正顾及农民的利益。所以新莽的王田措施不仅无法扭转历史，空自招来地主们的不满和反抗，而且希望落空的农民的怨怼很自然地把王莽逼入两面夹攻的绝境。始建国四年（12），当郎中区博进谏痛陈利害后，王莽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布：“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就这样，王莽改制的重头戏“王田”、“私属”制正式宣告破产。

除土地、奴婢方面的改革外，币制改革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另一重要领域。早在新朝建立之前，王莽为打击货币持有者，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便曾搞过币制改革。居摄二年（7），他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为理由，下令新增“一直（值）五千”的“错刀”、“一直（值）五百”的“契刀”和“一直（值）五十”的“大钱”等三种钱，让与西汉原有的五铢钱一块儿在市场上流通。由于新发行的货币质量低劣，远不值所定之值，而政府又用这种劣质钱兑取百姓手中的五铢钱，从中渔利，结果不但使流通秩序混乱，而且造成了民众对新币的不信任。人们拒绝使用新货币，王莽就用严刑酷法强制推行，以致出现令“民人涕泣于道”的情景。

新朝建立后，在以往货币改革所造成的严峻事实面前，王莽不但丝毫没有醒悟，反而突发奇想，硬要给经济现象赋予一种想当然的政治内涵，企图通过改变币制，抹去汉朝刘氏天下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记。“劉”字，由卯、金、刀三部分构成，这与货币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在王莽的眼里，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他认为，金、刀就是当时流通的五铢钱、大钱、契刀、错刀等货币的代称，如果大家不再使用它们，不就等于抹去了人们头脑中汉朝刘家的印记吗？于是乎在始建国元年、二年（9、10），王莽又两次改革币制，颁行“宝货五品”，把货币分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指金、银、铜、龟、贝五种不同的币材；六名是六类货币的名称，即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泉；二十八品为28种货币的交换比值。如此混乱的币制，同时在市场上运作，连王莽自己也搞不清楚该怎样折算。因此，时过不久，王莽就不得不宣布取消龟、贝、布之类的货币，只准流行“小钱直（值）一”和“大泉五十”两种。天凤元年（14），王莽又进

行第四次货币改革，重申金、银、龟、贝币可用（价值有所增减），废除大小钱，以重五铢值一钱的货泉和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钱的货币两种并行。王莽多次的币制改革，使社会经济陷入极度的混乱中，“农商失业，食货俱废”。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他始料不及的。

属于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还有五均赊贷和“六莞”。王莽为了控制国家的经济运行秩序，采纳国师公刘歆的建议，于始建国二年下诏，声称根据《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的记载，以及《周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的原则，特推行这一改革措施。

五均为平抑物价，其内容主要是：

1. 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五都”，设五均官。具体做法是：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五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

2. 长安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南西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3. 工商各业，按其经营向市中申报，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即按时向他们征税。

4. 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中月”即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作“市平”。物价高于“市平”，政府就把所控制的物资平价出售，以平抑物价；物价低于“市平”，则听任自由交易。人们如有卖不出的五谷布帛等物，司市可按法定价收买之。

赊贷即向民众贷款。其规定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向钱府丞借贷。祭祀贷款限十天归还，丧贷限三个月归还，均不收利息。工商贷款，收取1/10 的年息或3% 的月息。

“六莞”指由国家管理的六种经营事业，具体是：国家专卖盐、铁、酒，政府铸钱，官家管理山泽，再加五均赊贷。

前文已述，汉武帝时期曾经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用以强化国家对经济运行秩序的控制。王莽搞的五均赊贷及六莞，和当年汉武帝的举措颇有某种相类似的地方。这种看起来确乎是造福于民众的措施，由于本身的空想性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失当——特别是用人不当，反而使其变为大商人、富豪掠夺财富的新手段，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人民大众。所以，当王莽垮台的前一年，即地皇三年（22），便不得不下令废除了这些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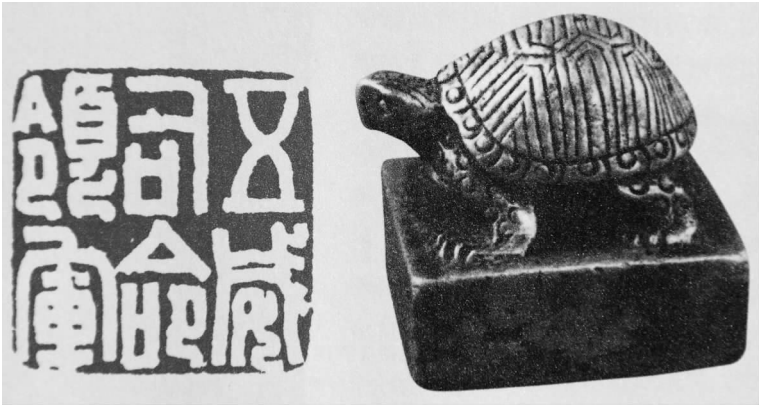
王莽在进行上述经济改革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之中，最重要的是其官爵制度的变更。

从前文所述可知，王莽是学礼出身，所以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他总企图给臣民以唐虞再世的新印象，于是煞费苦心地以《周礼》为蓝本，来改革典章制度。

他在西汉典制的基础之上，根据“五德”、符命和杜撰出来的古史系统，采用一改变二增减的办法，即改变原西汉的大批官名和秩禄之号，同时增减许多官职，从而建立起新莽的官爵体系。

王莽初即位时，曾依照哀章所伪造的符命，封拜辅臣 11 人，即“四辅”“三公”“四将”，合称十一公，形成最初的政府班底，以后又发展为所谓的“新室十四公”。此外，王莽又封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周公、孔子之后为公、侯。还根据《王制》及《周官》等典籍，改定秩禄之号：三公、卿、大夫和士。大夫又分上、中、下；士则有元士、名士、中士、下士、庶士。如此共计 10 种。始建国四年（12），王莽在长安南郊的明堂信誓旦旦地宣布，要依周制对诸侯授茅土裂地分封。可事实上，他连分封的图册都没有准备好，根本无法实授国邑。于是被封的 2000 多人，只得暂住京城，每月每人给几千钱花销。在物价飞涨的长安，几千钱根本不敷用度，害得这批受封者“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新莽变易汉官制分两种情况：其一是增加新官职，如在中央政府中增设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五威司命等官；地方则设州牧副、部监副等。其二是改易汉官名，如将中央官大司农先改为羲和再改为纳言，把大理（即廷尉）改为作士，改中尉为军正等；地方官太守改称大尹，又名卒正或连卒，县令、长则改叫宰，等等。



新五威司命领军印

王莽还对州郡县名称和区划，首都、宫殿以及城门名称，均作了较大的变动，如改长安为常安，长乐宫为常乐宫，等等。不仅如此，他对匈奴及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的名称和官号、玺印也进行更变，如把匈奴单于改称“降奴服于”之类。这一轻率的、带有侮辱性的举动，招致双方兵戎相见。

上述王莽的托古改制，可以说没有一项是成功的。他煞费苦心设计的改革措施，换

来的却是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纷乱如麻。这里，历史和对待秦帝国一样，也与王莽开了一个玩笑，他“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五、对周边地区的战争

王莽在改制的同时，还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发动战争。

王莽执政后，为显示自己的威德，特派五威将王奇等向周边少数民族颁发新室印绶，收回汉印绶，把原来汉朝所封的“王”尽改为“侯”，结果引起反抗。在东方，高句丽人反对王莽，莽派严尤征服之，并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但高句丽人一直没有停止斗争。在西方，西域各国纷纷反抗，断绝与王莽的来往。在西南，句町王径直起兵反抗。天凤元年（14），王莽派冯茂等发巴蜀兵击句町；前后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始终未能征服对方。

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是对匈奴的战争。匈奴自宣帝时起和汉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王莽辅政后，命令匈奴囊知牙斯单于改名“知”，以表示景慕他辅政时的“太平圣制”。他称帝后，派专使收回单于的“玺”，重新颁发“新匈奴单于章”。接着王莽又下令分匈奴全国为十五单于，并派人到边境招降呼韩邪单于诸子，封为单于。始建国三年（11），王莽一面下令把匈奴单于改称“降奴服于”，一面又大发北方各郡国及乌桓、鲜卑十二部兵，由十二将率领，分十路进攻匈奴，引起匈奴人强烈反抗。结果损失惨重，“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天凤五年（18），王莽又发兵击匈奴。“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称之为“猪突豨勇”，命全国吏民捐献资产三十分之一助军费。

这些战争大大加重了人们的负担，破坏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也加速了新莽的垮台。

六、新朝败亡

王莽取代汉室，旧史家一直称作“篡汉”。对此篡逆行为，自然会引起刘氏皇族及拥刘吏民的不满与反抗。居摄元年（6）四月，安众侯刘崇以“安汉公王莽专制朝廷必危刘氏”为由，率众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虽以失败告终，但却打响了武装反莽斗争的第一枪。

次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利用都试兵马的机会，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太子，号召天下，起兵反莽。天下为之震动，王莽惊慌失措，寝食不安，急调大军予以镇压。

三辅地区听说翟义起事，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男子赵明、霍鸿立即响应，东起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西到汧县（今陕西陇县），共有23个县的人响应，聚众达10万人之多，杀死右辅都尉和来县（今陕西武功西）县令，乘长安空虚，直逼京师，“火见未央前殿”。一时间，长安城风声鹤唳，一片混乱。王莽慌忙抱着孺子婴，来到郊庙之中，一边祷告，一边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一定归政幼帝。

到了冬末，翟义军失败。转年春天，赵明和霍鸿也战败身亡。参与起事的三辅吏民的尸体，分别被王莽下令堆放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圉（今河南杞县南）、槐里、周至（即陕西周至东）等五地的通衢大道旁，立木表，上书“反虏逆贼鳣鲸”六个大字，以威吓天下。

然而这种残暴的做法并没能杜绝反莽斗争的发生，初始元年（8）十一月，竟在朝堂之上又出现了反莽的事儿。原来朝中期门郎张充等六人不满王氏所为，于是密谋劫持王莽，拥立楚王刘行为帝，可惜由于行事不密而被扼杀于摇篮之内。

如果说上述刘氏宗族和拥刘吏民的反抗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挫创了王莽政权的话，那么，把新莽王朝送上断头台的主力则是广大农民的反莽义军。实际上，这类民众的反莽斗争一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就连首都长安附近也是“盗贼麻起”。为此王莽专门“建鸣鼓攻贼幡”，“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至新莽末，由于王莽长期的一系列瞎折腾，加以连年的灾荒、饥馑、疾疫相继，老百姓实在难以存活下去，不断的对外战争又引起了各族的反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如此就使原本分散各地的农民反莽义军由小到大迅速发展，而绿林、赤眉两军从中脱颖而出，形成两大主力。



绿林军始于天凤四年（17），以王匡、王凤为首，组织鄂西饥民聚集于绿林山（今湖北钟祥、京山、随县三地间的大洪山），公开反莽。后因逃避瘟疫，分兵两路转移。一支是王匡、王凤率领的“新市兵”，入南阳郡；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入南郡，号“下红兵”。不久，陈牧、廖湛率“平林兵”前来投奔，于是鄂北豫南成为绿林军的活动范围。赤眉军则兴于天凤五年（18），以泰山为根据地，推樊崇为首领。由于全军上下均将眉毛涂为红色以做标识，故被称作“赤眉军”。他们数度重创莽军，成为活跃在山东及其交界苏、皖、冀、豫诸省地区的重要反莽力量。

地皇三年（22），刘縯、刘秀等南阳宗室反莽武装力量加盟绿林军。转年二月，义军拥立属于刘氏宗室的刘玄为帝，建立更始政权，以复兴汉室江山为号召。一时之间，“海内豪杰翕然响应”，长安为之大震。该年六月爆发的昆阳（今河南叶县）之战，刘秀亲率数千义军以一当百，以少胜多，击败王莽数十万大军，从而敲响了新莽政权的丧钟。

昆阳大捷后，更始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匡率领向洛阳进发，攻下洛阳后与赤眉及河北诸路义军取得联系，联合反莽；一路由申屠建率领取道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

向关中挺进。

在此稍前，几十万饥民蜂拥进入关中。在东方田野里吃尽了庄稼的蝗虫，也铺天盖地由东向西一路飞往长安。未央宫的殿阁也爬满了蝗虫，以致大臣无法上朝。数十万饥民入关，吃饭成了大问题。王莽异想天开，派遣大批谒者、大夫前往抚恤，教饥民用草木煮成酪浆充饥，但事实上这种东西根本无法食用。同时，莽又设置养赡官，给长安等城市中的饥民发放少得可怜的粮食。监领粮食的大小官吏乘机中饱私囊，结果几十万饥民饿死了十之七八。京城里粮价飞涨，人心惶惶。王莽面对困境，一筹莫展。他除了一面大肆搜刮、纵情享乐外，就只有祈求鬼神，崇尚迷信，妄图侥幸逃避厄运。

申屠建率西路军进抵武关，早有析县（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率众起义响应，自称“辅汉”左右将军，迫使析县令投降，打通了武关通往长安的道路。此时长安“大姓”纷纷拥众自保，各路反莽军云集长安城下。王莽宛如瓮中之鳖，不知所措。有人告诉他《易》中有“先号啕而后哭”的经义，建议用哭的办法向上天求救。于是王莽竟真的亲率满朝文武大臣，赶赴南郊，向上天祷告。他捶胸挝足，嚎啕大哭，匍匐于地，捣蒜般叩头哀告，并作策书历数自己的功绩，以求感动天地。为了增加效果，他下令向陪哭的小民布施粥饭，哭声悲甚并能诵读策文的人则可授予郎官。一时间长安城南郊哭声惊天动地，结果居然有5000多人升为郎官，演出了一幕亘古罕有的闹剧。

为了保命，王莽特拜九位将军，号称“九虎”，率军东击，以求一逞；同时又把“九虎”妻儿扣为人质，押在宫中，以防他们叛变。他平日聚敛无数，临战对士兵却每人仅赐4000钱。这支心怀不满、毫无斗志的军队一到华阴县回溪，即被邓晔击溃，九虎战死六虎，溃军逃至渭口京师仓中，不敢再战。走投无路的王莽只得把监狱中的囚徒放出，发给武器，由新婚皇后之父史谌统领上阵。不料军队行至渭河桥，囚徒们便一哄而散。其中一些人恨极王莽，遂联手发掘了王莽老婆、儿子、父亲、祖父的坟墓，烧毁了棺椁，以及象征王莽德政的九庙、明堂和辟雍。十月初一，更始军攻入宣平门，莽死党王邑、王林负隅顽抗，先后被击破。长安城内市民朱弟、张鱼等乘机放火烧毁宫门。王莽先避火于宣室前殿，后又逃到未央宫沦池中的渐台之上。十月初三黄昏，穷途末路的王莽被商人杜吴刺杀于渐台，校尉公宾就势割下其首级，尸身则被愤怒的士兵砍为数段。在做了14年的短命新朝皇帝之后，王莽连同他的新帝国一并覆亡。

七、旷古闹剧，两点启示

纵观王莽一生，可以说做了两件事。一是代汉而自立，二是托古改制。对于第一件事，不论人们怎样批评，其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关于第二件事，不

管论者如何颂扬，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也是不能否定的事实。如果王莽只是一个普通百姓，那么，他的得失可以说基本平衡。然而王莽却是一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当从这一角度去考察，那自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平衡与否的问题了。这里，最重要的是看王莽所作所为给社会带来了进步还是倒退，给民众带来了福祉还是祸害。从前文所述可知，王莽带给社会和民众的除了灾难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了。唯其如此，对王莽这个人应该完全否定。

新朝同秦朝一样，都是延祚仅十余年的短命帝国，但秦在历史上有着多方面开创性贡献，而新莽却只是一场旷古闹剧而已。那么，这场闹剧对于今天社会有哪些启示呢？以下的两点似更值得重视：

其一，王莽迅速升迁的事实告诉我们，领导者必须警惕那些一味奉承、总是恭维自己的人，尤其要小心那种能够做出超乎常情举动的人。从前文所述可知，王莽正是靠阿谀奉承以及做常人难做之事而由一个小人物成为大人物的。像他侍病伯父王凤，其孝敬程度是王凤的亲儿子也无法做到的，以此他得到王凤的推荐，迈出了其仕途关键的一步。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很多，值得我们深思，吸取教训。

其二，王莽改制失败的史实告诉我们，改革者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可空想，不可生搬硬套古代的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不可搞名词游戏，不可搞泛政治化。王莽以改制来直接面对西汉末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应该说是可取的。但他不是脚踏实地，而是以空想、幻想来显现新莽政权的合法性，表明自己是解民于倒悬的真命天子。他把儒家典籍中理想化的制度生搬硬套过来，而不顾其在现实社会是否可行。他将经济问题想当然地政治化，并大搞更易名称的名词游戏，招来无端边衅。这样遂使得本已问题堆积如山的社会，更加纷乱如麻、难以为继。其最终结果，则导致新莽政权的彻底灭亡。这些，既是沉痛的教训，也是有益的启示。

东汉五斗米道与汉中张鲁政权

东汉末年，张鲁领导五斗米道徒，以汉中郡为主要基地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学术界称之为“张鲁政权”或“张鲁汉中政权”。这一政权的建立，既是汉代西部政局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以五斗米道所代表的张鲁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宗教作为统治基础的政权。为五斗米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学资料，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一、五斗米道的创立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它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道教是由汉代方术之士杂糅古代巫术、阴阳灾异、谶纬预言等多元文化，并摭取道家的神秘学说和儒家的伦理观念而形成的一种宗教。五斗米道是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关于它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和樊光春先生著的《陕西道教 2000 年》认为五斗米道是由张修在公元 184 年之前创立于汉中的。据《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概述：

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

传统观点则认为五斗米道实际上是张陵于公元 126 至公元 144 年在四川鹄鸣山创立，据《三国志·张鲁传》载：张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此外，《后汉书·刘焉传》、《华阳国志·汉中志》等书谈到这

一问题与陈寿说法大致相同，如《后汉书·刘焉传》云：“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

张陵对他所创立的道教从组织上进行整顿，初步建立了教仪教规。首先，入道者交米五斗，以供斋醮之用。其次，要敬仙神、祭祖先。规定教民要忠贞不贰地信奉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道神。除每年五月、腊月的吉日祭祀祖先，二月八日祭灶神外，不得另有祭祀。更不准淫祀。第三，教民对家人要慈孝，对外人要敬让，不准兴讼好斗。不准欺诈世人。第四，积德行善，修复道路。第五，修身炼性，服食丹药，讲究房中之术。对于违犯以上科律者即令其有病，病者须行请祷。请祷之法，令病人饮符水，居静室思过，并继承了古代关于天官（天帝）赐福、地官（地祇）赦罪、水官（水神）解厄的神话传说，令病者自书姓名、服罪、悔过之意的文书一式三份，一份放置于山上，一份埋入地下，一份沉入水中，称为“三官手书”。经过一番整顿，五斗米道真正成为一个有教祖、教父、教仪、教规的道教组织。

二、汉中政教合一政权的建立与灭亡

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道。张衡去世，子张鲁继之。“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祖孙三代，世人称为“三张”，道内则称“三师”：称张陵“天师”，称张衡“嗣师”，称张鲁“系师”。张鲁嗣教后，继续传播并发展壮大了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



公元188年，刘焉由太常卿放任为监军使兼领益州牧，经过两年经营，基本控制了蜀郡，又谋划向北方的汉中发展。汉中地理位置优越，是进入蜀地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据《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记载：“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公元190年，“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这样，张鲁就开始了在汉中的政治生涯。

刘焉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张鲁，据说是因为他与张鲁的母亲有特殊的关系。《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云：“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后汉书·刘焉传》对此事也有记述：“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

张鲁割据汉中，以五斗米道教化百姓，自封为“师君”，规定初入道者称“鬼卒”，经过考验而信仰坚定者为“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为首领，部众多的称“治头大祭酒”。祭酒既管教务，也理行政。《三国志·张鲁传》记载：

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张鲁像

张鲁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从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至师君的金字塔式的教阶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祭酒是教内骨干，他们保证义舍、宽刑、禁杀、禁酒等项措施的实行。其政令的实施，是以廉耻治人，诚信不欺诈，令病人自首其过、修路补过等具有浓烈宗教色彩的措施来保证的。

张鲁以五斗米道统治巴、汉一带前后将近三十年，扩大了五斗米道的势力，史称“民夷便乐之”，朝廷“力不能征”。张鲁时期的五斗米道，其性质已变为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的思想工具，它与朝廷官方神权的对立，不再表现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主要表现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张鲁政权得以长期存在，固然由于汉廷软弱，鞭长莫及，也由于五斗米道变得平和自守，可以加以容忍。于是朝廷封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

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

曹操对待归降的张鲁及信徒，一面优宠，一面又采取了多项控制措施。一是把张鲁带到北方，留夏侯渊和张郃守汉中，以便就近监视控制道教首领。二是迁徙张鲁米民。

《三国志·张既传》记载："从征张鲁…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三国志·和洽传》记载："太祖克张鲁，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太祖未纳，其后竟徙民弃汉中。"以迁徙之法实现其控制汉中的目标。

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其民多信道教，这些人迁到北方，曹操统治境内的道教徒必定猛增无疑，所以如何治理为数众多的道教教民，防止"妖匿"之徒阻梗滋事，成为曹魏政权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势必给其政权的巩固带来不安定因素。因此曹操对于如何安抚控制这些道教徒绞尽了脑汁，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以"优礼"为名监禁了一批有影响的方士，割断这批人（包括张鲁）同广大教徒的联系，从而达到了既利用道教力量又防止其东山再起的目的，取得了对于曹魏政权来说比较满意的政治效果。五斗米道归附曹操，使得曹魏政权的政治军事实力大幅度提高。

三、张鲁政权的当世意义及深远影响

关于张鲁汉中政权的性质，学术界有很多的讨论：有些学者认为它是封建割据政权，例如，黄惠贤先生在其文章《试论张鲁政权的性质》中明确指出："从初平（190—193）中刘焉派张鲁入汉中，到建安五年（200）张鲁与刘璋分裂为止，共八九年，张鲁对汉中地区从控制到统治，是刘焉父子益州封建割据政权的组成部分。从建安五年到建安二十年约十五年间，张鲁在巴、汉地区的统治，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割据政权。这个政权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方式进行统治。最后，张鲁遵循着阎圃策划的道路投降曹操，达到了封侯拜爵、子贵身荣的目的。总之，张鲁在汉中前后二十三四年的统治，完全是一个封建割据者的统治，这个政权是一个封建割据政权，而不是什么农民政权。"此前，张炳耀先生在其文章《试论张鲁及其政权性质》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很多学者则认为张鲁政权是典型的农民政权，例如，杨柄先生指出："利用宗教鼓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武装起义，是东汉末农民战争的一大特点……所以在张鲁时期天师道也曾在汉中地区（今陕南、川北）发动两次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实行过二十几年的农民武装创据。"

无论张鲁汉中政权的性质是哪一种，它存在的近三十年确实为当世百姓做出了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张鲁政权建立了政、军、教相结合的政权系统，与以往的封建官吏大有不同。最高领导人称为"师君"。师君之下的"祭酒"，一管政务（"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二领军队（领军队多的为"治头大祭酒"），三办义舍（免费吃饭，管饱，不许多吃，主要是招待流亡农民）。反映了当时人与人之间一种新型关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设想出来的、理想的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是一次伟大的尝试，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对于原本处在水深火热当中的汉中百姓来说是一种希望，对张鲁政权博取人民好感、巩固统治也有积极意义。

其次，实施“义舍”及“义米”制度。东汉末、三国时期，各个割据势力争夺激烈，斗争频繁；自安帝以来，统治者镇压羌人起义，战火多次蔓延汉中，汉中百姓苦不堪言。张鲁在汉中当政时在治内设置“义舍”及“义米”制度，给汉中群众带来了众多福利，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食和住的困难。实现了《太平经》提出的财物共有、周穷救济的主张，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施有很好的借鉴。

再次，张鲁规定境内严禁酿酒饮酒，以节约粮食，也不准商人抬高物价，以利百姓。实施宽刑，犯罪者，轻者罚修道路百步，重者“三原然后乃行刑”。这些措施在当时很受人民欢迎和拥护，史称“民夷便乐之”。虽然后世“保证了人人有吃的有住的”的评价有言过其实之嫌，但是在汉末天下大乱之际，张鲁统治的汉中确实成为比较安定的地区。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使汉中百姓赢得了相对安宁的宝贵岁月。

此外，张鲁政权为发展壮大五斗米道做出了重大贡献。张鲁在汉中完善并发展了五斗米道、实行政教合一制度，雄踞巴汉近三十年，至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汉中，双方大战阳平关后，张鲁投降曹操，曹操将他和家属带回北方，政权随之消失。尔后曹操多次将大批汉中五斗米道教民迁往三辅（长安、洛阳、邺城）等地，五斗米道也随之从汉中传往北方中原地区。在西晋统一之后，它又向东南沿海传播，从而遍及全国，也在无形中影响了古代道教的发展走向。

今日的陕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平稳、快速发展，高楼耸立，车水马龙，早已不见当时张鲁雄伟的城寨。但是，汉中“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的美誉足以显现它的当代地位。张鲁汉中政权虽是昙花一现，但它政教合一的政权管理形式格外引人关注，使得汉中在特殊历史时期成为古代型理想社会的试验田。

（撰稿人　吴　阳）

南北朝关中政权的更迭

西晋政权崩溃后，北方地区动荡不安，一些内迁部族乘势而起，强则称帝建号，弱则屈从听命，陕西地区就成为各种势力角逐的重要地区，先后有匈奴刘曜前赵政权、氐族苻健前秦政权、羌族姚苌后秦政权于长安立都称帝，还有赫连勃勃大夏政权定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北魏之后，西魏、北周以关陇为基础，定都长安，割据一方。在北周武帝宇文邕统一北方的基础上，隋文帝杨坚终于完成全国统一大业。长安地区二百多年间经历了多个政权的统治，成为民族融合和多元文化碰撞交汇的最前沿。精于骑射的胡兵番将粉墨登场，一些汉化较深的部帅尝试着骑在马上打天下，住在宫殿治天下，长安成为他们展示军事政治才能的大舞台。

一、南匈奴刘曜长安称帝

南匈奴人刘渊乘西晋乱亡之机，以大单于之号在离石称汉王，置百官，归附者数万人。东晋永嘉二年（308），自称皇帝，改元永凤，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其子刘聪继位后，荒纵刚愎，朝政由宦者王沈与外戚靳准专擅，在位九年，太子刘粲即位不久，被大将军靳准杀害。时族人刘曜以都督中外诸军事坐镇长安，在靳准宫廷政变后，杀靳准，迁都长安，改国号曰赵，史称前赵。刘曜大赦境内，修建光世殿为前殿，紫光殿为后殿，立宗庙社稷，起南北郊祭坛。

刘曜为刘渊族子，由刘渊养大成人，自幼聪慧过人，长大雄武骁捷，出类拔萃，“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雄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时号为‘神射’。尤好兵书，略皆暗诵。”建立前赵后，刘曜已经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政治才能也逐渐表现出来，他固执但又能听谏，如巴氐酋长徐库彭被牵连到一庄谋反事件，刘曜不仅囚禁他，还要杀掉他，光禄大夫游子远因此进谏，也遭幽禁。可是，刘曜在杀掉徐库彭后，巴氐族人尽叛，羌、氐、巴、羯族人响应者 30 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游子远在狱中再次进表并提出对策。刘曜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仅将游子远赦免，还委任他为雍秦征讨诸军事，领兵镇压叛乱。游子远采取招抚和进攻相结合

的战略，很快化解了危机，并征服了西戎最强之权渠部，原本就臣服于权渠部的其他部族也随之而来归附前赵，刘曜徙其部落 20 余万口于长安。由于刘曜能知错则改，这场危机却变成了前赵政权的转机。

刘曜于东征西讨之余，立太学于长安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挑选 25 岁以下青年 1500 人入学受教，还在政事余暇亲临太学，考试学生，如果考得很优秀就可拜郎中。

刘曜久习儒风，但旧习难改，穷兵黩武，嗜杀成性，尤其是年轻时形成的淫酒习惯，到成年后更加放纵，甚至在强敌石勒即将进攻洛阳之时，刘曜仍饮酒数斗，醉酒后的他不抚士众，对交战形势判断错误，结果一败涂地。刘曜昏醉奔退，马陷石渠而被俘，后遭石勒杀害，前赵因此而灭亡。

二、氐族苻健前秦定都长安

略阳氐族苻洪原姓蒲，骁武善骑射，多权略，被刘曜前赵政权授予率义侯，后请降于后赵，石季龙委以西方之事，累战有功，迁宗族于枋头（今河南浚县），屡遭疑忌，苻洪遂降于东晋，聚众十余万人。因为其孙苻坚出生时背上有“草付”之纹，遂改蒲姓为苻。自称大单于、三秦王，临终遗命其子苻健西入关中，以图大业。

苻健于危难之时接任首领，他利用声东击西之策略，成功摆脱困境，进军关中。当时，京兆杜洪窃据长安，依东晋而得到诸部的归附，对苻健集团的动向很警觉。苻健表面接受石赵之官位，于枋头修缮宫室，令所部耕田种麦，示无西归之意，部下有知情而不种者，苻健杀之以徇众。就在麦苗茁壮成长之际，苻健突然下令架浮桥、渡盟津，全军西行入潼关，既济而焚桥，大有破釜沉舟之气概，将士知无退路，奋勇争先，击溃杜洪的多重防御，略定三辅，入长安而都之。永和七年（351），苻健“称天王、大单于，赦境内死罪，建元皇始，缮宗庙社稷，置百官于长安。”次年，苻健于长安宫太极前殿称皇帝，史称前秦。

永和十年（354），桓温北伐关中，进军灞上，苻健固守长安小城，太子苻苌率领苻雄、苻菁等五万军众于白鹿原击败桓温军，在子午谷、潼关也取得胜利，前秦巩固了在关陇的统治。苻雄“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之时，发展经济以巩固政权，在此基础上，苻健从政治上引用人才，争取民心，“置来宾馆于平朔门以怀远人，起灵台于杜门。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而关右称来苏焉。”前秦政权逐渐稳定，苻健却不幸病逝。其子苻生残暴嗜酒，众叛亲离，族弟苻坚废杀之而自立，改元永兴，重用

汉人王猛，前秦势力盛极一时。

北海人王猛博学好兵书，为人谨重严毅，气度雄远。苻坚早闻其名，招致门下，二人异符同契，如鱼得水，及苻坚称帝，又委以重任。始平县内多功臣，豪横不法，前后官员无可奈何。王猛为始平令，上任后明法峻刑，对地方豪强不稍容纵。又领京兆尹，强太后之弟强德，“酗酒豪横，掠人财货子女，为百姓患，猛下车收德，奏未及报，已陈尸于市，坚驰使赦之，不及。与邓羌同志，疾恶纠案，无所顾忌，数旬之间，权豪贵戚，杀戮刑免者二十馀人，朝廷震栗，奸猾屏气，路不拾遗。”苻坚起初还责备王猛用刑严酷，王猛曰：“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剧邑，谨为明君翦除凶猾……酷政之刑，臣实未敢受之。”苻坚欣赏王猛，认为他有管仲、子产之才，对他深信不疑。转任吏部尚书，迁尚书令，愈见亲近，朝政多出于王猛。氐豪功臣樊世、仇腾、席宝等于苻坚面前多次诋毁王猛，均不纳。樊世当众责问王猛：“我辈耕稼而君食之乎?”王猛说：“何止是耕田，还要让你充当我的炊夫。”樊世发誓与王猛不共戴天，一定要将王猛之头悬于长安城门上。苻坚得知此事后，大怒道：“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樊世被杀后，诸氐纷纭，争相指斥王猛，苻坚极力维护，此后，公卿无不听命于王猛，王猛与苻坚在中央集权的问题上保持一致。

在求治求富的问题上，君臣更是英雄所见略同。前秦政权在王猛的主持下，课农桑，立学校，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苻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前秦利用泾水兴修渠堰，灌溉农田，经营关中，赢得百姓的支持。王猛则“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君臣励精图治，在战乱频仍之际，联手缔造了一段安宁时光，“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苻王之政改变了北方动荡不安的局面，“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前秦文武并举，经济形势也有好转。

在完成统一的问题上，君臣既一致又有分歧。前秦利用国力提升之优势，逐渐统一黄河流域。征服仇池杨氏，取西南梁、益二州，西灭前凉张氏，北取代地，东伐蒲坂，挫败桓温北伐。太和五年（370），王猛率领步骑六万对前燕慕容暐发动进攻，攻取邺城，平定前燕，统一北方。当时前秦，“民户殷富，四方略定，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唯建业一隅，未能抗伏。”如何对待南朝，君臣有不同意见。王猛认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主张先保境养兵，俟机而动，

对东晋的战略是不必急于求成。而苻坚则轻率进兵，始以投鞭断流为喻，中有草木皆兵之忧，后至风声鹤唳之境，悔不听众臣和王猛之劝导，一败涂地，于武将山被杀，以雄才大略之英雄气概却落得一个坎土而埋之的结局。

苻坚信奉佛教，素闻释道安之名，以神器喻之，派遣苻丕南攻襄阳，迎道安入长安弘教布法。苻坚甚至对大臣权翼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权翼不解地问是谁，苻坚说："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习凿齿也是道安在襄阳的一个高足。释道安到达长安后，"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道安不仅精通佛教经典，对诗赋文章、甚至是古物旧史也多所通融，京兆人争相从学，以至于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俗语。苻坚之后，姚兴再次以皇帝之权威，助力佛教之内传，于是关中成为当时的宗教中心。

三、姚苌羌族后秦关中政权

淝水之战后，苻坚之前秦政权内部矛盾全面暴发，众叛亲离，慕容泓、慕容冲欲恢复燕国，公开反叛。羌帅姚苌惧罪逃往渭北，得到羌人和西州豪族五万余家的拥戴，于太元九年（384 年），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年号白雀。时慕容冲与苻坚相攻，姚苌坐观时变，欲收渔翁之利。苻坚退入五将山，慕容冲攻入长安。姚苌派大将吴忠包围苻坚，执而杀之。苻坚战死，接收了前秦文武数百的姚苌击败慕容冲五万军队的进攻。随后，慕容冲部退出长安，姚苌取而代之。太元十一年（386），姚苌称帝于长安，置百官，改元建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

姚苌为姚弋仲之子，姚襄之弟，少当羌族，世为羌酋。雄武聪哲，多权略，深得士心，每行军以中军为大营，"时诸营既多，故号苌军为大营，大营之号自此始也。"为鼓舞士气，命令将士"于营处一栅孔中莳树一根，以旌战功。"用种树成林的方法纪念战功，并且不无自豪地说："少来斗战无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万众，国之事业，由此克举。"后秦建号长安后，姚苌重武臣也兴学礼贤，如奖励阵亡将帅，褒赠战没士卒。立太学，礼先贤之后，后秦的政治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姚苌却因操劳过度于军中发病。临终叮嘱其子姚兴："汝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备，吾无忧矣。"

姚兴执政期间，后秦达到极盛。姚兴留心政事，苞容广纳，军事方面依靠姚绪、姚硕德等将领，政治方面重用天水尹纬等文士。尹纬在前秦时受到苻坚打压，怀才不遇，任吏部令史之微职，每读书到宰相建功立业之际，常废书而叹。前秦形势失控后，尹纬说服群豪拥立姚苌。苻坚被囚后，尹纬前去劝降，苻坚的回答是："禅代，圣贤之事，姚

苌叛贼，何得为之!”但苻坚欣赏尹纬之才，问他：“在朕朝何官?”尹纬回答尚书令史，苻坚叹曰：“卿，王景略（猛）之俦，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后秦为尹纬提供了施展机会，姚兴困于强敌苻登，不遑宁处，尹纬助成其大业，荡清关中，既立功又立事，因此也得到姚兴的尊重和赏识。

姚兴不仅重用人才，也重视法令的执行，希望避免滥刑。他下令立律学于长安，让各地令史前来学习，学成后返回原地协助官员论决刑狱。就连姚兴也经常在政事之余，到谘议堂听断疑狱，旁听疑难案件的审问。在强化律法的同时，姚兴也借助佛教来巩固统治。前秦时关中就听说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释道安为大德智人，苻坚令吕光伐龟兹后将他送入关中。后来吕光将罗什留凉州数年，在后秦姚兴虚心邀请下，鸠摩罗什前来关中，“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姚兴年轻时便信崇三宝，锐志讲集，于是，“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仇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莫不欣赞。”姚兴与鸠摩罗什联手译经成为千古佳话，也让佛教的传播速度加快，史载：“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后秦官民崇佛信教，苻坚始作俑，姚兴集大成，释道安、鸠摩罗什成全其政。

后秦政权到姚泓在位期间，内部各派力量不顾强敌，内讧不止，在东晋刘裕北伐的打击下灭亡。



四、赫连勃勃大夏政权与统万城

大夏赫连勃勃，匈奴族，其父刘卫辰在前秦苻坚时为西单于，苻坚国乱后，占据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万八千，被后魏击败。赫连勃勃投奔后秦姚兴高平公没奕于，没奕于欣赏他相貌堂堂，聪明善辩，是济世之才，故将女许配于他。就连后秦主姚兴见而奇其才干，但大臣姚邕却认为赫连勃勃天性不仁，难以亲近。后来，赫连勃勃羽翼丰满后袭杀其岳父没奕于而并其众，与后秦反目，证明姚邕的判断是正确的。义熙三年(407)，称天王，建元龙升，署置百官，赦其境内，自诩是匈奴夏后氏之后裔，故国号大夏。

岭北诸城尽属于夏，攻平凉、克上邽、取安定，势力壮大。决定营造都城，任命天性工巧却残忍刻暴的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负责营建工程，“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赫连勃勃命名“统万”，取“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义。阿利“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新都、宫殿建成后，刻石都南。

其城四门各自命名，“名其南门曰朝宋门，东门曰招魏门，西门曰服凉门，北门曰平朔门。”崔鸿《十六国春秋》引《夏录》曰：“赫连勃勃宫殿大成，乃刻石都南，颂其功德……又起冲天台于南山，欲登之望长安。”不管是新都名与诸门之名，还是冲天台之名称均渗透着赫连勃勃之“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雄心壮志。



统万城遗址

新都统万城规模壮阔，坚峻牢固，“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城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北魏郦道元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唐人李吉甫可能亲见原城，“其城土色白而牢固，有九堞楼，峻险非人力可攻。”其遗址位于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当地百姓称之为白城，或赫连城。赫连勃勃性凶暴好杀，令人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难怪连北魏太武帝也常引以为鉴，看到统万城及宫殿后说：“蕞尔小国，而用民如此，虽欲不亡，其可得乎?”以后多次诫励属下说：“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屈丐指赫连勃勃，原名屈孑，自己认为匈奴人以母姓刘而姓刘不合礼，提出“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后代）其非正

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故改姓赫连。

刘裕北伐攻入长安，灭后秦姚氏政权，赫连勃勃坐山观虎斗，乘刘裕退出潼关之机，攻入长安，遂称皇帝于灞上，年号为昌武。有大臣劝他迁都长安，他说：“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数百余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因为当时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北魏，故大夏仍定都统万，以长安为南都，置南台，以赫连璟录南台尚书令。事实证明赫连勃勃的判断是正确的，赫连勃勃去世后，第二代夏王赫连昌被北魏所擒，第三代夏王赫连定迁至平凉后，仍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

五、影响与启示

西晋失驭，北方政局动荡不安，匈奴、鲜卑、羯、氐、羌各部族也卷入纷争，使得政治军事局面更加复杂。精于骑射、善于舞刀弄枪的游牧民族在实践中学习治国安邦之术，甚至也喜欢舞文弄墨，如大夏王赫连勃勃为了从气势上压倒刘裕，先令文人写出文章，自己提前背诵，然后在接见东晋刘裕使者时，即席口授国书，命舍人当场记录，文不加点，封好交付使者带给刘裕，“（刘）裕览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仪瑰伟，英武绝人。裕叹曰：‘吾所不如也!’”由赫连勃勃所导演的场景甚至骗过了聪明绝伦的刘裕。实际上，各族精英都在不同程度上学习儒家经典，汉化成为一种潮流，如匈奴人刘渊早年好学，《史记》《汉书》、诸子，无不综览，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略皆诵之。此后刘聪、刘曜等人好读书，善属文，工草隶，尤精于兵书。羌人姚兴在战争间隙，与学者讲论经籍，乐此不疲，还与鸠摩罗什执经对译；羯人石勒虽不识字，却喜好文学，常要人读史书给他听，还不时地对史事加以点评，等等。这些情况充分反映出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五胡四夷诸多部族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为传统文化带来了本民族的文化、风俗，出现自春秋战国以来又一次民族融合的历史机缘，多元文化在碰撞和交汇中齐头并进，在建筑、宗教、舞乐、服饰等方面影响到内地人民，更推进了中国历史的文明进程。如苻坚迎请释道安于长安弘法，姚兴迎接鸠摩罗什入长安译经，使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加快。赫连勃勃所营建的统万城，穿越了 1600 年的风雨，仍然屹立于朔方，浓缩为一卷充满神奇的大地之书，既琢磨不透又耐人寻味，已经成为民族史、建筑史、文化史方面的重点案例。外来文明就像决堤的潮水，以汹涌澎湃的气势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不断充实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随着珍异奇宝之物而来的，既有艺术，也有学术，更有实用的技术。经过战争、冲突和攻伐，人们逐渐学会使用协商、忍让和沟通的办法解决分歧，避免暴力和破坏性的局面。某种程度上讲，由民



族融合和民族交往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至今仍余音不绝，而历史留给现在和未来的启示也需要我们深刻总结和认识，在避免冲突和战争的前提下，让更多的人分享民族融合的硕果。

（撰稿人　贾志刚）

隋唐治世面面观

隋唐几代统治者从经营帝业出发，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先后创造了隋开皇之治、唐贞观之治和开元天宝盛世等封建治世，这些盛世所取得的成就，虽不免有旧史官的溢美之词，但仍有值得称道之处，其致治致盛之道，也是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究其所由，或利用统一局面的优势，或凭借民族融合的契机，或顺应民心思治的潮流，或寻求制度创新的道路，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官尽其职、事尽其宜。虽皆称治世，但三个时期各有其特点：开皇年间，隋文帝君臣孜孜奉国；贞观年间，唐太宗君臣锐意进取；开元年间，唐玄宗君臣务实创新，三个时期虽各谋其政，却殊途同归，其治国理政之宏图大略，既成全封建帝王将相的政治理想，也最大可能地释放了古代型盛世的历史魅力。都城长安作为施政中心，做出的贡献不容置疑，是盛世成就了长安，还是长安成就了盛世，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一、开皇之治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内修制度，外抚邻邦，薄赋轻徭，自强不息。在平定三总管叛乱后，采纳长孙晟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成功解除来自突厥的威胁。随后，处心积虑地准备平定南朝最后的陈朝，南北对峙几个世纪的局面画上句号。随着统一局面的出现，社会逐渐安定，经济发展迅速，政治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史载隋文帝开皇、仁寿之间，人庶殷繁，帑藏充实，就连唐太宗君臣也认为当时仓库盈溢、天下隆盛。修撰《隋书》的唐代史臣认为：“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后世史家称这一时期为“开皇之治”。

在政治建设上，隋文帝改革旧有体制，创立三省六部制、试行科举选官制，改革地方行政制度，废止地方长官辟署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加强中央集权。罢郡减员，整顿原来十羊九牧的混乱局面。改善吏治，加强官吏的考核，推行官员责任制，万里追证百年旧案，官吏不遑宁舍，人自诫励。同时，隋代继承西魏北周府兵制，解决了兵士

著籍与垦田之矛盾，实现领兵权和调兵权的分离。改定刑律，制成《开皇律》，修订礼乐，适应世望宽平的形势，种种制度改革，使得开皇时期政治出现新起色。

在经济建设方面，隋文帝整顿户口管理，轻赋于民，推行大索貌阅，输籍定样之政策，包括析籍之令、貌阅之法、相纠之科、轻税之法等内容。在核实户口的基础上，每年正月，令百姓三党五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之上下，定其名，轻其数，乃为输籍定样，杜绝官吏徇私舞弊，奸无所容。因为所定之标准较低，唐人杜佑径称为轻税之法，认为隋代之盛，实由于此。不仅高颎之输籍定样属于轻税之法，纳言苏威也于此时行轻役之典，《隋书·苏威传》记："初，（苏）威父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典，上悉从之。"轻税轻典，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随着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也扩大，开皇末期，中外仓库，无不盈溢，天下储积之数，得供五六十年。手工业之纺织业、瓷器业、造船业等都有显著进步，尤其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技术水平的造船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隋代能造出巨型船舰如五牙大舰和龙舟凤。杨素在永安，曾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5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6拍竿，并高50尺，容战士800人。五牙大舰虽属于江上作战之军舰，但此技术足以成为建造龙舟的技术条件，隋炀帝三下江都所乘之龙舟4重，高45尺，长200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120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形制稍小，而装饰无异，还有浮景9艘，也达到3重，一起构成所谓的水殿龙舟。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凌波、五楼、道场、玄坛、板艎、黄篾等数千艘。船舰名称多达20余种，规模之大，构造之复杂都说明隋代造船技术取得长足进展。万斛船、二万斛船也相继问世，说明隋代工匠已经突破了旧时"水不载万"的限制。

在商业贸易方面，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也出现了繁荣景象，西京大兴城之东（都会）、西（利人）两市，成为国际商品集散中心，东都洛阳之三市（丰都、大同、通远）也以商贾辐辏、珍货积聚而驰名中外。大都会与中小城市以及城乡之间的集市、草市一起形成初期国内市场系统。尤其是随着中外贸易的兴盛，国内御道、驰道、直道、驿道更加通畅，从大兴到洛阳、从大兴到河西走廊、从大兴到襄阳等大道，畅通无阻。隋代与周边民族、周边政权的交往增多，对外贸易也有所进展，为重新开通丝绸之路准备了条件，紧随其后的隋炀帝委派大臣裴矩经营丝绸之路，重新恢复与西域、中亚、西亚等地区的交流。当时隋朝疆域东西9300里，南北14 815里，有户890万。就在皇帝本人服无金玉、食不兼肉的同时，里巷百姓却传来衣食滋丰、仓库盈溢、朝野欢娱的记载，史家美其名曰"开皇之治"。

二、贞观之治

唐代前期，几代皇帝励精图治，一方面追求清明政治，一方面坚持制度建设、社会建设，出现了为历代所称颂的“贞观之治”，为唐朝的繁盛打下良好基础。

唐太宗在位（626—649）以贞观为年号，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君臣共治，探索致治之道。首先，完善国家大事的决策机制。在原来的御前决策、宰相决策、百官会议决策的格局中，以御前决策为核心，宰相决策为基础，百官决策为辅助，形成了周密完备、行之有效的决策机制，特别强化封驳、谏诤，听取不同意见，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唐太宗善于纳谏，认同魏徵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观点，乐闻己过，鼓励臣下犯颜直谏，不仅自己能从谏如流，还要求臣下也要虚心纳谏，做到为臣不隐、为人不谄。如贞观初年，太宗有感于府兵征发不足，同意简点使提出的将中男也列入征发对象的奏议，结果敕令三四次发下都让魏徵驳回。太宗怒不可遏，再次出敕，更增加身形壮大，不满十八，也列入征发范围的内容，不料魏徵照样驳回。太宗召魏徵责问其事，说：“中男若实小，自不点入军，若实大，是其诈妄，依式点取，于理何嫌，君过作如此固执，朕不解公意!”魏徵回答说：“臣闻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如果次男尽点入军，国家租赋杂徭从何而出？军队在精不在多，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原因是礼遇失所，人无斗心。如果国家遇之以礼，使人百其勇，何必在多?”一席话，唐太宗怒气全消，说：“我见君固执己见，疑君有私心杂念，今论事合于情理，让我又减少一次失误。”乃令停征中男入伍，并赐金瓮一口。



唐太宗像

其次，从执政角度认真梳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唐太宗认为君臣之关系如同鱼水，休戚与共；而君民之关系有若舟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次，他对群臣说：“他人劝我行霸道，魏徵劝我行帝道、王道，我采纳魏徵之言，不过数载，就出现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之局面，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为敌，今酋长并成为唐朝的带刀宿卫，部落皆归顺，能有这样的成绩，魏徵之力最多。”转身对魏徵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

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将魏徵比作良工，自己比作是待加工的玉料。类似情况还有将魏徵比作良匠和铜镜，如魏徵提出辞职，唐太宗说：“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在魏徵去世后，他谓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正因为他能摆正君臣关系，才能虚心待臣，出现若鱼若水的良好君臣关系。他总结隋亡的教训，主张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反对损百姓以适其欲。常以古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勉自诫，他接见诸州官员时，提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告诫地方官不夺农时，不竭其力。他为了体察民艰，还自种自锄，“就别院种三数亩禾，时自锄其科莠，才得半亩，即苦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在他看来君民关系是治国施政之根本，安民之道即是治国之本。

再次，唐太宗极为重视选贤任能。他不仅重用秦府旧僚，也打破地域界限，突破敌我阵营，不拘门阀等级，不限胡汉华夷，部分体现出任人唯贤的精神。他在执政 23 年中选用了 23 名宰相，出身寒门者超过三分之一，其中，马周还有平民宰相之称，史载他少孤贫好学，落拓不为州里所敬，后游长安，依中郎将常何为客，后代常何陈时政得失 20 余事，事皆合旨，太宗觉得常何是武将，何以有如此识见，就询问其原因，常何以实情回答。太宗即日召见马周，未见之前，遣使催促者数四，一见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数年之后，累迁到中书令，因为他处事平允，直道而言，甚获时誉，唐太宗甚至说共康时政者，唯借此人。唐太宗的选才唯贤也体现在怨仇不弃方面，曾是太子李建成东宫旧僚的魏徵、韦挺、王珪、李纲、裴矩等，曾是齐王李元吉旧属的袁朗、袁承序等，在贞观年间都继续任用，甚至委以重用。连他自己也说：“魏徵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而太宗用人方面弃短取长和华夷一体的思想，更成为千古佳话。贞观朝涌现了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房玄龄，处繁理剧、众务必举的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的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激浊扬清、嫉恶好善的王珪，都是一时之俊杰。时至今日，秦府十八学士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仍成为国人爱重唐朝史的著名典故，而他的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则爱之如一”更让他赚足后人的赞美。

最后，他也是严格执法、以身护法的典型。他鉴于古代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罚无罪，故要求自己与臣僚坚守法令。一次，太宗发现有人在选举中舞弊，就下诏要求作伪者自首，不自首，罪至死。不久，又发现作假者，太宗要求处以死刑，

执法官戴胄认为据法当处流刑。太宗责问戴胄："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遂欣然接受。因为他自始至终参与了缔造唐朝的军事活动，目睹了隋亡的过程，清醒地认识到，天下可以逆来，但需要顺守，而法令是治国的利器，守法就是守国，护法就是护政。

唐太宗注意采取切实措施发展生产，不夺农时，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尤其是重用有作为的官员等等，贞观年间，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秩序井然，经济迅速恢复，出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的治世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也成为后代帝王崇拜的典型。

三、开天盛世

武周后期，发生五王之变，宰相张柬之联合崔玄暐、桓彦范、袁恕己、敬晖与李多祚发动政变，逼武则天传帝位于唐中宗李显，复唐国号，将政治中心由洛阳迁回长安。此后数年之内，政变迭起，先有太子李重俊之变，接着有韦后毒杀中宗，以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逐杀韦后与安乐公主，拥立唐睿宗李旦复位，最后李隆基清除太平公主余党等政变，到先天二年（713），睿宗让位于李隆基，改元为开元，是为唐玄宗（或唐明皇），任命姚崇为宰相，逐渐扭转自武后以来动荡不安的政局，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积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唐玄宗亲政后，力排众议，召姚崇于同州刺史任上，欲以为相，姚崇不谢恩，玄宗不解地问他，姚崇说："臣有十事上献，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诏。"上曰："悉数之，朕当量力而行。"姚崇说："自垂拱以来，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请圣政先仁义，可乎？"玄宗说正合我意。姚又说："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可乎？自太后临朝以来，喉舌之任，或出于阉人之口，臣请中官不预公事，可乎？自武氏诸亲猥侵清切权要之地，继以韦庶人、安乐、太平用事，班序荒杂，臣请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可乎？比来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纲者，皆以宠免，臣请行法可乎？比因豪家戚里，贡献求媚，延及公卿、方镇亦为之；臣请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之，可乎？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巨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先朝褒狎大臣，或亏君臣之敬，臣请陛下接之以礼，可乎？自燕钦融、韦月将献直得罪，由是谏臣沮色，臣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乎？吕氏产、禄几危西京，马、窦、阎、梁亦乱东汉，万古寒心，国朝为甚，臣请陛下书之史册，永为殷鉴，作万代法，可乎？"唐玄

宗说你所说的正是我素来所想的，愿行之不疑，姚崇这才拜谢。因为姚崇之“十事要说”指出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深得唐玄宗之欣赏，成为唐玄宗开元时期的施政方针。

此后，玄宗励精为治，每事咨访姚崇等宰相，力求事尽其宜，又任用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等为相，整顿吏治、抑制权幸、发展生产，数年之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百姓安居乐业，史载开元社会富裕之状，《新唐书·食货志》：“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这种海晏河清之局面也被小说家美化，宋人王谠《唐语林》记：“开元初，上留心理道，革去弊讹，不六七年间，天下大理。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置开远门，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四方丰稔，百姓乐业。户计一千余万，米每斗三钱。丁壮之夫，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不赍粮，奇瑞叠委，重译麕至，人物欣然。”开元年间家给人足，社会治理达到很高的程度。唐人陈鸿之《东城老父传》记：“张说之领幽州也，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辇河间蓟州庸调缯布，驾轊连軏，坌入关门，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米，藏于百姓。”提及以河北粮、河西粮运输入关，正与前述河北粮入左藏，河西粮入右藏之说法不约而同。不仅小说家之记开元多写升平之状，诗人也不例外，如杜甫在《忆昔》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虽说是盛世不再的惋惜之语，但也有一定的真实性。而身为唐代政治家兼史学家的杜佑在《通典》中也记：“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这些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作者群，都异口同声地记载开元盛世的景象，应当与当时社会的真情实景相去不远。

开元天宝之间，不仅农业发展渐入佳境，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城市、对外贸易等领域也发展迅速，尤其是裴耀卿主持的漕运，王毛仲主持的马政，宇文融主持的括户，张九龄主持的道路通行，李林甫的长行旨预算制，王珙主持的额外进献，韦坚主持的广运潭等，都取得了实效，关中政治中心的地位更加稳固。在社会财富积累的基础上，社会风气形成尊贤尚文、歌舞并进的盛唐气象，学术创新、艺术求新、技术革新蔚然成风，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人才脱颖而出，作为盛世硕果反过来更增添了盛唐气象的无穷魅力。

李白、杜甫、王维、岑参、孟浩然、高适等诗人的诗篇，张说、张九龄、苏颋、徐坚等散文家的文章，郑虔、吴道子、李思训、李昭道、周昉、张萱等画家的才情，张旭、

怀素、李阳冰、颜真卿等书法家的书风，李龟年、公孙大娘、杨玉环、念奴等艺术家的魅力，吴兢的《贞观政要》、刘知几的《史通》、张九龄、李林甫的《唐六典》、刘秩的《政典》、刘餗的《隋唐嘉话》、张鷟的《朝野佥载》等史籍的成就，无不彰显盛唐雄风的绚丽多彩。

四、丝绸之路

因为隋唐制定了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外交制度，中原与周边地区和政权的交往越来越频繁，隋唐的国际声望日益提高，丝绸之路维系着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欧亚内陆地区以气候异常干燥，降雨极其稀少而著称。在丝绸之路的中部地带，有号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出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阿赖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冰峰峡谷，行走艰难。除此以外，对丝绸之路构成阻碍的还有大片沙漠和戈壁。多为崇山峻岭包围或夹持的高原和盆地，因干旱少雨和强劲的风力作用，发育成沙漠和戈壁，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克孜尔库姆沙漠、哈拉库姆沙漠等，以及大面积的盐原和雅丹地貌，缺乏水草，路途艰险，对于行旅来说，九死一生。然而这些地理障碍并没有隔绝东西方人民的交通和联系，依靠高山积雪消融形成的河水，灌溉滋润了大漠之中的片片绿洲，成为东西交通往来的中间站，加上东西方物产的差异和交换的需要，驱使人们寻求与外界的联系。



东西方交流很早就形成，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两汉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二世纪，沿欧亚内陆交通干线，自西徂东，有四大帝国：罗马（公元前 30 年—公元 284 年）、安息（公元前三世纪—公元 226 年）、大夏—贵霜（公元 45 年—226 年）和汉代中国（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各自处于国势昌盛时期，四个帝国对外发展导致相互发生了关系，且分别与四周的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发生战争。其东端起点是长安，经陇西，然后通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分成南道和北道，分岔点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龟兹、姑墨到疏勒。南道自鄯善，经且末、精绝、于阗、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向西可至大夏（今阿富汗）、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另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经罽宾、乌弋山离，西南行至条支。如果从罽宾西南行，至印度河口，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到六至十世纪，这条线路又维系着隋唐、大食（初期为萨珊波斯）、拜占庭三大帝国及其相邻的突厥等游牧民族建立的汗国。欧亚内陆交通干线起着

纽带作用，它把农耕定居地区和草原游牧地区的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把当时世界的几大帝国联系起来。著名中外文化交流史学者张广达认为不利的地理条件如沙漠、山脉等对交通和贸易有阻碍，但并不能隔绝不同地区的交往，丝绸之路就是证明。

到唐代，随着国力增强，唐人注重与周边政权和部族的联系，不仅向外输出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也敞开胸怀吸收外来文明，东西方的联系更加密切，在欧亚内陆通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之时，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形成。《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宰相贾耽记录七条通往域外的道路，“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所记七道既有传统意义上的绿洲（沙漠）丝绸之路，也有草原丝绸之路，更有海上丝绸之路。荣新江先生认为唐代中外交流畅通无阻，当时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着、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

五、影响与启示

隋唐之间，虽然也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阵痛，但不论是制度的衔接，经济的延续，还是文化的传承，都能体现出唐承隋制的特点，尤其是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天盛世三个封建盛世阶段接力赛一样相继出现的情况，更增加了世人对中古时期的浓厚兴趣。这段历史让每个国人都装着一个挥之不去的盛世情结，人们或者期望复制盛世的繁荣，或者希望再现治世的荣光，抑或盼望找到致盛致理的路径。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隋唐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我们树立民族复兴大业的信心。隋唐人曾经创造过无数世界奇迹，隋唐文化曾经领跑世界，隋唐不仅为中国历史注入活力，也将中国写进世界强国的名单之中。诚如此，这段历史提供给现实的强大动力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保持国家的繁荣，不能只追求经济发展，实际上，文化思想是维持繁荣的动力，也是让繁荣永不褪色的养料，没有永远的繁荣，只有永远的文化，唐代盛世之所以历经千年而光彩依旧，不是因为经济财富的发达，其财富总量在以后早就被超越了，但唐文化所达到的高度、所取得的成就，最终保证唐代文明高高在上的地位，让贞观之治与开天盛世变成历代津津乐道、历久弥新的话题；二是避免重蹈盛世危局覆辙的武器是忧患意识，历史学正是忧患意识最有力的载体。忧患意识既是经济发展的随身侍卫，也是社会发展的护花使者。单纯追

求经济繁荣与一味追求建功立业都可能导致只顾眼前，结果适得其反，而居安思危式的反省意识、成难败易式的忧患意识以及先忧后乐式的责任意识是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为民族发展保驾护航；三是国家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并不能只局限于政权建设，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人地关系、古今关系既可成为社会发展的催化剂，也可成为国家治理的垫脚石，不能忽视；四是经济有兴有衰，政权有治有乱，历史则不会间断，开发历史资源是解决现实难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五是民族自豪与民族自信是促使我们起飞的翅膀，而不是捆绑自己的枷锁。

（撰稿人　贾志刚）



隋唐积极外交政策与长安大都会地位确立

唐朝继隋代之后，推行积极外交政策，同周边政权和部族加强联络，与唐先后建立朝贡关系的有300余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经过相互吞并后还剩70余国，他们与唐朝保持着多方面的关系。其中，互通使节成为唐朝结好异域和通使安边的重要手段，唐朝每年要接待大量的外来使节，其使者按方位属于东夷使者、西戎使者、南蛮使者、北狄使者，由鸿胪寺典客署和中书省四方馆负责接待。同时，唐朝也要派出大批使团出使他国，或称为使入蕃，或称为使绝域，或干脆就称为入吐蕃使、入回纥使、入高丽使等。诸多中外使节都与长安关系密切，或自长安出发到域外，或自域外来长安完成使命，正是因为许多使节的存在，赍三岁之粮，通百金之货，国际或族际纷争得以化干戈为玉帛，地域或区域间可以有无相贸，唐朝由此而成为周边政权最乐意交往的国度，于是，诸蕃君长相继遵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既为大唐天子，又行可汗之事，自此以后，唐朝以玺书赐西域、北方诸部族，都自称“皇帝天可汗”，唐代取得了与其国力对等的国际地位。

一、王玄策、杨良瑶的出使活动

在众多出使异域的唐朝使节中，唐代杰出外交家王玄策出使天竺的事迹一直为人所称道，他曾三次出使天竺，为唐朝与印度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贞观十七年（643），王玄策首次作为副使随大使李义表出使天竺，一行22人，历游天竺各地，至王舍城，在耆阇崛山刻铭。又至摩伽陀国，在摩诃菩提寺立碑，弘扬唐德。直到贞观二十年回国。随着使团归来，天竺文化得以在内地风行一时，著名画工宋法智随行天竺，他擅长临摹所经各地佛像，“巧穷圣容，图写圣颜，来到京都，道俗竞模。”一时之间临摹和雕刻佛像在长安成为时尚，都城内外不分贵贱争相模仿其样，甚至皇宫内廷也参与到收藏其作品的行列，天竺画风因此而大行其道。

贞观二十二年（648），升为右卫率府长史的王玄策作为大使再次奉使天竺，恰逢中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去世，国内大乱，其臣阿罗那顺欲自立，又派出胡兵攻击唐使，王玄

策使团同行30多人力战不胜，均被俘获，诸国贡物被劫掠一空。王玄策逃到吐蕃西南界，写书信征发邻国之兵，吐蕃为其发精锐1200人，泥婆罗国为其发7000余骑。王玄策与其副使蒋师仁率二国之兵果断回击，“进至茶�correct和罗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连战，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获其王妃及王子等，虏男女万三千人，牛马三万余疋。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遂俘阿罗那顺以还。”王玄策率兵经过三天激战，不仅夺回被抢之贡物，还平定了中天竺的军事叛乱，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擒获叛乱者阿罗那顺及其妃、王子，经吐蕃送至长安。唐太宗对此事的认识是：“若天竺不劫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敝，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也。”无论从维护唐使的生命安全，还是从使节不辱使命，抑或是维持天竺国的统治，唐人王玄策的机智勇敢决不逊于汉代班超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同样也堪称古代外交史上之壮举。

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是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此行的任务是护送佛袈裟，使行途中，还在今天西藏吉隆县留下《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石刻。王玄策一行来到婆栗阇国，国王专门为唐使表演幻术，王玄策在《西国行传》中记载其事：“至婆栗阇国，王为汉人设五女戏，其五女传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绳技，腾虚绳上，著履而掷，手弄三仗刀盾枪等种种关伎。杂诸幻术，截舌抽肠等，不可具述。”表演内容中五女戏、绳技等属于杂技，截舌、抽肠属于幻术，自显庆以来，因为王玄策多次出使印度，故印度之音乐、杂戏、幻戏等在长安广泛流行，增进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此后，印度之杂技幻戏在内地风行一时，如唐睿宗时，有婆罗门献乐于殿前，只见“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极锷刀锋。倒植于地，低目就刃，以历脸中，又植于背下，吹筚篥者立其腹上，终曲而亦无伤，又伏伸其手，两人蹑之，旋身绕手，百转无已。”这些记载都印证“幻术皆出于西域，天竺尤甚”的说法，更是中国与天竺通使交流的结果。



幻术是天竺术士的拿手戏，天竺艺人难陀就极具传奇色彩，据载难陀得如幻三昧，能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唐德宗时，传说他曾于剑南节度使张延赏宴设时表演过绝技，他将筇竹杖变为女尼，含情脉脉，逸态绝世，饮酒踏歌，曲尽其妙。他还当众表演断头戏，先让人将自己的头割下钉在柱子上，而身体仍坐饮席上，每巡酒至其前，直接倒入腔腹，柱子上的他却面赤而歌，座位上的躯体也手舞足蹈，会罢，自己起身持首复位，安然无恙，言笑自若。百姓欲留他在成都，他不愿留，众人遂将他关闭于室内。他走入墙角，有人上前牵拽其衣服，眼见他渐渐消失，只剩下袈裟一角，顷亦不见。透过这些故事可知，天竺幻术唐人喜闻乐见，从而也对唐人造成明显影响。

王玄策将前后出使天竺的经历写成《中天竺国行记》，或称为《王玄策行传》《西国行传》等，包括图3卷，文字10卷，向唐人介绍天竺的具体情况，扩大唐人对域外的了

解范围，对唐人了解世界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此书到宋代就散佚无存，现在人们只能从其他书中辑出一些原书的片段，无法再看到全书，只要发现其中只言片语就足以让人兴奋不已。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外交领域，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功不可没，甚至，深受世人关注的蔗糖传入也与王玄策不无关系。史载王玄策随戒日王使团返回天竺，他派人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后来将此石蜜匠 2 人、僧 8 人带到东夏，唐太宗派往越州，以甘蔗为原料造出蔗糖。印度制糖法的传入成为中印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绚丽多彩的事件，最早引进蔗糖提造法的人当然也应当载入史册，从这个角度讲，王玄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也是一位值得国人永远铭记的文化使者。

唐代的出使活动，除王玄策外，杨良瑶也很典型。杨是今陕西泾阳人，唐德宗贞元之元（785）奉命由海路出使黑衣大食。此事史传无载，距 1984 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唐故杨府居神道之碑》，使某事迹彰显。具体事迹不详，其远航线郑和是 520 年。

二、诸蕃尊称天可汗

北齐与北周东西对峙时，曾经争相结盟突厥，北周每年送给突厥锦彩十万段，而北齐更是倾府藏以事突厥，突厥可汗不无骄傲地说：“但使我在南二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其凌轹中夏之志溢于言表。到隋代启民曾上表称隋文帝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称隋炀帝为“圣人可汗”。隋末大乱，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割据势力均臣服于突厥，以求声援，甚至于李渊起兵太原时，也曾称臣于突厥。建立唐朝后，突厥仍数相寇掠，甚至兵临渭河边，威胁长安政府，唐太宗只好约盟请和，与突厥刑白马于渭桥，突厥才退兵。然而唐朝于贞观四年（630），派大将李靖、李勣率军深入漠北，一举击溃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其部落之众来降者络绎不绝，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唐朝在突厥突利故境置顺州、祐州、长州、化州四个州都督府，又分突厥颉利之地为云中都督府和定襄都督府，以原突厥酋豪为都督、刺史，各统其众，逐渐形成唐代羁縻府州的雏形。唐朝委任原来的部落首领、蕃落酋长为都督、刺史，颁发唐朝印信以为符契，保留其旧有的称号，尊重原来的酋长世袭制，自主内部事务，但需接受唐朝的正朔和册封。这样，各部落首领以唐朝都督对内称可汗，以可汗之身份对唐称官名，强化了唐与诸部的宗属关系或朝贡关系。

其后，薛延陀、回纥等铁勒部族争雄漠北，唐朝联合回纥击败薛延陀，于是，铁勒诸部争相前来朝觐唐太宗，说：“薛延陀不事大国，自取灭亡，请求归命唐朝天子。”贞观四年，因为铁勒、回纥等 13 部内附，置 6 都督府、7 州，并各以其酋帅为都督、刺史，各颁给玄金鱼，嵌错黄金为字，以为符信。诸蕃酋长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

唐天子，又行天可汗事乎?”此后，与西域城邦政权、北方诸族君长通信之玺书中，皆称为“皇帝天可汗”。此后，唐朝君臣致力于招徕远人，知各部族人素爱锦罽，太宗亲手赐予诸首领绛黄瑞锦文袍，其袍之质地花色均精巧无比，另赐其金银、宝刀、珍器等，事多殊形。铁勒首领睹而惊骇，以为未尝闻见，捧戴拜谢，欢呼雀跃之声此伏彼起。

诸蕃酋长归蕃前，唐太宗御天成殿，陈十部乐宴而遣之。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世为唐臣。”于是，沿此道根据水草地形设置 68 驿，各驿备有群马、酒肉以供过使，诸部每岁向唐朝贡貂皮以充租赋。

宴会期间，唐朝为供备诸蕃客饮酒，预先装好一套连通器。先在天成殿宴会厅设一高台，台上放置一个银瓶，用管道将旁边储酒之内阁与台脚相连通，以容量为百斛以上的大银盆储酒，利用连通器之原理将酒潜流于台脚，而涌入殿前瓶中。铁勒数千人开怀畅饮，瓶中酒却是倒一杯，生一杯，取之不尽，饮之不竭。令蕃客惊骇不已，窃窃私语：“天子若赐我辈此瓶，回到部落中就能有喝不完的酒了”。蕃客此语意味深长，有宝瓶就有酒，有唐朝就有宝瓶，他们依唐为援的目的就达到了。

唐朝不仅给北方诸部落发错金字玄鱼符，以为外交凭证，还发给西域诸国与唐有交往者铜鱼符，为此唐朝礼部为各国均铸造铜鱼雄雌相合者各 12 枚，皆铭其国之名，顺序是从第一到第十二，雄者存放在唐朝，雌者各付其国，如某国遣使来唐，正月来就带第一鱼，依此类推，逢闰月仍用原来之鱼。唐朝鸿胪寺官员负责以雌雄合符来验证使者身份，如果出现差错则推按其罪且奏闻皇帝。到开元时，重新发放外交铜鱼，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三、国际声望

正当唐朝雄踞东亚，构建与自己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秩序时，亚欧大陆其他区域也并不平静，形成若干实力雄厚的力量，诸多小邦国在几个实力强大的政权的夹缝中生存。当时，亚欧内陆各地普遍流行“四主说”或“五王说”，或许可以折射出当时人们对世界秩序的基本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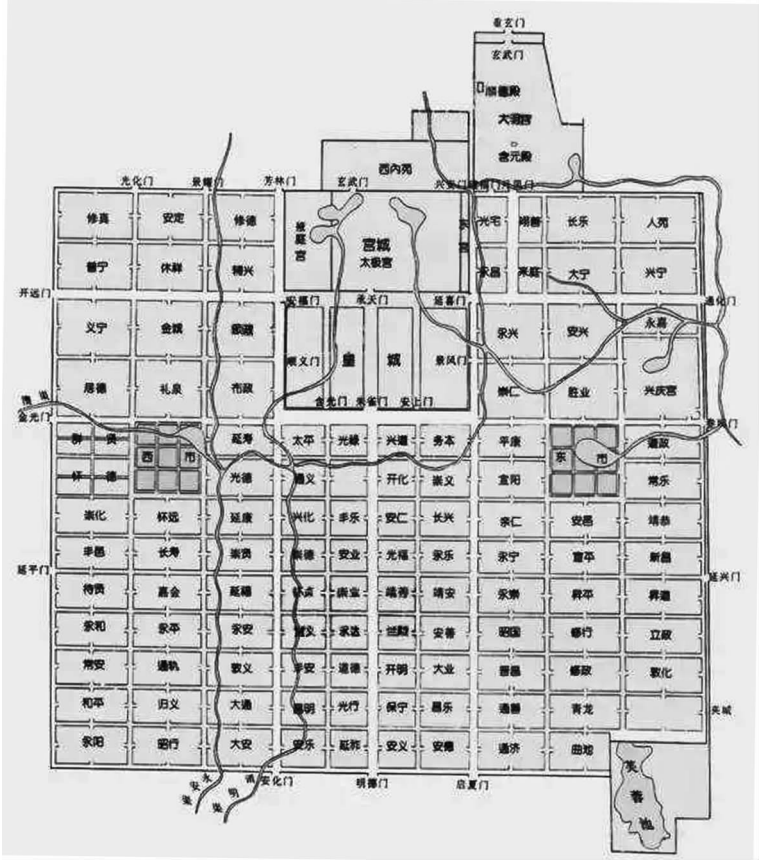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提到四主，分别是南象主暑湿宜象，西宝主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故象主之国，躁烈笃学，特闲异术，服则横巾右袒，首则中髻四垂，族类邑居，室宇重阁。宝主之乡，无礼义，重财贿，短制左衽，断发长髭，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毳帐穹庐，鸟居逐牧。人主之地，风俗机惠，仁义昭明，冠带右衽，车服有序，安土重迁，务资有类。三主之俗，

东方为上。”玄奘之四主分成象主、宝主、马主、人主，虽记其风俗之异，但未讲各主之确指。而同时期之唐人道宣就明确将四主与当时四个政权对号入座，他在《释迦方志》卷上说：“此一洲四主所统，雪山以南，至于南海，名象主也。地唯暑湿，偏宜象住，故王以象兵而安其国，俗风躁烈，笃学异术，是为印度国。”认为象主是印度国。又说：“雪山之西，至于西海，名宝主也，地接西海，偏饶异珍，而轻礼重货，是为胡国。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马，名马主也。其俗凶暴，忍煞衣毛，是突厥国。雪山以东，至于东海，名人主也，地唯和畅，俗行仁义，安土重迁，是至那国，即古所谓振旦国也。”他主张宝主是胡国，马主是突厥国，人主是至那国，即唐朝。但宝主胡国仍未确言，在道宣的另一部书《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更明确地解释说：“东谓脂那，主人王也；西谓波斯，主宝王也；南谓印度，主象王也；北谓猃狁，主马王也。”结合二处的记载，道宣将四主之名与当时并存的四个区域性的国家对号入座，宝主胡国指波斯，即萨珊波斯，象主是印度，马主是突厥，而人主是中国唐朝。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原来各国实力对比发生改变，各政权之间相互吞并，新政权在实力上超过旧国家，旧的四主说不适应新秩序了，所以在四主说基础上就出现了五王说。一位来自巴士拉的旅行家伊本·瓦哈卜回忆他来中国胡姆丹（长安城）与皇帝的谈话时，提到伊拉克王被称作“诸王之王”，唐朝皇帝被称作“人类之王”，突厥王被称作“猛兽之王”，印度王被称作“智慧之王”，拜占庭王被称为“美男之王”。这是适应萨珊波斯被大食攻灭后，拜占庭与大食在西方分庭抗礼的国际新形势，四主说就被五王说所取代。此事古代阿拉伯人马苏第在所著《黄金草原》也有记载，这名伊拉克人在回忆中提及中国国王说：“所有人中最为富裕的占有者是统治伊拉克的人，因为他占据世界的中央，其他列强围绕其周围，所以我们称之为“王中王”。继这一帝国之后，就是我国，我们把它看作是人类的王国，因为任何一个王国都没有像它那样被治理得井井有条，也不像它那样被规则地治理，沿有任何一个地区的臣民像我们的臣民听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人类的国王。继我们之后便是猛兽的国王，这就是我们的近邻突厥人的国王，他是人类中的猛兽的国王。继他之后是大象的国王，这就是印度的国王，我们承认他们是智慧的国王，因为智慧发源于该国。最后一个是罗马人的国王，我们也把他们看作是人类的国王，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体形那样优雅和面庞那样美丽的居民，以上就是主要国王。”在旧的四天子说基础上改造成五王说，即伊拉克王是“诸王之王”，东罗马王是“美人国王”，印度象王属“智慧之王”，突厥马王是“猛兽之王”，而唐朝皇帝是“人类之王”。不管是哪种说法，都不能缺少东方之中国唐朝，极为生动地说明中古时期唐朝的国际声望。

隋唐长安以国际性大都会的地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注意，拜占庭作家西莫卡塔在

《历史》一书中记载桃花石国的统治者 Taissan，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上帝之子”，与汉语之天子相当。他记载了服尚黑衣的桃花石国（隋朝）派兵越过大江攻灭服尚红衣的另一国（陈朝），一统全国。他还提到，“据说，亚历山大在桃花石城几里外，建筑第二座城市，外邦人称之为库姆丹（Khubdan）。”库姆丹城有两条大河流横贯其中，大河两岸垂柏依依。学者们认为此桃花石国可能是隋朝时代之中国，所记之事与隋平陈统一全国、隋朝自汉长安迁都大兴城相符合。值得一提的是在拜占庭人称长安为库姆丹之时，大食人则称长安为胡姆丹（Khumdān），关于中国皇帝居住的京城胡姆丹，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询问曾经游历过长安的伊拉克人伊本·瓦哈卜，“他告诉我们说，这座城市很大，人口众多，一条宽阔的长街把全城分成了两半。皇帝、宰相、禁军、最高判官、宫廷宦官以及皇家总管、奴婢，都住在这条大街右边的东区，在这里，既没有任何百姓同他们杂居，也没有任何市场。在这个区域，沿街开凿了小河，淌着潺潺流水；路旁葱茏的树木井然有序，一幢幢邸宅鳞次栉比。”也认为长安城环境优雅，街道两边流水潺潺，城内城外树木葱郁。



唐长安示意图

外国旅行家还提到唐代长安的东、西两市。提及长安东市的有日本求法僧圆仁，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到唐武宗会昌三年（843），“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从此处火灾的损失中可知，仅12行就有四千余家商店，拥有220行之东市其规模便可想而知了，长安之繁华盛况也可见一斑。关于西市，伊拉克人伊本·瓦哈卜亲眼看见，“在大街左边的西区，住着庶民和商人，这里有货栈和商店。每当清晨，人们可以看见，皇室的总管和奴婢、宫廷的仆役、将军的仆役、以及其他当差的人，或骑马，或步行，鱼贯似的来到这个既有市场又有商店的街区，采购主人需要的东西。”商店云集、买卖两旺的西市给外蕃游客留下深刻印象。这些由外籍人士保留下来的零星记载与中文史籍的大量记载相较，数量虽少但尤为珍贵，见证了隋唐长安国际性大都会的地位。

四、影响与启示

唐初推行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交替使用册封体制和羁縻制度，确立与唐朝国力相当的国际地位，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周边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然后采取实际措施巩固外交成果，在经济贸易和政治联盟的基础上，输出唐朝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以长安政府为中心形成东亚文化圈，逐渐确立了长安作为东方文明中心的地位，进而影响到欧亚大陆的古代型国际格局。

在制度上，唐朝达成了与盟友互通使节的共识，以错金字玄鱼符结好北方，以十二月铜符为信契结好西方，按距离远近区分派出使节为使入蕃和使绝域，按地理方位划分外来使节为东西南北四种，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古代型外交制度。在外交条件上，将国内交通体系与国际交通网对接，用实际行动拓宽中外交流的渠道，保障参天可汗道、沙漠绿洲道、草原道、西南通道、海上国际通道等基础，保障中亚马匹、西亚香药、南亚犀象等奇珍异货源源不断地运来，保护唐朝丝绸、茶叶、陶瓷等物资络绎不绝地输出；在文化思想上，在汉字、儒学、律令、科技、宗教、制度等方面，影响到周边地区，在乐舞、绘画、建筑、医学、宗教等方面吸收外来文化，使得中原文化远距离传播，外来文明在唐朝内地无处不在。在中外政治经济关系形成良性循环的同时，中外思想文化关系也出现密切相关的氛围，中国传统的外交制度和外交思想就形成了和而不同、睦邻友好的基本内核，也是唐朝对当代国际关系和后世历代国际关系的伟大贡献。

（撰稿人　贾志刚）

一代女皇的文治武功

武则天的一生都与长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她出生在长安，政治生涯发端于长安，死后葬于长安。据史料记载，武则天，讳曌，并州文水人也。“初，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武则天并没有得到太宗的宠爱，直到唐太宗驾崩她都是个才人。但是在此期间，她勤于学习，苦练书法，这为其以后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她见证了贞观之治，了解唐太宗的治国方略，并且她很幸运，唐高宗信任她，支持她，这都为其走上政治的顶峰做了准备。武则天一生前半期大部分在长安度过，称帝之后，长期居于洛阳，还是十分重视西京的地位和作用。她在位期间的确采取过一系列措施，那这些措施是怎样影响唐朝发展，对唐朝有什么作用？还有针对长安的措施，当时对长安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对现在西安的发展有哪些启示？

一、武周代唐



武则天一步一步获得唐朝最高领导权。最初是从感业寺再次入宫，得到唐高宗的宠爱，进号宸妃。在与王皇后争夺后位中获胜，“永徽六年，废王皇后而立武宸妃为皇后”。唐高宗身体不好，他知道“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就开始委托武后处理部分朝政。显庆以后，唐太宗的病情加重，而武则天的执政更加成熟，唐高宗也更加信任她，“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此时武则天和高宗共治盛唐。683 年高宗去世，684 年正月武则天临朝称治，权力进一步加强，这之后，开始积极为自己称帝做准备。公元 690 年废黜睿宗，称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终于掌握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这也引起唐室和大臣的不满，垂拱四年七月，越王李贞及其子琅琊王李冲等起兵反抗，结果“冲起兵七日而败”，“贞起兵凡二十日而败”，父子皆传首东都；还有“（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柳州司马李敬业举兵于扬州以讨乱。（光宅元年十一月）乙丑，徐敬业将王那相杀敬业降”，等等，都很快被镇压下去，说明武则天还是有一定的才能，镇压这些叛乱也使其统治稳定下来。



武则天像

武周之所以能够取代唐朝有许多原因。其一是武则天自己注重自身修养的塑造，发奋读书，精通文史，苦练书法，武则天的书法非常好，这也为其以后代高宗批阅奏折做了准备。她还积极学习唐太宗的治国经验，特别是太宗处理民族事务的方法，这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运用自如。其二是唐太宗把武则天纳入宫中，增长见识，给她学习的机会，让她看到权力的强大作用。其三是唐高宗给了她权力。唐高宗由于身体原因，把权力一次次授予武则天。其四是唐高宗的继任者没有能从武后手中夺回权力。最终导致武周代唐。

二、一代女皇的文治武功

武周时期，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特殊时期，她以周代唐，为了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在长安的统治，为了摆脱李唐旧的关中势力影响，迁都洛阳，但并没有取消西京长安，这为以后还位李唐江山留了后路，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有效措施，对长安的发展有重大的作用。

（一）注重人才。她清楚地知道人才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其统治期间广泛搜罗天下有才之人，如：姚崇、宋璟、张柬之、狄仁杰、张说等名臣帮助其治理国家，政治上较清明。武则天注重纳谏，狄仁杰是其最信任的宰相，武则天比较注重听其谏言。

“后将造浮屠大像，度费数百万，官不能足，更诏天下僧日施一钱助之。仁杰谏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终由地出。不损百姓，且将何求？今边垂未宁，宜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务。就令顾作，以济穷人，既失农时，是为弃本。且无官助，理不得成。既费官财，又竭人力，一方有难，何以救之？’后由是罢役。”任人唯贤，不拘一格提拔任用贤臣。姚崇刚开始只是一个“濮州司仓，五迁夏官郎中。时契丹寇陷河北数州，兵机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崇因一篇文章被武则天重用，连升数级，被任命为宰相，武则天不拘一格任用良才，同时也注重保护贤才。宋璟“耿介有大节……当官正色，则天甚重之。”但是也老是遭到酷吏、张易之等人的陷害，武则天都不听信他们，赦免宋璟。武则天重用酷吏，打击报复，滥用私刑，株连无辜，尤其大肆迫害唐宗室成员。武则天在早期长安居住时，就比较残忍，杀人较多，因此长期居住在洛阳。还有重用男宠，如薛怀义、张易之等，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整体上看武则天统治时期政治比较稳定。

（二）重视经济发展。早在唐高宗上元元年（674）末，武则天向唐高宗上书，建言十二事，其中就有三条是涉及经济方面的：一、劝农桑，薄赋敛；二、给复三辅地；三、省功费力役。充分体现了其对农业、手工业发展的重视程度。

武则天十分注重关中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发展，多次派人修建水渠，形成纵横交错的供水网。为节省军费开支，武则天提倡屯田、营田。天授初，娄师德在丰州“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饷和籴之费”，因此受到武则天的大力嘉奖。武则天注重农桑，并把农桑发展情况作为御史巡察的主要内容之一。武则天注重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商业的发展。武则天统治时期，由于人口迅速增加，生产发展，天授三年（692），武则天下令在神都洛阳增置西市。唐代洛阳城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当时并无外城郭。长寿二年（693），武则天命宰相李昭德增筑外郭城，“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使洛阳更加宏伟、壮丽，使洛阳成为武周时期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有各地的外来商人云集洛阳、长安、扬州、广州等地，商业繁荣。其统治时期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虽然其统治期间广修寺塔，修建明堂，营造天枢，奢侈腐化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每一代君主到后期都会有所懈怠，武则天也毫不例外，在其统治后期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力享乐。

（三）注重文化建设。思想文化上，提高佛教的地位，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在全国广修寺院，在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处，曾令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座，规模较大，范围较广，佛教在其支持下迅速发展，尤其是翻译佛经，武则天对佛家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唐朝长安是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政府管辖的国学六馆（国子监、太学馆、四门馆、书学馆、律馆和算学馆）是全国最高的学府，就是以后武则天在东都，也没有把长安的

学府废掉。武则天在科举制的发展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创立了殿试和武举。殿试始于载初元年（690）二月十四日武则天“试贡举人与洛城殿前，数日方毕。殿前试人，自此始也。”或云，这年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长安二年（702）正月，武则天“初设武举”，其考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长安对武则天来说很重要，其首创的武举就是发源于长安，其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这便于选择全面的人才，如姚崇、宋景、张柬之、狄仁杰、张说等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被武则天重用的。武周统治21年，进士及第者1172人，其中武周宰相75人，科举入仕者27人，比例大大超过了前代。这些有才能之人入仕，不仅提高了统治者的文化素质，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浓厚的文化氛围。武周时期因袭盛唐遗风，鼓励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兴办学堂，武则天为了更好地维护边疆稳定，允许和鼓励少数民族首领子弟入“国子学”和中央王朝各地郡学读书为质，这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

（四）武则天在处理民族关系军事上，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在处理民族事务中沿袭唐太宗之治，但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主要采取“因俗而治”，“以夷治夷，设立羁縻府州”，“远交近攻，和弱离强”，“和亲通婚”，“武力征服，维护统一”等一系列政策。武则天在位期间，周边民族关系复杂，长安是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门户，她深知长安重要的战略地位，虽长期居住在洛阳，但从来没有放松对长安的控制。武则天在位时，主要的边境敌人是突厥、吐蕃。长寿元年（692）九月，武则天应西州都督唐休璟之情，派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率军西击吐蕃，光复安西四镇，并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为了进一步加强西北边防，长安二年（702）十二月，“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同年正月，突厥寇扰盐、夏二州，七月，突厥又寇抄代州等，突厥屡次进攻，此时武则天在长安坐镇指挥，最终击退突厥。武则天在战争中取胜，除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外，还能重用番将，这些番将往往骁勇善战，在以后武则天的军事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永隆元年（680），武则天任用名将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经营西北边防；还有阿史那斛瑟罗因拥立武则天称帝有功，加封“竭忠事主可汗”等还有许多。武则天由于任用酷吏，建国时杀害许多良将，导致对吐蕃和突厥的战争中多次失败。在对突厥默啜的战争中，任命其男宠薛怀义为帅，他是一个不懂军事的和尚，还好任命其他懂军事的李昭德、苏味道等，阵容强大，使默啜胆怯归附。在军事上武则天的确有军事才能，但是有时候有任人唯亲之嫌。武则天统治时期，面对周边外患，利用自己的军事才能很好地处理了周边民族关系。长安是西北和西南的门户，也是唐朝的建都所在，其地位无可取代。

三、影响与借鉴

武周代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并不是朝代更替，而政权只是从丈夫手中转移到妻子手中，虽说在皇家中只是很小的一步，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很大的一步。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的横空出世，也意味着更多的历史变化即将到来。

在我国封建国家，政治的清明，国家治理的好坏，与统治者有密切的关系。唐太宗虚怀纳谏，任人唯贤，有魏徵的直言不讳，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也有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殚精竭虑的辅佐，唐朝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周时期，沿袭太宗的统治，武则天也注重人才，如姚崇、宋璟、张柬之、狄仁杰、张说等在武周时期就被重用。姚崇、宋璟后来成为唐玄宗的宰相，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武周时期，武则天为了打击政敌，大量任用酷吏，如来俊臣、周兴等，造成许多冤情错案，并且大兴告密之风，武则天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乃盛开告密之门，“故上变者遍天下，人人屏息，无敢议”这对社会稳定造成极不利的影响，人人自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是国家建设也好，地方发展也好，都需要一支优秀的领导团队，这支队伍要有在任何复杂局面中都能驾驭风险和掌控时局的能力。

农业是立国之本，武则天的农业政策就值得一提，政治运动并未冲击农业生产。在她统治时期采取了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继续推行均田制等措施，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突出表现在：第一，人口数量增长，至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去世时，全国有户 615 万余，人口 3714 万，较唐高宗永徽年间提高近一倍。第二，粮食产量增多，国家仓库里粮食充足。陈子昂说：“太原蓄钜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国家之宝，斯为大矣。”唐人张说也提到太仓有如山丘一样之储粮。粮食安全的最根本之处是农业，农业是立国之本，关中平原作为极为重要的粮食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武氏的经验是政治运动不波及农业，大农业，小政治。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在武周时期商人甚至可以参加皇帝国宴，成为皇帝的座上客，商业和商人地位有明显提高，两京和各区域中心城市的贸易活动极为活跃，再加上大量的胡商来唐交易，追逐利润，有利之所，无处不在。当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目标对陕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陕西腾飞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遇，西安作为西北的门户，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武则天十分重视制度文化的建设，她执政期间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首创武举和殿试，注重选人。这一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周边民族产生影响。日本派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也采取科举制选拔人才；还有新罗等。唐朝长安就是国家教育的摇

篮，人才培育基地，要将陕西建设成教育大省，利用陕西高校林立、人才密集的优势，建立健全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陕西的发展需要大量人才，因此要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实现陕西文化事业的伟大复兴。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怎么处理好民族关系对国家治理很重要。武周时期，武则天就有一系列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方法。这些方法对于现在中国来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仍然有很大的作用。现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像武周时设立羁縻府州。陕西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民族聚集区域，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实现民族和睦相处，也要借鉴历史的宝贵经验。

（撰稿人　李玲玲）

唐代科举的进士科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由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察举制度发展而来，大抵萌芽于南北朝，始立于隋而终成于唐，并一直延续到清末。唐代是科举制的奠基时期，宋代以后的考试内容、考试场次、考试形式以及科第习俗都可追溯到唐代。从唐代开始，几乎每一个饱读诗书的士人都与科举密切相关，他们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夙愿。科举是中国古代政治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进士科在唐代贡举常科中地位举足轻重。“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致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七十少进士’。”有唐一代，科举及第总人数，明经约有26 000余人，还有制举诸科上千人。据《文献通考》卷29 所录《唐登科记总目》，参考徐松《登科记考》作统计，进士有6 658人，还有部分遗漏。各科及第总人数，当在 3 万人以上。公元 290 年间能跻身进士及第者仅不足七千人，竞争之激烈与录取率之低显而易见。



与其他科目及第者不同，进士科及第者在放榜后还有一系列参见和游宴庆祝活动。由于进士科竞争相当激烈，一旦及第，必是件无上荣耀的喜事，故称“一登龙门，则身份十倍。”据《唐摭言》所载，从中宗神龙以后，形成了曲江宴会、杏园探花、雁塔题名的风尚。

一、过堂、谢恩与期集

中唐以后，科场皆以进士考试为中心，并形成了许多专门的术语，为便于了解，现将其解释如下，据《唐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载：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此是大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

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

由此可知，围绕进士科考试已形成了相当多的专有名词。进士科作为唐代贡举常科中的重要科目，至盛唐以后，地位逐渐超越明经。进士科所选人才相比其他科较优较精，且仕途较为顺畅，故受到世人追捧。

进士科为世人所重，亦反映了进士科竞争之激烈，登第之不易。无数士人连试二三十次皆败落而回，而一旦及第，则喜出望外、难以言表。年已 50 的孟郊在多次落榜之后终于在贞元十二年（796）金榜题名，写下了闻名于后世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在放榜后，新进士及第者还须参与一系列礼节和仪式，主要有参谒宰相、拜谒座主和同年期集。

参谒宰相，唐时称为“过堂”，因其在尚书省都堂举行而得名。由知贡举者率领新及第进士参谒宰相。《唐摭言》卷三《过堂》记载的情况如下：

其日，团司先于光范门里东廊供帐备酒食。同年于此候宰相上堂后参见。……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生徒随座主过中书，宰相横行，在都堂门里叙立。堂吏通云：“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公。”……前后状元已下叙立于阶上。状元出行致辞云：“今月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获在相公陶铸之下，不任感懽。”言讫，退揖。乃自状元已下，一一自称姓名。称讫，堂吏云：“无客。”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

《唐摭言》卷三将拜谒座主称之为“谢恩”，意为举子能及第，乃出于知举者的举荐提拔，需要答谢其举援之恩。《唐摭言》载其礼仪如下：

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入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以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事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曲谢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谢讫，即登阶，状元与主司对坐。于时，公卿来看，皆南行叙坐；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三日后，又曲谢。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苟特达而取，亦要言之。

首次谢恩，主要是礼节性的，通过自我介绍和谢恩参拜，表明座主和门生关系的建立，三日后之曲谢，增加一些感激提拔的内容。唐后期通过进士科而建立起来的官僚关系网，在谢恩和曲谢这两次活动中集中反映出来。

至于期集，则是新及第进士之同年宴会。据《唐摭言》所载：“谢恩后，方诣期集院。大凡敕下已前，每日期集，两度诣主司之门；然三日后，主司坚请已，即止。同年

初到集所，团司，所由辈，参状元后，便参众郎君。”聚会的地点为期集院，也就是主司住宅附近，由进士团团司租用之地。

二、科举文化中的曲江元素

科举与曲江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科举使曲江文化底蕴更浓，曲江为科举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其中，最著名的为曲江游宴。曲江大会在关试之后举行，故亦称“关宴”。“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曲江元素有助于科举文化的世俗认同。

曲江在长安城之东南角，为当时京都的游赏胜地。宋程大昌《雍录》卷六引康骈《剧谈录》谓：“曲江池，本秦时隑州。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据学者考证，唐时曲江池的四至，是在芙蓉园和曲池坊之北，晋昌坊、慈恩寺、杏园之东，修行坊之南，长安东夹城之西。曲江游赏，起自中宗，于玄宗时大盛。《唐摭言》曾引实录中一段文字，萧嵩家庙因逼近曲江，上表请移他处，唐朝廷就命士兵另为萧嵩营建，敕批为：“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与卿思之，深避喧杂。”由此可见，至天宝盛世，曲江附近已有众多宫殿，十分繁华。

及第新进士的曲江游宴为曲江春景的重要内容。晚唐人还特地为此编写了《曲江春宴录》《曲江春游录》等书。据《唐摭言》引李肇《唐国史补》所载“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远。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向之下第举人，不复预矣”。曲江大会原为落第举子所设，铺陈极为简陋，后来逐渐为进士及第者所占，渐趋奢侈。《唐摭言》载曲江游宴的盛况为：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所存者唯尚书省亭子而已。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撤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

曲江游宴吸引了长安城百姓争相观看，甚至万人空巷，有时皇帝也会登临曲江南岸的紫云楼观看，成为唐代京城长安的一大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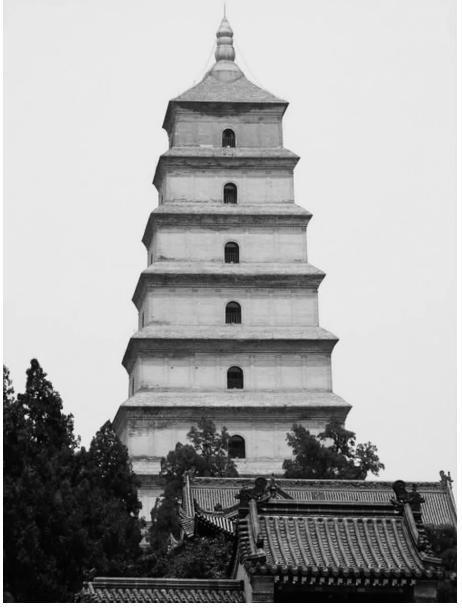
在曲江宴饮之时，新及第进士常吟诗作对，写下精彩诗篇，记叙当时的美好情景，如白居易《酬哥舒大见赠》（题下自注：去年与哥舒等八人，同共登科第，今叙会散之愁意）：“去岁欢游何处去，曲江西岸杏园东。花下忘归因美景，樽前劝酒是春风。各从微宦风尘里，共度流年离别中。今日相逢愁又喜，八人分散两人同。”另有重游曲江时想

念好友，合作《曲江忆元九》：“春来无伴闲游少，行乐三分减二分。何况今朝杏园里，闲人逢尽不逢君。”

曲江春宴，是进士及第后最为盛大的、历时最久的一次宴会。新及第者在此盛宴中游赏玩乐，吟诗作赋，极尽欢愉之情。而与此同时，宴集奢侈之风见长，到宣宗时，奢靡之风日盛。据《唐摭言》载“咸通中，进士及第过堂后，便以骡从，车服侈靡之极；稍不中式，则重加罚金。蒋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时家君任太常卿，语泳曰：‘尔门绪孤微，不宜从世禄所为，先纳罚钱。慎勿以骡从也。’”可见这种挥金如土、相互夸耀的习气，对于权贵之家是一种享受，而对于贫寒子弟来说，却是沉重的负担。唐朝廷遂下令禁止，但奢侈风气依然存在，直到唐亡，曲江胜景便不复往昔。

三、雁塔题名

曲江游宴之后，新进士及第者要前往曲江北岸的慈恩寺大雁塔，题名于塔身，称为题名会。唐末无名氏《玉泉子》谓：“慈恩寺连接曲江及京辇诸境，每岁新得第者毕列姓名于此。”慈恩寺位于长安东南角的晋昌坊，建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内有玄奘译经道场；寺内雁塔则应玄奘之请，建于高宗永徽三年（652）。据《唐摭言》所载：“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神龙为中宗之年号（705—706）。由此可知，在此之前进士及第者尚未有雁塔题名之举。



大雁塔

雁塔题名之事，《唐摭言》所载甚详：“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或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自此，雁塔题名成为士人学子心向往之之事。满腹才华的白居易 28 岁一举及第，在新晋 17 名进士中排名第四，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有关雁塔题名之人，据宋人戴埴所说，“细阅之，凡留题姓名，僧道士庶，前后不一，非止新进士也。”可见唐人雁塔题名，僧

道士庶，各色人都有，非同科及第者也有同登塔题名之事。据傅璇琮先生推断，慈恩寺本是游人繁杂之地，从开始的举子中有人偶然题名于雁塔，后逐渐演变为登第者游宴题名的场所。雁塔题名的内容，一般包括题名者的姓名、题名时间、郡望等。从遗存的“唐雁塔题名贴”等题名实迹来看，能确认的进士题名格式有两种：直接题前进士某某者；题郡望及姓名者。而且雁塔题名，均以毛笔题名在大雁塔塔壁上。

雁塔题名在唐武宗时一度被废止。以门荫入仕的李德裕对进士的“浮薄”之气极其厌恶，上奏将曲江宴会、雁塔题名都罢去，甚至将以前所题之名也削去。此后，到宣宗大中元年雁塔题名恢复如故。唐昭宗时的徐寅曾以“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为题吟诗，可见至唐末，这里又再度集中了一大批的题名。

题名之事，其意本为“一朝成名天下知”。苦读诗书之士人，所追求之目标无非是飞黄腾达，光耀门楣。一旦及第，就可以跻身统治阶级行列，难免流露出得意和踌躇满志的情绪。题名雁塔，不仅可以使新进士及第者吐气扬眉，风光无限，且显示了唐朝廷收拢人心的政绩。雁塔题名之事，为士人追求进士登第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四、影响与借鉴

唐代科举考试渐趋兴盛，进士出身成为诸色入仕“第一出身”，称为“士林华选”。中晚唐以后，进士科出身升迁迅捷，仕途顺畅。举子考中进士之后一系列的参见与庆祝活动，反映了科举取士对唐代社会生活、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深远影响，同时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于当今西安城市发展中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具有深刻的意义与启示。



（一）合理规划，建立多元公共空间

长安城与曲江、雁塔的卓越搭配对于当今城市发展规划具有启示意义。曲江、雁塔成为唐代盛极一时的游赏胜地，平民百姓、公卿贵胄与皇亲国戚云集此处观赏歌舞、游览湖光山色、举行各种娱乐活动。新及第者曲江游宴、雁塔题名等一系列宴集活动，既显示了登第士人考取功名后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情，多年寒窗苦读、一朝功成名就的豪情，也体现了唐朝廷网罗各方英才为我所用，得尽天下英才的政绩。

曲江为有浓郁文化氛围的自然景观，长安城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曲江游赏文化创造了条件，而曲江游赏为长安都市生活带来勃勃生机。将自然景观与城市有机结合，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雁塔为长安城标志性的人文景观。唐人雁塔题名，不仅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而且后来者论其书、谈其事，成为一种风雅之事。在雁塔举办书法展，除展览名家之作外，还可以邀请众位学子仿古人题名作诗。这样不仅可以构建出多元化的公共空间，而且可以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为当今都市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二）雅俗共赏，重塑中国都市文化

曲江游赏、雁塔题名对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现代社会，西方国家的都市文化强烈冲击世界各个角落，不仅破坏了当地本土的传统文化，而且造成千城一面的没落景象。西方的都市文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如娱乐日益低俗化，青少年文化中的暴力、成人文化的堕落等。所以，我们需要发掘古典文化中的精华，来重塑中国特色的都市文化。

曲江游赏为古代都市文化中的典范之作，进士文化为曲江游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进士及第后一系列的宴集活动，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新及第者及各方文人汇集一地，吟诗作赋，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最为著名的孟郊的《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西安世园会会徽设计者被此诗洋溢的春风得意之情激发出创作灵感，创作了富有影响力的“长安花”。值得一提的是以曲江为题材的诗在《全唐诗》的数量相当可观，据学者统计，大致在390篇左右。这些诗篇记叙时代贯穿了整个唐代，而且体裁多样，多出名家手笔，是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除了发掘唐代诗歌文化资源，曲江流饮的形式也可被借鉴，举办群众性的、官方性质的不同层次的文化与讨论活动，高校学术性的研讨活动也可以此方式。这样既发思古之幽情，又能古为今用。

（三）走向国际，复兴传承唐代文化

曲江与雁塔作为长安城标志性名片，是其走向国际的重要品牌。唐代进士及第后曲江游宴、雁塔题名这些规模宏大的宴饮与庆祝活动，成为万众瞩目的盛事。造就了曲江和雁塔这两处游赏胜地。这两处胜地累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深入地挖掘其中的唐文化资源，梳理提炼唐文化的特质，复兴传承唐文化，进而以唐文化作为沟通中西文明的纽带，将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新长安城展现在世界面前，吸引全球目光。唐文化的重新勃兴，既是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升华与突破，又是西安在当代社会富有活力的延续和传承，更是西安走向国际大都市的重要环节。历史与现实相交融、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完美结合的长安城将是建设国际性大都会的典范之作。

（撰稿人　李　君）

忽必烈汉法治关中

一、忽必烈分藩京兆之前的关中情况

公元1231年，金蒙之间持续十余年的陕西争夺战终于以蒙古的胜利落下了帷幕。三秦大地在这次战争的荼毒中千疮百孔，民生凋敝，经济损失严重。从陕北高原到汉江谷地，处处哀鸿遍野。

（一）镇抚陕西总管京兆等路事对关中的初步恢复

蒙古在确立了对关中的统治之后，依照“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惯例，在陕西设置了许多军将，其中最高的官职为镇抚陕西总管京兆等路事，又作京兆（等）路都总管。历任镇抚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恢复关中破败的经济，史籍记载：“时关中苦于兵革，郡县萧然。雄披荆棘，立官府，开陈祸福，招徕四山堡寨之未降者，获其人，皆慰遣之，由是来附者日众。雄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但此时镇抚的主要职责仍是带兵打仗，治理地方并不是首要任务。镇抚为了筹集军粮，会年年抢劫仍为宋境的陕南，使得陕南满目荒凉。直到1237年陕南被蒙古兼并，才终止了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

（二）六州规措大使管理下的关中

1240年，窝阔台大汗任命梁泰为宣差规措三白渠使，着手对关中三白渠进行修复，后来在修渠的过程中，规措使逐渐成为一级常设官，称为“六州规错大使”。在宣抚司建立之前，规措使作为陕西的唯一文职衙门，网罗了一些汉族名儒，在关中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还做了一些文治工作，如整修文庙，复立开成石经等。但是这种恢复工作鲜为可数，更多的却是破坏。蒙古对陕西的统治是“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他们在陕西滥施横暴的统治方式，直接摧残着陕西的经济。以至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后，杨惟中宣抚关中时，陕西仍是“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皆惊忧无聊”。

二、忽必烈分藩治陕

陕西这种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局面，直到忽必烈分藩治陕后才有所改观。在灭亡金、宋之后，蒙古贵族内部就如何统治中原一直存在分歧，是继续维护部落传统，在汉地推行奴隶制，还是改变传统，继承汉地已有的封建制度？其中，忽必烈表现出了高瞻远瞩的一面，主张学习汉法，积极搜罗人才。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包括赵壁、王鹗、许衡、姚枢等著名儒士在内的汉人幕僚集团。

（一）京兆宣抚司的建立



忽必烈

1253 年，蒙哥大汗开始分封征讨得来的土地，将关中地区分封给了忽必烈。从此，关中成为了忽必烈即位之前推行汉法的试验田，陕西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同年春，忽必烈在京兆（今陕西西安）设置从宜府，开始改变陕西自金以来有军无政、将校横行的局面。同时，为了减少蒙古贵族对汉法的阻碍，他将蒙古军人移驻到陕南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并奏请蒙哥将河东解州（今山西运城）盐池划拨陕西以供军费，改变了以往因军费劫掠关中百姓的局面。这样一来，在陕推行汉法的几个最大阻力得到合理的解决。

1253 年，京兆宣抚司正式建立，开明蒙古贵族孛兰与汉人杨惟中为宣抚使，商挺为郎中，开始在关中全面推行汉法。首先，禁止蒙古贵族恣意妄为，处死了个别典型，以儆效尤。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整顿吏治，惩处贪腐，明确尊卑等级，举用人才，制定各项封建政策法规；经济上奖励农桑，招商开市，设立交钞提举司，发行纸币，等等。忽必烈在关中尝试汉法的成功，使得陕西成为蒙古境内最早恢复正常封建秩序的地区，也为后来安西路（关中道东部地区）在元朝成为中国西部政治中心奠定了基础。

（二）廉希宪汉法治陕

年夏，忽必烈从大理得胜归来，驻扎在六盘山，改京兆宣抚司为关西道宣抚司，任命亲信廉希宪代替杨惟中为宣抚使，大儒姚枢为劝农使，商挺为宣抚副使，进一步在关中实行汉法。自此到元中统四年（1263），廉希宪开始了其近十年汉法治关中的宦途。

廉希宪（1231—1280），字善甫，畏兀儿人，是元朝在陕西推行汉法最具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任关西宣抚使期间，在政治文化上完全支持儒学汉法。他以“色目人”的身份，得到了汉人所没有的特权和信任；在关中推行汉法时，也因之减少了来自各方



廉希宪

的阻力。廉希宪采取了以下多项措施，振兴关中儒学和经济。

第一，文化上崇文重儒。廉希宪赴任关中之后，首倡复兴儒学。除劝农使姚枢外，廉希宪又请北方硕儒许衡为京兆提学使，使得“元初三大儒”之中的两人都任职陕西。此外，他还曾多次登门延请关中名儒萧惟斗。同时，廉希宪下令各郡县建立学校，“教育人材，为根本计”。一时之间，关中读书学习之气蔚然成风，民间不再以目不识丁为荣，“九儒十丐”的社会状况也得到改善。

第二，政治上继续抑制军事豪强。廉希宪实施“抑强扶弱”的政策，严厉打击军帅、贵族等。他继承杨惟中的方针，将军事贵族掳掠的儒士一律赦免，编入儒籍。此举不但有利于复兴儒学，也对军事贵族的势力有一定的遏制。同时，对于军帅掳掠平民的现象，廉希宪虽然无力阻止，但是也曾再三强调禁止俘虏降民，取缔奴隶市场，“禁诸人无贩易生口”，最大限度地减小蒙古贵族对关中经济民生的危害。

第三，经济上教民耕种，开辟屯田，释放奴隶。由于陕西处于宋元对峙的前线，保障着蒙古军队攻打宋朝的军需物资。1256 年，蒙古当局下令征发京兆路布万匹、米 3000 石、帛 3000 段及大量的兵器，并要求运送至平凉集结。商挺认为此举劳民，便让在关中任职的平凉籍官吏组织私属运粮，以节省民力。同时，廉希宪等人还对蒙古贵族抢掠人口加以禁止，并奏请释放大批被俘军役奴，增加了关中地区的劳动力。

三、两次大规模反对汉法斗争

——“钩考”风波与阿里不哥叛乱

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开明贵族在关中推行汉法，并非一帆风顺。在忽必烈尚未即位之前，守旧的蒙古贵族仍然拥有很大的势力，这些人对汉法儒教极其不满，力图恢复蒙古的奴隶社会。而身处第二等级的“色目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以回法来对抗汉法。这种制度和民族文化上的冲突，直接导致了关中权力的风波迭起，其中的“钩考”风波

和阿里不哥的叛乱可以说是影响重大的两次反对汉法事件。

（一）“钩考”风波

忽必烈分藩关中之后，以此为跳板，南攻四川，灭大理，西兼吐蕃，不断扩张势力。这样难免引起蒙哥的猜忌，加之蒙哥身边的守旧贵族又趁机进谗言，挑拨二人关系。1257 年，蒙哥命阿兰答儿与刘太平等人对陕西的官吏进行审查。其时忽必烈南征未归，阿兰答儿与刘太平在关中设立钩考局，以检查陕西及河南钱粮赋税情况为名，对京兆宣抚司的官吏进行钩考。他们罗织大量罪名、诬陷官吏、严刑逼供，“恣为威酷，盛暑械人炽日中，顷刻即死”，导致关中恐怖气氛蔓延。

忽必烈南征归来得知钩考事件，十分气愤，难以忍受阿兰答儿等在自己的封地上诬陷官吏，滥杀自己的亲信。他很清楚阿兰答儿背后是蒙哥的授意，于是便将自己的妻儿子女送往哈拉和林作人质，以此表示对蒙哥足够的尊重。同时，忽必烈亲往和林朝见，消除了蒙哥对自己的猜忌。之后蒙哥主动撤除了钩考局，阿兰答儿原本想借机铲除汉法支持者的计划也随之落空，钩考风波暂时得到化解。

（二）阿里不哥叛乱

1260 年，蒙哥去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改国号为元，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汉法。此时，陕西的守旧派贵族与支持汉法的势力又发生了冲突，忽必烈直接采取铁腕镇压，保障了汉法的顺利执行。

蒙哥死后，漠北蒙古贵族扶持阿里不哥对抗忽必烈，冲突逐渐升级。此时，原本宣抚陕西的廉希宪等关中官吏都去开平（今察哈尔和热河之间的多伦诺尔附近）辅佐国事，陕西的汉法势力到了最衰弱的时期。阿里不哥趁此机会派刘太平与霍鲁怀至京兆府，企图控制关中，与驻扎在六盘山的哈剌不花汇合。此举一旦达成，将会直接从西、北两面包围忽必烈，对元朝造成致命的威胁。忽必烈对此采用雷霆手段，任命八春、廉希宪、商挺等人为陕西西川等路宣抚使，出兵镇压叛乱。这场战争一直从 1260 年持续到 1264 年，最终阿里不哥由于党羽间不合导致分化而最终失败。

四、对忽必烈汉法治关中的评价

（一）元朝的汉法试验田

随着阿里不哥党羽的叛乱被平息，陕西地区进入到了持续的恢复和发展期，汉法也在关中得到进一步的确定和推行。京兆官吏在陕西开展大规模屯田，修复了丰利渠（今陕西泾惠渠）。随着农业的恢复与人口的增加，陕西的城市与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古长安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地位被逐渐恢复，虽然此时的京兆府已经难以恢复以往帝国心脏

的宏伟气势，但是随着商业经济的逐渐繁荣，京兆府也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快速时期。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说：

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装。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

在马可·波罗的记载中，关中那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场面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毫无疑问，这一切都与忽必烈汉法治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忽必烈汉法治陕的成功也为其在全国大规模推行汉法积累了经验，在陕推行汉法的官员如廉希宪、商挺等人则因推行汉法的成功而受到忽必烈的赏识，成为忽必烈建立元朝的中坚力量。可以说，陕西是忽必烈在全国推行汉法的一块极其成功的试验田。

（二）汉法治关中的局限

忽必烈汉法治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由于蒙元的等级制度，特权等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然要将本民族的思想融入到治国策略之中。因此，在忽必烈的治国方针中，就呈现汉法、蒙古法、回族法三者杂用的状况，也就导致忽必烈推行汉法有一定的保留，并不彻底。其次，在财政经济上，蒙元实行的是带有游牧性质的丁税，而不是唐宋以来所形成的财产税。虽然丁税比肆意掠夺要进步很多，但是此举依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进而导致了陕西人口增长的缓慢。还有，诸如屯田制度、驱口制度等一系列落后的制度直接限制着陕西经济的发展，对陕西造成了难以消除的伤害。再者，在文治制度上，汉法治陕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蒙古贵



关中平原

族的特权。1261 年李璮叛乱，导致了忽必烈对汉人儒臣的猜忌和不信任。从此忽必烈直接改组陕西行省，不再任命廉希宪、赵良弼、商挺等人为陕西主政者，改由蒙古人担任，陕西地区汉法的推行也因此遭到极大的阻碍。另外，忽必烈还一直拒绝实行科举制，直到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才恢复。但即便如此，科举一直都未成为仕途的主流，陕西地区的士风也备受打击，读书之气被严重削弱。而最为后世诟病的则是元代陕西独特的省、藩二元政体，这也是元代陕西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直接原因。

五、忽必烈汉法治关中对当代的启示

忽必烈汉法治关中，从本质上讲是落后的少数民族主动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利用汉族的文化和制度进行统治的活动。在汉法推行高潮时期，关中地区社会经济呈现出勃勃发展的生机；而当汉法遇到阻碍时，社会的动荡和一系列的矛盾便自然而生。

事实证明，落后的文明必然要被先进的文明所代替。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面对历史的发展，一方面要不断学习进步的思想文化，提高本国、本民族的人口素质，保证长久的生存；另一方面，更要认清历史发展的大势，主动摒弃不为历史所容纳的落后的文化制度。

同时，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元朝的等级制度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进步，完全是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结果。在对待民族问题上，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各民族平等政策，创造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大环境，努力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保证社会长久的发展动力。

（撰稿人　张　明　王翰儒）

慈禧西逃与“回銮新政”

一、慈禧挟光绪西逃西安

1900 年 8 月 14 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逃，途经怀来、大同，9 月 10 日至太原。8 月 21 日，慈禧还在西逃途中，就谕令端方审度形势，在西安府城“酌备驻跸之所，沿途所经，饬地方官妥为筹备”。端方接旨后，即与两司商议，成立支府局，专办“迎銮”事宜。其实早在 1900 年 6 月，军机大臣荣禄就密遣心腹来陕，知会陕抚端方作“迎驾”准备。端方接到密令以后，立即在西安满城内相度地势，拟定修建行宫蓝图。端方在准备“迎銮”的同时，命令潼商道陈兆璜在潼关督造御舟，准备两宫渡河使用。10 月 19 日，慈禧、光绪以及随行文武从风陵渡相继渡河西行，两宫“御舟三艘，均以锦绣饰之”。10 月 26 日，慈禧、光绪一行到西安，因行宫一时未能竣工，拟暂住督署。督署“门柱改朱漆，牌坊画以云龙”，修饰一新，但“驾至嫌其不敷，改住抚署。六部堂官至者，多住贡院”。对于原拟作为“行在”的督署进行改建。改建中，强拆民房，大兴土木，广招各地能工巧匠，一切均仿照在京式样，雕梁画栋，砖地皆凿以花鸟，府邸皆油彩一新，慈禧太后这才搬进了宽大、华丽、有几百间房屋的督署。古城西安，一时成为清王朝的临时政治中心。



慈禧

时值陕西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连

陕抚岑春煊也奏称："陕西今春缺雨，麦收歉薄，近复夏雨愆（qiān）期，秋稼受伤尤甚，小民多就食他方，是本省之粮已不敷本省之食。今銮舆西幸长安，臣仆侍从人数已巨，加以诸军扈跸，千乘万骑，皆须取给全秦……饥馑之内忧，更甚于军旅之外患也。"可是慈禧全然不顾民间疾苦，照旧挥霍无度，穷奢极欲。

慈禧到达西安之后，开设了专办皇差的支应局，开局不到一月，即耗银二十九万多两。"在西安的行宫里，地势虽狭小，也照北京紫禁城的御膳房一样的设备，膳房虽说是一个厨房，里边的组织分为荤局、素局、菜局、饭局、茶局、酪局、粥局、点心局，每一个局设一个太监专管其事，每局设有厨司十数人不等。"每餐必先由太监呈菜单百余种，由慈禧挑点。两宫每日膳费需银二百多两，按当时关中粮价，折合大米三十多石。夏天，慈禧要吃冰镇酸梅汤，地方官府便驱使百姓到二百里外的太白山运冰以供膳房使用。慈禧太后于1900年冬在西安食牛奶，养牛六头。次年春，因天气干旱，食之不适，遂罢。于是"将牛六头发交西安府喂养，每月需银六百余两，另建牧牛苑，任官掌之，正五品"。两宫到西安八个月内即耗银十二万两之多。慈禧还说，"向来在京，一费何止数倍，今可谓节约矣"。虽逃亡西安，但清政府官场内贪污舞弊、卖官鬻爵之风如旧。潼关施某欲捐得道员一职，就贿赂太监李莲英，打通关节。李问慈禧，慈禧公然估价说："今蒙尘于外，价可稍廉，然道员可擢两司，至少须万金"。总兵陈泽霖侵吞巨额军饷，军机大臣荣禄闻知，欲严加查处，陈便给荣禄行贿四万两，绸缎四箱，荣禄则暗准将此项被吞军饷作为"前敌遗失"予以报销。



光绪

严酷的天灾，加上繁重的皇差及各种苛捐杂税、徭役，使陕西人民已濒临绝境，饿殍常出现于街巷通衢。1900年12月，曾有饥民结队赴行在请愿，把军机大臣荣禄团团围住，唐承烈赶到，谎称自己是粮道，赈济事情由他解决，荣禄方得以乘机逃脱。与此同时，甘肃的回民也不忍盘剥而发动起义，提出"逐满"的口号。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使慈禧惊恐万状，她担心事态扩大于己不利，便下令赈济，开设粥场、暖场，以安定人心。饥民嗷嗷待哺，然而承办的官绅则趁机大捞油水，肆意克扣，甚至不惜在粥中掺以石灰，致使灾民多有中毒死亡者。此外，随从两宫来西安的王公大臣、随扈官兵和各地"勤王"之师，不仅要陕西人民供养，而且到处抢劫淫掠，无恶不作，给陕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帝国主义侵占北京后，为了控制清政府，一再要求慈禧、光绪回京，并声明保证其安全和尊严，其他封疆大吏特别是东南督抚也恳请回銮。但慈禧疑虑未释，虽一再向帝国主义表示忏悔，承认侵略者的议和条件，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却迟迟不肯回京。1901 年 9 月 7 日《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相继自京撤兵，慈禧这才挟光绪从西安起程回京。返京前，慈禧又搜刮白银七十多万两，准备大车三千辆，满载金玉古玩、绫罗绸缎以及有关文书档案。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御辇所经道路必以黄沙铺之，三十里设一行宫（憩所），驻跸各县，每晨须进燕菜一味。起程的前一天，行在军机大臣等即出城开道。10 月 6 日，慈禧、光绪及随从官员从西安起程，出南门绕道东关八仙庵拈香，然后东去，当晚驻跸临潼。临潼县令夏良才迎驾欠周，即交部议处，给予降级处分。次日至渭南，8 日至华州，9 日至华阴，12 日至潼关小住，15 日从潼关起程，途经河南，1902 年 1 月 3 日乘火车到京。辛丑回銮的皇差开支共计一百九十余万两，地方支应尚不计入其中。慈禧还冠冕堂皇地发布“加恩”谕旨，凡御辇经过之地豁免钱粮一年。实际上，天灾人祸与皇差已经早以使陕西人民没有可供交纳的钱粮，所谓豁免，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

慈禧太后在西安期间，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烧杀抢劫，胡作非为，而慈禧却躲在西安吃喝玩乐，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视百姓生死于罔闻。她只希望通过向列强割地赔款来保住自己的权势地位，继续垂帘听政，作威作福，这些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腐朽面目。



二、“回銮新政”在陕西的推行

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镇压之后，清政府为了讨好帝国主义，拉拢资产阶级上层，巩固自己的腐朽统治，于 1901 年 1 月 29 日在西安行在发布“新政上谕”，要求各方大员参酌中西政要，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如何改进慎重斟酌，并限两个月内详细陈奏。“上谕”中特别指出：“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此后，清廷根据翰詹科道、六部九卿、封疆大吏们尤其是张之洞等的陈奏，对于封建统治体制作了一些局部的调整，此即所谓“回銮新政”。新政在陕西的实施，主要可归结为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

1901 年 9 月，清廷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同时规定所有学堂课程“当以

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次年，陕抚升允就省城考院及崇化书院旧址设立“陕西大学堂”，聘光禄寺少卿屠守仁为总教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四书”“五经”被命定为必修课，此外还设有格致、政治时务、地舆、兵事、天文、算学、地质、测量、电化等课程。这些课程中每个学生至少要选习一门。大学堂内“恭祀至圣先师孔子暨诸先儒”的木柱，每逢初一、十五由教习率领各班学生行礼。学堂把一些带有民主色彩的言论视为异端，斥为“狂瞽谬说”，严加防范，不改者“立时斥逐”。

此后几年内，陕西师范学堂、武备学堂、法政学堂、存古学堂、宏道工业学堂等先后设立。各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也都先后设立了高、初等小学堂，但办学成效不佳。当时就有人指出：“陕西学堂林立，所需经费筹措虽有不同，要皆取之于民，要求别开生面而不累于民者，实难其选。”事实也正如此，各地筹措办学经费，加重了人民负担，经办者舞弊中饱，而普通百姓子弟能入学者为数极少。

1904 年（光绪三十年），武备学堂学生张凤翙被派送日本振武学校习兵科，是为陕西派留学生之始。1905 年，陕西当局又从陕西高等学堂（前身即原陕西大学堂，1905 年更名）之请，从该学堂选拔学生赴日本留学，先后有官费生白守洁等三十一人，自费生樊宝琦等十八人。由于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很多留学生都加入了革命党，成为后来陕西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第二，改练新军

1901 年 9 月，清廷谕令各省“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次年，陕西当局遵旨对军队进行整顿。整顿后，以常备新军步队六旗常驻省城，人数较多，装备较好；续备队十二旗，以六旗为屯军，六旗为防军。防军散扎各地。同时又将原抚标练军三营、城防练军步队一营、陕安镇标练军步队一旗、汉中镇标练军步队一旗、延榆绥镇标练军步队三旗，一律改为巡警军，分巡各地。从南、北洋新军中聘请教习，对整顿后的新军进行洋操和枪炮训练。

原来陕军多从外省招募，弊病很多。1905 年开始，专在本省招募，并将原有常备、续备各军汰弱留强，编配为步队、马队、炮队三个兵种。

军队的整顿和编练，给人民带来了灾难。首先加强了对人民群众反抗清朝反动统治活动的镇压，其次是加重了人民负担。陕西人民每年负担军饷一项达九十二万四千余两，较前增加三万七千余两，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新军经常滋扰生事，对人民无恶不作，尤其是巡警军对人民的危害则更为直接和深重。

第三，设“洋务局”、“课吏馆”、办《秦中官报》

《辛丑条约》签订后，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更加猖獗。陕西的高陵、城固为陕西天主教总教堂所在地，其他各县的教堂也相继建立和增多。传教士和不法教民霸占田产，放高利贷，搜集情报，侮辱妇女，甚至干涉地方行政，罪恶累累，引起陕西人民的强烈反对。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深入内地，外国人来陕“游历”（实际多系偷勘资源）者日多，此外如邮政、学堂、路矿工程等亦有招聘外人者。为了“事有总汇，责有专归”，1902 年陕西设立“洋务局”。洋务局的职责是“平日研究条约，有事则筹商应付。其稍有关系者立即派员会同地方官办理，不能了者又复提省讯究，务使情无不尽，案无不结。”所以，它实际上是陕西地方当局以办理外交事务为主，兼理洋务（如路矿等）的机构。

1903 年 4 月，陕西当局奉命设立“课吏馆”。各州县正佐各员均可入馆肄业。课吏馆的课程有三门，即历代政书、国朝政书和西国政书，大清律例、刑案和中外条约等分别于三门课中作为必修内容。三门课程依次精习。课吏馆“以修明政学为主，讲求吏治为先”，目的是造就“临民息事之才”。显然，培养提高在职的中下级官吏，使之通晓吏治兼明西学是课吏馆的主要任务。

1903 年 9 月，陕西当局创办《秦中官报》。为使“课吏馆”在学人员能明了本省情况和中外时局，以增广见闻，决定将秦中官报局附设于“课吏馆”，由课吏馆负责承办。陕西当局创办《秦中官报》的目的在于抵制维新思潮，对人民灌输忠君的封建思想。陕西巡抚樊增祥在《秦中官报序》中说，“戊戌之事株连秦人不少矣，是秦人不愚于祖龙之焚书而愚于无父无君革命平权之邪说也。”他咒骂主张维新改革的人是“野狐怪鸟”，由此，此报宗旨可见一斑。



《秦中官报》大体有六个栏目，这就是谕旨恭录、秦事汇编、直省文犊、外报汇抄、文艺存略、路透电音。其本是陕西当局诋毁新思想，愚弄人民的工具，但客观上也曲折地传播了一些外界消息，对陕西人起到了开阔眼界的作用。

《秦中官报》不仅是陕西省创办最早的具有学术性质的官办报刊，它也是目前所知陕西地方政府所办的时间最长的一种具有社会性、

学术性的刊物。《秦中官报》曾经于1904年改版，增添栏目之后，当时就受到西安市民的赞誉，扩大了社会影响。1908年终刊后，由陕西学务公所编印出版的《陕西官报》，其内容、宗旨均与《秦中官报》相同，这实际正是《秦中官报》改名后的延续。

第四，继办邮政、电报事业

陕西邮政事业开端于1900年，有西安、凤翔、商州、潼关四处。1903年于西安设立陕西邮务管理局，地址先在马坊门，后移东大街。此后各地邮局逐渐增设，各州县都设邮政局，一些重要村镇也逐渐设立邮政代办机构。

陕西的电报事业较东南沿海地区和一些发达城市为晚。1889年商办的西安电报局开业，局址设在梆子市街黄公祠，后移马坊门。该局首先与渔关局通报。1895年甲午战争时，又设西安至老河口一线。

1889年，陕甘总督杨昌濬奏请展设陕甘官办电讯线路，从陕甘两省军需项下及各州县筹银十五万两作为经费。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商办电报事业一律改归官办。所有电讯事业主要供官方通讯之用，次为各地商人互通商情。全陕电讯线路有东、东南、西南、西四干线。东干线由省城经渭南、潼关以达河南阌乡（今河南灵宝）局，又由潼关分支至同州。东南干线由省城经蓝田、商州、龙驹寨以达荆紫关局。西南干线由省城经户县、周至、宝鸡，南折经凤县、留坝以达南郑局。由南郑再分两支：一经西乡、石泉、安康、蜀河、白河接湖北郧阳局；一自南郑经宁强接四川广元局。西干线由省城经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以达凤翔。由凤翔再分二支：一经陇州接甘肃清水局；另一支接宝鸡局。西干线从咸阳又分二支：一经礼泉、乾州、长武接甘肃径川局；一经径阳达三原局。在三原再分二支：一经富平达蒲城局；一经耀州、同官（今陕西铜川）、宜君、洛川、肤施（今延安）、绥德达榆林局。由榆林折向东南接山西碛石口局。

邮电事业的发展对促进陕西经济的发展、沟通陕西与外界联系，便利人民生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从晚清陕西邮电事业有所发展，但和沿海地区相比依然十分落后，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一般还处于消息闭塞的局面之中。

三、影响与启示

陕西“回銮新政”中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改练新军，设立“洋务局”“课吏馆”。兴办《秦中官报》和继办邮政、电报事业等几个方面的政策的施行，对陕西教育，军队，政府机构和邮电出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清末陕西新政推行十年，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军事领域，对旧军队进行缩编改造，新军成为陕西主要的军事力量；教育改革为陕西培养了大量新式人才；经济改革使得陕西社会经济得到

很大的发展；政治上，一些新设的行政机构加强了陕西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咨议局等地方自治机构的成立，促进了陕西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社会公共事业领域的改革，使得新的社会生活秩序逐渐形成。

“回銮新政”成为促进陕西近代化发展的一次重要契机，对后来陕西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政对陕西社会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陕西社会的近代化；二是引起了陕西社会阶层的变化。新政对陕西社会近代化的影响突出体现在政治、教育和经济三个领域。陕西新政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等活动客观上造就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兴办实业增加捐税激化了社会矛盾，教育文化事业的改革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清末陕西新政的推行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陕人对于中央乃至外国的技术和资金向陕西投入抵触情绪很大，进而盲目排外，延缓了陕西近代化的步伐；其二是农业改革力度不大，这成为陕西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这就启示我们，第一，陕西社会经济基础落后，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吸收外部资金，其中不仅包括外国资金，也应包括东部发达省份的资金。除吸引外部资金外，也应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和人才，这是陕西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二，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农业的基础地位。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对于干旱半干旱的陕西中北部广大地区来说，兴修水利显得格外重要。清末陕西新政时期水利兴修毫无作为，这也是民国十八年大旱导致陕西出现严重灾荒的重要原因。第三，社会改革要尽可能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进行，清末陕西新政期间多项重大政策同时并举，不分轻重缓急，结果引起社会动荡，导致新政被迫中断。



20世纪30年代陕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从1932年前后开始的，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先后开辟了渭北、陕甘边、陕北、陕南、鄂豫陕和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巩固，为后来党中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渭北革命根据地地处渭河以北，以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包括富平、耀县、泾阳、淳化、高陵、蒲城、白水等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750平方公里，人口4万多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开辟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1928年至1929年陕西大旱期间，党领导三原、泾阳、淳化等地的农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粮抗款、“交农”围城运动，并发展成为武装斗争，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1930年夏，中共陕西省委渭北巡视员黄子文与省委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在三原武字区组织渭北灾民自救队，杀恶霸恶差，分粮食财物给饥民，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三四月间，正式成立武字区游击大队，大队长孙铭章，下设三个分队，有队员40余人。8月，渭北游击队成立，队长马志舟，政委金天华，有队员60余人，不久，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席黄子祥，副主席唐玉怀；9月，渭北革命委员会（即原富耀革委会）在武字区成立，下设土地、军事、财政、肃反、教育等部；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队长陈国玺，指导员习仲勋，归属渭北游击队统一指挥。10月，中共渭北特委建立，李杰夫任书记，李冲霄、黄子文、汪锋、程建文任常委。11月9日，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等6县民团和当地国民党驻军向武字区发动血腥“围剿”，党员群众近60人被杀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武字区先后6次遭敌洗劫，革命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贾拓夫到富平县，恢复了中共渭北特委，书记为李冲霄。不久又成立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刘林生、刘映胜、赵伯平先后任中心县委书记，重新恢复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黄子文，政委金天华，下编两个中队。

1933 年 3 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根据陕西省委指示，成立了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平，政委金天华，参谋长李天保，7 月，省委指示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参谋长李天保，共有 400 余人。7 月 30 日，红四团为策应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北上，在三原、富平交界处老户沟设伏，全歼富平张德润民团，张德润被俘获并处决。

渭北革命根据地恢复后，各项革命工作也很快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33 年 8 月，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调集六个团以上兵力，对渭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片白色恐怖。8 月上旬，红四团被迫撤离心字、武字两区，转移到耀县照金，渭北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二、照金革命根据地

照金革命根据地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李妙斋、王泰吉、高岗等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创立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位于铜川市耀州区以北 54 公里处，以耀州区西北部的照金镇为中心，地跨当时的耀县、淳化、宜君、同官等县，面积 2500 平方公里，人口 3 万 ~4 万。在鼎盛时期，以照金为中心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扩展到陕、甘两省十四个县，面积数万平方公里，以至当时西北地区传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之说。



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　刘志丹

1932 年 2 月，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红军陕甘游击队到耀县照金地区活动。9 月 17 日，中共陕西省委明确提出创建包括照金在内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12 月 24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杜衡任军政治委员兼第二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郑毅任团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主任，下辖 3 个连，共 200 余人，150 余支枪。红二团成立后将打击重点指向照金及其周围的国民党地方民团，激战焦坪，攻克香山，出击旬邑、淳化、三原等县，取得了一系列胜利，逐渐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旬邑、淳化三县边界

的照金革命根据地。1933 年 3 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后为秦武山），军委书记习仲勋。4 月 5 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兔儿梁召开，正式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经济、文教等委员，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摧毁国民党地方保甲政权，先后建立了照金、香山、芋园、桃曲原、马栏川、七界石、老爷岭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

1933 年 8 月，红二团南下失败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后由刘志丹接任），下辖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9 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刘文伯趁红军主力西征旬邑的机会，纠集地方民团武装向照金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根据地军民奋起抗击，经过六天激战，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驻地薛家寨陷落，游击队总指挥不幸壮烈牺牲，其余人员突围到甘肃与红军主力会合。1934 年秋，红军和游击队主力返回照金，全面恢复并巩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陕南革命根据地

陕南革命根据地是随着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由中共陕南特委领导创建的根据地。1932 年 4 月，根据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陕南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加强农村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陕南新苏区。8 月，中共陕西省委任命刚出狱的陈浅伦为陕南特委书记，回家乡西乡县开展武装斗争。陈浅伦与堂兄陈明伦等一起在西乡廷水、贺家山、私渡河一带以办“神团”为名组织游击队，秘密策划在私渡河鸡公田举行起义，开展游击斗争，但由于叛徒泄密，起义失败。12 月，红四方面军进驻西乡，派刘绪金等人与陈浅伦一起赴骆家坝，正式组建了川陕边区游击队，任命“神团”头目张正万为司令，陈浅伦为政委，程子文为政治部主任。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陕南特委以西乡的马儿岩为中心，发动群众，建立了十多个村庄的苏维埃政权，并成立了西乡城固边区革命委员会（后改为苏维埃政府），游击队也扩大到 1000 多人。1933 年 1 月，中共陕南特委作出了《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造红二十九军的决议》，同时，陕西省委派李艮、杜润芝、孟芳洲等人到西乡城固边区，以加强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创建工作。1933 年 2 月 13 日，陈浅伦、李艮在西乡私渡河主持召开军政大会，宣布红 29 军正式成立，陈浅伦任军长，李艮任政委。全军共 2000 多人。红二十九军成立后，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不断扩大边区，新成立了南城褒边革命委员会，使根据地面积扩大到 550 平方公里。

1933 年 3 月底，国民党军队趁红二十九军主力外出作战之机，向以马儿岩为中心的

陕南根据地发动进攻，4 月 1 日，被国民党重金收买的“神团”头子张正万发动叛乱，在反动势力内应外合下，正在马儿岩开会的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陈浅伦、李艮、杜润芝、孟芳洲、刘绪金等 60 余人壮烈牺牲。红二十九军副军长刘瑞龙将余部改编为陕南游击队，不久撤至川北地区，归入红四方面军序列。后来，中共陕南特委又相继组建了红二十九军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十等游击大队，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四、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

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创建于 1932 年 12 月底，结束于 1935 年 4 月，其辖区包括今汉中市的镇巴、西乡、南郑，勉县、宁强等五个县，是由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边的人民群众共同创建的革命根据地。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冲破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战略转移。11 月 5 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从商南县赵川进入陕境，在白鲁础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1932 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12 月 29 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于通江县城宣告成立，邝继勋任主席。1933 年 2 月 7 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中旬，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正式成立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熊国炳任主席。经过红四方面军的浴血奋战，到了 1935 年 2 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 20 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其中陕南苏区的县一级党组织和政权主要有中共陕南县委和陕南县苏维埃政府、中共宁强县委和宁强县苏维埃政府、中共阳平县委和阳平县苏维埃政府、勉县苏维埃政府、南郑县苏维埃政府。陕南苏区共辖有 22 个区（镇）、320 个村庄，不仅各级党组织机构较为健全，而且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了少共县委、贫农团、妇女委员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



1935 年 2 月，国民党军队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红四方面军向川康边界转移。4 月，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五、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共陕西省委、陕甘边特委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1932 年 1 月，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在甘肃正宁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 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全军 400 余人，分为三个大队。3 月下旬，陕甘游击队在甘肃寺村原、湫头原、五倾原、三嘉原及宁县盘克一带建立了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和寺

村原游击根据地，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序幕。12 月，陕甘红军游击队在陕西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 年 11 月，照金被敌人占领后，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1934 年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荔园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2 月 25 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重建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会上选举习仲勋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作为陕甘边根据地的最高临时政权机关，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并在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十四个县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1934 年 11 月 1 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圆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主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1935 年 2 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今子长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大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周家硷会议以后，刘志丹领导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和陕北的红二十七军，经过 5 个月的浴血奋战，接连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将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连接成一片，形成了面积三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巩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六、陕北革命根据地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共陕西省委、陕北特委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1928 年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成立。1931 年 9 月，晋西游击队渡过黄河进入陕北，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支队，10 月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整编为两个支队，南梁游击队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刘志丹；陕北支队为第二支队，支队长谢子长。到了 1934 年 7 月，陕北特委先后组建了八支游击队，在安定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第一、第二、第五支队，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到 1935 年初，陕北地区已建立了 14 个县的苏维埃政权。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1935 年 1 月 21 日，刘志丹到安定水晶沟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 月 29 日，陕北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安定县

白庙岔召开，宣布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次日，由陕北红军各团、各游击支队合编而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正式成立，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修任参谋长，先后下辖五个团和几十支游击支队。2 月 21 日，刚被选为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9 月，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于延川的永坪，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就在陕北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之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错误的肃反，杀害了原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干部 200 多人，并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张秀山等领导人逮捕关押。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人，才挽救了危局，西北革命根据地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

七、陕西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历史意义与重大影响

在 20 世纪 30 年代，陕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除了上述六大根据地外，还有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创建的神府革命根据地、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领导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等。这些革命根据地犹如星星之火，开始一点一点地分散燃烧，后来形成熊熊火焰，几成燎原之势，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及其附近地区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推动了西北地区土地革命战争形势的高涨。

陕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发展壮大，是陕西党组织中的正确路线坚持工农武装割据、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不断同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展开斗争的艰辛成果。正是由于同各种错误路线坚持不懈地斗争，才使得陕西各级党组织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从最初的屡败屡战到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体现了共产党人勇于纠正自身存在的错误、坚持不断开拓前进的光荣传统。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陕西的共产党人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无数的革命先烈在创建党领导的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满腔热血和年轻的生命，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甘于奉献自己一切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功伟碑。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代表党内正确路线的同志不断受到排挤打击的危难时刻，在中央根据地和全国其他根据地几乎丢失了百分之九十、党的白区工作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各地红军主力被迫走上长征路的险恶环境下，

陕西党组织经过艰辛努力，不但保留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大革命根据地，而且后来将两大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横跨陕甘两省、拥有十几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也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个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全国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确定落脚点、为三大主力红军实现胜利会师、为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大西北，提供了现实的基地，更为以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撰稿人　卢　鹰）

红军陕北会师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一、红军陕北会师

1935 年 9 月 16 日，由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首先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延川县永坪镇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工农红军第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拉开了全国红军会师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序幕。10 月 1 日，红十五军团发起劳山战役，在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劳山地区设伏，击毙国民党军第 110 师师长何立中以下 1000 余人，俘虏 37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000 余支、轻重机枪 180 余挺、炮 12 门、战马 300 余匹和电台 1 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红军的服装给养和武器装备问题。10 月 25 日，红十五军团主力隐蔽南下，于拂晓大雾弥漫之际向甘泉以南、洛川以北的东北军重镇榆林桥据点发动强攻。激战至下午，歼灭东北军第 107 师 4 个营，俘其团长高福源以下 1800 余人。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后接连取得的两场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 年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迭部县的俄界，举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9 月 18 日红军一方面占领了岷县的哈达铺，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9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长征以来一直困扰中央的落脚点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 10 月 17 日从定边县的五股掌、铁角城分两路进入陕西，19 日到达吴起镇，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吴起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历时整整一年的中央红军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保卫

并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在西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并决定派遣贾拓夫、李维汉等人寻找西北根据地及西北红军主力的负责人。

1935 年 11 月 6 日，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于甘泉县象鼻子湾。1936 年 9 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南部，进入西北根据地。10 月 9 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前来接应的先头部队会合。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接应的先头部队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胜利会师于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吴起镇，一路尾随而来的宁夏军阀马鸿宾部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和东北军白凤翔指挥的五个骑兵团也赶到了附近，对十分疲惫的中央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企图一举歼灭。毛泽东毅然决定发起“切尾巴”战斗，决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来。他说：“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利用吴起多山的地形，打它个胜仗，作为‘礼物’送给陕北人民。”这场战斗毛泽东亲自坐镇，彭德怀指挥，红军在吴起西山设下了埋伏。1935 年 10 月 19 日，即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当天，“切尾巴”战斗正式打响，至 21 日结束，全歼了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击溃了东北军两个骑兵团，中央红军终于切除了长征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结束了长征中的最后一仗。

二、西北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1935 年 6 月西北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之后，解放了 6 座县城，使陕北和陕甘边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发展和巩固了 20 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红军也扩大到 5000 余人，游击队也发展到 4000 余人。但自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错误的“肃反”，先夺权，后抓人、杀人，刘志丹以下的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地方领导干部，或惨遭杀害，或被捕入狱，几乎无一幸免。这个时候国民党也对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西北革命根据地内外交困，十分危急。

正是在这一危急时刻，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甘边特委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了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的情况与“肃反”将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泽东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遣得力干部接管了西北保卫局。1935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的汇报，决定成立党务委员会，认真审查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军团和新编入的红十五军团，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总兵力一万一千余人；

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以博古为主席。11 月 17 日，中央党务委员会释放了被关押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 100 多人，稳定了西北根据地的党心、军心和民心。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振奋红军长征后因长途跋涉、减员严重而低落的士气，中共中央决定在富县西北的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当时围剿西北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为东北军 5 个师，采取东西对进的战略，企图围歼红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毛泽东、彭德怀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然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11 月 21 日拂晓，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直罗镇国民党军队 109 师发起进攻。红一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红十五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激战至 23 日，歼敌 1 个师又 1 个团，打死打伤敌军 1000 余人，俘虏 5300 余人。109 师师长牛元峰自杀，缴获长短枪 3500 多支、轻机枪 176 挺、迫击炮 8 门。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大大鼓舞了红军和民众的士气，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赢得了时间，为党中央将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了落实瓦窑堡会议关于为完成“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大军事任务而举行渡河东征的决定，创造有利于中央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生存发展的条件与环境，1936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军委在陕北延长县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东征的行动路线、战略方针和兵力部署，正式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2 月 1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签发了《东征宣言》。次日，东征红军在延川县举行了东征誓师大会，随即开赴黄河沿岸。2 月 20 日，毛泽东和彭德怀正式下达了渡河命令，晚 8 时，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北起绥德沟口、南至清涧河口 100 里长的黄河岸线同时渡河，突破阎锡山军队防线，进入山西。3 月 31 日夜，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和政委宋任穷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山西兴县罗峪口渡口登岸参加东征，进入山西境内。3 月中旬，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并在孝义兑九峪重挫阎锡山军队之后，根据东征总指挥部的命令，兵分三路，实行新的战略展开，发动群众，筹款扩军，北进文水、交城，直逼太原近郊的晋祠。东征是红军主力与阎锡山的晋绥军第一次正面交锋，在接连失利的情况下，阎锡山不得不改变过去不许中央军入晋的方针，急电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派遣 10 个师号称 15 万大军，分两路进入山西，并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阎锡山也集中 5 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与中央军联

手对付东征的红军。中共中央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抗战实力，决定将东征红军撤回陕北。5月5日，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及全国各界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告红军东征胜利结束。红军从1936年2月20日渡河东征到5月5日回师陕北，历时75天，共歼灭敌军17000余人，扩充红军7000余人，并迫使原来进驻绥德、米脂等地的晋绥军4个旅退回山西，巩固和扩大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但不幸的是在东征中，陕甘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英勇牺牲于山西中阳县的三交镇。

红军东征结束之后，1935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经验，部署西征任务。会议决定继续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织西方野战军，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进攻，以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部队，积极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5月18日，党中央发布了西征命令及西征战役计划，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分左、中、右三路向陕甘宁边界地区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发起进攻。西征历时半年，进行重大战斗十余次，解放了陕西省的靖边、安边、定边，甘肃省的瑶县、庆阳、镇原，宁夏的盐池、固原、同心、海原、西吉等县城的广大地区，把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苏区，开辟了纵横各200公里的陕甘宁新根据地。

在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以高涨的革命热情热烈欢迎中央红军的到来，积极筹集军粮军费，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中共陕北省委在中央红军刚进入根据地完成970余石的捐献粮食的任务之后，又于1936年4月在红军东征时与陕北苏维埃政府联合发出号召：“为充实前线红军给养，决定向群众购买粮食三千四百五十石。各地党部和政府应动员群众卖粮食给红军，并发动群众自愿借粮一千五百五十石给红军。”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县与县、区与区之间展开卖粮借粮竞赛，到5月24日，共卖粮5950石，借粮3550石，捐粮960石，超额完成了陕北省委和苏维埃政府下达的任务，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东征作战。1936年初，陕北省委根据中央瓦窑堡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关于猛烈扩大红军的指示》，接受中央下达的招收新兵7000名的任务，仅三个月时间，就有9000多名陕北各界青年报名参加红军。富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招收1000多人参加红军，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着当红军的感人景象。

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红军的英勇作战下，在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努力工作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到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时，陕甘宁边区北起陕西北部的府谷、横山，南达陕西中部的淳化、旬邑，西至甘肃固原、宁夏的豫旺堡，东临黄河，南北长900里，东西宽800里，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

三、红军陕北会师与西北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的深远影响

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会师于西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陕北根据地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伟大壮举——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长征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陕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派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标志着红军战略退却的终结和战略转移的胜利完成。毛泽东指出：“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陕北会师 实现了党中央把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西北、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前沿阵地的战略任务，为党和红军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为了发展和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和党中央刚到达陕北就力挽危局，立即下令停止了王明路线的错误执行者在陕甘苏区进行的错误的“肃反”运动，释放了刘志丹等人，稳定了陕甘苏区的党心、军心和民心。紧接着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发起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红军从 1936 年 2 月 20 日到 5 月 5 日举行的东征取得了“一箭三雕”的效果。一是红军以抗日先锋军之名出师东征深得民心，阎锡山和蒋介石因与红军作战而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二是红军东征巩固和扩大了影响，扩大了红军，筹集了经费，达到了陕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蔡亮、张自嶷
油画作品：《三大主力会师》

北苏区在“发展中巩固”的目的。红军东征时“在山西的20多个县播下了抗日的种子，激起了山西乃至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情，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为日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华北主战场参加抗日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东征胜利之后紧接着举行的红军西征，不但粉碎了蒋介石和西北军阀东西夹击红军的阴谋，将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苏区，而且避免了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的作战，为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与共产党和红军合作抗日、进而促成“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由西北革命根据地扩大发展而来的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的所在地，成为指引全国爱国民众进行抗日战争的光辉灯塔，成为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撰稿人　卢　鹰）

瓦窑堡会议

一、瓦窑堡会议的历史背景

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是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等 10 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政治决议分六个部分，即：目前形势的特点；党的策略路线；国防政



瓦窑堡会议旧址

府与抗日联军；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这个决议，充分体现了我党在统一战线理论上的成熟和科学的判断。

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分裂的。"总之，"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二、瓦窑堡会议的主要内容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发展。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克服了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那时迫于形势，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才有可能结合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瓦窑堡会议所阐述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招致革命失败的教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把当时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也说明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总的来说，这次会议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1. 对于当前革命形势的判断

在经历了漫长艰苦的长征之后，瓦窑堡会议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战争与革命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最基本的特点。"

决议既对当前的形势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又对多年以后的形势做出了科学的预见。应该说，无论是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乃至以后的形势走向的预见，都十分准确。日本侵略者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1935年又制造华北事变，侵占了华北大片领土。根据日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的侵略本性，决议判断下一步日本就是妄想侵占全中国。一年半以后，日本果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实践证明了这种判断的正确，实践也证明了这种预见的科学性。

不但如此，决议还对当时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和内部矛盾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分析美国和日本的矛盾是“势不两立的”，进而提出：“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6年后，即1941年12月，日本果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可见瓦窑堡会议决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是准确的，对多年以后国际形势的预见也十分科学。应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

决议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尤其是目前凶横直进的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从此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也就是：主要矛盾已从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中日民族矛盾；由十年内战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转变到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期。不言而喻，中国革命由此划分了一个新的时期。可见决议对中国革命时期的界定同样是正确的。

2. 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决策

瓦窑堡会议在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对未来有了科学预见的基础上，进而制定了正确的党的策略路线。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决议同时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知识的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这条总策略路线是一条正确的策略路线，成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策略路线，成为指引中国抗战走向胜利的策略路线。党制定正确的策略路线，是瓦窑堡会议的一大功绩。决议在提出党的策略路线的同时，对当时国内各个阶层的角色和地位作出了定位，进而提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积极的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反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因此，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精彩论断，同时明确提出为扩大巩固共产党而斗争。这“两个先锋队”的提出，是瓦窑堡会议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定性认识的一个历史性飞跃。

在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尽可能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之后不到两年，在193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既有团结又有斗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对于中国情况是不适合的，这样就批判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结论中所讲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就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之后他进一步指出：“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会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一精辟论述，为我们党正确理解和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指明了方向。

3. 形成了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理论

瓦窑堡会议的内容、贡献和地位，主要体现在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其中毛泽东的报告比之瓦窑堡会议决议又前进了一步：一方面毛泽东是对国内各阶级的分析较之决议更为详细，尤其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更为深入准确。报告认为，首先国民党营垒内部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断分化的；其次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但也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二是报告没有提“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而是提出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成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这两点进步与瓦窑堡会议决议互相补充，使党的总策略更加完满。至于在党内的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并列为主要敌人等问题上，两者认识是一致的。对于两者的统一，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经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

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毛泽东后来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

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可以说日后毛泽东对于使党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正确运用以及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伟大构想正是孕育于此时的。

三、瓦窑堡会议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在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策略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急剧变化的时局形势，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适时调整具体的方针、政策，全力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石，通过此次会议，我们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新的、深刻的认识，在这些创新理论的影响之下，我们党摒弃了以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偏见，批判了统战工作中“要下层不要上层”的错误主张，提出了以“下层”为基础，以“上层”为重点，上下结合的统战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党一方面致信、电给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以及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陈立夫、胡宗南、陈诚等人，力陈抗日救国大义，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另一方面加强了争取两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以及失势的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各政治势力代表人物的工作；此外，毛泽东、周恩来还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民主人士、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他们在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建立起共识和合作关系。同时，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从民族大义出发，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之上，对蒋介石政府作出适当妥协与退让，通过不懈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不断促成蒋介石政府转向抗日，最终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标志，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军队广泛参加的规模空前、“层次丰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瓦窑堡会议的现实启示是：第一，大事业需要大团结，要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民富民强、繁荣昌盛的伟大理想，必须矢志不渝地坚持建立起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第二，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党的领导权。第三，在发展过程中要始终立足基本国情，将独立自主原则与充分拉动外援有机结合起来。

（撰稿人　刘　阳）

西安事变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

1. 当时的国内形势

1935 年 12 月 9 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民众抗日热情的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巨大压力。

1936 年 6 月 1 日，“南天王”陈济棠、桂系首脑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侵略，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次日，陈、李二人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此举虽说是为了抗日，其实质乃是在于对南京政府裁减地方武装的反对。南京政府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因此调集军队，准备阻击。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南京政府统一全国依然是大势所趋。因之，当陈济棠部甫一离开广东，其将领便在阵前纷纷倒戈，拥蒋反陈，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直言此番闹剧系以“抗日”为口号投机造反。经此一变，南方陈济棠、李宗仁迫于外界的压力，表态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安排。稍后，陈济棠离粤赴港，自此从民国政坛跌落。李宗仁则是亲赴蒋介石处请罪，才得宽宥。“两广事变”遂和平解决。

此后，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军队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东北军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随从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实力，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简直无法和两广部队相比）。据此，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因为两广事变的危机安然度过，西安事变在 1936 年的西安则是“非爆发不可”。

2. 张学良的东北军

早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局部抗日战争爆发。因当时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蒋介石做出了“攘外必先安内”决策，迫使张学

良及其东北军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 年初，日本步步紧逼，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在华北的抵抗遭到严重挫折，短短数月，山海关、承德等地先后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1935 年，随着中央红军经过长征陆续到达陕北，蒋介石为了“剿匪”，于该年 9 月 20 日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同时，蒋又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不过，在东北军与红军的数次战斗中（如 1935 年 10 月的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等），均作战不力，遭受到了严重挫折，以致后来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3. 中共的策略

1935 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历尽千辛万苦，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并逐渐站稳了脚跟。1935 年 12 月 17 至 25 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次年 1 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 年 2 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4.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1936 年 4 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期间，张学良曾携王以哲、刘鼎部将等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沟通，双方于同年 9 月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最终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此时的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的身份太过特殊，因之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二、西安事变的进程

1. “艳晚事件”

早 1936 年春，蒋介石即电令逮捕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进步分子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马绍周等。当年 8 月 29 日晚，西安国民党便衣特务根据线索在西北饭店抓捕了马绍周。与此同时，爱国青年学生领袖宋黎也被逮捕。不过在被押往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途中，宋黎被十七路军巡逻队解救。在针对国民党特务不断骚乱的情

形下，杨虎城与张学良密切合作，保护性地逮捕了刘澜波、孙达生等人，并派人包围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鉴于当时的紧张局势，张、杨商议后决定电请蒋介石坐镇西安督战，为兵谏准备。因29日这一天的电报代码韵目为艳，故称“艳晚事件”。这是张、杨共同合作同蒋介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事件对增强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团结，增强西北人民和东北人民的团结，对促进逼蒋抗日局面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西安事变”的前奏。

2. 蒋介石督战西安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直接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来到洛阳，对剿共进行周密部署。同日，张学良亦一同抵达洛阳，名为蒋祝寿，实则劝蒋联共抗日。但蒋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并威胁将其部队撤离到东边去。12月2日，张学良再次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同时，张向蒋汇报其部下军心不稳，势难支撑，因此再三请求蒋前往训话。12月4日，蒋由洛阳抵西安，驻华清池，同时着手调30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期间，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但遭蒋拒绝。与此同时，蒋介石召见邵力子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军师长以上官员训话，强调要么进兵“剿共”，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等地换防。蒋氏所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张、杨的恐慌。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当时，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激起民众极大的愤怒。游行民众遂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请愿示威。蒋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此举引起蒋极大的不满。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谏。

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3. 西安事变的发生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而十七路军则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

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亦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当日晚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上海请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孔祥熙等一行商议对策。由于端纳不仅与蒋友好，和张亦有诸多来往，因此宋美龄托请端氏出面代为调停。次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

12 月 16 日，南京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社会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张、杨。南京国民政府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在此形势下，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民政府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 月 17 日，原执意杀蒋的中共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介石。经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指示，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 月 22 日，在端纳等人的全力周旋下，宋美龄、宋子文等飞往西安，并与张、杨举行了会谈。随后张学良又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

12 月 23 日，双方在张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主事，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第一，停战，国民政府军撤至潼关外；第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第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第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第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12 月 24 日，蒋介石针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作了如下口头答复：第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撤离西北。第二，委托孔（孔祥熙）、宋（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改组政府。第三，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第四，联红容共。蒋主张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第五，召开国民大会。第六，联俄联英美以抗日。

12 月 24 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 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 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 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25 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却意外地得知，张学良已经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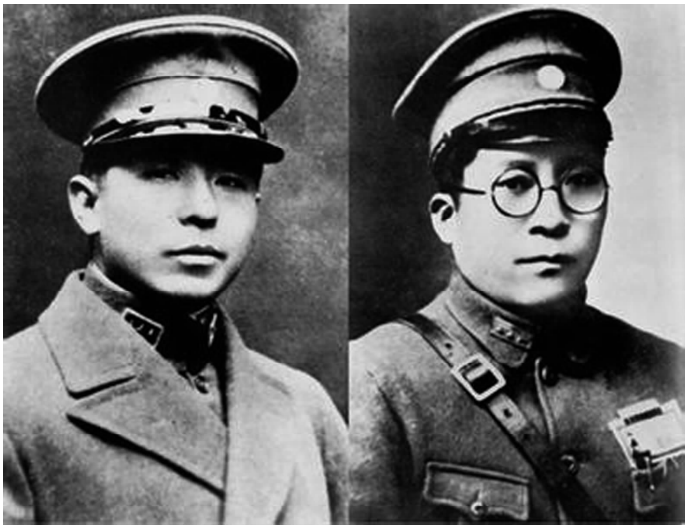
自护送蒋介石前往机场。

12 月 25 日下午，蒋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张学良亲自陪同。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 月 26 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则被扣留。

4. 事件尾声

12 月 26 日蒋介石平安抵达南京后，《大公报》称：“全国民众听到这个喜讯，都欢喜得几乎要发疯了。昨天晚间，全国自都市至城关，自成人以至儿童，都热烈庆祝，欢声彻夜，这种情形，真是揭开了历史的新页”。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被软禁的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而留在西北的 20 多万东北军则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出现了严重的内部矛盾分歧。1937 年 2 月 2 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指使部分军队发动兵变，杀死东北军元老派 67 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酿成“二·二”血案。驻西安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多方奔走，制止了东北军的相互残杀。1937 年 3 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东北军调驻安徽的方案，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各部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管辖。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遭国民党逮捕，并于 1949 年被军统局杀死在戴公祠，同时受害的还有其子女、卫士、秘书等多人。当年杨虎城离开西安时，曾将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军交给孙蔚如，并一再告诫：一定要牢记“兵谏”之初衷，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1937 年，17 路军被缩编为 38 军，孙蔚如任军长。孙以极大的耐心，平和的策略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保护了西安事变的成果，迎接了抗日战争的到来。抗战时期，孙任第四集团军司令，以坚守中条山出名，被称为

“中条山铁柱子”。

三、西安事变的影响和意义

西安事变发生后，几乎所有的舆论都对张、杨不利。当时，文化教育界纷纷表态反对张、杨。12 月 13 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国立编译馆、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七个学术团体通电全国声讨张学良，宣称：“当国家统一之际，绥乱将平之时，竟乃包藏祸心，劫持统帅，摇乱国本”，“同人等情切存亡”，“逢此激变，怒气堪膺，谨尽下情，驰电声讨”。12 月 15 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全国各地 100 多家报馆通讯社一致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对时局发表意见，列举了三项主张：第一，在此内忧外患时期，亟应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方针与政策。第二，张学良应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安全护送返京，继续领导救亡复兴的工作。第三，全国民众应为政府的后盾，讨平叛乱。而包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内的团体组织及社会名流亦表示了对事件的担忧。

然而，站在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蒋介石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后来八年抗战在奠定了信仰基础；第二，迫使蒋介石撤离了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基本上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内战争；第三，促进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和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第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抗日战争从局部走向全面；第五，促使陕西抗战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从这些意义上来说，怎么评价西安事变都不为过。

（撰稿人　王元琪）

洛川会议

一、洛川会议的时代背景

20 世纪 30 年代，中华民族仍旧没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遇，在日寇侵略之下，反而更深地陷入亡国灭种的危局之中，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侵华步伐不断加快，先是扶立“伪满”政权，后是渗透内蒙古、侵入绥远、察哈尔等地，再是策划“华北自治”，可以说是每一步都是按照其“大陆战争”的预定策略而行，贼心不死，且越演越烈。

而此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集团一方面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和，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先是将东北军撤入关内，后断绝民众对察哈尔同盟军的支持，



洛川会议旧址

致使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寇之手；另一方面，剿共之心不死，恪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谬政，先是五次大规模围剿，后又追击红军数万里直至陕北，甚至是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实现“国共合作”之后，防共限共之心犹然不减，调集大批中央军进驻山西、陕西，伙同西北军阀，层层围困陕北苏区。正是在这样的卖国政策下，使得日寇侵略气焰愈加高涨，终于酿成巨祸，“七七事变”之后华平津沦陷，山东军阀势力首鼠两端，亦将不保，山西陷入日军迂回包抄中，上海则陷入对日军的不对称作战中，处处捉襟见肘，这正是国民党政府多年恶政所带来的恶果。

正是在这样的危局下，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扛起抗日先锋的民族大旗，这一时期共产党人一方面警惕国民党军反共阴谋，另一方面更要提出一条正确的抗日救国道路，以救亡图存，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于陕西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相关问题，史称“洛川会议”。

二、洛川会议的主要内容

洛川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周昆等党政军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 23 人出席。会议议程主要为三项内容：（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创建根据地。（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目的，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区发展。关于国共关系问题，强调指出，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靠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许多同志都发了言，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精神，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少数人有一些不同意见：（1）关于出兵的时间问题。有人认为，现在战局很严重，应该早出兵，对我们政治影响好。这种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忽视了蒋介石借日军之手消灭异己的用心。（2）关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问题。有人主张，把军队全部开到前线，陕甘宁边区不留兵。这种主张对蒋介石袭击共产党军队后方的阴谋警惕不足。（3）关于作战方针问题。有人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这种主张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认识不足。（4）关于对国民党的估计问题。有人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作用，而对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认识不足。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分不开的。

在讨论中，当时为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说明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从此进入了抗战的新阶段。他着重指出：“总方针是要将已经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并“从中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统一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尤其指出“新的抗日十大纲领，就是争取胜利的具体道路!”张闻天精辟的分析和鲜明的立场，有力地肯定和支持了毛泽东的报告。

洛川会议是又一次共产党人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成功大会，在会议中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上决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增为十一人，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为副主席）。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央军委发布了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此时尽管党内还存在着对于八路军作战原则一些不同认识，但是大会对于所讨论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正确地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党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

抗战的胜利”，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定要实行党对抗战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获得彻底胜利。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明确提出：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提出“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政府必须和人民团结起来，恢复孙中山的全部革命精神，实行上述的十大纲领，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指出“今天的抗战，进入了实行抗战的阶段，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包含着严重的危险性”，“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所以，在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除此之外会议在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对八路军出兵的时机、数量及陕甘宁留兵多少、红军作战形式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是中国共产党人民主生活的重要体现。

三、洛川会议的历史影响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

这次会议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确立了共产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指明了方向。

这次会议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纲领，在八年抗战中得到了真实地应用和验证，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这次会议力挽狂澜，是共产党人践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写照，是一次高瞻远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这次会议也明确了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指导思想，即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

级领导权；必须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必须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做斗争；必须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军事斗争的具体战略方针必须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种游击战的军事思维日后更深入发展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瑰宝之一，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的断言，“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经过游记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洛川会议中关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对后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撰稿人　刘　阳）



确立毛泽东思想的“七大”

一、中共七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党的七大，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党的七大一直未能召开。此后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七大召开五次延期。直到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和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中国当时国情来讲，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以来，已经经历了24年的奋斗历程，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需要制定符合形势发展需要的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另外，在革命的过程中，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以及在之前撰写的大量文章和中共发布的许多文件，已经对党的历史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特别是整风运动以来，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七大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条件。

从国际方面来讲，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急于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因而在敌后战场收缩兵力，加强正面战场。共产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转入局部反攻，将日军压缩在铁路沿线和较大城市，处在人民的包围之中。1945年春夏之交，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德国法西斯即将灭亡，日本法西斯也行将败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大反攻前夜，国民党为抢夺抗战果实召开了六大，给即将到来的胜利蒙上一层阴影。为了使抗战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为了反对黑暗中国之命运，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七大召开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1. 七大召开情况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会期50天，这是党的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

七大会址中央大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自己动手修建的。主席台上面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大厅两侧的墙上插着24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的24年奋斗历程。插着红旗的V字形木座象征着革命的胜利。



周原遗址

在七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由华北、华中、西北等几个有代表性地区的代表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完成了三个历史性的任务：决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斗争中，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

黑暗的前途，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报告还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大会通过了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及《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中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第二，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第三，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 44 人，中央候补委员 33 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1945 年 6 月 11 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2. 如何确立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 年 3 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 6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2 年 7 月 1 日，朱德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陈毅在同日发表的文章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创造，指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

1943 年 7 月 5 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同年 7 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一文中，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1943 年 8 月，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指出：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 20 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他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同年 12 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1945 年 4 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到了 1945 年党的七大的召开，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

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之后，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3. 确立的毛泽东思想内容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又一历史性贡献。七大修改通过的新党章，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性质、基本动力、斗争形势、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七大对毛泽东思想主要概括为：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三、中共七大的历史影响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20 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八年抗战的经验，制定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批评了党内的错误思想，系统地阐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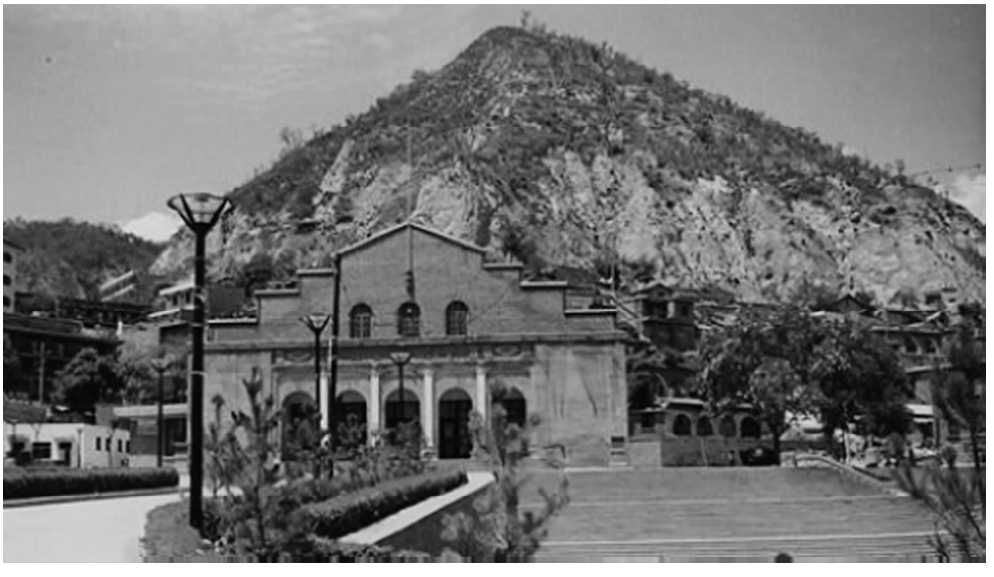
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党在理论上的成熟，也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产生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它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人民的一面旗帜，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撰稿人　刘　阳）

模范的陕甘宁边区

早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就确立了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的边区建设总方针。1937年5月12日，苏维埃西北办事处讨论通过了蔡树藩为主任、高朗亭为副主任的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5月23日，公布《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并成立了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林伯渠任主席。边区辖23个县及神府特区，面积12.9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195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撤销。陕甘宁边区政府是综合管理边区政务的政权机关，在其存在的十三年间，边区政府在中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致力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的陕甘宁边区情况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陕甘宁边区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社会保守。因此，边区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在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等方面，都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这一点，也可以从边区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管窥一斑。

政治上，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乡村基层政权基本上被地主乡绅、帮会组织等旧势力所控制。乡绅由于有一定文化，因此在传统社会一直是乡村的权威；而帮会、门道等地方势力在乡村设有香堂等组织，所以在乡村中也有自己的影响。由此造成的恶果是，乡民只知帮会、门道和帮主、堂主等，而不知法律道德、民族和国家的存在。经济上，边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比较恶劣，农业落后，粮食产量低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占有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却霸占着 60%—80% 的土地，许多地主既是商人又是高利贷者”，农民所受的剥削比较残酷。与东南沿海风气开化较早的地方相比，边区机器工业贫乏，民间仅有小手工作坊，甚至连一个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都不存在。文化上，边区政府成立之初，该地区在文化上毫无疑问是一片荒漠。据有资料统计，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前，该地的文盲达到 99%。正规的学校教育仅限于部分城镇，而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几乎看不到像样的学校教育。同时，文化设施奇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婴儿死亡率达 60%。这一点，毛泽东就曾很感慨地说道：“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多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



由于政治上的反动、经济上的落后以及文化上贫乏，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匪患严重。土匪的猖獗活动，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一大祸害。“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成为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二是二流子问题突出。二流子是陕北农村对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谋生身染恶习的人的统称。有资料统计，当时边区有 3 万无业游民和二流子，这些人成为边区社会生活和秩序不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三是烟毒泛滥。边区政府成立之初，鸦片吸食现象普遍。据有些学者研究，“陕甘两省的罂粟种植面积分别占农田面积的 90% 和 75%，男女老少普遍吸食”。四是妇女地位低下。在陕甘宁交界边远地区，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当地流传的俗语——“母猪不敬神，婆姨不是人”就是妇女地位的真实写照。此外，缠足，包办、买卖婚姻等封建陋习也是禁锢女性的沉重枷锁。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落后、偏

僻而且矛盾重重的乡村地区。为了巩固边区政权，改变边区乡村社会的落后面貌，中共及边区政府对边区乡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并最终使其成为“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初，首先着力于政权建设。为了巩固和完善边区政权，边区按照普选制度和“三三制”的基本原则，广泛发动各级群众参与政治活动，极大地调动了边区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社会各阶级阶层都可以参政议政，人民翻身做主。其次大力发展边区经济。边区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自救政策，发动了大生产运动，使得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政权稳固、经济发展迅速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政府带领边区人民进行了全面的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1. 加强乡村政权建设——老百姓成了真正的主人。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实行乡（市）村两级基层政权制度。边区乡村政权是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来的。《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规定乡（市）长由乡（市）参议会选举产生，乡（市）参议会为乡（市）政府最高政权机关。《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明确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选举制，选举乡参议会的议员，组织乡参议会。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 18 岁，不分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等的差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乡参议会每居民 60 人选参议员 1 人。乡参议会议员每半年改选一次。在边区的乡参议会、乡政府的选举中，完全体现了民主的精神，民众做到了真正的参政议政。1937 年，在边区第一届各级参议会选举中，“平均 70% 以上是参加了选举的”。而从参议员的阶级成分来看，乡村政权真正掌握在老百姓的手里。

2. 加强民众社会教育——老百姓民族意识、社会意识的觉醒。

社会教育是消灭文盲，提高乡村民众民族意识、社会意识的最好方式。边区成立之初，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占到 90% 以上。而要这些文盲大众都脱离生产来专门的学习机构学习，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唯一能行得通的便是利用生产的空暇来学习。因此，“社会教育是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学习不妨碍生产的一种教育方式。社会教育不仅是教育民众识字，而主要的是以民族革命意识，民族自卫战争中所必需的理论和技能，参加实际救国行动，争取抗战胜利。”为了规范社会教育，促进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边区颁布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边区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模范夜校半日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冬学

教员奖励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县识字检阅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馆组织规定》等政策法规。而社会教育的内容则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知识训练；二是技能训练；三是生活训练。

边区的社会教育有许多特点，简言之：一是教材简单明了，生动实用；二是教学形式灵活多样，田间地头、村庄院落都可做教学场所；三是方法灵活多样，读报纸、写儿歌、演戏剧、扭秧歌、办墙报等都可以和教学内容联系起来；四是教学不误农时，社会教育多在农闲时进行。所以，边区的社会教育乐于被群众接受。

社会教育使边区乡村成年男女普遍接受了一次文化教育和民族意识教育的洗礼。一是文盲的人数大大减少了。许多成人由不识字到识字，不仅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能够读书看报了，文化素质提高了；二是边区乡村民众的民族意识提高了。通过社会教育，乡村民众明白了许多道理。如为什么要识字学习、为什么要学习军事知识、为什么要努力生产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了通过社会教育，边区乡村民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3. *发动妇女解放运动，提高妇女地位*——女人能顶半边天。

陕甘宁边区实行男女平等的原则，提高妇女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实行婚姻自由，保护妇女的各项权利。1938 年 3 月 8 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师范学校举行。大会宣布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确定边区妇女运动的总方针。1939 年 7 月又成立中国女子大学，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由于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妇女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政治上，妇女有权参加选举，有的还被选为参议员、担任政府工作人员。这些昔日只知围着锅台转、足不出户的乡村妇女，现在和男子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国家大事，这是边区妇女地位史无前例的变化。经济上，1940 年毛泽东曾给有关部门写信，强调妇女运动必须以促进妇女经济独立为中心，主要途径是开展妇女生产运动，由此掀起了边区妇女生产运动的高潮；文化上，边区各级妇联举办了大量的妇女半日校和妇女识字组等。为了维护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等明确规定了男女婚姻以自愿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等。同时，边区政府废除女子缠足的陋习，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对阻碍废缠足者进行刑事处罚。

从婚姻、家庭中解放出来的边区乡村妇女开始走向社会，积极参加到各种社会活动中来。马克思说过：“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的衡量。”妇女社会角色的转换，是边区乡村社会风俗的一大变化，也是边区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

4. 加强社会治理——社会秩序大大好转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经过土地革命和军事斗争，原有的土匪或被消灭或被赶跑或隐藏起来，社会秩序有了一定的好转。为了巩固已有的成果，边区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治理。一是积极开展武装剿匪。二是整顿自卫军。1942 年 4 月，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开始整顿自卫军。《条例》指出：凡年龄在 19 岁以上 50 岁以下的边区公民，不分阶级、性别、籍贯、宗教、党派、职业、民族，一律参加自卫军。自卫军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社会治安，警戒地方治安，保卫地方政府，清剿敌探与土匪等。经过两年时间的剿匪，到 1943 年，边区的匪患基本得到了清剿。

前已述及，边区成立之初，境内的二流子大约有数万人之多。这些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边区社会管理的隐患，因此对这些人的改造，成为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边区改造二流子的政策是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在精神上不歧视。具体做法主要有：一是通过深入调查，严格区分二流子之间的差别，以在帮扶过程中区别对待；二是针对不同的二流子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帮扶说教；三是帮助二流子自力更生，自食其力。通过这些措施，边区的二流子问题到抗战结束前基本得到了解决。二流子问题的解决，对于稳定边区的社会秩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一是基本上消灭了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其二是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其三是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化。

毫无疑问，烟毒是边区政府成立后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为了肃清境内的烟毒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一是成立专门的查禁烟毒的机构；其二是制定了一系列禁毒的法规规定；其三是动员全社会劝禁烟毒。陕甘宁边区严密细致的禁毒措施，不仅有效遏制了烟毒在境内的蔓延，同时也逐步肃清了境内烟毒的流行。

匪患问题、鸦片问题以及二流子问题的解决，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边区乡村社会问题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转换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顺利地完成，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调控。

除上述问题的治理与解决以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还通过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削弱了地主经济在乡村社会的影响；通过鼓励农民成立劳动合作社，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普及教育，提高群众的素质；通过移风易俗，改变封建恶习，传播新风尚；通过社会保障，提高民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总的说来，边区政府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使边区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清明、经济自足、文化进步、社会和谐无疑是当时边区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般而言，20 世纪的 20—30 年代的中国农村危机重重，政治反动、经济萧条、社会文化极端地不发达等问题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整个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有鉴于此，社会各界纷纷表达了对此问题的关注。一些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出书斋成为社会活动家，试图将自己改造社会的方案付诸实施。其中，有典型代表的当属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平民教育、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试验的乡村建设、中华职业教育会在江苏昆山、卢作孚在四川北碚进行乡村改造活动等。毋庸讳言，这些乡村社会改造运动大多是从乡村教育入手，进而通过经济改造以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缺乏对农村问题的全面认识，且在试验过程中更多依靠个人的影响力来达到相关问题的解决，因此他们的经验并不具备推广价值。

相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无疑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可以说是在抓住了中国农村贫穷原因的症结的基础上进行的，提出并在实践上对诸多问题进行了有成效的改造，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理论、政策和方法。在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乡村社会问题解决的成功经验，后来被逐渐推广到其他敌后根据地，对各根据地的乡村社会改造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代表着未来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全国规模的乡村改造积累了经验。

综观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历史全貌，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经验：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毛泽东曾讲过，“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在社会建设方面完全贯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

第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边区的社会建设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制订了符合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符合边区人民群众需要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在推行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负责制及依靠和相信群众的基本路线。毫无疑问，党是边区各项社会事业建设的领导核心。不过，党的领导地位不是通过权力施加影响的，而是以正确的政策和模范的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边区政府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自己制定和颁布的法令进行社会建设。在此过程中，依靠

和相信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群众路线使得这些法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简而言之，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进行的，其成功的经验无疑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以及党领导下的依靠和相信群众的基本路线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具有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撰稿人　王元琪）

第二编

文治

从崇尚黄老到独尊儒术

一、黄老之学及其在汉初的盛行

“黄老之学”的“黄”指黄帝、“老”指老子。作为传说中的古代圣王，黄帝在先秦时期备受尊崇。《汉书·艺文志》中记录有战国时以“黄帝”为题名的书计 12 类 26 种 400 余卷（篇），可见当时黄帝学派已经形成并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势力。黄学一派的书籍后来陆续亡逸，但据《汉志》所录信息，可以推知该学派与道家之间存在极深的思想渊源。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黄帝四经》（包括《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进一步证实了黄学与老学同源异流的关系。较之后者，黄学更具催生法家学说的可能。最明显的证据，是老学公开反对法治，而黄学中包含丰富的法治思想内容，主张“是非有分，断之以法”。也许正是因为与法家思想密切相关，“皇帝之书”才能穿过秦火的烈焰浓烟传递至汉。入汉之后，黄学“静作相养”、老学“清净为天下正”的理念很快与“休息”政策产生了共鸣。

“黄老”合称首见于《史记》。黄老之学的主要特征，一方面主张清静无为，另一方面强调法治。此外，黄老思想中亦有尊君肃臣及提倡仁政的成分，表现出对其他学术思想的兼容性。事实上，黄老之学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并吸收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一种能适应现实社会各种需要的学说体系。

据《史记》记载，汉代黄老思想的最早践行者是曹参（？—前 190）。曹参曾为沛县小吏，随刘邦起事后多有功劳。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封长子刘肥为齐王，曹参为齐相。到任之后，他遍访贤士请教“安集百姓”的妙招，最终被黄老学者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说教打动。曹参用黄老之学治理齐国，大获成功，不仅使齐国国泰民安，也使自己获得了“贤相”的美誉，并于惠帝二年（前 193）继萧何成为帝王之相。汉相任上，曹参继续秉持黄老无为之术，“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再获成功。此期间传唱的民谣“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便是对其处政方式的歌颂。黄老之学从此风行，崇尚黄老、提倡无为成为当时汉家王朝的

治国策略。

惠帝、吕氏执政时期，“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文帝恬淡寡欲，在位 23 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重用“治黄帝老子之术”的陈平为相，专门配备“治刑名”的谨厚长者张欧教导太子。文帝皇后窦氏也“好黄老术”，她迫使儿子景帝从做太子时起就“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因此景帝即位后对这种祖传的治国之道谨遵无违，对“学黄老言”“好黄老言”的汲黯、郑当时等大臣颇为倚重。

黄老之学不仅是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成为一代学术思潮。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对学术进行分类品评的过程中，赞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言外之意，这种学说简直有百利而无一害。司马迁本人也被后世学者指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可见黄老之学的学术影响。

黄老政治在西汉初期产生了良好的治效。统治者们轻徭薄赋、节约开支、减省刑罚、赈抚百姓，发展了生产、争取了民心；百姓则致力农耕，滋殖衣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尤其是文、景二帝统治的四十余年，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呈现国泰民安的兴旺景象，历来被看作繁荣治世的典型，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之治不仅功在当时，还为汉武盛世所有重大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似可以这样说：黄老之学符合汉初特殊情况下的社会需要，而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也确实给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带来了利益。

二、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立国后经过 70 年左右的休养生息，当权者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需要，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于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用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董仲舒画像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宗师。他熟习经典，精通《春秋》，好学而知礼，“学士皆师尊之”。《举贤良对策》是他对武帝诏问的“答卷”。由于君臣之间的三问三答，问答重心关乎天人关系，此策又称为《天人三策》。正是在这封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诸

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作为儒学的传人，董仲舒扬弃了先秦儒家的仁义思想，主张“以人安人，以义正我”；同时强调德教，提倡“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具体到社会政治问题上，既对统治者提出了推恩施人、严于律己的施政要求，又为整个社会制定了有利于统治集团的道德要求。

作为《公羊》大师，董仲舒继承了公羊学派对于《春秋》的一贯看法，即认为这部书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表达了孔子的政治理论。《春秋》开首就是（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这原本是编年史以年时月日时间顺序组织史料的特征体现，但《公羊传》不惜笔墨详加解释，大意是说：元年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春是一年中的第一个季节；王指周文王；先说王后说正月是因为用的周文王历法的正月；用周文王历法的正月，是为了使用天下统一的历法。注意这里强调了“大一统”。董仲舒正是通过对“大一统”进行发挥性阐释构建起自己的政治学说。他直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将“大一统”表述为宇宙之中的基本规律。具体到社会政治问题上，就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为了回答武帝关于天人关系的制问，董仲舒对天人关系做出了详尽的论证。他糅合儒家、道家、阴阳五行诸学的相关内容，同时运用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对古已有之的天人感应说展开了自己立场上的抽象发挥，构建起新的天人感应的学说体系。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他说上天是“百神之君”和人类社会的主宰，它具有“仁”的特征，时常通过自然界的种种灾祥，表达对人的谴责或嘉奖；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最为天下贵”，其行为可以感动上天直至改变上天的安排。天人感应论给传统儒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具体到社会政治问题上，它鼓吹君权神授，同时强调君权的得失无常。它既向被统治者展示了服从统治的终极依据，又企图对统治者施加约束、迫使其敬天保民，所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很显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五行等多种学说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新体系以天人感应说为理论形式、以政治哲学为基本面貌、以大一统论为经世内核。新儒学成为适应汉代社会需要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经世学说，为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协调社会矛盾、育化道德风尚做出了理论贡献，“令后学者有所统一”，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正是对新儒学的种种价值有所认知，武帝果然采纳了董氏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独尊儒术。

当然，武帝的尊儒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原来武帝即位时才 16 岁，其祖母窦太后督政。前文曾指出，窦太后是位笃诚的黄老信徒。武帝上台

后虽然任命了一批儒者担任朝廷要职，如以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等等，但由于窦太后的缘故，尊儒的活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搞起来。特别是新上任的儒者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直接触犯了以窦太后为首的窦氏集团的利益，这样双方的斗争就远远超出了儒、道两种思想斗争的范围，而成为一场权力的斗争。建元二年（前139），“赵绾请毋奏事东宫”，使这场斗争达到最高潮。结果，握有实权的窦太后取胜，赵绾、王臧皆下狱自杀，窦婴、田蚡也被罢官，尊儒活动受到严重挫折。

不过，当时更易统治思想毕竟为大势所趋。数年后，尊儒活动又有所抬头。建元五年（前136）春，武帝正式“置五经博士”。所谓“五经”，即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书》《礼》《易》《春秋》。此举表明当时儒者势力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次年，坚持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窦太后去世，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崇儒的田蚡被重新起用当了丞相，一大批儒家的新生力量也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如此，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完全得以实现。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大转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大转折。从此，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学成为帝国时代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攻读儒家经典成了赶禄仕进的敲门砖。表面上看，独尊儒术似具有统一思想的积极作用，但实质上却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那种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局面，使人们进入到一个文化专制主义时代。从这种意义上讲，汉武帝独尊儒术对思想文化所起的钳制作用，要远远大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难怪学者感叹此举的结果道：“岂不哀哉！”



需要指出的是，切莫以为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纯粹用儒家学说治国。《汉书·元帝纪》有一段记载，向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其意说，元帝为太子侍宴时向其父（即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里所谓的“霸王道杂之”，即法、儒并用之意。而且这种“霸王道杂之”系汉家“制度”，也就是说其来有自，并非临时行为。这充分表明，汉世政治，尊儒只是表象，而其实际治国则是儒、法并用，且是儒表法里，或曰外儒内法。这一做法，实奠定了历代施政思想的基调，对中国政治影响极其深远。

（撰稿人：黄留珠）

汉代兴建太学、郡国学与校理群籍

一、兴建太学与郡国学

太学或作大学，为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相传虞时的庠，夏朝的序，殷代的瞽宗，西周的辟雍皆为古代之太学。西汉立国之际，国力十分有限，难以考虑兴学之事。文帝时，虽有贾山上书，建言设立太学，但限于客观条件，未能实现。直到武帝即位后，董仲舒再次提出建立太学的问题。元朔五年（前124），也就是置五经博士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武帝感到各方面的条件已臻成熟，于是授意丞相、御史二府讨论此事，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拟定了一个实施方案，获得批准，于是太学正式建立。

1. *太学的组织结构与学生数额*。太学建于京师长安，教师由五经博士充任，学习儒家经典。学生称作“博士弟子”，也叫太学生。其数额，武帝初建太学时为50人，昭帝朝增为100人，宣帝末增至200人，成帝时增为3000人。平帝、新莽时一度改成国学，骤增至10 800人。

2. *弟子选任*。博士生弟子分两部分。一是正式弟子，由太常择选，条件是“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二是“如弟子”即员外弟子，由地方县令长丞、侯国相推选，条件是“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入选者须先送到郡太守、王国相那里慎重审查，于每年终时随同到朝廷作汇报的上记吏一起，再被送到太常那里，“得受业如弟子”，即算作不在正式弟子员数的员外弟子。

另外，博士弟子也有通过高官宠臣享有的荫任特权而荫补者，如伏湛“以父任为博士弟子”，即典型例证。

3. *弟子的待遇、受学、射策与任用*。博士弟子学习期间，享有免除徭役的待遇，被称作“复其身”。不过游学费用需要自理。

一般情况下，弟子受学专攻一经，拜一位博士为师；个别也有兼治别经、兼问别师者。王充《论衡·明雩》记载说：“汉立博士之官，为弟子相呵难，欲极道之深，形是非之理。”可见除博士讲课外，师生间亦展开讨论。太学中还不时举行某博士或大师的经

学演讲会，称作“都授”或“都讲”，实际上就是一种篆体报告，各种弟子皆可参加。

弟子受学一年即要受博士考课，称为“射策”，即一种抽签考试。这是博士弟子仕宦的必经之途。早期设甲、乙二科。凡“能通一艺以上”，即达到乙科标准，可以任用为文学掌故。考课成绩优秀的所谓“高第”，是为甲科，可以为郎中，但必须“太常籍奏”。另还有与之配套的规定：一是“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二是“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大约至迟到宣帝时又增设丙科。《汉书·儒林传》所讲：“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当指西汉后期的制度。如此甲乙丙三科，依次分难易，射策者量力取策，答案正确者为“中”。其做法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人的智力差别，可以留太学继续学习。这样就使一般弟子都有机会做官，达到了某种和谐。

除京城建太学外，西汉地方亦有官办学校，叫作郡国学。

早在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为改变本地区落后面貌，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属县子弟入学，免除更徭，学毕得补小吏，是为兴办郡国学之始。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如此一来，建立郡国学的工作便在全国范围内推开。而帝国京师所在地陕西，其郡国学的普及率，自应是比较高的一个地区。

元帝时期，郡国学进一步有所发展，当时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职掌地方教育。至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郡国学又有了新的变革发展。元始三年（3），命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学、校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经》师一人。这样一种制度一直沿用到东汉时期。



二、刘向、刘歆父子校书

西汉立国之后，反秦之弊，除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文帝时“天下众书”已经“往往颇出”，至武帝朝政府公藏更是大增。然而武帝闵于“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始“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将文献的管理提上议事日程。成帝时则进一步诏令刘向等人校书，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籍校理工作就此展开。

刘向原名刘更生，是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他自幼“有材行”，成年后以通达经典、善属文辞，被汉宣帝视作“俊才”而置于左右。“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书，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元帝时因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并弹劾外戚专政误国，两次入狱。成帝即位，复进用，更名向。出于难以自明的学术兴趣和文化责任，同时继承前贤业已取得的学术经验，刘向开始了自觉的校雠工作。刘向校书18年，期间升迁中垒校尉，但事业未竟，于成帝绥

和元年（前8）去世。一直随其左右的幼子刘歆先“复为中垒校尉”，又“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复领《五经》，卒父前业”。



刘向刘歆父子

刘氏父子的校雠工作由目录、版本、校勘三个部分组成。

刘向在校书过程中为所校每一部书撰写目录，并将所撰各书书目汇集类编，形成目录专著《别录》。刘歆子继父业，将群书分类，著成《七略》（含《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别略》是《七略》的母本。《七略》是对《别略》的浓缩和总结。它为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日后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即以其为依据，“删其要，以备篇籍”。

刘向刘歆校勘工作的步骤包括选定底本，广备众本，订脱误、标笺识，补缺去重、条定篇目，存取别义，撰写校勘记。此外，还有确定书名。

现代学者将校勘方士分为存真、校异、订讹三类，或分为订本式、底本式、札记式三类。刘氏校勘对这些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因此中国文献校勘学实应“宗刘”。

“版本”一词的出现大概要晚到宋代，但版本问题几乎与文献孪生。由于受到复制手段落后的局限，早期文献一经流传就会形成不同的版本。汉兴后“往往间出”至“积如丘山”过程中同一文献版本各异的情况尤为普遍。就文本而言，差异主要表现在字体不同、文字不同两个方面。此类版本的混乱给文献的传习带了诸多麻烦，也成为汉世经学学术争议的直接原因，所以引起了学者和政府的注意。刘氏文献版本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写定本，再是选底本。

长期以来，学界多以版本专指纸质文献而言，认为其“广义包括抄写本和刻印本，狭义则仅指刻印本”，因而对于汉代版本问题鲜有提及。其实“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

的各种不同本子”，“关于图书的发生和发展、各个本子的异同优劣”都是版本学的内容。汉代的版本意识及其引导下的版本工作，已经开版本学的先河，同时为文献校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三、文化建设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文化建设”，是当今流行的词语。汉代虽然没有这个词，却有属于文化建设的事体。本文所说的兴建太学、郡国学及刘氏父子校书，便是典型的实例。

按倡言建太学的董仲舒的看法，“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兴太学”之目的，就是“以养天下之士”。古人所讲的“养士”，实即今日所谓的培育人才之意。不过古代所培养的人才是清一色的官吏。从这种角度去看，上自太学，下至郡国学，可以说全是未来各级官员的培养所。就实际效果而言，应该说汉代统治者兴学重教的初衷是得到了实现的。《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自此（指设置太学——笔者）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这就是说，自从兴建各类学校育才、储才以来，使官员队伍素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那种动辄“拔剑击柱”的人少见了，而“斌斌”的“文学之士”多起来了。由此可见兴学对于汉代政治生态影响之深远。

兴学对汉代的教育影响更是直接。因为兴学本身便是教育最为重要的内容。在官府兴学的带动下，各式各样的私人教育也迅速发展。这种私家教育的发达与繁荣，直到政治中心转移之后的东汉时期，在关中一带仍能明显看到。例如名儒马融在家乡茂陵教授学生，常有千数。其授课场面，更是气势非凡：“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请看，这是何等派头！



讲经画像砖

刘氏父子校书，其直接原因史谓“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但实际上是与西汉统治当局试图裁定《五经》同异、减省儒经章句繁多的愿望也是密切相关的。原来早在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诏萧望之、刘向等儒生，会集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宣帝“称制临决”，亲自作总结。不过这次

被命名曰石渠阁会议的经学讨论会，似乎并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而日后发展中又不断地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特别是成帝朝国家藏书大为扩充，需要对这些典籍进行整理，所以才有了刘氏父子的校书之举。由于校书更多涉及的是学术层面的事情，因此其学术意义也就更显重要。总的来看，刘向刘歆校书过程中取得的卓越校勘成就，对于文献的整理和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所创立的目录的编制程序和体例，著录了数以万卷计全面反映西汉末年社会文献财富的图书，引起了历代王朝对建立公藏图书机构以保管图书并编纂官修目录的关注，也为学者指明了学术门径。如龚自珍言：“微夫刘子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

西汉兴建太学、郡国学以及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是当时代文化建设的盛举。大大提高了汉国家的软实力。所谓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具体指精神、思想、学术、智力等层面所拥有的实际能力。一个国家立足于世界之林，不仅需要硬实力，而且不可缺少软实力，人们常说的“智高一筹”，是其谓也。汉武兴学、刘氏校书等史实表明，文化建设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必由之路。这一点，无疑对今天具有启示意义。

司马迁著《史记》

一、司马迁其人其事

西汉时期产生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学巨著《史记》。其作者是被世人誉为“史圣”的司马迁。他的家乡韩城，汉代叫作夏阳，属左冯翊。其祖先做过周太史，以后世代为史官；其父司马谈学问渊博，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司马迁，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武帝初，司马谈仕为太史令。司马迁亦随至京师长安，曾向孔安国、董仲舒等著名学者求教。20 岁时，开始漫游全国。此举使青年司马迁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体验了各地风俗民情，考察了重要的历史遗迹，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加深了与民众的情感。这些为他日后撰写《史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壮游结束不久，他入仕为郎中，从此经常侍随武帝巡行郡县，并曾奉使西南夷。



司马迁画像

公元前 110 年，武帝去泰山封禅，司马谈未能随驾前往，滞留周南（今河南洛阳一带），为此气愤发病。刚从西南出使归来的司马迁，在河洛之间见到奄奄一息的父亲。父亲紧紧握着他的手悲痛地述说自己事业未竟的遗憾，希望他继承父志，勿废天下之史文，扬名于后世。司马迁俯首流涕，表示谨遵父命，一定完成其未竟之业，写出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父亲死后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由于职务之便，他得以大量阅读国家藏书，搜集整理史料，为完成父亲的遗愿积极做准备工作。

不料当司马迁开始写作后不久，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被处腐刑。此事使他的肉体与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然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但为了完成著史的事业，他顽强地活了下

来。公元前96年，司马迁终于被赦出狱，并拜官中书令，尊宠任职。这样一来，使他有条件又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最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所有计划史书的写作。

司马迁把自己毕生写就的这部史学巨著，与文王演《周易》、仲尼作《春秋》、屈原赋《离骚》、左丘撰《国语》等相提并论，认为都是遭受厄运之后的愤发之作。他深知此书难容于世，写作时便已有将其“藏之名山”的准备。史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西汉帝国发展到武帝时期，统治相对稳定，经济实力空前增强，从而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当时的史官，受时代的激励，深感必须继承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的传统，改变自获麟以来数百年间诸侯相兼、史记放绝的局面，论载汉兴之后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业绩，以不废天下之文。这当中，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司马氏父子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史家责任感，正是当时史学要求突破原有的模式、寻求大发展大前进的时代趋势的反映。这一时代的使命，最终以司马迁继承父命，撰成《史记》这部划时代的巨著而得以实现。

二、《史记》对史学的贡献

唐刘知几《史通》将“诸史之作”析为“六家”，然后统归“二体”，即“编年体”与“纪传体”。而《史记》则是“二体”中“纪传体”的鼻祖。其开创价值，约有三方面：

首先，《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记史法，或曰以人物传记为主干的史书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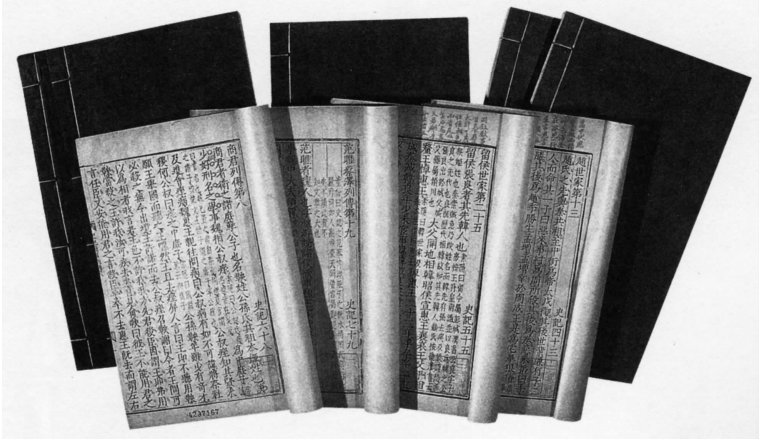
《史记》以前的各种史作，如《左传》《战国策》《国语》等，或编年，或记事，或记言，却没有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展现历史进程的。《史记》正好与此相反，全书骨干由12本纪、30世家、70列传构成。“本纪”是帝王的传记，以此作为全书的根本、纲纪。要之，即以主宰天下的帝王为中心来编排一个时代的历史。12篇帝王传记前后连贯，首尾相衔，构成历史主线。“世家”是诸侯王（含重要列侯将相）的传记。由于诸侯分封在不同地区，所以这部分实际是以诸侯王为中心的地区史。“列传”是各类重要人物的传记。通过记载这些人物活动，展示一个时代历史的细部。就规模和层次而言，本纪最大最高，世家和列传依次降低。这样一种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形式，被称作“纪传体”，是以前从来没有的。纪传体史书以本纪、世家、列传为主的结构，与当时形成的金字塔形社会政治结构完全一致，他适合于更有力地表现西汉帝国大一统的雄姿和威容，能够大大凸显清君明主、忠臣义士的地位，特别是突出帝王的作用，因此它较编

年体等其他史书形式，更能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史学也就在满足了这一需要的前提下，大发展大前进了。

其次，《史记》以前的史著，如《左传》是以年代为主的编年史，《国策》《国语》是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此外还有以文告档案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如《尚书》，然而却没有一部通史。《史记》的问世，结束了这一局面。该书所述，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迄作者所处的汉武帝时代，时间长达3000年之久。书中改变了以往史著记一事一言或单线条记述的做法，而是采取“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以时、空两个维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同时展开，众多人物和事件交错叙述，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样一部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而又融会贯通、脉络分明的通史的出现，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创造。这里，固然不可否认当时出现如此一部通史巨著的时代必然性，但作者的创新勇气、聪明才智和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史记》开创了无所不包的“大历史”史书体例。

所谓“大历史”，是指广义历史，即认为历史不仅仅只限于社会史，而是还包括自然史。在古代固然没有“社会史”“自然史”一类的概念，但却有从“大历史”角度考察历史的史观，有按“大历史”规格撰写的史著。《史记》就是这样一种“大历史”史著的开创之作；而其“大历史”的体例，则具体化为“书”这种形式。“书”是《史记》中很特殊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一种专门史。《史记》中共有八“书”，其上自天文，下到地理，囊括“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充分展现出一种无所不包的“大历史”格局。诚然，《史记》之前，有些史著如《左传》，也有某些自然



《史记》书影

史方面如天象、灾异等记录，但却是零碎的、分散的，范围和数量都很有限，远不能同《史记》中的“书”这种已经上升为专门史的系统论述相提并论。《史记》开创的无所不包式的“大历史”史书体例，对中国史学影响十分深远。以后的历代正史，差不多都有“天文志”，特别是宋郑樵所撰《通志》的“二十略”，自天、地、人、礼、乐、书到经济、政治、法律、艺文，乃至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几乎应有尽有。如此博大的气魄和规模，显然是对《史记》“大历史”体例的继承和发扬。这无疑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以上只是从总体上或曰大的方面所做的论述。实际上，《史记》还有许多更具体的创造，更具体的“第一”。例如《史记》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史学理论体系，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第一次从世界史的角度描述中国历史，其视野第一次移出中原一带而达到了岭南、东南亚、到达今新疆、中亚地区。《史记》第一次把历史活动的主体从政治家、军事家扩展到商人、医生、游侠、占卜者，甚至农民起义领袖和刺客。《史记》第一次提出了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的思想，其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几千年来不管有多少次内乱、分裂，有多少次外敌侵略，中华民族始终打不散、分不开，与此有绝大关系。《史记》第一次在书中为作者本人立传，使史学家也成为被研究的对象，等等。这些更具体的创造与第一，同前述的三个方面相比，自然属于细节问题了，故在这里仅点到为止，就不再展开论述。

三、《史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开创纪传体史书这一新体例形式，代表了西汉时期史学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极富文采，是一部记传文学的巨著，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1.《史记》以前的一些历史著作，虽然也写到许多人物，甚至较生动地刻画了人物形象，但通常均系片段，也较分散，属于历史事件的附庸。在《史记》中，司马迁则将人物作为事件的主宰，以写人物为主，进而反映历史的进程。《史记》这样一种更充分、更集中刻画人物性格，比较完整地写出人物一生活动的写作模式，为后世传记文学创立了典范。

2.《史记》描述人物，不是面面俱到，二是善于抓住人物一生中最典型的事件和行动，突出其主要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作者这里描写了少年项羽的志向、巨鹿之战、鸿门宴以及被围垓下后与虞姬作别这样几幕，以表现他既勇猛磊落，又自负残暴的悲剧性格。这样的表现手法，同样对后世传记文学产生有巨大影响。

3.《史记》善于把人物事迹、历史事件故事化，即把它们变成一个充满矛盾、紧张

而又曲折的故事。像《魏公子列传》中的“窃符救赵”，《蔺相如列传》中的“完璧归赵”，《刺客列传》中的“图穷匕见”等，都是结构完整、情结曲折、引人入胜的小故事，从而大大增强了文学性。这亦为后世传记文学的法式，成为效仿的榜样。

4.《史记》在刻画人物时，带有明显的抒情性，如“易水送别”“霸王别姬”等，皆作者饱含情感绘制的千古佳篇。另外，符合人物个性和生动传神的对话，简洁、形象、极富表现力的故事，亦其突出的特点。这些均开我国传记文学风气之先，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史圣精神与史传传统

有人曾把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以孔为“东圣”，迁为“西圣”。将此二人尊崇为“圣”，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以方位词冠之以示区别，显然远没有反应出两位圣人各自不同的特点。其实，称司马迁为“史圣”还是相当精准的。所谓“史圣”，也就是史学圣人的意思。这里，人们不禁会问：这位史圣究竟“圣”在哪里呢？对此，似可从“史圣精神”和“史传传统”两方面做出回答。

“史圣精神”，所指首先当是司马迁那种执着追求的精神和他那种顽强的毅力以及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心。这些，前文已有叙述，兹不重复。如果从史学本身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达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撰史思想，自然应该是最集中的体现。此外，《史记》的“实录”精神，也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东汉班固评价《史记》时所指出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应该说是对“实录”精神最全面的解释。这显然是对中国史学“秉笔直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今天，这样一种“史圣精神”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有启示意义的，值得认真学习并加以贯彻。

“史传传统”，具体指司马迁撰著《史记》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即由此开创了中国史学的史传新时代。众所周知，史传为传记的一种。传记是记载人物事迹的文章，具体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史传。其要求记载翔实的史事，崇尚朴实、雅洁，不能主观想象。另一类属于文学范围，或称传记文学。其用形象化方法，描写各种著名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及其历史背景；虽以史实为依据，但允许存在某种程度的想象性描写。《史记》问世的时代，尚没有第二类传记，而史传即第一类传记，也因为《史记》的面世而开始登上文坛。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史记》开创了史传的新时代。自此而后，中国史著的主体，从所谓前四史，到十三史，再到十七史，再到二十一史、二十二史，再到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等，皆为史传形式。应该说，这些都是《史记》影响的结果。

班固撰《汉书》

一、班氏父子与《汉书》撰写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巨著，产生于东汉时期。作者班固（32—92），字孟坚，与《史记》作者司马迁一样，也是陕西人。其籍贯当时叫作扶风安陵，即今陕西咸阳东北。



班固像

固之父班彪，字叔皮，以学显名于世；新莽末避地河西，为窦融划策事光武帝；东汉初历官徐令、望都长，后致力于著史。原来自《史记》流布之后，不少人鉴于其所记仅止于汉武，遂纷纷续补。班彪以为这些续作不足以踵继前史，于是慎核其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正当他撰著到百余篇（或说65篇）时，不幸逝世。

班固少承家学，9岁即能属文诵诗赋。王充对少年班固十分器重，认为“此儿必记汉事”。及长更博贯群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后入太学学习。“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23岁归家乡扶风班家台居父丧期间，着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志，撰写一部完整的西汉历史。不料祸从天降，有人上书告班固私改国史，遂被捕下京兆狱。班固的弟弟，就是后来出使西域建立奇功的班超，直赴京城上书替兄申辩。正好这时地方官也将书稿送至朝廷。明帝看过之后十分赞赏班固的才学，所以不但不治罪，反而召为兰台令史，典校秘书，让他专心从事汉史的写作。

章帝建初四年（79），诸儒讲论五经异同于白虎观；班固奉诏撰集其事，作《白虎通德论》，成为后世研究东汉学术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为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获胜的汉军至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功，他

为之作《封燕然山铭》，记其功其事。此铭近年被发现，印证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后窦宪遭诛，他受株连免官；不久被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下狱，旋病死。

班固积二十余年，据其父《史记后传》遗稿增补而撰写《汉书》，及死，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后和帝令班固的妹妹班昭进行整理，续作八表，又由马续补作《天文志》。如此，《汉书》才算最终完成。

班固还著有诗文四十余篇，以《两都赋》最负盛名。明张溥辑有《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二、《汉书》对《史记》体例的规范

古人将“史作”析为“六家”、统归“二体”，认为“载笔之体，于斯备矣”。所谓“二体”，即“编年体”与“纪传体”。前者以年月时间为纲编写历史，后者以帝王之“纪”、人物之“传”为主体来记述历史。而《史》《汉》均属“二体”中的“纪传体”。

《史记》是“纪传体”的鼻祖，具体由“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部分组成。“本纪”按年月编写历代帝王的史迹，为全书之纲纪。“世家”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历史及重要的将相事迹。“列传”是各类代表性人物的传记。“表”以图表、表格的形式谱列人物和记述史实。“书”为一种专门史，主要记述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汉书》则为“纪传体”的范本。它将《史记》所开创的史书新体例进一步规范化。具体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点：



《汉书》书影

一是将“本纪”省称为“纪”；

二是把“世家”与“列传”合并，统称作“传”；

三是改“书”为“志”。

如此一来，《汉书》的体例就变作“纪”“传”“表”“志”四部分。其中，“纪”12篇，“传”70篇，“表”8篇，“志”10篇。总计100篇，后人析为120卷。

三、《汉书》的史学价值

《汉书》的史学价值，主要在于其规范性，即完善、整齐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

《史记》虽然创立了史书的纪传体，但由于是初创，故其体例尚不规范，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例如，《史记》的本纪中没有《惠帝本纪》，但在《吕太后本纪》中仍用惠帝纪年，这样就自乱其例。再如，《史记》的专传或合传与类传的次序间杂，或以时代的先后，或因事迹的相关，而不拘于体例，像《刺客列传》在专传之间，《汲郑列传》反在类传之间；《匈奴列传》置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前，《大宛列传》反置在《游侠列传》之后，等等。再如，《史记》列传的篇名，或以姓标，或以字标，或以官标，或以爵标，虽寓褒贬之义，但体例很不统一。《汉书》在全面继承《史记》纪传体的同时，又针对它的不足，进一步改进之，完善之，规范之。归纳起来，此类工作约有这样几方面：

（1）确立“本纪”的义例。如针对前述《史记》无《惠帝本纪》的缺憾，《汉书》特为惠帝立纪，从而确立了“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的义例。这么做尽管显得僵硬，但就编纂形式而言却严谨多了。

（2）将“世家”并入“列传”，改变了《史记》传记“帝——王——臣民”的三级式为“帝——臣民”的二级式，从而更加突出了君权，突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同时也与汉武帝以后诸侯王有名无实的现实相适应。

（3）确定了各种传记的编排顺序及传的标名法。《汉书》规定各传均以时代顺序为主排列，先专传，次类传，再次边疆各族传，而以“贼臣”《王莽传》居末，使编排更合乎逻辑，也开后世叛逆或贰臣传的先例。关于传的命名，规定除诸侯王外，概以姓或姓名标题，统一了体例。所以章学诚讲：“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

（4）改“书”为“志”。《汉书》沿用了《史记》“书”这种专门史的体例，但却改名称为“志”，并在内容上有所合并和增加。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汉书》将《史记》的《礼书》《乐书》合并为《礼乐志》，将《律书》《历书》合并作《律历志》，将《天官

书》改作《天文志》，将《封禅书》改为《郊祀志》，将《河渠书》改作《沟洫志》，将《平准书》改作《食货志》，此外新增加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这样，就使专门史的门类更加齐全，布局更为合理。特别是新增的四志，历来受到学人的称赞与重视。总之，《汉书》大大发展了《史记》的“书”这种体例，使之成为史学上的志体，对后世所谓的“政书”影响深远。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绝大部分得以保存，《汉书》十志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5）对“表”进行了改造。《史记》的表主要是年表，另还有月表。《汉书》将其改造为三种形式，主要是贵族世系表，其次是公卿接替表和古今人物表。这当中特别是反映大官僚接替关系的《百官公卿表》，记录了汉代自中央到地方官吏设置的沿革与构成，弥补了《史记》的不足，意义尤为重大，开后世正史中《百官志》之先河。

经以上的改进与完善，纪传体史书步入其规范形态。此后，由纪、传、表、志四部分构成的纪传体史书体例，一直是历代正史所遵循的标准模式。

四、《汉书》断代为史

当然，《汉书》的史学价值也有开创性的一面，即其创立了断代为史的体裁。

《汉书》尽管沿用了《史记》的纪传体形式，但与《史记》却有很大的不同，它只是记述西汉（含新莽）200 余年历史的断代史。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非偶然，而是时代的产物。在两汉之间，存在一个王莽篡汉而建立的新朝政权和新莽末爆发的大规模农民战争，这些给东汉统治者极大的教训。为了使刘氏王朝不再发生外戚篡权事件，为了维护东汉政权的长治久安，当时的统治者迫切需要总结西汉一代的历史经验，而断代的《汉书》，正是适应这一要求而产生的。

另方面，到班固时代，“汉承尧运”“协于火德”之说，已为统治阶级所公认，而东汉朝廷也已开始编修国史。如果再依据《史记》的通史成规续编汉史，不但不能宣扬“汉德”，而且也会同《史记》把《汉高祖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一样，势必将《世祖本纪》编于王莽之后，置于新市、平林之列，这是当时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这样，摆脱旧传统，开创新体裁，就成为一种时代的需求。《汉书》断代为史，正符合这一需求。事实上，《汉书》所开创的纪传体断代史这一体裁，不仅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而且也极对以后历代统治者的胃口。唯此，所以后世的正史，基本都是像《汉书》那样，由纪、传、表、志四部分构成的纪传体断代史。仅此而论，《汉书》在史学上的影响，亦有超过《史记》的地方。

五、《汉书》的文学价值

《汉书》不仅是史学巨著，而且也极富文采，为我国传记文学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典范之作。

在文学方面，其继承、发扬了《史记》的基本做法。例如将人物作为事件的主宰，以写人物为主，反映历史的进程，进而成为一种充分、集中刻画人物性格，完整写出人物一生活动的写作模式。

再如善于抓住人物一生中最典型的事件和行动，突出人物主要性格特征。再如把人物事迹、历史事件故事化，即把它们变成一个充满矛盾、紧张而又曲折的故事。

再如抒情式刻画人物，充分运用符合人物个性和生动传神的对话，以及简洁、形象、极富表现力的叙事，等等。

此外，由于《汉书》作者擅长诗赋，而该书写作又经历曲折，后在朝廷的支持下完成，所以作者不免有显示学问才华的意向，这就使这部史作不仅多深奥的古字古义，而且先天具有较浓厚的文学色彩，从而更增加了其文学价值。

（撰稿人　直　生　黄瑞臻）

唐长安与外来文明

七至九世纪的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政治最强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作为其都城的长安也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国际化大都市，是当时的唐朝乃至整个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总人口可能达到百万，其中外番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不下数万人。长安城作为一个重要枢纽，将唐朝灿烂的中华文明扩散至周边地区。而西方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长安，再由长安传播至周边国家。隋唐长安俨然成为公元七至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座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的桥梁。

一、民间往来

长安与外来文明往来来源甚多，其中，民间交流占重要地位。而民间交流中起主导作用的应属商人。长安既有人数众多的突厥、回纥、粟特等少数民族商人，也有大量的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其中，胡商为之重，史载，安史之乱后，“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这些胡商“殖货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他们大都集中于长安西市，西市是长安的国际性贸易市场，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他们将香料、珠宝、药物等运到西市贩卖，再从中国购入丝织品、瓷器运回本国。西市内有众多外国商人所经营的邸店、酒肆，西市周边的坊里也侨居着许多外国商人。众多胡商的出没，再加上唐朝对外采取兼容并蓄的开放政策，使长安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文化生活方面都弥漫着一种异域风情。

服饰饮食是长安“胡化”最外在的表现。唐初，规定骑马“多著幂䍦。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永徽以后，弃幂䍦而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后来，下敕禁断，认为，著帷帽“过为轻率，深失礼容。”直至则天朝，帷帽再次大行其道。中宗即位后，宫禁宽弛，再无必须著幂䍦之制。甚至开元以后，众人骑马，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毫无障蔽。幂䍦、帷帽、胡帽皆为胡服，由全身障蔽到头颈障蔽再到毫无障蔽，可以看出唐代社会风气越来越开放。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甚至将“胡服”解释为：“今时服也”，可以想见胡服在唐朝受欢迎的程度。

饮食方面的“胡化”则更为常见。唐僧慧琳在《一切经音义》第三十七卷中说：“饼锭、烧饼、胡饼等皆为胡食。盖西域胡人传入。”唐朝“胡饼”盛行，日本僧人圆仁在长安求学时，曾记载“开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可见胡饼在长安的盛行。长安甚至出现了专饼锭的饼锭店，一在东市，一在长兴坊。而西域酒在长安亦甚流行，唐初有高昌葡萄酒，后有波斯三勒浆、龙膏酒，俱为时人所称美。西市及长安城东至曲江一带，俱有胡姬侍酒之酒肆。唐代饮食的“胡化”可见一斑。

唐朝音乐则是胡乐的受益者。唐朝在制定雅乐时，祖孝孙上奏道：“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而燕乐更是广泛吸收西域与中原乐曲融合而成的新系统。贞观时定十部乐，即《燕乐》《清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其中除《燕乐》《清乐》二部为中原乐曲外，其他八部都是吸收国内各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所用的乐器与演奏都各具民族与国家的特色，如胡笳、羯鼓等。胡乐与汉乐在唐时的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大唐特色的音乐文化。

随着在长安的外来者越聚越多，不仅在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方面改变着长安，同时也在制度上催生出了与外来者相关的法律。《唐律疏议》中便有许多涉及外来者的法律条文。《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



唐三彩

以法律论。”而对“化外人”亦有详细的界定：“化外人，谓番夷之国，别立君长，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唐朝时就已出现协调“化外人”之间矛盾的法例，可见政府法制建设的全面，也可想见当时各国、各族聚集长安的盛况。

唐律对“化外人”在唐各项权利都有特别规定。官员不能无故刁难外国商旅进入关津，“无故留难者，一日主司笞四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而“化外人”的在唐婚姻权，则规定“诸番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并不得将还番内。”说明唐并不禁止外番人与汉女结亲，只是不能将汉女带回番国。对于商人的财产权，唐律作出了细致的规定，“死商钱物等，其死商有父母、嫡妻及男，或亲兄弟、在室姐妹、在室女、亲侄男，见相随者，便任收管财务。如死商父母、妻儿等不相随，如后亲属将本贯文牒来收任，委专知官切加根寻，实是至亲，责保讫，任分付取领，状入案申省。”意为胡商死时，如果身边有亲人相随，便可收管财务。如无亲人在旁，则需将财务交由地方政府保管，等待死者至亲前来认领，查清身份后再归还家属。对可以认领并继承死者财产的人唐律也给予了明确的限定：“如有父母、嫡妻男及在室女，即任收任；如是亲兄弟、新侄男不同居，及女已出嫁，兼乞养男女，并不在给还之限；在室亲姊妹，亦依前例，三分内给一分；如死客有妻无男者，亦三分内给一分。”即父母、妻子、儿子和未嫁女可继承遗产，无子之妻和未嫁姊妹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而出嫁女、不同居的兄弟、侄子等不享有继承权。当然，政府对死商的钱物保管也有一定期限：“绝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货，满三月，无妻子之请者，尽没有之。”三个月无人认领，即没收国有。正是因为有如此严密的法规保障“化外人”的权益，才形成了“胡客留居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的盛况。



二、官方往来

如果说唐政府与民间往来更体现唐文化对外来文明包容吸收的话，那官方往来即是向外来文明展现大唐盛世、对外传播唐文化的最佳窗口。

唐政府机构中主管接待诸蕃入朝使者的为鸿胪寺，鸿胪寺为九寺之一，诸蕃使者到达长安后的所有活动都由鸿胪寺负责安排。鸿胪寺主要有卿 1 人，“掌宾客、凶仪之事及册诸蕃”，从三品上。少卿 2 人，“领典额、司仪二署”，从四品上。丞 1 人，从六品上。鸿胪寺下设典客署、司仪署和礼宾院三个常设机构。典客署掌“番客辞见、宴接、送迎”，在编人员 42 人。司仪署“掌凶事仪式及丧葬之事”，在编人员约 110 人。礼宾院则是鸿胪寺专门接待入朝番客的处所。

除鸿胪寺外，还有中书省中的四方馆也管理此类事宜。四方馆在业务上也受鸿胪寺

管辖，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双重领导关系的部门。

这些政府机构职责甚多，主要是：（一）为诸番来使提供食宿。但番客如果是来唐经商，鸿胪寺并不会为其提供食宿，而是由番客自行解决。由此，才催生出了西市内各大邸店。（二）详细询问番客所在地的山川、气候、物产、风俗等各项情况一并上报尚书省兵部职方司，为唐政府了解外番情况从而制定相关外交、军事政策提供依据。（三）赐钱物，对诸番使者向唐朝所献的贡品，由鸿胪寺估定其价值几何，并根据其值定出回赐物品，上报尚书省礼部主客司，同意后代表唐政府赐以使者相应的钱物。（四）报奏授官，如质子、归降首领以及入朝番客使团首领等诸番客，唐政府给予其优待，会授予中央或地方官，而其官位的大小，需由鸿胪寺提出初步意见，上报朝廷批准后正式授予。（五）供给资粮，诸番使者来唐期间及归国途中的资粮，皆由鸿胪寺负责供给。据《唐会要》卷一百记载："证圣元九年五月敕，番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圣历三年三月六日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番，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照此规定，不论入番抑或绝域，唐政府都会为使者供给资粮。（六）死于内地番客首领的身后事宜，亦由鸿胪寺负责操办。《唐会要》卷六六鸿胪寺条云："天宝八载三月二十七日敕，九姓坚昆、诸番客等，因使入朝身死者，自今后，使给一百贯充葬，副使及妻，数内减三十贯。其墓地，州县与买，官给价直，其坟墓所由营造。"诸番客入朝身死后，由鸿胪寺司仪署代表政府前往祭奠，按其官职赠钱充葬，并负责营造坟墓。

诸番使者中除一般性的入朝进贡外，还有一批是身负特殊使命的使臣。他们来到唐朝的目的并不是入朝参见，而是来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其中最著名的应为日本遣唐使。这些遣唐使中不乏入唐学习唐朝先进文化，归日后用其所学改造日本之人。据考证，从贞观四年到乾宁元年日本成功派出遣唐使达13次，每次团队规模少则百余人，多则几百人，最高曾达到650人次。使团成员除大使、副使等官员外，还有医师、画师、乐师、译语以及各行工匠等随同人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留学生与留学僧与使团随行。对这些外国留学生，唐朝采取开放政策，提供国子监让他们学习中华文化，鸿胪寺提供衣粮满足他们的基本衣食消费。据统计，日本总计有约二三百人先后在国子监学习，有些留学生聪慧努力，甚至在大唐也声名远播，如阿倍仲麻吕，亦名晁衡，高中进士，一生仕唐；吉备真备，携200多卷书籍归日，后官居右大臣，创制日文"片假名"；大和长冈，与吉备真备一起据唐律制定日本律令二十四条，完善日本律令。这些留学生对唐日间政治、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日本来唐的留学僧，经唐政府批准，亦可留居长安学习，亦由唐政府供给其生活

费用。先后入唐留学僧之数约三倍于留学生，达500人以上。较为有名的有空海，归日后创立日本真言密宗，创造日文“平假名”；道昭，师从玄奘，归日后创立日本法相宗。这些留学僧归日时同样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他们与留学生一样将他们在唐朝学习到的先进文化带入日本，使中国文化风靡日本上层，渗透到思想、宗教、文学、艺术、风俗等各领域，为日本大化改新后盛世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的对外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广泛吸纳外国人学习中华文化上，还体现在其科举取士时不拘一格专设宾贡科取外国学生。因外国学生学业成绩逊于华人，所以，唐政府特设宾贡科。新罗人金云卿为唐首位登宾贡科者，而考中宾贡科最多的也是新罗人，金云卿后还有崔致远、崔慎之等共计23人。除新罗之外，还有渤海留学生，如后任渤海宰相的乌昭度等，总计五人。此外可考者，尚有大食人李彦升、波斯人李绚等，其余皆不可考。这些宾贡进士，大多在唐朝做官，终身未归故国。他们与中国的士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流传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他们都是唐朝与外邦友好关系的见证者。

三、影响与借鉴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对外开放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在中国古代史上前所未有。据《唐六典·主客郎中》记：“凡四番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七十余番。”由此可见，唐朝对外交往范围之广。这些国家派遣使者来长安，不仅使域外的物产、习俗、乐舞等风靡长安。同时，随着使者的归国，他们也将灿烂的中华文明带到了域外，使中华文明得以远距离传播。



唐代长安之所以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首先，其内在因素应为唐朝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实力雄厚，身为国都的长安具有明显的外交优势。内政稳定、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为长安成为一个国际交流中心打下坚实基础。其次，统治者胸襟宽广，并没有过分强调夷夏之辨，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开放、不歧视的政策，给予番客足够的自由，甚至出任中央官员。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统计，唐朝宰相369人，其中有24人为少数民族，他们出身于15个不同的民族，而手握权柄的节度使更是番将用武之地。唐政府甚至还制定了向外国人授予官职的制度。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和博大包容的坦荡胸怀是大唐气象的内在基础，也是建设现代陕西可以借鉴的内容，现代陕西当以更加宽松的环境，兼收并蓄，勇于担当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领头羊，打造国际性大都市不仅需要热情，更需要智慧。

唐长安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辉煌历史，为现今提高西安等城市品位、形成陕西特有的城市内涵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立足历史，扎根现实，面向未来，陕西的对外开放

迎来新的机遇，内陆城市要站在开放的前沿，保持外向型性格，需要创造性的思维，充分利用内陆港、国际空港和古丝绸之路的优势，变地理劣势为区位优势。让曾经的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华丽转身，变成国际商务的中转站、世界贸易的必经之地和历史旅游者的终点站。

（撰稿人　张　晶）

唐代史馆和官修八史

有唐一朝重视借鉴历史、保存历史和创新历史，史学创作进入一个新时期。在借鉴历史方面，由官方组织史官编写前代史书，皇帝亲自过问修史之事，“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目的是借修史以总结历史得失，借鉴历史经验，“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其知古鉴今的意图不仅形于纸上，也见于行动，《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再加上由李延寿完成，又经过唐政府认可的《南史》《北史》等八部纪传体史书，正是其成果。

在保存历史方面，史馆的设立，系统的史料来源制度和大型的官修史书的问世，均说明唐朝将史料保存作为政府行为，并且逐渐形成制度。虽然唐代起居注、诸帝实录、国史今日存世者仅有《大唐创业起居注》《顺宗实录》等寥寥几部，但这些经由政府编撰搜集的资料成为后晋、北宋编写两《唐书》的主体史料。

在创新历史方面，唐朝在历史体裁、史学意识和修史制度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某些领域显示了唐人鲜明的创新精神。杜佑《通典》成为典制体通史的奠基者，刘知几《史通》成为史评体的开山之作，苏冕、苏弁兄弟的《会要》体裁为史料分类找到了新的载体。还有，唐初形成的后代修前代史制度、宰相监修制度、史料征集制度逐渐确立，即官方设馆修史得以制度化也是在唐朝形成的。因为重视借鉴历史，才会主动保存历史；因为重视修史，才会取得史学创新。

一、唐代史馆

史馆是唐代官方修史的最主要机构，史馆之名最早见于北齐，岳纯之认为牛润珍北齐史馆为一独立修史机构之观点不能成立，张荣芳在追溯史馆的渊源时认为东汉时的兰台、东观是当时政府修史活动的地点，但二者都是因为藏书丰富，修史可资利用，并非专供修史。瞿林东在《中国史学史》中认为，唐代史馆的设立是修史机构的重大改革，历代修史机构大致袭用此制，中国古代官府修史绵延不断，史馆起了重要作用。

唐代史馆设在两京，以都城长安的史馆为主，但其位置前后多有变迁。史载：

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馆门下东西有枣树七十四株，无杂树。开元二十五年三月，右相李林甫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官宜附近，史官尹愔奏移史馆于中书省北，以旧尚药院充馆也。

此条所记唐前期史馆历史变迁之大概，即史馆的隶属关系变化与史馆馆址方位的变迁两方面。史馆隶属关系是，由早期秘书省著作局承担修史演变为史馆专掌国史，隶属于门下省；开元时期，又归属于中书省。史馆因隶属关系的变动，其馆址也多次改变，贞观三年（629），移入禁中，即长安太极宫城中门下省之北；龙朔二年（662），大明宫建成后，又移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开元二十五年（737），李林甫授意史官尹愔奏迁史馆于中书省北，馆址又迁到原来的尚药院。但此后有无变迁，没有记载。至德二载（757），修史官于休烈奏报叛乱给国家藏书带来的损失情况时，提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据此可知，兴庆宫也有史馆，并收藏大量的国史、实录、起居注等书，而这些书正是开元天宝时期史馆的工作成果，并不属于一般国家藏书。知叛军进入长安之前，史官的工作地点主要在兴庆宫史馆，而不是大明宫史馆。

隋代国史属于秘书省著作曹，至唐初仍承旧制，只不过改为著作局，"隋氏曰著作曹，掌国史，隶秘书省。皇朝曰著作局。贞观初，别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此所谓的贞观初，他处记为贞观三年闰十二月，此前官修史书应归秘书省之著作局，如武德五年，唐高祖接受令狐德棻的建议，诏命修六代史，

自有魏至乎陈隋，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

此次已经就编纂魏、周、隋、梁、陈、齐六个王朝的历史，组织了编修班子，各史几乎都有秘书省的官员参加修纂，应该是以秘书省的著作局为主体，遗憾的是"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虽然未能完成编修六代史的任务，却为再次编修积累了资料、准备了条件。

二、官修史书与五代史的编纂

事实上，虽然史馆于贞观三年移于禁中门下省北，但并不是此后所有的官方修史都在史馆完成。最典型的事例是《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五代史就是贞观三年以后修纂，却不在史馆修成的官修史书。史载："贞观三年，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历时 7 年，到贞观十年完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上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诏藏于秘阁。"修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值得一提的是，五代史是在隶属中书省的秘书内省完成的，并非史馆。史载："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五代史），乃令（令狐）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五史的主修官仍然几乎都有秘书省或隶属于秘书省的著作局官员参与，其中，著作郎姚思廉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贞观三年，史言："又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既有秘书监，又有著作郎，集中说明五代史的编修也是以秘书省著作局官员为主体，在秘书内省完成的，并不是在史馆。

唐人杜佑在所著《通典》中记："初，著作郎掌修国史及制碑颂之属，分判局事，佐郎贰之，徒有撰史之名，而实无其任，其任尽在史馆矣。"杜佑这里认为唐朝著作郎"徒有撰史之名，而实无其任"，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当然，他所言"（修国史）其任尽在史馆"也有不准确之处，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前文所说，需要有一个时间节点，在贞观十年后是准确的，在此之前就不是事实。因为唐初可知的著作郎修史者大有人在，前有著作郎殷闻礼修魏史，后有著作郎姚思廉修梁史、陈史。同时，不在史馆修纂的五代史也说明修国史之任"尽在史馆"之说不够准确。但是，杜佑（735—812）生活在由盛唐转入中唐的时代，当时，国史之任确实是尽在史馆。不仅在杜佑时代，即从贞观十年后，或者说五代史后情况就是如此了，甚至出现五代史是秘书内省修成，而五代史志却是在史馆修成的现象。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五月，"太尉长孙无忌进史官修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由长孙无忌监修的《五代史志》或称为《五代志》，或称为《隋书十志》，其修撰者除长孙无忌监修外，还有哪些人，史书记载互异。《新唐书·艺文志》记《隋书》条时，注曰："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韦安化、李延寿与（令狐）德棻、敬播、赵弘智、魏徵等撰。"所列十人，并没有将修《隋书》纪、传与修《五代史志》的史臣加以区分，哪些人参与了《五代史志》的修撰仍不明确。唐人刘知几提到此事："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唯有十志，断为三十

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预其事。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刘知几认为在修撰五代史时就确定了十志三十卷的规模，原拟随后奏进，事实上此部分在第一阶段并没有完成，这才有再次修《五代史志》的工作。

何时开始修《五代史志》此处却言之不详，有必要稍作疏理。检《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记：“永徽元年，又受诏撰定律令，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知令狐德棻确实是既参与了五代史，又参与了《五代史志》的编撰工作，虽然提到他监修《五代史志》是在永徽元年（650），却并没有明确提及修《五代史志》的开始时间。

李延寿在《北史·序传》还提到另一位《五代史志》的监修者，“（贞观）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隋书十志》，复准敕召延寿撰录。”据此知褚遂良曾于贞观十七年（643）时主持编修《隋书十志》的工作。如果所记不错，褚遂良主持这项工作比令狐德棻还要早七年，但为何刘知几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没有提到褚遂良的名字，原因俟考。

事实上，《五代史志》最后完成时的监修者既不是褚遂良，也不是令狐德棻，而是长孙无忌，“显庆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隋、齐、周、陈五代史志三十卷，太尉长孙无忌表进之。”可知《五代史志》的监修至少是经历了三人：褚遂良、令狐德棻、长孙无忌，他们是这项工作的负责者。据《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记：“（贞观）十五年，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显庆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长孙无忌等诣朝堂上进，诏藏秘阁。后又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亦呼为《五代史志》。”此跋所记修志之年为贞观十五年，比前述贞观十七年要早 2 年，比永徽元年要早 9 年，不知何据。宋人王应麟对此有所提示：“贞观十五年，诏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勒成十志三十卷。后编入《隋书》，合八十五卷。”明确提到贞观十五年有修《五代史志》的诏文，此诏可能就是确定修撰时间的依据，惜今日已无法查到该诏原文。

总之，《五代史志》开始编修的时间应定在贞观十五年（641），其修成奏上的时间是显庆元年（656），历时十五年才完成此项工作。

哪些史臣参加了修撰《五代史志》的工作，因为当日官修史书是宰相领修制度，强调集体，致使参加者姓名不可尽知，更谈不上如何分工，只好就现有史料略作考证。前揭刘知几《史通》提到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五人曾参与其事；李延寿自写《序传》提到褚遂良曾奉敕修《隋书十志》，说明褚遂良也是修撰者之一；

《旧唐书》等史籍均记修成后由长孙无忌领衔奏进，证明长孙无忌作为最后的监修者也参与《五代史志》的编修。

有些史臣既参加修五代史的纪传，又参与《五代史志》的编纂。前引刘知几之文提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预其事，”应该是指参加修五代史的史官，只有令狐德棻参加了《五代史志》的修撰，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唐人李延寿在《北史》“臣延寿言”中自述：“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犹未出。然其书及志，始末是臣所修。”据此可知，李延寿也是既参与了修撰五代史，又参加了《五代史志》的编修，令狐德棻并不是唯一的两个工作都参加的史官。另据《旧唐书·李延寿传》记：“尝受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此文不仅证实李延寿的确参与《五代史志》的修撰，还提及参与编修此志的另一人即著作佐郎敬播，《旧唐书·敬播传》记：“贞观初，举进士，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寻授太子校书。史成，迁著作郎，兼修国史。”《新唐书》本传记敬播以修《隋史》之功获迁著作佐郎，而不是著作郎，因为上揭《李延寿传》也记他以著作佐郎参加《五代史志》的修撰，证明敬播同令狐德棻一样，也是同时参加编修五代史和《五代史志》的工作。刘知几不仅没有注意到李延寿、敬播与令狐德棻一样也是前后两次参加修五代史的史官，而且连敬播作为史官曾经参与过修纂的事实也忽略不提，只能说明刘知几对修五代史和五代史志的工作不够熟悉。

上文提到颜师古在贞观初曾与孔颖达同修撰隋史，但他是否参加了《五代史志》的撰修呢？史载：“颜师古，高宗时为礼部侍郎、监修国史。永徽元年，撰《隋书·地理志》三卷。”此条材料所记颜师古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0）撰成《隋书·地理志》三卷，按理也应该参与过修撰《五代史志》。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检两《唐书》颜师古本传，颜师古卒于贞观十九年（645），他根本不可能到唐高宗永徽元年再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也就不可能在此时再去完成《隋书·地理志》三卷。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册府元龟》的撰修者把时间记错，或者是把人名记错，因为《册府元龟》不记所引文献来源，故究竟是什么地方出错，一时难以判别。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颜师古在生前就撰成三卷《隋书·地理志》，因为其他诸志尚未脱稿，到修撰《五代史志》时才采用其稿。唐人言及《隋书十志》时，或认为“十志未奏，本犹未出”（李延寿），或认为“唯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刘知几），言下之意是早在初修五代史时，十志三十卷的规模已经定好，可能有些部分尚未脱稿，才导致再次修史。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会对我们今天考证《五代史志》即今《隋书》诸志造成许多误解，但据此就把颜师古定为《隋书·地理志》的编者，尚嫌证据不足。

实际上，魏徵在众史官中也是较为特殊者，前述他与房玄龄作为监修官主持贞观三

年修五代史的工作，并且直接参加了隋史、梁史、陈史、齐史的撰写，史载：“（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但对于魏徵是否参加《五代史志》的工作，多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是魏徵卒于《五代史志》开修的第三年即贞观十七年（643）。尤其是针对魏徵是否为《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多提出质疑。《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提到：“案魏徵本传，贞观七年为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俄请逊位，拜特进，今诸本并云特进。又《经籍志》四卷，独云侍中郑国公魏徵撰。”曹淑文认为此句不是讲《隋书》其他部分是别人所撰，唯独《经籍志》是魏徵撰，而是讲魏徵的官位在《隋书》的其他本或其他部分题的是“特进魏徵”，在《经籍志》题的是“郑国公魏徵”撰。所以认为魏徵是《隋书·经籍志》的撰者是曲解了跋文的原意。但仅就上提两点就证明魏徵未参加过《五代史志》的撰写，稍嫌武断。是否与上述颜师古撰《隋书·地理志》有同样情况，尚待他证。

褚遂良在《五代史志》的编撰工作也曾受到质疑，前引《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还记：“《天文》《律历》《五行》皆（李）淳风独作。《五行志》序，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传未尝受诏撰述，疑只为一序，今故略其名氏。”《旧唐书·李淳风传》也记此三志为李淳风所作，问题是《跋》文对《五行志》序“诸本云褚遂良作”的解释是褚氏未尝受诏撰述，这明显是错误的。正如前述，褚遂良不仅曾经受诏参加此项工作，还一度担任监修。因此，《跋》文褚氏“只为一序”的推断也会遭到质疑，从而，他提出褚氏之名在《五代史志》的史臣中略而不提的理由也就难以成立。

不管《五代史志》的参加者除上述数人外还有无其他人，其完成是在史馆中无疑，正与五代史在秘书内省完成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同是官修史书，主持部门不同；甚至同一部史籍，《纪》《传》在秘书内省完成，《志》在史馆中编修的现象，正好用另一种形式见证了唐朝官修史书制度转型的过程。

三、《晋书》和《南史》《北史》的修撰

《晋书》是代表唐初官修史书最高成就的又有一部史籍，其与《隋书》等五代史相比，表现出较大的异趣，反映着官修纪传史在取得独尊地位以后的变化。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下诏修《晋书》，诏曰：“宜令修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取。”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3人同掌其事，担任监修，但编撰体例由令狐德棻、敬播、李怀安、李怀俨4人确定，《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记：“有

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明确列出参加修撰史臣的数字，但此处所记之 18 人与《旧唐书·房玄龄传》所记人数不同：

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唯李淳风深明星历，善于著述，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至二十年，书成，凡一百三十卷，诏藏于秘府。

此处提到 8 人分功撰写，实际给出 2 人监修，8 人参修，与前引《令狐德棻传》所记 18 人同修相差较远。综合诸处所记，实际参加编修《晋书》的史臣要超过 18 人，达 22 人。这个数字并未计算李世民。

上揭文中“至二十年，书成”应指贞观二十年，如前所述，贞观二十年是《晋书》的开修之年，如此巨著怎么会在当年即数月内就完成，值得怀疑。检《册府元龟》记《晋书》：“后数载而书就。”明确记载此书用时数载，证明此处《晋书》编成于贞观二十年之说不可靠。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出版说明》认为“《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二十二年（648）成书，历时不到三年。”明确提到成书时间，但不知何据。史载贞观二十二年，新罗使者金春秋等入唐，“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唐太宗赐新罗使者诸物中包括新修《晋书》，说明《晋书》在此前就修成。据《旧唐书》卷三《太宗纪》，新罗使者金春秋是在贞观二十二年闰十二月入朝，所以新修成的《晋书》就成为唐太宗送给新罗的礼物，由此确定此书完成时间在贞观二十二年，虽属推测，也不无道理，但具体时间仍无法确定。



上引文中还提到李淳风在其中承担《天文》《律历》《五行》三志的修撰，正与本传所记吻合：“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可以确定《天文》等三志由李淳风完成。除此三志外，房玄龄、褚遂良可能是《地理志》的完成者，《册府元龟》记：“房玄龄太宗贞观中为司空，与中书令褚遂良等撰《晋书·地理志》两卷。”其他诸史臣的具体分工已难以尽知，只知敬播负责全书之发凡起例，“凡起例皆播独创焉，”史籍又言令狐德棻“其体制多取决焉”，实际上负责全书的编撰体例工作的除令狐德棻、敬播外，还有李安期、李怀俨，此数人对《晋书》的完成起到关键作用。

在众多史臣中，有些史臣既参加了五代史、《五代史志》，也参加了《晋书》的修

撰，令狐德棻、敬播、李延寿等就属于这类史臣。与其他史臣不同的是，李延寿不仅参加官府修史，还进行私家修史的工作，《旧唐书》卷七三《李延寿传》记："尝受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预修《晋书》……延寿又尝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等八代史，谓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颇行于代。"正是因为李延寿特殊的家庭教育和特殊的任职经历，才有《南史》《北史》二书的出现。

李延寿之父李大师常怀著述之志，"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但他的志向并没有实现，临死之时，"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李延寿为了实现其父的遗志，在私家藏书的基础上，又利用参与官府修史的机会，手抄笔录，依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例，历时16年，终于编成《南史》《北史》，"其《南史》先写讫，以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奏闻。次以《北史》谘知，亦为详正。因遍谘宰相，乃上表。"因为当时官府修史已形成制度，私家修史要公开流传，必须获得政府承认，而李延寿父子的《南史》《北史》撰自私门，在未经奏闻皇帝之前，不可能流传。为此，李延寿在经令狐德棻审查修正、经宰相通过后，上表奏闻，《北史·序传》收录此表全文，但对于奏闻结果却并未提及。综合现有记录来分析，他的上表并不是一次成功，两《唐书》就此事的记载出入很大，《旧唐书》本传记南、北二史"颇行于代"，而《新唐书》本传却言二史，"时人见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二者截然相反，如果不是失实，就可能是二史初期流传有过波动。而李延寿之所以要将二史初稿呈报监修国史、诸宰相，甚至要表奏皇帝，也许与书稿得不到时人认可有关。此事的转机可能在"帝自制序"之后，《册府元龟》记：

李延寿为符玺郎，撰南、北史一百八十卷，卒。高宗诏曰："故符玺郎李延寿，艺文该洽，材兼良史，撰《政典》一部，词殚直笔。虽其人已亡，功有可录，宜赐其家绢五十疋，仍令详正所写两本付秘书，一本赐皇太子。"

唐高宗因欣赏李延寿材兼良史而亲自为《南史》《北史》作序，还对他所写《太宗政典》的史笔再次表彰。《新唐书》记此事在调露中，《唐会要》记在调露二年（680），李延寿在唐高宗调露二年之前已去世，而他所著《南史》《北史》到此时才得到承认，距他成书上表已过20余年，这似乎暗示《北史·序传》所载表奏当时未予通过，李延寿以此《表》作为全书的结尾，是有现实用意的，难道他要通过此种形式向后人表达他的坚持和自信吗？有待通识。

李延寿完成《南史》《北史》的时间大概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前代史》："其年（显庆四年），符玺郎李延寿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

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南、北史，上自制序。”刘知几也记此书完成于显庆中，向前回溯16年是贞观十七年，这是他撰写的起始时间。实际上，编撰工作早在贞观五年就开始了，李延寿《自序》记：“（贞观五年）从官蜀中，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所阙，未得及终……（贞观十五年）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贞观十七年）因此遍得披寻。”说明修撰二史的资料搜集工作从贞观五年（631）到十七年，一直在进行，只是到了贞观十七年，修史所需资料更为方便后，才开始全面修撰。从贞观五年到显庆四年，前后共用28年，这还没有计算其父李大师接近两年的工作。而从显庆四年到调露元年得到认可又经过20余年，可见私家修史工作之艰巨。



《南史》《北史》书影

《北史》的记事，“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从386年到617年，只有232年，并非244年，编成《北史》100卷。《南史》的记事，“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从420年到589年，共170年，编成《南史》80卷。瞿林东在综合宋代

和清代诸学者对《南史》《北史》的分析认识后，充分肯定了二史的学术价值，尤其他认为李延寿著《南史》《北史》在体例上采用了纪传体，改变了他父亲打算作编年体的计划，但是，在著述宗旨上，他完全承继了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对此，谢保成认为李延寿改用纪传体，未能把南北集于一书，是对其父思想的偏离，父子异趣。何德章则认为“南北二史承认南北分裂，而不强调谁顺谁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南史》《北史》有鲜明的正统观，以北魏、北周、隋为正统，以宋、齐、梁、陈及东魏、北齐为偏据。《南史》《北史》所引发的争议历来就纷纭不已，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二史的研究价值是无可争议的。

四、影响与启示

唐代设立史馆，定期搜集当代史料和编修前代史，使得后代修撰前朝史逐渐形成优良传统。虽说官修史书需要克服虚美隐恶、曲笔回护、众手修书参差不齐等缺点，但国家修史也有史料来源充分、编撰人员精干、档案保管和修史制度严密等优点。史馆制度为唐以后历朝历代所继承，纪传体史书也成为正史，与其他类型史料相比独享尊崇。

编修史书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现实负责，更是对将来负责。从历史的角度看，编修史书是继承史学优秀传统的要求，希罗多德认为历史能让人类之功业不被遗忘，先人之丰功伟绩不失去光彩。恰与汉代司马迁之“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之观点不谋而合。从现实的角度看，修撰历史是认识国情的开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就是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基础上才完成了《资治通鉴》之名篇。从将来的角度看，孔子早就有“述往事，思来者”之名句，正是最精辟的概括，司马迁对此有所引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从事史学最根本的任务，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今日史学的核心价值可以体现对史学的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等方面义无反顾的追求。

（撰稿人　贾志刚）

隋唐时期的两大地理名志

在我国古代汗牛充栋的史学著作中，地理学占着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在二十四史里，除《史记》等少数外，都设有《地理志》，足见地理学是人类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学科。但在正史中存在的地理志仅仅作为一个附属部分，大多比较简括。而唐以前独立成书的地理学专著数量较少，且以专门领域为内容。如《水经》和《水经注》，就仅仅以水流为阐释对象，与人们要求了解全面的地理状貌、行政设置和各地详情的愿望差距甚远。

唐王朝建立之后，这一情况有了显著的改观。唐帝国的逐渐强大、与邻近民族、国家的交往的日趋频繁、水陆交通的发达、对外关系的密切以及唐代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风尚和追求，都迫切地需要获得十分广泛而系统的地理知识与新的地理观念。于是唐代的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和其他学科一样，在经济高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出现了空前的兴盛与繁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唐人的众多地理著作已不复留存了。现存价值最高的唐代地理著作当属《元和郡县图志》和《两京新记》。



一、最早最完备的地方总志——《元和郡县图志》

《元和郡县图志》又名《元和郡县图》，作者为唐代名相李吉甫，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次年又有增补。原书 40 卷，另有目录 2 卷，总 42 卷。它以贞观十三年（639）规划的十道为纲领，配合当时的四十七镇，每镇一图一志，分镇记载府、州与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四至八到的方里，开元、元和的贡赋，以及沿革、山川、盐铁、垦田、军事设施、兵马配备等。图的部分，在北宋时已经亡佚了，而志的部分，在南宋淳熙三年（1176 年）首刻时已有缺佚，大体上还保持四十二卷之数，宋以后目录亡佚，又缺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卷，今天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十四卷了。

《元和郡县图志》的问世虽是作者出于政治目的和现实功利的考量，但也是唐代疆土广大的集中反映。在此书的自序中称：“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

为切也”，认为山川险易之地与国家之安危息息相关，将志书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就本书而言是为“王者建州域，物土疆，观次于星躔，察法于地理……辨方经野，因人纬俗”服务的，要使此书具有“辨州域之疆理，时获省阅，或裨聪明”之功效，从而实现“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的价值取向。

那么这样一本书为什么一直备受推崇并被认为是唐代志书的最高水平呢？这是因为在魏晋以来的总志中，《元和郡县图志》不仅是流传下来最古的一部，同时从质量上看也是最为优秀的一部，价值最高、资料最丰富、记述最广泛。

首先，《元和郡县图志》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地方总志，我国历代官方都对地方志及其编修十分重视，其数量也很多，约占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不过，唐代以前的地方志则存者寥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68 中如是说：“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今录以冠地理总志之首”，将《元和郡县图志》冠以地理总志之首。

其次，从内容上看，翔实丰富、全面可靠。尽管唐宪宗时黄河南北有五十多个州被藩镇所割据，川西也沦于吐蕃，而《元和郡县图志》中仍以“十道”分篇，在援引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各个地方古今地理称谓的变异，勾勒出其历史变迁、行政建置与重大战争的大体轮廓，并表达出了独到见解。“四至八到”将各个地方的具体面积、全国的坐标位置、邻近的重要州郡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清楚表述，贡赋、山川、名胜古迹、风物特产都在其记述之列。《元和郡县图志》对于人们了解当时全国形势、各地沿革变迁、户口变动、物产分布、交通状况以及相关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李吉甫本身史地知识渊博，著述颇丰，又系当朝宰相，不少资料都是他亲知、亲闻、亲历的，资料更加真实可靠有依据。

再次，从体例上看，《元和郡县图志》受到初唐李泰《括地志》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括地志》，如四至八到为其最早使用。此书的结构框架与宝贵经验为后来的《太平寰宇记》等书摄取和吸收。

最后，《元和郡县图志》所体现的地方志编纂思想对后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该志原序中，李吉甫历陈各家地理书之弊端，指出“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并且“写丘壤山川，于攻守利害皆略而不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吉甫是反对当时地方志编修中重古轻今、传疑失实的做法的，说明了此书略古重今、重纪实的编纂思想。在地方志编纂中，如何处理好古与今、详与略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略古而详今既能保证

资料的丰富性，又有利于实现真实可靠。“详今略古”之后渐次成为编修地方志的传统和基本原则了。

此书以经世致用为导向，对当时的兵要厄塞和军事攻守利害也一一载明，为当朝皇帝宪宗削藩镇提供了极为方便实用的依据。这是与其编纂的初衷和目的相一致的，表明此书既有其地理价值，在巩固中央中也发挥其作用。向后来的地方志编著者提出了另一编著思想——经世致用。

总之，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在中国古代地理学著作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承前，因它是对前代地理学著作的继承和发展；言其启后，则是从其价值和影响而论。它翔实、丰富、可靠的内容历来为人所推崇；它“略古详今”、“经世致用”的编纂思想，为后来编著者所继承和发扬；它所开创的体例，直到现代地理学兴起之前始终是历代地理学著作所遵循的典范。

二、古代城市文献中的划时代著述——《两京新记》

都城既是一个政权、一个王朝的象征，又是社会、文化关系的起点。因此，都城制度成为历代文人学者记述的中心。就唐朝而言，都城制度发展到了集大成阶段，承继自隋的唐代长安、洛阳两京，在天宝以前，由于统治阶级在两地之间往来不断，两地经济、人文都盛极一时。这两座城市的坊里、宅第、风俗、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情状，都十分值得探寻。在这文人聚集的两京之地，著述当然较他地丰富许多。在有关两京的现存史料中，有一部不可忽视的著作，这就是《两京新记》。



《两京新记》又名《东西京记》，唐人韦述于开元十年（722）撰成，共五卷。为我们提供了长安、洛阳都市生活的生动画卷，是详细记载隋唐长安与洛阳的重要著作，为历代研究隋唐两京者所重视。全书现已不可见，仅存第三卷残文，是日本镰仓时代抄写的尊经阁卷子本。据日本学者福山敏男推测，原书内容为：卷 1 京师总说及宫城、禁苑、皇城；卷 2 京城总说及万年县所领诸坊；卷 3 长安县所领诸坊；卷 4 东都总说及宫城、皇城、东城及诸坊；卷 5 诸坊。现存卷 3 残文以京城西半部长安县所领 50 坊和西市为主要内容，卷首残去五坊即朱雀街西最北的五坊，记载了长安的街坊、官舍、府宅、园林位置、建置过程及时人掌故，记寺观尤详。现有辛德勇先生的新辑本《两京新记辑校》于 2006 年 1 月由三秦出版社作为“长安史迹丛刊”之一种出版，由《两京新记》残第三卷和诸书所引佚文辑录而成，包括《玉海》《兴地记胜》《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 27 部书。另外在《建康实录》中，亦有《两京新记》佚文两处：一处记载了西京的光福坊大兴寺；一处为东京景安坊的内容。

唐朝史学家韦述撰述的《两京新记》一书，是中国古代城市文献编著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述，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最早城市状况的历史典籍可以追溯到《国朝》和《宫宅地形》，均为建筑都城和宫室位置选择等技术方法的书籍。之后《考工记》的“匠人建国”和“匠人营国”两部分内容，分别讲述了建设城邑时确定方位的方法和城邑布局形式。东汉末至曹魏期间出现的《三辅黄图》是转折时期的标志性著述，之后《洛阳伽蓝记》和其类似，以记述帝王或神祇等上层建筑为主，很少涉及普通居民的居住空间。

进入隋唐出现了大量偏重于记述东都洛阳的著作。《两京新记》在继承魏晋以来传统的基础上，第一次依照长安城的整个城市的平面布局状况，系统记录了大量官员和商人等城市居民的住宅以及相关史实，向人们展示了一座城市的整体面貌，而不再是只有帝王和神祇，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开元时期长安的坊市间巷的盛况，而且开启了后世撰述与研究唐代两京的风气。城市文献的编述，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而《两京新记》在有关唐代两京的文献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可谓是汉唐时期有关长安、洛阳著述的集大成之作。自宋至清，市民的生活空间成为城市文献的主要内容。

《两京新记》的体例更加完整、有条理。其体例大致是先叙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的建置，外廓城则以坊、署、寺、祠、观为纲，正文顶格，系用大字书写；复为子注，为双行小字，详为阐释；而每街的坊的总数又低两格来写。于是乎隋至唐开元百余年间两京建置之废置、迁徙乃至政治、社会变动等内容，尽在其中。这种叙述体例，比《洛阳伽蓝记》更有条理，对以后关于两京的著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敏求的《长安志》、《河南志》、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悉遵此例。今人的许多研究也以此体例为纲。

就内容而言，《两京新记》不单记述地理沿革、城市建制的兴废变迁，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以及掌故传闻也囊括其中。不仅记述了唐代城内的建筑实体，同时也记述了社会各阶层的秘闻佚事，以及民间的习俗，旁及中西文化、物产的交流。相关记载中，有不少采自隋唐小说。包含这一部分内容的韦述原著，要比后世单纯标记空间的实体建筑、宅第的增损、寺观的兴废要生动曲折得多，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三、影响和借鉴

地理名志《元和郡县图志》和《两京新记》的出现是唐代地志学热的重要体现，地志学的发展是适应大一统政治局面和商旅频繁往来的需要，是一大批关注国家命运与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脚踏实地的结果。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与艰巨劳动下，众多地理学专著问世，极大地活跃了唐人的思想，开阔了唐人的眼界，推动了唐人大规模的经济贸易和对外交往以及政治、军事方面的进取、开拓。

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既是唐代地理学专著的集大成之作，亦是唐代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思想的实际行动，更是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资鉴思潮的产物。而韦述的《两京新记》则是汉唐时期有关长安、洛阳著述的经典之作，在中国古代城市文献编著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将芸芸众生的生活空间作为其两京城市著述的主要内容，成为纪录城市发展史的里程碑。

时至今日，社会现实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地理志所提供的自然环境、土地资源、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重要历史数据和资料，一是对社会、文化研究者来说，它是一个地域、一个国家全面系统的纪录，为了解历史上的当地情况，科学地认识和把握当地情况，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从而制定当地发展计划提供了依据。

二是就一个地域、一个国家而言，文化和传统因素往往是宣传的重要内容，既有利于保留传统文化、增强当地人的自豪感，也为扩大当地影响、创造当地声誉和知名度提供了条件。在这一方面，地理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诸多传统的因素本身就是地志的记载内容。

三是在经济寻求发展的今天，新的发展元素的发掘成为共识，而在这其中，各种各样的传统和特色成为经济发展的生长点，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此，各地均在记载当地情况的书籍中不断努力寻找传统、寻找新的经济发展“亮点”，而无所不包的地理志就成为激活经济的宝库，从中可以找到过去的建筑形态、过去的坊市传统、过去的居民生活状况，进而凝聚成特色，为区域文化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腾飞插上翅膀。

（撰稿人　李　华）



隋唐宗教中心与寺观文化

隋唐时期，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对外交流密切，文化兼容并纳都为宗教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宗教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积淀的必然结果。这一阶段，佛教系统的教义、教规逐步建立，主要宗派形成，寺院经济迅速膨胀，佛教中国化程度不断加深。道教进一步理论化，开始糅合儒家思想并吸收佛教义理，并依托强有力的统治背景向统治阶层渗透。宗教的命运与国家经济水平息息相关，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长安，宗教核心地位毋庸置疑。

一、“佛都”长安

陕西是佛教在中国内地传播的首站，早在公元前2年，来自西域大月氏的使者伊存，在长安向博士弟子景卢口传授《浮屠经》，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同时也是三秦大地——陕西成为佛教第二故乡的起点。两晋南北朝时期，陕西作为北方的佛教中心得以后来居上并迅猛发展。隋唐时代，长安以其政治文化的首善地位，加上统治者的极力扶持，成为了中国佛教人才汇聚，名著翻译，宗派创立，佛法广传和文化交流的五大中心。期间，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并向外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

随着西北佛教文化重心的转移，隋代西北地区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有三大变化，一是佛教寺院向关中各地扩展，二是佛教寺院由都市走向大山，三是长安的佛教寺院猛增，数量庞大。根据宋敏求的《长安志》记载，大业初年，隋大兴城（今陕西西安）有120所寺院。《长安志》所引韦述《两京新记》云，唐长安城有佛寺92所（僧寺64所，尼寺28所），《长安志》载记长安城佛寺104所（其中僧寺76所，尼寺28所），较之前者，应是天宝以后新增的佛寺。清人徐松在前者基础上撰城的《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城坊考佛寺107所（僧寺79所，尼寺28所）。

唐长安城的寺庙不仅数量众多，且规模宏大。慈恩寺初建时，“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西明寺“廊殿楼台，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目晖暇。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万寿寺“殿

宇廊庑，方丈山门，共一百九十七间，左右院林二所”。据考古实测推算，太平坊内寺的实际面积约为50 000平方米。大兴善寺尽占靖善坊一坊之地，面积约261 082平方米。大慈恩寺占去晋昌坊一半，面积约265 720平方米。”隋唐长安寺院林立，规模宏大，光被远迩，四方学侣，向风而靡，缁门俊秀，归者如云。释门英达，高建法幢，翻译经典，讲习经论，钻仰经宗。译经大师玄奘、义净、不空等一大批高僧在长安从事佛经翻译，慈恩寺、兴善寺、西明寺号称三大译业中心。慧远、昙延、道洪、灵润、吉藏、智炬、昙迁、慧藏、端甫等一大批智海明珠云集长安，师匠百数，结聚法筵，击论讲习《涅槃经》《法华经》《华严经》《摄大乘论》《唯识论》《俱舍论》等佛教经典，讲导著述，名道日新，缁素钦揖，四海英髦，风趋波委，道学如林，义筵如市，义学高于风云。长安都会，朝宗所依，影响所及，终南山和关中平原的雍州、岐州、华州、同州、坊州、邠州等地，大法广弘，璨然可观。此外，还有盛极一时的西行求法之运动，义净三藏作《大唐求法高僧传》仅就一己之见，时限太宗，高宗，天后三朝，所记已有六十人，义净自谓“西去者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则其湮灭未彰不知凡几，而求法之盛概可知已。

关中不仅是西北译经之重镇，亦是会通佛学之要所，还是全国佛学之研究中心，因此隋唐佛教宗派大多发源关中，并以其为基点传扬开来。三论宗、唯识宗和东塔律宗开创于长安，三阶教、华严宗和南山律宗形成于终南山。扶风法门寺是唐代的皇家寺院，其地宫出土的1000多件珍贵文物，囊括10个“世界之最”，其中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是当今佛教界的最高圣物。唐代，樊川寺院密集，尤以“八大寺”（兴教，兴国，华严，牛头，观音，云栖，禅定，法幢）为代表，位于少陵原上的兴教寺亦因玄奘大师舍利塔而闻名于世。户县香积寺是中国净土宗发源地，被日本净土宗奉为祖庭，祖师善导大师在此弘扬净土法门，得到高宗崇仰。寺院在当时占地300亩，建有12个院落，有“骑马关山门”的传说。建于东晋后秦的草堂寺，是三论宗祖庭，隋代译经集大成者印度高僧阇那崛多曾在那里住了15年，并翻译了300多卷佛教经典，大业年间，李渊曾为儿子李世民的疾病在此祈福做佛事，可见其影响之大。始建于西晋的遵善寺在隋时进行扩建并改名为“大兴善寺”，“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金刚曾在此住持20多年，使得大兴善寺成为传扬密宗的中心，奠定了其元祖地位。乐游原上的青龙寺不仅是唐代密宗的重要场所，对日本佛教也影响颇深，“三朝大德”惠果法师曾在此住持寺物，著名的入唐八家，其中六位（空海，圆行，元仁，惠运，圆珍，宗睿）均先后在青龙寺受法。敬业寺初创于隋，盛于唐，道宣律师在此潜心著述，宏宣律学，创立了中国佛教中最为清苦严格的律宗。隋唐时期，佛教极度兴盛，后引发了唐武宗会昌年间的大规模灭佛运动。会昌二年（842）至会昌五年（845），唐武宗多次勒令天下僧尼还俗，下诏拆毁天



下寺院、兰若，下令检括天下寺舍奴婢及财物。后拆除大小寺院 4600 余所，毁废招提、兰若 4 万余所，还俗僧尼 26 万余人，收奴婢为两税户150 000人。此后，以长安为首的关中佛教元气大伤，自此一蹶不振。尽管汉传佛教在西北地区仍继续流传，但总体上每况愈下，日趋衰落。



法门寺

宗教文化重心的形成和演变，是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宗教的传播需要一定的“土壤”和“气候”，其发展又与政治、文化等背景相关联。其中，民族分布、人口迁徙等因素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关中成为隋唐西北佛教文化中心固然与其地处中西交通之要冲有关，更为重要的是长期分裂到统一政治局面直接作用的结果，并仰赖于隋唐帝王的积极扶植，即利用佛教信仰来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研究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其特点，将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佛教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以及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概貌，具有重要意义。

二、宗教消费文化

隋唐时期宗教的蓬勃发展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之上，而空前活跃的宗教活动本身又是一种消费行为。寺院经济的高度发达是佛教宗派形成的经济基础，宗教消费是隋唐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兴建寺观、开窟造像、法会斋醮、炼丹服食及僧道衣食等。从性质上看，这是一种非生产性消费，具有较强寄生性，资金来源主要是官方供给、信徒布施和寺观田产。

兴修寺院、营建道观是宗教消费里的大宗。根据杜光庭的《历代崇道记》记载，开

皇三年（583），隋文帝在首都大兴城建造道观 36 所。后隋炀帝迁都洛阳，在洛阳造观 24 所。隋大兴城禅定寺“架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阎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隋代二君在位 37 年，全国共有佛教寺院 3985 所。李唐王朝自认为是老子后代，一度将道教定为国教，崇道尤以玄宗为甚，开元年间，天下道观一度达到 1687 所，尚不包括私立道观。唐长安回元观“堂皇三重，皆像宫中小殿，房廊窈窕，绮疏诘屈，无不穷极精妙”，东明观“长廊广殿，图画雕刻，道家馆舍，无以为比”。佛教寺院的兴建与道教宫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唐一代，太宗时有寺 3716 所，高宗时有寺 4000 余所，玄宗时有寺 5358 所，武宗时毁寺 4600 所，这还不算民间大大小小的招提、兰若等寺。

隋唐时期，佛教的石窟造像不可计数，耗资难以估算。今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等主要开凿于隋唐时期。甘肃安西榆林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并非创建于隋唐，但在隋唐时期仍继续开凿。开窟是为了修行，修行必须礼佛，礼佛就要造像，不止石窟，隋唐时期大小寺院的殿堂、甚至平民百姓的家中率皆铸佛供养。衍生了一度异常繁荣的佛像铸造业。武周时期，薛怀义在洛阳造功德堂，其中大像高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数十人并坐。”唐玄宗开元年间，沙门海通于嘉州大江之滨凿石为弥勒佛像，高达 360 尺。唐代宗朝宰相常衮以为“诸祠寺写经造像，焚币埋玉，所以赏赉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岁巨万计。”

佛教徒平日做法事，寺院在重大节日举行盛大法会，隋唐佛教法会极为奢丽。武周时期，僧怀义“每作无遮会，用钱万缗，士女云集，又散钱十车，使之争拾，相蹈践有死者。”唐代宗于七月十五日在内道场造盂兰盆，所费百万。法会期间，佛教寺院往往大开斋筵，施饭食于成千上万的僧尼。佛教有斋僧之法会，道教有斋醮之法事，名目繁多。开元十年（722），唐玄宗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庙一所，每年依道法斋醮。元和八年（813），唐宪宗以庄宅钱 50 万、杂谷 1000 石充作长安兴唐观斋醮之费。

隋唐时期的宗教消费，除了各种宗教场所的建设和宗教活动的举行，各类教徒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史载，隋文帝在位凡度僧尼 23 万人，隋炀帝时期度僧尼 16 200人。唐玄宗开元年间，天下有僧尼126 100人，当时全国道士约有43 214到69 948人左右，这只是官方统计在册的教徒人数，尚不含脱籍的僧尼、道士、女冠等。可以说唐武宗时期灭佛，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

佛、道等宗教在中国的发展，长期依赖于统治者的支持，官方供给是隋唐宗教消费的重要经济来源。大型宗教场所的建设多属政府行为，除了出资兴建寺观，还大量赏赐钱物供养僧尼道士。唐玄宗诏令：“其天下有洞、宫、山各置坛祠宇，每处度道士五人，并取近山三十户蠲免租税差科，永供洒扫。”以田产为主的寺院产业来源，也是朝廷敕

赐。唐代，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唐高宗赐西明寺“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 50 辆、绢布 2000 匹。此外，译经费用与宗教节日活动费用也常常由政府出资。

但凡宗教都有大量忠实信徒，上至达官贵戚，下到平民百姓，善男信女们源源不断的财布是宗教消费的又一来源。“贞观之后，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供天下伽蓝修理。藏内所供，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每日所出，亦不胜数。”无数信徒的慷慨施舍，不仅保障了教徒的日常生活，还为诸多宗教活动提供经济支援。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迎奉法门寺佛骨舍利，“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不仅官员百姓竭力布施，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也布施无度。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恃宠骄横，施财所营安乐佛寺，拟于宫掖。洛州昭成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汇聚众宝，“用钱三万，府库之物，尽于是矣。”官僚豪富的捐献，或是自带田产设置兰若，召集僧徒，耕种土地，或是将自身所有田产，变相转移至寺院名下。此外还大量施钱修复经书。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诏令修复北周武帝所毁废像遗经，文帝和后妃各施绢 12 万匹，王公以下爰至黔黎施钱百万，“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隋唐寺观广占良田，凡京畿丰田美利，多归寺观，吏不能制。对此，唐睿宗曾下诏：“依照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并令司农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唐武宗灭佛，没收寺院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 15 万人。隋唐寺院广占良田，又拥有奴婢。寺院奴婢（僧祇户、佛图户）或营田输粟，或酿酒制茶，或冶炼加工，他们的劳动收获都归寺院所有，且有免税免役的特权。杭州灵隐山释道标“置田亩，岁收万斛，置无尽财，与众共之。”部分寺观还从事借贷、邸店、碾硙等行当，收入颇丰。茅山紫阳观即于“便近县置一库收质，每月纳息充常住。”隋唐富寺不断与民争利，以致唐武宗委派功德使到各地巡察，并规定富寺邸店“计料供常住外，剩者便勤货卖，不得广占求利、侵夺疲人。”敦煌大寺院的主要收入之一来自碾硙提供，净土寺硙课的收入相当于其粮食收入的三分之一。

大小不一，耗资不等的宗教消费贯穿隋唐社会始终。作为文化消费的重要方面，宗教消费客观上丰富了隋唐文化的内容，尤其是寺庙艺术的发展，但也极大地耗费了隋唐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宗教文化的兴衰也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国力的此消彼长，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缩影。

三、影响与借鉴

宗教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现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宗教在历史、哲学、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领域都留下了巨大遗产，是人类重要的精神财富。隋唐时期的宗教，在思想方面独树一帜，在组织方面自立门户，在经济上空前繁荣，在政治上影响显著。陕西宗教曾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推动了中国宗教的整体发展，丰富了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也为中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以陕西宗教为核心的隋唐宗教作为各民族的共同信仰，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团结和进步，也促进了国家统一、稳定和发展，增强了中国和周边国家人民的了解、友谊与和谐，在文化的传承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代长安作为当时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同时又是宗教活动中心，寺院文化空前繁荣。寺观除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之外，更发挥出一般社会文化功能，得到各阶层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大大拓展了影响范围，增加了寺观文化的生命力。隋唐宗教消费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更是艺术领域的延展，囊括了人们多彩的社会生活。陕西的历史文化景观十分丰富，宗教文化景观尤为得天独厚。家喻户晓的大慈恩寺、法门寺、大兴善寺、香积寺、楼观台等宗教名胜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璀璨夺目的寺观塔碑、精巧绝伦的石窟造像遍布各地，独特的寺观文化引人瞩目。

深入发掘、整理陕西宗教文化遗产的内涵和价值，并与当代陕西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发挥其在推动经济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是新时期宗教发展的重要命题，也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挑战。丰富多彩的寺观文化资源，可以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并增强国际交流往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有效发挥宗教文化的强有力作用，使其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构建和谐陕西的精神辅助，宗教文化的地位十分重要，寺观不仅是传统宗教文化的体现，也是民族自信心和荣誉感的源泉，更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旗手。借助宣传推介活动将千年古刹建设成为集休闲旅游、社会活动、省情教育、学术研讨、餐饮娱乐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朝阳产业，凸显地域特色和思想文化，时不我待。

（撰稿人　汤　洁）

隋唐宫廷藏书制度

隋唐藏书之风极其浓厚，藏书既是治学读书的一个条件，也是其必然结果，隋唐藏书问题已经引起学界关注。如曹之先生根据大量史籍记载，考证出唐代63位藏书家，此后范凤书、牛红亮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了隋唐五代的私家藏书情况，借此可了解隋唐五代私家藏书的社会环境。针对隋唐官府藏书的成绩与新动向，学界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甚至对隋唐佛寺藏书也有学者予以关注；特别是对于隋唐目录学理论的思想和成就尤其值得一提。据此我们可以知晓隋唐官府图书收藏、整理以及所发挥的社会作用，但隋唐时期宫廷藏书的相关问题却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特别是不少文章把隋唐宫廷藏书和官府藏书混为一谈，对其关系未加界定，以及宫廷藏书的性质和相关管理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故本文将在这些方面稍作申述，希望得到同好的教正。

一、隋代宫廷藏书

隋代虽然短暂，却极为重视藏书的积累，据牛弘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上书请开献书之路一文，提及隋初藏书现状："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隋朝继承北周、北齐的藏书，但典籍遗逸，残缺犹多，总藏书量可达4万余卷，除去重复者外，只有15 000卷，还遭遇残缺不全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隋朝政府发出献书之诏，"献书一卷，赍缣一匹。"史言此诏效果明显，由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

此后在平定陈朝后，又继承陈朝的旧藏图书。不仅献书之诏发挥作用，平陈新获书籍也成为隋朝图书总量增加的又一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隋统治者在宫廷之中收藏大量书籍，宫廷成为公私藏书中最齐全、最完整的藏书地。

唐人李林甫于《唐六典》注文曰："隋平陈之后，写书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

余以实秘书外阁。炀帝于东都置观文殿，东、西厢贮书。”此处所言二事，一是隋平陈后将其书写成正、副本藏于宫廷中，但此次收藏多少本未言；二是隋炀帝在东都修观文殿作为宫廷藏书殿。对于第一件事，《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记得稍详，可以补充藏书数目，“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据此可知，此次整理是在陈朝古本的基础上，另写正、副二本，共3万多卷。第二件事，上引《隋书·经籍志》记：“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此内道场所藏之佛经道经数量，在《隋书·经籍志四》中有记载，“右道、佛经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此处统计之道经佛经可能只是内道场中的收藏，约有7414卷、2329部，此数可能就是宫廷内道场收藏佛经道经的总数。据此可知，隋炀帝东都宫廷藏书分为三类：四部书、古迹名画和道经佛经。其中四部书藏于观文殿之东、西厢，各写50副本，分三品；古迹名画藏于观文殿后“妙楷台”和“宝迹台”二台；道经、佛经藏于宫中内道场，并编有目录。

事实上，隋代宫廷藏书多于秘书省的原因可能与杨广个人喜好文学的性格分不开，他即位之前就有藏书之爱好，即位之后，又将此种爱好带到宫廷之内。《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总叙：“（隋炀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捕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卷。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杨广即位之前收藏到的各类书籍达31部，17 000余卷。即位之后，又将隋代宫廷藏书分藏东、西二京，西京藏于嘉则殿，约有37万卷，但多重复者，经柳顾言整理后，得正御本37 000卷。东京藏于观文殿，其藏书量因史籍未加确言，已不得而知。因为当时国家藏书是在37 000卷的基础上各写50副本，所以不计重复不会超过3.7万卷，计重复则其总量相当可观。不管怎样，隋代多写复本、副本的藏书措施，客观上有利于藏书的保存和流传。对于东京宫廷藏书点前引各书多记为观文殿，而《元河南志》注文曰：“（修文）殿内藏正御本书。”却记载东京正御本书藏在修文殿，应当为观文殿（详下）。

此外，观文殿藏书之环境更值得一提，“其正御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标。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

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观文殿藏书室分东、西厢，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所藏之书称正御书，装帧精美。马端临记观文殿前读书室分为十四间，与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记相同，但《太平广记》所引之《大业拾遗记》所载观文殿藏书室数与此稍有不同：“隋炀帝令造观文殿，前两厢为书堂，各十二间，堂前通为阁承殿，每一间十二宝厨，前设方五香重床，亦装以金玉，春夏铺九曲象簟，秋设凤绫花褥，冬则加绵装须弥毡。帝幸书堂，或观书。其十二间内，南北通为闪电窗，零笼相望，雕刻之工，穷奇极之妙，金铺玉题，绮井华榱，辉映溢目。每三间开一方户，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当户地口施机，舆驾将至，则有宫人擎香炉，在舆前行。去户一丈，脚践机发，仙人乃下阁，捧幔而升，阁扇即开，书厨亦启，若自然，皆一机之力。舆驾出，垂闭复常。诸房入户，式样如一。”据此知观文殿书堂东、西两厢共24间，与前引《文献通考》所记之14间稍有不同，俟考。

除了宫廷藏书的环境优雅豪华之外，宫廷藏书之保存条件也无与伦比，《河南志》记十二宝厨，“厨中皆江南晋、宋、齐、梁古书”。南朝古书收藏在宝厨中，四部书收藏在殿前书堂中，古迹书画又藏于殿后二台内，分类收藏和分部收藏相结合，显示宫廷藏书的又一特色。

前揭诸书记观文殿藏书时，对殿后二台之收藏功能多言之不详，只是约略提及二台之名为“妙楷”和“宝迹”，是宫廷中收藏书画的主要设施。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记：“陈天嘉中，陈主肆意搜求，所得不少，及隋平陈，命元帅记室参军裴矩、高颎收之，得八百余卷。隋帝于东京观文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自古法书，西曰‘宝迹台’，收自古名画。炀帝东幸扬州，尽将随驾，中道船覆，大半沦弃。炀帝崩，并归宇文化及，化及至聊城，为窦建德所取。留东都者，为王世充所取。圣唐武德五年，克平僭逆，擒二伪主。两都秘藏之迹，维扬扈从之珍，归我国家焉。”知东都观文殿后二台所藏之法书古画总数约有800多卷，隋末唐初，除大半遭覆船之灾外，其余经王世充、窦建德而归唐朝所有，又遭遇由洛阳运往长安途中沉覆之灾，这部分书是存是亡引起不小的争议。

随着隋朝灭亡，洛阳宫廷所藏之书被王世充占有，唐朝平定王世充后，用船向长安运送途中，不仅法书古画多半随船沉没，宫廷所藏其余典籍也在其中，“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隋代图书经隋末战乱后损失惨重，此言唐初留存有89 666卷，是东、西二都劫后余生之总量。东都宫廷藏书经王世充后归唐政府，运输途中出现沉船漂没事故，有多少幸存，难以确言。此处记

所存十不一二，却不记具体数字，检其他史籍记载，如《新唐书·艺文志》记："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底柱舟覆，尽亡其书。"由此得知，隋代宫廷所藏书籍以西京嘉则殿为最多，可达37万卷之多，但经战乱后才余8万多卷。隋东都观文殿和殿后二台之藏书量也很大，惜经王世充割据后，才剩8千多卷。对这部分书籍的命运，上揭史料记载不一，前条记司农少卿宋遵贵，后条却记太府卿宋遵贵，任职有差异；而对于所运之书，或记尽亡其书，或记十存一二，何者为确，难以断定。再检《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记："乃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泝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忽遭湮没，所存十亡一二。"张彦远自注曰："国初，内库只有三百卷，并隋朝以前相承御府所宝。"张彦远只从古画法书的角度记录此事，认为所存十无（亡）一二，他还特别提及唐初内库藏古画法书之数量仅剩300卷，证明此次运书事故并非是尽亡其书。而未知名《大业拾遗》所言："武德四年，东都平后，观文殿宝厨新书八千许卷将载还京师……乃于陕州下书，著大船中，欲载往京师，于河值风覆没，一卷无遗。"由唐初保存在内库之300卷书画古迹而知，此处"八千卷观文殿书一卷无遗"之说法明显有记载失实的嫌疑。

随着宫廷藏书制度的成熟，隋代藏书的最高纪录也出现了，"大凡经传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五万多卷的藏书量足以证明隋代文化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是藏书机构更加完善的结果。就连五代后晋史官也无不称赞，"及隋氏建邦，寰宇一统，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但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隋末战乱又让公私藏书面临存亡绝续的极大考验。动荡之中，隋代藏书不仅在数量上散佚严重，而且在种类上也一落千丈，据《隋书·经籍志四》记："凡四部经传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注文曰："通计亡书合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七卷。"唐代修《隋书·经籍志》时，四部书可考者有4191部、49 467卷，但只有3127部、36 708卷有书，亡佚者达到1064部、12 759卷。这虽说不只是宫廷藏书的损失，当然包括宫廷藏书在内。



由以上分析可知，隋代国家藏书量逐渐增多，由隋初的15 000卷，到开献书之诏和平陈后，发展到37 000卷，再到后来，增加到56 881卷之多。盛极而衰，战乱又让隋朝二帝之图书经营成果付之水流，特别是宫廷藏书，更是如此。隋代两京宫廷藏书经隋末战乱后所剩不多，西京长安嘉则殿藏书由原来的37万卷（包括重复者），至唐初才有8万余卷。东京观文殿四部书和佛经道经由原来的37 000余卷，经王世充乱后才余8000余卷，再经运书船沉没事故后，所存十不一二。而观文殿后二台所藏之古画法书由原来的800多卷，经乱后才剩下300多卷。由此看来，隋亡唐兴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使隋代公私藏书

经历了一次书厄，对隋代宫廷藏书更是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二、唐代宫廷藏书

唐朝建立后，不仅继承隋朝所留下来的图书，而且还继承隋朝的图书收藏制度，既有秘书省等专职机构管理图书，又保留宫廷藏书的习惯，某种程度上讲，宫廷藏书仍然是唐代图书的特藏，进而又出现了所谓的御本、御书之说。事实上，御本、御书在隋代就多有使用，隋人称“御书单本”，或称“正御本”，或称“正御书”，或称“御府所宝”，或称“宝厨新书”，等等不一而足，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固定含意。“御本”初意指装帧精美、抄写工整、用纸考究的书籍，后逐渐成为专为宫廷使用之御用图书，如东都观文殿“所藏之书称正御书，装帧精美”。还有“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很明显此处正御本意指经过学者精挑细选的、供皇宫专用之书。到了唐代，御本成为专门用词，如《唐六典》注文曰：“集贤所写，皆御本也。”集贤殿书院所写之书专供宫廷藏阅，“玄宗即位，大校群书。开元五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置校定官四人。七年，驾在东都，于丽正殿置修书使……十三年，与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因改名集贤，改修书使为集贤书院学士。其大明宫所置书院，本命妇院，屋宇宏敞。”不管是在乾元殿、丽正殿、集仙（贤）殿，还是大明宫集贤殿书院，都是为内库收藏而写的，均可称为御本。又《唐会要》卷六五《秘书省》载长庆三年（823），秘书少监李随奏，“当省请置秘书阁图书印一面。伏以当省御书正本，开元、天宝以前，并有小印印缝，自兵难以来，书印失坠，今所写经史，都无记验，伏请铸造。”李随所提到的御书正本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在开元、天宝之前以小印印缝，此后则加盖秘书阁图书印以示与其他图书的区别。

唐代图书收藏中，除了出现“御本”图书外，还流行正本、副本、贮本、异本之说。如崇文馆司经局洗马之职，“掌经、史、子、集四库图书刊缉之事，立定正本、副本、贮本，以备供进。凡天下之图书上于东宫者，皆受而藏之。”文学之职，“掌分知经籍，侍奉文章，总缉经籍，缮写装染之功，笔札给用之数，皆料度之”。校书、正字之职，“掌校理刊正经、史、子、集四库之书。”司经局为皇太子管理图书，缮写、刊正、收藏是其职责，而保管图书分成正本、副本、贮本的办法可能也是宫廷藏书的通则。

为了降低图书因灾散佚的危险而建立正副本之外的贮本制度，使得唐代宫廷御本藏书更加安全，也是宫廷藏书制度逐渐成熟的标志。同时，为了保证宫廷图书在不重复的情况下不断增加，唐代宫廷藏书还建立了异本采进制度。如唐玄宗采纳褚无量的建议，采进天下异本，“（褚）无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

校，以弘经籍之道。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纵观焉。开元六年驾还，又敕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此次异本的采集范围有多大?《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记：“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至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及四部书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此采进异本之建议取得了明显效果。

褚无量建议采访异本的范围是天下，实际上是借抄公卿士庶之家藏以丰富皇帝之宫藏。此次行动应该在西京长安发起，但为何却在东都乾元殿展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据《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一》总序：“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又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据此可知，最早宫廷藏书在西京长安，由宫人主掌，唐玄宗即位之前，只是实行购书、缮写的措施，但存在残缺错乱的情况。玄宗即位之后，针对宫廷内库藏书增加缓慢的问题，连续推出整比旧书，采集异本，创设书院，宰相学士共同管理的办法，显示唐政府对宫廷藏书的重视。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发现长安宫廷内库藏有大量图书，内库、东宫丽正殿、大明宫集贤书院等均属御本。洛阳宫廷也有大量藏书，乾元殿、东都集贤书院等也有御书，尤其乾元殿之新藏图书，更有令人骇异之处。



史言“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不计算重复者，新旧藏书共有82 384卷，远远超过隋代56 881卷的总数。如此丰富的藏书，绝非一朝一夕而成，尤其是禁中之图书，一直受到皇帝的重视。史言：“其中杂有梁陈、齐周及隋代古书，贞观、永徽、麟德、乾封、总章、咸亨年，奉诏缮写。”从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到唐高宗咸亨年间（670—673），大约四五十年间，抄写复制与征求同时并举，才有如此成绩。

此就唐代藏书之总量而言，如果从宫廷藏书的角度来看，唐代也可谓盛况空前，如唐玄宗时编纂之《唐六典》记：“今秘书、弘文、史馆、司经、崇文皆有之。”除秘书省之藏书属于国家藏书，不能算作宫廷藏书外，集贤院、弘文馆、司经局、崇文馆均有藏书，甚至史馆也可能有大量藏书，这些都应在宫廷藏书之列。

首先，集贤院分成大明宫集贤书院和东都集贤书院，长安大明宫集贤书院位于光顺门外，东都洛阳宫之集贤书院位于明福门外，二者之藏书均属于御本，“集贤所写，皆御

本也。书有四部：一曰甲，为经；二曰乙，为史；三曰景（丁，笔者按：避唐讳改），为子；四曰丁，为集。故分为四库，每库二人，知写书、出纳、名目、次序，以备检讨焉。四库之书，两京各二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最初，集贤所藏御本图书总量可达25 960卷之多，两京分藏，每处均按四库不同装帧以示区别，无论从纸质、缮写，还是装帧、保存，都可谓深藏精贮。同时，我们注意到西京、东都集贤院之藏书量约略相当，据唐人胡交《修洛阳宫记》：“开元之隆，銮舆时巡，诏命儒臣宋璟、马惟白等，博汇群书于乾元殿，又即明福门外置集贤书院，置学士员，校书其间，而藏书之富，殆与长安大明宫集贤书院等，不其盛欤!”胡交也参与其事，所记西京、东都二集贤书院之藏书量约略相等，或者就是前揭各写二本，然后分藏于二集贤院，但是，因为集贤书院只是执行同书分藏二处的制度，所以书籍种类并未增加。



书分四部

值得注意的是，集贤院御书由8人主掌，分工很细，有分管写书者，有分管编目者，还有分管排序者，更有分管借阅还授者。非常幸运的是，集贤殿书院最初主管的8人还有迹可查，《唐会要》卷三六《修撰》开元九年（721）条记：“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上《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藏之内府，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库是殷践猷、王恢编，史库韦述、余钦，子库毋照、刘彦直，集库王湾、刘仲，其序例韦述撰。”此二百卷《群书四部录》正是8位集贤学士编目之成果，同时此书所录之48 169卷，也是集贤殿书院当时藏书总量，较此前之二万多卷已

有大幅增加。随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虽目录缩为40卷，但总量却增加到51 852卷。此后，集贤殿书院藏书量还在不断增加，到开元十九年（731）：“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仅集贤殿书院之藏书就达到89 000卷，而四库分藏之书的总数只有80 080卷，可能存在数字传抄失误的问题。因为西京长安禁中之集贤藏书太过集中，所以又有官员提出分藏东都一部分，开元二十四年（736），“百司从官，皆令减省集贤书籍，三分留一，贮在东都，至天宝三载六月，四库更造见在库书目，经库七千七百七十六卷，史库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库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库一万五千七百二十卷。从三载至十四载，库续写又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三卷。”唐玄宗接受众官员的建议，留下54 672卷，正好是原来八万多卷的2/3，另外1/3分藏到东都集贤殿书院，可能出现部分书籍的分藏。由此可知，开元后期西京集贤书院藏书量超过了东都集贤书院，同时二者藏书的种类也由之前的同书分藏二处，开始出现有所侧重的专书专院收藏法。后来，天宝中，西京集贤书院又缮写16 843卷，加上原来的五万多卷，又达到71 515卷，更加加剧东、西京的宫廷集贤院藏书量的不平衡。

不仅如此，宫廷集贤院的藏书在管理制度方面也是逐渐完善、健全，《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一》总序：“（褚）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璟、苏颋同署，如贞观故事……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对于宫廷所藏之书，不仅在管理制度上由宰相负责，在出入人员的身份上也有所限制，特别是在保障御本书的更新上给予专门的政策，这些都显示了唐代宫廷藏书的特殊性。

其次，史馆藏书也在宫廷范围内。唐代史馆设在两京，以都城长安的史馆为主，但其位置前后多有变迁。史载：“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馆门下东西有枣树七十四株，无杂树。开元二十五年三月，右相李林甫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官宜附近，史官尹愔奏移史馆于中书省北，以旧尚药院充馆也。”此条所记唐前期史馆历史变迁之大概，即史馆的隶属关系变化与史馆馆址方位的变迁两方面。史馆隶属关系是，由早期秘书省著作局承担修史演变为史馆专掌国史，隶属于门下省；开元时期，又归属于中书省。史馆因隶属关系的变动，其馆址也多次改变，贞观三年（629），移入禁中，即长安太极宫城中门下

省之北；龙朔二年（662），大明宫建成后，又移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开元二十五年（737），李林甫授意史官尹愔奏迁史馆于中书省北，馆址又迁到原来的尚药院。但此后有无变迁，没有记载。至德二载（757），修史官于休烈奏报安史之乱给国家藏书带来的损失情况时，提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据此可知，兴庆宫也有史馆，并收藏大量的国史、实录、起居注等书，而这些书正是开元天宝时期史馆的工作成果，也属于宫廷藏书。不管安史乱前史官的工作地点是在兴庆宫史馆，还是在大明宫史馆，都属于宫廷范围。

再有，东都乾元殿、东都集贤殿和东都丽正殿，都属于宫廷修书、校书和藏书的重要地点。

还有，门下省弘文馆也是宫廷藏书之地，唐代西京太极宫内、大明宫内，以及东都宫城内都有弘文馆。如《唐会要》卷六四《宏文馆》记："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宏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其后移仗大明宫，其馆亦在门下省南。"宏文殿曾经聚书达 20 多万卷（包括重复），这成为宏文馆的藏书主体，褚遂良曾任馆主。到唐高宗仪凤中（676—678），"以（弘文）馆中多图籍，置详正学士校理。自垂拱以来，多大臣兼领，馆中有四部书。"弘文殿之藏书一度是所有藏书机构中最多的，但后来藏书量如何变化，不得而知。

另有，崇文馆学士也有管理图书之职责，学士"掌刊正经籍图书"。校书"掌校理四库书籍，正其讹谬。"说明崇文馆也有相应的藏书，其具体藏书量也不得而知。

最后，太子东宫司经局仍然是宫廷中的藏书机构之一，唐宪宗元和三年（808）诏："秘书省、宏文馆、崇文馆，太子春坊司经局、校书正字宜委吏部，自今以后，于平留选人中，加功访择，取志行贞退，艺学精通者注拟，综核才实，惟在得人，不须限以登科，及刊入等第，其校书、正字，限考入畿县尉簿，任依赏格。"将太子春坊司经局与其他藏书机构相提并论，显然也证明司经局也藏有御书，而校书、正字之职，正是此部门的管理人员。

安史之乱后，宫廷藏书也受到很大影响，如兵兴之后，集贤院图籍淆舛，蒋乂"料次逾年，各以部分，得善书二万卷。"出现增加两万卷的情况，也出现短缺数万卷的情况，如唐文宗开成元年（836）敕，"秘书省、集贤院应欠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诸道缮写。"这次清查又发现短缺四万多卷，骤增骤减的现象，正说明宫廷藏书出现了大量散失问题。而中唐以后社会动荡不安更让唐代宫廷藏书难免与世沉浮的命运，《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文宗时，郑覃侍讲禁中，以经籍道丧，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

文，日令添写。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有。及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书省奏曰：‘当省元掌四部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卷。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二万余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万八千卷。’”事实上，宫廷藏书与秘书省等国家藏书机构藏书量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国家藏书由原来的七万余卷降到二万余卷，再到后来才一万多卷，唐代宫廷藏书的辉煌也不复存在。

三、影响与启示

隋唐宫廷参与的藏书事业，其影响不仅在书籍的收藏，也在于促进读书氛围的形成，有利于社会文化发展，更是出现大批学者型官员的基础。隋唐宫廷藏书的局面与隋唐王朝的国运共进同退，反映出古代社会政局变化成为影响藏书的最重要因素，宫廷藏书因与当时政权关系密切。在古代社会，书籍收藏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首先，隋唐时期正处于书籍由简牍全面转入纸质的时代，收藏书籍的成本降低；其次，纸质书籍仍以卷轴的形式装订，却造成收藏的不便；再有，书籍仍以抄写为主，造成流传不广；还有，隋唐时期既有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也兴起，藏书之风浓厚，宫廷藏书兼有二者的优点，既有雄厚的财力和物力，也有专业程度很高的学者负责管理，故隋唐宫廷藏书是藏书风气浓厚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有利于保存书籍。

当前，资料的保存已经由纸质时代迈进多元化时代，但如何保存当代史料的问题却更加突出，电子化信息资料有利于保存，却不利于长期留存，尤其是跨世纪、跨千纪的保存，而纸质文献的退缩正考验未来资料保存的命运，千年后，我们的后代能否看得到这个时代的文献，不能完全依靠电子设备，纸质资料仍有存在的必要，地方政府要承担起这个使命。

（撰稿人　贾志刚）

隋唐关中节日风俗

风俗为何，前贤论者颇多，如班固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据此可以将风俗理解为：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群体性生活习性。风俗既有地区性，“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又有时代性，不同时代均对风俗施加影响。所以风俗之事，似轻而实重，汉代应劭主张：“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有一定的道理。

隋唐时期，京师长安俨然以帝都之尊而成为天下取则师范之地，关中风俗大行其道，特别是在节日、娱乐、游艺等方面，为别样长安注入了无限生机。正因如此，了解历史上的长安风俗，不仅是保护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建设文化陕西的需要。

一、节日长安

隋唐时期，每逢节假日，长安城内外民众欢欣鼓舞，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节日气象。不同的节日，其节日礼仪、节日习俗、节日饮食、节日娱乐等也大异其趣，隋唐节日，可以按不同标准划分，有季节性节日、纪念性节日、宗教性节日等，尽管每人之于节日的理解和认知并不相同，但节日能让每人各得其乐，如群众喜迎除夕或上元，官员们偏爱元旦或冬至；农事强调四时八节，宗教推崇佛日或道日；民间喜欢清明或上巳，宫廷钟情于四节进奉（端午、元正、冬至、降诞），因此，节日风情的多姿多彩，使长安风俗既深邃又迷人。

隋唐时期，正月望夜通宵燃灯聚戏，京城尤其繁兴，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民众的狂欢节，隋代名臣柳彧曾有专文涉及此事：

［柳］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漫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炫服靓妆，车马填

喧。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

柳彧认为正月十五夜京城节庆之风太过奢华，遂有禁绝之请，有趣的是，原本是批判性的奏文却成为记载隋代上元节俗最为生动的史料。从参加者来说，不分男女，不问贵贱，三教九流，几近全民动员；从活动内容来说，倡优杂技，丝竹繁会，人戴兽面，男为女服，无奇不有；从节日特色来说，燎炬张灯，高棚广幕，炫服靓妆，聚戏朋游。尽管柳彧的出发点不是称许，但他的概括能力却是超常的，寥寥数语，隋代京城上元之夜花灯初放、人流如潮、百戏竞兴的盛况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柳彧的意见得到隋文帝认同，但上元节庆并未因此而受到多大影响，因为之后不久，既有隋文帝“正月十五日，上（杨坚）与近臣登高”之记载，更有隋炀帝正月十五日大设“八里戏场”之事，史载隋大业六年（610）正月，“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元人胡三省注曰：“丁丑，正月十五日。今人元宵行乐，盖始盛于此。”正月十五日的灯光依旧辉煌，百戏游乐之风更盛于前。

到唐代，上元夜燃灯之俗并未稍衰，唐人将上元燃灯称为烧灯、影灯，出现了所谓的灯树、灯轮、灯楼的称呼，故又将之称为灯节。唐人于上元有赛灯之戏，以影灯多者为上，相胜之词有千影、万影之说，故史籍常有上元灯数的记载，如唐睿宗的灯轮、玄宗的灯楼、韩国夫人的百枝灯树、杨国忠的千炬红烛都曾经照亮过京城的夜空。唐睿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被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俱竖之如花树”。还让宫女和京县少妇数千人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其盛况不亚于隋代。较唐睿宗之 20 丈灯轮、5 万燃灯之规模，玄宗灯楼之火树银花更引人注目，据《明皇杂录》记：“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时有匠毛顺，巧思结创，缯彩为楼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锵然成韵。乃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灯楼之蜡炬呈龙腾虎跃之状，难怪唐人有“龙衔火树千灯艳”、“西域灯轮千影合”之句。此外，韩国夫人之百枝灯树和杨国忠之千炬红烛也不示弱，如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又杨国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长安街上达官贵人万千灯影之光明与月色辉映成趣，令无数唐人流连忘返。《旧唐书》记景龙四年（710）正月望夜，中宗与皇后微行观灯，“是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唐朝上元京城解除宵禁，一度还允许宫女外出观灯，也许皇帝想与民同乐，许多宫女却迷失于上元灯影之中，晚唐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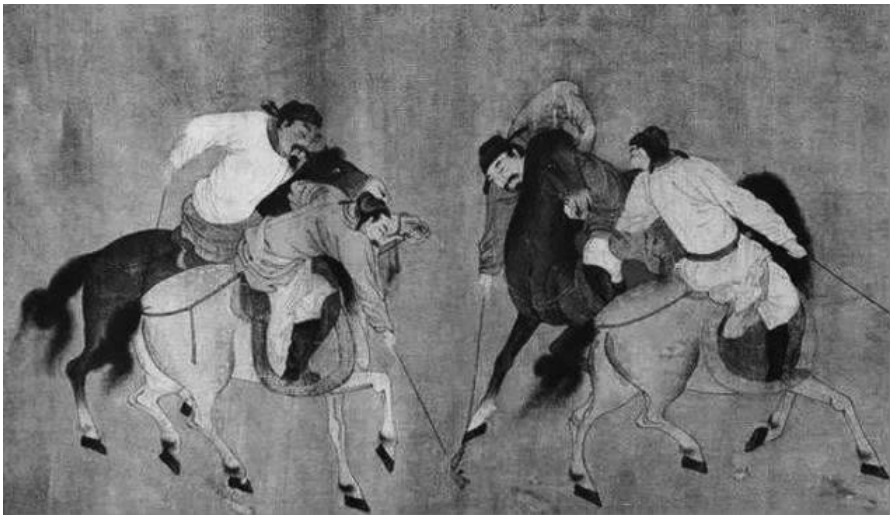


李商隐触景生情，写道：“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

不仅上元节长安火树银花，其他岁时节令都富有特色，杜甫之“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有感于长安上巳临水禊饮之俗；崔颢之“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针对关中七夕女儿节乞巧而作。还有元旦朝会、寒食拜墓祭坟、清明踏青、端午竞渡、中元节盂兰盆会、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南郊等等。尤其是唐代增加了帝后诞节、中和节、降圣节、佛诞节等，都是唐代新增，前代所无。另外，在节日的设置上也广泛吸收外来风俗，如明显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有盂兰盆会、浴佛、西域灯轮、乞寒泼胡、骑马击鞠等，都是典型例证，在丰富节俗的同时，也为传统节日风俗注入无限生机。

二、节日娱乐

节日风俗既有禁忌、祈享、祭祀、避祸等内容，也有信仰、祝福、期盼、娱乐等元素，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节日的其它意义日渐淡薄，而其游艺娱乐性质却呈日益加强之势。隋唐时期，伴随着节日风俗出现相对固定的娱乐活动，如除夕驱傩、上元角抵、寒食拔河、清明秋千、端午竞渡、七夕乞巧、中秋玩月、重阳登高、冬至相扑等，此外还有马球、蹴鞠、斗鸡、斗鸭、斗花、斗草、围棋、象戏、弹棋、双陆、长行、投壶、樗



唐人马球图

蒲、绳伎、剑器等表演性或竞胜性游戏，在营造节日气氛的同时，也平添了节日的娱乐性，实现节日的多重社会功能。

唐代多位皇帝爱好击鞠，唐太宗时，“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毬，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毬，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诫。”据此可知唐太宗曾下令练习打毬，还一度喜欢观看，但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出发，沉溺于打毬之戏必然要玩物丧志，不仅取谤四方，也引起蕃胡窥伺，更严重者将风俗引向萎靡不振。出乎太宗意料的是，其后多位帝王热衷于此，如唐中宗喜欢打毬，此项运动遂风靡一时，“上好击毬，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毬场。”皇帝之喜好常能左右风俗，上之所好，下必从之，不仅宫廷内以击毬取乐，皇室成员、外戚贵族多有击毬高手，进而影响到民间风俗。

同样是喜好打毬，有些皇帝喜欢观看，有些则自执毬杖，亲自出马，如唐玄宗就是身手不凡的打毬健将。景龙四年（710），“宴吐蕃使于苑内毬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毬，帝率侍臣观之”。唐中宗观看的这场比赛，是吐蕃使团毬队和唐朝宫廷毬队之间的较量，“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毬。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因为唐玄宗在未即位前就善于打毬，曾经以少胜多，战胜了吐蕃毬队，在即位后，他仍乐此不疲，史载：“明皇尝三殿打毬，荣王堕马闷绝，移时不苏。黄幡绰奏曰：‘大家年纪不为小，圣体又重，倘马力既极，以至颠踬，天下何望！何不看女婿等与诸色人为之？如人对食盘，口眼俱饱，此为乐耳。傍观大家驰逐忙遽，何暇知乐？’上曰：‘尔言大有理，后当不复自为也。’”经黄幡绰劝告，唐玄宗不再置身毬场，改成以观看比赛为乐，但因为皇帝喜好，宫廷击鞠之风更加风行，“开元、天宝中，玄宗数御楼，观打毬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致伤毙。”经皇帝提倡并助战，宫廷击鞠热情越发高涨，出神入化的毬技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唐以后，京城击毬之风自上而下逐渐推广，且可能与节日娱乐联系起来，如贞元四年（788），唐德宗“御麟德殿观宰臣李晟、马燧及诸将会鞠，李泌辞以不能，请记筹，从之，颁赐有差。辛丑，帝以寒食假满，内鞠会未毕，是日，特赐百官假一日”。因为内鞠会尚未结束，还特意延长假期，说明寒食会鞠活动得到官方支持，似乎已形成了一定惯例。

驻防京城的禁军是击毬高手云集之地，因为禁军把骑马击毬作为训练将士的一项内容，“两军老手”甚至成为一流毬技的代名词，但山外有山，击鞠高手上至宫廷，下到民间所在多有，如唐宣宗之毬技令二军老手折服，史载宣宗“孤矢击鞠，皆尽其妙。所

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宣宗擅长骑马击鞠，说明其毬技高超，同时，只有经常上场比赛，才能令二军老手佩服有加。此外还有新科进士当众挫败神策将士之事，唐僖宗乾符四年（877），新科进士有月灯阁打毬之会，结果场地被两军军将占据，“两军打毬，军将数辈，私较于是”。为了打击其气焰，新进士刘覃自请出场，“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骤驰击拂，风驱雷逝，彼皆愕瞟。俄策得毬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黾俛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正因为军将击鞠较为专业，故进士将其击败成为此事之看点。

不仅皇帝、官员、军将、进士热衷于击鞠较胜，就连平日千娇百媚的宫女也乐此不疲，诗人王建《宫词百首》中有：“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毬。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又一首：“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毬。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诗中描写了宫廷中击毬宫女的天真可爱，有时徒步打毬，有时骑马打毬，特别是宫廷打毬还要奏龟兹乐，以背身毬为奇妙，以得头筹为荣幸，打出高水平毬时围观的内人还要唱好喝彩。

三、隋唐节日趣事

节日娱乐形式多样，吴玉贵统计唐人一年的假期多达47日，人们乘着假期的闲暇，或登临出游，或举酒相邀，或闭门贪欢，不一而足，因为假期是个人时间，节日期间发生的逸事也十分个性化。

清明前后，书生崔护独自到长安城南郊游，觉得有点口渴，就叩响前面村舍的大门。过了许久，里面有女孩问：“谁呀?”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位十六七的女孩，虽未化妆，却青春焕发。崔护赶紧说明自己的来意：“我叫崔护，一个人来此寻春闲游，口渴难忍，想在您这里喝口水。”女孩子把水杯递给崔护，就倚着门框，脉脉含情地看着崔护喝水的样子。崔护喝完水后，很有礼貌地递还水杯，但他已被女孩的笑容打动，四目以对之时，双方都有心头一颤的感觉，崔护还是告辞离开。

第二年清明，崔护带着一年来越来越浓的相思，又一次来到城南的村舍门前，本来他仍想借口水喝，举手要叩门时，又停住。于是，他就在门侧题诗一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又过了几天，崔护身不由己地又来到那家门前，让他吃惊的是，院子里传来凄惨的哭声，就上前询问，那家的老父看着从城中来的年轻人，就说：“我女儿从去年清明以

后，神情恍惚，若有所失，而从前天见到门扉上的一首小诗，就气绝而亡。”崔护要求进屋哭悼女孩。看到女孩仍旧灿若云霞的面容，崔护无法自控，高声说：“崔某在此，你还能看见我吗?”连喊几声，女孩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没过半天，就神志清醒了。全家转忧为喜，就将女孩子许配给了崔护。从此，那首情浓意重却青春活泼的爱情诗逐渐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踏青艳遇故事虽不一定真实，却为清明节注入无限浪漫，与此类似的破镜重圆故事又为上元节蒙上一点凄婉。南朝人徐德言娶了陈后主的妹妹乐昌公主为妻。天生丽质的乐昌公主与气质不凡的徐德言立下山盟海誓：“如果我们不幸被分开，我们要想办法再见面。”人海茫茫，一旦失散如何才能再相聚呢？他们就将一面铜镜分成两半，每人各执其半，相约日后每年正月十五，将半镜拿到长安市中叫卖。

隋朝灭陈之后，乐昌公主被越公杨素看中，纳在后庭，在众多的姝丽之中颇受宠爱。数年后，徐德言费尽周折来到了长安，他就于正月十五来到市场中寻访卖镜者。这几年，每逢正月十五，长安都市中就有一名苍头奴卖破镜，价钱比几个好镜都贵很多，市人都嘲笑他。徐德言见到卖镜者，把他引到自己的住所，拿出自己的半镜，两块半镜正好相合。他感慨万千，当即写下一首诗交与卖镜奴：“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

乐昌公主得诗后，涕泪俱下，忧郁不食。杨素就询问原因，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被二人的真情所感动，遂答应陈氏与徐德言重新结合，并备厚礼遣送。送别宴席上，陈氏哭着也写了一首诗，诗曰：“今日何造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做人难。”二位有情人得铜镜之助终成眷属，破镜重圆也成为爱情经典故事传唱千余年。

围绕节日发生了无数趣事，舞台在长安的也成千上万，有些淹没于历史洪流，有些流传于千古之后，透过那些历史悲喜剧，仍然能够触及节日风俗的内核，是节日成全了逸事，还是逸事成全了节日，值得玩味。

四、影响与启示

节日的社会功能一直受到重视，但仍不能彻底诠释节日与文化的关系、节日与风俗的关系、节日与政治的关系，节日与民众生活的关系更无法回避。作为一种历史习俗，节日有文化传承、社会协调的作用，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节日也有满足人们心理需求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作用。

当前节日系统更加多元，传统节日约定俗成，在现实生活和生产中仍然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因为多种原因，原始的节日风俗渐次退缩，节日特征逐渐被历史冲淡和稀

释，节日的区分日渐模糊，节日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得不到完全发挥。如何给节日风俗注入新鲜空气，让不同的节日各具特色，避免多节一面，考验社会管理者的智慧，把节日还给风俗，把风俗还给节日，不失为一条出路。目前，西方节日对传统节日造成很大冲击，外来的情人节势头盖过了传统的七夕节，西方的狂欢节、圣诞节、愚人节、母亲节等如潮而来，大有席卷之势，传统节日被挤压，与节日相伴而行的传统风俗不被国人重视，如何在节日风俗领域中处理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是每位国人的一道智力测试题，把乐趣留给心灵，把判断交给历史，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总而言之，释放节日风俗的文化潜力和经济潜力，有很多选择，但一定要兼顾节日旧俗、外来风俗与区域文化、现代新风的共性，在科学和人性的指引下，完成新时代对节日风俗的特别贡献。

（撰稿人　贾志刚）

丝路影响下的隋唐长安胡风

隋唐两朝从隋文帝开皇年间到唐玄宗天宝末年，近一个半世纪出现了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天盛世三个所谓的封建治世，隋唐虽然国力有所增强，但在经济上依靠农耕地区和军事依赖游牧地区的社会结构仍然没有改变，而隋唐统治区域仅限于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与西部畜牧区的产品有着很大的互补性，故打开与西域的通道就特别重要。于是隋唐继续经营丝绸之路，保持与西域地区、中亚、西亚的贸易对双方都具有迫切性。随着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开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通过这条国际大商道全面展开，香药、珠宝、马匹纷至沓来，丝绸、茶叶、瓷器络绎不绝，唐人张籍《凉州词》曰“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正是丝路繁荣景象的写照。庞大贸易产生了巨量商税，“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地广则费倍”。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西向始发站，相应地成为西域胡人东来的目的地，自然地隋唐长安城的胡风胡化亦特为显著。



一、胡风长安

1. 胡汉混杂

汉文史籍以昭武九姓胡泛称中亚阿姆河以北、锡尔河以南即河中地区众多的粟特邦国，然其数远不止九个。“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新唐书》的记载明确指出了中亚粟特人的经商传统。源源不绝的西域胡商沿着丝绸之路东来取利，甚或流寓长安。对照《唐两京城坊考》中的唐长安城复原图，就会发现城西胡人第舍所在街坊分布密集且集中。如普宁、义宁、群贤、怀远、延寿、居德、崇化、金城、醴泉、崇贤等坊，均位于长安城之西北隅，而且呈环绕式有规律地分布于西市周围。该古籍论西市：“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表明西市较东市繁华。胡商与西市实在是地利人和的精准结合。除此之外，为中亚粟特人普遍信奉的祆教在长安城中立有五处祆祠，其中四座的地理分布为：布政坊祆祠位于西市东北郊，崇化坊祆祠位于西市西南郊，醴泉坊祆祠位于

西市北边，普宁坊祆祠位于西市西北。三夷教中的景教在长安所立的两座寺庙的地理位置为：醴泉坊波斯胡寺位于西市西北，义宁坊大秦寺位于西市西北。西域胡人住址和庙宇的集中布局表明留居长安的西域胡人中绝大多数聚族而居于西市及周边地区。西域胡人善商贾，然而隋唐时期长安城中的胡人不仅仅限于从商一途。隋唐长安城中中亚诸国人，就文献史料及出土碑铭墓志所载，有姓名可考者约16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番将，少部分从事文职如译语人。这些人主要是到长安入侍为质的中亚诸国的王族成员及其后裔。还有一部分慕义归化者，他们成为唐代长安胡人集团之中的上层人物，并随着家族繁衍开始了汉化进程。《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

放眼隋唐两朝，加诸不见于史籍的普通胡人，长安城中的西域胡人数量必是相当可观。



三彩胡人

2. 金玉宝玩

中亚地区及波斯历史上盛产珠玉宝石，因此西市胡商多能识珠断玉，故西市亦称“金市”。李白即有诗刻画“金市”，“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

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太平广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唐安史定后。有魏生者……假屋以居。市肆多贾客胡人等……尝因胡客自为宝会。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诸胡出宝。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径寸。余胡皆起。稽首礼拜……（生）遂所出怀以示之……三十余胡皆起。扶生于座首。

曲折地反映出长安珠宝行业已被西域胡商所垄断。西域诸国以进贡的方式贩运而来的主要是香料、异药、金玉宝玩，以此满足都城之内皇室和文武勋臣、豪富阶层的猎奇享受心理，相关史料比比皆是。

（玄宗开元四年）七月，大食国黑密牟尼苏利漫遣使上表，献金线织袍、宝装玉洒地瓶各一。

（开元六年）康国遣使贡献锁子甲、水精杯、玛瑙瓶。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安国遣使献宝床子及鸵鸟卵杯，康国遣使献宝香炉及白玉环、玛瑙、水精眼药瓶子。

（开元）二十九年三月，吐火罗遣使献红颇梨、碧颇梨、生玛瑙、生金精及质汗等药。

西域诸胡国通过进贡的方式向唐朝宫廷提供了不少的珍禽异兽，主要有狮子、猎豹、鸵鸟等。史载：

贞观九年七月，（康国）献狮子，太宗嘉其远来，使秘书监虞世南为之赋。

（显庆）二年正月庚申朔，吐火罗国献师子。

（开元）十六年十一月，米国王遣使献狮子。

（开元）十七年正月，米国遣使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狮子各一。

狮子因其形体威猛，中原所未有，因此被民间视为瑞兽，逐渐成为我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此外，唐代的宫廷贵族热衷于狩猎，贵族男女均醉心于此。西域诸国所献豹均成为贵族豢养之物，豹猎成为鹰猎、犬猎之外又一田猎方式。唐乾陵懿德太子墓第一过洞东壁壁画上即绘有驯豹图。鸵鸟就更是一种稀奇之物了，“永徽元年，（吐火罗）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铁，俗谓鸵鸟”。

3. 车服饮馔

西域胡人的东来间接推动了长安城中服用制度的变迁，“初，妇人施幂罗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冒，施裙及颈，坐檐以代乘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冒益盛，中宗后乃无复幂罗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冒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帷帽是隋时传入的一种胡服，该段记载以都中上层女性服饰的演变印证了胡服在推动唐朝较为开放雍容的王朝气象中

发挥的作用。窄袖胡服，贯头衫，折襟外衣这些来自丝路沿线的中亚胡国、波斯、回鹘、突厥诸政权的传统服装，曾经流利于长安城中的普通百姓之中，一改传统汉服宽袍大袖的形制。即如北宋沈括所指出的：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鞓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鞓，皆便于涉草。

隋唐两朝西域胡商经由丝绸之路贩运而来的较有代表性的日用商品有石蜜（块状乳糖）、砂糖（蔗糖）、白叠布（棉布）、葡萄酒。葡萄和葡萄酒西汉时即传入，在唐初，葡萄酒的酿造方法也一并传入长安。史载："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

4. 乐舞游艺

以钟磬等打击乐器为主的传统的雅乐，因袭规范，缺乏创造，远离生活而遭受冷遇。新颖动听、富于娱乐性和表演风格、以管弦乐器为主的西域胡乐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清商雅乐而风靡隋唐长安。胡舞胡乐对长安乐舞风尚的影响在制礼作乐这样的国家大事中显著体现出来。史载：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

除清乐、高丽乐、礼毕乐与西域关系不大外，其余六部乐皆来自西域。而唐代基本继承隋九部乐，增加一部燕乐，又改礼毕乐为高昌乐，即：

高祖即位，仍隋制设九部乐：燕乐伎……清商伎……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隋乐每奏九部乐终，辄奏文康乐，一曰礼毕。太宗时，命削去之，其后遂亡。及平高昌，收其乐……自是初有十部乐。

由此则唐代十部乐中，西来的音乐占十分之七。音乐往往与舞蹈联系在一起，当时长安流行的舞蹈大概分为软舞和健舞两大类。软舞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拓、甘州、回波乐。健舞有棱头、阿连、柘枝、剑器、胡腾、胡旋、浑脱等。其中健舞中的柘枝、胡腾和胡旋均来自中亚的石国和康国，唐诗中多见对柘枝、胡旋的描述，这三大乐舞在开元、天宝时曾风靡长安。唐代长安流行的与西域中亚有关的游艺主要有三种：泼胡寒戏、打马球与双陆。泼胡寒戏原是康国民俗，"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唐时风行于长安城中。《旧唐书·中宗纪》记载："（景龙三年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这一民俗节日源自中亚，后流寓长安的胡人不忘国俗，汉人则仿效之，泼胡寒戏遂演变成一项大型的民俗游艺活动。只是这一游艺与汉民族传

统的礼仪观念背道而驰，中宗时中书令张说上疏：“且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礼。”之后不久便被下诏禁断，从此销声匿迹。马球是从波斯传入的一项体育运动，原称波罗球，在长安城中特别兴盛。太宗贞观年间开此风气之后，唐朝皇帝精于此戏的还有玄宗、宣宗、僖宗、穆宗、敬宗，球技精湛者尤推玄宗、宣宗二帝，而达官贵人均嗜好此戏，民间相习成风。史载：

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

双陆是源于西域的一种掷骰行子的棋类游戏，《新唐书·狄仁杰传》中记载：

（武后）召谓曰：“朕数梦双陆不胜，何也？”于是，仁杰与王方庆俱在，二人同辞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

双陆入武后梦中，可见双陆在长安城上层统治阶层中流行的普遍程度。

5. 教法昌明

伴随丝路东来的除去异域物产，还有西域本土的宗教，亦即时人所称三夷教。祆教是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的宗教，又称拜火教，为波斯国教。隋唐时期在政府的认可与保护下于多处流传，长安城中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崇化坊分别立有祆祠。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聂思脱里派，景教是聂思脱里派在8世纪中叶以后的自称。于贞观九年（635）传入长安，获准在长安义宁坊建祠一所。原称波斯胡寺，后为免与祆教混，而改称大秦寺。后应流亡长安的波斯国王卑路斯请求，在长安醴泉坊又建一景教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于明末在西安出土。碑文阐述了景教流传的经过。并称景教在中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3世纪时创立的，在东传的过程中受到回鹘人的尊奉，成为回鹘国教，后在回鹘的要求下，唐政府曾在长安城为摩尼教建大云光明寺一座。另外，天宝九年（750）怛罗斯之战的惨败使唐朝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则推进到这一地区，中亚的伊斯兰化由此开始。中唐时期李泌捡括胡客，“凡得四千人”，都是天宝以来至贞元三年（787）三十年间从安西入回纥道来到长安的阿拉伯、波斯、中亚粟特人，故其中必然包括不少的穆斯林。

关于隋唐长安城的胡风，向达先生曾经指出：“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太宗雄才大略，固不囿于琐微，而波罗毬（马球）之盛行于唐代，太宗即有力焉。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番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社会各

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全面地概括了唐长安城在丝绸之路西端西域诸国影响下所显现的胡风。

二、影响与启示

历史上，隋唐两朝曾经将以中原汉族王朝为主导的封贡体系拓展完善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汉文明的声威远及八方四维。论者言及隋唐气象，除去两朝几代统治集团苦心经营而致的民殷国富、海晏河清，更是国家维度上的开放与包容。隋唐长安城也成为不同文明交汇、碰撞进而相互渐染的国际性大都会。借助于丝绸之路的传输，西域诸国的土产、宗教、艺术、习俗以及日用器物的制造技术、装饰风格传入长安，官商士民竞相争用，上下相效，胡风几乎刮遍了当时有关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绚丽多彩的隋唐文明，西域文明之贡献尤为明显。可谓中体不坠，西用纷竞。

往事越千年，浩瀚苍茫的戈壁荒滩上长河落日依旧，但驼铃清越的商队已不复存在。然而也正是历史的发展，又赋予丝绸之路新的内涵，使其重获新生。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已经被古丝路沿线地区人民所认同，重走丝路成为共识，古丝绸之路遗留的丰富历史文化遗产日益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丝路沿线的众多城镇涌现一批耀眼的文化明珠，西安无疑是其中最举足轻重的一颗。陕西所保留的丝路遗韵，无疑是重新激活丝路的重要内容。我国西北地区不断发现储量巨大的油气田，陕西正处于西部能源向东输送的关键节点上。今日今时的丝绸之路已经演变为一条文化之路，旅游之路，能源之路。

忆古思今，隋唐先民对西域蕞尔小邦之风物的“拿来主义”应该解读为勤于借鉴学习、兼容并包的进取心态。展望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处在“新”丝路战略位置上的西安，任重而道远。

（撰稿人　刘　峰）

宋敏求的《长安志》

一、宋敏求其人

（一）宋敏求生平

宋敏求（1019—1079），字次道，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地志学家和大藏书家。

宋敏求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宋皋在太宗、真宗时，曾任尚书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等职；父亲宋绶，官至兵部尚书、参知政事，精通历史文物和典章制度。

初宋敏求以父荫授秘书省正字，召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任馆阁校勘。庆历四年（1044）因卷入政治风波，受到牵连，他被免去馆阁校勘的职务。庆历五年（1045），经王尧臣的奏举，任《新唐书》编修官，后任太常集贤校理、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在编修《新唐书》期间，又曾通判西京，出知太平州。嘉祐五年（1060），升尚书工部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治平元年（1064），宋英宗即位，宋敏求担任仁宗实录检讨官。次年任知制诰，同撰修仁宗实录，同判太常寺。

熙宁元年（1068），因在英宗丧期间宗室是否可以嫁娶问题上发表的意见前后不一致，他被出知绛州，但旋即调回京师，仍任知制诰。两年后，又因在具体问题上同变法派有分歧，再次被罢免知制诰职务。熙宁四年（1071），任集贤院学士、史馆修撰、判秘阁等职务。熙宁五年（1072），出使河北，致祭决河。熙宁七年（1074），任龙图阁直学士。元丰二年（1079），因病逝世，享年61岁，赠礼部侍郎。

宋敏求一生才华横溢，为人正直清廉，交友广泛，得到广大士大夫的赏识。与宋敏求交好的友人在变法问题上普遍属于保守派阵营，可知宋敏求的政治倾向也趋于保守，但是宋敏求对新法的反对态度并不像司马光那样激烈。

宋敏求之父宋绶固有藏书之好，藏书量多达两万卷。宋敏求子承父业，也喜好藏书，并广泛搜罗各种珍贵书画。《宋史》有云：“敏求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议，必就正焉。”为了扩大藏书量，宋敏求还十分重视抄书。他与当时藏书

家王钦臣相约传书，互相各置目录一本，碰到缺少的书籍，就加以写寄。他藏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为一般藏书家所不及。除了收藏书画，他还对大量图书进行校勘。经其校勘的图书，在当时成为文人士大夫进行考证工作的参考书目。苏颂称其“家书数万卷，多文庄、宣献手泽与四朝赐札，藏秘惟谨”。

（二）宋敏求著作考

宋敏求知识渊博，精通典章制度。曾巩评价道：“公于古今，典章沿革，得之于心，山藏海积；又于旧闻，隐显纤悉，析之以口，天高日白。公在朝廷，群众百司，解惑解疑，公为著龟；公在太史，维潦与属，正谬辨讹，公为耳目。”宋敏求有大量的著作成果，苏颂有言：“五朝正史，二圣编年，出于一门父子手笔，可谓家世之盛矣。”张保见在《常山二宋撰著考》中考证了宋敏求一生的著作：宋敏求合著书目颇多，但多已佚亡，如《两朝国史》《仁宗宝录》《阁门仪制》《集例》《例要》《朝会仪》《蕃夷朝贡录》；现存的合著只有《唐大诏令集》和《新唐书》。其独撰的许多著作也多已佚失，如《入蕃录》《三川官下录》《元会故事》《讳行后录》《宝刻从章》《韵次宗室名》《续唐录》《宝录》《唐余录目》《东京记》；现存的有《安南录》、文集 48 卷、《春明退朝录》、《长安志》、《河南志》，其中一些著作也只保留了原著中的一部分。同时，宋敏求也辑录了大量唐人别集，为辑佚和整理我国文献典籍做出了贡献。

二、《长安志》其书

宋代是方志大兴时代。北宋立国之后，统治者重视对方志和舆图的编纂、收集，先后 10 余次诏令征集图经，规定州县图经每闰年一造送，诸路图经十年一上。同时政府组织修撰图经，这对宋代方志的大兴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宋代方志虽浩如烟海，但流传至今的却为数不多。其中有关长安的方志不过两部：宋敏求《长安志》以及程大昌《雍录》。

（一）《长安志》内容概况

《长安志》凡 20 卷、16 个门类，主要记载唐代长安属县、坊市、陵墓及宫城等，成书于熙宁九年（1076），又称《熙宁长安志》。《长安志》以唐代韦述所撰《两京新记》为蓝本，博采群书，参校补充。各卷内容为：卷一总叙、分野、土产、土贡、风俗、四至、管县、杂制；卷二雍州、京都、京兆尹、府县官；卷三宫室一，包括周、秦、汉上；卷四宫室二、汉中；卷五宫室三，包括汉下、后汉、晋、前后秦、西魏、后周；卷六宫室四，唐上；卷七唐皇城，唐京城一；卷八唐京城二；卷九唐京城三；卷十唐京城四；卷十一县一，万年；卷十二县二，长安；卷十三县三，咸阳；卷十四县四，兴平、武功；

卷十五县五，临潼、鄠县；卷十六县六，蓝田、礼泉；卷十七县七，栎阳、泾阳、高陵、乾祐、渭南；卷十八县八，蒲城、盩厔；卷十九县九，奉天、好畤、华原、富平；卷二十县十，三原、云阳、同官、美原。

宋敏求《长安志》仅对长安城的描述就占八卷之多，即卷三至卷十。前两卷主要记载古长安及周围地区的历史地理沿革，时间从秦汉到宋代。后十卷则是对长安下辖的24个区县的记载，内容分本书一半，详近略远，厚今薄古。

（二）《长安志》版本流传

《长安志》的宋元刻本已佚，现传世的都为明清刻本。元代李好文作《长安志图》，是对《长安志》的一大重要补充。明代刻本的《长安志》有成化本和嘉靖本两种。成化本刊印于明代成化四年（1468），由郃阳书堂刊行，其中《长安志图》三卷，附在《长安志》之前。现在国家图书馆藏有成化本两部，一为黄虞稷所藏，一为黄丕烈藏。黄虞稷的成化本缺《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渠堰因革一项，其他内容完好。黄丕烈旧藏的成化本，书后附有其在嘉靖十四年（1535）所作的题跋，题跋交代由嘉靖本补其失页。

嘉靖本是嘉靖十一年（1532）十月西安知府李经在西安主持刊刻的，《长安志图》仍附在《长安志》之前。这个本子的卷首有嘉靖十年（1531）十月康海序，卷尾有嘉靖十一年（1532）十月李经后序。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都有收藏。

成化本和嘉靖本大同小异，但是总体说来，在《长安志》的刊印上面，成化本比嘉靖本要完善得多。嘉靖本只是在保存《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渠堰因革一项上完好，但是在其他卷页上面其实脱误更多。但是两个本子可以互相得以订正并可以互补残缺。明成化本和嘉靖本在字数内容讹误上颇为相近，当是出自同一个祖本。



由于明代刊刻的本子很难见到，清代有许多抄本就流传了下来。这些抄本中，比较重要的，一部是吴翌凤古欢堂抄本，根据书前吴翌凤所作的跋，该抄本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传抄而来的，根据汪士鋐抄录的黄虞稷藏的成化本抄借而来，现藏国家图书馆。另一部是朱彝尊潜采堂抄本，该抄本的著录情况见于朱彝尊的《曝书亭集》卷三十五《书熙宁长安志后》，其中说道：“斯编借录于汪编修文升（汪士鋐字）”。可见这两个抄本出自一家，根源上都同出明成化本。清代刊刻印刷的《长安志》只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毕沅灵岩山校刊本，也是迄今为止流通最广的本子。毕沅刻本实际上是由其幕僚孙星衍等人校勘的，孙星衍所依据的底本亦是前述汪士鋐抄出的明代成化本。毕沅刻本后来编入所刻的《经训堂丛书》，该丛书前附加了王鸣盛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写的序言，故而灵岩山本又被称为经训堂本。该本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还刊行有铅印

本。毕刻本的版本最大的好处是引用了相关文献的按语，方便读者查阅理解，另外它利用嘉靖本作了一些有益的订补，对成化本传抄下来的一些明显的字讹进行了修改，这是它的功绩所在。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长安志》为“两淮马裕家藏本”。《四库全书》本和以上各种本子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将《长安志图》和《长安志》分开刊印，分别加以著录，将其作为两部志书收录。从“提要”中可以知道，《长安志图》依据的是“安徽巡抚采进本”，其和《长安志》来源于不同的两部书，所以著录上和前代有所出入。据《长安志图》提要，其所依据的底本为“明西安知府李经所锓”，另外，《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渠堰因革一项下的首页保存完整，由此看来，《四库全书》本的《长安志》当亦为出于明代嘉靖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的《宋元方志丛刊》，是目前学界利用较广的一部影印方志文献，其中《长安志》即是收录的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刻本，虽然印刷精当，但是由于方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出现很多讹、脱、衍、倒的现象，因此迫切需要利用各种本子对校和参校，对其进行点校整理。



《长安志》书影

三、《长安志》的价值和影响

（一）《长安志》的价值

1. 史料价值

顾颉刚先生曾对方志的史料价值概括道："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复：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长安志》以唐开元时韦述的《两京新记》长安部分为蓝本而大事增益，但《两京新记》现今仅存卷三残帙。其余关于长安一带的地理著述或者笔记小说，如《三辅黄图》《三辅决录》《游城南记》等，虽然也记录了一些长安宫室遗迹和历史内容，但大多散佚，或者载述片面零散。因之该书成为后世研究唐及唐以前长安地理、建筑的重要参考书目。现今关于长安研究的资料上所绘制的唐代宫城平面图，就是主要取材于《长安志》，故《长安志》作为一部完整准确记述唐代皇城京城的方志，至今仍是研究古代长安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此外，该书除详述宋以前长安古迹外，也记载宋代之事，亦具有参考价值。

2. 文献价值

《长安志》另一大特点是旁征博引，且许多征引的书目现已散佚。晁公武称道说："因韦氏所记，搜采群书，罔有遗佚"。赵彦若在《长安志》序中也说："穷传记诸子钞类之语，绝编断简，靡不总萃隐括而究极之"。魏喜娥的硕士论文《宋敏求〈长安志〉引书钩辑》中对《长安志》中引用的书籍作以整理研究：宋敏求《长安志》引书广泛，并保存了不少珍贵古籍资料，《长安志》中记有亡佚文献，诸如：辛氏《三秦记》、王褒《云阳记》《旧图经》《关中记》《两京道里记》《周地图记》等数十种；现存文献的引用亦很多，如《史记》《汉书》《水经注》《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等著作。他对《长安志》中多征引的古籍进行考证，发现《长安志》中所征引书目：经 19 本古籍；史 57 本古籍；子 17 本古籍；集 14 本古籍；还有其他 3 本古籍，共百余种，其中半数为佚书，故《长安志》的文献价值由此可见。

3. 史地价值

宋敏求记述周、秦、汉、隋、唐的都城，首先注意其地理位置、地形特点和山川形势，对于其地理环境的考察极为精当，故其志也具有很高的史地价值，这也是作为方志之书必备的因素。

如宋敏求依据大量资料，论证西周都城丰镐位于沣河西岸，镐京位于沣河东岸，两

者相距二十五里，为今天的考古发掘提供了线索。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丰镐遗址区发现了车马坑和板瓦，证明宋敏求记载的方位无差。同时，《长安志》也记载了雍州所辖的万年、长安等二十四县的地理环境，包括治乱兴废、户口、物产土贡、津渡桥梁、湖泊泉池、关隘要道、陵墓园林，水系分布等，为今天研究长安地区的历史地理情况、考古工作、历史上的户口、水利等等都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此外，《长安志》也体现了其他重要的价值。如《长安志》中也描述了长安城的建筑文化和民俗以及商业情况，这对研究长安地区的风土人情、经济情况等具有参考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长安志》也记载了大量佛教的寺庙道观，其密集程度和众多的数量上可窥见唐代宗教流传盛行的情况，这在其他方志中鲜有记载。

（二）《长安志》对后世的影响

州县之书滥觞于宋代，方志亦完备于宋代。近人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说："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书"。

汉魏以来方志形成了两个渊源，即述地和记人两种不同的体例。述地就是以记录一方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为主，记人则侧重于人文和社会关系活动。隋唐时图经成为盛行的方志，方志中"图"占很大地位。到了宋代方志就出现了很大变化，即"志"的内容明显增多，而《长安志》就处于这种过渡阶段。它既延续了汉魏以来述地体例传统，用相当多的笔墨来记述唐皇城和京城以及京兆府下辖各县，又独出心裁创出"杂制"条，将地方上的逸事轶闻，无适当的类目将其统辖，就都收集在一起，归为一类，称其为"杂制"，为人文记载。虽书中有关人文记载还显薄弱，但这种由偏重地理考述转向重视人文记载的取向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元明清之际许多人仿其体例，借其资料来撰述有关古长安城的著作。如元代李好文著有《长安志图》三卷（一名《长安图说》），在《长安故图》的基础上编成二十二图，常被附刻于宋敏求《长安志》前。元朝骆天骧采用该书的体例和资料，削繁分类，编纂《类编长安志》十卷，增补了金、元时的重要史料。清朝徐松撰的《唐两京城坊考》，其中长安部分完全承袭了该书的体例和内容，只是略加增补而已。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皆历代建都之制，上起伏羲下讫于元。仿《雍录》《长安志》体例，征引赅洽，考据亦颇精审。

综上，《长安志》在编纂叙述上，征引广博，内容翔实，并且门类丰富，体例完备；其详今略古，叙述简练，文直事赅。在内容上则是详述长安都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并且突出长安的都城文化。后世对于《长安志》的评价相对比较高。司马光以为："此志精博宏赡，旧都遗事藉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清人王鸣盛也称誉此志："宋氏

此编，纲条明晰，赡而不秽，右云具体。”清人周中孚更是大加赞赏：“长安为周、秦、汉、唐建都作邑之所，事迹丰黔，纪载宜详。次道以唐韦述《两京记》但详于古迹，余多阐而未备，乃创为体例，遍搜传记诸书，汇次成书，旧都古今之制，于是乎备。……凡府县之政，官尹之职，河渠，关塞、风俗、物产、宫室、街道之属，无不纲举口张，典而有体，赡而不芜。”近人陈子坚甚至认为：“其荣采群书，阁有遗佚，精博宏赡，有裨治方”，认为这一部“绝作”。

《长安志》虽赞誉颇多，但仍有其不足之处。由于宋敏求的一生主要是在当时的都城开封府，虽然也曾外出做官，到过西京和亳州（今属安徽）、绛州（今山西新绛），但他的游迹却未出过崤函，其撰述多是受到韦氏《两京新记》影响，并以查考大量文献为主。未能实地考察，故其志书存在许多问题。如在其叙事中，曲台既入未央，又入诸三雍，一分为二。长门宫在都城之外长门亭畔，而列诸长信宫内，位置记载有误。而且宫殿园囿，多空存其名，不著事迹，无迹可寻。此外郑樵在其《通志二十略·地理略一》中也考证：“灞水，出永兴蓝田县终南山金谷，东经临潼县，北流入渭。然《长安志》云：‘灞水从上洛界入汉。’”但瑕不掩瑜，总而言之，《长安志》“实则凌云之材，不以寸朽为病也。”

（撰稿人　张　明　王翰儒）



关中书院与陕西书院教育

中国书院教育萌芽于唐，成熟于宋，发达于元、明、清，其发展阶段大致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后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的过程，也正是陕西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渐由政治文化中心趋向边缘的过程。

宋元时期，陕西开始兴起了书院教育。这种以学者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往往由学者私人招徒授业发展而来，因此思想比较活跃，可能成为学派的发源地。其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一是标领学术，二是传承教育，三是主导文化、影响社会。由于书院在学术性、教育性方面的独有特点，使得书院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影响独一无二，尤其是其标领学术的作用使得书院常常成为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传承关学、发扬实学是陕西书院的代表性旗帜。

陕西书院教育兴起于关中，但地方志中有确切开办记录的第一个书院，却是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经略陕西时在延州开办的嘉岭书院。除此之外，宋元时期陕西书院都集中在关中。其中，眉县的横渠书院，由张载讲学而发展起来；蓝田县的芸阁书院，宋神宗元丰至宋哲宗元祐年间由吕大临创办；京兆府的鲁斋书院，由蒙元初许衡讲学发展而来，元成宗时萧斛曾任山长；三原县的学古书院，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由李子敬建；高陵县的渭上书院，创建年代一说为宋哲宗元祐年间，一说为元仁宗延祐年间；乾县的紫阳书院，金元之际由杨奂建，等等。

书院教育虽然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但在体制上尤其优越于府（州）县学之处，因而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宋元时期是陕西书院教育的早期阶段；到了明清时代大盛，书院在陕西已是遍地开花，其中尤以关学巨子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最为著名。

一、关中书院

（一）关中书院的产生

冯从吾是明代关学的集大成者、明末东林党人的西北首领。万历年间，他受朝中恶势力排挤，罢官归陕；回到西安后，闭门谢客，专心致力于学术活动。为了宣传自己的

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冯从吾在著述之余，借用西安南门内的宝庆寺作为讲学场所；听众踊跃，很快便达数千之众，连陕西布政使汪可授、按察使李天麟也慕名前来听讲。官员们后以地方官府之名，把宝庆寺东的小悉园拨给冯从吾建校。万历三十七年（1609），冯从吾主持下的关中书院应运而生。

关中书院建讲堂六楹，题匾名“允执堂”。冯从吾《关中书院记》云：“书院名‘关中’，而匾其堂为‘允执’，盖借关中‘中’字，阐‘允执其中’之秘耳。”书院由冯从吾亲任主讲，并延请了一些德才兼备的关学名儒共执教席。书院以阐述孔孟的“一一躬身尽道”和程朱理学的“精一执中之学”为宗旨；以四书五经、通鉴等为教材；以“纲常伦理要尽道，天地万物为一体”为教学内容。不仅西北各地，甚至四川、湖北、河南等地的学生也来关中书院就读。一时之间，西北的关中书院与东南的东林书院遥相呼应，成为讲学议政和培养士人的中心。作为一所影响巨大的文化机构，关中书院与附近的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咸宁县学一起构成了当时西安，乃至西北诸省的文化中心。关中书院由此成为明末四大书院之一。

关中书院之所以能够创立，得益于明代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与支持。明太祖就曾说过：“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他认为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而“人才以教导为先”，故鼓励各地大力创建学校，培养人才。《明史·选举制》云：“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可以说，关中书院是在明代“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教育理念下建立。但是与官学不同，关中书院的主旨是宣传学者学术思想，以达到醒悟世人的目的。

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关中书院被魏忠贤党羽查禁。清康熙三年（1664），书院重建；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陕西师范学堂。经清代屡次修葺与扩建，关中书院成为当时陕西最大的书院，跨省区招收陕甘两省士子，但清议传统已基本消失。王宏撰、李颙、柏景伟、孙景烈、蒋湘南等名儒，先后在关中书院主讲。政府对关中书院的控制十分严密，院务由陕西巡抚兼管，山长的聘任、经费及学生录取都由巡抚决定。开设的课程



冯从吾像

主要是“正学”，即程朱理学。书院名义上以提倡教化、移风易俗为办学目的，实际上却与府（州）县学一样，成了以考课为主的科举预备机关。

（二）关中书院的特点

关中书院是明清时期全国著名书院之一，是陕西的最高学府，兼具学术研究机构的性质。它继承了宋元书院遗风，以阐述孔孟的“一一躬身尽道”和程朱理学的“精一执中之学”为宗旨；以四书五经、通鉴等为教材；以“纲常伦理要尽道，天地万物为一体”为教学内容。明清两代陕西理学的崛起、文风之昌盛与关中书院有着密切关系。

书院教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和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极其宝贵的组成部分。作为明清四大书院之一，关中书院具备书院教育组织形式的特点：1. 书院既是教育教学机构，又是学术研究组织，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历史上有名的书院，差不多都是当时教育活动的中心和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2. 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会讲，开展争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尽管这种“百家争鸣”的范围十分有限，但较之一般官学却自由得多。3. 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不受地域限制。书院有学者讲学，其他书院和外地书院的师生前来听讲，来者不拒。4. 书院以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书院教学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教学，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能力。5. 书院师生关系比较融洽，感情深厚。相对于官学唯科举是教的办学主张，书院提出了自己的办学宗旨：以人为本，以德育人，“明道”、“传道”。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认为书院有着中国古代学校中为数不多的自治权利，“与官府的学术垄断相对应的，则是书院的那种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所有的脆弱而又支离破碎的自治权利”。

（三）关中书院的影响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最高学府，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书院的创办者冯从吾在继承宋代书院传统学风的基础上兼采其他书院之长，倡导“德教为先”的治学原则与“务戒空谈、敦实行”的教学特点，使关中书院不仅成为明代全国著名的书院之一，而且成为传播关学思想的重要基地，为明清陕西理学的崛起与文风昌盛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数百年间，关中书院秉承宋元书院之遗风，汇聚天下学者士子，延请学富德高的名儒执掌教席，先后有冯从吾、孙景烈、李颙等理学家于此任教；他们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以讲求性理为宗旨，主张“明体适用”。关中之乡试、府试的考举之士，多为此书院之生员。关中书院还培养出清代陕西唯一的状元——王杰。此外，西北奇才于右任、关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刘古愚等也曾就学于关中书院。关中书院为陕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和

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宏道书院、味经书院、崇实书院

（一）宏道书院

宏道书院位于三原城北，由明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之子王承裕于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建立。书院最初由一僧舍改建而成，用来授徒讲学，称为宏道书屋。王承裕乃关学大儒，慕名而来的学子众多，于是在此就读的学生捐资对书屋进行了扩建，始称宏道书院。

宏道书院主要录取陕甘两地的士子入学。与其他书院不同，宏道书院民办色彩更为浓厚，主要是由富户、商贾集资创办与经营，官府只给予少量财政资助。宏道书院虽系民办，其宗旨却十分正统，以“明纲常之道，知修齐之理”为办学方针，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习目的。鼓励学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主要学习程朱理学，涉猎史志知识。宏道书院在教学上不断取得成就，创办初期就培育出马理、吕楠、秦伟、雒昂、来复、张问达等一代名臣。

到了清代，宏道书院更多地接受官方资助，并直接受置署三原城内的陕西学政管辖，已基本上成了官办学府。其学术风气更加浓厚，加上陕西历任学政对书院的重视和扶持，使其很快成为西北学术的一面旗帜。时称“学风之盛，莫过三原”。清末政治腐败，宏道书院在继承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上，又成为宣传民主和科学的阵地，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并培养出了井勿幕、于右任、柏惠民、李仪祉、吴宓等一批革命志



宏道书院

士。于右任曾形象的赞誉宏道学院为“西北革命熔炉”。



宏道书院

（二）味经书院

晚清国难日深，新政之议起，洋务、维新、变法图强之说大倡，陕西书院教育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在新政的潮流中，教授新学、西学、实学的新型书院在陕西出现，其代表是泾阳县的味经书院与崇实书院。

味经书院位于今陕西泾阳县。同治十二年（1873），陕西督学使许振祎奏建味经书院。书院经费由其本人捐廉，并向泾阳、三原、郃阳、韩城、渭南等地绅商筹集。政府规定，味经书院与关中、宏道书院同级，亦面向陕甘两省录取士子。

味经之设，“以实学为主，令诸生逐日研究”。从书院的第一任院长史梦轩主持书院开始，便制订学规，从严教学，使当时在此就读者多有所成。长安名儒柏景伟担任院长时，又在书院内设“求友斋”及刊书处，宣传西方新学。对书院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关学大儒刘光蕡，他任职期间，大胆革新课程，推行西方自然科学，引导学生注重实践。甲午战争后，又在味经书院内设时务斋，研讨中外大事，以图兴亡救国。时值维新运动时期，味经书院不仅成为宣传西学的窗口，也是西北地区维新运动的主要阵地。一时陕甘士子争赴求学。味经书院为社会培养了很多人才，著名数学家张秉枢、爱国教育家杨松轩、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著名新闻家张季鸾都曾先后就读于此。

（三）崇实书院

崇实书院坐落于味经书院东侧。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刘光蕡倡议下由陕西学政赵维熙奏请创建。书院以求实学、做实事为宗旨，设“致道”“学古”“求志”“兴

艺”四斋，以了解时事，探究救国之道，推广实业为目的。书院专设制造所，供学生实验习艺，仿制机器。书院还派优秀学生赴上海学习机械制造和其他先进生产技术，购买新式农具，研究推广发展生产的技术和经验。书院以厉耻、习勤、求实、观时、广识、乐群为学规，在给学生灌输维新思想的同时，又注重发展实业，为陕西培养了一批维新人才和实业人才。崇实书院实为近代陕西以至西北地区一所最早讲授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学校。



崇实书院

味经、崇实书院于课程设置方面，在陕西以至西北最早开设了天文、数学、测量、格致、地理、外语以及机械、农林、矿务、军事等西方新学，并刻印了不少时务新书和西方科技著作；书院还兴办实业，推广技术。这些科技教育和科技出版活动在引进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有志于革新变法的人才。这种改良书院的教学体制也为陕西建立新型科技教育奠定了基础。

三、书院精神与大学精神

唐五代时期发展起来的书院，至宋兴盛。南宋书院数量大增，规模扩大，内容充实，特色鲜明，影响面广，发展到鼎盛时期。然而到元世祖以后，书院出现了官学化的趋势。尤其是在明清两朝，政府更为变本加厉，使书院私学的性质逐渐淡化，乃至于等于官学，沦为国家学制系统中的一员，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性格气质，并最终在清末西式学堂彰显优势时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辛丑条约》签订后，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清政府接受新政之议，其中包括两江总督张之洞以变通政治人才为由而改书院为学堂的奏请。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书院为学堂。

在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书院传递了中国文化和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

代教育思想，并形成了自身独特且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书院精神。书院制度的终结并不能代表书院精神的消失。因为虽然书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从制度层面已经不复存在，但有着千余年历史的书院积淀下来的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仍然有极强的生命力。中国近代一些著名教育家仍然执着于书院优良传统，致力于书院精神的发扬光大。这不仅仅表现在他们对书院以及书院精神的潜心研究上，也表现在身体力行上，对书院精神的坚持与传承上。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在某种大学理念的支配下，经过大学人的共同努力，长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追求的理想和信念。它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所在，是对大学的生存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导向，是千百年来大学得以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书院的大学精神即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书院形成的理念及文化蕴涵，是整个书院文化中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这种精神是书院大学归属的本质所在，也是书院最具典型意义的特征。书院的许多特色，诸如面向下层办学、打破生员身份限制、实施“有教无类”以及开放式办学等等，体现了书院宽容、自由、独立而又具有人文性的独特精神，给教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对中国文人的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1 世纪面对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时代赋予了大学新的使命和丰富的内涵，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要求。对中国的大学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的成功经验，又要立足本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使大学精神重新建立起来，以支撑大学伟大而遥远的未来。简而言之，我们要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大学精神，就不仅要吸收西方文明，更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对其精华加以现代化转化，使其呈现出中国气派。

近年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改革的步伐也不断加强，但是随之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缺乏良好的学术自由的气氛，重科研、轻教学等。而追溯我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其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自由讲学、学术开放等特点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我国台湾教育史家张正藩教授在评论书院时曾说：书院“对于我国教育、社会、政治及学术思想等方面，均有极大之影响。仅就教育而言，如院址之优美，讲学之自由，教训之合一，以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注重自动自发之研究精神等等，若与现代之大学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我们要充分汲取书院的优秀传统，如其所倡导的独立和创新精神、灵活的教学管理、醇厚的师生感情等，这些对于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撰稿人　张　明　张淑霞）

明修“关中八志”与《陕西通志》

一、“关中八志”

宋元时期的陕西方志学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明清时代陕西学者的突出贡献亦主要集中在方志学领域。清初文史大家王士禛就曾说过“关中名志甲天下”，“明代名志多出于秦”。

“关中八志”即是明代名志，即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初刻的康海《武功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初刻的王九思《鄠志》，嘉靖二十年（1541）初刻的吕柟《高陵县志》，嘉靖三十六年（1557）初刻的乔世宁《耀州志》，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初刻的张光孝《华州志》，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初刻的孙丕扬《富平县志》，万历三十三年（1605）初刻的刘九经《郿志》。“八志”除《鄠志》今已失传外，其余都流传至今。



明代“关中八志”颇具特点：其一，较之宋元方志而言，明代“关中八志”体例完备，大致奠定了后世方志的成熟模式。但它的修撰过程与清代方志相比，又具有更多的“个人著述”性质。虽然当时外省籍立官监修、本地名流学者主纂的修纂制度已经建立，但撰写班子比清修方志要简单得多，基本上是成于一人之手，此人即对全书负责。不像清修方志那样写作班子庞大、审订程序严格、作品往往一副“官修”的派头，问责虚置，个性全无。这种带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著述性质的方志，虽然在资料搜集等方面往往无“官修”之书完备，但在成一家之言方面却具有“官书”所难以具有的优点。其二，“八志”的撰写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名人，大多是在京师或外地任过要职后返乡著述的。作为本地学者，他们有眼见耳闻亲身经历之长，而作为资深位置的前官员，他们又比当地父母官即方志的监修者地位更高，比起清代方志的纂者往往地位低于监修者，以至于只能仰其鼻息写出官样文章的情况来，他们的作品显然可能写得更好。

八志中，尤以康海《武功县志》和韩邦靖《朝邑县志》名气最大。康海的《武功县志》，记载本县的山川城郭、津梁市集、祠庙寺观、户口物产等情况，体例得当，内容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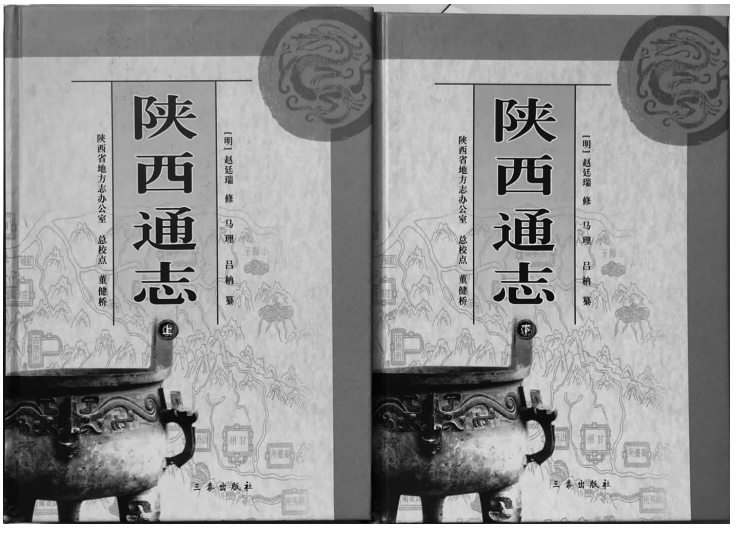
面。王士禛对此志有过“文简事赅，训词古雅”的高度评价。该志初刻后，曾多散佚。清乾隆年间，武功知县得一钞本，由朴学名家孙景烈加以评注后翻刻流行，收入《四库全书》。《朝邑县志》为“朝邑二韩”中的韩邦靖所撰。韩邦靖（1488—1523）字汝度，号五泉，与其兄韩邦奇同年中进士，在明武宗朝同被下过诏狱，同被革职为民，至明世宗朝又同时获平反，并再度起用。其文章与才气也和其兄相类，但 36 岁早夭，故著述不如其兄那样宏富。《朝邑县志》是其最有名的著作，后也收入《四库全书》。

二、《陕西通志》

除“八志”外，嘉靖年间纂修的《陕西通志》也是明代陕西方志学的重要成就。

《陕西通志》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由时任陕西巡抚赵廷瑞主修、陕西三原籍著名学者马理等人编纂的一部省级地方志书，共 40 卷。马理（1474—1556），字伯循，三原县人，是明朝中期关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受教于三原著名学者王恕，后又受教于陕西三边总督杨一清，精心研究《礼记》《礼仪》等儒家经典，成绩卓著，声誉鹊起。据史书记载，高丽国曾专门派遣使者，来中国抄录他的文章；安南使者至京，也一再打听：“关中马理先生安在?”可见其名声之大。后来马理以光禄卿之职致仕回乡，组织人员编写《陕西通志》。书成之后流传至今，成为现存陕西省志中最早的一部，对陕西地方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嘉靖三十四年关中大地震，马理不幸罹难。

《陕西通志》实际上是今天西北几省、区共同的地方志书．其内容分星野、山川、封



《陕西通志》出影

建、疆域、建置沿革、古迹、经籍、艺文、户口、田赋、物产、仙释、职官、水利、兵防、马政、风俗、灾祥、鉴戒及各类人物等，约二百余万字。另有天象、地理、山脉、河流、城池、物产等附图二百余幅，号称“上下古今，括囊殆尽”，在古代各种陕西志书中久负盛名。

三、清代方志学的继续发展

清代陕西的方志学继续得到发展，尤其是乾隆年间毕沅任陕西巡抚时，曾有一大批来自各省的乾嘉朴学大师、文史名人聚居其府，如洪亮吉、刘长明、孙星衍以及陕西武功人孙景烈等，他们都对陕西方志的修纂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学者“敷政之暇，授碑碣以订金石，稽掌故以续文献，故关辅志乘，多成于斯时”，亲自主纂了一批方志，如孙星衍《礼泉县志》《邠州志》《三水县志》，洪亮吉《长安县志》《淳化县志》，孙星衍、洪亮吉《澄城县志》，孙景烈《鄠县志》《郃阳县志》等等，都是陕西清修方志中的上乘之作。毕沅之后，道光、咸丰年间朴学大师蒋湘南主持关中讲席，先后修纂了《同州府志》《泾阳县志》《三原县志》《留坝厅志》，“考核详审，世推佳制”，对陕西方志学发展也多有贡献。

与明代陕西几部名志都属于简约派相反，“清自屡开鸿博，崇尚考据，故诸作多趋于博丽”。朴学名家主纂的陕西方志体例严谨，以博见长，繁而有序，信息丰富，查找方便。不过“官修”的色彩也更加浓厚。

（撰稿人　张　明　张淑霞）

毕沅与清代陕西修志

一、毕沅的方志学

毕沅（1730—1797），字秋帆，又字续衡，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乾隆二十五年（1760）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三十一年（1766），升授翰林院侍讲，后为《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官。此后，毕沅官运鸿通，历任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河南巡抚、山东巡抚、湖广总督等职，前后二十多年，成为清代著名的封疆大吏。



陕西巡抚毕沅

乾隆三十七年（1772），毕沅署理陕西布政使政务，开始在陕西长达 13 年的仕途。毕沅虽身居高官，但极为崇重学术，始终不减学者的气度和素质。公事之余，他的主要精力和兴趣在于治学。毕沅学问渊博，治学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经学、史学、文献学、文字学、子部书籍、金石考古等，辑佚补缺、校勘考释，这些在乾嘉时期均为私家学术发展的主流。因而颇具声誉，时人评价他“于经义、史籍、天文、地志、下逮百家、杂技之类，俱通贯而纂辑之”。为了加强地方上的社会治理，毕沅主张“能以文学拔饰吏治，不特长吏与有荣施”，大力倡导地方官府编修方志。他曾说：“余自壬辰岁开府西安于关中，州县之志皆次修与。”体现出对方志纂修的特别兴趣。同时，毕沅注重延揽各方人才，广开幕府。幕宾多为饱学之士，如经史博通的孙星衍、史地学家洪亮吉、金石学家钱坫、文史学者严长明，等等。这些学者除协助其校书、立说外，还参与编修方志。就在毕沅官陕这一年，四库馆开，清廷下令广征天下书籍。毕沅进献了亲自编定、成书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关中胜迹图志》30 卷。“是编举陕西巡属诸州县，各分地理、名山、大川、古迹四目，考据本末，荟萃诸书，系之以图。”该书被乾隆批准收入《四库

全书》。

乾隆时期的学者把参修方志作为一生的荣耀，章学诚就曾说："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由于地方官员和学者共同参与到方志的编修活动中，编纂了大量高质量的方志。此外，这一时期崇尚实学的考据之风影响到各个学术领域，方志也更加注重翔实有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成书的《韩城县志》的编纂官傅应奎就称："夫邑志之作虽属一隅，然搜讨援据，即史臣记载之义也。"受这一时期风潮的影响，毕沅"从少至老，无一日废书"，"少嗜著述，至老不辍"。例如，他在整理校注《长安志》时参考了大量史料。据统计，有地方志25种，金石碑刻31种，史书政典22种，地理著作17种，经史注疏14种，野史笔记7种，小学典籍4种，类书3种，诸子著作1种。《长安志》的校注当中，署名"沅案"的考证共944条，可见用力之深。他著作等身，有《续资治通鉴》《山左金石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灵岩山人文集》《夏小正考注》《晋书地理志新补正》等。

方志学方面，据统计，仅在陕西，除校刊《长安志》和《长安志图》，由他参与、倡导、支持而成的就有《西安府志》《朝邑县志》《长安县志》《淳化县志》《三水县志》《直隶邠州志》《醴泉县志》《韩城县志》《同州府志》《澄城县志》《长武县志》《蒲城县志》《汉中府志》《扶风县志》《渭南府志》等地方志共28部，占乾隆后半期近30年全部志书的90%。还有一些志书和毕沅虽不曾有直接关联，却是在他的教导和鼓励下完成的。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吴六鳌等修、胡文铨等纂《富平县志》八卷，就是富平知县吴六鳌在毕沅的鼓励之下完成。"毕公训曰：'富平有修志之役尔，其矢公矢，慎毋漏毋支，以蕆厥事。'"《新修韩城县志》也是如此，"大中丞毕公有缮治之命"。

另外，凡是遵循他"檄修通志"要求而实心修纂方志的人，他基本上都予以表彰并为之序。《同州府志》《三水县志》《直隶州志》《醴泉县志》《朝邑县志》《淳化县志》等都有毕沅序。各地方志的纂修人员也都知道毕沅对纂修方志"情有所钟"，纷纷请他作序。

值得重点强调的是，毕沅所撰的《关中胜迹图志》与《关中金石记》，被史学界誉为"关中地理研究的姊妹作"，对关中史学研究贡献极大。《四库全书总目》赞曰："以郡县为经，以地理、名山、大川、古迹、旧事四目为纬，而以诸国附于后，援据考证，各附本条，俱有始末"，一改前朝诸书"体例各殊，纯驳互见"之旧观。且毕沅借访察地理、撰修方志之机，"因以灌溉之利，通山谷之遂，修明疆界，厘正祀典"，将西安古城修葺一新。同时《胜迹图志》中又记录了许多文物保护方法和措施，其在对如何保护陕西境内的古陵园和重要古建筑时曾云："各守土者，及其邱垄茔兆，料量四致，先定疆

域，安立界石，并筑券墙，墙外各拓余地，守陵人照户给单，资其口食，春秋享祀，互相稽核，庶古迹不就淹没”。

可以说，毕沅堪称一位杰出的方志学实践家。


淳化縣志序

淳化爲今陝西下縣於漢則三輔名邑也司馬遷班固皆云黃帝萬靈所庭在焉漢王褒有雲陽宮記揚雄有甘泉宮賦世所艷稱爲淵雲詞賦者均萃於此縣其爲靈勝何如哉至宋而宋敏求長安記程大昌雍勝畧搜采廣博尚校有明所脩縣志爲詳余自壬辰歲開府西安於關中州縣之志皆次第脩舉獨淳化以僻在衆山中民俗凋敝不欲有所創造以動衆然前以公事至縣覽其山川訪其基址未嘗不致意久之歲壬寅邠州及所屬三縣有重脩志乘之請適常州洪孝廉稚存來客西安余因以屬之孝廉精於

淳化縣志序

史學所脩州縣志皆一以史例編之志成凡十八卷余又以十年來所聞見而欲訂定者爲增益十數條於是此書之成其該核可繼長安志雍勝畧二書非世所傳明康海武功志韓邦靖朝邑志等所可比矣知縣萬令廷樹宰是八年亦能以儒學飾吏治者且其挑纂搜輯於是志之成實有力焉例所得附書也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夏五月

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鎮洋畢沅撰

毕沅为《淳化县志》撰写的序言

二、毕沅设置的修志团队——“史志幕府”

出于对学术事业的崇重，毕沅甚喜结交文学之士，并且周济寒俊、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组成以治学和编纂书史为主要活动的史志幕府。后人赞称毕沅“爱才若渴，汲引后进，惟恐不及”。当时著名学者诸如精于历史文献与宋史的邵晋涵，经史博通的孙星衍、凌廷堪，史地学家洪亮吉，文字学家段玉裁，狂狷学人汪中，诗人吴泰来、庄忻、方正澍、黄景仁、杨芳灿，金石学家钱坫，书画家黄易，书画学家钱泳，书法和篆刻家邓石如，文史学者严长明，文史理论家章学诚等，皆曾入毕沅幕府。

毕沅的史志幕府团队处于乾隆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1. 礼贤下士，以义结缘。

毕沅与学者的友情关系，以及对学者慷慨的周济与馈赠，才是史志幕府维系的纽带。毕沅幕府成员间大多出于知遇情义，如同宾朋，出力多少并不与收益对应。洪亮吉称毕沅“爱士尤笃，闻有一艺长，必驰币聘请，惟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在众多文献、

笔记中，记述着毕沅接济许多文人的轶事美谈。先后优待的学者有黄景仁、程晋芳、汪中等经学巨匠；优渥家境贫寒的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所赠银两足以令其购田建园（即今位于安庆的铁砚山房），一举成为富户。不拘一格擢拔著名考据学家孙星衍为幕府中的奇才，因孙星衍“恃才傲物，目无余子，浅学者动遭讥詈，同辈不能堪，欲群殴而攻之”，故而为了平息孙星衍与幕中同僚的矛盾冲突，毕沅“因别构一室处孙，馆谷倍丰于前，诸人益不平，亦无如何也”。毕沅从崇尚学术文化的意愿出发而厚待学者，使之获得崇高的社会声望，有助于其幕府组织的兴旺不衰。

2. 主攻文史，不涉政治。

帮助幕主毕沅修纂史志，是幕宾主要活动之一，这与为处理军政事务而聘用的门客、师爷、谋士大不相同。在中国古代，春秋时期贵族、卿大夫就有私下“养士”之风，其主要出发点在于从中获取政治影响和政治谋略。战国末期、西汉以降，也有任使幕僚纂辑书史事例，如战国时期秦国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就是以这种方式撰写而成的。但这种修书活动，仍然包含表达幕主政治理念的因素，幕僚也没有完全摆脱政治的依从关系，甚至多少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毕沅的幕府则是文化的组合，不参与时务政治。毕沅在任官生涯中，也经历不少政治动荡、军事行动，未见其幕府起到相关的作用。其原因是在乾隆时期高度的皇权专制、朝廷具备超强政治控驭力的背景下，无论毕沅还是多数学人，都不敢贸然组成一个政治性的幕府。总之，毕沅组织的幕府仅仅是一种脱离政治的“史志幕府”。

3. 大师云集，著述颇丰。



毕沅任职陕西时期，幕宾虽然有来有去，但长期保持可观的人员数量。据记载，毕沅自任职陕西地方大员时开设幕府，前后存在时间长达 20 多年，著名学者受到礼遇和资助者就有 50 多位，“士之负笈担簦走其门者如鹜，片长薄技罔弗甄录，海内慕为登龙”。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毕沅幕府在清中期以前都是首屈一指的。毕沅能够组织长达 20 多年、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化幕府，固然间接得益于他的地方大员官职（主要是因官位获得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势力），但其幕府存在和运行的机制却很少官僚气息。而毕沅个人的文化素养、学术见识、崇重学术与尊重学者的态度，是幕府中比其官位更重要的向心力。在毕沅几十年既为高官也不忘学的生涯中，著述丰硕而精深。其中，《关中金石记》以及校刻《三辅黄图》《长安图志》等书，这在我国地理学和金石学上占有一席之位；主持编纂的《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不愧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鸿篇巨制。这些史学著述多在幕内学者协助下完成的，充分体现了毕沅幕府修史的辉煌成就和不朽功绩。

三、毕沅主导纂修《西安府志》

乾隆四十年（1775），著名文史学者严长明以病在告，游历至关中。在与毕沅讨论修志过程中，见识颇同。于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毕沅延请严长明入其幕府，并上书请求纂辑《西安府志》，获得批准。按清代方志通例，府志、县志应以知府、县令之名题为“修”，而主笔的撰写人题作“纂”，这是方志编纂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其余协修、参修、校对等等，各依具体情况署名。但《西安府志》十分特殊，实际主导修纂者乃巡抚毕沅，以省级高官主持所属一府方志，于是创出“鉴裁”“甄辑”“编订”等等新的题名方式。时任陕甘总督勒尔谨排在“鉴裁”首位，时任陕西巡抚毕沅列于第二，其余省级官员依次排列。知府舒其绅列于“甄辑”第一，以下为府、县官员，严长明位居“编定”之位，尚有协修、校对多人。这种安排，目的只是强调了省级官员对这部方志的主持作用，而非西安府自主编纂。实际上，省级官员也是巡抚毕沅主导，题名于本书的人物，起关键作用的是毕沅，其次是知府舒其绅和学者严长明。

《西安府志》的整个编纂过程，从筹划、奏请、编纂、缮修到最后的定稿，统一由毕沅主持。陕西粮储道翁耀曰：“大中丞弁山毕公巡宣是邦，阅兹数载，举凡土物、民风无不备悉。而西安为省会要区，尤加意焉。乾隆丙申夏入观避暑山庄，以各属旧志皆简而不详，浮而寡要，奏加增辑，天子俞其请。”《西安府志》初稿时，“凡与秦中文献关涉者，计得千五百种。发凡举例，类聚区分，文成数万，为门一十有五，分类五十有一，合成一百卷”，后经毕沅“亲加裁削，为《西安府志》八十卷 ”。细看现在的八十卷《西安府志》，其内容详实，分类准确。由此不难看出，由其删除的内容实在是多余的。舒其绅谈到《西安府志》的剪裁时说：“斟酌民言，参稽案牍，凡一郡之农田、水利、食货、建置、官师、学校、选举及人物之忠孝节烈、官有条章、家乡簿籍，恣情披阅，莫敢或遗，亦莫敢或滥。”毕沅评价《西安府志》曰：“披览其文则简要而事复赅，综具程大昌之博议而谢其烦芜，擅何景明之雅材而加以典实。”

在内容编排上，《西安府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了历代关于西安名胜古迹的治理情况，尤其是对清代乾隆时期的记述更为详细，其目的就是为了发挥方志经世致用的功能。比如，《西安府志》对关中书院的记述尤为详细。关中书院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毕沅任巡抚后对其非常重视，“咨访明师，必取博通今古、品行方正者主之。妙选俊髦，潜心教学，共相观摩。后与司道按月轮课，亲赴书院，详加甲乙”。

乾隆四十四年（1779）成书，次年付梓。《西安府志》是自西安设府以来仅有的一部府志。书成之后，舒其绅感叹日：“今国家重修统志，方成数省。而四库馆亦未竣事。

是篇实为诸郡嚆矢。”与以前西安地方志相比，无论在搜荟群籍，决疑纠谬上，还是在体例结构、史学思想上，都具特色，有功于地方史的研究。

除主导纂修《西安府志》外，毕沅又组织吴泰来、严长明、钱坫、孙星衍及洪亮吉等人，以自己为主导，责成各学者编纂陕西各地的方志。自乾隆四十四年（1779）始，他们先后撰成《朝邑县志》《长安县志》《淳化县志》等大量地方志著作，保存了许多正史中没有的珍贵史料。

毕沅从事的就是这种“有趣且有益的事业”，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就。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其中乾隆朝他总共列举了 38 部，而与毕沅有关联的就有孙星衍主撰《三水县志》，洪亮吉主撰《延安府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钱坫主撰《朝邑县志》，占比达 40% 多。“以上诸志，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绩学之长官总其事”，“本邑耆宿负重望居林下”，“为长官者既物色得人，则隆其礼貌，专其委任，拱手仰成，不予牵制”，这正是对毕沅方志学思想主张的精当概括。

（撰稿人　丁　喜）

味经书院及其刊书处

味经书院在陕西乃至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它是陕西维新运动的中心，为陕西培养了大批讲求实学、经世致用的人才，对推进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社会、文化进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经世致用的办学理念

味经书院创立于1873年，是由民间绅商筹建、得到官方认可的一个教学机构。味经书院意为“吟诵、品味”经典，其在办学宗旨、运营体制、管理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当时，关中重要的书院有关中书院、宏道书院等，由于陕西与甘肃两省同属于陕甘总督治下，因此，书院同时招收陕甘两省士子。这两个书院主要以科举考试为目标，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以及各种考试的技巧，对于“四书”以外的其他经典则不予重视，更不用说史学与历代典章制度了。在西方列强入侵、世界科学昌明、社会激烈变革的近代中国，这种教育制度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



味经书院

于是，当时的陕西学政许振祎发动陕西绅商筹集资金，在陕西泾阳创立了一所新的书院，起名为“陕甘味经书院”。

味经书院与关中其他传统书院不同的地方有三点：其一，书院教学内容以“实学”为主，讲习的内容主要有钦定七经及《纲鉴》、诸史、《大学衍义》、《衍义补》、《文献通考》等书；其二，书院最高领导山长要亲自为学生讲课，克服传统书院之中山长脱离学生的弊病；其三，书院归地方士绅管理。这一点尤其重要、其之所以强调由地方士绅管理，就是要把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延续下去，而使其不会因为官员的变动而中断，这在当时应该说颇具长远战略眼光。许振祎将设立书院的想法奏报朝廷，得到允许。书院建立在泾阳县原瀛洲书院旧址上，许振祎带头捐款，陕西绅商积极支持。1873 年 8 月，许振祎调离陕西，继任学政吴大澂对此计划积极支持，并筹措了一万两白银借给商家，以所得利息作为书院的膏火。书院首任山长为史兆熊，他在此建章立制，使许振祎的意图得到充分贯彻。其后，味经书院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社会各方的好评和认可，来书院就学者日众。

1883 年，陕西名绅柏景伟接任山长职务，对书院进行整顿，书院教学随之达到很高水平。1887 年，柏景伟调任关中书院山长，刘古愚（1843—1903 年）接替其味经书院教席。刘古愚和柏景伟都身怀经世之志，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有感于国家衰弱、列强入侵，二人积极投身到自强救亡的运动中。刘古愚在 1895 年到 1898 年的维新运动中表现突出，他北联康梁，中接湖广，并派书院学生南下上海，与全国维新运动活跃的地区声气相同，味经书院一时成为陕西维新运动的中心。



二、从求友斋到刊书处——陕西近代出版业的先声

味经书院刊书处是陕西近代出版业的先声，其历史可以上溯到书院“求友斋”。柏景伟接任味经书院山长的第三年（1885），也正是在中法战争的炮声中，柏景伟和刘古愚在书院创立了“求友斋”。中国在中法战争随胜而败，使得柏景伟认为整个中国大局的败坏，本着从自己做起的原则，柏景伟和刘古愚积极为国家培养能够适应形势需要的经世致用人才，以解救危难。求友斋设立源于三原商人胡子周。胡子周不仅经商有术，而且有报国之志，他看到外国以武力为后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益加深，由衷地希望自己能够对扭转这种局面有所贡献。他找到柏景伟和刘古愚，希望捐出一些银两，为国家培养人才做一些贡献。这样，在胡子周首倡的二百两银子的基础上，柏景伟与刘古愚又筹措了一千两银子，在味经书院开设了“求友斋”。求友斋与书院相比，更加突出了经世致用的特点，把自然科学和西学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学生都是从书院选拔出来的，

入求友斋学习者都是出于自愿，这就保证了学习的积极性。求友斋首批招收学生40名。

在求友斋，柏景伟与刘古愚把学生的学习和版本校勘联系起来，这是味经书院创办以来刊刻的第一批书籍，现见于文献记载的书目有《诗义折中》《梅氏筹算》《平三角举要》《豳风广义》等十余种。经史是中国文化的根脉，在清末，研习经史是题中之义。《梅氏筹算》《平三角举要》《豳风广义》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值得提出的是，刘古愚是自学数学，然后终身致力于推广数学教育的，因为他深深懂得，要学习西方科技，数学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从而使久为“秦中绝学”的数学再次在陕甘流传开来。《豳风广义》是清朝李二曲的弟子杨双山所著的有关农业方面的专著。

由于陕西本地缺乏高质量的校勘、刻印书籍的机构，当时人们所读之书都是从四川、湖广等地购买而来，由于长途贩运，价格昂贵，一般人根本买不起。市场所见的书籍大多是民间的私刻，有些书甚至连经文都删节不全，字句的讹误随处可见，即便如此，关中平原南北的山区也难以见到，当时的文化之衰败可见一斑。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民间缺书的局面，在当时陕西学政柯逢时的支持下，味经书院于1891年8月成立了刊书处，求友斋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刊书处的初期资金一共一万两，陕西官方拨款一千两，以示支持，柯逢时自己捐银一千两，从泾阳县绅商募集五千两，再加上其他人的捐集，共一万两。”这一万两是本金，刊书并不动用，只是把它贷给商人，以每年所得利息为刊书资本。刊书处资本依然属于民间性质，在运营方面官府不予以染指，此事由柯逢时上奏朝廷，准许刘古愚担任刊书处的具体负责人。此外，还成立了由30名出资者代表组成的董事会，每年于其中选出一人任正董事，其他人轮流任董事，味经书院监院周斯亿负责日常事务。由于刊书处属于民间举办，使其有了一个稳定的运营机制，不受官员变动的影响。即使在戊戌政变之后，刘古愚辞去了味经书院山长职务之后，学政沈卫还就刊书处改成由机器刊印的事情去函与刘古愚商量。

刊书处的业务方面有两个特点：其一，慎选人才，刻书与学生培养紧密结合；其二，精心校勘，以成善本。校订人员要严格选择，只有参加了求友斋的学生才能列入正式校勘者的队伍中，其他人经过考核后只能列入学校行列，经过一定程序的考核才能转成正式。刻工要选择专门的工匠，保证字形端正美观。校书须遵行“宁详勿略、宁严勿宽、宁泛博勿固陋”的原则。学生校书不仅仅是字句的考订，相关的知识也要在校书中进行扩充，义理、考据、辞章以及天文、舆地、兵刑、礼乐、农田、水利等各项都需要研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任选一门，在校勘中遇到相关的内容随手记录，以为学问之基。刘古愚还规定了详细的刻书进度，刻工每日刻200字，40名工匠每日刻8000字，每月可刻24万字。第一批参加校书的不足20人，初校、复校共需完成48万字，每人每天要校对2400个字。

1895 年甲午战争之后，刊书处由主要刊刻经史转向了刊刻时务书籍。所谓的时务书籍，就是和当时政局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在当时的学政赵维熙的支持下，刘古愚又在味经书院设立了时务斋，重点研究传播时务之学，把原来刊刻经史著作三分之二的经费转作时务书籍印刷方面的经费，原来校勘经史三分之二的膏火转给时务斋诸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古愚非常强调学生阅读当时有关时务的报纸，如《京报》《申报》《万国公报》等。1895 年 11 月，刘古愚的弟子，当时在北京任工部主事的李岳瑞，给刘古愚寄来了康有为的历次上书诸稿以及《强学会序》《章程》等，刘古愚对康有为的变法思想非常赞同。之后，他通过到北京参加科考的学生以及南下上海的学生和康有为以及当时在上海主持《时务报》的梁启超取得联系，与北京以及东南地区的维新运动桴鼓相应。经过多年经营的刊书处，此时发挥了优势，康有为的著作通过刊书处迅速得以面世。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籍由于观点惊世骇俗，在北京受到打击，张之洞坚决不同意康有为此二书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因此，虽然梁启超为《时务报》主笔，但是由于受到汪康年的抵制，康有为的上述著作也难以借助《时务报》的条件印刷出版。直到 1897 年，才由康广仁主办的大同书局刊印出版。但是在陕西，维新派借助刊书处的力量，使得康有为的《桂学答问》《强学会序》《五上书记》《七上书记》以及梁启超的《幼学通议》能够迅速得以面世，并在周边省份得到广泛传播。

随着清末陕西各地书院陆续改建成各类学校，味经书院合并崇实学院、三原宏道书院，也于 1902 年改建为宏道工业学堂，味经刊书处也走向它的尾声。当时陕西并无专门的印刷机构，味经刊书处作为陕西近代最早的官书局，合并于 1896 年成立于西安梁府街的秦中官书局（即陕西官书局），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归学务公所管辖，属于学务公所图书馆。民国初年独立为“陕西省印刷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成为陕西规模最大的“西安新华印刷厂”。

三、味经书院与刊书处的影响

味经书院刊书处是陕西近代出版印刷事业的先声，陕西机器印书局就是在刊书处的基础上设立的。味经书院“经世致用”的办学理念和以“实学”为主的教育内容，以及刊书处刊布并广泛传播的维新书籍对当时陕西、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文化事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基地

维新运动时期，刘古愚的一批弟子分别在北京、上海参加了维新活动，身在维新运

动中心的李岳瑞将北京和陕西的维新运动联系起来，味经书院及其刊书处就成为西北地区新思想传播的基地，一大批报刊、书籍通过这里扩散开来，从而使味经书院刊书处在中国的出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近代产生巨大影响，使近代中国思想为之一变的重要著作——严复所译《天演论》，据李泽厚先生考证《天演论》的最早刻本就是味经书院的刊本，出版于1894年或1895年。《天演论》一开始是以稿本的形式在少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中间流传的，梁启超、康有为、卢靖、吴汝纶、夏曾佑、吕增祥、熊季廉、孙宝瑄等人首先见到的就是严复的未刊稿本。可见，在刊刻维新书籍和传播方面，味经书院在传播新思想的过程中走到了时代和全国的前列。

（二）刊成善本、嘉惠士林

味经书院刊书处不同于一般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它是将研究与刊书相结合的学术机构，追求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因而其所印刷书籍校订精详、刻工优良、质量上乘。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陕西学政沈卫以泾原两县官绅所刊书百种呈进皇上，并奏请将书目“分咨各省督府学臣，派员来陕采购，以广流传”。刘古愚由于“任味经刊书处事，时越十年，校刊精详，嘉惠士林，其功甚巨，由国子监学政衔晋五品衔”。也是在这一年，味经刊书处改雕版为铅印，奏请朝廷“于官书局存款项下酌提二三千金，在上海购买铅板活字大小数号及铜模机器等件装运来陕，仍交官书局绅董刘光等经理”。此后的刊书处以铅印新办学堂课本和西学教科书为主，排印技术也已走向现代化，将陕西印刷业推进到了大规模机器生产阶段。

（三）培养经世英才

无论是求友斋还是后来的时务斋，历任山长都非常注重选拔优秀人才充实于其中，在味经书院的教学中，传统的经史自然是修习的重要内容，西学以及自然科学也是必备的内容，在校书、刊书的过程中，这些人逐渐成长为新旧兼通的经世之才。在书院参与刊书的有陈涛、杨蕙、孙澄海、邢廷荚、郭毓章、王含初、张鹏一等人，都是一时之俊杰。陈涛、杨蕙、孙澄海在戊戌维新时期往返于西安、武汉、上海之间，使西北与中南、东南声气相通，使陕西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邢廷荚在北京与康有为密切接触，与刘古愚的早期弟子李岳瑞一起成为沟通陕西与北京的纽带。王含初是清末数学家，张鹏一是近代著名学问家。刊书处以及刘古愚的其他弟子，是陕西第一批具有近代学术素养的新型人才。陕西第一批自然科学家大多出自刘古愚门下，当时有关中才俊十九出其门墙的说法。被称为关中三杰的李岳瑞、于右任、张季鸾是刘门弟子中最为世人所知者。

四、味经书院与刊书处的启示

味经书院刊书处存在于传统刊书向近现代图书出版的过渡时期，刊书处从刊书内容到管理制度两方面突破了封建传统模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味经书院刊书处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要敢于打破传统，顺应社会发展，勇于改革创新，只有如此才能推动事业的不断发展。

味经书院的办学方式、教授内容、学习方法、管理模式以及实践环节都蕴含着历代山长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情怀以及中国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表现了中国书院教育鼎盛时期的学术灵魂。书院吸收了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内容，尽管其中的新式教育特别是自然科学教育是初步的，还不具备系统性，但毕竟打开了长期以来陕西闭塞的学术发展局面，打破了关中旧式教育内容与教学传统，引领了陕西乃至西北教育发展的脚步，顺应了历史潮流，为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撰稿人　路中康）



百年沧桑话西大

一、从陕西大学堂到西北大学

陕西近代高等教育肇始于1902年创办的陕西大学堂，即今天西北大学的前身。1901年1月，逃亡西安的清政府颁布了“新政上谕”，开始实行新政。同年9月，清廷又颁布诏令，要求在各省城设立大学堂，各府与直隶州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初，陕西巡抚升允奏请开办陕西大学堂，很快到清廷批准，正式创立了陕西大学堂，并于三月招生开学，成为近代史上中国西部省份成立最早的地方性新式高等学府。陕西大学堂位于西安原游艺学塾旧址和咸宁、长安两县考院旧址上，聘请时任清政府光禄寺卿的屠守仁为总教习，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主要讲授儒家传统经典“四书五经”，同时开设有天文、地理、算学、化学、测量、地质、电学等新式课程。当时的陕西大学堂不仅是一所地方高等学府，同时还兼有行政教育机关的职能，负责管理陕西全省中小学堂的学务。

自从陕西大学堂创办之后，陕西的高等教育开始发展起来并初具规模，先后建立了“陕西师范学校”“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宏道工业学堂”等专科学堂。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陕西巡抚夏时奏请清政府批准，将陕西大学堂改为陕西高等学堂，拟定了《高等学堂更订章程》，规定了学校的办学规模和学制，增设了英文、日文等外语课程，并聘请日本人和中国留学生为各课程教习。陕西高等学堂第一期学生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毕业，到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计有三期共208名毕业生。

中华民国元年（1912），时任中华民国秦军政府大都督的张凤翙，决心振兴西北的高等教育事业，计划在西安创设一座新型大学——西北大学，并亲自出任“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不久，即以陕西法政学堂为基础，合并陕西高等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三秦公学等学校，正式创建了西北大学。西北大学以原陕西农业学堂旧址（即今天的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为校址，设有大学部、预科部及文科、哲学科、法律科、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毕业证

商科、边务科、农林科等专门部，于1912年春正式开学，第一届招收学生约五六百人。到1913年时，西北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已达到1804人，并在1912至1915年间，向日本派遣了两批留学生，并创办了第一期学术期刊——《西北大学学丛》。

西北大学诞生于时局多变的清末民国初期，也就注定了它前途多舛的命运。1914年6月，袁世凯派其亲信北洋军第七师师长陆建章率兵入陕，取代张凤翙成为陕西督军，不久就逮捕了西北大学校长钱鸿钧，并于1915年下令撤销西北大学，改为公立陕西法政学堂专门学校。1918年，原镇嵩军统领刘镇华被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为陕西省省长，1912年兼任陕西督军，刘是个作恶多端、祸陕甚烈的地方军阀。就是这个刘镇华，在重办西北大学上却至为积极，出力甚多。他曾经说过："少练一团兵，就可以办一个大学。"于是在1928年8月成立了"西北大学筹备处"，任命其同乡、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弟子傅铜为筹备处处长，并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负责聘请教师和购买图书仪器。1924年1月，曹锟政府正式批准立案，西北大学再次开办，并于2月正式招生，3月正式开学，共录取了来自14个省280名学生。

再次开办的西北大学由傅铜担任校长，为了创牌子、聚时望，在刘镇华的大力支持下，与省教育厅在1924年暑假合办了西北大学"暑期学校"，邀请国内学界名流来陕讲学。当时应邀前来的有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

儒，东南大学教授刘文海、陈钟凡，陈定谟，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等，还特别邀请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从1924年7月21日到29日在西北大学作了8天的演讲，后来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这次讲学的演讲稿。“暑期学校”的开办对长期落后、闭塞的西北带来了学术新风，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学术文化的发展。

1926年，发生了为期八个月的西安围城事件，死于战火和饥饿、寒冷的西安军民达5万之多，地处西安城外西南郊的西北大学也饱受兵燹之祸，校舍残破，学生流亡，到西安解围时全校师生已不足200人。1927年1月，战时临时地方军政府、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权——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鉴于西北大学元气大伤，经济拮据，决定“收束”西北大学，所余校产经费改办西安中山学院。西北大学再度停办。

二、从西北联大到国立西北大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华北地区北平、天津的高校纷纷迁入内地。9月，教育部下令由迁到西安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联合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成为今天西北大学的直接前身。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规模较大，下设文理、法商、教育、农学、工学、医学六大学院，有学生1400余人，校区分布在今天西安市庙后街、小南门外东北大学校舍和北大街通济坊三处。1938年初，由于正面战场失利，日本侵略者占领了风陵渡，威胁潼关，西安吃紧，日寇隔黄河向陕西境内打炮，还经常派飞机轰炸西安。1938年3月，由“蒋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出面，借口“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及为国家根本的教育事业起见”，下令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全校师生由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宝鸡，然后编队徒步穿越秦岭，到达汉中。4月3日，当时的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方案，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西北联大校本部设立在城固县考院旧址，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分布在城固县城，医学院设立在南郑，农学院设立在勉县。偏僻的汉中一时学者、学生云集，人才济济，书声琅琅，成为整个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西北联大以“勤朴公诚”为校训，以“培养人才与服务社会并行”为原则，努力从事教学科研，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当时西北联大的知名教授有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文学史专家高亨、张西堂、高明，历史学家许寿裳、黄文弼、萧一山、陆懋德，教育学家马师儒，艺术与文物专家王子云，经济学家罗章龙，地质学家张伯声、郁士元，物理学家岳劼恒等专家学者，他们一边教育育人，一边从事科学研究，在艰苦的环境下了推出了一大批影响当时及后世的研究成果。

1939 年 8 月 8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并将原联大工学院改为西北工学院，联大农学院改为西北农学院，联大师范学院改为西北师范学院，联大医学院改为西北医学院，均独立建校。西北大学仅保留了原文理学院和法商学院。根据当时规定的必须有三个学院才可称为大学的制度，西北大学将文理学院一分为二，建立了文学院和理学院，原法商学院保持不变。三个学院之下共有十二个系，仍为中国西北地区最高学府。在 1939 年 9 月国立西北大学秋季开学时，全校共有教职工 216 人，学生 851 人。1941 年 9 月，国立西北大学创办的《西北学报》，发表专文介绍了西北大学教授南迁以来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和专业论文。1943 年 1 月，创办了学术研究刊物《西北学术》，先后发表了陆懋德教授的《汉中区的史前文化》、高亨教授的《周易故经今注》、黄文弼教授的《吐鲁番之历史与文化》等重要论著。1945 年 1 月罗章龙教授的新著《中国国民经济史》（上、下册）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就在学术界引起重要反响，被教育部指定为大学丛书。9 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到城固访问西北大学，作了《科学与民主主义》的学术报告，并向西大赠送英文书刊数百册。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位于汉中城固的西北大学经常由进步社团出面，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一是组织阅读活动，阅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和《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进步报刊；二是每年 7 月 7 日全校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发表纪念文章、诗歌和壁报等文艺作品，上演以抗战为主题的话剧；三是举办时事讲演会和时政座谈会，听取关于抗战军事形势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报告，讨论抗战前途和中国未来的命运。西北大学也有不少热血男儿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沙场。地质系年轻教授郁士元带头志愿从军，被称为“抗战以来教授从军第一人”，前往重庆受到蒋介石接见，并被授予少将军衔。一时间，此举成为特大新闻，广为传播。蒋政府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掀起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西北大学报名从军的教职工有 56 人，学生 253 人，工警 46 人，最后经体检合格者 50 人，编入青年军二零七师，先至云南再赴印度参加中国远征军作战。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在城固侨寓七年的西北大学立即成立迁建委员会，筹办迁回西北大学永久校址西安事宜，并于 1946 年 4 月底正式开始回迁。在全校师生告别城固之际，于校本部讲舍旧址勒碑纪念。碑文题为《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由中文系教授高明撰书，校长刘季洪领衔立石。西大回迁西安后以原西北大学旧地为校址，各项条件远较城固优越，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得以开展起来，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三、从教育部直属综合大学到省属全国重点大学

1949 年 5 月 20 日，西安解放。西北大学迎来了新生，进入全面发展时期。1949 年 7 月，陕西师范专科学校、陕西商业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并入西北大学；1950 年 3 月，南郑师专分校并入西北大学；1950 年 4 月原并入西北大学的医学院独立为西北医学院（即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1950 年仲夏，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带着毛泽东的任命状和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委任状，到西安就任西北大学校长，西北大学进入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 14 所综合大学之一，各个学科大师云集。除了校内四大学部委员外，历史系的陈直、陈登原、马长寿，体育系的王耀东，地理系的傅角今、王成组，文学系的张西堂、傅庚生、郝御风，物理的岳劼恒、旺仁寿，地质学系的张伯声、郁士元等，都是所在学科的泰斗。1952 至 1953 年，在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大调整时，西北大学英语系二、三年级学生并入北京大学，一年级与俄语组教师并入西北俄文专科学校（今西安外国语大学前身），原兰州大学经济系、银行会计系并入西北大学；西北大学的经济、银行、会计三系被合并到兰州大学；1952 年 11 月，西北大学少数民族系迁往兰州，并入西北民族学院；1953 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安师范学院（即今陕西师范大学前身）；1958 年法律系从西北大学分离，与西北政法干校合并为西北政法学院（即今西北政法大学前身）；1960 年西大经济系与他校合组为西北财经学院（即今西安交通大学财经金融学院前身）。

1958 年，侯外庐上调北京，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从延安来的副校长刘端棻就任西北大学第十五任校长。1959 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西北大学由教育部直属综合大学改归陕西省属高等院校。1978 年西北大学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现为国家“211 工程”大学、国家“一省一校计划”重点支持建设院校，教育部和陕西省共建高校。全校有太白、桃园、长安三个校区，总占地面积 2360 余亩。设有文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历史学院、文化遗产学院、地质系、石油化学化工学院、艺术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等 22 个院（系），80 个本专科专业，5 个研究中心，12 个研究所，40 个研究室。拥有 177 个硕士点，19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85 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2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地质学、物理学、化学、历史学等 4 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1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14 个省级重点学科，5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大英百科全书》把西北大学列为世界著名大学之一。全校现有教职工 2400 余人，其中中科院院士 3 人，“长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 4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4 人，教育部创新团队 5 个，国家级教学名师 4 人，国家级教学

团队 5 个，国家级和省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42 人，全日制在校学生26 000余人，其中研究生 7000 余人，外国留学生 700 余人。

西北大学一直坚持“公诚勤朴”的校训和自强不息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为国家培养各类专业人才 10 余万名，其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为所在行业、部门、地区的业务骨干、学术带头人和领导干部。学校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经济学家的摇篮”“作家的摇篮”。学校每年承担国家“973 计划”“攀登计划”“863 计划”、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百余项。先后获得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陕西省最高科技成就奖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奖励。

四、西北大学百年发展史的影响

西北大学的百年发展史，是陕西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政局动荡不安，清王朝为了迎合列强，笼络民心，培养人才，下令地方兴办新式学堂，发展高等教育，西北大学的前身——陕西大学堂在古城西安应运而生，陕西的高等教育开始发展起来并初具规模。民国初年，地方政府为了改变西北地区文化落后闭塞的局面，正式创办了西北大学，但仅仅存在三年之后就被北洋军阀摧残于襁褓之中。20 世纪 20 年代，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持续发展、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时，地方军阀也开始附庸风雅，发展教育，再次开办西北大学，并举办“暑期学校”，邀请全国学界名流来西安讲学，促进了西北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军阀混战又使得西北大学饱受蹂躏，举步维艰，不得不再次停办。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为了保存和坚持中华民族的高等教育事业，华北地区的高等学府或南下或西迁，南下的高校整合为西南联大，西迁西安的高校整合为西北联大，给陕西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学术新风和发展机遇。西北联大南迁汉中城固后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最高学府。西北联大和西北大学侨寓城固八载，以“勤朴公诚”为校训，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坚持中国文化的血脉，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立西北大学进入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陕西高等教育发展也迎来了辉煌的发展时期。到了 2013 年，陕西的高等院校总数已在全国排名第三，民办高等院校总数全国排名第一，在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北大学地处周秦故都，汉唐胜地，西北上庠，百年发展几经风雨，饱受离合，历尽沧桑，被称为“西部高校之母”。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兰州大学经济学院、西北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

著名高校，都流淌着北大学的血液，大多是从西北大学分离出来单独成校的。今天的西北大学作为全国重点综合类研究型大学，文化底蕴深厚，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实力强劲，特别是历史考古学、经济学、汉语言文学、地质学、物理学等基础性学科研究在全国名列前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就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专业；著名作家贾平凹、迟子建毕业于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魏杰、刘世锦、邹东涛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新中国的第一批石油地质专业人才大多是从西北大学地质学系走出的，据统计，曾一度在全国十四个大油田中，有十三个油田的局长或总地质师均由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的毕业生担任。西北大学也因此赢得了“中国工商经济学界的西点军校”“中国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作家摇篮”“中华石油英才之母”等美誉。

（撰稿人　卢　鹰）

驷驖车辚话秦声

秦腔又名秦声、梆子腔、乱弹，是我国古代四大声腔之一。在繁花似锦的中国戏曲园地里，它作为一个地方戏曲剧种，就像秦地人一样的古朴憨厚、激昂慷慨、端起端落，由于它孕育诞生于自古帝王朝的秦中，长期承受着周秦汉唐文化的雨露，有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许多遗传基因。在陕西四十多个地方戏曲剧种中，它更具有秦人的风神品格，所以，成为各阶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一种融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与技艺于一炉的综合艺术。

一、光辉灿烂的历史

秦腔是以秦声为声腔体系的剧种。溢觞于西周时期秦地的旷野牧歌，《秦风》《豳风》的作为“乐”，已表现出音乐、诗歌与舞蹈的自然组合。在秦汉时期的百戏杂陈中，又广泛地吸收了“戏”的一些实体性的表演动作。三辅人民创作演出的《东海黄公》，标志着陕西戏曲的形成。在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高度发展的李唐时代，它又在各门类艺术都得到充分发展与日趋融合过程中，为适应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从大曲中吸收、消化了慢、中、快、散的板式结构，初步建立了以板式变化为特点的音乐体系。安史之乱后，大量教坊、梨园艺人的流落秦地民间，专业艺人与群众的结合，共同促进了秦腔的形成。宋代的“串梆子”与元代的秦声杂剧，又进一步推动了它的发展。到了明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一大批有识之士，积极参加秦腔的艺术实践，使之臻于4成熟。至今尚保存的明前七子之一康海亲手绘制的131幅彩色脸谱，风翔木刻年画中正德二年（1507）与七年（1512）的雕版《回荆州》、《二进宫》，和当时周至举人张附翱创建的张家班戏班与康海、王九思、许宗鲁、何栋、胡侍、张炼等人的家班，还有遍布三秦大地几百座戏搂，连绵不断的城乡秋神报赛演戏活动，都雄辩地说明了它的成熟。也就在这个时期，秦腔清游大江南北。清代是秦腔的鼎盛时期。在秦地拥有各种类型的班社五百余家，编演的剧目，有史可查的达两千多种，从业人员近万。声腔上、表演上、演员之间、班社之间，出现了许多独具特色的艺术流派。正是在这一大普及、

大发展的形势下，陆续出现了十几部秦腔理论著作。有代表性的，像三原张鼎望康熙年间撰写的《秦腔论》，乾隆时内廷侍读严长明的《秦云撷英小谱》，史学家吴长元的《燕兰小谱》，晚清则有三原解元陈伯澜的《群儿赞》。18 世纪时，魏长生多次带秦腔入京，一时称盛京师。乾嘉时谈论秦腔的论著多达一二百种，出现了“秦腔热”。京秦同台、徽秦同台，有力地促进了京剧的形成与发展。在长达近两个世纪的“花雅之争”中，由于秦腔的“随唱胡琴，善于传情易入市人耳目”，一举夺得剧坛盟主地位。

在我国品种繁多的地方戏曲剧种中，秦腔能历经数个世纪而不衰，主要原因是：它始终植根深厚广阔的西北黄土高原的泥土中，并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顺乎潮流，不断调节自己本身的机制，进行艺术上的推陈出新，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变化的审美情趣。不断的改革，促进了这一古老艺术的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才使它能永葆艺术青春，人称“老树红花”。18 世纪时，秦腔艺术家魏长生和魏派传人的创新，在北京，遂使“京腔旧本置之高阁”，“六大班几无人过问，或至散去”（《燕兰小谱》）；在扬州，“昆班子弟亦有倍师而学者”，以至“将素习昆腔抛弃”，出现了“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这些成就，自然应归之于魏长生等人在秦腔唱腔、表演、化妆、剧目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他演出的《赛琵琶》，即早期的《秦香莲》，曾受到当时朴学大师焦循的高度赞扬。说“此剧自三官堂以上，不啻坐凄风苦雨之中，咀茶啮蘗，郁抑而气不得申，忽聆此快，真久病顿苏，奇痒得搔，莫可名言，《琵琶记》无此也。”又说：“真是古寺晨钟，发人深省。”（《花部农谭》）

在近现代史上，秦腔更是在不断的改革中得到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辛亥革命后，易俗社这个由一批文化程度很高的学者创建的机构，首先把剧本



秦腔《龙凤呈祥》

的编写、艺员的培训、演出实践结合起来。他们高举科学、民主、移风易俗的旗帜，艰苦卓绝地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推其陈，出其新”（李桐轩《甄别旧戏草》）工作，从而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一、把编写新剧本作为中心任务，提出了“以新编脚本为主”的方针。为此，他们组织了一个由数十名专家学者、业余专职参加的作家群，坚持不懈地进行这一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三十多年中，共创作新剧目六百多种。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与科学、民主的思想精神。其中突出的有被誉为“易俗社双璧”的孙仁玉、范紫东和高培支。孙仁玉的创作，以短小精干的小剧为主，共有一百六十多种；范紫东以情节复杂、场面恢宏的鸿篇巨制为主，留下了68本大型剧目。中国近代史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们都搬上秦腔舞台，使之成为一部中国人民近代历史的连续剧。不少剧目至今仍呈现在舞台上。二、在唱腔上大胆地吸收借鉴了陕西一些小戏的艺术营养，创造了长达二三十字的如泣如诉、缠绵悱恻的新腔调：在表演艺术上，追求“传神写真”“感人易人”，从而形成了以其细腻儒雅的做工和慷慨激越的唱腔为特点的艺术风格。这方面，陈雨农的建树最大。三、在秦腔中首先建立了导演制（当时叫教练制）。四、从学文化入手，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先后招收了14期学员，人数达六百余名。“衰派之一绝”的刘毓中，与梅兰芳、欧阳予倩共称为“北梅、南欧、西刘”的刘箴俗，“西北梅兰芳”、王天民，和沈和中、宋上华、马平民都是他们中的佼佼者。至今，易俗社的学生仍活跃在西北五省区舞台上，不少人成为戏曲界的中流砥柱。所以被鲁迅誉之为“古调独弹”。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秦腔在这一大背景下，又有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和关中八一剧团在易俗社基础上的锐意革新。1944年曾被陕甘



秦腔《锁麟囊》剧照

宁边区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马健翎，毕其一生从事这方面工作，《血泪仇》是他的代表作。秦腔也成为“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武器”（彭德怀《给民众剧团的一封信》）。毛泽东主席观看演出后，说：“群众很喜欢这种形式”，并在一些论著中，多次赞扬这种“新秦腔”，视之为建设新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些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秦腔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了生力军。此后的秦腔，正是沿着这条路，不断发扬光大的。新剧目的层出不穷，新人的大批涌现，表演艺术上的精益求精，极大地丰富了陕西三千万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1991 年冬，陕西省振兴秦腔指导委员会举办的陕西省群众秦腔演唱大赛，参加者达数万人，正说明了这点。

二、驷驖车辚的风格

秦腔的艺术风格，可以用《诗经·秦风》中两首诗的首句二字加以概括，这就是“驷驖车辚”。它表现在秦腔的各个方面，诸如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剧目与舞台美术，都是这样。

就拿秦腔音乐来说，它是一种以板式的变化，来表达一定思想感情和内容的音乐结构，俗称板腔体。具体来说，就是以速度适中的一对上下七字或十字句格局的乐句为基础，在变奏中强调节拍、节奏的变化作用，用许多不同的板式的变化与联结，作为整个戏曲音乐的基本手段，表现各种不同的情绪与内容的。这完全不同于元杂剧与明清传奇的曲牌联缀体音乐结构。它是秦地人民群众与艺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充分利用曲调在行腔用韵方面的原则，把一支曲子用许多不同板式唱出来，既使人听起来并不感到单调，又能使快慢得到调节，使曲调与戏剧性结合得十分紧密和谐。

秦腔音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板腔体的唱腔音乐，一是曲牌式的伴奏音乐，一是以大锣大鼓大钹和梆子为代表的打击音乐。秦腔的板式节奏主要有：一板三眼、一板一眼、有板无眼、无板无眼四种。板式又叫板路，达六类二十种。各种板路因起、落的不同，又有许多细小的区别。除滚板外，各板路又都有快、慢与花音、苦音的分别。二六板是秦腔板路中最基本的板式，应用也最为广泛，常用于剧中对话与叙事，其他板式都由它衍变而成。慢板是秦腔中重要板式，速度较慢，节奏严谨，唱句规律，曲调迂回、婉转，抒情性极强，长于表现人物复杂的思想感情与内心活动。代板是秦腔中戏剧性很强的板式，它能突出语言和节奏的特点，常在戏剧矛盾发展高潮、人物情感非常冲动时使用。垫板长于表现高亢激烈、紧张豪放的情感。滚板则长于表现一种极为悲伤、痛戾之情，如泣如诉，回肠千转。

秦腔音乐的音域十分宽广，一般是从低音“1”到“5”，共 12 个音节，有时达 24

个音节。主导乐器秦胡（俗称胡胡、板胡）的定弦，正和这一音域相适应。其主音是5，在慢板和一切下句结束音，都毫无例外地用5，所以称作“徵调式”。当演唱时，如果站在远处听的话，似乎只是连绵不断的“5”在奔流，给人以高亢嘹亮的深刻印象。秦腔唱腔的调式，也正是以5为主音。再由围绕主音的音群的变换，形成了花音与苦音两个调式。前者欢快、刚健、清新，善于表达喜悦、轻快、爽朗和欢腾的感情：后者浑厚、深沉、激越，长于抒发悲哀、痛戾、凄凉和怀念的情怀。正因为这一中国调式的特殊方法，秦腔在唱腔上表现为满宫满调、端起端落的特色，有如清代严长明所说：“至秦中，则人人出口皆音中黄钟，调入正宫……其擅长在直起直落，又复婉转关生……叩律传声，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钩，累累乎端若贯珠。”“激流波，绕梁尘，声振林木，响遏行云，风云为之变色，星辰为之失度。调中有句，句中有字，字中有音，音中有态。小语大笑，应节无端；手无废音，足不徒跣，神明变化，妙处不传，则音而兼容。”（《秦云撷英小谱》）

秦腔剧目十分丰富，近年调查统计约有万余本，现存八千多本。它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秦腔的艺术风格。在取材上，以描写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反映完整的政治、军事斗争，表现英雄业绩的正剧、悲剧最为突出，民间日常生活与家庭婚姻的剧目，也占一定分量。从现存剧目看，大型的历史、传奇英雄剧，如列国、三国、隋唐、水浒、杨家将戏所占比重甚大，俗称“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尽的列、三国”。秦腔剧目中，保留有90多本杨家将戏，谱写出杨家自杨衮到杨文广五代男女老少、主仆亲朋们前仆后继、为国尽忠的光辉事迹，表现出中国人民传统的不怕牺牲，勇于赴难，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可贵的是，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剧目，成为历史“实录”。明清两代的“三珠一寺加一坠”（《庆顶珠》《串龙珠》《明月珠》《法门寺》《玉虎坠》），“三打一破”（《打金枝》《打銮驾》《打镇台》《破宁国），还有“四山”“四柱”“上八本”“下八本”“中八本”“江湖十八本”等等，真是琳琅满目。近现代由于秦腔作家群的出现，则有易俗社作家们创作的《鸦片战纪》《宫锦袍》《秋风秋雨》《新华梦》《一字狱》《三滴血》《还我河山》《血泪仇》《关中四杰》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改编的《游龟山》《游西湖》《赵氏孤儿》《火焰驹》《西安事变》等，深受人民群众欢迎。从总体看，这些剧目，在思想上，表现出对封建政治制度礼教不同程度的抨击与批判，对异族侵略的顽强抵抗斗争，对贪官污吏的揭露和鞭挞，对一些不良倾向的批评与嘲讽；同时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与道德情操，颂扬了好官、清官的德政，赞扬了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侠女义士的不畏强暴、助人为乐的义举，也宣扬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力量和他们的生活理想与审美情趣，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的倾向看，它是秦地人民群众理想意愿、道德品质以

至美学观点和价值观念的直接反映。长期以来成为人民群众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进行自我修养的教材。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些错误的东西。从戏曲文学上看，秦腔剧本采用分场制的编剧体制，以板式变化构成每场戏的音乐结构，能够根据剧情的需要安排唱词，安排不同的场次，并把各种做唱念打在每场中巧妙地结合加以运用，或根据一种艺术手法为主去安排做唱念打，从而出现了以大段大段唱腔（有时达百余句）为主的唱腔戏，以做表为主的做工戏等等。它是一种繁简得体、点线结合的格局，便于舞台时间、空间的灵活运用与处理，也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剧情、矛盾冲突的开展。秦腔的这种编剧体制，是继元人杂剧、明清传奇以后，在中国戏曲文学上的又一伟大贡献。

秦腔表演艺术也是以奔放豪爽为特点的。具体说就是：生旦净丑，角色齐全；做唱念打，综合处理；以虚写实，虚实结合；超越时空，云游八极；场面宏大，动作规范。秦腔也有《走雪》《拾玉镯》《柜中缘》那样细腻委婉的表演，但更多的仍是豪爽痛快的表演，以至连一些以儿女之情为内容的表演，旦角仍“亦渐雄风，皆勇于公义”，“有趋车赴公之勇”。表现在舞蹈动作上，就是幅度较大。艺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创造积累了许多表演程式，像吹胡子瞪眼，抖马拉架子。拉架子就是扎架势，仅上场、下场的架势就有数十种之多，如平马式、弓箭式等。其他像搜门、滚遍、踏三锤、拉喝场、磨锤子等，雄浑庄重；高难度的表演特技有吹火、踩跷、吊帽盖、鞭打灯花、甩梢子（一种长假发）、耍翎子等等，刚劲利索。秦腔角色有十三门二十八类，俗呼“十三头网子无所不备”，可谓细致齐全。须生、红生、大净与青衣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破宁国》同时出现四个红生和一净角，人称“四红加一黑，必定破宁国”。秦腔艺术在长期的实践中，名家辈出，各领风骚，也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艺术流派。像乾隆中期声腔上的大荔腔、周至腔、渭南腔与礼泉腔，和由此而发展成的五路秦腔；西安乱弹、西府秦腔、同州梆子、汉调挑挑与阿官腔。在艺人之间，则有以艺擅长的申祥林，以声擅长的小惠，以扮相擅长的琐儿等；班社之间易俗、三意之别等等，角色间的流派就更多了。他们共同促进了秦腔艺术的昌盛繁荣，缤彩纷呈，也满足了不同观众的欣赏兴趣。秦腔脸谱是人物性格的一种立体外观。以三原色为主，间色为副；平涂为主，烘托次之；在显示人物性格上，表现了“红忠、黑直、粉奸、金神、杂奇”的特点；线条粗犷，笔调豪放，着色鲜明，对比强烈；图案壮丽，寓意明确。共称“火爆”格调。舞美方面也是这样。它们共同成就了秦腔驷驿车辚的艺术风格。

三、深厚广泛的影响

秦腔是我国人民创造的极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戏曲百花园里的一棵老树红花。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史上，尤其是在明清以来的“花雅之争”，在近代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乾嘉学者的普遍重视，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的赞誉，毛泽东同志的称颂，都说明了这点。它对中国地方戏曲声腔剧种的影响更大。作为板式变化体的音乐结构，不仅把我国戏曲声腔艺术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也影响、促进了整个梆子声腔剧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目前仍活跃于舞台的北方各路梆子，都与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陕西，它还促进了四十多个地方小戏搬上大舞台，真有一花引来百花香的作用。艺人们也说：“一声梆子响，神州都在唱。”此外，乱弹腔系、皮簧腔系许多剧种，也有它一份哺育之功。皮簧腔中的“西皮腔”，就是在秦腔的基础上形成的。说到剧目，它积累的万余种剧本，不仅丰富了中国戏曲文学的宝库，也为其他剧种提供了移植、改编的方便。像人们共所称颂的《打渔杀家》《秦香莲》《春秋配》《火焰驹》《拾玉镯》《柜中缘》《血泪仇》《游西湖》等等，它们都出自秦腔，而成为盛演不衰的剧目。

秦腔自明中叶以后，陆续流播神州各地，特别是白莲教与李自成起义、秦晋商人与艺人的搭班流浪演出，极大地推动了它的流播与扩散。台湾至今仍有秦腔剧团的活动。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西秦会馆或山陕会馆的戏楼，仍回响着驷驖车辚的声音。

1983 年，陕西省成立了振兴秦腔指导委员会，极大地推动了秦腔艺术的发展，秦腔从此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撰稿人　焦文彬）

第三编

民生

秦直道

一、秦直道修建缘由

秦代是古代中国陆路交通网的初创期，秦统一前，北方日益强大的匈奴成为中原政权的威胁。统一后，始皇嬴政即派蒙恬北伐，收复河套以南地区，次年又越过黄河，将匈奴赶至阴山以北，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设立九原郡，在迁徙移民屯垦的同时修筑长城。秦始皇认识到出于保卫边防目的，必须建立交通、通讯和军需补给等快速反应体系，一旦战争爆发，中央能在最短时间内启动应战机制。于是，在公元前212年，命蒙恬和扶苏在镇守边关的同时监修直道。《史记·六国年表》卷十五载："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史记·匈奴列传》索引十三载："苏林云：'去长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这条南北走向的道路大致呈直线，故被称为"直道"。该工程前后用了近五年时间，约至秦二世三年（前207）竣工。

秦始皇直道是秦王朝营建的重大工程之一，以规模之宏大、意义之重要以及施工效率之惊人，可以看作秦政的文明标志。《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秦直道的修筑，当然也是规模宏大的经济行为。关于秦直道的建设动机，《史记·蒙恬列传》的记述，强调秦始皇个人的出行需求："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李斯为赵高构陷，于狱中上书秦二世，自言七条罪状，实则自陈建国强国之功绩，"幸二世之寤而赦之"。其中说到主持驰道规划建设："治驰道，兴游观 ，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也说秦帝国的交通建设事业，目的在于满足秦始皇"游"的需求，炫耀威权，"以见主之得意"。《资治通鉴》卷七"秦始皇三十五年"的记载引用《蒙恬列传》的内容，然而不取"始皇欲游天下"语："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数年不就。"司马光的取舍，体现出正确的历史判断。显然，秦直道营造的主要出发点，并非仅仅满足"始皇欲游天下"的需要。

从秦直道工程主持者蒙恬的身份可以得知，修筑这条道路的主要意义，在于完备抗

击匈奴的国防建设。司马迁“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说明了直道和长城边防的关系。《史记·匈奴列传》又明确写道：“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开通直道的作用，与“塞”“戍”“据”等长城防务建设有关，也与“北击胡”，“渡河”攻伐匈奴的作战行动有关。

直道南起云阳林光宫（西汉为甘泉宫，今咸阳市淳化县梁武帝村），由甘泉山一路向北，途经陕西、甘肃、内蒙古等三省区，穿横山山脉、黄土高原、鄂尔多斯草原，跨黄河直抵九原郡麻池古城（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孟家湾村）。路面最宽处约 60 米，一般亦有 20 米，它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河套图志·秦汉塞道》载：“今以秦人塞直道考之，自九原起，南至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则今之泾阳至延（安）榆（林），北达乌剌忒旗之五原县，皆秦建筑古道。”直道是秦首都咸阳通往北方前线最便捷的道路，它和早年修筑的长城互为依托，构成了一个既能阻挡匈奴南下，又能快速为前线输送军队和补给的整体防御体系。秦直道所在地势较高，施工较平地困难，却因此减少了人为破坏，减少了河流冲毁导致的水土流失，使它成为遗迹保存较好、较接近原貌的古道路标本。虽历经两千余年的环境变迁，部分路段至今仍能使用。史载直道“道广五十丈，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可见直道的设计规划和施工，已具备今天高速公路的雏形。秦林光宫位于渭河谷地的北缘接黄土高原处，是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交汇、对峙的敏感地带，名为帝王避暑离宫，实乃抗击匈奴的军事指挥中心。直道作为秦帝国的交通和信息网络系统，连缀着沿途的关塞和城镇，加上道路自身具备的综合功能，又使它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它的修筑增强了中原王朝军队的战斗能力，使匈奴势力在很长时段内，都忌惮它的存在而不敢贸然进攻。到了两汉时期，其政治、军事、经济作用得到极大发挥。

随着魏晋隋唐时期匈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唐以后中原政治格局改变，当时威胁中原的突厥人一般由宁夏经甘肃攻打关中，秦直道的军事战略地位和意义因此降低和减弱。由于政治中心东移，而且直道多修建在远离居民聚集的北部高原山地，人迹罕至，该道路自宋代后逐渐荒芜，待到清初，已基本淡出人们视野，这条曾经的军需补给通道也不再行用。佛教自东汉末传入，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呈放射状传播，到达陇东后与秦直道交汇。在直道沿线两侧，共发现数十处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各代石窟。直道自诞生之初至明代，在军事、文化、经济、民族交往等方面发挥过相同或相近的作用，同时它也被看作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之一。对于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早期文献记载并不多。《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



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秦直道遗址

山堙谷，直通之。……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秦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崩于沙丘平台。……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蒙恬列传》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这些记录指明了直道的起始地点和启用时间，但缺少对路线的具体走向、宽度、途经郡县的名称以及使用情况等的说明。唐代《括地志》及《元和郡县图志》载：庆州华池县（今甘肃省华池县东华池镇）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有秦时的“故道”，即秦直道。

二、秦直道建筑

直道作为军事工程，主体是便捷通行的道路，其次还有关隘、桥梁、障塞、阙台、烽燧、驿站、城镇等沿线各类建筑设施，这些建筑设施共同架构成为立体的军事防御网和军需供给网。对这些建筑的研究，是了解直道在各历史时期所发挥作用的支撑基点。既可以深入揭示其战略地位，也能成为确定它走向的证据，对推动秦汉交通史、军事史、历史地理以及丝绸之路和秦汉建筑研究都有独到意义。道路为人们的交通出行提供便利，同时也是联系城市各功能性建筑间必不可少的要素。《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叙官一九》“遗人”对中国上古道路的修建形式有如下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这些形式规范了道路的基本设施状况。《国语·周语》又载：“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行道树的种植，一可作里程标志参照，二可绿化和保护环境。偏远地区要为旅客提供就餐住宿

等服务和设施，以确保旅途的畅通与便捷，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些虽交待了道路设施的概况，却很少涉及具体的修建情况。依《周礼》推测，在直道开口处及沿线应该有着一系列功能齐备的建筑设施。通常在道路的起点和终点会设置有阙和广场。这既是道路起讫的标志，也是部队屯兵和宣誓的场所。宫殿为最高统治者巡幸提供休憩之地而城镇和驿站等一般性实用建筑，则有着双重的意义：既能作为部队的屯兵之所，也可以作为军需后勤补给、军属安排和军队缓冲休息之处。驿站具有多重功用，在承担邮传职能的同时，还能为军民提供食宿便利。以上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建筑，基本涵盖秦汉时期日常生活建筑的多种类型。

（一）道路构筑

秦直道之前相关道路记载，仅有周武王在两京间修建的“周道”和以洛邑为中心而呈辐射状向四方修建的等级不同的道路，很少提及其他道路的修建过程和形式。文献对直道的修建情况也讲得较为简略，这是研究中国古代道路建筑的一大遗憾。考古发掘出的直道路基、沟渠、桥梁、涵沟等固态建筑以及路两旁行道树等共同构成道路的标志，为中国古代道路的构成形式提供了复原依据。

通过考古发掘，核定了直道的基本路线：起点是陕西省淳化县北铁王乡梁武帝村，终点为内蒙古包头市的麻池乡，陕西富县是直道中部重要的军事要塞和交通驿站。

古代道路一般沿河谷选址修建，而直道的设计者则抛弃了常规的选址方式，而选择了远离河谷的高山之巅。古人在黄土高原的子午岭（现陕甘交界处）沿线，沿山脊设计线路，在低凹处挖山填谷夯筑垫方，建成了古代中国唯一沿山脊和高地修筑的国家级道路。路基由黄土夯筑而成，平坦坚实，已发现的道路遗迹全长 736 公里，路面最宽处约 66 米，最窄处约 20 米。陕西境内已发现直道遗迹全长 498 公里，其中富县段长 125 公里。桦沟口段直道位于陕甘交界处张家湾乡五里铺村，横跨葫芦河及其支流桦沟河的交汇地带，大致呈西北至东南走向，路面一般宽 30 米至 40 米。该段发掘工地的位置正处



秦直道路线图

于直道由高岭向平川盘旋而下的路段，在山区的路面一般宽约 10 米至 30 米，部分路段宽约 40 米至 50 米道路剖面共有植被层、自然堆积层和碾压层三层，其中碾压层厚度约 15 厘米至 35 厘米。直道下层路面的铺筑时间约为秦代和西汉早期，上层路面约为西汉中晚期。在路面发掘出了遗存的车辙和脚印。

经测量得知位于黄陵县兴隆关（即沮源关）以东的堑山路面宽度 66 米，是直道现有路面的最宽值。该段直道路面宽阔，弯道较大。考古证明，直道全段共有三个路面最宽的节点，该段直道是除起点淳化和终点九原郡之外的另一最宽处。经发掘显示路面铺设情况最为典型的路段，位于富县张家湾乡车路梁和尚塬转弯处。在道路弯道外侧的夯土护坡之外 20 余米处，又发现与之平行的夯土。两道平行夯土宽达 61 米，可能是类似甘泉县方家河段直道的夯土隔墙，即在需要大面积夯筑垫方（“堙谷”）的直道外侧，沿路夯筑出数个平面方形隔墙，在隔墙内填土以形成护坡或路面。富县桦沟口段中心区，发现有与道路平行的沿河高 3 米、靠山侧延伸 5 米至 6 米护坡夯层厚约 6 厘米至 8 厘米，靠山侧厚度递减。排水系统位于盘山道靠山侧路面，与道路平行，宽 1.3 米，深 30 厘米至 50 厘米。上层为斜坡状叠压堆积土，下层为淤土，沟底铺垫有碎礓石。

（二）房舍建筑

直道富县桦沟口段沿线两侧，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及陶器、铜器、铁器、兵器等遗存，这些资料断代明确，为了解秦直道附属设施的分布和内涵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建筑材料堆积中，以秦汉时期粗细绳纹、抹带绳纹筒瓦、板瓦及陶罐、盆、甑等残片为主，铜镞和钱币的时代在两汉之间或稍晚。其中有多处直径为 55 厘米至 65 厘米的圆柱形夯土磉墩及其上部的石柱础。从布局分析，在道路两旁各有面宽约 3.5 米的房屋遗存。由于葫芦河水的冲刷和人为破坏，房屋的间数和进深不详。沿河流一侧，还有多处以夯土为基成片相连的建筑基址，面积最大约 200 平方米。

此外，在旬邑县石门关南峰发现了长 64 厘米、宽 16 厘米、唇长 4 厘米的绳纹筒瓦和长 70 厘米、宽 40 厘米的绳纹板瓦以及长 37 厘米、宽 37 厘米、厚 4 厘米的几何纹和乳钉纹铺地砖、菱形几何纹空心砖、陶井圈、云纹瓦当和长生未央瓦当，山顶还有大型石柱础等秦汉建筑材料堆积，总面积约 5000 平方米。根据出土材料及规模分析，该处可能为当时宫殿遗址。

（三）桥梁与关塞

2005 年 7 月，甘泉县文物工作者在洛河南岸台地桥镇乡安家沟村发现了一处秦汉建筑遗址，遗址东西长约 150 米，南北宽约 80 米，总面积约 12 000 平方米左右，与洛河北岸人称“圣马桥”的秦直道引桥遗址隔河相望。遗址内绳纹板瓦、筒瓦、云纹瓦当、空心砖等建筑构件以及罐、瓶、盆、甑等陶制生活用品残片随处可见。据现场遗存分析，

这些或是集洛河渡桥的保护和管理于一体，同时兼具驿站功能的机构所在地。洛河北岸的方家河村西引桥至今尚存高20米的桥墩遗迹，夯土每层厚12厘米至20厘米不等。

（四）阙台遗迹

在直道遗址的南部起点淳化县，其端口处有宫城的北城墙遗迹，东端南部现存一对圆锥形的夯土遗存，如巨冢般伫立于天地之间。该夯土遗存底部宽宏，在其南侧尚有大量残砖断瓦及草拌泥墙面的残留遗存，它们应当是土木结构残阙的夯土台基。其中，西侧夯土台现存约高15米，底部周长约200米，顶部周长约40米；东侧夯土台现存约高16米，底部周长约220米，顶部约30米。类似的夯土遗迹在直道的中部富县和终点九原郡所在的包头市各发现一处。道路前立阙的相关记录虽未见诸文献，但在当时有着凡重要建筑前必定立阙的传统，例如，商鞅在咸阳宫区“筑冀阙”。直道作为秦帝国国防的标志性建筑，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阙的树置是显而易见的。文献记录秦直道最宽处约60米，而现存两夯土台基之间距为57米，若经考古清理，这对封土基部直线距离当略大于60米，与现测秦直道之最宽处大体相符。

阙以南是黄土高原与渭河谷地的结合部，既地势开阔又沟壑纵横；近阙体前后，显然为人工平整过的、好似阅兵誓师的广场。直道如砥由此向正北延伸，雄伟的嵯峨山投影正好插入两阙之间。极目向北，由黄土高原攀上蒙古高原，有直冲蓝天之势。直道沿线虽然有着众多的烽燧遗迹，但与巨大的阙的封土遗存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在直道中部的富县及终点处的内蒙古包头九原郡，也各有一对与梁武帝村类似的大型夯土遗存。

三、司马迁“适北边，自直道归”



关于秦始皇直道工程，《史记》之《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蒙恬列传》《匈奴列传》都有记述。正是司马迁的记载，保留了关于这一伟大工程的真实历史记录。《蒙恬列传》最后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写道：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司马迁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明确告知《史记》的读者，他曾经亲自行历秦始皇直道。这是第一位曾经行走在秦始皇直道上的历史学者，也是第一位留下自己行经秦始皇直道亲身感受的历史学者。这是第一位记录秦始皇直道工程的历史学者，也是第一位就秦始皇直道发表自己对这一交通建设之评价的历史学者。司马迁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适北边，自直道归”的呢？清人缪筌孙曾经考察“太史公”历史考察行旅路线：“太史公南游踪迹，

《河渠书》赞云：‘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屈原传》赞云：‘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即南游九嶷，浮沅、湘时事。《樊郦绛灌传》赞云：‘吾适丰沛，问其遗老。’即‘过梁、楚以归’时事。《河渠书》赞又云：‘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其为郎中使巴蜀时事。归途或至陇右，故登崆峒与？惟北游未知何时。《五帝本纪》赞：‘予尝北过涿鹿。’《蒙恬传》赞云：‘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自有北游龙门、朔方之实迹。”他认为，“太史公南游踪迹”或可指称某时事，然而“惟北游未知何时”。如“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者，虽“自有北游……朔方之实继”，但是不能明确当时具体情景。著名学者史念海在讨论汉武帝元封元年巡行北边的路径时，曾确定“武帝此次出巡，司马迁实在从行之列”，“司马迁说，他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这就足以证明他是随从武帝东巡归来的”。

总的来说，秦直道和以军用为目的长城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作用，作为连接关中和北方地区的军事通道，不仅满足了始皇帝“欲游天下”的私心，更加快了中央政府与北方各地的联系速度，保证了政令的畅达，使人们在观念上、心理上增强了对民族和国家统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发挥军事防御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流与融汇的纽带。秦直道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意义重大，在工程测绘、设计和施工、管理等方面，反映了秦代经济、文化、交通和建筑技术水平的较高成果。

（撰稿人　丁　喜）

郑国渠与关中六渠

一、秦水利工程的奇葩——郑国渠

秦王政元年（前246），在今陕西渭北平原上，开始兴建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由于设计和主持施工的人名叫郑国，所以这项工程被称作“郑国渠”。

郑国本是韩国的著名水工，即水利专家。他为什么会到秦国去兴建水利工程呢？

原来与秦毗邻的韩国，时时感到有被秦灭亡的危险，昏庸无能的韩桓惠王愚蠢地使出所谓的“疲秦”之计，让水工郑国入秦，劝说秦兴建引泾入洛的大型水利工程，以消耗其国力，使之无力东伐。不料郑国在秦主持工程之际，阴谋被秦发觉。秦宗室大臣乘机向秦王政建议“一切逐客”，被采纳，遂下逐客之令。

在被逐的众多宾客之中，有一位名叫李斯的楚国人。他当时已经官拜客卿，前途十分看好，然而逐客令让他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他毅然上书秦王，要求改变成命，此即著名的《谏逐客书》。



在书中李斯首先列举了秦用外人而使国富民强的事实，从“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说到孝公之用商鞅、惠文王之用张仪、昭王之用范雎，然后得出结论：“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如果秦“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必然“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接着李斯又举出秦王所喜爱的珠宝玩好、音乐美女，许多皆来自秦国以外，并不因其非秦国所产而拒绝，但对于“取人”，却“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如此做法，“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在此基础上，李斯反复阐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道理；如果不能容纳人，“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就等于帮助敌人，是所谓的“借寇兵而赍盗粮”。最后李斯指出，“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如果执意逐客，则“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政见到这篇情词恳切的上书后，立即撤销了逐客令，继续推行吸纳外国人才的

客卿制度，并恢复了李斯的官职。同时也听从了水工郑国的辩解之词，赦免其死罪，让他继续完成预定的工程，即本文开头所讲的以郑国名字命名的从今陕西泾阳县界内起经三原、富平、蒲城等县进入洛水全长150公里的灌溉渠。

史载，郑国渠成后，“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每亩收成可达一钟（相当今1.837石/亩），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



郑国渠渠首大坝

二、西汉兴建的关中六渠

自西汉定都长安后，关中便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这里的农业生产直接关系着京师的粮食供应，故而统治者对关中的农田水利建设极为重视。另外，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维持汉帝国庞大的财政开支，还必须把关东，即今河南、山西、河北、山东一带的大量物质漕运到关中，为此，也向统治者提出了完善关中水利的要求。武帝时期，国家富强，为了进一步强化王朝的统治，巩固和发展京师实力，于是在关中大兴水利事业。关中六渠就是当时修建的主要水利工程。

1. 漕渠

元光六年（前129），主管王朝财政的大司农郑当时向武帝建议，从长安到黄河修一条人工运河，以解决漕运问题。武帝十分赞赏这一计划，下令让齐人水工徐伯勘察设计，征发数万人开渠，“三岁而通”。这条与渭水平行的人工运河即漕渠。它自长安而东，经今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在潼关附近入黄河，全长300余里（汉里）。过去漕运溯渭

水而上，渭河沙多，流量变化无常，河道蜿蜒曲折，由长安至黄河900余里（汉里），航运需时6个月。改为漕渠运输后，路程只有原来的1/3，时间节省一半，3个月可达，且航道较直，航行方便。在渠口附近建有京师仓（或称“华仓”“河口仓”“京师庾”），其遗址在今华阴凤凰岭一带。这座西汉国家级的粮仓，建筑宏大，周围有城墙护卫，仓内有通风防潮设备。每年由关东运来的漕粮约在400万石左右，一度还曾达600万石。另外，漕渠还可供灌溉，民田受益面积达万顷以上。

2. 龙首渠

约在元朔、元狩之交（前123—前122），有一叫严罢的人向武帝进言，建议由北而南修一条引洛河水的灌渠。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征发万人，自征县（今陕西澄城南）引洛水开渠。渠道所经商颜山（今铁镰山）一带，土质疏松，渠岸容易崩塌，修渠的劳动群众因地制宜，发明了“井渠法”。这一开渠技术，类似现代的隧洞竖井施工法。其在地面上打成许多井，在地下修建暗渠使井井相通，水流井下暗渠中。此法通过丝路传至西域，直到今天，新疆人民仍用这种办法修建灌溉渠道，称为“坎儿井”。因开渠中获得“龙骨”（当为恐龙类化石），故取名“龙首渠”。经十余年的努力，渠始基本建成。而建渠过程中所创井渠法，实不失为水利史上的创举。

3. 六辅渠

元鼎六年（前111），左内史兒宽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灌溉秦郑国渠原来浇不上的“高卬之田”。六辅渠，又名“辅渠”或“六渠”，实际是在秦郑国渠基础上增修六条辅助渠道，使郑国渠的灌溉体系更加完善。

4. 白渠

太始二年（前95），赵中大夫白公奏请修建引泾灌渠。其“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流经今泾阳、高陵、三原、临潼等地，全长200里（汉里），可灌田4500余顷。此渠因白公首议建造，故名“白渠”。整个工程规模宏大，建成后与六辅渠、郑国渠构成了渭北地区完整的灌溉系统。后人将这些渠合称“郑白渠”，对关中地区农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当时老百姓便作歌赞颂道：“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东汉的班固在其《西都赋》中也以“郑白之沃，衣食之原”来颂扬二渠之功。汉以后历代曾多次对郑白渠进行维修改建，使之一直福泽三秦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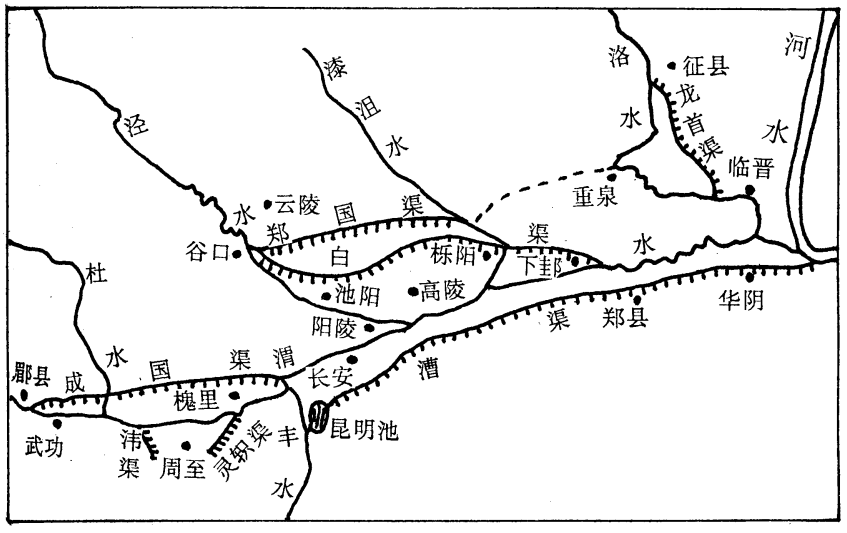
5. 灵轵渠

该渠起于周至灵轵原下，为引渭工程，因原名而为渠名。其灌溉今周至、户县一带农田万顷左右。

6. 成国渠

该渠自今眉县杜家村开始，引渭水东北向流往上林苑蒙笼渠，全长200余里（汉里），灌溉今眉县、扶风、武功、兴平、咸阳一带上万顷农田。

关中六渠的兴建，大大促进了汉代关中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航运事业的兴盛，是古代水利史上的壮举。



汉武帝时期关中水利工程分布局

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人们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此言不差，而且是经验之谈。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立国，所以历代统治者对水利建设都相当重视。秦在关中兴建的郑国渠，其过程虽然颇具戏剧性，但毕竟是一项空前浩大的水利工程，它与秦兴修的另一项巨大水利工程都江堰，一东一西，成为秦两大灌溉农业基地，有力地保障了秦农业的稳定收入，大大加强了秦的经济实力，为秦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事实，大家都是清楚的。由此不难窥见郑国渠在当时代的重大影响。

汉武帝时期兴修的关中六渠，是继郑国渠之后在关中地区兴建的一系列重要水利工程。应该看到，这些工程除了农业灌溉功能之外，还具有漕运功能。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六渠中的六辅渠、白渠与秦郑国渠共同构成的水利灌溉网对陕西农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事实上，这些渠道历代多予修整，一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关

中民众在郑国渠和白渠的旧址上兴建了泾惠渠，大大推进了陕西农业的进步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2年对原泾惠渠进行改造，重修了120公里长的干渠，使古渠换新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秦汉时期兴建的那些大型水利工程，实在是福泽延绵、惠及子孙万代啊！

（撰稿人　黄留珠）



隋唐关中的水利工程

一、隋唐关中漕运工程

隋唐定都关中后，政府运转要求解决赋调租粮的运输问题，市场交易依靠大量物资集散，京师人口需要稳定的粮食供应渠道，以畜力和人力为主的转输方式远远不能满足京城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借助水力的漕运就成为提升运力的关键所在。史载隋代，“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运输繁重不说，效率也偏低，日夜兼运，还要持续数月。针对此种现状，有识之士提出对策，据《册府元龟》记：

初，帝每忧转运不给，柱国于仲文请决渭水，开渠漕，帝然之。使仲文总其事，又命郭衍为开渠漕大监，与宇文恺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曰富民渠（一云广通渠）。

此项工程由于仲文提议，经隋文帝批准，以郭衍为开漕渠大监，实际上由著名工程建筑家宇文恺主持开凿。工程其他情况如何？诸书语焉不详，据《隋书·高祖纪》，开皇四年（584）六月，“开渠，自渭达河，以通运漕。”到九月，“幸霸上，观漕渠，赐督役者帛有差。”可知漕渠自六月开工，到九月完成，工期仅三个月，可谓神速。值得一提的是，漕渠长度出现不同的记载，如《隋书·食货志》记：“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同是广通渠，同样由宇文恺主持，前记400余里，此处却记为300余里，略有出入。不仅漕渠长度记载存在差异，甚至漕渠名称也有多种，如前引资料把隋代漕渠或称为富民渠，或称广通渠，也有别称者，如《长安志》记：“永通渠，隋开皇四年开，起县西北渭水兴城堰，初名富民渠，仁寿四年改。”记载了仁寿四年改富民渠为永通渠之事。此外，还有富人渠的称法，《北史·郭衍传》：“征为开漕渠大监……名曰富人渠。”史念海先生曾经注意到漕渠之名尚有富民渠、广通渠、永通渠、富人渠之称，认为永通渠是避隋炀帝杨广

之讳，富人渠是避李世民之讳，可谓确当之论。

参加漕渠开凿工程之人数已无法确知，就连工程管理者也无从详考，除上述于仲文、郭衍、宇文恺3人外，成千上万的人曾经为此项工程贡献力量，如今都变成了无名英雄，只有为数很少的人被记载下来，如史载元晖曾监漕渠之役，苏孝慈有督决渭水为渠以属河之役，元寿也曾参督漕渠之役等。或言监漕渠之役，或言督漕渠之役，证明他们也是工程的参与者。此外，薛回曾领漕渠监，和洪任漕渠总管监。特别是新出土《隋郭均墓志》记：“（开皇）四年，领开漕渠总监，……三月即成。”志主郭均也是开漕渠的参加者，其职名与元晖等人对照，少了监、督之词；与薛回等人相较，少了监领之语；与开漕渠大监郭衍等相比，均有“开漕渠”之字，也许实际工程中就有开凿和监督的区分。与其他参与此事却不能留名者相比，郭均等人是非常幸运的。

据马正林、李令福等学者研究，隋漕渠基本因袭汉漕渠的路线，只有在渠首和渠尾略有变动，持续使用了30多年。唐朝建国后，“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已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随着漕粮每年由20万石增加到百余万石，关中通漕就势在必行。到唐玄宗时，出现两位漕运能人，一是裴耀卿，一是韦坚。裴耀卿以分节转输法解决了关东的漕运问题，3年漕粮700万石，但关内问题却成为瓶颈。水陆运使韦坚敢于担当，决心解决关内运输难题，“引浐水开广运潭于望春亭之东，以通河渭。”韦坚如何沟通河渭？此处言之不详，《旧唐书·韦坚传》记：



自西汉及隋，有运渠自关门西抵长安，以通山东租赋。（韦坚）奏请于咸阳拥渭水作兴成堰，截灞、浐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于长安城东九里长乐坡下、浐水之上架苑墙，东面有望春楼，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枻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屩，如吴楚之制。……至（望春）楼下，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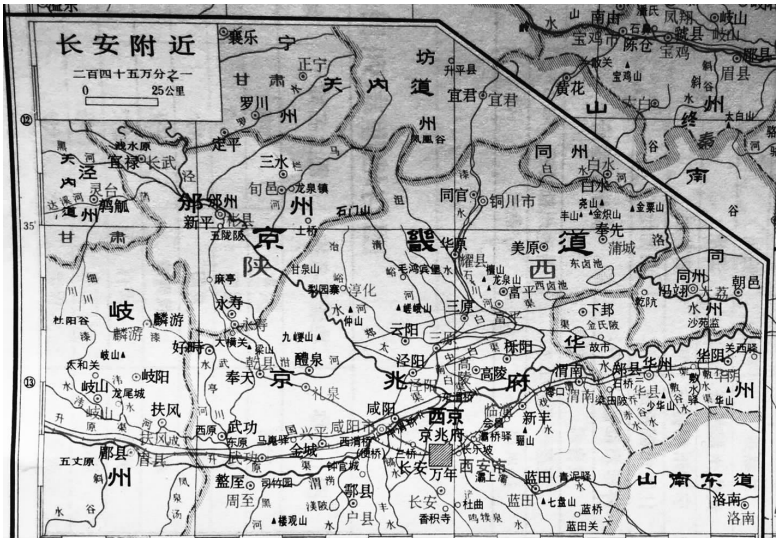
韦坚在汉隋漕渠遗迹的基础上重新开通运漕，西起兴成堰，过浐水、灞水，直到永丰仓（隋名广运仓，避隋炀帝讳改此），使得关内漕运能力增强，特别是他还聚浐灞水而成广运潭，导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庆功会，“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是

岁，漕山东粟四百余万石。自裴耀卿言漕事，进用者常兼转运之职，而韦坚为最。”一年能运输400万石粮，创下关内漕运的最高纪录。

韦坚漕渠在使用30余年后丧失航运能力，一方面因为“浐灞二水会于漕渠，每夏大雨辄皆填淤，大历之后，渐不通舟。”另一方面，是社会动荡造成了疏浚不及时，导致漕渠转运功能减弱。直到唐文宗时，再一次将开凿漕渠提上日程，时任宰相的李石于开成元年（836）奏开漕渠，提到：

咸阳令韩辽请开兴成渠。旧漕在咸阳县西十八里，东达永丰仓，自秦汉已来疏凿，其后堙废。昨辽计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内无挽车之勤，则辕下牛尽得归耕，永利秦中矣。

唐文宗君臣不顾国力衰微坚持开漕通舟，正是因为有汉隋和韦坚的漕渠旧迹可以利用，故有用功不多之说。文宗力排众议，通过开漕通运的请求，“堰成，罢挽车之牛以供农耕，关中赖其利。”这是唐朝第二次开通漕渠，也是西汉以来的第四次，不断重复的漕渠工程是在反复强调漕运对于都市的不可或缺，也用另一种方式提醒后人水利工程是重要的，维护与管理同样重要。


长安附近
二百四十五万分之一
0 25公里
关内道
京兆府
西京
长安
万年
咸阳
渭南
华州
同州
坊州
鄜州
邠州
宜君
同官
铜川市
美原
奉先
浦城
三原
云阳
泾阳
礼泉
醴泉
武功
扶风
岐山
凤翔
宝鸡市
陈仓
凤翔
岐山
眉县
太白山
终南
南山
华阳
华山
新丰
蓝田
蓝田关
七盘山
杜曲
香积寺
鸣犊泉
樊观山
周至
盩厔
鄠县
户县
五丈原
麟游
好畤
永寿
乾陵
昭陵
金粟山
丰山
铜川
耀县
富平
东卤池
下邽
沙苑
故市
关西驿
渭南
华阳
华州
山南东道
洛南
洛南
山南西道
凤州
两当
徽县
嘉陵江
白水
白水河
渭河
泾河
灞河
丹水
洛水
沣水
漆沮河
灵台
泾州
宁州
甘泉山
罗川
定平
三水
旬邑
龙泉镇
五门山
新平
五陵原
士窊
麻亭
亨化
永寿
杜阳谷
岐阳
龙尾城
好畤
九嵕山
醴泉
奉天
礼泉
扶风
西原
马嵬驿
武功
咸阳
西渭桥
金城
柏谷坞
盩厔
周至
渼陂
楼观山
鄠县
户县
五丈原
斜谷
褒斜道
褒水
子午道
子午谷
秦岭
太白山
黄花山
宝鸡山
陈仓
凤翔
岐山
眉县
斜谷
褒水
终南
南山
太白山
华山
华阳
关西驿
渭南
华州
华阳
故市
下邽
沙苑
富平
东卤池
耀县
铜川
铜川市
丰山
金粟山
浦城
奉先
美原
华原
耀县
同官
白水
白水河
同州
朝邑
乾陵
昭陵
永寿
麟游
好畤
九嵕山
醴泉
礼泉
奉天
泾阳
云阳
三原
礼泉
武功
扶风
岐山
凤翔
咸阳
西渭桥
金城
柏谷坞
马嵬驿
西原
新丰
京兆府
西京
长安
万年
咸阳
渭南
华州
华阳
华山
少华山
蓝田
蓝田关
七盘山
杜曲
香积寺
鸣犊泉
樊观山
周至
盩厔

的规划充分考虑到城市的供水问题。隋唐长安城供水主要有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黄渠等人工引水渠来完成，各渠利用秦岭北坡水源和长安特殊地形展开，实现对长安城水源补给之目的。

龙首渠，一名浐水渠，隋开皇三年（583）开浚，堰浐水而成龙首堰，导水西北流。此堰位于城东南马头埝（后作马腾埝）附近，为保护水源和渠堰的安全，唐代曾于此置监守卫。自龙首堰支分浐水，北流至长乐坡西北分为二渠，《长安志》记："北流至长乐坡西北，分为二渠，东渠北流入苑，西渠屈而西南流，经通化门南，西流入城。"西渠经通化门入兴庆宫、皇城、宫城，成为兴庆池、东市放生池、宁王九曲池、太极宫山水池、东海池的水源；东渠北流，于郭城东北隅折而西入宫苑，成为大明宫龙首池、太液池、凝碧池、积翠池等景观的水源。主要解决东城及兴庆宫、大明宫苑的用水。

清明渠，在长安城南，引潏水为源，始于开皇初年。经郭城南面安化门东入城，经大安坊东街，由安乐坊之西南，曲而北流，经过昌明、丰安、宣义、怀贞、崇德、兴化、通义、太平等坊，"东流入皇城大社，又东至含光门街，屈而北流，经尚食局东，又北流经将作监、内侍省，又北流入宫城。"成为太极宫南海池、西海池和北海池的水源，解决长安城西部用水的同时，也为皇城和宫城供水。唐代宗永泰二年（766），京兆尹黎幹以京城薪炭不给，奏开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凿运水渠，自京兆府直东，至荐福寺东街，至北国子监正东，至于城东街正北，又过景风门、延喜门，入于苑，阔八尺，深丈余。"此次开渠是以运木为目的，故此运水渠应为运木渠之误，郭声波认为此渠也属于清明渠。



永安渠，又称交渠，开凿于隋开皇二年（582），堰交水成福堰，在城西南，永安渠渠首在今香积寺西南引交水北流，从郭城南面安化门西街入城，穿城而过，经大通、敦义、永安、延福、崇贤、延康六坊之西，从西市东北流过，又由布政、颁政、辅兴、崇德四坊北流，出郭城北面之景曜门（或为光化门），入芳林园，沿汉长安东城垣注入渭水。主要解决长安城西半部用水。

黄渠，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就有"宁民令颜旭开渠，引南山水入京城"之事，成为唐朝开凿黄渠的先声，到开元年间正式大规模疏凿引水。自南山东义谷（今大峪）堰水上少陵原，流经鲍陂，西北穿蓬莱山，注入曲江，分为二：一流经慈恩寺而西入清明渠；一北流受阻于乐游原转向西流，经昭国坊韦应物宅、长兴坊杨师道山池，再流入宫城，此渠又呼为"御沟"，是长安城东南部的主要都市水源。

三、农业水利灌溉系统

隋唐两代重视水利不仅体现在工程兴建方面，也在水利立法和水渠维护方面表现出来，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水部式》就是一部失而复得的唐代水利法则，其中多处涉及关中地区的用水和管理法则，诸如合理分配上游与中下游的用水量，解决官堰与私堰的关系，调和灌溉用水和转运用水的矛盾，遵循谁用水谁维护的原则。

关中自秦汉以来有郑白渠，到唐代灌溉功能严重退化，需要另辟新径。“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硙，止溉一万许顷。’……至大历中，利所及才六千二百余顷。”由秦汉水田之4万余顷，到唐高宗永徽年间减少到万余顷，再到唐代宗大历年间才有6200顷，“亩腴一斛，岁少四五百万斛。”每年减产数百万斛，使闻者惊心。穷则思变，如何走出有水无利的困境考验唐人的智慧，中唐以后，关中水利稍有起色，据李令福先生研究，有两次大规模的改造和兴建：一次是大历十二年（777）黎幹开掘郑白二水支渠，复秦汉水道；一次是宝历元年至太和二年（825—828），刘仁师兴修高陵渠堰，并全面改造三白渠系。其中尤以刘仁师之贡献最大，可以与郑国、白公相提并论，身后也只有近代的李仪祉可以与其媲美。

刘仁师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方面因为他对关中灌溉系统加以改造，“有古白渠，宝历元年，令刘仁师请更水道，渠成名曰刘公，堰曰彭城。”改变了三白渠分水口太多的现状，形成了三限口下分太白、中白、南白三大干渠，彭城堰下分刘公四渠的泾渠灌溉系统，不仅惠及当时，也影响后世。另一方面是他成功地解决了上下游争水的矛盾。灌区上游泾阳县豪强截断水流独占水利，泾田独肥，它邑为枯，刘仁师提出别开水渠、修筑新堰的方案并力争施行；为了彻底消除上游霸水之弊，重新制定了上下游各县用水法则，将其向引泾灌区各县推广，开创了唐代引泾灌溉工程的新局面。刘仁师兴利除弊之功绩，赢得民众的爱戴，除为他建庙立碑之外，渠堰以他命名，称刘公渠、彭城堰，甚至于长期以来当地百姓生子以刘名之，以示纪念。其祠庙历宋元明清一直香火不绝。

如果说刘仁师解决上下游争水的办法发挥了引泾灌溉水利工程的最大效益，那么唐人调和官堰与私堰之间冲突的行动，也对历代维护水渠有所启示。隋唐时期碾硙业大盛，权势之家争相在渠道上私设碾硙，堰遏费水，使渠流梗涩，故唐令规定：“泾、渭白渠及诸大渠用水之处，皆安斗门，并须累石及安木傍壁，仰使牢固，不得当渠造堰。”碾硙存在与灌溉争水的问题，如果缘渠欲造碾硙，须经州县批准，还要从地理位置上和时间上加以限制，“诸灌溉小渠上先有碾硙，其水以下即弃者，每年八月卅日以后，正月一日以

前，听动用。”从法令上讲，碾硙要在灌溉余水和农闲时方准使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唐代碾硙与灌溉争水持续不断，如唐高宗时长孙祥就有废碾硙的提议，得到宰相长孙无忌的赞成，“无忌对曰：‘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比为碾硙用水，泄渠水随入滑，加以拥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于是遣（长孙）祥等分检渠上碾硙，皆毁之。”高宗君臣以碾硙耗竭渠水，故加以毁拆。唐玄宗时私碾硙又卷土重来，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立硙，以害水田。开元九年（721），京兆尹李元纮令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但是因为碾硙获利丰厚，之前有太平公主家与僧寺争碾硙，当时有宦官高力士家“都北堰洋列五硙，日儥三百斛直”，之后有升平公主脂粉硙两轮，以及仇士良城东水硙等都很有名。到代宗广德二年（764），李栖筠又“奏请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硙碾七十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时隔不久，又出现毁拆碾硙之事，如大历十三年（778），“坏京畿白渠硙八十余所，以妨夺农业也。”一次拆掉 80 多所，仅三白渠下碾就拆掉 44 所。同样的事三令五申，正说明碾硙与灌溉争利争水呈此消彼长之势，且一直延续到唐末，唐僖宗光启元年（885）诏文：“关中郑白两渠，古今同利，四万顷沃饶之业，亿兆人衣食之源，比者权豪竞相占夺，堰高硙下，足明弃水之由，稻浸秸浇，乃见侵田之害。”碾硙屡毁屡建的事实，说明唐人在维护灌区与追求厚利之间始终未能找到平衡点。

四、影响与反思



自古关中就有天府奥壤之称，水资源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平原得水而为天府，田野引水则成奥壤，山岭沐雨变成林海。隋唐长安充分利用八水绕流的自然条件，在国计民生与生态环境中间施展才华，以水为主题，在水力、水源、水利等方面大做文章，从国计角度看，唐人充分挖掘郑白诸渠的灌溉潜能，成为有唐三百年历史的主线之一，某种程度上讲，隋唐文明就是一部水力利用、水利开发史。同时，隋唐国运与漕运能力密切相关，漕渠的通塞与否成为关中政权生死攸关的生命线。从民生的角度看，水资源为隋唐长安城注入无限生机，三大渠系和黄渠的引用，不仅解决了长安百万人口的生活用水，也为造园建池创造美好家园提供有利条件，同时，新颖别致的园林湖泊成为游乐观赏的好去处，也能为长安官民提供蒲鱼之利和水产美味，水资源为民众带来了无穷便利，也改变了唐人的生活方式。从生态环境角度看，隋唐长安城及周边出现了无数的园林风景，在赏心悦目的同时，也改善了长安城的环境条件，森林、草场在得到河水滋润的同时，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调节气候，形成局部地区的良性循环。

隋唐时期在水资源立法上也取得显著成绩，在用水管理部门方面，既有属于六部管理的水部，又有都水监，还有各级地方官府中少尹、司士等职的主管，同时也委派渠堰使定期监察巡查，制度较为严密。尤其是水资源立法也可圈可点，敦煌藏经洞所出《水部式》残卷让唐代水资源立法失而复得，再现了唐代水力立法所达到的高度，也是后代管理水资源和保护水环境的绝好借鉴。

当前，西安城水资源的利用又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在历史上八水绕长安的基础上提出八水润长安的新思路，借鉴隋唐经验成为超越隋唐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撰稿人　贾志刚）

隋唐时期秦岭古道与关中交通

在举重驭轻思想的主导下，隋唐两代曾一度推行关中本位政策，皇帝居中而治，驾驭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在国家机器运转过程中，大量的信息交换通过敕令文牒的上传下达来完成，而道路交通就成为承载信息传递的神经系统。从某种程度上讲，以都城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成为王朝兴衰成败的指示器，所以道路交通网的建设对都城而言既“系生民休戚”，又“关国家盛衰”，是民生工程，也是政治命脉。隋唐关中地区有哪些途径与周边地区沟通？道路交通网在维持都城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中发挥何种作用？都是理解隋唐历史的重要内容。

一、长安交通网

隋唐以前，全国范围内就已形成了以关中为中心的陆上交通网，文献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记载，到秦代又开直道、通驰道，至汉代又大治驰道，历代都苦心经营以都城为中心的道路网，对当时及后来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隋唐政权仍然定都关中，修治和维持四通八达的道路网仍然十分迫切，唐人柳宗元曾言：

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界于栎阳，其驿六，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蓝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自长安至于盩厔，其驿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关曰华阳。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其驿三，其蔽曰凤翔府，其关曰陇关。自渭而北，至于华原，其驿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阳而西，至于奉天，其驿六，其蔽曰邠州。

柳宗元形象地将唐代全国道路网描绘成两句话：“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可谓确论，虽然柳宗元是从馆驿使的角度关注关中地区的道路，但他毕竟将唐长安周边的 7 条官道及相应的 47 个馆驿、5 个关隘记载下来，功不可没。从中可知，隋唐道路管理不仅只维护桥路，也注重馆驿、关防等设施

与道路的配套使用。

隋唐长安联系全国的道路基本可以确定，但各道的具体情况仍有差别，如东向道路多为沟通西京、东都和北都的大道，尤其受到重视。唐代有将道路划分等次的规定，“从上都到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东向道路位次最高，当然会引来极大关注。如贞观初，唐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据此可知，东向道路是联系长安与东都洛阳、北都太原、河北涿郡等地的关键线路，是联系关中与关东地区的最重要的通道，地位当然重要。纵横其间的驰道宽度有数百步（百步约150米），道路两旁种满行道树。所用树种前后也有变化，如早期多种槐树、杨树，后来还有柳树，再后来还添种果树，有专门机构管护，一般情况不能随便砍伐行道树：

贞元中，度支欲斫取两京道中槐树造车，更栽小树。先符牒渭南县尉张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车，岂无良木？恭惟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辉映秦中，光临关外，不惟用资行者，抑亦曾荫学徒。拔本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况神尧入关，先驻此树，玄宗幸岳，见立丰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邵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皇旧游，宁宜翦伐？思人爱树，诗有薄言，运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状牒上度支使，仍具奏闻，遂罢。

官道旁之行道树有多重功能，既可垂荫护路，又能标记行程，还有供观赏、存纪念的作用，与道路一样不可或缺。

东向驰道的路旁树间，还有为皇帝专用的行宫和御道，史载“隋炀帝从东都至西京御道并作长廊。”用长廊分出皇帝专用的御道。此外，隋炀帝还在从长安到洛阳的驰道旁修建行宫14所，“改洛州为豫州，自豫州至京师八百余里，置一十四顿，顿别有宫，宫有正殿。……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从长安东出之官道设有行宫，据统计，隋两京路此段行宫有华阴县的兴德宫、华阴宫、金城宫，渭南县的崇业宫、崇善宫，郑县的普德宫、太华宫等。唐朝则有华清宫、游龙宫、神台宫、琼岳宫、金城宫等。唐玄宗时对此又加整修扩建，“（开元二十六年）两京路行宫各造殿宇及屋千余间，……（开元二十八年）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如果说行宫只服务于皇帝巡幸，一般行旅不能受惠，那么风姿绰约、硕果累累的道旁果树，会让行走其间者在诗情画意中忘掉旅途些许劳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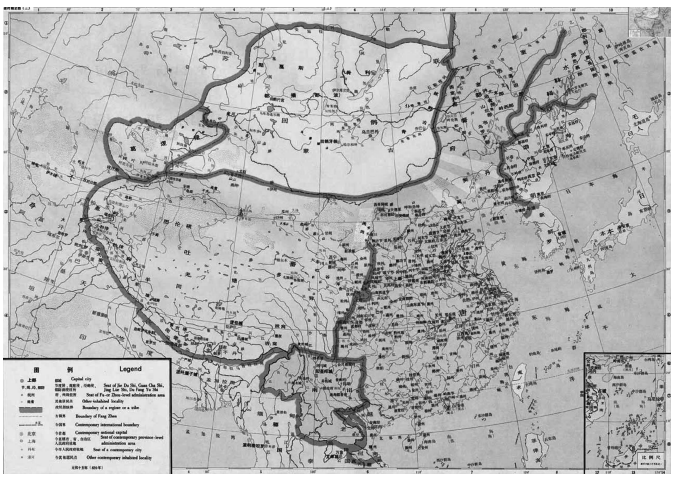
长安西出道路是关中联系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的通道，属于陆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东段。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全国设26关，分为上、中、下三等，属于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的上关有六：“京兆府蓝田关，华州潼关，同州蒲津关，岐州散关，陇州大震关，原州陇山关。”其中设置于长安东出驿路者两个，即潼关和蒲津关，而置于西出道

路者就达3个，分别是散关、大震关和陇山关。又隋唐时期沿着西向道路也设置了若干行宫，如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4所置行宫主要是为皇帝行幸仁寿宫途中停顿而建，但也有置于官道附近的，如盩厔县隋宜寿宫，兴平县隋仙林宫，扶风雍县之岐阳宫，不知所属之陇川宫等，均属于西向驰道的附属设施。同时，长安西出官道旁也有行道树，史载韦孝宽任雍州刺史时：

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候，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韦）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候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荫。周文后见，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

此前就有夹路种树之传统，如“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源，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行旅。”不仅夹道种树，还于道路两边开沟，以防雨水冲毁道路。北朝时关内道路也是如此，如前秦苻坚时，“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由此可知，韦孝宽“列树表道”之法只是继承了以前的传统，并非创新，但由此说明周隋关内道路的管理制度逐渐恢复。

长安北向道路有北通丰州天德军之道路，西北通灵州之道，东北通胜州振武军之道，严耕望先生认为防御游牧民族南侵是主要任务，故北向道路多与北边防线相配合，最显著者莫过“参天可汗道”，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铁勒诸部内附，设六府七州以安置，“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以貂皮充赋税。”也有称“参天至尊道”，“诏碛南鹞鹈泉之阳置过邮六十八所，具群马、湩、肉待使客，岁内貂皮为赋。”二说虽有所异同，但都基本反映历史实情。



唐全图（741）

二、秦岭古道

长安南出道路多需经行秦岭，无论是南出金州、兴元府，还是西南通成都，亦或是东南走荆襄，无一例外。史载有褒斜道、骆谷路、子午道，另有库谷路、蓝田路，大体上包括傥骆道、子午道、褒斜道、商山路等。在传统古道的基础上，隋唐对穿行秦岭的几条道路均曾加以整修，如商山路就曾多次疏通，唐人崔湜曾于景龙年间（707—710）献策开南山新路，“景龙中，（崔湜）献策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役徒数万，死者十三四，仍严锢旧道，禁行旅。所开新路以通，竟为夏潦冲突，崩厌不通。”此南山新路是为了沟通商州与长安，属于商山路无疑。史言崔湜“尝充使开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上官）婉儿草遗制，曲叙其功而加褒赏。”此次开路或因客观原因（水潦、崩厌），或因意外事件（中宗驾崩）等原因，导致新路作用不能完全发挥出来，虽有上官婉儿曲笔回护，仍留下太多的遗憾。也才有再次开拓此路之事：

李西华，贞元中为商州刺史。商州西至蓝田，东至内乡，七百余里，山岨重沓，小遇暴雨，则隔绝行旅．或露居粮绝，旬日不止，则往往僵仆。西华上请，役功十余万，置桥立庐，又回山通偏路以避盛水。自是行李不滞。

李西华的奏请是有针对性的，“请广商山道，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拓宽路面以防崩压不通，多开偏路以防水潦阻绝，由此才能达到“人不留滞，行者为便”的效果。

斜谷路也有多次整修，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努力使斜谷道变成水陆联运的通道，虽史籍未言此举之实际成效，却不容乐观。唐朝一度将官道集中于骆谷道，而放弃斜谷路。到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复置斜谷路馆驿。”此年有讨伐西川刘辟之事，“高崇文之师由斜谷路，李元奕之师由骆谷路，俱会于梓潼。”知此次斜谷置驿是出于军事目的，也提出重用此路的现实要求，此后，斜谷路逐渐恢复官道地位。到宝历二年（826），兴元观察使裴度“奏修斜谷路及创造馆驿毕。自京师抵汉中，列邮传于骆谷久矣，而艰难阻险，人尝病之。度既到镇，因访故老，熟其利害，遂决请移路于斜谷，桥梁馆宇，克期而就，人心大慊。”此前骆谷路为主官道，列邮传，因为道途艰难险阻，不便于行人，故有裴度重新恢复斜谷路之举，虽说此举“桥梁馆宇，克期而就，”也只能是初具规模。因为据参与此工程的地方官奏报，道路设施还相当简陋，如凤翔府奏：“当管缘兴元新通斜谷路，创置驿三所。”山南西道奏：“当道新制斜谷，其中须置馆驿，及创驿右界名者三。”两地分别位于斜谷路的起始点，各置驿 3 所，说明此项工程是由两地合作相向而建。如果设施齐全，就不会有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的又一次整修，史载：“自散关抵褒城，次舍十有

五，牙门将贾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剑门，次舍十有七，同节度副使石文颖董之。……层崖峭绝，枘木亘铁，因而广之，限以钩栏。狭迳深陉，衔尾相接，从而拓之，方驾从容。急宣之骑，宵夜不惑。郄曲棱层，一朝坦夷。”据此可知，归融此次新修驿路不仅包括驿舍，还有对栈道的削刊和拓宽，是一次大规模的整修。到唐宣宗大中三到四年（849—850），还有一次从文川谷路到褒斜路的摇摆。起初，山南西道奏：“当道先准敕新开文川谷路，从灵泉驿至白云驿，共一十所，并每驿侧近置私客馆一所，其应缘什物粮料递乘，并作大专知官，及桥道等开修制置毕。其斜谷路创置驿五所……并已毕功讫。”知有以新开文川谷路取代斜谷旧路的倾向。此路的走向被唐人孙樵详细记载于《兴元新路记》中，“以褒斜旧路修阻，上疏开文川道以易之。”但到次年，“中书门下奏，山南西道新开路，访闻颇不便人，近有山水摧损桥阁，使命停拥，馆驿萧条，纵遣重修，必倍费力。臣等今日延英面奏，宣旨却令修斜谷旧路及馆驿者。”新开之文川谷路因山水毁断不能通行，只好重新走斜谷旧路，虽说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但正反映出唐人探索新路的勇气。

南向道路还有子午路，宝应元年（762）敕文将其与诸道并提，“敕骆谷、金牛、子午等路往来行客，”将子午道与骆谷道、金牛道相提并论。《读史方舆纪要》引《通典》：“汉中入长安，取子午路凡八百四十一里。”现存《通典》只记汉中“去西京，取骆谷路六百五十二里，斜谷路九百三十三里，驿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并未记汉中经子午路之事。而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引《华阳记》：“子午、骆谷、褒谷，并为汉中北道之险，而骆谷尤甚。故唐世长安有事，每从此幸兴元。至于从来用兵，其三道并出者，不多见也。”甚至还提到：“唐天宝中，涪州贡生荔枝，取西乡驿入子午谷，不三日至长安。”说明唐代对子午路曾经加以利用。但子午道水陆艰险，故有“山水艰阻，黄金子午”之谚语，也极言黄金路、子午路之艰险难行，甚至影响到唐朝对此道的进一步开通利用。



骆谷道在唐代一度成为长安南出之主官道，虽为汉魏旧道，唐代仍对其多有变通，如从武德七年（624）起，唐代开骆谷道以通梁州，对旧道加以改造利用。唐玄宗时全国共有 26 关，中关 13 个，其中属于南向秦岭古道者有三：“京兆府子午、骆谷、库谷。”骆谷关就设在骆谷路，贞观四年（630），曾经将关址南移七里。唐人李吉甫记：“按骆谷在长安西南，南口曰傥谷，北口曰骆谷。”唐代将此道作为主官道，但也有过改道的尝试，如天宝八载（749），“王鉷奏开清水谷路，……隶京兆府，十一年以路远，改属洋州。”也曾以清水谷路来改进骆谷道。严耕望先生研究得出，唐代君主因关中事变而南幸山南、蜀中者凡四次，其中德宗出逃、僖宗逃难均取骆谷道，这显示出此道与长安非同寻常的关系。

总之，隋唐立都关中，努力维持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正如唐人杜佑所言：“东至汴宋，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虽说杜佑未言长安，但长安无疑是各向道路的参照物和出发点，正是长安与各地通过道路联系起来的真实记载。

三、影响与借鉴

虽关中古有“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之说，但立都于此的隋唐却呈现出开放包容的时代特征，识者或将其归功于四通八达的道路网，诚哉是言。我们发现，无论是平常百姓的“肇牵车牛远服贾”，抑或是帝王将相的治国、平天下，均与道路密不可分，离开道路不能说寸步难行，最后也难免走投无路。四通八达的道路网为长安带来了世界，也将长安置身于世界，随着道路而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正是因为重视开通道路，才破解了地理上四塞为固与政治上开放创新之间的难题，实现儒家声威远播和招来远人的对立统一，是为机遇；同时，道路开通所要求的管理制度和防御能力也要水涨船高，是为挑战。某种程度上讲，长安通向各地的道路有多长，隋唐人的“天下”就有多大。

默默无闻的道路还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着几乎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小到百姓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大到祀与戎等国之大事，纷繁表象背后均体现出“道”在其中的规律。不同层次的道路连接着复杂多变的历史舞台，上演着不计其数的历史悲喜剧，但站在道路上观察，都属于从远古指向未来道路上的一小段。

当前，关中地区在道路建设领域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纵横交错的交通网为陕西腾飞插上了翅膀，但道路规划的针对性就成为凝聚特色的关键。如“蜀道难”的历史局面曾经考验古人的忍耐力，在多条穿越秦岭隧道打通后，“蜀道易”新局面又考验着今人的想象力。又如随着交通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利用这种机遇谱写鸿篇巨制的要求越来越紧迫，城际铁路，高速铁路和公路，地下、地面、高空铁路等新元素的不断涌入，势必会冲击传统思维，不仅挑战我们的接受能力，更挑战我们的应变能力和超前意识，历史和现实都向我们提出与时俱进的要求。

（撰稿人　贾志刚）

千年沧桑耀州窑

一、千年瓷都，风雨沧桑

陶瓷即“土的艺术品”。提起耀州窑，人们立即会想到那令人心醉的刻花倒流壶、公道杯、倒装壶、良心壶、凤鸣壶……这些外形古朴、釉色温润晶莹、造型独特的艺术精品尽显耀瓷在宋代鼎盛时期的辉煌。而瓷器上的装饰手法以刻花、印花为主，刀锋犀利遒劲，线条流畅奔放，体现了耀瓷制作的最高技术。

耀州，设立于五代后唐时期。北宋称耀州为华原郡，金元时称为耀州，因此考古工作者称黄堡镇唐代遗址为“黄堡窑”，而宋、金、元时的黄堡窑才依照习惯称为“耀州窑”。耀州窑场广泛分布于今铜川市漆水河畔的黄堡镇、陈炉镇、立地坡、上店、玉华宫等地，位于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的交界之地，储藏着陶瓷所需的大量瓷土原料以及用于配釉的瓷土原料。这里煤炭、钳土的储量相当丰富，漆水河流域雨量充沛，气候温润，有着发展陶瓷业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同时在古代，这里有丰富的森林植被资源，为唐五代三百多年窑场烧瓷提供了燃料。



1954 年，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在遗址不远的黄堡高级小学，发现了我国最早纪录陶瓷生产的碑刻——《德应侯碑》。该碑系统生动地记载了耀州窑的位置、生产工艺流程和精湛的艺术造诣。这通石碑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1959 年 3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遗址上进行了大面积发掘，收集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耀窑陶瓷文物珍品。除在黄堡发掘外，还在铜川市的上店、立地坡、陈炉、顺河村、玉华村等地进行了广泛地调查，并发现了许多耀州窑系的其他瓷窑遗址与文物。其中陈炉镇瓷窑在明时已具生产规模。

据嘉靖三十六年（1557）乔三石所编《耀州志》记载“黄堡，今其地不陶，陶于陈炉”。明末寇慎《同官县志》记载“自麓至巅，皆为陶场，土人烧火炼器，弥夜皆明。每值春夜，远眺之，荧荧然一鳌山也”。清乾隆《同官县志》载有一首题为《炉山不夜》的五言诗：“日落炉峰夕，林间树色嗅。村灯暗秋月，野火夜沉星。似接然山景，凝昭梦泽灵。峥峻躯怪石，到处喜飞萤”。这都反映了陈炉陶业之盛况。陈炉的瓷窑按生产品种分为碗窑、瓮窑、黑窑、小货窑，生产工艺与黄堡耀州窑基本相同。据《同官县志》记



我国主要窑址分布图

载“崇祯十二年公元年，兵荒马乱，民饿死者，骼黄枕藉于道，而陈炉一方尤甚，居民八千家只存八十家，邑之仅存六里者，盖始于此也”。从这里推算崇祯之前陈炉之盛况，每户以五口人计算，八千户亦达到四万人，陶瓷生产之规模就可想而知了。

1984 年以来，对黄堡耀州窑遗址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发掘的漆水两岸一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唐三彩作坊一组三座，三彩釉试烧小窑炉一座，唐代瓷坯作坊一座，宋代瓷坯作坊和施釉作坊三组六座，瓷窑七座，储藏瓷器的土窑洞一座以及加工原料的大碾槽、堆料场、堆煤场、晾坯场等。在我国历史上黄堡镇为北方烧制青瓷的耀窑系的中心窑场所在地，创烧于唐，至今一千多年。沿漆水河两岸的峡谷台地上，层层叠叠布满了唐、五代、宋、金、元等各个时期的瓷窑和作坊，一占称“十里窑场”。据《德应侯碑》载：“晋永和中，有寿人耳，名林，而其字不传也。游览至此，酷爱风土，变态之异，乃与时人传大窑甄陶之术，由是匠工得法。”早在东晋以前，黄堡的陶业已兴起，吕家崖、李家沟等黄堡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了大量灰陶、夹砂灰陶、红色彩陶等，为人文历史、文化、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成为陶瓷考古研究的基地，足见黄堡陶业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黄堡镇是迄今陕西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座古代大型手工

业城镇，是我国古代生产陶瓷的重要基地之一，被誉为“千年瓷都”。

二、耀州窑的历史发展

从耀州窑兴起发展的历史看，分为兴起、成熟、极盛、继续、衰落等五个时期。

（一）唐代——耀州窑的兴起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陶瓷在魏晋六朝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生产地域广阔，各地名窑兴起，南北技艺交流，产品质量明显提高。随着对外贸易的拓展，瓷器的需求量日益增长，瓷业生产也日趋繁荣。

黄堡窑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创烧。从考古发掘资料看，耀窑是我国古代生产陶瓷釉色品种最多的窑口，品种达数十种。其中唐三彩色彩艳丽，格调明朗，气韵雍容，被举世公认为中国古陶瓷的文化瑰宝。

在三彩作坊中发现了唐代的琉璃瓦。我国战国时期即已出现琉璃工艺，关于琉璃瓦创烧和使用的文献记载始于北魏。唐代文献则称琉璃瓦为“碧瓦”，唐大明宫遗址屡有绿色琉璃瓦出土。黄堡窑址出土的琉璃瓦也以绿色为多，这说明耀州窑在唐代就与宫廷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烧造宫廷高级建材的重要基地 。

耀州距唐都长安仅七十多公里，凭借毗邻皇都的区位优势，所生产出来的陶瓷有白瓷、黑瓷、青瓷等，几乎囊括了唐代的所有瓷种，蔚为可观，誉为“集大成者也”。除唐三彩之外，唐代耀州窑已发现的瓷器品类有白釉瓷、黑釉瓷、黄釉瓷、茶叶末釉瓷，花釉瓷，素地黑彩瓷、白釉黑彩瓷等多种。瓷器在此时已经被广泛使用，茶具、餐具、文具、玩具、乐器和生活实用器具，乃至各种作为陈设的装饰器类，几乎无所不备。瓷器的烧制，小中见大，精巧而有气魄。

唐代耀窑虽处于探索阶段，但聪颖的匠师们博采众长、大胆创新，使自己走出了一条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特长的创新之路。这种在黄河南北独树一帜的烧瓷业至宋代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名窑。

（二）五代——耀州窑的成熟

黄堡窑以品种繁多而闻名，其青瓷碗受到茶圣陆羽的特别赞誉。至五代，虽仍兼烧白、黑、茶叶末等产品，但单色青瓷已成为主要产品。个中原因，一方面因青瓷淡雅，招人喜爱，另一方面则因为此地瓷土和釉料适于烧制青瓷。再加上数百年技术积累，使这里能够烧出十分精美的青瓷器。于是，物美价廉的耀州青瓷不胫而走，名扬天下。

在黄堡镇铜川第四中学操场耀窑遗址发现的五代文化层，遗物特别丰富，出土了约万片五代瓷标本，获得一批相当精致的青瓷器皿，如多折盏、葵口盏托、十四曲把足杯、

多层浅盘式套盒等。其造型与唐代的浑圆丰满相比，变得轻巧和秀丽。器壁变薄，口沿变得曲折多姿，有如菱花、海棠等。器盖更是多样，有仿瓜纽、果蒂、龟、虫、兽形，也有团花、枝花、草叶等形。这些造型，显然是从唐五代金银器造型得到启示，而瓷器的价廉物美，“天下无贵贱通用”，又非金银器可比。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六件带“官”字款的标本，是五代耀州窑青瓷完全成熟的标志。这种“官”款五代青瓷，过去在浙江临安发现一件，从风格看，那是越窑产品。“官”款产品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御用器。过去人们据《宋史·地理志》“耀州……贡瓷窑”、《元丰九域志》卷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认为耀窑贡瓷在宋神宗至徽宗年间。考古新出“官”款青瓷的发现，把耀窑烧制御用瓷的时间提前了一百多年 。

（三）宋代——耀州窑的极盛

到了宋朝，中国的瓷器烧造业进入一个极为繁荣的时期，定、汝、官、哥、钧等五大官窑，定、钧、耀州、磁、越、建、景德镇、龙泉等八大民窑，争相辉映。耀州窑作为一个自成窑系的北方著名窑场，以大批量生产独具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无可争辩地成为北青瓷的代表。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特别把耀州青瓷比作越窑的秘色瓷。他写道：“耀州青瓷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这是对耀州青瓷崇高评价，因为秘色瓷是世所公认的唐代瓷器的精品。



宋代耀州窑青釉提梁倒注壶

在耀州窑场，拥有一批技术高超的工匠，他们所做的瓷胚，“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烧制成的瓷器，“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这里的窑场范围很大，制陶业已经形成了一项产业，“居人以陶器为利，赖之谋生”。往来的商贾如云，这里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陶瓷生产和销售中心。他们还把产品运到外地销售，《续资治通鉴长编》曾有记载，在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耀州遗子弟载陶器四车，进京（汴京，今开封）贸易”。这表明宋代是耀州窑最为辉煌的时期。

随着社会的进步，耀州窑的工匠们发明了大型石跟槽粉碎设备，改进了制轮工具，使用了能够提高炉温的煤炭，在瓷器的烧造技术和工艺上获得了巨大进步。

中国素称“瓷国”，宋瓷外销数量空前。目前在日本、朝鲜、埃及、坦桑尼亚、阿曼等国古遗址都发现了中国宋代耀州窑青瓷器。值得一提的是，12 世纪毁于战火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了上万件中国陶瓷标本，其中就有宋代耀窑印花凤鸟莲纹盘、刻花缠枝菊纹碗。东非坦桑尼亚基尔瓦岛出土大量中国瓷器，耀州青瓷在其中占有显著位置。



北宋耀州窑飞鱼形水盂

（四）金代——耀州窑的继续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的考古发掘找到了金代作坊和灰坑，出土了一批金代瓷器，在该文化层中发现有刻“贞元”（1153—1156）年款的瓷片和“大定”（1161—1189）年款的印模。这将金、元瓷器明确区分开来。从金代遗物看，青瓷釉色可与宋瓷媲美，纹饰方面有所创新，还出现青白玉釉一类的新品种。这说明金代耀窑并没有明显衰退。同时，从数十年来的考古工作中发现，许多金代墓葬和遗址都有耀瓷出土，有些还十分精美。这说明，金代耀窑不但产量未减，质量也没有降低。

（五）元、明——耀州窑的衰落

元代耀窑产品有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是釉色青中少绿而偏黄，呈姜黄色。据研究，这是火候掌握不好、还原焰变成氧化焰所致。元代耀窑青瓷不再进入宫廷，变得粗犷质朴，但更坚实耐用。同时，白地黑花瓷增大了产量，饰有浓郁民间风格黑花的白瓶为百

姓所喜好。这说明工匠们为维持生计，调整了品种，将市场转向了更广阔的民间。

到了明代，“十里窑厂”的繁荣景象不复存在。到了明末修《同官县志》时，黄堡窑址只剩下颓垣断壁。

三、耀州窑衰败之谜

耀州瓷釉色苍翠、深沉、透亮，如冰似玉，造型古朴庄重，纹饰富丽多姿，构图严谨生动。耀州窑在宋代与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窑齐名。但从明朝至民国前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耀州窑在各种史书中突然杳无踪迹。于是出现了耀州窑衰败之谜。有人认为，耀州窑毁于金元入侵的战火；有学者认为是因原料枯竭而衰落；也有专家认为耀州窑并未停止生产，而是转移了地点，由原来的黄堡镇转到了陈炉镇，故陈炉镇窑烧的瓷器实即原来的耀州窑瓷。

最为普遍的观点是认为耀州窑是毁于战乱。黄堡镇是当地最早烧制瓷器的地方，耀州窑的中心窑址就是黄堡镇。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的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十五公里，南距耀县十三公里，漆水从镇内流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皆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黄堡镇能成为耀州窑的中心窑址，与其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是分不开的。在北宋时达到鼎盛，《同官县志》描述了当时的盛况：“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也。”从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烧窑的规模是相当大的，达到了十里都是窑场的程度。但到金、元后，黄堡镇的耀州窑盛况不再。据《同官县志·工商志》记载：“同官黄堡镇瓷业，宋代早已驰名……惜自金、元兵乱之后，镇地陶场，均毁于火，遂而失传。”也就是说，由于北宋末期金兵南犯，宋王室被迫南迁。在战乱的情况下，黄河流域遭受了严重破坏，黄堡镇亦难逃劫祸。当时的窑工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出走，窑场规模于是逐年缩小。到明代弘治年间，十里窑场沦为荒丘瓦砾，既而销声匿迹。于是有的学者提出黄堡镇耀州窑是由于金、



金代耀州窑月白釉胆瓶

元时期的战乱而导致衰败之说。

关于黄堡镇耀州窑是否是由于战乱而衰败于金、元，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在金、元兵荒马乱的时候，窑工为了保命，逐年四散，流落到远离战火、远离官道的深山偏僻之地。后来虽然黄堡镇的窑场毁了，但带着手艺的窑工却在立地坡、上店村、玉华宫及陈炉镇等地纷纷落户，繁衍生息，并继续经营瓷器。耀州窑的中心虽然衰败了，但在它周边地方的耀州窑崛起了。考古调查证明，陈炉窑在烧造时间上与黄堡窑有沿延关系，且主要生产工艺如泥制、拉坯、烧成等相同，又同处古代同官县，所以陈炉窑是耀州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耀州窑”的中心窑场——黄堡窑，在金、元时期衰败以后，耀州窑的中心窑场随即转移至陈炉地区。

“黄堡衰，陈炉兴”，所以黄堡镇耀州窑的炉火并未“停烧”。这些后崛起的耀州窑，很多工人是从黄堡镇逃难出来的窑工或者他们的后裔，所以在技术上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角度说，黄堡镇耀州窑并没有衰败，只是进行了窑址转移。由于后来的耀州窑分散于多个地方，不像以前都集中在黄堡镇一地，这样单个的规模就比不上黄堡镇，但也颇具规模。如当时的陈炉镇，据文献记载：“陈炉镇……住民八百余户……镇民俱业陶，而以农为副业，陶场南北三里，东西绵延五里，炉火杂陈，彻夜明朗。”故有“炉山不夜”之称，为“同官八景”之一。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金、元时候的耀州窑和黄堡镇耀州窑相比，也并没有衰落的迹象，仅陈炉镇这个地方就如此繁荣，如果把所有集散的耀州



耀州窑博物馆

窑加起来，其繁荣程度绝不亚于黄堡镇，甚或有超过的趋势。当时陈炉镇等地不仅商贾云集，而且在工艺上与黄堡镇耀州窑相比也有很大的改进。如能把瓷泥中许多多余的杂质去掉，使成品瓷成分更纯质地更加坚致，强度更高。并且这时已经懂得陶范印花，即在成型制坯时压印装饰花纹使得瓷坯制作十分齐整，比北宋初期时在瓷坯上刻花是一大进步，使得装饰纹样在构图上可以多样化，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

耀州窑衰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认为并非史书所说的毁于金、元战火，主要是因为原料短缺以及瓷业间的激烈竞争所致。黄堡镇在北宋曾经出现过十里窑场的壮观场景，从中也可猜知窑的数量之多。黄堡镇虽然有丰富的煤和十分适合制瓷的坩子土，但这些毕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长年累月使用，后来终于枯竭了，于是出现“此地不陶，陶于陈炉”。陶工也因此流落到陈炉一带，继续操陶业，谋生计，甚至形成规模性的迁移。另外耀州窑是以生产民间用瓷起家的，由于它越来越不适合皇家口味，明清时期耀瓷逐渐失去了为宫廷生产贡品的资格，地位日下。此时我国北方的制瓷业也逐渐南移，景德镇也在这时逐步崛起，一举夺得生产宫廷贡品资格，成为瓷都。景德镇以洁白的胎釉配以用钴料烧出的绚丽的青花瓷器，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这对耀瓷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耀瓷逐渐失去关注，耀州窑也走下神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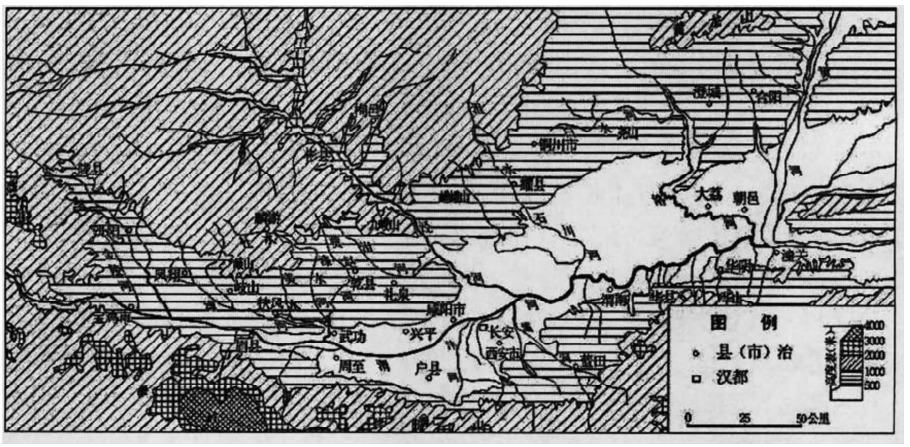
（撰稿人　丁　喜）

宋元明清四代的关中水利

关中是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也最早成为经济核心区。该地区春季降水有限，加之升温较快，蒸发量数倍于降水量，致使春旱频率较高，有“十年九旱”之说。在农作物需水量最大的春季，降雨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即使在降水最多的夏季，也时有伏旱发生。关中地区的气候特征对人工灌溉提出了迫切要求。

关中地区水利开发利用历史悠久。早在周代，周先民就曾在此“相其阴阳，观其泉流……度其郁原，彻田为粮”，开渠灌田于渭水之滨。之后，在秦汉及唐时，关中地区一度以大型水利工程著称于世。郑国渠、成国渠、三白渠等不但在水利史上有重要地位，而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使得“关中沃野，无凶年”，有“陆海”“天府”等美誉。隋唐都以关中平原的长安为首都，大力恢复和发展关中地区的水利事业。唐代对郑白渠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更新与改造，使渠系得到完善，产生了巨大的效益。

宋、元、明、清四代，在我国东部建都，关中的政治地位下降，政府不像汉、唐两代那样大力建设这里的水利，再加上泥沙的淤积越来越严重，关中水浇地的面积在逐渐缩小。



关中地形与河流分布图

一、两宋时期的关中水利

隋唐之后，经过五代十国动乱，关中地区水利设施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水利效力明显下降。五代以后长安不再是全国都城，之后政府不再像秦、汉、唐时代那样重视建设关中水利。宋代对郑白渠数次的修缮，最后在大观年间修成的丰利渠，使得灌溉面积增多，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关中水利事业得到很大的改善。主要的修缮有：

宋代乾德年间（936—968），修筑木堰，“节度判官施继业率民用梢穰、笆篱，栈木，截河为堰，壅水入渠。缘渠之民，颇获其利”，恢复了三白渠。新建木梢堰，虽可获得一定的效益，但是渠堰很不牢固，“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则堰辄坏。至秋治堰，所用复取于民，民烦数役，终不能固”，所以数次的修缮，花费颇多。其后的淳化二年（991），有县民杜思渊上书言：“唐时有石翼，坚固耐劳，乞依古制，调丁夫修叠石翼，可得数十年不挠。所谓暂劳永逸矣。诏从之，遣将作监丞周约己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而止”，已经有了修筑石堰的计划，但是由于工程量大，花费颇多，没有达成修渠堰的目的。

到了至道元年（995）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陈尧叟上郑白渠利害：“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顷，皆近代改修渠堰，浸隳旧防，繇是灌溉之利，绝少于古矣。郑渠难为兴工，今请遣使先诣三白渠行视，复修旧迹”。当时灌田不及二千顷，故有全面考察，大修三白渠请示。当时灌田派大理丞黄埔选、光禄寺丞何亮亲往现场踏勘，“选等使还，言……其三白渠溉泾阳、栎阳、高陵、云阳、三原、富平六县田三千八百五十余顷，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筑堤堰，以固护之。旧设节水斗门一百六七十有六，皆坏，请悉缮完。渠口旧有六石门，谓之‘洪门’，今亦隤圮，若复议兴置，则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势，别开渠口，以通水道。岁令渠官行视，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即时浚治……欲令自今溉田既毕，命水工拆堰木寘于岸侧，可充二三岁修堰之用。所役缘渠之民，计田出丁，凡调万三千人。疏渠造堰，各获其利，固不惮其劳也。选能吏司其事，置署于泾阳县侧，以时行视，往復甚便。……时著作左郎孙冕总监三白渠，诏冕依选等奏行之。后自仲山之南，移治泾阳县”。此次修建规模很大，先有官吏考察并制订计划，后由三白渠总监督修之，不仅修了渠堤，缮修了斗门，别开渠口，而且还规定了管理官员的住所、日常渠官的行视办法、木堰的岁修节约之制。

景德三年（1006），“盐铁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马景盛陈关中河渠之利，请遣官行郑、白渠，兴修古制。乃诏太常博士尚宾乘传经度，率丁夫治之。宾言：‘郑渠久废不可复，今自介公庙迴白渠洪口直东南，合旧渠以畎泾河，灌富平、栎阳、高陵等县，经久

可以不竭’。工既毕而水利饶足，民获数倍。”修治了引水渠首。

熙宁六年（1072）五月，诏“诸创置水硙碾碓妨灌溉民田者，以违制论。”命赞善大夫蔡朦修永兴军白渠。

宋代的改造主要是筑堰和改凿新的引水渠口，是在唐代渠系的基础之上，对原有水道的修缮。最主要改凿是渠口上移。但是因为其他灌溉无力大修，溉田作用下降，所以整个关中的水利，仍呈滑坡趋势。

二、元代时期的关中水利

宋朝的丰利渠，在元代称为王御史渠，王御史渠又名新渠，至元前期（1264—1275），李德辉为关中安西王，“至则视瀕泾营牧故地，可得数千顷，启庐舍，疏沟浍，假牛、种、田具与贫民二千家，屯田其中，岁得粟麦刍藁万计”。据《元史》：“陕西屯田总管府：（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以安西王府所管编民二千户，立栎阳、泾阳、终南、渭南屯田……三十年，复更为民屯……栎阳七百八十六户，后存六百五十户；泾阳六百九十六户，后存六百五十八户。”《元史》在泾渠条下曰：“元至元间，立屯田府督治之。”

后又经过大德八年（1304），陕西行省命屯田府总管谷伯颜帖木儿即泾阳尹王琚疏导。在至大三年（1311），行台御史王承德言改造，又自延祐元年（1314）兴工到延祐五年（1319），渠成。这次是元代最为影响的改造。自此之后，还有几次较大规模的修造。但总而言之，元代修治基本与宋代相同，主要是在渠首。渠系基本与唐代相同“立三限闸以分水，凡二所，三限闸其北曰太白渠，中曰中白渠，南曰南白渠，太白之下是为邢渠，邢堰之上分为二渠，北曰务高渠，南曰平皋渠。彭城闸渠分为四，其北曰中白渠，其南曰中南渠，又其南曰高望渠，又其南曰隅南渠，中南渠之下其北分者曰析波渠，其南分者曰昌连渠，渠岸两边各空地八尺，凡渠不能出水，则改而通之。”

据《长安志图·泾渠图说》载：“至大元年（1308），承德郎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监察王琚建言于宋渠上更开石渠五十丈……延祐元年（1314）兴役，后至元五年（1339）渠成”。王御史渠只是渠口上移了一段距离，渠首工程结构无大的变化。

三、明清时期的关中水利

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罕有汉唐时那种大型水利工程出现，小水利的兴修却蔚然成风，水平很高，形式多样。主要有对小河流的水利开发，充分利用泉源，大力推广井灌和

涝池。

明代十分重视水利事业建设，中央政府常常派遣官员到地方指导、监督水利兴修，“明初，太祖诏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越二十七年，特谕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泄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乃分遣国子生及人材，徧诣天下，督修水利。明年冬，郡邑交奏。凡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其恤民者至矣”。朱元璋在明初重视关中水利事业的修复和发展，只是他在新朝定鼎后在陕西推行“休养生息”恢复经济措施的一部分。明代关中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明代引泾灌溉，多次整治和疏浚。前期主要是对元代王御史渠及原三白渠系进行整修，主要是中央政府或高级地方行政长官主持兴修。据相关文献记载与学者研究，明代较大规模的整治引泾工程，至少进行了六次。从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开始，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先后进行了六次修缮与改造。

明代的修治主要是对引水口、渠道系统，一如唐代以来之白渠向下流扇状派分为中、北、南三白渠，三白渠又酾出诸多大小支渠，使渠水广润灌区诸县之田。明代关中水利的修建，成绩最为显著的是泾阳洪渠堰的开凿和渠道的疏浚；是西安府城中居民饮用水渠道的修复和新建，另有朝邑的引洛入渭渠的兴修。西安供水问题古往今来都是人们颇费心思而又难于圆满解决的问题。明初的西安府城，“井水咸苦，饮者辄病。”曹国公李文忠向朱元璋奏报：“陕西病咸卤，请穿渠城中，遥引龙首渠东注。”从其请。导引地面水来解决城市供水，这是承袭了汉代以来的供水格局；寻找新水源，拓展地面水供水区域，则是明代的贡献。城市供水设施得到很大改善，西安府城居民不再受“井泉咸苦，饮者辄病”的磨难，从而促进了关中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初，关中水利的修复和扩建，既有对古代劳动人民和有远见的杰出的政治家的历史创造活动的继承，秦汉的郑白渠、白公渠，唐、宋、元之三白渠和丰利渠，对明代洪渠堰、广惠渠的修建，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保障了效益的提高。在与大自然做斗争，在整体的经济建设活动中，往往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关中水利的发展，又与朱元璋一贯重视农业，及时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唤起广大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关。

清代，关中水利发生了重大变化，关中各地引泉小水利为数更多。据雍正《陕西通志》记载，眉县境内泉水众多，县东一里的一湾泉、三十里的槐芽泉、四十里的柿林泉、六十里的龙舞泉，县东北十里的清远泉，县北一里的崖下泉，县西五里的红崖泉、六里的五眼泉，县西南十里的观音泉、十一里的碗泉，皆引以灌溉。

井灌也在明代兴起，井灌是穿凿汲取地下水的一种灌溉方式，主要出现于引用河流、泉源等地表水所不及的地方。故井灌既是地表水引灌的重要补充，又是区域水利灌溉事

业进一步发展的一种表现。有关明代关中地区凿井灌溉的情况已见诸文献记载，如：万历《富平县志》记，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杨时泰任富平知县，他除率民疏浚引仁灌渠外，还改变了“邑田故不井”的状况，教民桔槔，从此凿井灌溉始在富平县流行。

至清康熙时，户县王心敬著《井利说》一书，在渭河以南地区提倡开井灌溉。至雍正、乾隆时获得大发展。乾隆二年（1737）崔纪代理陕西巡抚，鉴于当时陕西连年大旱，河渠浅涸，嘉禾枯槁，遂采纳王心敬的建议，大力倡导凿井灌田。一时凿井之风遍及西安、同州、凤翔、汉中、乾州、邠州等 33 个州县。据同年十一月统计，除旧井76 000余口外，凿新井68 980余口。

乾隆十五年继任陕西巡抚的陈宏谋认为：“关中之地。平原土厚，虽有河道，岸高难引，凿井灌田实为救旱良法。”因此，继续积极推进井灌。规定：“凡以己资开井者地方官验明奖励，无力者给社谷、常平谷作工本。”在他的推动和鼓励下，“又凿井二万八千有奇”。这样，乾隆时陕西已有灌溉水井136 900余口。当时井大者可灌田二十亩，中等者可灌田六七亩。以平均每井灌田 10 亩计，则陕西井灌的农田面积就已达 130 余万亩，可见，至乾隆时，陕西关中井灌区已基本形成。

明清时期的关中水利工程，仅以井灌而言，灌区就达到了 130 万余亩，另据清人毕沅记载，这一时期西安等州具有灌渠 1171 条，灌田达 64 万亩之多。再加上小流域的水利设施，泉灌和涝池的灌田面积，保守估计总灌田面积应该在 200 万亩以上。

四、借鉴与启示



纵观关中地区水利发展，与环境和气候的变迁息息相关，水利开发由农田排水到引水灌溉再到水害治理最后又到以引水灌溉为主的水利工程。历史时期关中地区的不同水利制度及设施对现在社会的水利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近十多年来，世界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制定有关政策法规，鼓励灌溉用水户更多地参与灌溉管理，进行灌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在我国，用水户参与管理由来已久，从关中各种地方志和水利碑记，都能看出当地参与式用水管理制度，尤其体现于各灌区的渠册即“水册”中。

进入 21 世纪，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基本完成，关中经济区的建设提到了国家级层面，西安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准，在全国是北京、上海以后的第三个。

从古至今，一些水利建设工程仍然沿袭下来，虽说当今社会条件、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对比所发生的地理、水文等因素，参考其漕运与都市用水事

业，系统分析考察关中地区较为典型的农田水利、都市给水与漕运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我们21世纪的关中地区，甚至可以延伸至更广泛的区域，来更加合理地沿袭和利用这些水利措施，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更适合于关中地区农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为现代关中水利规划提供借鉴，从而造福于人们的生活生产。

（撰稿人　张　明　张淑霞）

丝绸之路与陕西人的情缘

近期以来，丝绸之路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新热点。可以说，人们动用了一切手段和方法，重新认识丝路，大力宣传丝路——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弘扬丝路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作为历史文化大省的陕西，因历史上长期居于丝绸之路的起点，故而在当今的“丝路热”之中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和独特的优势。不过这里应当看到，陕西除了曾是丝路起点之外，对丝路还有着另一种相当巨大的资源，那就是历史上陕西人与丝绸之路结下的极为特别的关系和极其特殊的情缘。而这种关系和情缘表明，陕西人身上似乎天然地具有某种丝路“基因”。

一、陕人张骞“凿空”通西域

今天人们所说的“丝绸之路”，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一书中提出的。这是一条沟通世界东方和西方的陆路大通道。通过它，东、西两大文明实现了有效的交流。特别是东方中国的丝绸经由这条通道输送到遥远的西方，意义更为重大，所以才有了“丝绸之路”的称谓。而这样一条在中西交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丝路的开辟者，正是一位陕西人，他的名字叫作张骞。

大家知道，中西交流的历史起始甚早。《山海经》里“夸父追日”的故事，很可能反映了原始社会一次溯河、渭而上，朝西北方向的大规模交通活动。《穆天子传》中关于周穆王乘八骏之车，溯黄河、登昆仑，会见西王母的传说，则生动反映了古代人们进行中西交往的愿望。该书中有关西方风物的记述，表现出当时人们对于西部地区所具有的丰富知识。当然，这些记述尽管有着不少令人可以驰骋想象的内涵，但毕竟带有太多的神话或传说的色彩。

至秦汉时期，中西交流已经既非神话，也非传说，而是活脱脱的现实。当时把今新疆、中亚及更远的西方泛称为“西域”，而狭义的西域则仅指天山南北一带的地方。西

汉初，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那时活动在北方一带的匈奴族经常侵扰汉边境，成为严重的边患。为了有效地抵御北方匈奴的侵扰，汉武帝从一个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后，便立即决定募使前往寻求与国，以实现其“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武帝的募召，得到了时为皇帝卫队成员的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人张骞的积极响应。当时，从汉到西域须经匈奴人控制的河西地区，前进的道路异常艰难。公元前138年，张骞率众百余人持汉节从都城长安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人俘获，拘留了十一年，逃脱后继续仗故节西行抵大月氏。由于大月氏在中亚阿姆河流域农耕定居已久，“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结果张骞扑了个空。尽管张骞未能完成结交与国的使命，但他终于在公元前126年生还长安，给西汉王朝带回了关于西域的最新消息。这更加激发了汉武帝西进的热情，此后遂开始了一系列广求西域通道的活动。自公元前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大败匈奴收复河西之后，通往西域的道路终告畅通。

史学家司马迁把张骞的西域之行，称之为“凿空”。对于“凿空”一词，古人曾有多种解释。或曰“凿，开；空，通也。（张）骞开通西域道。”或曰“谓西域险厄，车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现代史家范文澜在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将“凿空”解释作“探险”，显然超越了古人，更为准确。张骞“凿空”的行动，意义重大。由此而开拓的西域通道，即日后被以“丝绸”命名的“丝绸之路”，对中西文化经济交流起了巨大作用，谱写了世界文明史上绚丽的一页。



张骞像

虽然迄今关于丝路开辟的时间，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但不论怎么说，经河西、新疆、中亚直到西方的商路，开始成为正式通衢大道，并见诸史籍明确记载者，张骞“凿空”通西域无疑是一个里程碑；丝路开辟者，陕人张骞当之无愧。从汉武帝朝开始，直到西汉结束乃至其后一些相当长的时间，长安始终都是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无可争辩的起点。

二、陕人班超等立功西域维护丝路畅通

张骞出使西域，丝路正式开辟。不过，这条沟通中西的道路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恶劣，尤其是北方匈奴政权的存在，更使之不时受到威胁甚至被中断，因此保持该通道正常的运作秩序、维护它的畅通便成为很重要也很特别的事情。如公元前 36 年（汉元帝建昭三年），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矫诏调发屯田兵士和西域各国军队 4 万人征伐匈奴郅支单于，胁迫上司西域都护府校尉甘延寿服从其事，攻克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斩杀郅支单于，即典型实例。

东汉建立之初，无力顾及西域，但随着国力不断增加，亦开始有所作为。公元 73 年（明帝永平十六年），窦固等大败北匈奴，东汉着手恢复与西域诸国的政治关系。在这一背景下，遂出现了班超经营西域再次打通丝路的壮阔一幕。

超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父彪、兄固，皆著名史学家。家贫，佣书养母，后投笔从戎，随窦固击匈奴。当汉军获胜、肃清了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之后，班超奉命率 36 吏士出使西域。超等攻杀匈奴派驻鄯善、于阗的使者，废亲附匈奴的疏勒王，巩固了汉的统治。汉明帝死，亲匈奴的龟兹等国乘大丧之机攻汉都护，进行反扑。汉廷征班超还朝，疏勒等国极力挽留。班超遂在西域坚守，并初步稳定了局势。后得到汉章帝派来的援军，联合当地力量，开始全面反击。从公元 87 年（章帝章和元年）到 94 年（和帝永元六年），陆续平定莎车、龟兹、焉耆等地叛乱，击退月氏入侵，保护了西域各族的安全，使中断了的丝绸之路得以重新畅通。由于班超在西域所做的贡献，东汉政府于公元 91 年（永元三年）即任命他为西域都护，后又封定远侯。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元 97 年（永元九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这件事。虽然当甘英抵条支西海（今波斯湾）后，被当地人欺骗海路艰险而返，此举却在客观上将丝路向西大大延伸到欧洲。《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国，一名犁轩，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延熹九年为公元 166 年。这就是说，当甘英出使大秦未果 69 年之后，大秦的使者终于来到东汉都城洛阳。有文字记载的东、西方两大帝国的交往，此为首见。这或可视为班超遣使出使大秦所结出的带有某种必然性的文明交往成果。

班超之子班勇，也是为维护丝路安全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人物。勇字且僚，少年时就颇有父风。安帝初，任军司马，出敦煌迎西域都护及甲卒而还。元初年间，廷议西域

问题，他力主复置西域副校尉，为安帝采纳。公元 123 年（安帝延光二年），任西域长史。时匈奴多次攻扰西域，他率兵士 500 人出屯柳中，复与龟兹合兵击走匈奴伊蠡王，开通了车师前王庭。公元 125 年（延光四年），他调发汉兵 6000 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大破车师后部，斩其王军就，献首京师。次年（顺帝永建元年），在全部平定车师六国的基础上，他领导西域各族大破北匈奴呼衍王，进一步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确保了丝路的通畅。他将自己的西域见闻，著《西域记》一书。今传世的《后汉书·西域传》，即据此写成。

上述班氏父子皆陕籍人士。其实，当时勇敢抗击匈奴维护丝路安全的陕西人还有不少。例如耿恭、耿秉兄弟的事迹，亦相当感人。

耿恭字伯宗，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境）人，东汉开国功臣耿弇弟耿广之子。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明帝末，任戊己校尉，屯驻车师后王庭金蒲城。不久，遭北匈奴进攻，他以毒药箭击退之。后引兵据疏勒城，北匈奴复来进攻，并断绝城下涧水。他团结吏士，甚至饮用压榨出的马粪汁，终于打井成功，使匈奴退兵。及明帝去世，北匈奴趁机反扑，车师也背叛。在粮尽矢绝的情况下，煮铠弩食其筋革，与部众坚守不屈。公元 76 年（建初元年），章帝派出援军，攻交河城，迫使车师投降，耿恭等得救，只剩 26 人。及回师玉门，仅余 13 人。时人称其节过苏武。

耿秉字伯初，耿弇弟耿国之子，与耿恭为叔伯兄弟。体格雄伟，腰带八围。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以父任为郎，数次上言兵事，认为边患专在匈奴，必须以战去战。明帝末，迁官驸马都尉，与窦固等大破北匈奴，并攻破车师。章帝时，历拜征西将军、度辽将军、执金吾。公元 89 年（和帝永元元年），与窦宪一起击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封美阳侯。性勇壮而简易，军行常自披甲在前，深受士卒爱戴。他对于匈奴，不只使用武力，更重恩信；所以匈奴闻其死讯，举国嚎哭，或至割面流血。

耿氏兄弟抗击匈奴的斗争，应该说亦为维护丝路的畅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唐代丝绸之路经营者多陕人

唐代，丝绸之路步入其最繁荣的时期。而丝路的这种发展繁荣，是与唐帝国对丝路的经营密不可分的。

唐的丝路经营，总体上来看，是与整个国家的治理同步并行的。具体言之，则是随着帝国对丝路沿途地区统治权的建立或强化——换句话说，即随着唐接纳毗邻北部和西

部边境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归附、将其领地改变为唐的行政辖区的过程来实现的。

这里，唐王朝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对手，便是横亘于帝国北方及西方的突厥汗国。

史称突厥是匈奴的别种。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很快就成了威服塞外的强国。隋朝时，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隋末中原丧乱，突厥再度崛起。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唐乘东突厥内部分裂派兵出击，次年灭之，于是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一带，设置顺、祐、长、化四个都督府；又在突厥统辖的今内蒙古地区，东面置定襄都督府，西面置云中都督府，下设六个州。虽然唐在这里是任用突厥酋长为地方官进行管理，但这些地方已变为唐的政区却是毋庸置疑的。

特别是唐灭西突厥、完全掌控西域，对丝路的经营意义更为重大。

西突厥在隋末唐初迅速扩张，隔绝了中原地区与西域的联系。因此，唐灭东突厥之后，开始同西突厥展开争夺西域的斗争。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占据伊吾（今新疆哈密）等七城的胡人归附唐朝，唐以其地为西伊州（后改称伊州），作为进军西域的据点。公元635年（贞观九年），唐降服据有今青海及新疆东南部的吐谷浑，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唐攻取高昌国，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雅尔和卓）；又占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设庭州。公元642—648年（贞观十六至二十二年）唐连续打败西突厥，攻取焉耆、龟兹等地，天山南路各小国纷纷摆脱西突厥控制，归附唐朝。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田、疏勒四镇，称“安西四镇”。四镇为唐经营西域的军事基地，对西域的统一起重要的保障作用。



公元657年（唐高宗显庆二年），唐灭西突厥，控制了整个西域地区，于是在中亚碎叶川以东置昆陵都护府，以西置濛池都护府，皆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碎叶川南岸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靠近西突厥牙地千泉，正值中亚交通要冲，商业繁盛，唐遂以碎叶替代焉耆，划入安西四镇（碎叶、龟兹、于田、疏勒），作为经略中亚的重要基地。此时原来役属于西突厥的中亚各国也都归附唐朝，唐在于田以西、波斯以东的十六国之地，在乌浒河（阿姆河）以北的昭武九姓国之地（今乌兹别克境内），也划置了许多都督府和州，称作“羁縻州”。公元702年（武周长安二年），武则天又在天山以北设置北庭都护府，与原有的安西都护府同为设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安西都护府负责管理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楚河以南的广大中亚地区，北庭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游牧地区。

上述将近一个世纪唐在北方、西方将突厥掌控地区改变为帝国辖区的行动，实际上也就是对丝绸之路最大的一种经营。此举有力地保障了丝路的畅通。鼎盛时期唐帝国的

西部疆域，达到咸海西岸，包括了中亚大部分地区。

当然，漠北少数民族的关系相当复杂，他们建立的政权亦起落无常。如东突厥灭亡后曾有后突厥汗国的兴起，另先后还出现有薛延陀汗国、回纥汗国等等。不过总观这些政权与唐的关系，和好明显占据主流。他们基本都臣服于唐，为大唐藩属。像回纥人，还曾派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唯其如此，所以唐代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再经新疆通往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丝绸之路，基本上是通畅的。这一切，正如唐诗人张籍《凉州词》所描写的那样："无数铃声遥过赜，应驮白练到安西"。唐帝国的丝绸等商品，随着一队队骆驼运销西方；西方的物品也由这条商道运达唐朝内地。丝路上往来的除了商贾之外，还有各国的使节、贵族、学者、艺术家、僧侣等。那时与唐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 70 余个。

需要指出的是，唐所秉持的开放、包容政策，对于丝路的发展繁荣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大家知道，唐立国初期太宗李世民便确立了对各民族的开放包容政策。公元 644 年（贞观十八年），突厥内乱，十余万人请求迁至黄河以南的胜州、夏州之间（今甘肃、宁夏一带），朝臣纷纷反对，认为夷狄不可靠，接纳他们会带来麻烦。太宗力排众议，对大家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这一席话，充分显现了唐主宽阔的心胸与包容的心态。太宗又对主掌"起居注"的褚遂良讲："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事后果然不出所料，突厥首领主动降唐，还被授官右武卫将军。

在正确政策的指引下，文明昌盛的唐王朝对外的吸引力空前增强，成为时人向往的圣地。这自然也就带来了丝路的发展繁荣。来自粟特、突厥、回鹘、铁勒、高句丽、百济、日本等民族和国家的众多外来人口，给唐帝国注入新鲜血液。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还当了唐的高官，直接参与了帝国的管理。历史上，像唐这样既繁荣、强大又开放、包容的帝国，并不多见。

唐帝国经营丝路过程中，涌现出不少英勇抗击突厥、立功西北边地的著名人物。他们之中，陕籍者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李靖，京兆三原人；李大亮，京兆泾阳人；张俭，京兆新丰人；侯君集，豳州三水人；王孝杰，京兆新丰人；唐休璟，京兆始平人；李嗣业，京兆高陵人；高叡，雍州万年人；程千里，京兆府人，等等。据此，似乎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说：唐代丝绸之路经营者多陕人。

至于在发展繁荣的唐代丝路上，究竟出现过多少属于奇迹类的事儿，人们似乎没有做过统计，但高僧玄奘经由丝路西天取经，无疑是这类事情的典型。此举被后世演义作

小说《西游记》，成为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还有那分明是吃了败仗、作为“耻辱”记录的唐与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的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之战，由于被俘的唐军士卒把造纸术带到阿拉伯世界并传至西方，结果反而造就了一段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从以上两例奇迹，不难看出唐代丝路的巨大贡献，亦不难看出唐人经营丝路的价值和意义。

四、历史丝路与今日重建丝路以及陕人责任

我们把自汉开辟而至唐繁荣的陆上沟通东西方的道路，作为丝绸之路的主体部分，称之为“历史丝路”。通过上述，不难看出这条丝路开辟者、维护者及经营者那种积极进取、敢于开拓、勇于探索的精神，那种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自尊心和自信心，那种矢志不渝、坚贞不屈、忠君报国、不辱使命的意志与品德，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都是有重要启迪意义的。这些，都堪称历史文化的精华，需要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

自然，这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看点是，历史丝路的开辟者是陕人，著名的丝路维护、经营者当中也多为陕人。如此一种“多陕人”现象，再加上长期以来陕西一直都是丝路起点的事实，就明显昭示我们，丝路与陕西不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也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特有的“缘分”。换言之，也就是说陕西与丝路犹如一对孪生兄弟难解难分，陕西命里注定就有强大的丝路“基因”。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唐代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政治中心的东移、经济重心的南移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在东西方贸易中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原来的陆上丝路反而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近现代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广大地区渐次成为沙俄和苏联的统治区域。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独立，欧美及日本、韩国等迅速进入中亚，开展经济、文化渗透，美国甚至还建立了军事基地。凡此种种，表明发达国家对古老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地区非常重视。而这些，也明显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在我国争取外部和平环境、维护领土安全、保障国内社会经济建设的战略需求中，中亚地区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2001 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人们简称“上合”。该组织的成立，符合“上合”各国对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维护区域稳定的共同战略需要。2013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期间，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所作的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中，明确提出了重建丝绸之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2014 年 6 月 5 日，在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第三

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主席又发表了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重要讲话，指出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在文明交往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希望双方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新机遇和新起点，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在当前我国东部和南部海疆多事，我国外部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情势下，通过重建丝绸之路、共建丝路经济带，发展加强我国与中亚各国及阿拉伯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进而谋求更大的发展，显然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当今天我们重建丝绸之路的时候，照一照前述“历史丝路”的镜子，应该说是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的事情。比照之下，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今天重建丝路虽然有某种延续、发展历史丝路的意味，但却并非简单的一般性的延续和发展，而是在全新起点上一种超越性的新延续和新发展。重建的丝路，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而已；它将从陆上、海上双向贯通东方与西方，最终合拢在非洲大陆，实现亚、非、欧一体化，使之成为以中亚为核心的“世界岛”。这较之历史丝路，当然要壮阔得多，要宏伟得多。

其次，历史丝路和今天重建的丝路尽管不可同日而语，但前者毕竟留下了不少经验教训，可资后者借鉴。这之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既要有勇气和决心开辟通道，又需有耐心和毅力维护其安全和持续发展。我们知道，无论是开辟丝路的策划者汉武帝，抑或是实践者张骞，皆为具有超常勇气和决心的人物。正是他们非凡的勇气和决心，才使丝路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得以开辟。开辟丝路虽说很不容易，但维护其安全畅通并使之持续发展，实际上则是更难的事情。历史丝路，由于战争、变乱等多种原因影响，不时被阻隔、中断，不过如班超、班勇父子，如耿恭、耿秉兄弟等等，凭借勇敢和毅力，凭借聪明和才智，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有效地维护了丝路的安全，保证了其畅通无阻。这样的历史往事，需要我们时时牢记。二是变自发为自觉，并不断强化自觉意识。历史丝路的缘起，可以说完全是一种自发行为。当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旨在寻求与国，“断匈奴右臂”。不想此举却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对于中西文化经济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谱写了世界文明交往史上绚丽的一页。如此的历史后果，当然远不是西域“凿空”的组织者和力行者所能预料到的。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产生的实际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今天重建丝路，自然需要借鉴历史上的教训，不是自发而是自觉地规划预期的结果，令我们的行为获得最大的收效。

最后——实际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由于陕人与丝路有着如前所述那样的特殊缘分，故而陕人在重建丝路中也自然应该担当更大的责任。非常有趣的是，不仅历史上丝路开辟者是陕人，著名的丝路维护者、经营者多陕人，而且今天倡导重建丝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恰好也是陕西籍。看来，冥冥之中陕人与丝路真是有那么一种无法剪断的情缘。基于这样的情缘，长期居历史丝路起点的陕人，也就责无旁贷地必须走在重建丝路的最前列。

陕西人，加油！

（撰稿人　黄留珠）



明代关中大地震

一、关中大地震概况

（一）事件简介

据《碧霞元君圣母行宫记碑》碑阴佚名《地震记》记载，此次地震发生的时间是“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子时分”，即公元1556年1月23日24时左右。关中百姓沉睡之际，“近古以来书传所记未有之变”突然降临了。此次地震的亲历者曾描绘道：

是夜予自梦中摇撼惊醒，身反覆不能贴褥。闻近榻器具若人推堕。屋瓦暴响，有万马奔腾之状。初疑盗，继疑妖祟，俄顷间头所触墙轰然倒矣，始悟之：此地震也。见月色尘晦，急揽衣下榻，身倾如欹如醉，足不能履地焉。家南有空地，从墙隙中疾走，比至其处，见母暨兄及弟侄咸先至，无恙，曰：“急号呼汝，汝不闻耶?”盖其时万家房舍一时摧裂，声杂然塞耳，都不闻也，矧号呼哉!

时四更余，势益甚，声如万雷，可畏!迨五鼓，少定，始闻四邻远近多哭声矣。……比明，见地裂横竖如画，人家房屋大半倾坏，其墙壁有直立者亦十中之一二耳。人往来哭泣，慌忙奔走，如失穴之蜂蚁然。过午，人俱未食。盖炊具顿毁，即谷面之类，皆覆土埋压。……四乡之外，村居被祸者，幸奔入省城暂避。至如穴居之民，谷处之众，多全家压死，而鲜有脱者。

震后人们才知道，这次灾害“河南地方稍轻，山陕极重，别省微觉地动”。另据近年发现的碑石记载，震时“忽由东南而来，地势摇动，震响如雷，一升一降，升如登天，降如坠井；即时墙屋倾圮，声震天地，灰飞尘扬，塞空蔽目，旄倪哭声，达满四境”。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今陕西华县，强度达8级以上，烈度相当于11级，波及大半个中国。富庶的关中大地遭遇了人类有史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地震灾害。

（二）大地震特点分析

关中大地震的特点大致有以下方面：

其一，地震发生于午夜时分，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所以导致方圆2000里的人口有六成死亡。其二，地震强度大，波及的范围比较广。虽然主震区在陕西华县，但波及甘肃、山西、河南、河北等地90多县，受灾的区域很广，程度很重。其三，震区位于农耕条件良好的汾渭盆地，人口密度大，土质疏松，地下水位较高。渭河谷地处于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其南边秦岭，地面高低相差悬殊，当地壳运动时，断裂的概率远远大于相对平整的地区。其四，次生灾害严重。黄土滑坡和黄土崩塌造成的灾害特别突出。滑坡堵塞黄河，造成河水逆流。当地居民多住在黄土塬的窑洞内，因黄土崩塌造成巨大伤亡。秦可大《地震记》就写道：“至如穴居之民，谷处之众，多全家压死，而鲜有脱者。”地裂缝、砂土液化和地下水系的破坏，使灾情进一步扩大。震后水灾、火灾、疫病等次生灾害严重，并不次于地震直接伤害。

二、关中大地震的影响

（一）大地震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大地震之后所引起的灾害是双重性的，既有地震之后的直接灾害，还有由地震所引起的次生灾害，给人们造成了永远的心灵伤痛。



小雁塔

首先，大地震造成的影响直接表现为人员伤亡。据当时人估计，“潼、蒲之死者什七，同、华之死者什六，渭南之死者什五，临潼之死者什四，省城之死者什三”。据《明史》记载，此次地震“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八十三万有奇”，“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八十三万有奇”。另据《续文献通考》卷221记载：“压死奏报有名官吏军民八十二万有奇。”记载在嘉靖三十四年年末的《嘉靖实录》中称：“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八十三万有奇，其不知姓名未经奏报者复不可数计。”死亡人数8倍于现代著名的日本关东大地震，3.5倍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5.5倍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更为残酷的是，这次地震之后又引起了饥荒和瘟疫，造成了空前巨大的人员伤亡。震时正值隆冬，灾民冻死、饿死和次年的瘟疫大流行及震后其他次生灾害造成的死者无数可计。同时，地震也造成了牲畜数量的减少。由于地震中人们都自身难保，无暇顾及牲畜的安危，故被压死的牲畜数量也无以为计。如陕西大荔县“压死人畜无数”，河南陕县“人畜压死无算”，山西太平县“民畜压死者甚众”。

其次，地震破坏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地震后，关中大地已是面目全非。“川原折裂，郊墟迁移，或壅为岗阜，或陷作沟渠。山鸣谷响，水涌沙溢。城垣、庙宇、官衙、民庐，倾颓催圮，十居其半。”“其事变之异者：或涌出朽烂之舡板，或涌出赤毛之巨鱼，或山移五里而民居俨然完立，或奋起土山而迷塞道路。其他村树之易置，阡陌之更反，盖又未可以一数也。”据《明史》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

关中震区受灾情况不尽相同。省会西安府不仅大批房屋倒塌，连当时已经历了840多个春秋的唐代古建筑小雁塔也坍毁二层，塔身纵裂，成为今天所见的样子。史载：“长安荐福寺塔，名小雁塔，唐时建，凡十五级。嘉靖乙卯地震，裂为二。”而“省城之西渐轻，东则渐重，至潼关、蒲坂而极，轻者房壁之类尚以渐左，重者则一发即倾荡至尽。轻者，人之救死，尚可走避，重者，虽有幸活，多自覆压之下，掘挖而出”。渭南县的城门震后陷入地中，潼关、蒲坂城垣沦没，而极震区华州竟至于“堵无尺竖”，完全被夷为平地。这些地区不仅人工建筑荡然夷平，自然地貌也为之改观。华阴、华县、朝邑、三原一带平地上突起了许多岗丘，而渭南赤水山则陷为平地；渭河北徙四五里，冲毁大片农田；神川塬上五指山的五峰尽圮，而耀州的将军山也变得与震前比它低得多的宝鉴山一般高了。

（二）大地震的启示

2006 年，陕西省召开华县大地震 450 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地震造成的直接灾害、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关中大地震灾情严重，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抗震救灾体系不健全，民众防灾减灾意识薄弱。这些我们今天都应引以为戒。

首先，加大防震减灾基本常识的宣传力度。地震灾害多无法预测，故地震发生时多数人会出现紧张、慌乱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往往会增加人们受到伤害的概率和程度。因此，宣传活动应从稳定群众情绪入手，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画展、专栏、学习班等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让群众掌握避震自救方法，提高对前兆分析的能力，一旦发现动物、地下水等宏观异常现象及时报告。宣传教育应持久适度，不宜过于集中，也不能忽冷忽热，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影响社会的安定。

其次，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抗震救灾体系。灾情发生后，救灾系统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关中大地震之所以“创造”了地震灾害死亡人数的记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合理有效的抗震救灾体系包括多个渠道，如组织指挥、现场抢救、医疗救护、卫生防疫、物资供应、生活保障、心理疏导、灾害评估、防止犯罪、灾后重建、灾后孤儿孤老安置，以及赈灾款项和物资的监管等等。只有如此，才能让受灾地区群众在短时期内迅速恢复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再次，加强地震专业人员的培训。地震专业人员包括地震科研人员和专业救援队伍两个层面。地震科研人员根据地震发生规律，用科学方法对未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强度做预先的估计，并在具备一定可靠程度的前提下将地震预测的意见向公众宣布。这种地震的预报精度对于降低灾后损失意义重大。目前地震预测仍是世界性难题。我们应该加强科研投入，争取培养出优秀的地震专业研究人员，以期取得地震预测方面的重大突破。此外，我们还应参考地震频繁发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建立起一支专业的救援队伍。如日本 1987 年成立的灾害救援队，由 SAR（搜救）队、专业救助队、医疗队、生活自给管理队、高效联络队、教育队等组成。救援队还配备有一百余吨的工具设备，包括运输与通信车辆、船只、小型直升机、各类起重挖掘和装卸工具、搜救仪器、个人全套用具、生活补给储存设备、发电设备等。

纵观关中历史上的地震，大约一次大震过后总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间歇期。自明代华县、泾阳大地震以后，关中地震进入新的间歇期，至今已有 400 余年。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我国地震、地质工作者正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百倍的警惕性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以最大的努力及时地预测预报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震，尽量减轻地震

灾害，保证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自然灾害的巨大破坏性再度引起社会的重视。尊重大自然及其客观规律，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知天命而用之”，造福于社会；同时爱护大自然，增强救灾减灾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确保社会稳定持续的发展，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灾难会让我们经历痛苦，但是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反思，尊重自然，珍惜和敬重生命。灾难发生后，我们更懂得重建家园，匹夫有责。

（撰稿人　张　明　张淑霞）

明清陕南移民

陕南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之间，古为四塞之地，早在汉唐时期，陕南境内月河川道农耕文明已十分发达。郦道元《水经注》“沔水上”云：“汉水右对月谷口，山有阪月川，于中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只是由于世乱年荒，宋元以后陕南社会濒于凋蔽。明清时期，政府实行招垦政策，大批南方客民进入陕南，陕南经济才得以较快发展。



秀丽陕南

一、明代陕南移民

元末明初，秦巴山区汉水流域历经战乱，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该地人口骤减。据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的统计，整个兴元路（安康市全部及汉中地区之南郑、洋县、城固、西乡、褒城，宝鸡凤县）在册人户 2149 户，总计人口仅 19378 人，还不及宋代金州人口 65674 人的三分之一。明政权建立之后，大批经战乱兵燹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元末红巾军农民起义军为谋求生计，或逃避赋役官差，辗转流入秦巴山中垦荒就食，寻求生路，统治者对此鞭长莫及。这对于新生的明政权来说，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个极大地威

胁，而且在财政上也是一个重大损失。为此，朱元璋诏令“禁山”，采用“大军点户”的办法对南方一些大山区及秦巴山区实行封禁，“禁不许入”；同时又对全国户口进行清理注册，不准老百姓在山区居住。“禁山”政策的推行，使大批流民涌入川东地区，一部分流民则躲避官兵的围堵，于襄、荆、宛、邓及川、陕、鄂三省边区的秦巴老林辗转流浪。

与此同时，中原广大地区历经战乱后已是土广人稀，田野荒芜，很多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洪武十年（1377），河南、四川等布政司所属州县，由于户粮多不及数，以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而陕南经过战乱兵燹的浩劫之后，也是一派民生凋敝的景象。洪武十七年（1384），明政府令凡民户不满三千户的州改为县者三十七，如汉中府所属之洋州，于洪武三年就降州为县，改为洋县。针对这种情况，朱元璋采用移民垦荒和屯田的办法调剂。其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广东、山西及江浙一带的农民被大批迁徙到河北、安徽、河南、陕西、四川等荒芜之地。江南苏、松、杭、嘉、湖一带的富民被强迫迁徙贫瘠之地，这些富户从此以后虽不敢再公开回到原籍，却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到处流浪。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辗转来到川陕鄂接壤区。

明中叶以后，江浙及中原富庶地区的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流民问题也日趋严重和突出。当时，全国流民最为集中的地方是荆州、襄阳、南阳、洛南、西安、汉中、夔州七郡所属州邑。项忠《善后十事疏》称：“荆州、襄阳、河南、南阳、西安、汉中、夔州七郡所属州邑，在山谷中者十三，介山地间者十四。国初，禁不许入，自驰禁，致流民啸聚。今奉命留其已附籍者，尽逐其未附籍者。”他又说：“英宗皇帝尝命处置流民，今宜申明榜喻，凡已获业者，复其家三年。”马文升在《巡抚事宜书疏》中说：汉中府“地方广阔，延袤千里，而人民稀少，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及陕西所属八府流民十万余人，其中或因逃粮避差，或因畏当军匠及本处地方荒旱”，大批逃到汉中、金州（治西城）等地寄居下本，在那里的有利条件是有“土地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

据史料记载，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时有言逃民，聚居各处，殆四五万人。先后入山，抵汉中府深峪中潜住”，英宗景泰五年（1454）开始抵达河南的流民二十多万户又“转徙南阳、唐、邓、湖广襄樊、汉、沔之间逐食”。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十二月巡抚荆襄右副都御史杨璿奏称：“荆、襄、安、沔之间，流民亦不下百万。”明政府开始对流民采取驱赶回原籍的做法，但并没有解决这里的流民问题，这些流民“自往年驱逐之后，多去而复来；及继以灾伤，逃移渐众，益相聚集”。后期明政府改变策略，于成化十二年（1476）决定解除明初的“山禁”，并派都御史原杰出京安抚流民。《明史·

原杰传》记载：“杰出抚，遍历山溪，宣朝廷德意，诸流民欣然愿附籍。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籍之，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其初至无产及平时顽梗者，驱还其乡，而附籍者用轻则定田赋，民大悦。”由于解除“山禁”成化十二年后又有大批流民涌向陕南等山区。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刑部左侍郎何鉴奏称：“清查过荆、襄、南阳、汉中等处流民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余户，七十三万九千六百余口。其愿附籍者，请各给户由，收入版籍。愿还乡者，量宽赋役。”同年十月孙需上奏说：“续清出荆、襄、郧阳、南阳、汉中、西安、商洛等州府县流民十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一户，愿附籍者九万二千三百七十户。”



石泉县后柳水乡

二、清朝陕南移民

（一）清朝康熙之前陕南情况

陕南经过明末农民战争，清朝统一战争，康熙时期平定三藩战争，兵灾之后的陕南再次出现明初时期的荒凉景象，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明末汉中府在册耕地13 146.12顷，清初却只有6890.10顷，仅为明末的52.4%，商州明末在册耕地7729.02顷，清初只有2488.29顷，仅为明末的32.19%，兴安州明末在册耕地为18 746.61顷，清初只有1460.14顷，仅为明末的8%。陕南战后人烟稀少。山阳县在顺治二年（1645）“以兵燹之后，凋耗无几，攒为东、西二里”从明朝的二十里到此时只剩下二里。洛南县在明末战乱之后“劫烧无遗，人民百存一二而已”。白河县在清初甚至是“百里不闻人声，四境荒芜”。汉阴县城在康熙初年仍然是“一望萧条，如同瓦砾”，石泉县自明末“崇祯丙

子（1636）以后五十二年间，七经寇陷，所存者寥寥数百余家”。陕南地区急需劳动力以恢复经济。

（二）清政府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

面对战争对农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为了早日恢复生产，增加赋税收入，顺治六年（1649）清政府颁布“垦荒令”，“招徕各处逃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三年之后按亩征粮，不得“预征私派”，并以劝垦的多寡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一个条件。但是由于“缘无人承种之地，耕熟之后，往往有人认业，遂起讼端”。因此，“垦荒令”的实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难以展开。直至康熙七年（1668）云南道御史徐旭令还上奏说：“垦荒令行之二十余年，而未见成效。”土地荒芜，税源不足，造成清政府财政越来越大的亏空。这种入不敷出的情况，直至康熙时期才有所好转。康熙为了发展生产，扩大税源，采取种种措施鼓励开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规定：“凡土地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这就为“垦荒令”的推行排除了一个障碍。同时还一再放宽起课年限，康熙十年规定四年起课，十一年又宽至六年起课，十二年规定“通计十年方行起科”。不准原主“认业”和放宽“起课”年限等措施，对扩大垦荒面积起了重要作用。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全国耕地面积，已经达到七百四十余万顷，比顺治十八年增加了34.8%。“更名田”和“垦荒令”对一部分农民获得小块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予以承认，这对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这种大背景下，陕西也积极采取措施，招民垦荒，恢复生产。

（三）陕南移民情况

清初陕南移民较少，主要原因是当时清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全国各处都需要从战乱后恢复经济，抛荒的土地需要重新开垦，游离于土地之外的人口相对较少，因此，招民开垦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自明季遭流寇，频年荼毒，流徙无遗。国朝定鼎后，招抚流亡，十不获一”。陕南移民大规模的进入是在乾隆中期之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经济逐渐得以恢复，在经济恢复的同时，也出现了人口剧增、土地集中的问题。乾隆时期有人曾这样评论当时人口与土地的情形：“今天下占田者十之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人多地少，这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勉强度日，一遇灾荒就拖家带口逃往他乡，成为陕南移民庞大的潜在群体。由于“摊丁入亩”的实施，使农民获得了较多的自由，此后“田夫贩竖，咸得优游康衢，而毕生无追呼之累”，可以“轻去其乡，五方杂处”，这个政策也使无地可耕的农民向外迁移成为可能。

清朝在康熙雍正之前，向陕南移民数量不大，到了乾隆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激增，

社会矛盾加剧，向陕南移民的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乾隆六年（1741）以晚征、少征、免征为核心内容的陕南徕民政策调整为标志，出现了向陕南移民的浪潮。乾隆三十七八年（1773）“川楚间有歉收处所客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万”。嘉庆时期，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1799）、嘉庆五年（1800）连续两次下达谕旨给地方政府，“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耕种”“将南山老林等处可以耕种之区，拨给开垦，数年之内，免其纳粮，俟垦有成效，再行酌量升科”。

嘉庆初期，“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成群，到处络绎不绝”。到嘉庆末年，陕巴老林地区“江、广、黔、楚、川、陕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仅盩厔一县，道光三年查明就有客民十五万”。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为82.7%。清代康熙中期陕南人口在50万左右，100余年后，陕南人口达到了396万，增长率为697.9%。



漫川关双戏楼

总之，明清大移民是一场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对上自秦汉、下至宋元以来所形成的川陕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客观上促成了自成一体的秦巴山区对全国的一次大开放。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促进了川陕人口繁衍和人种的优化；促使陕南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得闭关自守的陕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同时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融，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交叠、沉淀和重新排列组合，使之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经济文化现象，表现在如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

明清是历史上人口流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当寻觅生计的百姓从湖广闽粤来到秦巴山地后，并没有就此停住移动的步伐，一部分移民先是在关中的外围秦岭北麓一带活动，然后继续向北进入关中，并由此继续北上来到陕北垦荒，这些移民对于促进陕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改进陕西农作物种植结构，推动玉米、红薯、洋芋等外来农作物的种植起了很大作用。

（撰稿人　丁　喜）

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

一、引 言

经济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而地缘则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明清时期的中国，具有全国影响的商业集团一般都以地域乡缘为组织纽带，被称为十大商帮，包括徽商、晋商、陕商、粤商、闽商、洞庭商、江右商、宁波商、鲁商、苏商等。在“十大商帮”中，山陕商帮在相当区域内处于领袖地位。

“一家发财，惠及乡党，出入相友，资表比服。”从明初到清末，山陕商人以其轻生重死、厚重质直、博大劲直的气概，从盐业起步，将业务扩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诸多行业，贸易范围不仅包括国内，还远及朝鲜和俄罗斯，可以称得上是雄霸一方。其独特的商业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重要一页，有所谓“无西不成商”之说（陕商和晋商被合称为“西商”。在很多地方，人们都管山西商人叫作“老西”，管陕西商人叫作“老陕”）。



在中央集权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集中表现为通过制定和执行各项经济政策来调节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保持统治的安定。而这些经济政策所表现的政府行为和需要往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利用这些政策就会促使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这方面，明清之际的陕西商人表现出极高的智慧。明清500年，陕西商人借助政府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成就了纵横全国的商帮。他们把茶叶贩运到甘肃和青海，把食盐贩卖到四川和贵州，从江苏贩卖棉布，把烟草贩卖到江浙。经过长期发展，财力雄厚的陕商逐渐占据了以泾阳和三原为中心的西北、四川、贵州和西藏等几大市场，被称为“西秦大贾”和“关陕商人”。

二、陕商的崛起与发展

陕西自古农业资源发达，秦汉时代“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自汉唐以来便成为我国精耕农业发祥地和农业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迄至明清，南北方社会虽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陕西仍为富庶之地。

明清时期，陕商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两项中央政策——食盐开中和茶马交易。

1. 食盐开中

明代初年，为了防范境外鞑靼人入侵，明政府于沿边各处分设九边镇，以卫中原，其中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由陕西布政司管辖，常驻兵力20余万人。在这些边荒地区设军驻守，仅靠屯兵自种，外方转输，路远费繁，不能满足军需供应。而且，政府财政难以支持。这么多兵力，在边荒地区，仅靠军队自己开荒种粮是远远不够的；而从粮食产地运粮，路又远，费用又高。所以，这迫使明政府不得不设计一个既使“转输之费省”又使“军储之用足”，而且输粟入亦可获利的两全其美之策来解决边防军的供应问题，于是明朝政府在边塞实行了“食盐开中”。所谓“开中”，就是朝廷开出军需标（物资名称、运达地点），如标的物是粮食，商人可根据要求运输军粮至边关指定地点，政府收到标的物后，按公示的标准付给商人一定数量的“盐引”，称为中的。商人则凭盐引到政府指定盐场购盐，销售后获取购销差价，便是经营利润。明清两代政府都对盐实行垄断经营，成本低而售价高，商人只要获得食盐许可证，便有暴利可图。洪武二十年（1387），“大宁军储不给，请令商人纳粟中盐，粟五斗给浙盐一引”，由商人自己购买米粮运送到各个仓库，然后换取盐引，意味着食盐开中有了独立的经济意义。所以，“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食盐开中政策率先在山西、陕甘等边疆省份实行。

“食盐开中”政策的出台，转变了“官盐铁”的食盐专卖，使一般商人得以参与食盐贩运，并且充分照顾到商人的利益。这一食盐开中政策，最先行于山西，到宣德十一年便推行于陕西，近水楼台先得月，陕西商人紧紧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和蓄势已久的经济实力，参与中盐屯种，换引贩盐，成为与山西商人并驾齐驱的西北盐商。

自古“盐者利之宗”，得盐者便可独步商界。历史有记载，“前明用开中法，以盐实边，输粟塞上，得捆盐于淮南北，明边重西北，山陕输粟便，故淮盐以西商为大宗”。陕商把粮食交上，拿到的只是盐引，要想拿盐还要到产盐的地方去。所以一时间，全国各大盐场都能看到陕商的身影。在盐利最大的两淮盐场，陕商的势力仅次于徽商。在四川盐场，陕商几乎占据垄断地位，“为盐商者，多系山陕商人”。



凤翔县文昌巷的周氏家族大院

2. 茶马交易

明政府为了加强边防和安抚少数民族，实行边防和边贸相结合的交易政策。当时陕西所管辖的边夷，以游牧为主，产马盛地，却不产茶，而对于游牧民来说“不得茶，则困以为病”。所以明政府就推行了用茶易马的治边政策，“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只不过刚开始的茶马交易，也是官方垄断，私人不得贩茶。后来，利之所趋，私茶难禁，所以政府就开始放宽政策，效仿食盐开中之法，由原来的官收官销变为官督商销。

这一政策，对于陕商来说，又是一个重磅利好的消息。陕商开始大规模走上贩卖运输边茶的经营道路，并居于领军地位。明清时期，陕西的茶商一度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到四川康定、雅安，以至于遥远的云南香格里拉、普洱，西藏的昌都，到处都是陕西的茶商以及会馆，从明清到民国，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上，他们几乎垄断了西北和西南的茶马贸易。明代宋应星谈到商帮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和徽郡三方之人”，而陕商一度在晋商和徽商之上。当时垄断西部贸易的陕西商人，每年经营的布匹达 2700 万匹，茶叶 1125 多万斤，皮革 150 多万张，羊毛 2500 多万斤，药材 1500 万斤，水烟 700 万斤。当时川康地区流传的民谣，“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就是陕商贩茶势力的写照。同样地，棉布也是紧俏的军需物资。本地产的棉布不够用，陕商们就到江南区采购。巨额的棉布长途贩运，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陕西商业资本集团。用从江南采购的布匹，换取边夷的马匹，大量的马匹，又刺激了毛皮业的发展壮大。

当时，陕商拥有极为雄厚的财力，形成贸易垄断集团，经营涉及边茶、水烟、土布、

皮毛、药材、盐业、金融等各个领域，均能雄踞一方。陕西商人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蒙古、俄罗斯、朝鲜等邻近的国家或地区。陕商的贸易活动，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云贵川一带为例，商贸十之八九被陕商控制，以盐都自贡为例，盐业几乎全被陕商垄断，川人只占十之二三，雄伟气派的西秦会馆是自贡最华丽的建筑，也是中国最奢华的会馆，充分代表陕商的财气。在中国各商业重镇建有许多豪华的陕西会馆和山陕会馆，至今都是该地区的名片。像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的繁华街道，就是起源于老陕会馆的“陕西街”“陕西路”，雅安、康定也有陕西街，在雪域高原，草原牧场，大江沿岸到处都有陕商的会馆和店铺。陕商信奉关公，所建会馆叫武圣宫或关帝庙。陕商秉承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注重品牌和信誉，生意越做越大，打造的都是百年老字号。

在西南地区，陕西商人把茶叶、日用百货及陕西土布、日用工业品、洋布、绸缎等输入藏区，又将藏区皮毛、土特产运入内地。他们西上拉萨，南下云南，在玉树、丽江，到处设有商号分支机构。贸易活动以打箭炉（现甘孜州首府康定）为中转基地，从川湘收购茶叶运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再运回四川，销往藏区。每年贩销量约 4000 驮，每驮 4 包，每包 60 斤，每年仅从湖南运往陕西的茶叶原料就多达 300 多万斤。泾阳常有甘肃的“骆驼客”往来，把砖茶运销西北各地。陕西商人同时还在藏区收购麝香、虫草、贝母、黄金、羊毛、皮草，再转运至成都、武汉、上海、西安等地出售。其中一部分又转运出国。康定泸河西岸有户县商号 40 多户，其中“德泰和”一家，就有店员 150 多人，流动资金有 100 万现银圆。

三、陕商的历史贡献

明清时期，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代的初步开发发挥过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在明代 200 多年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陕商垄断。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陕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

在清初百余年间，陕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力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



西安高家大院

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在清朝康乾时期，陕西商帮无论是经营范围，还是经济实力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较之明代有了蓬勃发展，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安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随着陕西商人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快速扩张，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并且由于陕西商人在秦巴山区的生产性投资，使那里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迅速发展，使得秦巴山区成为我国较早产生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陕西成为明清500年间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同时，陕西商帮创造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覆盖陕西和整个西部的“双层次西部市

场网络结构”，一个是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龙驹寨、凤翔为横坐标，以汉中、延安、榆林为纵坐标，覆盖陕西县镇市场的陕西市场网络结构。一个是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兰州、西宁、宁夏、乌鲁木齐为次级市场覆盖西北地区县镇市场的西北市场网络体系。这个网络体系促成了西部地区500年经济的正常运转，其标志就是每月阴历二十八、二十九两日，西北各地商家将银两纷纷缴解各地座庄，再由座庄将银两压回陕西泾阳、三原总号的“标期”，从而整个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动态发展，使陕西的兴衰关系着整个西北地区经济的逆顺运营。这个“双层次市场网络体系”对今天发展西部的市场经济仍有现实意义。前不久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就是艺术再现的泾阳商家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

此外，陕西商帮与晋商共同创造了“合伙制”的经营体制，靠“财东与掌柜的分权制经营体制”，将自己的生意做强做大，一个常年住在渭南绿荫覆盖小山村的陕西商人，其生意却在天山南北，长江上下，靠的就是“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创新。而且他们机智地解决了掌柜与投资人的“利益一体化”问题，利用“人身开股制”即掌柜人身入股，将掌柜的利益与企业捆绑在一起，利润“银六人四”，使掌柜、职工效死为企业效力。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成功的企业制度创新。特别是陕西商人在四川自贡创造的以“日分”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份制”，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可提供实际的可供操作的历史经验。

（撰稿人　丁　喜）

民国十八年陕西饥馑

1928 年 12 月 29 日，随着张学良“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的全国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勾画统一后中国的美好前景之时，一场罕见的大灾荒却让这个美好的梦再次破碎。一般而言，“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从 1929 年开始，由旱灾、水、风、雹、虫、疫并发的巨灾，至少席卷了全国 25 个省份，尤其以西北、华北的旱荒最为严重。旱荒以陕西为中心，遍及甘肃、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等省份，并波及山东、苏北、皖北、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形成了一个面积广袤的旱灾区。

一、陕西民国十八年饥馑概况

就陕西而言，这次旱荒导致全省 92 个县份受灾。据民国十九年底陕西省赈务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的陕灾报告中统计，当时，全省有“200 多万人活活地饿死，200 多万人流离失所，800 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水灾、火灾、兵匪之灾一起袭来。全省尽成灾区。赤野千里，饿殍遍地。甚而人人相食，惨绝尘寰。经此以后，全省人口锐减 1/3，对社会经济造成了绝大的摧残，它是陕西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由是，时人称这次灾荒为“民国十八年饥馑”。

概观陕西“民国十八年饥馑”，可以总结为四个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长。所谓陕西“民国十八年饥馑”，实际从民国十七年（1928）就已经开始了，且一直延续到 1932 年夏季。早在 1928 年年初，陕西各地向省府呈送的报告中，就已经大量的触及灾荒问题了。

第二，灾情来势凶猛。民国十七年到十九年的持续大旱灾，波及整个华北，但受灾最重的就是陕西。灾情中的骇人景象，在近代陕西地方史料中比比皆是。现简举几例如下：

在泾阳，因为缺乏食物而上吊自杀身亡的李坊堡的吴草娃，县东里的赵裁缝，瓦王村的王玉普，首张里的杨增全4人。此外，夏村里的岳文夫妇，因为饥饿难忍，先把自己不满3岁的孩子活活勒死，然后夫妻双双服毒自杀。

在白水，草根树皮早已被剥食干净。每天大路上东来西往的尽是饥饿的灾民。到处都有饿死的人。

在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茨荆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少人吃了这种饼因难以消化而致死。

而在省城西安，也已无多少食品可吃，灾民又冻又饿。在城中心的北大街老菜市以东，东大街古物商店，盐店街风火洞口，新城南门外，北柳巷口，浸礼会门口等处发现男女数十人的尸体。

灾难深重的关中地区，又以西府为灾中之重。往年风调雨顺的西府连续三年没有下一滴雨，路上的尘土厚得能埋人，三年六料颗粒无收。

据《宝鸡县志》记载："民国十七年宝鸡亢旱十二个月，禾苗尽死，夏秋无收，粮价腾飞，人曾相食。"民国十八年，天大旱，全年无雨，渭水涸竭，车马通行，禾苗枯死，颗粒无收，亩地换小麦一斗，草根树皮食之殆尽，灾民为了生存，拆房卖地，鬻妻卖子，换粮糊口。无奈中壮者外逃求生，弱者坐以待毙，乞讨者甚多，饿殍遍野。

《岐山县志》记载："无禾无麦，麦仍失种，山童赤地，菜根亦断，拆房卖薪以糊口，然斗麦价七八元，房尽而粮仍绝。"当时囤积有粮食的豪门富户乘机抬高粮价，斗麦从四五角钱猛增至二十元。草根树皮掘食已尽，十室九空。灾民涌入城市，白天乞讨于街头，晚间露宿檐台，不少人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口吐黄水，断气声绝，陈尸道旁无人掩埋。

在扶风，贫苦农民饿死者日有所闻。县城和绛帐镇平均每天死亡者不下百口。廊檐、街道死尸横陈，时值炎夏，不及分别掩埋，遂掘坑集中掩埋，亦有"万人坑"。

相比比较富庶的宝鸡岐山、扶风，地处偏远的千阳、陇县、麟游则更是赤野千里，青草全无，苗尽枯槁，饥民盈野。

第三，各种灾害齐聚。如上所述，在持续五年的灾情中，已经出现了旱灾、雪灾、春寒霜冻、暴风、冰雹、黑霜、蝗灾等，收成大减。据记载，民国二十一年春夏之间，鄠县、宝鸡、岐山、陇县、麟游连续遭受热风袭击，地里的庄稼在大风中成片枯死，甚至残破栖身的屋顶上的青瓦都被风刮得如同树叶般飞落。连着热风又是黑霜，刚挺身的麦子被黑霜一举打死；紧接着，又是冰雹突降，庄稼地里跟碾子碾过一样，一片狼藉，

惨不忍睹。凤县先是出现了二月春寒和霜冻，春苗都被杀死；紧接着7月在苇子坪、谷叉河一带突降冰雹，大如鸡卵，人畜被砸死打伤无数，秋作物悉数被毁。

在天灾的同时，人祸也纷至沓来。受灾害影响，各县土匪蜂起。这些“土匪”其实相当一部分是破产农民因饥饿而聚众抢富户的粮食，而被当局称之为“土匪”。还有其他一部分则是来自于地方军队。他们把持一个地区后，胡作非为，欺压百姓。

第四，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灾荒中贫苦农民为了活命，纷纷卖田典物，生产能力下降，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农村经济遭到极端破坏。“西安钟楼下北大街，竟成农具市场，农具中最有价值之犁耙及辘轳绳索，平时新置均须十数元，现至多售一二元。至于锄头镰刀，只值二三角。”灾民外逃和农具变卖导致大量土地抛荒。“据天津《大公报》及西安《民意晚报》二十年调查十九县所得的结果，每县被荒废不耕的田地，平均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七十”，“到民国二十二年，陕西农村还是大量荒芜”。土地抛荒，导致农家经济破产，以此可见灾荒对农村经济破坏之巨。



民国十八年饥谨灾民图

二、社会赈灾

为了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进行赈灾救济工作，陕西省早于民国十七年就成立了“陕西省救灾委员会”，并在各县成立了“救灾分会”。由于陕西的灾情特别严重，引起

了全国上下的重视。民国十八年，“全国赈灾委员会”派代表团赴陕视察灾情。代表团通过实地走访，在全面了解陕西灾情的基础上，强调要加大对陕西的赈灾力度，同时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募捐，共同赈灾。

由于省内外众多绅士学人的呼吁和宣传，全国不少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及个人纷纷捐款捐物支援陕西赈灾工作。这其中，赈灾最有力的当属朱庆澜。

朱庆澜，字子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山东济南。早年参军，参与辛亥革命。民国二年被北洋政府派任黑龙江督军兼民政长，并授予“镇安右将军”称号。由此，被称为“朱将军”。民国十五年（1926）后，朱庆澜辞去政府一切职务，在天津组成“华北慈善联合会”，专门从事社会福利救济事宜，泽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共十余省。

民国十八年陕西饥馑，虽然民国政府设有中央赈务委员会，但因忙于内战，无暇他顾，因此赈务徒有虚名。而民间的慈善团体虽有各种募捐救灾活动，但一方面由于力量有限，募集能力不足，因此杯水车薪，难见成效；另一方面，军阀的割据混战，使得全国各地的救灾物资难以顺利运抵灾区。凡此种种，皆在有形无形中增加了赈灾的难度，使得灾患日盛一日。子桥将军闻讯，由京来陕，亲赴咸阳、武功、扶风、宝鸡等地查灾救济，效果明显，被称为“陕西的朱庆澜”。朱庆澜赈济陕西灾荒，之所取得的成就非凡，原因不外以下几点一方面在于他的慈心善举，另一方面也在于他采取了符合时宜的赈济策略。

第一，打通救援通道，使得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能安全运抵灾区并发放到灾民手中。陕西灾荒时，朱庆澜以“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的名义，亲自赴陕救灾，说服各派军阀达成共识：尽力救灾，严禁抢劫、克扣救灾物资。由于朱庆澜的声望以及慈善之心，使得各方军阀都对其表现出极大的敬意，从而使得募集到的救援物资能顺利运抵灾区，并及时发放到灾民手中。

第二，着力宣传灾情，积极劝募。1929 年，朱庆澜视察完陕西灾情回到天津后，立即提出了“三元钱救一命”的口号，进行大规模的劝募活动。此举得到了包括天津在内的全国范围民众的大力支持，当时很有名声的《大公报》《益世报》等都作了长篇专题报道，并开辟专栏定期刊登捐款人的姓名和数目。朱庆澜提出的“三元钱救一命”倡议感动得许多人捐钱捐物，共散出募集白洋约 100 万元之多。当时，移居天津的溥仪闻讯后，当即约见朱庆澜，表示愿意为灾区捐款。溥仪说：“陕甘灾情是如此之重，古来少有。你提出‘三元钱救一命’的口号，鲜明有力，很感动人。我现在得不到政府补助，手中没有多少钱，救一千条命就是了。”三天之后，溥仪经他人之手，给朱庆澜送去了三千大洋。陕甘的灾情也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当时有家电影制片厂专门到陕西灾区拍摄

纪录片，并请朱庆澜手书片名。朱慨然应允，亲题“人道”二字。纪录片的放映推进了募赈的宣传工作。

第三，养济并举，善行昭三秦。除了大力劝募以赈济灾民外，朱庆澜还特别注意对流浪儿童的收容与教养。受灾情的影响，关中各地随处可见无依无靠的流浪儿童。为了有组织地收容教养那些流落街头的孤儿，朱庆澜先是1930年春在扶风与崔献楼一起捐资成立了“扶风灾童教养院”，提出“教养兼施，工农并举”的宗旨，共收养灾童约五六百人。除给这些孩子统一学习文化课外，朱庆澜还将他们分别编入医疗、纺织、制鞋、编织、铁器、木工等组学习专业技艺。为了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他又在扶风地广人稀之处购买农田4710多亩，兴办农场，安置灾民，缓解灾情。为救助灾民及儿童，他在西安又请冯玉祥让出军营300间，设立灾童教养院，收留男女灾童九百余人。朱庆澜对儿童的救助注重教养兼施，身心并救。此外，他还重视对妇女的救济，在西安设织染厂两处，收容灾区妇女。

不过，这样的赈济，对于处在大灾难中的人们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纵使有朱庆澜这样的近代慈善大家倾力赈灾，但其实际效果依然有限。这样说明了在大灾难面前，一个统一、富裕的国家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

三、民国十八年饥馑的原因分析

被称为“八百里秦川”的富庶之地，为什么这次灾荒如此严重而持久呢？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

首先，粮食产量限制。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以关中的主要粮食作物小麦来说，一般均产为百斤。根据历史资料，民国十八年全国平均小麦亩产为146斤。如此低的粮食产出不仅无法满足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更无从为灾年储备充足的粮食。加之，陕西从民国十六年开始就旱荒严重，延续达五年之久，根本无从以丰补歉，这是民国十八年灾荒严重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农田水利建设多年失修。陕西境内土厚而泉深，人们总喜欢把陕西比作“神皋沃区”，其实，所谓的“神皋沃区”，只是指周、秦、汉、唐的盛况而已。自唐末后，大灾大旱时常发生。民国时期，关中原有的古代水利设施绝大多数已经废毁，杨虎城和李仪祉新修的水利工程或未竣工，或难以发挥效益，关中绝大多数农田已经退化成靠天吃饭的旱田。而关中地区水田仅占全部耕地的1%—2%。如此微不足道的水田比例，也是导致灾荒严重的一个原因。

第三，政治腐败动荡。这场巨大灾难降临时，正是中华民国由北京的北洋政府向南京中央政府转换时期。连年的北伐内战引发了国内持续的政局动荡，刀兵四起。政府机构脆弱不堪，从国家到地方，官员如同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灾难发生前的西安围城和全省性的“剿匪行动”早已经使国家和社会濒临崩溃。这场灾难发生时，虽然新成立的南京政府竭尽全力，但面对遍及全国的巨大灾难，毫无家底的中央政府只能提供杯水车薪的救助。

第四，交通困难。民国十八年时，陇海铁路尚未修到西安，连年战争也使铁路运输能力极其有限。汽车和公路也是刚刚起步。当时主要的运输工具还是船和马车。河道干涸使得船无法行驶，马车运输因为本身消耗太大，效率极低，而且兵荒马乱抓夫派差使得民间运输几乎断绝。更重要的是，地方势力的武装割据也使得交通阻隔。据记录，当时往关中运一石米要花费十石米的价钱。价巨途艰，也是造成灾荒不断恶化的再一个原因。

综上可知，政治腐败动荡，赈灾投入不足是造成民国十八年饥馑的主要原因。民国以来，中央政府更迭频繁，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当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在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上演着远交近攻的战争游戏。具体到陕西，1928 年冯玉祥基本上统一了陕西。不过到了 1929 年年初，由于冯不满蒋介石遣散会议有意削弱地方政府军事实力的决定，与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同年 10 月，冯玉祥发动了反蒋战争。次年 4 月，他又联合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发动了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蒋战争——中原大战。战争使翘首企盼救济的灾黎再次成为军阀混战的牺牲品。战前，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灾情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组建了西北赈务委员会，决定发行一千万赈务公债，减免运往灾区赈粮的税收以及运费，等等。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一改对灾区的政策和态度，认为赈济陕灾即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救济冯军，因此非但没有尽力救济，反倒加紧对陕西的经济封锁。处在这样的战局中，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自然没有力量也不会认真去救荒赈灾，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灾荒的严重程度。

因此，民国十八年陕西饥馑，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由于自然灾荒造成的饥荒，但就实质而言，其真正的原因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灾害其实仅仅是造成的饥荒的导火索，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混乱的政局以及经济的不发达。政治上的混乱导致了救灾工作无法有条不紊地推进，而经济上的不发达则无法为消解灾害提供经济援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国十八年饥馑，与其说是天灾的原因，倒不如说是人祸结果。1930 年，《大公报》曾对当时的社会局势做如下评论：

夫国家今日之危甚矣……数千万人民之救死恤伤，数百万冗兵之供养安插，满目疮

痍，到处祸水，除若干大小都会之外，全国数百万方里中，尽是饥民、饿民、土匪、红枪会，而三万万以上之良农良工，几乎消灭不能自存焉。试追念北伐当时所许于人民者何事？今日人民所享者何物，国事至此，危矣急矣！蔑以复加矣！

这段忧国忧民的激愤之语，既是对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失望与批判，也是对国家人民命运的深重忧虑，其实何尝又不是对人祸加重天灾的一种反思和抨击！

四、影响与反思

民国十八年大饥荒，使陕西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严重后果是人口锐减。民国十八年年馑人口损失数众说不一。第一种来自陕西省救灾委员会报告，认为从 1927 年 4 月到 1929 年 12 月，因灾死亡人数是 250 万人，其中关中各县死亡人数最多；第二种说法是到 1930 年，人口损失 300 多万人，其中外出逃荒的 50 多万人，陕西人口从 940 万降到 640 万人；第三种看法是至少死了 500 万人，这是来陕西考察过的外国记者斯诺说的；此外，还有资料说，陕西这五年的大灾害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我个人认为饿死的加上逃荒的人，损失 300 多万人口是比较准确的。

数字的背后，是一幕幕惨状。据《陕灾周报》，咸阳是重灾区，饿死的、逃荒的，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在人世了。咸阳夏家寨 70 多户人家，经过 5 年的自然灾害只剩下了 7 户人家。其中戴姓人家，灾前家中 35 人，5 年灾荒后只剩下 8 人，饿死 27 人；马家堡原来是 50 多户人，灾后只剩下 5 户，仅存十分之一；大王村 20 多户人，灾后只剩下 2 户。武功的情况也很惨，300 多户人的东大寨原来是大村镇，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灾后一户人都没有留下。陈家沟原有几十户人，最后全村人都饿死在一个窑里头了，也就是说一户都没有了。我估计如今东大寨、陈家沟肯定有人，但应该都是移民或者是后来搬回来的。

第二个严重后果就是社会发展停滞，元气大伤。五年灾害过后，陕西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家庭保存下来了，而绝大多数的家庭是一无所有，没粮食、没积蓄、没财产。许多街道上出现了人市，一个姑娘卖 12 个银圆，一个女人只卖两个银圆。有时甚至都不要钱，只要是给馒头、给吃的就把孩子给人了。许多家庭妻离子散，不计其数的陕西妇女被卖到了河南、山西、四川。据《陕灾周报》报道，陕西彭家村，两年间有 27 名妇女和 10 个小孩被卖到了外地。

陕西重灾区灾后的状况，按南京政府灾后视察报告的话是：“田园荒芜，路断人稀，鸡犬寂声，牛马绝迹，机关停闭，商业衰稀。”来访的中外记者都叹息说，从没有见过这

样的情况。1932 年《陕灾周报》写到，陕西关中的重灾区是一片死颜色，声是死的，颜色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大自然的整个活动都好像停止了。

第三个严重后果是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到 1932 年，灾区只有 30% 的家庭还能勉强维持生产。但是还能种一点东西的地方，一没有劳力，二没有种子。陕西饿死的 200 多万人中，很多都是青壮年劳力，加上逃难走的，留下的大约用陕西话说都是“死娃病老汉”，都是没有劲，干不动活的。所以到了 1933 年，渭河两岸绿了，却没人种地，荒草一片。

据《中国救灾史》一书统计，到 1933 年，兴平、武功的荒地占耕地总数的 70%，扶风、乾县占 80%，大荔占 75%，澄城占 60%，白水、岐山各占 50%，三原、临潼无人耕种的地占耕地总数的 40%。

大灾过后，陕西社会经济虽然开始缓慢复苏，但因受害太深，受灾面积太大，我认为，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陕西人还没有从 1929 年到 1933 年这一段的灾荒所造成的阴影和影响中完全摆脱出来。

“民国十八年年馑”距今仅仅八十年，八十岁的老人都经历过。我们现在确实发展很快、成就很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两个词：

第一个词是“居安思危”。越到盛世太平年，越要回想过去的饥荒和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不总结经验教训，平时没有预防和抵抗自然灾害的观念，一旦自然灾害来临，我们将会束手无策。

从造成“民国十八年年馑”200 多万人死亡的原因（战乱、灾荒等天灾人祸）中，我们不难意识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多么重要！我们国家人口多、资源有限，社会一旦不稳定，造成的后果难以想象。要提高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就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就要靠提高社会整体发展的水平。我们享受着时代进步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好处，就要把社会稳定、时代进步放在突出地位上。每一个合格的公民不能光享受，要珍惜资源，要为社会稳定出力，为社会创造财富，为社会的发展做贡献。

第二个词叫“忧患意识”。在我们发展繁荣背后，不能忽视一些潜在的深层次的危机，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各种灾害，要有预见性，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关中十八年年馑”，关中道是重灾区，饿死的人最多，受到的破坏最大。而现在，我们关中道的土地资源却被肆意侵占，人均耕地面积在年年减少，这种土地资源的减少着实让人忧虑。加上生态环境的恶劣，全球变暖，自然灾害随时伴随着我们。比如 2007 年的夏季，渭南地区就有 200 公顷土地遭了大旱，颗粒不收。自然灾害离我们并不远。

所以我们必须重视生态、重视保护自然。一个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一是自然环境，

二是社会环境，三是人文环境。中国人的文化最讲究天人合一，我认为这个天就是自然，人跟自然不和谐了，自然跟你能和谐吗？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要顺其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这样我们才能好好活下去。肆意糟蹋生态，糟蹋自然，我们必然要遭到自然的惩罚。

我认为应该在全民中、在全体干部中，特别是基层干部中搞一次忧患意识教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些干部和所有的决策人应该把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要把我们的经济实力搞上去。环境好了，经济好了，社会好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才会更好。

回忆陕西的昨天很沉重，审视陕西的今天很骄傲，展望陕西的明天会更辉煌！因为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撰稿人　王元琪　王国杰）



陇海铁路与民国西安建设

一、陇海铁路与西安交通中心的确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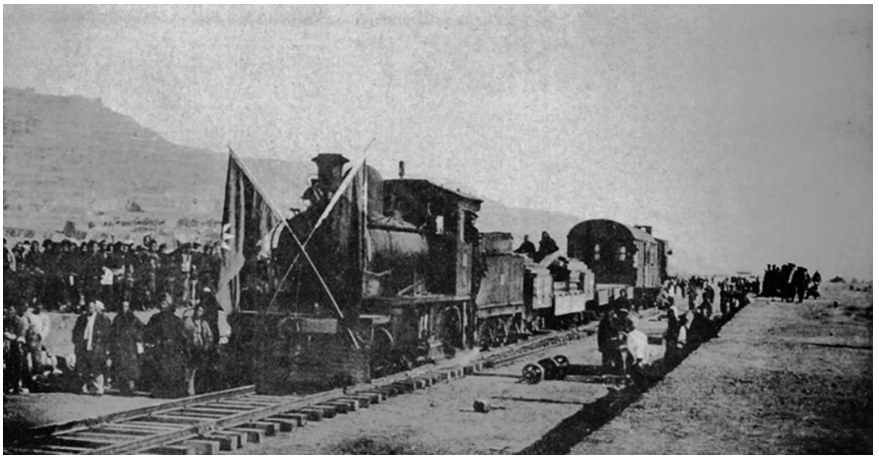
民国初期，西安的交通运输依然沿用传统的官道，主要依靠畜力，其运输能力相当有限。西安城内的交通工具主要依靠马车、轿车和人力。1921 年，长潼汽车局设立，并开始发展城区公共交通系统，开办城内由钟楼至东、南 、西、北四门的市内公共汽车。1922 年，关中东部的主要通道西安至潼关公路已能通行汽车，同年又开办汽车客货运输业务，陕西的近代新式交通运输业自此开始。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又先后修建了西长公路、西凤公路、西眉公路等，关中地区新式交通有了初步发展，但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影响，公路质量较差，仅可勉强通行汽车。

陇海铁路是中国连接欧洲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始建于 1905 年，由于受到近代中国社会动荡的影响，直到 1932 年 12 月才修通到陕西潼关。国民政府出于救灾和战备需要，加上主政陕西的杨虎城积极努力，之后陇海铁路的修建速度有所加快，1934 年 7 月通车渭南，1934 年 12 月通车西安。1937 年宝鸡的通车，标志着陇海铁路贯通陕境，关中交通条件得到彻底改善。

陇海铁路通车后由于高速且运费便宜，渐渐取代公路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据《西北视察记》记载：“首堪称述者，即去岁（廿三年）陇海路通车西安，新通车之潼西段，分站未建，路基未固，而营业状况，即蒸蒸日上，可卜该路前途之发达，必与路线延长为正比。”铁路扩大了西安与铁路沿线城镇之间的客流量，陇海铁路通车至西安后，仅 1935 年一年，西安的旅客发送量就达到了 189. 5 万人次，1936 年西安至宝鸡间年旅客发送量增加到 278. 6 万人次。抗战时期的 1942 年由于咸同支线投入运营，1943 年旅客发送量增加到了 738. 7 万人次。陇海铁路的通车使得地处铁路沿线的西安 、咸阳和宝鸡等城镇客流量大增，城市的人口猛增。1931 年西安仅有118 135人，1937 年就增至197 257人，1945 年更增至489 779人。

传统商道沿线的三原、泾阳一直是近代陕西的经济中心，但在陇海铁路贯通陕西后，三原、泾阳也因远离交通干线而相继衰落，到民国中期，西安的工业、商业、金融业发

展水平已经超过三原、泾阳，也超过了新兴工商业城市如宝鸡、咸阳，成为陕西的经济中心。当时陕西向外输出的货品主要是农产品，以稻、小麦、棉花为大宗 ，都是以西安为商品运销地。陇海铁路关中段沿线各镇的农产品，如兴平土布，凤翔烟草，宝鸡的木料、药材，同官的煤矿等都是通过铁路运至西安，除在西安当地销售外，悉由陇海铁路东运。西安不仅作为关中段各县输出商品的门户，也成为东南工商制造品输入的门户，西安凭借便利的交通区位成为陕西重要的商品运销地和中转站。



1936 年 12 月 7 日，陇海铁路西宝段正式通车

根据《秦风日报》所载：“统计全省工厂现有 162 家，西京即有 64 家，占全省三分之一强。各工厂分布情形，西京市 64 厂，宝鸡 9 厂，泾阳 7 厂，眉县 7 厂，南郑 6 厂，同官、宜川、宁强、岐山各 5 厂，咸阳 4 厂，渭南、三原、城固、华阴各 3 厂，耀县、武功、镇巴、兴平、榆林、留坝、略阳各 2 厂，白水、凤翔、周至等 19 县各 1 厂，此全省工厂之总资本为40 053 030元”。由上分布情形可知，陕西工业，当以关中区为第一，汉中区次之，陕北区最少。由此可见，关中段沿线各镇以西安作为与外省经济交往的窗口，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

清末陕西从东南沿海及海外输入机器等近代工业文明，所走的路线基本上是通过溯长江、汉江 ，翻越秦岭到达省城西安。交通的落后极大地阻碍了机器向陕西输入的步伐。陇海铁路陕西段的通车，加强了关中地区各城镇之间的联系，使陕西近代交通有了跨越式的发展。

二、陇海铁路助推西安经济大发展

由于近代西安运输不畅，20 世纪 30 年代前几乎无现代工业可言，较大的工厂仅有西安集成三酸厂、西京电厂等少数企业，据《西京市工业调查》记载："西安古称帝王之都，昔年文物之盛，为全国冠。然年移代迁，事物更迭，自吾国海禁开放以来，沿海各埠工商各业之组织，焕然一新，其蓬勃气象，与时俱增。独西安地处西北，交通阻隔，凡百经营，都属简陋，即偶有一二近代规模之组织，亦因环境不良，运输阻滞，或以经营不力致遭失败，或以资本脆弱难于维持，民元而后，连岁苦饥，迭遭丧乱，本市工业不毁于战火，即苦于滞销。故过去谈西安工业者，除旧式手工之生产方式尚可略举外，余则不足轻重，若与东南各省新兴工业相比较，更觉瞠乎其后……"比起东南沿海如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城市的同期发展水平，西安至少落后七八十年。其余传统手工作坊式的小型店铺仍集中于西大街、南院门、北院门、马坊门、五味什子、粉巷一带。一些行业还形成了各自较为集中的区域，以利于扩大影响，提高竞争力，如绸缎、皮货、鞋帽、瓷器、花粉多集中在南院门、马坊门一带，铁铜器具、广货多在南广济街，钱庄、银行多在盐店街和梁家牌楼，干果、海味多在鼓楼什字等。

此外，民国初年，西安的金融业没有大的发展，仍以票号、钱 庄 、银号为主要的金融信用机构。1914 年，中国银行（原大清银行）在西安设立分行。1917 年，秦丰银行改名为富秦银行，随后，西北银行成立。1930 年 12 月，陕西省银行成立。1926 年至 1931 年间陕西围城之役、连年大旱等天灾人祸导致钱庄业务衰退，不过之后钱庄数量也有所增长，业务渐次恢复，总之，民国初期，西安的金融机构是以钱庄为主、银行为辅。

陇海铁路的通车，首先解决了西安近代工业所需要的能源问题。有学者考证，至 1936 年底，陇海铁路煤炭运输最大的受益者是连云港与西安，前者占陇海铁路总运量的 48%，后者占 19%。陕西煤炭虽然蕴藏量大，但陕西省交通不便，若不通火车，距西安不足 100 公里的同官矿区，在产地每吨煤炭高不过 5 元，而运抵西安，每吨要 50 元左右才能收回成本。由于陇海路筑成后，西安主要使用河南产煤，成为东煤西运的特例，解决了工业发展必需的燃料问题，使得西安工业发展具备了先决条件。正如时人所言："自陇海铁路西展后，西安的各种建设及工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电灯、电话近都完成，纺纱厂、面粉厂、打包厂以及大小机器铁工厂，又先后开始营业。再如自来水工程，行将投标，咸同铁路及洋灰厂，借款也在商洽进行中等。此种实业机器的动力，完全赖于煤炭的燃烧。所以煤炭销售额逐渐增加，国内各矿源源而来，大有争先恐后之势。"

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后，商业发展也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西安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

较之前更为突出，与中、东部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给整个西安的商业市场带来了勃勃生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安商贸的繁荣，西安逐步成为陕西重要的商埠和西北五省物资集散中转重地。



民国时期西京车站

对此，时人观察到，“西京市商业年来机关增多，交通发达，日呈繁荣之象”。据《陕西经济十年》记载，1934 年西安城区商户数量约为 5000 余家，以中小商户居多，成立的同业公会共涉及 39 个行业。1934 年年底，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后，西安商贸也大为兴盛。据 1935 年 9 月统计，当时西安的商号，除小本经营外，其有局面者 3000 余家 ，正式成立工会者 39 家，涉及 45 个独立行号。39 个行业公会包括 1900 余家商号，45 个独立行业包括 1101 家，合计约为 3000 余家。自 1935 年起，商店增多，商业资本额不断扩大，西安的商业迎来了比较繁荣的时期。

金融业自陇海铁路延伸至西安后也略有发展，除传统钱庄外，中央和地方也相继在西安开设了银行。民国时期西安的金融机构还有典当业 、信托业、保险业等。从民国建立到民国十九年的近 20 年中，西安仅设立过秦丰银行、西北银行等几家银行，营业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1930 年 12 月至 1942 年春，西安城内已相继设有银行共 l4 家，以发行钞券、办理帖放 、存款 、放款、汇兑、收兑为主要业务 ，这一时期是西安银行业相对

较为发达的时期。

三、陇海铁路促进西安城市职能的加强和新市区的发展

1912 年 9 月，陕西都督府下令拆除了满城西、南两面城墙。满城拆除后，政府便开始对其进行重新规划。1912 年 12 月，张凤翔修整了东大街，并修盖了临街的街房，东大街成为了当时市内最宽敞的街道。同年，陕西军政府还将原满城南部官地 327.5 亩划归西安红十字会医院（原西安市中医院），又将原满城东南隅官地 41 亩划归英华医院。由此可见，民国初年，沿东大街一线的满城南部地区是开发的重点，其他地区尚未有所涉及。但是，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天灾人祸，却使西安城的发展裹足不前。

1926 年，冯玉祥解西安之围，改“皇城”为“红城”，1927 年陕西省政府从北院门移至“红城”并改名为“新城”，此后新城一直作为陕西省的行政中心。1928 年，原满城所有地被划定为新市区，西安市政府在新市区规划道路、拍卖荒地，将新市区划分为 30 个平均约 50 亩大的街坊。1930 年，西安市政府设立了新市区管理处，负责新市区的建设和管理，新市区逐渐成为西安的行政中心。1931 年 1 月，西安市政工程处成立，办理西安城关一切市政工程事宜，该年 3 月 1 日，市政工程处开始分段招标修筑西大街碎石路面，至翌年 1 月 25 日竣工，完成了西安第一条碎石路面的修筑工程，这标志着西安市政工程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陇海铁路通车西安，以及西安作为陪都的筹备建设，政府对于西北的提倡开发，使这一时期西安人口渐增，工业化程度提高，市政建设加快，新市区随之兴起，成为西安的经济、文化中心，西安由单一的政治职能逐渐演变为多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职能。陇海铁路通车后，新市区的建设脚步随之加快。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开始对新市区进行了一系列修筑街道、城市规划的工作。从 1933 年到 1949 年，在新市区陆续开辟多条纵横有序的干道。“街道亦甚宽敞，人车分行，可免杂沓，两旁新植槐柳，市容突增美观……东西大街，及自陇海门至南街，今春更已开驶公共汽车。各街道正由主管机关逐渐修筑碎石路……”

1934 年，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制定了《西京市新市区公有土地处理办法》，并相继完成了新市区土地估价规则、招标规则以及地价区等级图。这已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区域土地利用规划文件。陇海铁路通至西安后，火车站附近开始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本市商业中心，在火车未通以前，以南院门及东大街，为精华荟萃之区，至铁路通达后，为新市区及大差市一带，因其接近车站之故”。东大街和尚仁路（今解放路）由于距火车站较近，逐渐取代了原先的商业中心西大街、南院门和东关而迅速成为新的商业

中心。新的经济因素导致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变，并带动了城市商业发展，由分散发展逐渐走向集中。新市区和火车站北部区域工业企业的大量分布是这一时期工业格局的显著特征。

陇海铁路通车还促使西安市民社会生活日趋开化。20 世纪初，据外国人观察，西安人对浮华、轻佻的娱乐并不感兴趣，戏院对其社会生活的影响比其他城市小得多。自从陇海铁路通车直达西安以后，一切新鲜的生活资料叩关而入，这使西安市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陇海线上载出了大量的当地出产的棉花和麦子，从外省各大埠运进了各种商品，久陷于贫困古朴的西安市民便开始和各种新奇的商品接触，使他们的生活从古老守旧的方式，逐渐地转变。虽然在陇海铁路没有通车以前，西安也有各色外埠的货物运输进来，但为数极少，而享受的人更属寥寥。据《西京》的描述：“通车以后，货物接踵而来，外埠的政务工作人员以及商人们也都随着到西京去，许多新的习尚，被这班外乡人带了进去，渐渐地西京市内一般人也普遍同化了。”铁路为西安市民的生活注入了更多的现代化要素，包括衣食住行、文化教育、公共娱乐、新闻出版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领域。

陇海铁路的通车使得西安市民衣食住行发生了显著变化。就衣着方面来说，自古关中的服饰质朴守旧，铁路通车后，截发高跟的女郎，也常徜徉在长安市上。在饮食方面，据《西京》记载：“西京的食，和其他较大的城市一样，各色口味全备，近年来因为国内外的考察团和旅行团一批批不断的前去，因此西菜在西京也成了一种很普通的食物。在从前喝一瓶汽水得化一元的代价，喝啤酒更贵，现在铁路通达后，价目较为便宜，但是捐税很重，售价仍嫌过昂，只有上等人士吃得起。西京市上的菜馆，著名的有西京招待所（西菜）、南京大酒楼（江苏馆兼办西菜）、西北饭店大餐间（西餐）、玉顺楼（河南馆）、第一楼（陕西馆）、十锦齐（天津馆）、鸿源饭庄（河南馆）。这许多餐馆大都集中在东大街一带，专供外来的旅客和当地的富绅官员们宴乐之用。”居住上，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外许多都市，都处在经济没落漩涡之中，而西安反呈极度繁荣，商店数目及贸易额，均有极度增加，建筑事业，更突飞猛进，如雨后春笋，异常活跃，土地价格自每亩数十元，暴涨数百元，甚至数千元。旅馆营业尤为兴盛，无论大小旅店，莫不利市三倍。街巷房屋，亦皆供不应求。如中山大街（东大街）、竹笆市民众大街（南院门）一带均为百货、绸缎、皮货、纸张等商店，装潢尚不少新式者。旅馆饭店，再如中山大街之西京饭店及西北饭店，建筑设备，在西北尚属难得。1936 年前后，在新城的北新街一带陆续盖起了“一德庄”“四皓庄”“五福庄”“六谷庄”以及“七贤庄”等新村，成为当时西安城内最为阔绰的住宅和街坊，可见当时西安社会生活日益丰富，有了现代化气息。正如时人所言，“长安居大不易之观，顿呈现眼帘，缘西安繁荣，系以陇海铁路

通车为主要原因”。

在行的方面，陇海铁路通车，也使得从中原到西安交通便利，人们出行更加方便，从西安到西北主干道的出现，也有利于开发西北事业。据1928年的资料记载：“报纸除《新秦报》外，有《中山报》。以八百万同胞之陕西，每日仅仅有此数百份之单张报纸宣传文化，因邮局阻隔，尚无材料可登，其可怜可哀为如何。”陇海铁路通车以后，新闻报纸、杂志社和各类通讯社等新闻传播机构也空前繁荣起来。在民国后期，不足60万人口的西安市，汇集着18家报社、28家杂志社和15家通讯社。这些报刊除了报道新闻，也涉及文娱、医药、经济、少儿等专门性报刊。《西京民报》的一位作者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社会变化的情景：“在开发西北的热流中，陇海通车西安，加之大部国军西移，西安遂成中国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的重心。西安繁荣也在飞跃的发展着，各色各样的人也一列车一列车（陕西以东诸省）运来。眼所见的，是巍峨壮丽的洋式建筑，代替了古旧的黑油板门。耳所闻的，是抑扬顿挫的南腔北调，淹没了本地的土腔，所谓陕西亦非陕西之陕西了！”

近代西安的发展是铁路与其他多种因素如国民政府计划建设陪都、国防需要、战时移民、迁厂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陇海铁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数百年来，因山川阻隔与外界联系力度较弱的西安，不像同时期一些城市有开埠的历史，直到陇海铁路通车，中、东部地区先进的工业文明才沿着陇海铁路大举进入西安，西安才真正步入近代化发展阶段。所以，陇海铁路作为纽带将西安同外部世界紧密连结，激活了西安这一传统内陆城市的近代化发展。

（撰稿人　丁　喜）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西工商界

陕西工商界由于受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的影响，很早就加入到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的运动中，掀起过抵制日货的高潮。抗日战争爆发后，陕西工商界又加入全民族的抗日行列，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抗日举措，造就了韩望尘、薛道五、窦荫三、叶雨田、瞿冠英、张士心、王鲁斋、芮廷王、黄峻山等一批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陕西工商界领导人。

一、倡导国货　抵制日货

五四运动前，西安市场上日货充斥。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学生爱国行动的影响下，当地商会也与学生联合会一道发出通电，表示与全国一致“坚决抵制日货”，并组织人力，对商号进行检查，订出公约，还在西安市南院门将日货示众，把鞋帽、百货、照相机、钟表及海味等日货摆出，予以识别和抵制，号召人们不买不用；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内再次掀起了规模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陕西工商界也积极响应。这两次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的运动，对日货在陕西的倾销都有沉重的打击。

西安历来是西北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但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由于铁路未通，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民族工商业户寥寥无几。作为西北物资集散枢纽的西安，却只经销土特产和手工业制品，因而西安市面上“洋货”泛滥。除英、德等国的产品外，“东洋货”几乎布满了市场。诸如布匹、百货、小五金以及儿童玩具等。在这种外货倾销的冲击下，迫使西安各界爱国人士联合起来抵制日货，挽回权益。经济界和工商界的有识者，既激愤于国耻，又虑及自身发展的前途命运，便设法组织国货企业。

当上海和各厂商备受外货倾销的沉重压力而痛苦难熬之际，便有许多企业参加并成立了“国货联营办事处”，以求协力斗争。1933 年春，该处曾派人到全国各大城市包括西安在内进行联系。他们一方面推销国货，一方面希望各地成立同样的机构，加强协作。西安各界有关人士，在杨虎城和邵力子、南汉宸的倡导下，随即发起成立“西京国货公司”，并由“陕西中华促进社”“陕西国货产销合作社”和西安百货业的几家同业公会部

分人士负责进行筹备。

1934 年 7 月，公推顾汉三、张定九二人为代表，同“上海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厂商联营办事处”派来西安的代表杜重远和胥仰南专就成立西京国货公司有关问题进行协商，组建西京国货公司筹备会。筹集股金 1200 股，银币 6 万元。由于杨虎城、邵力子率先入股倡导，机关和学校公教人员入股后还可享受优惠购物权利，因而积极认股。许多工商业者也勇于多认购一些股份，所以短短两个月，股金总额就全数筹齐。西京国货公司于 1935 年 5 月 25 日正式开张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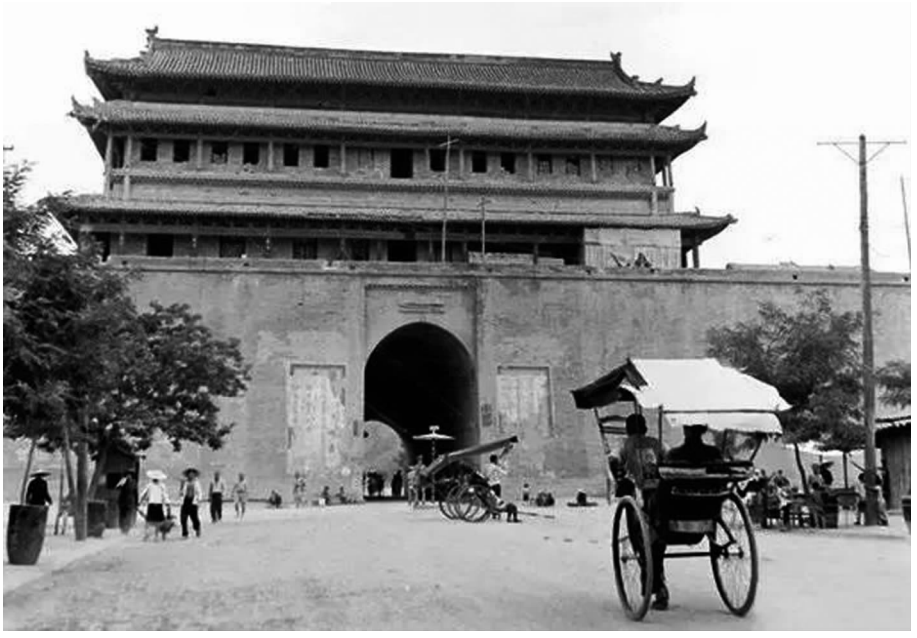
该公司创办初期，由众多厂商提供商品，货源相当充足，所经销之国产百货琳琅满目，种类繁多，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还附设有中、西服缝纫部，可进店选料，随即加工，十分方便。当时，该公司是西安最大的一家新型百货商业。

1938 年后，日军入侵愈烈，战祸蔓延，交通阻塞。西京国货公司派人赴四川成都、广元等内地，设立办事处，联系采办商品，以弥补货源不足。其时，省财政厅拨法币 2 万元，委托设立“陕西省土产推广处”。于是，该公司即用“推广处”名义，在陕西一些县增设办事处，并专辟南院门营业部二楼为“土货商场”，兼办地方土特产推广经销业务。公司与“推广处”对外是两块牌子，内部则是一套人马，经济不分。当时购销的主要土特产，除四川的土纸、川绸等以外，本省的有：安康的生漆、桐油，洋县的黑白木耳、五倍子，紫阳的茶叶，耀县的瓷器，周至、兴平的土布，以及陕南的竹器、丝绸和陕北的羊毛毡等。

土特产的大量购销推广，加之为适应市场需要而采取的一些做法，如设立作业本装订部、糖果食品制造部、皮革品制作部、物品寄卖部等，在当时战事频仍、市场物资匮乏紧缺之际，对于补充军需民用，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35 年 1 月 1 日，陇海铁路通到西安，古城市场出现繁荣景象，是年 3 月，天津国货售品所经理吉玉如亲自到西安考察市场情况，回津后派徐卓然前来西安筹建西安分所，同年 12 月 15 日国货售品所西安分所开张营业。当时西安大部分货源仰仗外地，以上海为主，天津、北京、济南分所也互相代办。

在提倡国货方面，民族工商业者重视国货的宣传，除通过报纸、传单、壁报、电影广告进行宣传外，还采用游行广告，即雇用闲散人员穿该所特制套色西式大褂，背后嵌有“国货售品所”五个红字的广告衣，肩扛各种宣传旗帜，敲锣打鼓，串游大街小巷，边走边散发传单。有时还租用卡车，周围圈上红布，上贴醒目白字，宣传中国人用中国货，以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遇到各种节日，还适时地扩大宣传。如儿童节，就预先在天津印制彩色小旗，上面印“救中国，用国货”“庆祝儿童节”等字样，凡顾客在节日领小孩来所购货或参观的，分所都送一件纪念品。此外，分所还参加过马坊门民众教育



民国时期西安西门

馆主办的国货展览会，一面展销，一面做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及上海相继沦陷，货源中断，西安工商业者派人到武汉、重庆组织货源，惜以数量较少，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业务受到很大影响。随着战区的扩大，伤兵难民云集西安，售品所同年冬曾举行“棉衣大会”，从 30 天内售出的货款中用抽签的办法抽出一天，将其所得货款一半退给顾客，一半做成棉衣，用于慰劳伤兵和救济难民。共做棉衣 100 套，50 套送给西安慰劳伤兵委员会，50 套送给救济难民委员会。

二、实业救国　支援抗战

杨虎城将军主持陕政期间，号召兴办实业，发展陕西经济，造福一方。一些有识之士踊跃兴办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随着 1935 年陇海铁路通到西安，经济日趋活跃，促进了陕西工业的发展。

1．薛道五与西安化学制药厂

薛道五，原系杨虎城部下的军医处处长，他同情革命，素具爱国思想。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昂。由于风云骤变，战事一起，外货

势必减少甚至中断，而国内药厂寥若晨星，且又设在沿海各地，西北的药品来源将大成问题。因此在1934年，杨虎城指定薛道五创办制药厂。而南京当局唯恐日本会认为中国政府是在做战争准备，怕引起“友邦误会”，药厂迟迟未能办成。到了1935年，薛道五感到由国家投资兴办药厂已没有希望，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步步紧逼担，西北大后方的药物供应行将中断，于是他下决心自筹资金创办药厂，并得到了杨虎城的默许。他一方面联络医药专家，一方面争取各界知名人士的支持，邀约韩威西等有影响的人士发起，窦荫三、李子舟、张德枢、杨俊和等人参加入股，延聘赵少艇、吴子实、程梦九等负责筹建西北化学制药厂。

董事会聘任薛道五为制药厂经理，吴子实为厂长。在当时的西安崇礼路（今西五路）购置地皮，从事建厂。厂长吴子实先去日本考察制药业，回国后在上海订购机器设备，运回西安安装。1937年，西北化学制药厂建成投产，招收并训练从事生产的工人100名；后来生产发展，规模扩大，到1939年的鼎盛时期，职工达到500余人，生产的药品缓解了陕西的军需民用之困难。

1938年，陕北八路军派人参观西北化学制药厂，并提出由该厂协助解决延安药品供应问题。1939年秋后，八路军方面多次派人到该厂购买药品。这时，国民党当局正在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八路军派来的人以参观为名，向厂内职工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唤起了该厂管理人员和工人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把八路军购药的发货票写成外县顾主以作掩护。1938年由延安来西安的化学家陈康白、1939年八路军派来的李维贞等，都先后到制药厂联系供应药品，薛都给予了妥善解决。在一次洽谈中，双方感到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方面仍不时地制造摩擦，制药厂向陕北供应药品时遭破坏。为长远计，薛道五建议在解放区帮助建立药厂。凡机器设备、人员、原料，以及建厂所需而制药厂能协助解决的，尽力帮助解决。薛道五遂督促制药厂铁工部制造一套制药的机器设备。不久，延安派人来办理购买药品和代制机器等价款结算及起运事宜。这些药品和机械作价都很低，有些还是奉送的。延安制药厂很快建成投产，边区的药品有了自给的能力。

2．石凤翔与西安大华

石凤翔原是石家庄大兴纱厂厂长，由于日寇入侵，企业危困，1935年，他在西安选购地皮，着手建厂。除将石家庄的设备运抵西安外，他又亲自去日本考察，订购了300台自动织布机和配套的机械，采购了一套温湿度调节设备；他还派人去阪本布机制造厂，实习安装、保养、维修技术。由于盖厂房采用了新材料，造价低，施工进度快。1936年秋，西安大兴第二厂就运转投产了，这是西北第一所近代化的纺织企业。大兴第二厂开工半年，每月都有盈余，但企业规模不大。汉口楚兴公司是裕华、大兴、大华三个纺织

公司的母公司。不久，由裕华公司公积金项下拨款投资，扩充大兴二厂，同时更改厂名为大华纺织厂，成立了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石凤翔经营的雁塔牌细布是以畅销中国市场的日本龙头细布为竞争对手的。他几乎把全部精力倾注于雁塔牌细布上。他精选原料，注重保养工作，讲求浆纱技术，做到雁塔牌细布在外观、色泽、手感各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每匹成布又略长于龙头细布，深受买主欢迎。西安雁塔细布在西北地区深入人心，在少数民族中也不例外。

石凤翔在抗战初期，从事著述，写了一部《棉纺学》，后来又开办大华纺织专科学校，招收当时的高中毕业生，从事专业培训；并拆迁西安大华一万纱锭到广元，创办了广元大华纺织厂；又租用了武昌震寰纱厂拆迁到西安的纱机 1.2 万多锭，扩大了西安大华的生产能力。

3．抗战中在陕建成的其他企业

30 年代初，机器局制造弹药，迫切需要三酸。1933 年，陕西省机器局局长窦荫三令张希仲等设立“集成三酸厂”并任其为经理，叶雨田为副经理。张希仲积极从事三酸的生产和原料的发掘，数年之间，业务扩展很大，厂内又增设了铁工部，有制模、翻砂、金切、装配等工序。因集成三酸厂的股东多系十七路军系统的人员和社会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特务警宪对该厂进行捣乱和破坏。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厂方不得不处处设法应付危局。集成三酸厂当时也算得上西安较大的企业之一，尤其在抗战中生产制造弹药的重要原料三酸，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出了力。

1935 年，河南开封大中火柴公司总办、开封商会会长刘海楼先生响应杨虎城召唤来陕兴办实业。他将大中公司的部分机器设备，连同一些青工迁来西安，办起了中南火柴公司。后因经营困难，由冯尚文接办。冯邀集一些热心“实业救国”的人士，如周敬熙、刘梦锡、张光宇等与旧中国银行西北分行投资经营的雍兴实业公司联合投资经营，中南火柴厂又得复苏，保障了战时的日用供需。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陕西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韩望尘除有父遗西安春裕荣、春裕泰两商号，还先后与友好合资创办西安新华砖瓦厂、眉山笔铅矿、白水新兴煤矿、耀县协建煤矿等工矿企业，为发展战时后方经济，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8 年正值中国军民抗战高潮，当时政府号召举国上下、朝野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西安仅有的西北化学制药厂，因产量低微，供需差距甚大，军需民用又十分紧迫。而西北地区盛产西药原料，尤以药棉、纱布所需原料棉花产量甚大，陕西年产棉花在百万担以上。为了利用地区物资，保障人民健康，积极供应军需，西安医药界知名人士李子舟倡议兴办了西安华西化学制药厂。

1942 年，抗战前线急需大量酒精和白酒，更加促进了凤翔县酿酒业的发展。全县酿

酒作坊91户，占全县工商业总户数的五分之一。此时，还有许多农村富户和殷实自耕农也开设“烧锅”酿酒，被称之为“连家生意”。将这些“连家生意”的产量加在一起，全县白酒年产量达到2400吨，供应了抗日前线。

为支持抗战中的军需供给，西安市的工商业者多人合作，筹集资金，建成了染厂、军装厂，生产军布和军装。其中大部分是为八路军生产军装，与八路军建立了长期的供需关系，大量的八路军军服源源不断地送上抗日前线。

1938年春，西北公路局局长谭伯英与上海商业银行下属“中旅”新成立的驻秦办事处（驻西安市）签订合同，委托“中旅”承办公路沿线的食宿事宜，商定在公路的宿站设立招待所。一年内在西兰公路沿线陆续成立了彬州、平凉、华家岭、兰州四处招待所。

1942年兰州招待所扩建为“西北大厦”。1943年由陇海铁路局与“中旅”合资筹设了宝鸡招待所。1944年宝天铁路通车，设立了天水招待所。抗战初期，苏联支援我国的军事物资，对外称“羊毛车队”，沿途招待所一度曾承担过接待任务。

这一时期在陕建成的工商企业还有：华峰面粉公司、成丰面粉公司、利民米厂、西北机器修造厂、西北电池厂、东华漂染厂、尧山油厂、新亚酒精厂、华盛烟草公司、民生工厂以及解放区的八路军卫生材料厂、雍兴公司蔡家坡纺织厂、重庆华中化工制造厂石泉分厂、西安福豫面粉厂等。这些企业在抗战中都发挥了作用，除满足后方人民生活需求外，又为前方战事提供了物资供给。



西安南大街，远处为鼓楼和钟楼

三、抢运迁陕　图存发展

卢沟桥事变后，由经济部督导抢运内迁来陕的湖北纱布局、善昌新纱布厂、汉口申新纺织四厂、福新面粉五厂、漯河大新面粉厂、洪顺机器厂、秦昌火柴厂等联合组织了“迁陕工厂联合会”，会址设在宝鸡十里铺太白庙内。

申新四厂全称为申新第四纺织有限公司，1921 年由荣德生创设于湖北汉口，拥有布机 870 台、纱锭 5 万枚及日染整 2000 匹布的纺、织、染全套设备。1937 年 8 月 12 日，日军进攻上海，荣系企业惨遭破坏。汉口申新四厂经理李国伟目睹不利战局，忧虑重重，遂决定加入“工业内迁远动”，但由于股东们与经营者意见分歧，此事被搁置。

1938 年5 月，日军攻占徐州，打通津浦路，图谋进攻武汉。此时，李国伟决意西迁，荣德生又最早提出迁到宝鸡的意见。当时陇海铁路终点是宝鸡，交通方便，八百里秦川气候温和，盛产小麦、棉花，同官（铜川）到韩城号称“黑腰带”，蕴藏丰富的煤炭，加之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对于开办纺织工业极为有利。经过李国伟、瞿冠英等实地考察，最后确定在宝鸡十里铺购地建厂。1938 年9 月三列满载申新四厂机器的火车到达宝鸡，至9 月底，汉口申新运到宝鸡的机器已达60 余车皮，计有纱锭2 万枚、布机400 台、粉机1 套及3000 千瓦发电机组。从此，申新在宝鸡建厂，在西北创建纺织业。

当时大敌入侵，国难当头，宝鸡申新的发展步履艰难，最初开始生产，只以木炭蒸汽与12 部汽车引擎作动力，只开纱锭2000 枚。1940 年6 月，租用火车蒸汽车头作动力，又开纱锭3000 枚。而大部分机器闲置，生产能力很低。



1938 年4 月至1939 年10 月，日本飞机时常在西安、宝鸡一线狂轰滥炸。李国伟与工程师吴凤瑞及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商议后，决定建筑窑洞工厂。此项工程从1940 年11 月开始，到1942 年2 月完工。建筑耗资98. 55 万元法币，为平地建筑费的数倍。共建成24 孔窑洞，其中400 英尺长的窑洞有9 孔，总容积为55. 4 万立方英尺。安装纱锭1 万多枚，以后又用仓库安装布机73 台，边纺纱，边织布，以产养厂。这种办法在战争情况下，既保存了机械设备，维持了生产，又为战时工业开创了先例，受到中外同行的好评，英国议会代表团和中外记者曾到厂参观。

为适应纺织业发展的需要，申新先后配套在宝鸡建成了铁工场、原动部、面粉厂、造纸厂及宝兴煤矿等，并在甘肃天水建立一座面粉厂。在上海、西安、宝鸡、兰州、天水等设立办事处；三原、泾阳、渭南、咸阳、汉中、耀县等地设采购部（即外庄）。还在宝鸡设立管理陕甘川三省的申新四厂、福新五厂的总管理处（后改为陕甘管辖区）。为了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销，一大批木船往返于嘉陵江上，成为当时内迁工厂组织相当

完善的民族工业的典型之一。

1938 年秋，武汉沦陷。10 月 1 日，9 架日军飞机轰炸漯河，战事吃紧，国民党白崇禧部令大新面粉厂限期西迁，逾期不迁则予炸毁。黄自芳、杨靖宇随即派职员鹿荣常等人联系火车一列（20 节车厢），由工厂组织工人拆装机器设备，同年冬迁至陕西宝鸡。当时随车来陕职工仅有 30 人。大新面粉厂迁到宝鸡以后，得到地方绅士韩树勋等人协助，在十里铺购地 70 余亩，边建设边安装，至 1939 年 7 月正式建成开工。此时，老厂职工及其亲友陆续携眷到来，大多数被安置在厂内工作。该厂职工逐渐增至 120 人。为了安置多余的职工及亲属就业，还购置果园，安装水磨，利用副产品、下脚料酿酒，养猪、纺纱织面袋；在宝鸡恢复了黄自芳任校长的原郾城私立励行中学，在十里铺办起了惠工学校。此大新面粉厂成了宝鸡较早的现代工厂之一。其时，大新面粉厂生产所用原料多从宝鸡附近的虢镇、绛帐、千阳和陇县等地购进，生产的面粉除了在本市销售以外，还销往西安等地。

当时迁陕的工厂大体上分为三类：纺织、面粉和日用品。由于这些工厂的迁陕，为陕西工业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既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保障了军需民用，更为前线提供了物资用品，支援了抗战，为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撰稿人　孟宪斌）

第四编

人物

坚贞不屈志不移——苏武

苏武（前140—前60），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和爱国英雄。天汉元年（前100），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扣居匈奴十九年，历经生死磨难，持节不屈，至始元六年（前81）才被释归汉，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病故，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褒赞苏武的忠贞爱国情操。在班固所著的《汉书·李广李陵苏建苏武传》中，记载了一位气节高尚、坚贞不屈的民族英雄，他用19年的艰难岁月诠释了一个人的崇高品质和爱国忠心，成为我们民族矢志不渝、坚贞不屈的光辉代表。

苏武是汉武帝时期的朝臣，天汉元年（前100），匈奴的新单于即位后，害怕汉朝袭击，主动向汉朝示好，尊汉天子为长辈，还释放了拘留匈奴多年的汉使，汉武帝赞扬匈奴单于的深明大义，于是便委派苏武为中郎将带领一百多人出使匈奴。苏武接过汉武帝赐给的“符节”，护送被拘留的匈奴使者，带着回赠单于的财物，踏上了出使的征程，不曾料想，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威逼背叛汉朝，臣服单于。



苏武纪念馆

一、北海放牧　坚贞不屈

苏武在被囚禁匈奴期间坚贞不屈，匈奴单于也十分佩服苏武的节操，早晚派人探望他的病情。几个月过后，苏武的病情日渐好转，单于借此机会劝降苏武，他的副中郎将张胜在诱惑面前不战而降，而苏武面对威胁却面色不改、岿然不动。劝降者无奈，只得作罢。这时的匈奴已经进入漫长的寒冬，苏武对汉朝的忠心也让单于感到震撼，于是他就更想逼迫苏武投降，下令把苏武囚禁在地窖中，断绝了他的饮食，想用长期饥渴的折磨摧垮他的意志，逼他屈服。此时正值天降大雪、天寒地冻，衣不遮体的苏武蜷缩在地窖中，靠吞食雪团、毡毛求生。数天后，匈奴人发现苏武竟然还活着，便以为苏武有神灵保护，就放弃了杀他的念头。单于将苏武与随行的人员全部分开，将他一个人流放到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牧羊，单于给苏武的全部都是公羊，但他还假装许诺，等公羊生下羊羔，能产奶后，苏武就可以回归汉朝了……

被流放到北海后的苏武孤苦无依，匈奴人不给他粮食，他就靠挖野鼠和储存的野菜充饥。虽然生活艰难，但苏武一直握着汉武帝赐给他的汉朝使节的符节，将它时刻带到身边，时间长了，节仗上的旌毛全部脱落，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棍子。日复一日，寒来暑往，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唯有符节和羊群陪伴着苏武。

从被发配到北海苦寒之地牧羊的那一天起，苏武心中对祖国、对家乡的思念就一直没有停息过，漠北的风沙吹不散他的思乡之情，更摧不垮他的坚强意志，因为苏武在等待，等待着终有一日能返回故土。



二、矢志不渝　丹心不改

虽然匈奴人将苏武放逐到北海牧羊，看似不闻不问，实际上一直都想劝降他。汉将李陵的投降使匈奴人看到了希望，于是匈奴人便派李陵来劝降苏武。一次，李陵宴请苏武，席间，他向苏武讲述了苏家的苦难遭遇，试图说服苏武。苏武出使匈奴不久后，哥哥苏嘉自杀身亡，弟弟苏贤饮药自杀，妻子孩子失散流离。出使匈奴十余年，这是苏武第一次听到自己家人的消息，苏武听了之后，长叹一声“我父子等无功无德，都是由国家的提拔才位列将军，报效国家犹如报效父母，应肝脑涂地，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的!”

李陵与苏武饮宴几天后，一直劝苏武归降，可苏武始终持节不改，并愿意以死明志。李陵见他对汉朝如此忠心，只好羞愧而去，临别之前，李陵不好意思亲自送礼物给苏武，

就让自己的妻子给苏武送去了牛和羊。后来，李陵再次到北海看望苏武，告诉他汉武帝驾崩的消息，苏武犹如晴天霹雳，此时的他再也忍不住，他跪向南方，放声痛哭，吐出的都是鲜血，痛苦万分。

在苏武心中，国家是大事，自己的家庭是小事。人伦亲情固然重要，但君臣大义，国家利益却高于一切，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爱国精神。

三、历尽艰险　荣归故土

汉武帝去世后，汉昭帝即位，匈奴于始元六年（前81）派使者向汉朝求和，此时的汉朝便打听苏武的下落，单于欺骗汉朝说苏武已死。苏武的随从便暗中向汉朝使者告知实情，他让汉朝使者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中射中大雁，脚上寄有书信，上面说苏武在北海牧羊”，汉使者便以此质问匈奴人，匈奴人无奈，只得释放苏武回国。李陵知道苏武要回国，为他摆酒设宴，说：“你今天得以回国，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古往今来，又有谁能超过你啊!”在李陵看来，苏武的忠贞守节已经是一个奇迹，谁也不曾料想到苏武竟然有活着回故土的那一天。

苏武在始元六年（前81）春天回到长安，当初带去的随从100余人，除了在匈奴死亡、投降的之外，归国时仅仅剩下9人。此时的苏武已经60岁，须发皆白，汉昭帝让苏武去茂陵谒见汉武帝，苏武老泪纵横，趴在汉武帝陵前失声痛哭。祭祀之后，他将那根光秃秃的符节供奉在汉武帝庙中，苏武用这样的方式告慰先帝英灵：“我苏武没有辜负您的重任，如今复命而来!”汉昭帝任命苏武为典属国，重重嘉奖了他。汉宣帝即位后，尊苏武为德高望重的“祭酒”，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苏武病故，终年80岁。甘露三年（前51）朝廷为表彰苏武的美德，特将他的画像放置在麒麟阁上，以彪炳其不朽的功德。

民国时，有人曾感召于苏武的爱国精神，作《苏武牧羊歌》，歌中唱道：“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愁十九年，心存汉社稷，历尽难中难……”这首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苏武感人的一生，教育着每一位炎黄子孙。在今天看来，这种高尚的民族气节，这种对国家忠贞不渝的高贵品质，感染着每一位后世人，而苏武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对于每一位陕西人来说，更是我们永远要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

（撰稿人　赵　鹏）

药王孙思邈与唐代医人群体

隋唐时期医药事业发展很有起色，政府和皇帝都重视医疗，如政府组织编写过《新修唐本草》，太医署的各级机构在治疗疾病的同时还负责培养专门医药人才；几位皇帝还先后向地方百姓颁示《广济方》《广利方》等常用医药手册，地方政府在特殊时期还把常用医方刻到公共场所的石碑上，以便患者据方自疗。一批医道高超的名医从大量诊病去疾的医人群体中脱颖而出，孙思邈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不仅为解除当时百姓的疾病痛苦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推进了中国古代医疗事业，或许他们已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或许他们已变成无名英雄，但他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却一直传承下来。

一、药王孙思邈

名医孙思邈主要活动在隋到唐初，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州区）人，不仅善于治病疗疾，也精通百家老庄之说，在推步（天文）、导养（养生）、阴阳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尤以医术高明而被人称为药王，曾经隐居五台山、太白山。隋文帝时以国子博士征召，他没有应召；唐太宗时召到京城长安，欲授予官爵，他也没有接受；唐高宗时召至京城，不乐为官，坚决要求入山修行，皇帝只好赐给他良马送还山中。

关于药王孙思邈的传说很多，或讲他不拘旧典，敢于以新法治病救人；或记他勇于实践，以独创之法起死回生；或说他医德高尚，淡薄功名利禄，患者不分贫富贵贱“普同一等”。在他看来，“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重人命，轻千金，所以药方在他那里是为了治病，而不是为了求官图利，因此就为其书命名为《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这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医学之大成的名著。宋代曾于孙氏故里耀州将《千金要方》的摘要本《千金宝要》刻成煌煌巨碑，现仍有 4 块丈余高的石碑幸存于“孙思邈纪念馆”中，而原书却散佚脱简了，因为石碑只是原书的摘要，我们已不能见到完整的《千金要方》，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他生前曾经隐居、采药制药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现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的药王山已成为关中北部地区的名山圣地，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有一次，孙思邈在路上碰到一家出殡发丧的队伍，他发现棺材里正向外淌着点点鲜血，就上前询问出丧队伍后边痛不欲生的老婆婆，这才得知死者是她的独生女儿，因为难产刚刚死去，家里人怕时间太长亲属伤心过度，就要把她埋葬。凭他多年的经验来判断，产妇尚未死去。孙思邈急忙让人打开棺材，也顾不得许多，就上前查看情况。他见到产妇脸色发白，好像真的死去一样。但用手摸她的脉搏，似乎还有一点微弱的起伏。孙思邈就在路旁给“死者”治病，结果，经他紧急抢救后，“死去”的产妇竟然奇迹般地活过来，还顺利地产下腹中的婴儿。



孙思邈像

他不仅读了很多传统的医籍药典，也向他人虚心求教，还敢于大胆地摸索创新，他提出“复方”之说，即一病多方，一方多病；在中医针灸疗法中的“阿是穴”，据说就是他摸索出来的；同时他还善于学习异域传来的新法新药，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特征在他身上也有所体现。他的《千金翼方》中保存了《新修唐本草》的大部分内容，如果不是他的记录，现在我们要了解这本古代医典，就会受到相当限制。

二、疑病怪疗

唐代朝野都重视医疗的作用，唐政府集官方力量在显庆四年（659），由苏敬等人编成《新修唐本草》55 卷。而民间所著医学著作更多，不说上面提到的《千金方》，知名于世的有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王焘《外台秘要》、甄权《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等，另外失传多年的孟诜《食疗本草》也在敦煌藏经洞中有部分发现，同时也有许多医方药籍的残卷出土。

在一些常见病的治疗上，依靠医典药方完全可以防治，但如果遇到疑难病就非常棘手，需要特病特疗。例如：唐朝有人患了一种应声病，多方求治，不见疗效。就来找医官苏澄，苏澄也觉得无从下药，他跟病人说话，而病人的肚子里就会答应，忽然他心生一法，就对病人家属说：“医书里并没有治这种病的药方，我编《本草》时把天下所有的药物都选进来了，我看最好的办法是，在病人面前朗读《本草》，看他对什么药物不敢回应。”于是，就对他病人读起来，每读一种药物，病人的肚子里立即回应，唯有一种

药物，不作回应，再三朗读也无应声。苏澄于是就以此药为主，开了一个药方，服下去后此怪病就根治了。

唐时京城中有一位妇人，跟随丈夫外出，不小心误吃了一只小虫子，从此就常常怀疑虫子留在肚里，因此致病，频疗不愈。回到京城长安后，就来找某医生，他了解详情后，就答应保证手到病除。谈话中间，医生就将病人的一位侍婢叫到别处，告诉她说："我要让你家娘子服吐泻药，须你用盘盂来承接。在娘子猛吐之时，你就说有一只小蛤蟆逃走了，必须不能让娘子知道你说的是假话，切记莫泄。"那位侍婢就按医生所教的那样一说，她家娘子的怪病就从此治好了。

长安有一位少年说自己眼中常有一面小镜子，别的医生都无法施治，他就来找名医赵卿，经过查看，赵卿说今天太忙，明天我保证把你眼中的小镜子取出来，让少年明天早晨别吃饭，来他家吃鱼脍后，再行治疗。

第二天一大早，少年就饿着肚子来到医生赵卿家，主人把他接到客厅，并说有几位客人要送，等送完其他客人后，再来一起吃鱼脍，说完赵卿就出去了。房子里只有少年一人，桌子上放着一杯芥醋，别的什么也没有。少年在房子里等了很久，也不见人来，饥饿难忍，又闻到杯子里的醋香，就忍不住端起来喝了一小口，过了一会儿，又喝一小口，喝过几次后，就觉得胸中特别舒畅，眼花也看不见了，索性就端起杯子全喝下去。刚喝完，赵卿就进来了，少年为在未经主人允许情况下喝醋向他道歉，赵卿就说："你是因为吃鱼脍太多，导致胸闷，才生眼花的感觉，这种病只有在不经意间喝酱醋才见疗效，刚才只是想让你饥不择食之时多喝点醋，是我故意安排好的，现在你的病看好了，请你自己找地方吃饭去吧，我家已吃过早餐了"。



三、出血开刀

唐高宗李治，晚年经常感觉到头昏眼花，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武则天对此有她自己的想法，表面上很着急，内心里则是治好与治不好她都无所谓。高宗疼痛难忍，就让人召来御医张文仲和马鸣鹤会诊，马鸣鹤说："皇帝是风毒上攻，如果能刺头流点血，就会好转。"武则天在帘子背后马上大发雷霆，说："这人可杀，天子的头上怎么是他试验出血的地方?"秦鸣鹤吓得跪在地上叩头请求饶恕，唐高宗这时说话了："医生讨论病状，原则上是不能治罪的。我头重憋闷，似乎快不能忍受了，流点血未必就不是好事，你就随便治疗。"秦鸣鹤就用针刺高宗的百会和脐户穴出血，唐高宗忽然惊叫："我的眼睛又能看见了。"话还没说完，武则天就从帘子背后出来向秦、张二人施礼说："这真是上天赐给我的良师神医。"自己亲手拿出珍宝赏赐他俩，而唐高宗只好什么也不赏了。医术不

是政治，刺血疗法直到现在有时也仍使用。

武周时期，来俊臣等一批酷吏滥用刑具，大搞罗织，百官人人自危，唐睿宗李旦也被怀疑，有人诬告他有异谋，来俊臣就把他手下的人员拷问，有人屈打成招，而乐工安金藏咬牙挺住，大声对审判官说："你们如果不信我安金藏的话，那我就以剖心自明来保证皇子不反。"随即拔出一把锋利的刀子，一下插进自己的腹部，然后向下一拉，哗的一下，五脏都跌出来，血流满地，气绝而亡。武则天听说此事以后，立即让人抬进宫中，派医师把他的五脏都如数放回腹腔中，用白桑皮把伤口缝合，又涂上药，过了一个晚上，安金藏竟然奇迹般地苏醒过来。武则天前来慰问，说："我连我自己的儿子都不相信，还要你来以死证明，实在是不应该。"就下令停止审问此案。这个案例经常被认为是唐代用外科方法治病的典型。

实际上，这种开腹又缝合的情况在唐代并非唯一，唐将李祐的妻子姜氏也有类似的经历，乱兵用刀划开她的腹部一尺多长，当时气绝倒地，由于李祐及时赶到为她敷药裹伤，过了一夜后复苏。当时她正在妊娠期，伤好后，她还能把孩子生出来，这在当时并没有外科的唐朝简直就是天大的奇迹。

唐人崔慎由左眼曾长出了一块赘肉，把眼睛都遮住了，医久无验，听说扬州有一位姓穆的眼医可以治此病，就让判官杨收去邀请。杨收去后一打听，知道还有一位更好的眼医叫谭简，做事谨慎，医术超过穆生，就把谭简请到崔慎由的府中。谭简看过崔慎由的病情以后，就说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除掉赘肉，但必须在天气晴朗的中午，心神安静，坚定不犹豫的情况下方能治好。崔慎由就答应，这件事连妻子儿女都不让知道。谭简又问崔慎由说："能饮多少酒？"崔回答说："虽酒量不大，但能饮满数杯。"医师听了很高兴。

这天，天空万里无云，崔慎由把医师谭简请到宅中非常幽静的小楼上，除了一个小僮儿外，别人谁也不知道。谭医师就请崔慎由先喝酒，酒喝到一定程度后，拿出一把非常锋利的小刀，一刀就割掉了崔慎由眼前的赘肉。崔慎由就觉得眼前忽然一亮，赘肉就落在了谭医师的手中。面对伤口鲜血直流的情景，谭医师神态自若地用干净的布子擦掉流出来的鲜血，然后敷上特制的药物，才让小僮去报告崔家人知道。

医师谭简的手术有几处跟现在手术相似：先要求病人喝酒，等于是起到麻醉的作用，减轻其疼痛，然后开刀，最后敷药。这个手术在今日几乎毫无难度，但在千余年前的唐朝，恐怕有人想也不敢想。

在敦煌出土的一批有关藏医杂疗方中，还明确记载了突厥外科疗法，特别提到手术后的饮食要凉性，这也是人们外科实践能力提高的一种表现。尤其是提到人脑骨破裂的治疗方法，甚至比唐人小说中提到的还要惊险，要求受伤者剥掉脑皮，露出骨头，剖开

内皮，杀一只狗，以热狗皮盖在伤口上，就会愈合，也须将伤口涂药包扎。反映出藏医在当时并不排除外科手术的治疗方法。

总起来看，在中医治病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以内病内治，外伤内治为主，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外科手术之法，当然这也与消毒不发达，伤口容易感染大有关系，但那些成功的外科事例，常为人所津津乐道。

四、影响与启示

任何时代都离不开治病救人的医人群体，隋唐社会如此，现实社会亦如此，他们不畏艰难解除病人的痛苦，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救死扶伤，他们不囿于成见毅然探索新法，担当起民众生命健康的卫士，坚持在抗击疫病的最前沿，用实际行动为古代医德添加新内容。隋唐时期各地灾害频发，疾病肆虐，唐政府集官方力量编撰《新修唐本草》，纠正昔日医方之错误，孟诜在长期行医实践中写成《食疗本草》，拓宽治疗疾病的途径，还有人编写《海药本草》，吸收外来医学成果，推动隋唐医学整体进步。虽然隋唐时期的医疗水平仍旧肤浅，大量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医疗事业并不发达，民众的医疗认识仍夹杂大量的巫医观念，舍医求巫、轻医重巫的问题仍旧存在，但隋唐社会的医药环境可以培养出巢元方、孙思邈、甄权等名医，其学术氛围能够推出《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千金方》《龙树论》等医籍，就说明隋唐医疗事业是有活力的，医药水平是在不断前进。特别是外来医药技术和医方的传入，更成为当时医疗事业的新血液。

如何让医人与医学形成良性互动局面，如何让医学服务于患者，如何使社会容纳医药创新，如何保持医疗事业的活力，不仅考验隋唐人，也考验当今的社会管理者。

（撰稿人　贾志刚）

颜真卿——刀光剑影度一生

一、引 子

颜真卿与欧阳询、柳公权、赵孟頫被后世并称为“楷书四大家”。颜真卿继承传统而又有创新，博取众家之长，书风雄强浑厚，气势磅礴，变二王之法，自成一体。颜体楷书是博大宏伟的盛唐风貌的完美体现，代表了唐代书法的最高成就。正如苏轼所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颜真卿在书法史上集大成式的崇高地位，得到后人的公认。

然而，颜真卿在书法领域的耀眼光芒，掩盖了他卓越的道德人品。正如明代文学家徐渭说王羲之“以书掩其人”。颜真卿的伟大之处，不仅仅表现在其书法成就方面，更多地表现在其道德人品方面。

二、为拜名师两次辞官

颜真卿是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祖籍山东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他出生于诗书世家，五世祖颜之推曾写下著名的《颜氏家训》。

颜真卿继承了良好的家族文化基因，他非常喜欢读书，文章写得很漂亮，对书法更情有独钟。不幸的是，在颜真卿3岁那年，父亲就病故了，家里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贫困。这让母亲很为难，吃饭还是问题，哪儿有钱去买那么多笔和纸供他练字呢？

颜真卿看出了母亲的心事，有一天，他手里拿着一只碗和一把刷子，高兴地对母亲说：“我有不花钱的纸笔了，您别发愁了！”母亲疑惑地看着他。他说：“这只碗是砚，这把刷子当笔，黄泥浆可以当墨！”他在碗里装满了泥浆，走到墙壁前挥笔写了起来，写满后又用清水把字迹冲洗掉，说：“这就是纸啊！”

母亲笑了，颜真卿也因此练就了一手好字。26岁时，颜真卿考中了进士，在朝廷里当了校书郎，后来又外放到醴泉（今陕西省礼泉县）任县尉，负责管理地方治安。这件



颜真卿画像

工作相当繁杂，起早贪黑，没日没夜，但颜真卿总要挤出时间练字。人们看到他写的字，都赞不绝口，可他内心里却十分苦恼，因为字写到这个程度，没有名师的指点，就再难有长进了。他想去拜一个人为师，可想起此人的脾气，又有点犯怵。

这个人就是张旭，擅长草书。他性格怪僻，最喜欢饮酒，为杜甫所列的“饮中八仙”之一（其他7位分别为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焦遂）。喝得大醉后，张旭常常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有时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因此被时人送予了“张颠”的雅称。

为了表示自己拜师的诚意，颜真卿毅然辞去了官职，赶到洛阳，投到张旭门下。张旭仔细地看了他写的字后说：“你的字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国家正是用人的时候，你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哪能在写字上花那么多功夫呢?”

话说得很婉转，可颜真卿听得出其中的拒绝之意。他也不敢强求，只好告辞回到了长安。没过多久，他再次在朝廷中得到了任职的机会，可他一直对未能拜张旭为师耿耿于怀，于是又一次辞官。张旭被他的诚心所感动，点头收下了这个弟子。

然而让颜真卿失望的是，入门几个月，张旭要么就是将自己书写的字和前代名家的字帖给他，要他“倍加工学”，要么就是带着他游山玩水、赶集看戏，“领悟自然”，丝毫没有把诀窍传授给他的意思。有一天，颜真卿实在忍不住，对张旭抱怨说：“我来拜门求师，是想得到您笔法的精微秘诀，为什么只让我临帖、参悟呢?”

张旭不高兴地说：“我是见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察笔法之意，见公孙氏舞剑而得落墨神韵，除了勤学苦练和师法自然，哪有什么诀窍啊!”

颜真卿从张旭的话中，明白了为学之道，于是他再也不去寻找捷径，而是埋头苦学，揣摩前辈笔法，把从自然万象中领悟到的神韵凝于笔端，终成一代书法大家。

三、粉碎了安禄山的“闪电战”

颜真卿学好书法后，再次出仕，在朝中任监察御史，可是他也像许多艺术家一样，不谙世事，一味耿直，在天宝十二年（753）被贬到平原郡（今山东省德州市）任太守。诗人岑参为他送行，不无担心地写道：“郊原北连燕，剽劫风未休。”然而，这个地方最

可怕的不是气候的恶劣，而是憋着劲准备造反的安禄山。

到任后，颜真卿“废苛政、黜奸小、除奸诡、进忠良”，深得百姓爱戴。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称赞他“自承到官后，高枕扬清风。豪富已低首，逋逃还力农。”当然，颜真卿对安禄山的野心也心知肚明，悄悄地做起了防范。

颜真卿以防汛为名，修筑城墙、赶制兵器、收揽壮丁，积储粮草。为了避开安禄山的耳目，他每天都是一副文人做派，吟风弄月，甚至还亲自主编了一部研究音韵的著作《韵海镜源》。安禄山派人来检查工作，他在好吃好喝好招待之余，还即兴写了一幅字，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著名碑帖《东方朔画像赞碑》。安禄山笑了，把颜真卿真的当成了一个只知道舞文弄墨的书呆子。

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起兵谋反，对唐王朝发动了出其不意的“闪电战”。叛军所到之处，守令要么开门出迎，要么弃城匿窜，没有敢勇猛地打一场的。没多长时间，叛军就直逼首都的最后一道防线潼关。唐玄宗李隆基束手无策，狼狈不堪，一边仓皇出逃四川，一边哀叹：“河北二十四郡，难道就没有一位忠臣吗?”

这时候，颜真卿挺身而出，不等皇帝的诏令，誓言讨贼。他辖下三千兵马很快就扩充到万人，并与时任常山郡（今河北省正定县）太守的族兄颜杲（音同稿）卿约定互为犄角，共同抗击叛军。

平原郡久攻不下，安禄山寝食难安，又气又急。攻陷洛阳后，他派段子光带着洛阳留守李憕的首级，前来招降颜真卿：“看到了吧，如果不投降，就是这个下场!”

颜真卿不为所动，冷笑说：“我认识李憕，这并不是他的首级。来人！把这个叛贼给我砍了!”

此举一下子稳定了军心，河北 17 郡又相继归顺朝廷，颜真卿被推为联军盟主，统兵 20 万，横绝燕赵，军威大震。天宝十五年（756），他指挥联军在堂邑（今山东省聊城市）大破叛军，歼敌 2 万余人。

当时，颜真卿手中并没有精锐的部队，凭借的只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武装力量。但他却打赢了安史之乱以来的第一场胜仗，“颜真卿”3 个字于是成了一面旗帜，连守在安禄山老巢的嫡系将领刘客奴都派人跟他联络，准备归顺。颜真卿当即派人从水路给他送去了 10 多万军资，为了坚定刘客奴的信心，他还把自己不到 10 岁的独子当人质。

河北诸郡的归顺和堂邑之战，截断了叛军和老窝之间的联系，安禄山只好终止进攻潼关，回师河北。颜真卿的这一番举动，为大将郭子仪、哥舒翰等正规军重整军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唐玄宗听到这些消息，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我不了解真卿的为人，他做事竟这样出色!”

在这场关乎唐王朝存亡的战斗中，颜氏一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后有 30 多人为国

捐躯。在常山战役中，颜真卿的族兄颜杲卿寡不敌众，被敌军俘获。安禄山命人将他押解到洛阳，亲自审问。颜杲卿拒绝投降，安禄山当着颜杲卿的面，砍下了他的儿子颜季明的脑袋。颜杲卿大义凛然，痛骂叛军，结果被用铁钩钩断了舌头，依然骂不绝口，最后被残忍地处死。

数年之后，颜真卿满怀悲愤地记述此事，写下了著名的《祭侄文稿》。这篇用行书写成的祭文一气呵成，国仇家恨全部凝聚在了指尖，其中有好几处因为笔写干又顾不上蘸墨而形成的枯笔，让人感受到他当时苍凉悲壮的心情。这幅作品被后世誉为“在世颜书第一”，是唯一可以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比高下的书法珍品。

四、四朝为官得罪五宰相

因为在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颜真卿被调回中央，深受重用。不过他的文人气质加上嫉恶如仇的性格，让他在充满尔虞我诈的官场显得特别另类。他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肃宗时任过尚书，代宗时被封为鲁郡开国公，德宗时被奉为太师，虽然官一朝比一朝大，但往往都是新帝登基时把他召回中央，提拔不久就因为得罪掌权者而被贬到地方。他得罪过 5 位宰相，贬职成了家常便饭。

杨国忠当宰相时，前朝名相宋璟的儿子宋浑得罪了他，遭到贬职处分，满朝大臣噤若寒蝉，只有颜真卿站了出来，对杨国忠说：“奈何以一时忿，欲危宋璟后乎?”何必因为一时的气愤，而使宋璟的后代受到伤害呢？在唐玄宗朝，身为皇帝小舅子的杨国忠脾气非常不好，颜真卿的话虽然只是劝解之言，却让他如鲠在喉，结果就是让颜真卿落得个与宋浑一样的下场。

唐代宗时，元载为相，在朝中结交了许多私党，他怕群臣议论然后报告皇帝，就给代宗打了个报告说：“群臣向您上书报告事情，多数都是谗言诽谤，请求每次议论朝政时，先让他们报告给各自的长官，长官报告给宰相，由宰相判断是对还是错，然后再向您报告。”这就相当于从制度上保证每件上报给皇帝的事，都要经宰相过一遍筛子。代宗正为每天乱七八糟的事心烦，就被说得有点心动。颜真卿当即上书批评此事：“古人说，‘苍蝇飞舞声嘤嘤，飞上荆棘停住身，进谗说话没定准，搅乱各国不太平。’所以古代贤君都是广开四方视听，陛下却想自己堵住耳朵、蒙住眼睛，听不清、看不明，那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只准宰相报告事情，这样的事旷古未有，即使是李林甫、杨国忠也不敢公开这样做!”

在颜真卿的强烈反对下，元载堵塞言路之举没有得逞，但没多久，颜真卿就莫名其妙地被贬到硖州（今湖北省宜昌市）。

颜真卿得罪的最后一位宰相是历史上著名的奸臣卢杞。卢杞曾到郭子仪府上拜访，吓得郭大元帅赶紧让家里的女眷回避。后来家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卢杞长得神头鬼脸，女人们看了肯定忍不住要笑，他一定会记恨在心，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一个都活不成！"颜真卿显然没有郭子仪这份智慧，他依然不改刚正不阿，弄得卢杞脸黑得更加难看，准备把颜真卿排挤出京城，落个耳根清净。颜真卿听说了，找到他说："您先父卢中丞的头颅被安禄山送到平原郡时，脸上满是血，我不忍心用衣服擦，亲自用舌头舔净，就凭这点，您忍心不容忍我吗?"卢杞听了惊惶地下拜，内心则对颜真卿更加恨之入骨。



《与郭仆射书》清拓本

颜真卿只要是看谁做得不对，哪怕是皇帝老子，他也敢说敢管，更不用说皇帝身边的那些红人了。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有一幅《争座位帖》，它的来历，最能体现颜真卿的这种性格。

有一年，唐代宗设宴款待从外地前来参拜的郭子仪。按照礼法规定，宴会上文武官员的座位顺序，应该按照官职的大小排列。但负责安排座次的官员郭英义，为了讨好代宗宠信的太监鱼朝恩，竟把官职地位更高的尚书们都排到了鱼朝恩的后面。宴会上鱼朝恩十分得意，时任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气愤地对身边的人说："鱼朝恩不过是个善于拍马

屁的小人，没有什么功劳，他的座位凭什么排在前边！”同僚们赶紧劝道：“他是皇上的红人，谁惹得起？还是算了吧！”颜真卿回答说：“不行！这有关国家的尊严，不是件小事。这个座次我一定要争！”

回到家，怒气难平的颜真卿奋笔疾书，不一会儿，《与郭仆射书》（又称《争座位帖》）就诞生了。这篇作品历数了鱼朝恩的种种罪恶，痛斥了郭英义溜须拍马的无耻行为，笔力雄健，气势夺人，充分展现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成为他的书法代表作之一。

五、明知是火坑也要往里跳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朝中议论着准备派兵讨伐，这时卢杞悄悄给唐德宗出了个主意，他说李希烈这个人“年少骁将，恃功骄慢”，一般人都不看在眼里，如果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去劝说他，一定能“不劳军旅而服”，不用费一兵一卒就能将叛乱平息了。

唐德宗自然很高兴，说：“那派谁去合适呢？”

卢杞说：“颜真卿是朝中元老，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没有谁比颜真卿更合适的了！

满朝文武听说此事都吃了一惊，因为谁都看得出来，卢杞是在借刀杀人。于是不少人都劝颜真卿说，你不如以年老体弱为理由推辞不去。颜真卿慨然回应说：“君命也，将焉避之！”这是皇帝的命令，怎么能因为怕死而回避呢！说完，他带上诏书，连家都没回就奔向前线了。



事情果然如卢杞所料，颜真卿一到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就被1000多个杀气腾腾的武士包围了，明晃晃的刀剑在他眼前直晃。颜真卿镇定自若，脸上的颜色一点也没改变。李希烈见状，假意喝退了武士，笑着对颜真卿说：“手下人不懂事，您别见怪。这次起兵，我是被逼无奈，还请替我在皇帝面前说几句好话。”

颜真卿说：“你只要归顺朝廷，自然不会获罪。”

李希烈根本听不进劝告，把颜真卿扣押起来。不久，朱滔、田悦等4个同样反叛的藩镇派遣使者到李希烈处，上表称臣，劝他称帝。李希烈很高兴，命人把颜真卿叫来，看一看自己是众望所归。四镇使者借机拍马屁说：“早就听说颜太师有威望，现在李元帅就要称帝号，而颜太师恰好到来，这是上天把宰相赐给元帅啊。”颜真卿厉声呵斥他们说：“说什么宰相！你们知道有个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他便是我的哥哥。我年岁这么大的人了，只知道恪守臣节而死，难道还会受你们的引诱胁迫吗！”4个家伙不敢吱声了。

文的不行，李希烈决定给颜真卿点颜色看看。有一天，他命人在馆舍庭院中挖了一个大坑，然后把颜真卿架过来威胁说：“你如果不归顺我，就活埋了你!”颜真卿神色安然，对李希烈说：“既然我的生死已经决定，何必玩弄花样！赶快一剑砍死我，你心中岂不更痛快些?”弄得李希烈没了脾气。还有一次，李希烈叫人在院子里架起一堆干柴，点起熊熊烈火，然后把颜真卿带到火堆前。一个叛将对他说：“再不归顺李元帅，就活活烧死你!”颜真卿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一句话没说，纵身就向火堆扑去，吓得那个叛将赶忙把他拉了回来。

颜真卿情知难逃此劫，早就从容地做好了准备。他给朝廷写了遗表，给自己写了墓志铭和祭文。在祭文之中，他写道：“天之昭明，岂可诬乎！有唐之德，则不朽耳!”贞元元年（785）8 月 23 日，李希烈派人将颜真卿勒死于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龙兴寺中，终年 77 岁。

欧阳修评价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意思是，颜真卿是位君子，他的品德和性格，人们初见也许会心生敬畏，然而愈久会觉得愈可爱。颜真卿的人生如书，把刚直忠烈的品格融入了书法之中；他的书如人生，把字的端庄与遒劲化成了处世的性格。这样的书法，让我们钦佩；这样的人生，让我们高山仰止。

（撰稿人　苏　陕）

关学创始人张载

一、张载其人

张载（1020—1077），字子厚，祖籍开封。其父张迪于四川任职期间病故后，张载伴母扶柩归乡，然行至凤翔郿县（今陕西省眉县）横渠镇时，路资难继，遂葬亲定居。因此，世称其为“横渠先生”。



张　载

张载“少喜谈兵”，21 岁时“以书谒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劝诫道：“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此后，张载立志于学，不仅学习儒家经典，而且遍读佛、道之书，“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他曾与二程“论《易》”“论道学之要”，自言：“吾道自足，何事旁求!”终尽弃异学，专心致力于儒学之道。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张载举进士，先后任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市）司法参军，云岩（今陕西省宜川县）县令等职，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宋神宗熙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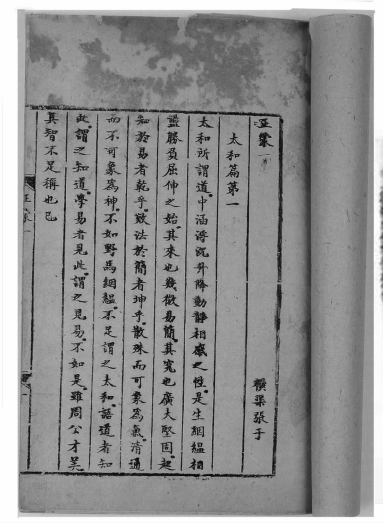
张载祠

（1069），御史中丞吕公著向朝廷推荐张载。宋神宗召问治道，张载强调“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阐明了法先王、崇尚礼治的政治原则。宋神宗悦，以其为崇文院校书。一日，王安石见张载问以新政，张载委婉地表示了不敢苟同的意思。不久，张载便被调出朝；继而辞官还乡，屏居横渠。自此，张载“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孜孜研读儒家经典，“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熙宁十年（1077），张载被召回朝，知太常礼院。因与有司议礼不合，他复称病辞职，卒于归途，享年58岁。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张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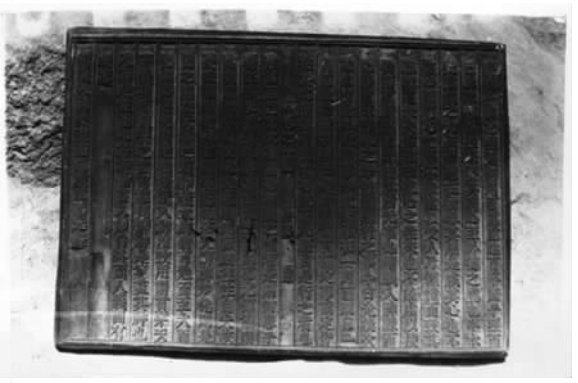


张载墓

被葬于横渠大振谷。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明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赐封“郿伯”，从祀孔庙。《宋史》卷427有传。



正　蒙



明万历四十一年木刻《张子全书》印版

张载的主要著作有《易说》《正蒙》《经学理窟》等，后人集其著述为《张子全书》。其中，《正蒙》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张载弟子苏昞效仿《论语》《孟子》的体例，“篇次章句，以类相从，为十七篇”，将原来数万言的《正蒙》化简为今存本的样子。该书“无不包矣，无不尽矣，无大可过矣，无细可遗矣”，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伦物理，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张载的哲学内涵。《经学理窟》与《正蒙》的相关章节反映了张载的社会政治观点，《易说》与《正蒙》则构成了张载的哲学体系。



张载集

二、张载的学术思想

张载的学术思想，既不源于二程，也无其他师承，而是直接本于儒家典籍。明代关中大儒冯从吾概括张载学说的特点："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的，以孔孟为法，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关于张载思想的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已有学者对20世纪张载哲学研究做了总结。

气为万物之源，这是张载在天道观上的基本观点。张载言："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通过确认太虚为气之本然形态，张载同时追溯了万物存在的统一本源，所谓"虽无穷，其实湛然；虽无数，其实一而已"；通过肯定气的聚散，张载又对存在的多样性作了说明，所谓"阴阳之气，散则万殊"。张载将终极形态的"虚"理解为气之本体，旨在从本源的层面论证世界的实在性：事物的变迁，都无非是气的聚散；万物来自于气，又复归于气，从而世界既非由"无"而生，也不会由"实"走向"空"。

张载对于天道的考察，同时又关联着人道。气的追溯，处处引向人的存在："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故圣人语性与天道之极，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气的聚散属对象世界的变迁，"性"则与人的存在相联系，由气的聚散进而究性与天道之极，无疑体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相关性。以道观之，气的聚散，并非杂而无序，其间包含内在的条理："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天道之域的这种有序性，亦体现于人道之域："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天序与天秩，属自然之序；"经"与"礼"，则涉及社会之序。经之正、礼之行，以"知序"和"知秩"为根据。在张载看来，人道意义上的秩序包含更具体的社会伦理内容。基于对伦理之序的关切，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语既体现了理想的追求，又包含内在的使命意识，突显了人的普遍社会责任。

张载认为人性有两种形态：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主要与人的感性存在相联系，而天地之性则更多地体现了人作为伦理存在的普遍本质。张载提出变化气质的要求，即以普遍的伦理原则、规范对人加以改造，使其言行举止合乎普遍规范的要求，"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进而走向理想的人格之境。变化气质的过程，就是反归天地之性的过程。这是张载，也是其后的理欲之辨，以及"存天理""灭人欲"道德要求

的理论基础。

三、张载与关学

张载在关中创立的学说，世称“关学”，为理学开创阶段的重要学派之一。不过，“关学”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谓广义关学，泛指北宋至清末的陕西关中理学（儒学）。如，冯从吾在其《关学编·自序》中言：“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学，皋比勇撤，圣道中天。……余不肖，私淑有日，顷山中无事，取诸君子行实，僭为纂次，题曰《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余懋衡在明刻本《序》中解释道：“其书以‘关学’名，为关中理学而辑，表前修，风后进，用意勤矣。”明儒张舜典在《关学编·后序》中论述得更为透彻：“关学之编，少墟冯侍御为吾乡之理学作也。吾乡居天下之西北，脊坤灵淑粹之气自吾乡发，是以庖羲画卦、西伯演《易》、姬公制礼，而千万世之道源学术自此衍且广矣。……故此编惟列孔子弟子四人、横渠先生而至今，无不考而述焉。故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炳炳尔尔也。”以上诸家均取关学之广义。这种宽泛的关学概念，不能说明关学的时代性质和学派特点。其实，关学仅指北宋时期以陕西关中张载为创始人的理学或张载关学学派，即所谓狭义关学。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所使用的关学概念，多取其狭义，如言：“北宋时期陕西地方的关学，以张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关学当时与洛学、蜀学相鼎峙，但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



张载关学的特点，在政治上强调“学贵致用”，重视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学术传统上株守儒学，躬行礼教，以捍卫儒术、反对释老自任，盛行的时间限于北宋。张载之时，关学兴盛的情况不下于洛学，然而再传之后便寥落衰替了。张载卒后，“守横渠说甚固”的吕大临，“东见二程先生卒业焉”；“师横渠最久”的苏昞，则令其门人“诣程门受学”；至于其他的关学者，均早已“潜心伊、洛之学”，反映了关学向洛学转化的趋向，关学几乎可以说一传而亡。究其原因，在于张载虽“勇于造道”，以思想上的优势，傲然独秀于关中，然而在政治上始终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二程借助旧党势力扩大洛学思想影响的时候，他却“以素位隐居”于穷乡僻壤，洁身自好于新旧党争之外。因此，他也就不能为统治者所用。

张载以后，狭义关学渐趋衰熄，但因关学的洛学化和朱学北传，关中理学即广义关学却得以继续发展。有学者就认为，张载关学为明清实学思潮提供了学术思想渊源，为明清实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张载的影响

作为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张载，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思想体系中的矛盾，对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气本论，被罗钦顺、王夫之、戴震等唯物主义哲学家发展，形成了宋、元、明、清时代的元气本体论学派；人性论，则被程颐、程颢、朱熹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继承发展，形成了人性二元论学说。张载的其他思想，也被后继者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吸收借鉴、批评扬弃。张载及其关学中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财富。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要适当地学习其先进的思想内容，把“关学”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发扬光大。

张载当年讲学的横渠书院，即他入仕前读书的崇寿书院，今天已成为张载纪念馆。早在元代元贞元年（1295），横渠书院的旧址上就建成了张载祠。至1883年近600年间，张载祠共计修复了14次。1990年，政府正式立项修复张载祠，1998年基本恢复原有规模。整个祠堂以宋代仿古建筑为主，布局以主建筑为轴线呈中心对称。清康熙皇帝手书“学达性天”的匾额和无数名士游览留下的诗词文章均被保存下来，使得张载祠发展成为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旅游景点。

张载的墓茔位于今天宝鸡眉县大镇谷迷狐岭，南距张载祠（张载纪念馆）8公里，占地90余亩。宋代元丰元年（1078），弟子们将张载安葬于此，与其父张迪墓、弟张戬墓一起，形成了张氏墓群，属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载墓前树有清代“宋贤张横渠先生墓”碑一座，经过眉县人民政府的投资修整，还增添了石门、庙堂、祭祀台等建筑，成为当地著名旅游景点之一。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西安，应该在文化建设上以关学传统为精神内核，将关注点放在以关学为代表的软实力方面，以“民胞物与”的和谐理想与“四为”的实践丰富文化建设的精神性，提升整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在人文素质建设上也要重视关学的人文化成作用，学习张载关学崇实尚信、以礼为教的思想，不断提升人们的文明素质，让关学的思想精华渗透到每一个市民的血液当中，从而成就更为深刻更加有内涵的新西安。

（撰稿人　张　明　王翰儒）

北宋蓝田四吕

一、蓝田四吕

吕氏兄弟出生于关中书香门第，自幼博通诗书。祖父吕通，官至太常博士；父亲吕蕡，为比部郎中。吕蕡共有六个儿子，其中五子登科，获取过进士及第出身。这五子之中，又有四人成为千古大家，《宋史》为之立传彪炳史册。这四人就是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被尊称为“吕氏四贤”。而“四吕”中又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人因曾师从关学开山祖师张载而被称为“蓝田三吕”。



蓝田风光

（一）吕大忠——良吏治郡县

吕大忠（约1025—1100），字进伯（或作晋伯），为吕蔡长子，宋仁宗皇祐六年（1054）进士。最初官任华阴尉，后升至晋城令。熙宁年间，韩绛宣抚陕西，吕大忠被擢升为永兴路义勇，后又被升为秘书丞。在任期间，吕大忠曾向韩绛建议：国家不宜养兵太多，冗兵问题会导致国库空虚；应学习汉代屯田和唐代府兵制，“弓箭手近于屯田，义勇近于府兵，择用一焉，兵屯可省矣”。之后，吕大忠历任代州、石州知州，曾与辽朝求地使者萧素、梁颖在代州会谈，划分疆界。吕大忠面对萧、梁二人争做主席位的傲慢行为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每次会谈时，都“以礼折之，素、颖稍屈”。元丰年间，吕大忠为河北转运判官，“上生财、养民十二事”。元祐年间，又历任工部郎中、陕西转运副使、陕州知州等，官至宝文阁待制。在对西夏的态度上，吕大忠力主用兵，拒绝西夏的求和，认为“夏人强则纵，困则服，今阳为恭顺，实惧讨伐”。

吕大忠为人耿直，举止端庄，口无妄言，做学问虚心求教。程颐曾经夸赞他：“吕进伯可爱，老而好学，理会直是到底。”如，吕大忠有次遇到了曾为进士榜首的马涓。马涓骄狂轻浮，吕大忠便对其说：“状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称也，既为判官则不可。”且训诫马涓道：“今科举之习既无用，修身为己之学，不可不勉。”吕大忠曾路过一地州学，听人在讲授《论语》。他便正襟肃立，保持一位学者谦卑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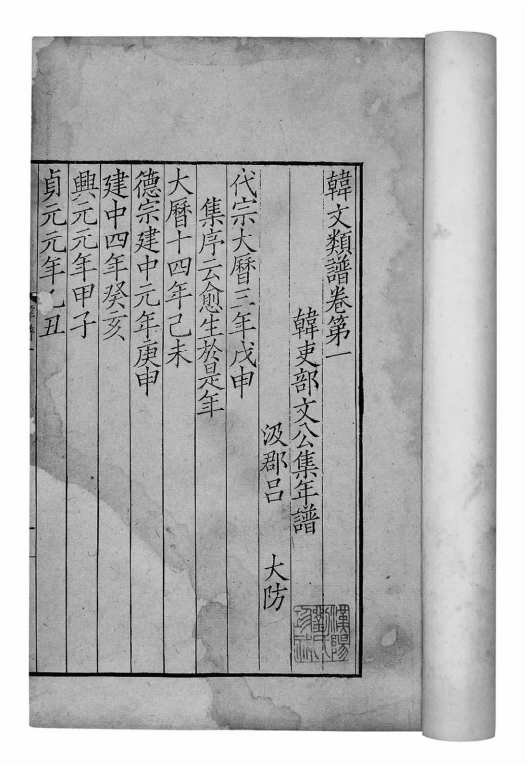
吕大忠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晚年潜心著书立说，有《前汉论》30卷、《辋川集》5卷、《奏议》10卷等，但均已散佚。

（二）吕大防——宰相持国柄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为吕蔡第二子。“身长七尺，眉目秀发，声音如钟”，一生严格恪守儒家礼仪规范，忠君保民。自幼受到祖父、父亲的影响，熟读经书，对《三礼》颇有研究，在当时“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皇祐元年（1049），吕大防进士及第，初任冯翊主簿、永寿县令。在任期间，他曾巧妙地为县民引水为渠，灌溉农田，渠水因之被称为“吕公泉”。而后历任著作佐郎、青城县令、盐铁判官。宋英宗继位后，吕大防改任太常博士、监察御史，曾上书指出社会弊病。《宋史》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为万世矜式”。宋神宗年间，吕大防先后被委任为淄州知州、泗州知州、河北转运副使、陕西宣抚判官兼延州知州、华州知州、秦州知州。元丰初年，改知永兴军。吕大防的仕途在宋哲宗年间到达了最高点，元祐二年（1087）授尚书左丞，不久又进为中书侍郎，封汲郡公，参与朝政。司马光死后，他接任宰相，位极人臣。为相八年间，吕大防拒绝参与元祐党人的争夺，一身正气，不结私党，“立朝挺挺，进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声誉。凡八年，始终如一”。绍圣元年（1094），吕大防被弹劾。后又由于参与“元祐更化”一再遭到贬斥，最

终在绍圣四年（1097）病逝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享年71岁。

在兄弟四人中官位最高，吕大防著述也颇丰，其中《吕氏家祭礼》1卷、《神宗实录》200卷、《政目》、《长安图》2卷、《长安图记》1卷、《西铭解》、《吕汲公文录》20卷、《文录掇遗》1卷皆散佚，不存于世；《杜诗年谱》1卷、《韩吏部文公集年谱》1卷、《周易古经》2卷现存于世。吕大防的著述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周易古经》带动了宋人恢复研究古《易》的热潮；杜、韩年谱为现存最早的年谱著作，开有宋一代年谱编纂之风气；《长安图记》则在历史地理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古长安的历史地理有着重要的价值。


韓文類譜卷第一
韓吏部文公集年譜
汲郡吕　大防
代宗大曆三年戊申
集序云愈生於是年
大曆十四年己未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建中四年癸亥
興元元年甲子
貞元元年乙丑

吕大防编《韩文类谱》书影

（三）吕大钧——操行闻士林

吕大钧（1029—1081），字和叔，吕蕡第三子。自小才思敏捷，文才出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初任秦州右司理参军，后来转任光禄寺丞、三原县令。吕蕡致仕后，吕大钧便随其父一同回乡，称病不再任职。自此，吕大临潜心研究理学，开始钻研和传授关学，教化乡里。吕大钧所作的《天下为一家赋》，描绘了他心中的理想世界："外无异人，旁无四邻，无寇贼可御，无闾里可亲。"晚年，担任王宫教授，官至宣义郎。元丰四年（1081），病卒于延州任上，享年53岁。

吕大钧和张载为同科进士，因慕张载学识渊博、博通古今，吕大钧便虚心求教，向张载执弟子礼，拜其为师。此举带动了整个关中学者向张载求学的风潮，最终形成了媲美洛学的关中本土学派——关学。张载去世之后，吕大钧也曾向洛阳二程求教，但是始终坚持张载的基本思想，成为关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吕大钧一生著述颇丰，有《蓝田吕氏祭说》1卷、《吕氏乡约》1卷、《乡仪》1卷，《诚德集》30卷。其中，《吕氏乡约》集合了吕氏兄弟几人的心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较为完整的乡规民约。《乡约》主要提出"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条基本道德规范，经过实践推行，"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对此，张载也曾高

兴地说道："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

吕大钧也十分注重教养儿子，严格贯彻张载的思想。其子吕义山颇有乃父之风，最终也成为了关学大家。

（四）吕大临——名儒扬关学

吕大临（1042—1090），字与叔，号芸阁先生，是吕氏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他无心仕途，没有像兄长那样登科为官，是六人中唯一没有获得进士及第出身的。但他一生潜心经传，研究儒家思想，也曾拜张载为师，成为关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去世之后，吕大临又求学于程颐，与同为程门同学的谢良佐、游酢、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因此，吕大临兼通关学和洛学两大学派的优点，实是学"洛学"长处，又守关学"注重气节""躬行礼仪"的传统，博采众长。吕大临志向高远，胸怀鹏鹄之志，曾作诗勉励自己"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反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唯传颜氏得心斋。"

吕大临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仅凭门荫做过太常博士、秘书省正字等职，且时间都很短。后来范祖禹以勤奋好学，人品高尚推荐吕大临为官。可惜未及为官施展自己的抱负，吕大临就不幸去世了。

吕大临深受家学师承的影响，治学带有浓厚的正统儒学思想；崇尚礼教，敦慕古礼，还能体察民间疾苦，对当朝政治有很多独到的见解。除了文章和学问，他的金石学造诣也颇为高上，可算是我国最早的金石学家。其著作《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对大量的当世珍宝、古物做了研究，还对青铜器铭文做了专门的系统研究，备受历代学者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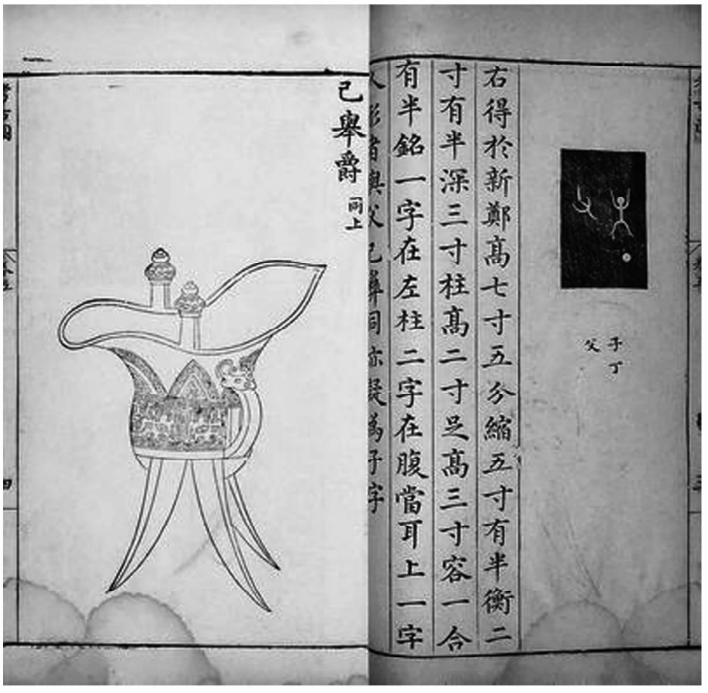
吕大临在诸吕中年岁最小，享年最短。他一直潜心学术，著书立说，现存于世的主要有《中庸解》《考古图》两部著作，大量的书籍如《吕氏易章句》《芸阁礼记解》《编礼》《吕氏老子注》等皆已亡佚，亟待后人辑注。

二、蓝田四吕的影响

（一）碑林的创建

蓝田四吕对金石学很有造诣，其中以吕大临成就最高，《考古图》一书奠定了他在金石学上的崇高地位，"宋人所作古器物图录的成熟、系统和完善，当以此为代表作，后世同类之书概莫能出其规范"。而吕大防、吕大忠则以草创了碑林而闻名天下，功在千秋。

唐天祐元年（904），唐昭宗迁都洛阳，之后韩建缩建长安城，将原国子监中的一部分石经迁于城内尚书省西保存。后梁时期，刘鄩镇守长安时，又将城外剩下的石经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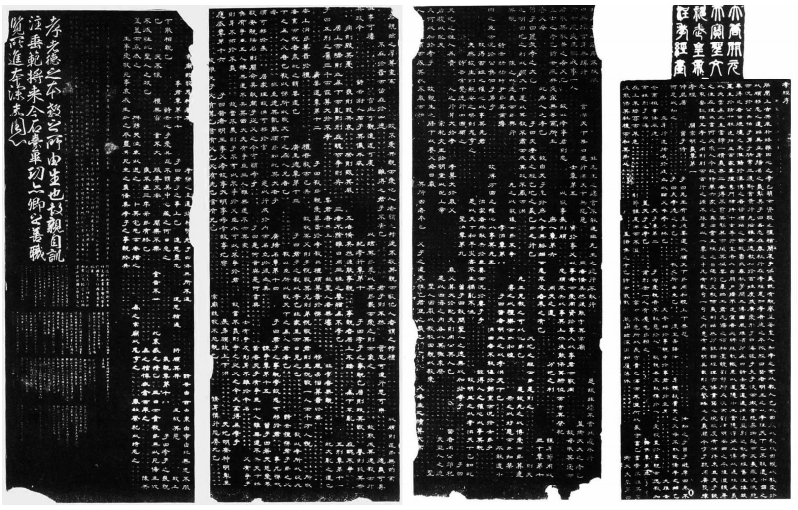
吕大临《考古图》书影



西安碑林

迁入城内，与上述石经一同保存。北宋时期，保存石经的尚书省被建成了文庙。北宋景祐元年（1034），范雍创办京兆府学，设于文庙内。元丰三年（1080），吕大防移文庙、府学于“府城之坤维”。元祐二年（1087），吕大忠将唐石经及其他碑刻迁于“府学之北墉”。此次迁徙的石碑，构成了现今碑林的主体。崇宁二年（1103），石经又随着府学迁于京兆府之东南隅，即今碑林现址。元祐二年吕大忠迁石经之举被认为是碑林的创建时

间，今碑林的镇馆之宝之一就是当时吕大忠迁入的唐《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吕大忠的迁碑，为今天全国最大的碑馆碑林博物馆奠定了基础，此举将永载史册。



石台孝经碑

（二）关学传播与著作等身

较之政治生涯，蓝田四吕最大的贡献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在经学、史学、金石学、地理学、文学诸多方面都有着耀眼的表现。其中，经学是四人最主要的研究学问，而关学更是他们的研究重点。四人当中，以吕大临在经学方面的研究成就最高，他出入于关、洛之间，求学于张载、程颐，可谓是集关学和洛学之大成，在宋明理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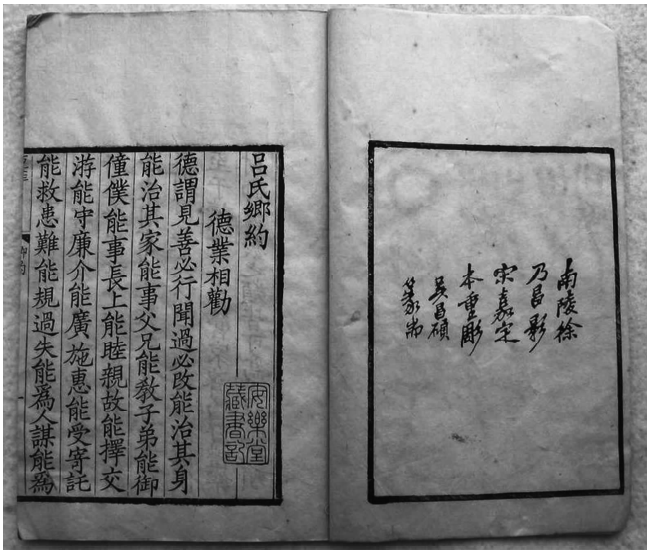
四吕的著作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其中一些重要的史料和史观有助于后人了解北宋时期的政治动向、经济军事和社会思潮等。四吕的著作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评价吕大忠“博极群书，为文尚理致，有益于用，章奏皆亲谓之”，吕大防“书命典丽，议者为在元绛之上云”，吕大钧“赡学博闻，无所不该，其文章非义理不发”。朱熹则称赞吕大临：“吕与叔《文集》煞有好处，他文字极是实，说得好处，如千兵万马，饱满伉壮。”

（三）礼学思想与《吕氏乡约》的意义

蓝田四吕礼学思想上承袭了张载、二程的主张，其中受张载的礼教影响更大。他们并不是古板地继承先师们的思想，而是真正做到了将礼学思想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四吕在礼学思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把礼付诸于现实生活中，真正地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最为著名的就是《吕氏乡约》。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乡约，是邻里乡人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制度。《乡约》虽由吕大钧一人制定，但是却为吕氏兄弟共同遵守推行。《吕氏乡约》推行时间不长，北宋就为金所灭亡。到了南宋时期，《吕氏乡约》经朱熹之手再度重放光彩，王阳明著名的《南赣乡约》就是由《吕氏乡约》增订而来。清末民国时期，蓝田大儒牛兆濂以《吕氏乡约》为基本教材在蓝田讲学 8 年之久。当代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忠实即以牛兆濂为原型，塑造了《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形象，且其中《白鹿乡约》就是《吕氏乡约》。梁漱溟在山东推广“乡村教育”，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吕氏乡约》的影响。

《吕氏乡约》把封建的道德规范转变为具体的行为规范，以礼仪的形式发挥封建纲常礼教的社会作用。礼仪变为道德的外在，具备了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等级名分的社会职能。宋明理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哲学化的伦理说教与现实的礼仪形式相结合，并通过礼仪这个中介对社会各阶层进行道德禁锢。《吕氏乡约》是宋明理学第一部有关日常生活的成体系的礼仪规则，涉及处世、交往、修养、义务等各方面，在宋明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吕氏乡约

蓝田四吕的礼学思想和《吕氏乡约》对于现代社会也有重要的价值，在今天西方文化及其伦理道德的冲击之下，我们该如何坚守和捍卫传统文化，将五千年的礼仪文化融入到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社会中，并促进社会的转型和和谐社会的建立；如何将礼的传统观念贯穿到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吕氏乡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范本。

（四）吕氏家族墓地

2006—2009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对蓝田县五里头村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进行了勘探及发掘，出土遗物 700 余件组。通过出土的墓志铭文可以确定大部分墓葬主人的名讳身份，并以此为根据排列出了吕氏家族墓葬的分布次序。蓝田吕氏家族墓地中共埋葬五代人，使用时间在北宋中、晚期的 40 余年之中，吕氏兄弟无疑也在其中。

吕氏家族墓地的发掘，不仅较完整地揭示了北宋时期吕氏家族墓地的全貌，而且为研究北宋家族墓地的构成提供了宝贵资料。出土的众多墓志铭文对研究北宋家族墓葬礼制、北宋官制、科举考试制度以及吕氏家族定居陕西蓝田后的发展脉络都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撰稿人　张　明　王翰儒）

鸦片战争中陕人“死战”与“死谏”

一、武死战——陕甘军队奋勇杀敌

1840 年，英国政府借口保护对华贸易，悍然出兵发动了对华的侵略战争，史称“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在战争中战和不定，清军实际上已无力抵抗外来侵略，政治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造成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战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先后从陕甘调往前线的军队有 1 万多人，并从陕西调去大量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此外，清政府为了筹措军饷，除从陕西调拨盐课外，还令陕西绅民捐输“海疆经费”100 多万两白银。

1841 年（道光二十一年）8 月，英国侵略军头目璞鼎查率领军舰攻陷厦门，并进而北犯江浙沿海。清廷惊慌失措，除饬令沿海各省调兵设防外，又调内地各省军队前往救援，命固原提督胡超统率陕甘兵 2000 名迅赴天津山海关一带驻扎，以卫京畿。又调陕甘军四五千人，开往浙江之杭州、绍兴、乍浦、慈溪等地，以备反攻英军。

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3 月，负责浙东军务的扬威将军奕经仓促出师，反攻宁波、镇海、定海三城。副将朱贵率陕甘河南兵 1500 人由慈溪攻镇海。但因进军计划事先遭泄露，英军早有准备，前锋进攻失利。朱贵遂率陕甘兵 900 人退守慈溪城西之大宝山，与刘天宝、谢天贵等军互为犄角。3 月 15 日，英军 2000 多人自宁波攻慈溪，其他守军相继溃退。英军从三面包围大宝山，倚仗炮火优势疯狂轰击。陕甘兵三面拒敌，“无不以一当百，白辰至申，饥不得食，渴不得饮，誓死格斗”多次打退英军进攻，打死英军多人，击伤英军军官 4 名，终因后援不继而失败，朱贵与部下将领 30 余人、士兵三四百人皆英勇牺牲。

英国侵略军阴谋侵入长江，切断漕运，迫使清政府投降，为此，转而进攻乍浦。乍

浦是江浙两省海防重镇，驻军总计七八千人。其中有汉中镇总兵德坤率领的陕甘军1000多人防守在常山一带。1842年5月18日，英军在28艘军舰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分三路强行登陆，防守在黄山岭、唐家湾的军队相继溃退。德坤率陕甘兵800人前往救援。在唐家湾、常山和英国侵略军展开激烈战斗，连续击退英军3次进攻。终因在牛角尖、檀树泉登陆的英军从背后突袭，背腹受敌而失乍浦，不得已退守平湖。

在唐家湾、常山战斗中，陕甘军将士“尤为奋勇，抬炮亦极得力”，如都司韩则录“身受九伤，犹复督催力战”。此次战斗，由于陕甘兵打头阵，因此伤亡较大，士兵阵亡者367人，将佐7人，分别占整个乍浦战役阵亡总数的1/3以上。在唐家湾、常山战斗中，陕甘兵毙敌200余人，事后英国侵略军心有余悸地说：“我们这天的损失超乎寻常的大”。

乍浦战役之后，英军攻陷吴淞口和上海，阴谋溯江上侵。陕甘兵900多人与豫军1000余人，在寿春镇总兵尤渤率领下自浙东前去救援，阻英军于松江。汉中镇总兵德坤亦率所部1000余人开往苏州御敌。1842年7月，英军攻陷镇江，进逼南京。清廷又调陕甘军1000余名自陕拔队驰赴苏北黄河、运河交会的清江浦驻防，以防英国侵略军北犯。1842年8月，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鸦片战争结束。陕甘军于1842年9月至1843年3月分别自沿海各地撤回。

二、“文死谏”——王鼎“尸谏”林则徐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之中主和派把持朝政，他们对英国侵略者妥协退让，对抵抗派则极力打击排斥。禁烟有效，抗英有功的两广总督林则徐先被革职，后来又“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广大爱国军民对此无不哀伤愤慨，怨声不绝。即便在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稍有正义感的官员也莫不“骂琦善误国及穆彰阿之妨贤，而惜林公之不用”。林则徐的旧友们“不期而会”，准备筹款为之“赎锾（huán）”。协办大学士汤金钊和太常寺卿唐鉴不避斧钺，积极为林则徐辩白。而东阁大学士王鼎“尸谏“林则徐更是轰动一时的事件。

王鼎（1768—1842），字定九，号省崖，陕西蒲城县人。王鼎少时家境贫寒，学习勤奋，崇尚气节。25岁中举人。后来赴京考试，大学士、韩城人王杰以同族关系欲罗致入府，他婉言谢绝，王杰赞叹说：“观子品慨，他日名位必继吾后”。1796年（嘉庆元年），王鼎考中进士，授编修。以后连年升迁，迭任礼部侍郎、吏部右传郎，刑部左侍郎等职。王鼎在嘉庆朝是有名的干员。由于他才德兼优，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嘉庆皇帝对他

说：“朕向不知汝，亦无人保荐。因阅大考考差文字，知汝学问。屡次召见奏对，知汝品行。汝是朕特达之知。”嘉庆皇帝特意留王鼎在京为官，随时“差往各省查办事件”。

道光帝即位后，王鼎由于在理狱、治水、平叛、盐政诸方面功绩卓著，被授为军机大臣，辅佑皇帝处理要务，后因他赞画有功，1828 年（道光八年）“加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1838 年（道光十八年）“拜东阁大学士”。成为道光朝“力持朝纲”“赞襄攸赖”的重臣名相。1840 年（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这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候，王鼎毅然站到了抵抗派一边，力主抗战、反对妥协投降。

在1838 年（道光十八年）清朝讨论禁烟问题时，王鼎支持林则徐等提出的严禁鸦片的主张，并向道光帝进言：“林则徐多谋善断，有为有守，堪当重任。”道光帝采纳了王鼎的建议，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在林则徐离京南下广东时，王鼎还设宴为他饯行，对林则徐禁烟寄予很大希望。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于1840 年 9 月，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改派琦善去广州署理两广总督。琦善对英国妥协投降，1841 年（道光二十一年）2 月，他因为擅自割让香港被革职锁拿进京，王鼎以军机大臣、大学士兼管刑部的身份，奉旨会审琦善。在上奏道光皇帝的奏折中，王鼎说：“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还将参与此案的卖国分子鲍鹏等一并缉拿进京下狱。王鼎在朝中以自己的影响和地位，打击投降派的卖国活动，支持抵抗派。由于朝野人士纷纷保荐，道光帝命林则徐以四品卿衔留前线参与军务。

1841 年 5 月，奕山在广东打了败仗，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道光帝不查办奕山，反而把广东营务废弛的责任归罪于林则徐、邓廷桢，6 月 28 日将林则徐“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在朝领衔保奏无效。此时正当黄河在祥符（开封）决口，王鼎遂以林则徐熟悉河工为由，奏荐林则徐襄办河工。道光帝准奏，但道光随后也令王鼎出朝，前往河南总督河工。当王鼎来到被水围困的开封时，文武官员集议弃城迁徙，又借口“水势方涨”，反对堵口。王鼎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黄河水横流，会使下游江淮—带尽成泽国，危及千万民命，因此主张坚守开封，尽快堵住河口。他以 70 多岁高龄率领僚属昼夜巡查守护，使危城开封得以保持。王鼎亲住工地督办堵河工程，曾连续 8 天未回行馆，疲劳时即睡在肩舆里，由于过度疲劳，旧疾屡次发作，但仍坚持不肯休息，林则徐“追随星使（王鼎），朝夕住坝”。在此期间，王鼎对林则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十分敬佩林则徐的为人和才干，对林则徐的意见“倾诚按纳”。他们齐心协力。苦战 6 个月，终于使河口合龙。

在治河期间，王鼎上奏道光帝说：“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希望能按照惯

例，论功行赏，重新起用，最少也可以将功折“罪”，赦免流放。可是，早已倒向主和派的道光帝，根本不理会王鼎的奏荐。在河工完成后的庆功会上，王鼎让“林居首座”，并一再表示“还朝必为荐之”。然而，视林则徐为眼中钉的主和派唆使道光帝不待王鼎回朝，于大坝合龙的次日就谕令“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闻命后，“定九大骇”，忿忿不平。而林则徐对此结局早已料到，所以闻命后情绪“自若”，他一方面深感王鼎知遇之恩，劝王鼎“相公且莫涕滂沱”，“休为羁臣怅荷戈”；”另一方面，他对王鼎回朝抱有很大希望，“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上方”，幻想道光帝能回心转意，支持王鼎在朝中伸张正义，严惩佞臣。林则徐从祥符工地起程西戍，王鼎欲留不能，只好相送于河干，两人依依不舍，挥泪而别。王鼎料理河工善后事毕，奏请返京，道光帝因其“积劳成疾，命缓程回京”。但王鼎为时局所忧，不顾疾病缠身，日夜兼程赶回北京，上朝“力荐林公之贤”，吁请朝廷重新起用，但道光帝根本听不进去，穆彰阿还诋毁林则徐禁烟招衅，“不堪录用”。穆彰阿是朝廷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当时“权倾朝廷”，对道光帝影响很大。因此，王鼎在朝中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屡次弹劾穆彰阿“妨贤误国”之罪，在议和问题上“侃侃力争，忤枢相穆彰阿”，反对妥协投降。王鼎每见穆彰阿“辄厉声诟骂”，“历数其罪，甚至当着道光帝及同僚的面，王鼎也是“盛气诘责之，斥为秦桧严嵩”。但是道光帝此时已下决心妥协求和，“将办理羁縻事宜，专交耆英办理”。所以王鼎屡屡廷争，已使道光帝大为不满，当王鼎再度劝谏时，“上怒，拂衣而起”，王鼎“终不获伸其说”。道光帝还降旨一道，命王鼎“休沐养疴”，不让他上朝说话。在用尽了一切方法都不能使道光帝回心转意时，王鼎愤怒交加，思量再三，“欲效史鱼尸谏之议”，以自己的死来促使道光帝醒悟。1842 年 6 月 30 日（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这位具有民族血性的爱国者，“草疏置之怀，闭阁自缢”。以死规谏道光帝：“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先开，穆不可用，林不可弃也。”王鼎的尸谏使穆彰阿等人惶恐不已，忙派其同党军机章京陈孚恩对王鼎家眷危词恫吓，索取“遗疏“原稿销毁，另撰遗折“以暴疾闻”。道光帝虽“疑其卒暴”，但并没认真追究，终不知尸谏之真相。

三、影响与启示

陕甘军队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在前线奋勇杀敌，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历史将永远铭记那些为维护民族尊严而英勇战斗的爱国主义将士们！

王鼎一生“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卒之日，家无余赀。”王鼎



王鼎画像

历任嘉庆、道光两朝，刚正廉洁，名重于时。鸦片战争中，他坚决主张武力抗拒侵略，支持保荐林则徐，弹劾痛斥穆彰阿等妥协投降势力，成为杰出的爱国志士，特别是他在清朝已经决计投降、“议和”将成之际，不惜牺牲自己而进行“尸谏”，更是悲壮感人。王鼎“尸谏”虽未达到目的，但他为国家民族利益“忠贞致身”的精神，令人敬慕，值得尊敬。

陕西维新领袖刘古愚

一、刘古愚的政治维新主张

刘古愚即刘光蕡（1843—1903），字焕唐，古愚是其别号，出生于陕西咸阳天阁村一个“世代书香”的地主家庭。光绪元年（1875）陕西乡试举人，曾一试进士未中，便“绝意仕途”，潜心教学，先后主讲于泾阳、泾干、味经、崇实诸书院长达三十余年。以“教士有方”，被清政府加赠国子监学正衔。后因在味经刊书处刊书的成绩，晋五品衔。平生著述后人辑为《刘古愚先生全集》。

刘古愚早年崇尚王阳明的学说，后来对清代关中学者李二曲、杨双山的学说极为推崇。平日很留心国事，早在咸、同年间赴省城及后来赴京师应考时，目睹西方侵略者入侵后的中国社会情况，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和科学发达有所见闻，“始知西人富强，以制造精奇，原本算术”。刘古愚在各书院任职期间，协助陕西地方官吏推行过一些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设施，如办团练、拟定保甲制度，试办蚕桑、白蜡，设立义仓、义塾等。

清朝末年，政治黑暗，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对此，刘古愚“胸弗谓是”，愤然曰：“中国之时势岌岌矣，孰为之？中国自为之也。”他指出，中国当前已经到了“政刑不修、纪刚颓废”的程度，社会危机日趋严重。面对这种严峻局势，“中国非变法不能自立”。他认为，社会之坏，首先坏在人各为私。“私心炽而大道不明，……我朝不能改革而更张之，以至今日而适承之弊也。今中国事事不如西人，而其大端则朝野上下之间，各谋其私，以成瓦解之势。”

甲午中日战争时，刘古愚感到“中日一战，情见势绌，各国无不垂涎中国”。在旅顺、威海卫早已失守，津沽不安的处境下，为了确保清王朝的安全，他采用“数年来，谋国多有西迁之说”，在《代陈观察上端方书》中，向当局建议迁都西安，并提出在渭河设立水师，在河套设立军屯，在潼关设立壕堑等备战措施。而且，曾亲赴潼关一带勘察地形，为朝廷西迁作准备。同时，他又著《壕堑私议》及《管子内政寄军令说》等篇，主张寓兵于农和实行全民皆兵，说“中国之弱，至今日之势，非行举国皆兵之制，

不足以起废疾”。

中日甲午之战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当时，帝国主义侵略的触角，已由沿海通商口岸延伸到了内地。马关条约中有允许日本人运机器在中国内地制造货物售卖一款，深处内地的刘古愚已感到“乃不曰通商口岸而曰内地，盖通商口岸多近水际，其利已为西人所据……余利未尽为外人所夺者，惟湖南、山西及陕甘……”每当他“或论时局艰危，则慷慨愤激，涕洒横集”。于是他“究心于西人政学所以致富之源”，在陕西范围内筹划经营，以期“为朝廷留一方净土”。

此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学会、宣传变法。刘古愚通过自己的学生、保国会会员李岳瑞、陈涛等，于1896年和1897年先后与康、梁取得联系，进而读到了康有为的《强学会序言》《新学伪经考》，以及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宣传变法的《时务报》《知新报》《新湘报》等书刊，使刘古愚“恍然于中国受病之由”，并得到了一些使中国“回生之方”，在刘古愚“无可为计”的爱国思想上，增添了许多维新内容。此后，刘古愚在陕西戊戌变法时期提出了许多维新主张，与全国维新运动相呼应，并在全国影响很大，因而在评论戊戌变法时，常以“南康（康有为）北刘（刘古愚）”并称，由此可见刘古愚在维新变法时期的影响之巨大。

二、政治改革主张

在政治改革方案中，刘古愚认为中国的富强之道，就在于去君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但他的一切维新主张都是在维护皇权的原则下提出的。他认为“中国诸事皆可为，唯患上之左右牵掣，下之虚应故事”。所以主张加强皇帝的实权和各级政府的职能，自上而下改革各项弊政，中国便可“奋然自兴”。他以办新学为例说：“使州县下一令曰：‘各乡均设学，有不设学及子弟不入学者罪之。乡人从乎否乎？’又下令曰：‘凡学，书算兼通，文武并重，有不如是者罪之。’乡之蒙师从乎否乎？”刘古愚希望通过师生君臣之道来加强皇帝的权力和提高政府效能，特别是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被囚，使得刘古愚更渴望着一个有实权的皇帝。

刘古愚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优于中国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提出过：“外洋政事均决于议院，中国不顾民心得乎？”又认为“宪法可使自天子至于庶人，各守其范”。“暴君污吏亦不敢鱼肉下民。”“人法相维，而世久安长治矣！”因而主张“通上下之情”，这样“上修之为政，下学之为艺……岂外洋所能敌哉”。不过，刘古愚标榜立宪，却并不主张“求宪法于西国”，他认为“西国所谓宪法”，即“中国所谓洪范”，中国古代早已有之。至于立宪的最终目的，他认为是在使“君权乃不他移”。而对于伸民

权，他却持反对态度，并担忧“自译书盛行，自由平等之说，嚣嚣横议，不可遏抑”的情况，认为“等则必有尊卑，权则自分轻重……使贤者居上以临下，不肖者居下以奉上，乃安而无倾。不平之平，平之至也”。如果“妄者乐其平而妄其等，昧其权，则大乱之道矣”。基于这种认识，一直到晚年的著作中，他还用立宪的口号抗拒已经兴起的民主革命运动。由于受传统文化的束缚，刘古愚对西方近代的“民权”“自由”“平等”学说存有异议，曾提出“尊卑有序”“贤不肖有别”的主张。但他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显然突破了封建思想的藩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

刘古愚认为政治改革的关键，在于尚贤用人，使贤者安于上位。他说，“存亡之要在任人也。……国之所以亡，在于杀贤拒谏，国弱民困之大端，而其所以至如是者，任用失人也。盖任用失人则是非活，是非活而后有杀贤拒谏之举，而民乃以困，国乃以弱也。……可见国之存亡惟在所任之贤否也”。在他看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皆为贤者，朝廷应对他们加以掇升，使其各得其位，发挥作用。

三、社会改良主张

在社会风尚改良方面，刘古愚首先劝止种植与吸食鸦片。刘古愚感到“自海禁大开之后，罂粟毒卉，大妨谷土”，“陕人沉迷洋烟，耗产失业，或贪种植之利，流毒弥广”。为了抵补“中国银钱日漏外洋”和消弭鸦片的流毒，达到“御侮”和“利民”的目的，刘古愚在陕西极力提倡蚕桑事业，认为“蚕桑利大，苟著成效，乡人自必弃彼（鸦片）业此（蚕桑）”。他一方面劝令家人亲友，种桑养蚕，取丝织绸，以扩大影响，对热心劝办蚕桑的地方官吏如三原县令刘青藜等则多方赞助宣扬；另一方面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戒食鸦片的办法。如在味经书院院规及励学社章程中均明文规定，凡入学入社者，不得吸食鸦片，否则除名。对移风易俗作了相当努力，对当时的陕西社会起到了良好作用。

刘古愚还劝止妇女缠足。1897 年，刘古愚与门人邢瑞生、柏厚甫等在报纸上看到梁启超《戒缠足会序言》，对劝止妇女缠足，深表赞同，认为：“女子之足，果犯何律?”而“束缚其足……是真以妻女供玩好也”。乃作《劝不缠足会后序》，在陕西大力宣传，劝止妇女缠足。当时陕西风气未开，他便先从自己的女、媳及其门人的妻、妹中开始推行，相约如因天足难嫁者，师友之间，互通婚姻。以致后来刘古愚及其门人间多有姻亲关系。以后陕西不缠足的风气渐开，与刘古愚等人的提倡是分不开的。

四、教育思想与实践

刘古愚一生将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教育救国”，并为之终身奋斗。他认为“今日中国之患，不在外人之富强，而在我国之贫弱，亦不在我国之贫弱，而在我民之顽犷，顽则无礼义而昧时势，犷则逞蛮野而触祸饥”，“今日贫弱之祸谁为之？划兵吏农工商不学为之也……故兵不学而骄，吏不学而贪，农不学而惰，工不学而拙，商不学而奸欺”。兵骄、吏贪、农惰、商奸、工拙已成为社会之大害，造成中国社会的贫弱不堪。

在《与沈淇泉学政书》中，刘古愚恳切地写道：“今日中国不患上无能文之学士，而患下无作事之兵、农、工、商。故愿公以教启其识，即以收其心而聚其气，此今日之急务也”。他积极主张教民之学，认为“国势贫弱，唯学能救之。故国之贫弱，有待于大兴教育，特兴学以化民成俗为之”。他认为“官、吏、兵、农、工、商各明其学……”“各精其业，即各为富强之农……故今日救中国之贫弱以设立学堂，兴办教育做起始为须要”。

同时，他认为，“民生之困，在官师政教分途，仕与学不相谋……所以治日少乱日多也”。因此，他主张广开学校，而且在实际教学中提倡讲学无门户之分，男女并教，以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他认为只要“官吏兵农工商各明其学”，“各精其业，即各为富强之事”，这样，整个中国便可富强起来。在此思想基础上，刘古愚进一步提出了“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主张：“一村设小学，其师为闾胥，管一村之政令教化；……一县设县学，其师为县令，管一县之政令教化……”以至府、省、京师类推。不仅可以“寓西人议院及地方自治之规模”，且能使“无人不学，无官府非学校”。对于培养人才的好处是：“治事即为学，则学者无影响之见，依稀之谈，不为记诵词章之习，而真才出矣！”对于社会政治的好处是：“天下之官民皆如师与弟子，而天子则以天下之官民为弟子，民隐焉有不上达？主泽焉有不下究？隔阂去而吏弊自何而生？涣散去而人心焉有不振？一故大同之运尚，何敌国外患之足虑哉！”刘古愚这种用教育改造政治，以学治代替吏治的方案，目的虽为加强封建统治，但却触及封建统治权，把衙门搬进学堂，让书生去坐衙门，自然不会为统治者所接受。刘古愚的爱国教育思想虽然不可能成功，却对我国教育方针的创新和教育制度的改革起着不容忽视的启示作用。

“除虚文、修实学”是刘古愚维新教育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说：“先儒教人读书，在内返诸身，予谓尤在外验诸世。”对于古与今的关系，他认为：“学于古者，必以身所值之时习之，习之而得古人立法之意，则以应当世之变，然后推行无弊。”这种学以致用和古为今用的认识，反映了刘古愚学术思想上辩证和历史

的观点。从这种认识出发，他“每治一学，辄欲施之实用，非是，则弗治”。因此，对于当时的括帖记诵，训诂考据之学以及“空谈其理，而身不能为其事”“驰于利禄，溺于词章”的读书之士，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中国之衰是“由于空谈性命，而不证诸实物”。而“西人之学，皆归实用，虚不如实，故中国见困于外人也”。

所以，他提出整顿学校教育的原则：“坐而诵不如起而行，课其文不如验其事，即以虚不如求之实，考之古不如证之今，谈天地氤氲之奥，不如测算厘度之实而有用也。”他甚至提出了“披神农之籍，何如请于老农，读种树之书，何如学于老圃”，以及“习八股诚无用，学算而不能制器，亦画饼也”的讲求实学的主张。在他三十多年的教学活动中，始终贯彻着这种精神。从光绪十一年（1885）开始在径干书院募款建立“求友斋”，光绪十八年（1892）又设刊书处，以后更在味经书院时务斋创设“味经讲学会”，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三原建立具有鲜明维新色彩的“励学斋”，均以灌输西方先进自然科学和宣讲国内外时事为目的，为当时的陕西培养了大批讲求实学和从事救国御侮活动的人才，在陕西地区传播了有实用的西方科学文化。尤其难得的是，刘古愚在书院附设复邠机馆，筹设机器、纺织、轧花及制蜡、缫丝等工场，有意识地供学生观摩实习。这种试图将学与用结合起来的教育方法，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纵观刘古愚的爱国教育思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古愚没有能够完全冲破时代局限，但他在当时能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之中，尤其是为了拯救陕西民众所进行的教育活动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之魂。

五、经济主张与实践

刘古愚大力提倡“教育救国论”，但他又认为，只有同时举办实业，兴办近代新式企业，教育救国才能见出实效。为此，他将“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比做一车之两轮，只有同时并举，中国才有希望。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大机器生产在东南地区已经出现，上百家近代新式企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清政府的压迫下顽强地生存着。然而，此时的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新式企业寥寥无几。有鉴于此，刘古愚作题为《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的文章，指出：“机器入中国，……运之所趋，唯中国不能阻，即西人亦不能秘其术而不令其入中国也。……今西人数十国持其舟车大炮，环伺中国，中国人虽众，而驱血肉之躯以挡大炮，仁者忍为此乎？不忍而其之，非机器不为功。”他批评洋务派只重军用工业，不重民用企业，“军器，杀人之器也，西洋制造日用之机，则生人之器也，杀人之器欲效法，而生人之器无效法，不亦颠倒乎。……故效法西洋之制造军器，必先效法西洋制造日用之器”。

他指出，列强“今则以商务夺我之财，以教士诱我之民，……故欲救时弊，非洞悉西方之政治、工艺不可……”他建议学习西方集资之法，联官民于一气，创办民用工业，使中国走上富国之路。刘古愚认为“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漏危日甚，非注重实业，为根本之计，不足以救贫弱”。特别是“马关条约”中有允许日本人运机器在中国内地制造的规定，使刘古愚积极采取“自收利权”，“杜外人窥伺”，“以占先著”的办法，提出了“聚商力”和自购机器设厂制造的主张，试图在陕西发展机器生产来抗拒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刘古愚发展陕西近代新式企业的主张，遭到当时顽固派的攻击，说他：“堂堂大儒，推崇工商末事，有损学者体面。”对此，他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刘古愚除在泾阳设立复邠机馆，以手工工场的形式经营养蚕、缫丝、纺绸、制蜡之外。1896 年，他在陕西学政赵维熙的支持下，与门人邢辽英倡议集资 20 万两白银，筹建“陕西保富机器织布局”。他亲自撰写《陕西保富机器织布局简章》，积极向地方绅商宣传举办工业之利和保护民族权益之要义。他说：“集股不拘籍贯，此为保全中国权利起见，非专为陕谋，……凡我中国人宜人人竭才智为之。”希望得到外地陕籍官商的同情与支持。

机器织布局股份定为大、小两种，大股每份一千两、小股每份一百两。1897 年春，他派门生陈涛、杨慧、孙征海三人前往湖北、江苏等地考察，学习办厂经验和购置机器设备。不料集资困难，大户观望，小户无力，入股者寥寥无几。无奈之下，他只好托在京为官的门生李岳瑞等人向豫丰太银号借资 20 万两，但因无人作保，集资未成，仅采购到几架日本轧花机，“虽人力操作，然每日每人可轧花二百斤左右，当七人之功效”。刘古愚再筹资金，前去湖北又购回十余架，在泾阳县城西门口办起一所机器轧花厂，四乡棉农，纷至加工，此后，“机器轧花风气日开，数年之内遍及渭北一带”，为陕西民间采用外洋机器生产开了先例。

在采用新机器的同时，刘古愚也积极采用新学。他认为：“工艺为救中国贫弱要策。”甚至认为：“吾国政治受人牵制，异日一线转机，岂不在工艺乎?”于是，一方面积极培养工艺人才，在味经、崇实诸书院内，设立兴艺斋、工艺斋，教授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和技术，内容包括算术、电讯、化学、医学、天文、地理、外语及轮船、舟车、枪炮制造，“以裕制器尚象之源”。并在书院设有制造区一处，作为学生的实习场所，一方面利用味经刊书处刊行各类科学书籍，传播科学技术，扩大新学影响。当时，在他提倡下，学生张某能自制经纬仪等测天器，田某能仿制日式轧花机。他自己也曾试制成纺纱小机，“纺纱快利，旧车比之，十不当一”。其他如在蚕桑、制蜡等技术工艺方面，刘古愚也曾精心钻研，煞费苦心。

六、影响与启示

刘古愚从事社会教育三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培养出了一批实用性人才，出版了一批实学著作。刘古愚的学生随当时的陕西布政使测绘了陕西地图，测绘了礼泉、三原、泾阳等县的水利渠道，日后刘古愚的学生，陕西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在三秦大地上大修水利的源头即在此处。刘古愚培养的这一批实用性人才为西北开发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



刘古愚

刘古愚的维新思想，反映了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社会大潮流之下的陕西社会的发展趋势，代表了陕西当时一部分封建知识分子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对配合全国维新变法运动，促进陕西知识分子的思想觉醒，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他本人也因此遭到清政府的疑忌。戊戌政变后，刘古愚被陕西地方当局定为“康梁新党”，罢去了味经书院山长职务。

鉴于戊戌变法时期刘古愚在陕西提出的这些维新主张，当时曾一度有所谓“南康北刘”的称道。虽然刘古愚和康有为相比，无论思想、言论、作为、影响及其在维新的程度上，刘古愚都不如康有为的。但僻处陕西的刘古愚，能进入当时维新领袖行列，正反映了维新思潮在当时的全国和陕西的普遍存在。

（撰稿人　路中康）

戊戌维新时期的陕籍京官

一、“言诸新政最多”的宋伯鲁

宋伯鲁（1853—1932），字子纯，晚年号芝田，又号芝栋，陕西礼泉人，他自幼饱读经史，光绪十一年乙酉举人，十二年（1886）丙戌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1896 年补山东道御史，此后为掌山东道御史。



宋伯鲁

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宋伯鲁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变化。甲午战争之前，宋伯鲁是一位理学修养较深的传统知识分子，他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应墨守列祖列宗的清规戒律，视新生事物为奇技淫巧，正襟危坐在清朝这座摇摇欲坠的宝塔之上层。但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的政治更加腐败和黑暗，社会危机也日甚一日。在京师任职的宋伯鲁看到这些状况，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担忧。虽然，此时他已经年近半百，还是毅然抛弃了陈旧迂腐的观念，与这个时期的许多开明知识分子和官绅一样，希望中国在外患日迫、国势危急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挽救民族危亡和社会危机，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甲午战争后，中外交往更加频繁，驻外公使、留洋学生、外国传教士、外交官及商人，都将西方的社会学说、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介绍到中国。宋伯鲁对此很感兴趣并悉心研究，他根据自己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了解，在上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写道：“曾考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他把三权分立的政体形式向光绪帝做了形象的比喻：“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若手足，司法者

譬若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他说：“要骤变新法，绝无旧例可循，非有论思专官，不能制定新制。”他建议特开立法院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入院办事，皇帝每天到立法院，由王公大臣作为参赞，共同商议变法大大事，“草定章程，制定宪法”。

宋伯鲁对西方“三权分立”政体形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认为泰西诸国之所以富裕强盛，关键问题之一是采取了先进的政治制度，而中国积弱，也正是出于政治制度腐败落后。他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仿照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向光绪皇帝描绘了一幅君主立宪的画面。他主张设立的“立法院”与康有为主张设立的“制度局”具有类似的性质，其实质是总揽变法维新大权的新政机构，这反映了宋伯鲁主张改变封建专制的积弊，赶上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

在经济思想方面，宋伯鲁向清政府提出了“开源”和“节流”两项主张。在1897年4月，他奏请“添扣各项减平以裕利源”，以挽回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根据他的奏折，户部议复，皇帝降旨，从1897年起，“各项经费津贴新费口粮及一切正杂各款，凡向支库平者、每两核扣六分，统按二两平发给”。在厉行节流的同时，宋伯鲁认为，“筹款之法，节流不如开源”，而开源之选有二：一是派人到美国集资，然后回国开办铁路矿务，待开业经营之后，照章向清政府缴捐纳税，政府便可以利用这部分收入创办各项新政。二是对已经开办的并且开始盈利的工矿企业加以扩展，尽快收到经济效益，以渡过目前的财政危机。

宋伯鲁认为的“节流不如开源”，这种经济主张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因素。他一反几千年封建社会“崇俭节流”的传统观念，提出开源的主张，并且试图引进外资，利用外资来发展近代新式工矿企业，这一主张是进步的，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与康有为等人“富国养民”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方案是基本契合的。

宋伯鲁与其他维新志士一样，认为要变法维新，废除八股科举取士制度是当务之急。他曾于1896年12月刚入都察院时向皇帝上一奏折：“请乡、会试第三场及各项考试策题，专问时务。”他写道：“方今国事艰危，人才乏绝，推其原因，皆因科举仅试八股之故。”八股制度，埋没人才，摧残人才，使士子读书数十年，“尚不知汉唐为何代，郡县为何名”。这样，他们怎么能够“通万国之情形，考中外之法”？八股考试制度极其严重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学术思想界呈现出一片黑暗沉闷的局面。

在激烈抨击了八股考试制度的诸多弊病以后，宋伯鲁又把中国和西方各国教育制度加以对比。他认为，西方各国都非常重视向学生教授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能够实际应用的知识和技术。所以，西方诸国自童幼至弱冠，皆教之以算学、图史、天文地理、化光电重、内政外交之学，唯恐其民之不智；而中国的教育制度，却是把人们束缚在八股帖括之中，唯恐其民之不愚也。他大声疾呼，指责中国的教育制度“与自缚倒戈，何以

异哉”？百日维新期间，他更奏请皇帝特下明谕：永远停止八股。

在学术思想方面，宋伯鲁精通理学。但他并不主张株守“中学”而排斥“西学”。他认为，不近经史的人不可能真通经济（经世致用之学），不懂时务的人也不可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他认为，中国人才匮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读书士子对于中西两学不能汇通。那些进士、举人出身的官僚，对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及自然科学知识一概无知，而进过洋学堂懂得一些西学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传统的经史子集又茫然不解。他说：“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推其缘故，殆颇由取士之法歧而二之也。”那么，只要“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千年沉疴，一旦扫除，转弱为强，在此一举”。

宋伯鲁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都有自己的见解。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没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西方的社会学说也不是简单地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消除中西新旧之间的隔阂，对西学有选择地加以取舍，吸收那些有利于中国富强的思想主张，舍弃不适宜中国社会的部分。因此，宋伯鲁的文化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前瞻性，在当时的陕西维新人士中颇具代表性。

此外，宋伯鲁还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19 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面对“瓜分豆剖”的严重危局，他极为痛心地向清政府提出，列强“眈眈环视，旦夕宰割”，“是昔仅有其言者，而今将见诸事实，危事存亡，变在顷刻，若不急筹善法，一旦分裂，悔将不及”。但是，与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相同，宋伯鲁不是将挽救民族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而是对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宋伯鲁认为，只要与英美日三国联合，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另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战，俄不敢出，则法德无所附，势必解散，吾既合日，彼英与日素善，不患不就我范围。”基于上述思想，他请求光绪皇帝立即派所谓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比如大学士李鸿章，并派工部主事康有为作为李鸿章的参赞，会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商谈挽救中国民族危机的问题，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这样，就一定能够转祸为福，“以保我宗社，奠安我疆土，时至今日，危机万分，守旧之言万不可听，伏愿皇上独奋乾断速下明诏，则四万万生灵庶不至沦为异类，天下万事幸甚”。

出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宋伯鲁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没有深刻的认识。甲午战争的硝烟未散，《马关条约》规定给日本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尚未付清，祖国领土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他竟然忘记了造成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凶恶敌人正是日本，反

而把制止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希望寄托在美英日等帝国主义身上。虽然，他的主观动机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倘若他的主张被付诸实施，那么，造成的客观后果无异于前门拒虎，后门引狼，中国将沦为列强的附庸。

二、力主“练师”“保商”的李岳瑞

李岳瑞（1862—1927），字孟符，陕西咸阳人。他“幼慧嗜读，髫年人泮，有神童之目”，青少年时代，受业于同乡、著名学者刘古愚。光绪壬午中举人，次年癸未，取捷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主事任工部迁屯田司员外即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办铁路矿务事。青年时代，李岳瑞不仅熟读经史，而且还略通天文、地理和数学，并时常留心国内外大事，注意时局的变化和社会状况。他通过各种渠道，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历史、地理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可谓博学多识。

1890 年，李岳瑞曾写过一篇文章，力主练师船，赴欧洲各国保护商民。他在回顾了中外贸易几十年的情况后，指出“中外之变至今极矣”，中国沿海数千里的海口都控制在别人手中。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正是：“彼有东来之兵，而我无西去之甲也”。他说，外国的军舰以“护商”为名，实际上在中国沿海及内地进行侵略活动，所以他指出：“居今日而论自强之道，有急于练师船以保华商者哉”他在文章里写道：“窃以为不筹保商之计，则利权终不可收。不练护商之船，则兵威终不可振”。体现了他“练师”“保商”的爱国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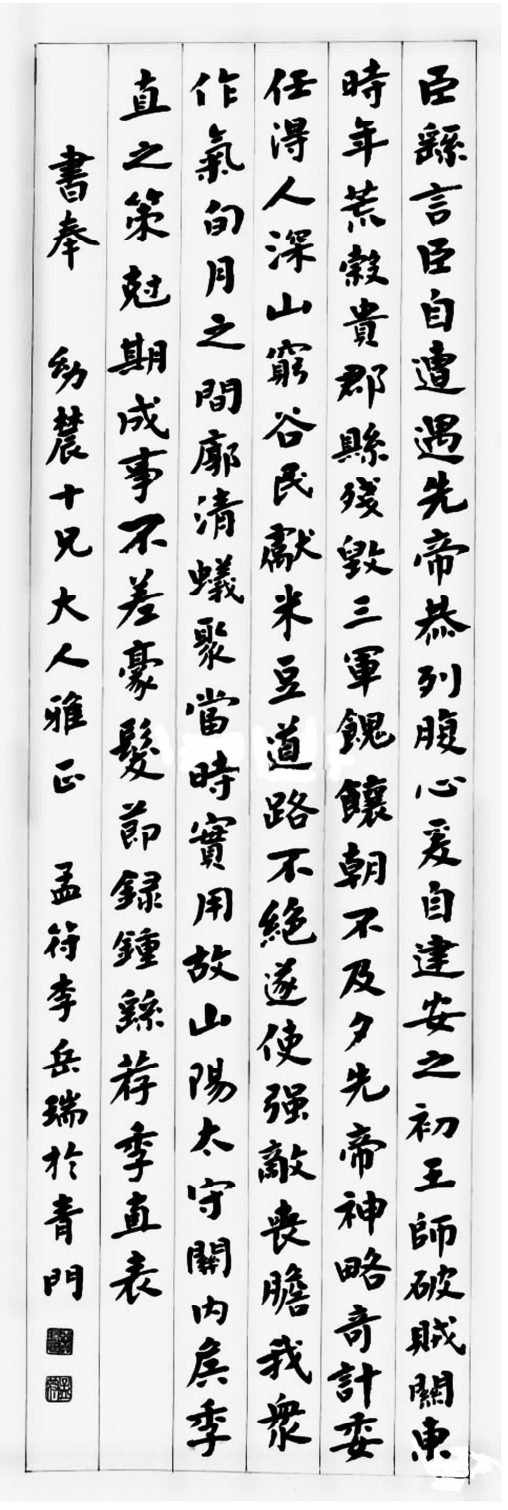
李岳瑞还认为，要改变中外贸易的现状，当务之急是要妥善办理两件事情：一是编练军舰往来保护华商，二是规定不得以有用之银易无用之洋货。这样做的好处有四：其一，商船可以窥探敌国之虚实，“使数万里岛夷之地形国势常在吾耳目之中”。其二，中国商船可以借保商为名“默宿重兵于海外”，倘若有敌国犯我国土，那么我商船便可联络我商民，“伺隙而动，以为牵制，卡其饷道。”抵制外来侵略势力。其三，精练保商之兵，使举海外百万之商令其自购枪炮，而教以施放之法、营伍之制，无事以资卫护，有事足壮声威，是不费一饷而可得数十万之精兵常处敌人肘腋。其四，在洋舰必经的航线上，选择一个尚未开发的小岛，设立海关，征收往来洋船之税，“开矿凿山以资兵轮驻泊之用，可以雄视海表，反客为主”。他希望用“保护商人”的办法收回中国丧失的各项经济权利，实际上是主张同西方侵略者进行“商战”，同时借练商船、保商之兵的机会，训练中国的海军，壮大国防力量，保卫祖国的万里海疆。这种思想和主张显然是受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影响，这成为李岳瑞一生政治、经济观点的基础。

李岳瑞还撰写《同治间福建创立船政局考》（上、下篇）、《书魏默深筹河篇后》等

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李岳瑞就当时国内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面前，中国必须加强海防，而“欲海防不可不练水师，欲练水师不可不设局制船”。他认为，仿造西方的坚船，是防御外来侵略的一个有效的方式；他说，“伺其所短，何如师其所长，拙攻其所防何如巧夺其所恃”。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反抗外来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可见，李岳瑞的主张与魏源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反抗外来侵略的有效办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说，李岳瑞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与维新派一样，有着正确的指导思想。

百日维新开始后，李岳瑞向光绪皇帝上奏，请求废除三跪九叩等繁文缛节，裁汰各官僚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撤除或合并翰林院、詹事府等闲散衙门，精简中枢重叠的办事机构，改变过去那种遇事相互推诿，人浮于事的状况，提高办事效率，做到上下相通。

李岳瑞还奏请“易服制”，建议清政府派官员到西方国家购买西服，以西服取代长袍马褂，革除清朝封建统治几百年来的陈规陋俗。维新派人士张元济就非常赞赏他的这项建议，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曾有诗志其事。光绪帝看到这本奏章后，肯定了他的建议，并准备秘密派遣中国使臣到西方国家购买五百套西服，决定择吉日良辰，谒庙拜祖，祭告天地，改元开化。但光绪帝慑于慈禧太


臣縣言臣自遭遇先帝恭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破賊關東
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敝三軍餽饟朝不及夕先帝神略奇計委
任得人深山窮谷民獻米豆道路不絕遂使強敵喪膽我衆
作氣旬月之間廓清蠭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
直之策冀期成事不差豪髮節録鍾縣荐季直表
書奉　紉農十兄大人雅正　孟符李岳瑞於青門

李岳瑞作品

后的淫威，不敢私自行动。这些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大都没有付诸实施。尽管如此，当慈禧太后知道此事后，还是大发雷霆。她气急败坏地拍案大骂："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一帮顽固守旧官僚趁机群起围攻李岳瑞，恶意造谣中伤，咒骂他是"汉奸"，企图"用夷变夏"，斥责他违背祖宗的成法，肆意妄为，并纠集反动势力，对李岳瑞等人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

李岳瑞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帝党"人物。他主张起用新人、裁汰冗员是为了革新清朝政治，挽救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具有爱国性和进步性。

三、参与变法、鸠连京秦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宋伯鲁便屡次向光绪帝上奏，请求"明定国是"，推行新政，挽救民族危机。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下诏书"明定国是"，变法维新。6 月 16 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他在总署章京上行走，并准专折奏事。当日，康有为委托梁启超草拟一折，交宋伯鲁代奏，请求废八股，改策论。次日，宋伯鲁上奏要求"永远停止八股"。6 月 17 日，宋伯鲁再次上奏，疏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认为"新政之行如风行草偃惟速乃成"，强调变法的紧迫性。6 月 30 日，宋伯鲁又上奏请求：今后"如有奏请复用八股试士者，必系自私误国之流，重则斥革降调，轻则严旨申斥"，只有如此，"旧焰消沮，人心大定，而真才可以日出矣"。

新政诏令的接连发布，引起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极端仇视，他们百般阻挠新政的推行，必欲将新政全面加以废除。宋伯鲁痛恨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认为他们"耳目所须，心志所从，皆与新政相反"，并与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6 月 20 日，宋伯鲁与维新党人御史杨深秀联名上奏，弹劾顽固派礼部尚书许应骙，"品行平常，见识庸谬，妄自尊大，刚愎凌人"，"庸妄枉悖，腹诽朝旨，倡言经济科之无益、务欲裁减英额"，"庸底西学，进有近达时务之上，则疾之如仇"。痛斥他身为总理各国事务之大臣，但却"深恶洋务，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建议光绪皇帝"可否将许应骙以三、四品京官降调，退出总理衙门行走"，如此"内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邻邦之笑柄"。光绪帝奏请太后，立即令许应驻明白回奏，后而调离京城。

宋伯鲁试图借机打击顽固派守旧派官僚，为维新变法消除障碍，请皇帝启用维新派官员，以促使变法大业能顺利向前发展。但顽固派不甘失败，进行了反击。8 月，御史文悌上奏，弹劾宋伯鲁和杨深秀，说他说二人"受人唆使，结党攻许"，"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认为他们不宜担任御史之职，"令回原衙门行走"。光绪帝支持维新派，反而革除了文悌的御史职务，令其回原衙门行走。8 月 26 日，宋伯鲁又转呈康有

为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阻挠新政的奏折。

宋伯鲁在北京任职期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联系甚密，他的一些奏折就是在康有为的鼓动下上奏光绪帝的，有的奏折还是康有为代为草拟的。因为起初康有为仅是一个工部主事职的六品官，位卑言轻，没有资格直接上奏章，所拟的变法方案无法上达光绪皇帝。而宋伯鲁身为御史，为清朝的“言窗”，所以，康有为利用宋伯鲁的职位之便，向光绪皇帝上疏言事，坚定光绪变法的决心，推行新政。在百日维新前，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建议设立制度局，在乾清门大誓群臣，这些建议都曾与宋伯鲁商议过，并得到了宋的赞同。宋伯鲁的维新志向比较坚定，对顽固派的斗争也较为果敢。梁启超对宋伯鲁的评价是，“屡奏定国是，废八股，劾奸党，言诸新政最多”。

李岳瑞在百日维新前后，与康梁等维新党人过往甚密。他曾经把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介绍给陕西著名维新领袖刘古愚，沟通了他们之间联络的渠道。此后，梁、刘二人多次互相联络，交流京师与陕西地区有关变法的各方面情况，互相呼应。李岳瑞通过这个途径，使康梁的维新思想在西北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尤其对陕西的维新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96 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是为维新派的宣传喉舌，在当时知识界乃至政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少官绅士子，或者真心赞助，或者沽名钓誉，纷纷给《时务报》捐献银钱。李岳瑞在京师主动承担了为《时务报》募收捐款的工作，并积极协助报馆推销报纸。他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为宣传维新变法做出了重大贡献。据黄遵宪在 1897 年 5 月致汪康年的一封信中所说：“近见李孟符，言及今年乡试，士子云集省会，似可每省酌寄一二百份，以期拓充。陕西一省，孟符即可代办，可即寄百余份托渠。”



维新运动进入高潮以后，李岳瑞利用自己在总理衙门任章京一职的便利条件，把衙门内的有关维新变法的机密情报，透露给在天津主办《国闻报》的严复，以通内外信息。他还时常来往于光绪皇帝与维新志士之间，使维新派的新政建议迅速上达于光绪，并将皇帝的意图转告给维新派。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李岳瑞与杨深秀、宋伯鲁等人前往康有为的住处，告诉他英国人有七艘军舰在大沽海面游弋，“将与俄战”。康有为也把李提摩太送来的列强“瓜分图”给李岳瑞等人看，希望他能将此情况上奏皇帝，并立即采取措施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另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记载：“七月初四日，总理衙门传言来，谓当有旨到，命勿出门，既而章京李岳瑞来，口传谕旨，即受，不知何以报也。”新政开始后，后党顽固派一直紧锣密鼓地进行秘密策划，准备对维新派进行反扑。当李岳瑞得知后党顽固派在磨刀霍霍，调兵遣将的消息时，急忙向康有为等人报警，要他们密切注视后党的举动。

1898 年 9 月 22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捉拿新党。李岳瑞闻知政变发生的消息以后，立即通知宋伯鲁和其他维新人士从京师逃走。李岳瑞、宋伯鲁急忙逃入意大利驻北京公使馆里避难。李岳瑞身藏一盒鸦片，准备在被捕时吞服自尽。由于外国公使出面干预，李岳瑞、宋伯鲁才得以免遭杀身之祸。清廷降旨：宋伯鲁“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应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李岳瑞“上书请变服制，用客卿，今革职永不叙用”。

四、关西学会与陕学会

1895 年 4 月 17 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在北京会试的各省举人，由康有为倡议上书拒绝和约。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发动广东籍举人签名上书，随即得到湖南籍举人的响应。4 月 22 日，粤湘两省举人联合上书，请求拒和。接着其他各省举人也纷纷上书要求拒和，反对《马关条约》。康有为更联合各省举人，草拟万言书，要求清政府“拒和、迁都、变法”。该书 5 月 2 日递都察院，请其代转。此即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万言书”上签名的各省举人共 1300 多人，今有姓名可稽考者 603 人，其中陕籍占 55 人。“万言书”虽被都察院以条约“既已用宝，无法挽回”为借口，拒绝代转，然而“公车上书”却拉开了“戊戌维新”的帷幕。“公车上书”之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基本形成，他们编印刊物，宣传变法主张，同时创立各种学会，为变法组织力量。

德国于 1897 年强占胶州湾，列强争相效尤，中华民族的危机日渐严重，带有救亡图存意义的维新活动也日益高涨。1898 年 1 月，康有为联络广东旅京人士组成“粤学会”，讲求宣传变法图强的维新主张。当时倾向维新的宋伯鲁、李岳瑞等联络其他陕籍京官，于同年 1 月在北京成立“关西学会”，予以响应。

关西学会成立后，发表了带有宣言性质的《关西学会缘起》。在“缘起”中，他们痛切地指出民族危机已很严重：“德发难端，闹聚胶墨，咽喉之道鲠；英觊长江，耀兵舟山，财赋之区危；俄舰麇集，养虎自卫，腹心之疾亟。嗟夫！甲午以后，非复甲申以后之情形也，即今日而求如甲午之秋，安可得哉，安可得哉！”他们要求改变现状，避开敌锋迁都关中，以利图强。他们考虑到关中地区风气闭塞，因而办“关西学会”的目的也就是“尚通而去塞”，“起点京师，鸠联桑梓”，宣传维新，开阔关陇风气。他们并以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互相激励。

关西学会章程要点是：一、治经义。“以经术言变法，为本原中之本原，当发明圣制，探讨微言，勿尚琐碎支离之汉学，勿骛空谈无根之宋学。”二、治国闻。“西欧民

政，东赢会社，皆彼中立国之本。要求会员研讨西方和日本的社会制度，学习外国语言和科学技术，为维新变法创造条件。三、广应求。“它省魁儒杰士，愿入会者，不分地域，一律延揽。”以期扩大影响，团结更多的维新志士。四、定会期。会友每人出资二十两，作为购买图书和聚会的费用。规定每星期聚会一次，交流读书心得和对时局的看法。参加关西学会的会员，都引用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明末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互相激励。入会者同心同德，为挽救民族危亡，启蒙陕西民众的思想而不懈努力。

1898 年 3 月，宋伯鲁与御史杨深秀（山西人）等结交秦晋士子在关西学会的基础上扩大为“关学会”（又名“陕学会”）。随后不久，关学会同在京的粤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由康有为、李盛铎等人倡导，合并改组为“保国会”。1898 年 4 月 12 日，在粤东会馆召开“保国会”成立大会，与会者二百多人，包括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和倾向维新的官员。保国会拟定章程三十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入会者必须“激励奋发，刻念国耻”。在北京加入保国会者一百八十六人，其中陕籍人士三十四人。陕籍保国会成员回陕后，组织了“不缠足会”和“味经学会”，努力改变陕西社会风气，破除缠足等陈规陋俗；有的会员如毛昌杰、薛信等参加办学事业，积极宣传维新思想，开展维新活动。

五、影响与启示



以宋伯鲁、李岳瑞为代表的陕籍京官成立的关西学会和陕学会，与当时维新派创办的其他学会和报馆的目的一样，都是利用学会的组织，向封建士子讲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开拓和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借以组织力量，在舆论上造成一种巨大声势，来推动维新变法运动发展。关西学会和陕学会凝聚了一大批陕西和西北地区的维新志士，为陕西地区维新活动的开展准备了的人力和组织条件，通过改良实践活动，促进了陕西新式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量新式人才，有力的促进了陕西和西北地区维新运动的发展，奠定了陕西民主革命的基础。陕西维新人物作为全国维新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对陕西社会还是对全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撰稿人　路中康）

李仪祉与“关中八惠”

一、民国陕西水利建设的缘起

陕西古代被称为“天府之国”。当其时，秦有郑国渠，汉有白渠，由是使得关中广大耕地可以引水灌田，因而民富国强，造就了“秦川自古帝王都”的美誉。宋以后，陕西偏处西北，交通阻隔，加之经济发展受限，其在全国的地位逐渐式微。

在陕西，有条件实施大规模水利灌溉工程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中部关中平原和南部的汉中盆地。而北部的黄土高原地区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的境况。长期以来，陕西的水利建设实际上处于荒废状态，因此，“靠天吃饭”成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常态，而周期性的旱灾则成为困扰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自 1877 年（光绪三年）到 1928 年共为 51 年间即有 5 次旱灾发生，相隔最近者为 9 年，最远者为 15 年，平均为 10 年。这与关中‘十年一大旱，五年一小旱’的农谚正好相符。”而 1928 年开始连续五年的大旱灾和瘟疫，使曾经富庶的关中从天堂变成了地狱。当时，整个陕西田园荒芜，渠道废毁，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最终酿成数百万人丧生的“民国十八年年馑”。正是这场空前的大劫难不仅震撼了陕西各界，也在全国造成了严重的恐慌。陕西近代新式水利事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发轫。

李仪祉（1882—1938），原名协，字宜之。陕西省蒲城县人，著名水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李仪祉生于书香门第，早年曾考取过科举功名，获当地秀才第一名。后在父辈的影响下，入京师大学堂学习。辛亥革命前后，赴德国学习土木工程专业。在此期间，游历欧洲诸国，为当时西方诸国发达的水利事业所折服，遂立志从事水利工程事业。回国后，曾先后在江苏、陕西、重庆、浙江等地从事教育、水利等行业。

1930 年，在杨虎城等人的极力邀请下，李仪祉回陕，并先后担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务。借助于当时国外华侨的资金赞助和杨虎城、邵力子等陕西军政大员的倾力支持，李仪祉带领他的水利队伍，

对民国时期的陕西水利建设事业进行了详细的规划。他制订了《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筹划了“关中八惠”泾惠渠、渭惠渠、洛惠渠、梅惠渠、黑惠渠、涝惠渠、沣惠渠、泔惠渠，计划在十年内水利惠及全省，使陕西成为一个模范农田水利区。在此期间，他还亲赴陕南陕北考察，筹划了陕南汉惠渠、褒惠渠和陕北定惠渠。而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李仪祉和他的团队先后建成了一批在当时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式灌溉工程，其中最能代表陕西水利发展水平的，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中八惠”。

二、“关中八惠”简介

“关中八惠”水利工程分别是：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梅惠渠、黑惠渠、泔惠渠、沣惠渠以及涝惠渠等。现做如下简单介绍：



泾惠渠概貌

1. 泾惠渠

泾惠渠自1930年10月动工兴建，1932年6月开始通水，1935年4月全部竣工。泾惠渠的引水枢纽在泾阳县西北的张家山泾河谷口，泾河水自流入渠。该水利工程用款共计167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来源于华洋义赈会、檀香山华侨、朱庆澜等中外慈善团体和个人的赈灾捐款，以及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拨款、陕西省政府筹款等项。泾惠渠干支渠总长273公里，该工程建筑物有拦河大坝、节制闸、退水闸、桥梁、跌水、斗门、涵洞、渡槽、滚水、退水坡、倒虹吸洞等782座。修成后的泾惠渠可灌泾阳、礼泉、三原、高陵、临潼5县农田约48 666.7公顷，受益人口达100万。由于当时处在战乱环境，交通不便，经费短缺，泾惠渠的近代化程度在“关中八惠”中并不算很高，但该渠的建成开辟了陕西水利事业的新时代，成为陕西以后所建各渠的模范。

2. 洛惠渠

泾惠渠竣工后，李仪祉辞去建设厅厅长，专任省水利局局长，集中精力从事陕西水利工程的规划与实施事宜。洛惠渠是开工时间仅次于泾惠渠的关中又一大型水利工程。该工程由水利部泾洛工程局主办，1934 年 3 月开工，1947 年 12 月开始放水，直至 1949 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全部工程尚未完成。从 1949 年 11 月 6 日开始，人民政府对洛惠渠动工续建、完善配套，到 1950 年正式通水。该渠由澄城头筑坝引洛河水，引水量为 15 立方米/秒，干支渠总长 83 公里。计划灌溉大荔、朝邑、华阴 3 县农田33 333公顷。主要建筑物有拦河大坝、斗门、进水闸、排洪闸、隧洞、渡槽、跌水等多座。其中第 5 号隧洞穿越铁镰山，总长度为 3377 米，工程极其艰险，历经 10 余年才凿通。各项建筑物均由钢筋水泥构筑，近代化程度很高。洛惠渠以其工程巨大且坚固壮观而名列陕西各渠之首，与泾惠渠、渭惠渠并列，被誉为“关中八惠”之三姊妹渠。

3. 渭惠渠

渭惠渠工程 1934 年由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设计，由陕西省政府划拨出全省营业税作为偿还全部工款的抵押，向西安银行团贷款 150 万元，于 1935 年 3 月成立陕西省渭惠渠工程处，4 月动工，次年 12 月开始放水，1937 年 12 月全部工程告竣，用款 230 万元。该渠自眉县魏家堡筑坝拦河引渭水，引水量为 30 立方米/秒。干支渠总长 177 公里，计划灌溉眉县、扶风、武功、兴平、咸阳 5 县农田 40 000 平方公里。工程建筑物计有拦河大坝、进水闸、退水闸、冲刷闸、分水闸、退水坡、跌水、桥梁、涵洞、斗门等多项。1949 年后，人民政府对渭惠渠进行续建、扩建。1975 年，渭惠渠灌区与宝鸡峡引渭灌区合并，渭惠渠定名为宝鸡峡引渭灌区原下总干渠。渭惠渠是灌溉面积仅次于泾惠渠的陕西第二大渠，工程技术完善，所有建筑物多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极其坚固，近代化程度相当高。

4. 沣惠渠

沣惠渠于 1941 年 9 月动工，1947 年 5 月竣工。主要水源为沣、滈河水。建筑物有拦河大坝、进水闸、冲刷闸、倒虹吸洞、跌水等多项。该渠由户县秦渡镇沣河与河汇流处筑坝引沣水，引水量为 11 立方米/秒。干支渠总长 48 公里，可灌溉户县、长安区、咸阳市农田15 333公顷。

5. 梅惠渠

该水利工程创修于清康熙六年（1667），建有东、西二渠，可灌田千余顷，为眉县知县梅遇督凿，故又名梅公渠。1936 年 10 由水利部泾洛工程局主持重新整修，1938 年 7 月完成。用款 22.7 万元，由经济委员会拨款。主要建筑物有拦河大坝、进水闸、退水闸、桥涵、渡槽、斗门等。该渠自眉县斜峪关引石头河之水，引水量为 8 立方米/秒。干

支渠总长121公里，可灌溉眉县、岐山县两县农田8800公顷。

6. 黑惠渠

黑惠渠位周至县，其主要是引渭河南岸支流黑河水以利灌溉。黑惠渠由水利部泾洛工程局主持兴修，经费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拨付。1938年9月动工，1942年4月放水，12月竣工。用款180万元。主要建筑物有拦河大坝、进水闸、冲刷闸、跌水、过水桥、汇流、隧洞、斗门等。该渠由周至县黑峪口引黑河水，引水量为8.5立方米/秒。干支渠总长55公里，可灌溉周至县农田10666公顷。开渠后“黑水就范，两岸可免泛滥，为利尤溥”。

7. 泔惠渠

泔惠渠位于礼泉县东北，1943年5月开工，次年2月建成，用款210万元，由农民银行贷款。渠道建筑物齐全。该渠自礼泉姚家沟引泔水，引水量为0.4立方米/秒。干支渠长5公里，可灌农田200公顷。

8. 涝惠渠

涝惠渠位于户县。1943年7月开工，引渭水支流涝水灌溉农田，1947年10月竣工。主要建筑物有拦河大坝、各式水闸、隧洞、过水桥、跌水、斗门等。该渠由户县涝峪口引涝河水，引水量为5立方米/秒，干支渠总长22公里，可灌溉户县农田6666公顷。

其实，“关中八惠”灌溉工程并不能代表民国时期陕西新式水利工程的全部。除此而外，还有陕南的汉惠渠、褒惠渠、惠渠，陕北的织女渠、定惠渠等新式水利工程，但这些水利工程无论从规模上、近代化程度上还是所取得的效益方面，都远远逊色于“关中八惠”。

三、“关中八惠”的影响

1. 近代化程度高

首先，关于关中乃至陕西水利建设的整体规划。水利规划对于治理江河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国古代，通常只是凭经验做定性的分析。在近代，由于有了定量的测量和水文测验，规划工作日渐科学化。李仪祉所制定的《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即明证。其次，民国时期陕西所建新式水利灌溉工程不管是勘测、设计，还是具体施工过程，均以科学方法为指导，与旧式水利工程有着实质性区别，是名副其实的近代化水利灌溉工程。再次，水泥、钢材等新型材料的引进。水泥和钢材是水利工程中很关键的材料。中国古代由于水泥和钢材的缺乏制约着水利工程的兴建。近代以来，水泥在水利工程中广泛使用，民国时期已具备了水泥灌浆技术。另外，工程建设过程中，还从德国引进了水

泥灌浆机全套设备。因此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水工建筑已逐渐普遍。新型材料的运用大大提高了农田水利的效益。民国时期，随着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关中八惠”为典型代表的陕西水利建设由传统的仅凭实践经验的做法开始进入了用先进的水利科学技术指导建设的新阶段，开创了陕西乃至全国的近代水利建设的新局面。

2. 工程量大

民国年间，全国水利灌溉事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除灌溉工程的修整外，所创办的新式水利工程为数不少。黄河流域主要有：甘肃洮惠渠，宁夏云亭渠，绥远民生渠，陕西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梅惠渠以及山东虹吸淤田工程。在长江流域主要有：湖北金水排涝闸，江苏无锡及庞山湖灌溉工程。其他的有河北仁寿渠，山西桑干河淤灌工程，浙江绍兴三江闸、黄岩西江闸及温岭新金清闸，福建莲柄港溉田工程等。综观全国水利事业，陕西省在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建设方面最为突出。从1930年11月到1949年10月的19年间，“关中八惠”中竣工了七惠（洛惠渠完工大部，全部工程于1950年4月告竣）；陕南三惠全部竣工；陕北一惠（定惠渠）因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工程半途而废。总计完成10渠，基本完成1渠。在当时战争环境下，这些成就不仅在西北地区名列前茅，在全国范围内也属佼佼者。

3. 成就突出

各大灌溉渠的建成，对于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提高农产品产量，增加民食，抵御自然灾害，发展本地区社会经济都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由于粮食的增产，还使得当时的河南、山东、河北和山西等省来陕的大量难民得到了救济。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维持军需民用的作用更应注意。众所周知，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我国东部各主要粮食、棉花产区相继沦陷，西北、西南成为全国抗战的战略后方。战争形势要求西北、西南各省必须为抗战提供充足的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而陕西新式灌溉工程建成后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在抗战期间，陕西成为大后方仅次于四川的主要麦棉产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式灌溉工程的修建，对于供给抗日军需、支撑持久抗战的作用是不容忽视。

4. 示范效应明显

就科学技术发展的意义而论，陕西各渠的成功建设，开辟了中国近代水利科学技术发展的先河。通过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输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水利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为中国水利事业走向近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陕西来说，各渠的成功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科技资料，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为陕西水利事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应看到，作为中国最早的大规模近代化水利事业，它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示范作用：通过兴修新式水利，并积累一套建设与管理经验，在大面积范围内使农产品获得大幅度

增产，为北方干旱区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模式和前景，从而使陕西水利建设成为全国各省的模范。因此，民国时期的陕西水利建设事业，完全有资格载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史册，并占有突出的地位。

“关中八惠”，灌溉农田数百余万亩，惠泽三秦，李仪祉居功至伟。因“关中八惠”，民国时期陕西获得了“陕西水利，居全国之冠”之誉。在修建水利工程中，李仪祉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即：治理黄河不仅要上中下游并重，而且还要将防洪、航运、灌溉和水电等诸多功能兼顾。这种思路改变了几千年来单纯着眼于黄河下游的治水思想，把我国治理黄河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在实际工作中，李仪祉亲自主持陕西泾、渭、洛、梅四大惠渠的建设任务。由于治理理念的改进以及在修建过程中广泛使用现代技术，使得这些水利工程具有较高的现代水准，从而树立起了现代灌溉工程样板，对中国水利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而陕西人民受益尤大。

1938 年 3 月 7 日，年仅 56 岁的李仪祉因积劳成疾逝世于西安。下葬之日，自觉参加送葬的群众达三万人之多。公祭时，日本飞机盘旋轰炸，主持人恳求大家疏散隐蔽，然而人群却岿然不动，场面异常感人。

一般而言，水利建设必须要以稳定的政治局面、巨大的经济实力、有效的政府功能等作为后盾。但是，民国时期陕西的水利建设却是在一个战争频仍、社会动荡、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以及自然灾害频繁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中，我们有理由为陕西水利建设取得的成就而搞到骄傲和自豪。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民国陕西水利建设的成就。

（撰稿人　王元琪）

第五编

武事

安史之乱击碎长安盛世

天宝十四载（755），蓄谋已久的安禄山起兵范阳，叛军南下席卷河北，又渡过黄河，占领东都洛阳，并派兵攻陷潼关，一度侵入长安。唐玄宗仓皇西逃，京城长安陷入建唐以来最严重的动荡之中，安史叛军如同一股浊流迅速向全国漫延，开天盛世的历史局面被突如其来的渔阳鼙鼓击碎，接下来是动荡不安的八年，即使唐肃宗重新收复两京，昔日家给人足的好景难以重现，面对重重困难，唐人并未灰心丧气，整顿盐法、制定两税法、施行赋税三分法等，结果却并未尽如人意，要走出安史之乱的阴影谈何容易。盛极而衰的唐朝历史，被史学界视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政治方面如此，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均产生深远影响，这次偶然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为什么一个安史之乱甚至能改变历史走向？还需要从安史之乱本身说起。

一、番将安禄山崛起之路

安禄山本姓康，原是中亚粟特人，因其母改嫁于突厥人安延偃，遂冒姓安，因为胡人崇拜斗战神轧荦山，故其小名为轧荦山（roxsan），汉名禄山。安禄山足智多谋，善于察颜观色，精通六蕃语言，活跃于营州柳城一带，为互市牙郎，不同部落之间贸易与互市时担任中间人，就是驵侩的角色。当时，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有经营边疆之志，安禄山因盗羊被幽州守将捉获，欲从重治其罪，而安禄山在庭审现场倡言：“公欲灭两番，不该杀壮士。”当地称奚和契丹为两番，一语正中张守珪要害，于是张守珪令安禄山将功赎罪，与其同伴史窣干即史思明均担任捉生将。安禄山骁勇狡猾，屡建奇功，又熟悉山川道路水泉，很快就升任为幽州节度使下偏将，又被张守珪收为义子，提拔为兵马使、节度副使，一直到营州都督、平卢军使，独当一面。天宝元年（742），平卢军升级为节度，安禄山担任平卢节度使，次年，又兼任范阳节度使。

安禄山发展自己势力的同时，又千方百计献媚于朝廷，每有使者往来，出财以饱其欲，归朝必盛誉其贤能，唐玄宗始闻其声名，后入朝奏事，深得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喜欢，唐玄宗欲托以心膂之任，于宫内设宴承欢。席间，皇帝引见皇太子，安禄山不拜，左右

哗然。禄山佯问："皇太子为何官?"玄宗说："是储君，我百年之后的继承者。"禄山才说："恕臣愚昧，只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该万死。"始行臣礼。当时杨贵妃宠冠六宫，禄山请求贵妃收己为养儿，玄宗允许，每觐见，必定先拜贵妃，玄宗怪问其由，得到的回答是："番人先母后父。"玄宗不但不怪罪，反而更加喜欢他的"直率坦诚"。恩宠日深，日常接见，杂以诙谐戏谑，帝妃为之启颜。正月初一是安禄山的生日，天宝十载（751）正月初四，杨贵妃召安禄山入内，按照长安风俗，新生儿三日有洗儿礼，贵妃用绣绷子围住禄山，令宫女以彩舆舁之而戏，欢声雷动。玄宗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贵妃替禄山作三日洗儿，因而欢呼。"玄宗也来助阵，大悦，命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极欢而散。从此，宫中称呼安禄山为"禄儿"，不禁其出入。

在此期间，安禄山的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令大将刘骆谷在长安伺察朝廷动静，随时搜集朝廷消息向他通报。而唐朝皇帝倦于政事，丧失进取之志；权臣相继持政，纲纪大乱；各地甲仗入库多年，朽坏无法使用；百姓太平日久，耻谈战事。史载："天宝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销锋镝，以弱天下豪杰。于是，挟军器者有辟，蓄图谶者有诛，习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摈之不齿。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人至老不闻战声。"宰相李林甫为阻碍边帅出将入相之路，以固己权，提出节度使的选任，文臣不如武臣，武臣中汉将不如番将，番将天性好斗，少养马上，长习战阵，如能抚而将之，则足以威服海内。玄宗信从，始用安禄山。后来，诸道节度尽用胡人，重兵在握，安危是系。安禄山最早识破玄机，以平卢、范阳节度使，兼河东节度使、陇右群牧都使，身兼三镇，又掌管马政，兵强马壮，每次破敌之后，为部下成千上万人奏功请赏，又奏表请以番将32人取代汉将，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与此同时，安禄山在范阳北修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储甲积谷，养善战之番族将士八千人为假子，称为"曳落河"，即番语之健儿，又畜单于护真大马数万匹，牛羊五万头以备不时之需。令胡商潜于诸道兴贩贸易，每年向他输送异方珍货数以百万计，史载："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又每岁献俘虏、牛羊、驼马，不绝于路，珍禽奇兽、珠宝异物贡无虚月。"安禄山出身粟特，对商业兴贩最为熟悉，也深知商业聚财的道理，在经济上发挥胡商善于经商取利的特长，所聚之财成为日后叛乱的经济来源。在精神上，他利用胡人信奉祆教，每年举行盛大的宗教祭祀仪式，界时有陈牲牢、焚香罗拜、众巫击鼓歌舞、邀福于天等环节，荣新江先生认为此天就是胡天，即祆神，此仪式就是祆教祭祀活动的写实。安禄山以感应轧荦山神而诞生又让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宗教领袖，利用宗教的力量来团结番兵番将，号召境内外粟特胡众，宗

教领袖为他起兵准备精神力量。

天宝十四载八月以来，军中秣马厉兵次数，主将宴飨士卒的频率，要比平常为多，士兵觉得有点奇怪。冬，禄山召集属下所有大将置酒会宴，席间，让人观看所绘巨幅地图，地图的内容是从幽州到洛阳，山川险易、攻守利害悉在其中，看完图，在座每人均厚赐金帛并地图一份，诫之曰："泄露天机者斩！"三日后，举兵反，将士如梦方醒。安禄山称奉密诏讨伐杨国忠，征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号称二十万，挥师南下，日行60里。兵之所至，郡县猝不及防，甲仗库器仗朽钝不可用，郡县守兵不识使用弓、剑之法，官吏或弃城逃走，或束手就擒，毫无抵抗能力。唯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兄弟誓死抗敌，但也无济于事。

二、渔阳鼙鼓动地来

安禄山起兵反唐之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还以为是有人故意抹黑安禄山，等到证实情报后，君臣相顾失色。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玄宗向他咨询讨贼方略，封常清信誓旦旦地说："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玄宗立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即日乘驿到东京募兵，十余天得兵六万人。封常清命人拆毁河阳桥，做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唐玄宗以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于长安出内府钱帛募兵11万，号曰"天武军"，但皆为市井子弟，乌合之众。上命高仙芝统其中五万从长安出发，屯于陕郡，宦官边令诚为监军。

安禄山用草绳结破船横绝黄河，一夕冰合如浮梁，范阳军队渡过黄河攻陷陈留，将士降者近万人，听说唐军杀掉其子安庆宗，恸哭失声，遂令杀降以快其忿。叛军又攻荥阳，守军士卒，闻鼓角之声，自坠如雨，荥阳失守。叛军声势大振，进攻东京。封常清所募兵均未经训练，仓促上阵，武牢一战，唐军大败，退守葵园，又败，上东门一战，再败，都亭驿之战、宣仁门之战皆败，东京洛阳失守沦陷，封常清情急之下，坏墙而走，东京守军随封常清撤退至陕郡，与高仙芝部汇合。封、高二人商量，退守潼关，封常清说："连日血战，知贼锋不可挡，陕无险可守。潼关为关中之东门，如贼军突入潼关，长安危机，不如引兵坚守潼关，以图后谋。"二人遂于潼关布防。

此后一段时间，决战双方都出现了一些变故。唐军方面，因主将高仙芝得罪监军宦官边令诚，他诬奏高、封二人逗留不进以致军败，玄宗大怒，令边令诚持诏于军前诛杀高、封二帅，临阵斩杀主将，犯了兵家大忌。

而安禄山方面，攻占洛阳后，见宫阙雄伟，遂僭号大燕皇帝，改元圣武，署拜百官，

故屯兵不进。这期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合兵出井陉关击败史思明部于九门，收复河北 13 郡。安禄山前方有潼关守军拼死抵抗，后方又有退路中断的危险，恐惧不安，还一度责怪其谋士严庄、高尚，其另一谋士田乾真劝他说："自古兴王，战皆有胜负，乃成大业，无一举而得者。今四方兵虽多，非我敌也。有如事不成，吾拥数万众，尚可横行天下，为十年计。"安禄山才转忧为喜，又召来严庄、高尚等置酒酣宴，禄山于宴前自歌以消除他与二人的误解，待之如初。随即命其将孙孝哲、安神威西攻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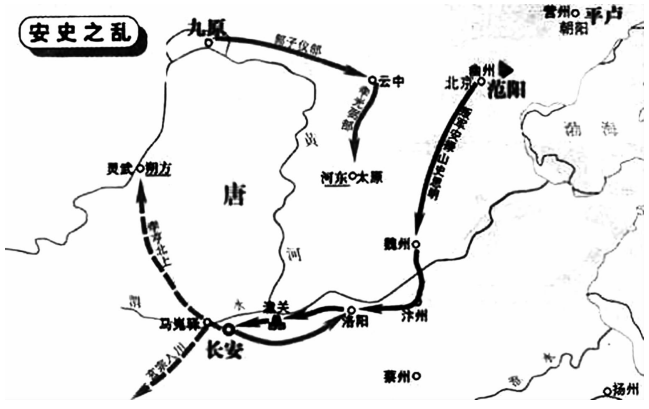
恰在此时，高仙芝、封常清二人被杀，唐朝只好任命留在京城养病的哥舒翰领兵二十万守潼关。有人向哥舒翰提出，杨国忠骄纵召乱，天下莫不切齿，公可向皇帝抗表请诛之而慰百姓之愤，或留兵三万守潼关，悉以精锐回诛杨国忠。哥舒翰未做任何反应，但此事被杨国忠获知，杨国忠请求选监牧小儿三千人于苑中训练，又募集万人屯灞上，名义上是防御叛军，实际上是防备哥舒翰。哥舒翰大怒，乘机袭取而兼并其部，二人之嫌隙逐渐形成。

负责攻打潼关的叛军将领是崔乾祐，以羸兵四千处阵前，卧鼓偃旗，唐军侦探报告叛军毫无准备，久处太平的唐玄宗不识军事多年，遂命哥舒翰进军收复陕、洛，哥舒翰奏曰："贼既始为凶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关，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郭子仪、李光弼也认为潼关大军以固守为主，不可轻出。但杨国忠恐哥舒翰于己不利，以错失机会为辞，屡次奏请出击，唐玄宗就遣使督促哥舒翰出战，使者项背相望，哥舒翰不得已，引兵出关。



唐军与叛军相遇于灵宝西原，贼将崔乾祐据险设伏，表面却只派出不到万人的疑军，或疏或密，或前或退，毫无章法，唐军望而窃笑，哥舒翰浮舟于河，督兵三万鸣鼓助阵，其将王思礼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将十万主力继后，形成排山倒海之势。但双方相持之地却是北阻河，南薄山的狭窄通道，大军不便展开。兵始交，贼军偃旗欲逃，官军将士大有轻敌之色，随后，贼军伏兵冲击，居高临下木石俱发，唐军被挤压在隘道上很被动，伤亡很大。哥舒翰用马拉毡车为掩护，下令冲击贼阵，双方相持不下。午后，东风加大，叛军用草车塞住唐军之毡车，纵火焚烧，烟焰弥漫，因风加剧。唐军将士无法睁眼，自相残杀，怕叛军随烟突击，聚弓弩向烟中乱射，矢尽方知无叛军。而叛军遣同罗精骑绕过南山，自唐军背后袭击，唐军首尾难顾，因此而大败。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互相排挤掉入河中溺死，喊叫声震天动地，后军不审前军败势，望风而逃，哥舒翰之二十万众溃不成军。先是，潼关外有三道防堑，皆广三丈、深丈余，因为兵败人马坠入其中，须臾而满，后来者踩在其上如履平地，士卒逃入关者仅剩八千余人。

哥舒翰退到关西驿，准备收拾剩余人马，复守潼关，被部下一名番将擒去投降叛军。安禄山问哥舒翰：“汝常轻我，今日如何？”因为之前哥舒翰与安禄山及另一番将安思顺之间相轻，唐玄宗经常在他们之间扮演和事佬，一次，高力士召三人入宴，席间，安禄山说：“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哥舒翰应声说：“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安禄山以为讥笑他，勃然大怒，大骂哥舒翰，哥舒翰欲还言，高力士以目示意下，才免于争斗。有鉴于此，哥舒翰伏地求饶，说：“肉眼不识圣人，遂至于此，今天下未平，陛下留臣，以尺书招各地守将，不日皆下。”安禄山就让哥舒翰以书招众将，但得到的都是责让他不死节的答复，安禄山知哥舒翰无用于他，于苑中将其杀害。之前，哥舒翰也诬奏安思顺与禄山通谋而将其杀害，大敌当前却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大事之前，肆志报怨，显见其胸怀不广。



安史之乱示意图

三、西幸避难

潼关失守，哥舒翰部下急告长安，结果未能及时获得召见，到傍晚，玄宗未见平安火，开始担心，因为唐代烽候制度有每天傍晚放火一炬以报平安，谓之平安火，今大败之后，烽候守兵逃难，不知去向，所以才引起长安纷乱。经过多次商议，何去何从还是未能达成一致，恐惧心理日益浓重，唐玄宗表面宣布要御驾亲征，但暗地却准备出逃剑南。乘着夜色，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禁军，厚赐钱帛，选择九百匹闲厩马，准备妥当后，玄宗与杨玉环姊妹、皇子、皇妃、皇孙，杨国忠、陈玄礼等亲近臣僚以及宦官、宫人悄悄打开延秋门，落荒而逃，当时不在宫中的皇妃、公主、皇孙都不能随行。次日清晨，百官仍有按时入朝者，到宫门前，还听到报时的更漏声，三卫立仗与往常无异。

等到宫门打开，宫人如潮水一样涌出宫中，谁都不知道皇帝哪里去了，中外汹涌扰动，乱成一团。王公、贵族、士族家人四出逃窜，而山野草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中盗取财货，以至于骑驴上殿，取财于左藏大盈库，随后又放火烧库毁灭证据。而负责守宫者、守府县者、守库者争相将管钥献出以讨好安禄山。

白居易在其著名诗歌《长恨歌》中写道："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逃难途中的唐玄宗经历了百味人生，先是饥饿，避难队伍来到咸阳望贤宫，官吏逃散，无人承役，皇帝饥肠辘辘，杨国忠只好到市场买了一个胡饼献上，渐渐地百姓送来一些粗食豆屑，皇孙辈用手争食，一抢而尽，犹未能饱，众人掩面而泣。继续前行，随行者多逃逸不归，内侍监袁思艺也亡去，好不容易来到金城县，县官脱身而走，但饮食器具都在，士卒得以自给。晚上驿中无灯，人相枕藉而寝，贵贱无复分辨。

其次是叛乱，当逃难队伍来到马嵬驿时，被饥饿和愤怒折磨的将士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他们在陈玄礼的率领下，将杨国忠围住，并追杀其子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军士围住驿站，喧闹不已，玄宗拄杖出抚军士，令收队回营，军士不应，使高力士问其故，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贵妃不宜继续侍奉皇帝身旁，愿陛下割恩正法，以息众怒。"玄宗只好说："朕当自处置。"返身入门后，倚杖倾身而立，哀不自胜。臣僚规劝："众怒难犯，安危在顷刻之间，愿陛下速决。"玄宗仍坚持贵妃未参与杨国忠之谋反。高力士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仔细考虑，将士安则陛下也安。"无奈之下，唐玄宗命高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而后报，舆尸与驿庭，召陈玄礼等入视。陈玄礼及禁军将士皆呼万岁，再拜而出，玄宗用舍车保帅之法总算是避过一难。



再次是亲离，杀掉杨国忠以后，何去何从难以统一，或认为去河陇，或主张向灵武，或提出去太原，或坚持回京城，一时意见纷纷，而玄宗意在入蜀，只是不敢明言，恐违众心，争议难平，有人提出先到扶风，徐图去就。路上，有百姓遮道请留，玄宗命皇太子于后宣慰父老，有父老前言："皇帝既不肯留，愿殿下率众东破贼，取长安，如果殿下与至尊都入蜀，中原百姓谁为其主?"不多时，众至数千人，太子以未与父皇面辞为由欲西行，宦者李辅国执缰而谏曰："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归，有可能吗？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子仪、李光弼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吗?"太子只好派其子李俶驰告皇帝，玄宗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又送东宫内人与太子，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之后，太子与

皇帝分道扬镳，来到灵武，建立新政权，又收得两京，迎玄宗于蜀，是为唐肃宗。

还有就是失众，玄宗等人来到岐山，流言传叛军前锋就要到来，士卒潜怀去就，出言不逊，陈玄礼不能控制，皇帝几乎绝望。正好成都向长安贡春彩十余万匹运到，玄宗命悉陈之于庭院，召来将士，告谕众人："朕比来衰老，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苍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劳苦倍至，朕甚愧疚，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可能供给不上，现在听任大家自择其路，朕与子孙、中官辈自行入蜀，今日与大家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如果回去，见到你们的父母及长安父老，替朕向他们表示歉意，大家好自为之吧。"说完泣下沾襟，众人皆哭，说："臣等与陛下共生死，不敢有贰！"玄宗良久说，去留自便，自此流言始息。

四、影响及借鉴

唐朝到玄宗时期进入全盛，但也正是玄宗时期丧失了全盛，太平盛世的得失留给后世太多的思考，让我们又想起了一句古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成就一个时代需要几代人的励精图治，而毁掉一个时代仅需一不小心，或稍不留神，这也难怪古人要争论创业难和守成难的问题，也许今天这样的问题仍未过时，因为历史的问题经常会吸收现实的成分，而变成现实的问题，"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诚哉是言，强大的唐朝如何在一次叛乱后元气大伤，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重演，自然而然地回到了对安史之乱的反思上，有几个方面不得不考虑。其一是防微杜渐，玄宗君臣由积极进取转向消极享受是一个渐变过程，在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之间逐渐落伍；其二是居安思危，开元天宝时代是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盛世，经济建设成就突出，国际地位也颇有建树，文化成就更是举世瞩目，但社会忧患意识和民族反省意识却成为短板；其三是听言纳谏，国家治理是系统工程，只有吸收各方面最有建设性的想法，才能做到后胜于前，逐代累进，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闭目塞听必然导致眼光短浅，心胸狭窄，出现个人利益大于一切的情况，必然自食其果；其四是惩恶扬善，社会管理建立在民风淳朴的基础上，为官者以移风易俗为己任，为吏者以兴利除害为自觉，为君者与民同乐，为民者与国同忧，为恶者无地自容，为善者众口称誉，诚信向善的社会风俗是保持稳定和维护太平的最得力武器，唯有在思想上筑起防溃之堤，才能防患于未然。

（撰稿人　贾志刚）

宋夏三川口、永乐城之战

一、宋夏三川口之战

西夏建立之前，元昊采取联辽抗宋的策略，屡次对宋境进行扰掠，不断扩大领地。北宋统治者息事宁人的退让态度，使得元昊的略境行为愈演愈烈。西夏建国后的第二年（1039），元昊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国家地位，开始发动对宋战争。

（一）战争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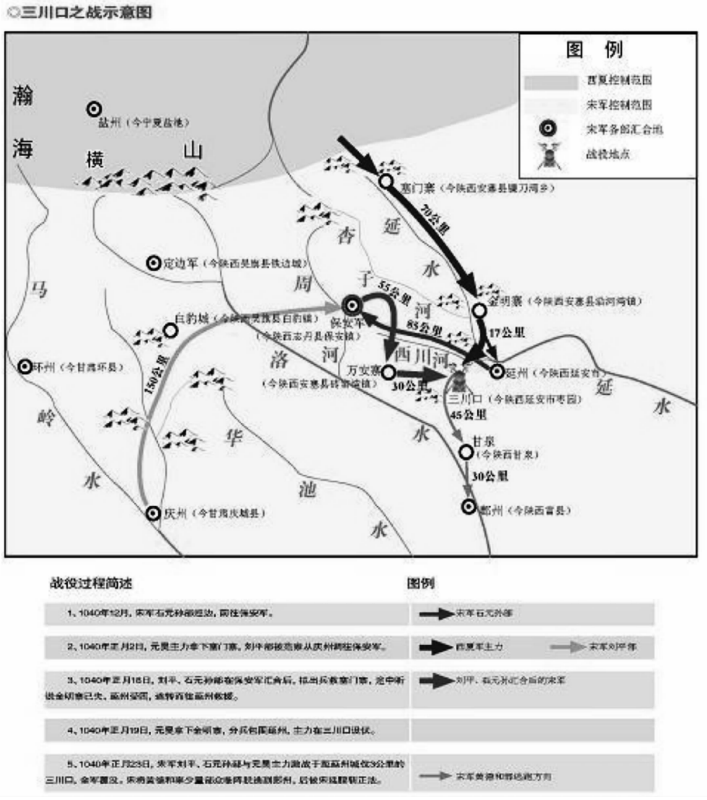
自宋真宗以后，宋朝的边备便日渐松懈，士兵孱弱，战斗力大幅下降。延州是位于宋朝西北边境的军事要地，也是西夏出入的要冲，因此成为元昊对宋战争的第一个目标。当时知延州范雍得知夏军进攻的消息恐惧万分，急忙上奏朝廷请求增兵支援，然而他的上疏在入京之后即被扣留，并未报至仁宗皇帝手中。

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派牙校贺真率部下向宋金明砦（今陕西安塞县北）都监李士彬诈降，并且下令西夏将士凡遇李士彬者，均不得作战。李士彬见此状况，以为西夏士兵胆怯怕战，便骄傲轻敌起来。元昊趁其不备，率兵数万一举攻下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继而进攻金明砦。待元昊军直逼金明砦之时，范雍连忙手书调集鄜延副都督石元孙和鄜延、环庆副总管刘平前来救援。此时诈降的西夏士兵里应外合，李士彬尚未出战便沦为俘虏。

西夏军攻下金明砦后，随后南下，进逼延州。刘平自庆州率领八千精锐与石元孙汇合，共计万余人，昼夜行进驰援延州。大军行至三川口（今陕西安塞县东，即延州、宜州、洛州三条河流汇合处）遇到已经在此驻扎设阵的西夏军队，便仓促应战。尚未开战之际，鄜延都监黄德和被人多势众的西夏军队吓得领兵自阵后先逃，宋军士气大减，随即溃败。刘平、石元孙二人带领余众撤退至西南山，安营扎寨进行战略防御。元昊先派一部分军队在寨前挑战扰乱，然后亲自带兵从山后攻破山寨，刘、石二人兵败被擒。

西夏军队在三川口全歼宋军刘、石部之后，集结于延州城下，为攻城做准备。就在延州城危在旦夕之时，天降大雪，寒风四起。西夏军缺少御寒的衣物，无心恋战。另一

方面，麟州都教练使折继闵、柔远砦主张岳、代州钤辖王仲宝率兵攻入西夏境内，元昊不得不回师救援，延州之围随之而解。此后西夏军队屯驻于金明砦，攻取了宋安远、栲栳、黑水等砦，控制了横山以南至延州一带的地区，宋朝在甘陕青宁边境的防御从此处于被动地位。是役为西夏政权日后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军事基础。



三川口之战示意图

（二）宋军战败的原因及启示

三川口之战以宋军的惨败告终，分析其失败原因，就会发现这样的结果并非偶然。北宋中期统治腐败，官僚政治黑暗，尖锐的阶级矛盾充斥着整个国家。由于北宋立国以来实行土地不抑兼并的政策，地主阶级对土地进行大肆掠夺，导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广大贫苦百姓除了上交赋税，还要承担繁重的国家徭役，生活痛苦不堪。不仅时有农民反抗斗争，士兵兵变也此起彼伏，“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无日不有，大则欲谋杀官吏，劫仓库，小则欲谋劫民户，入山林”。另外，宋真宗朝以后浮华奢靡之风四起，崇佛道，重祭祀，耗费巨资于各种宗教活动当中。宋真宗修玉清昭应宫历时五年（1009—1014），“耗费国帑，不可胜计”。宋仁宗祭祀仅飨明堂一项，就耗钱一千二

百余万缗。国家边事频仍，统治者却将大把钱财耗费在于国计民生毫无益处的地方。反观西夏，由于处在建国初期，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励精图治，艰苦创业。一方面继续完成对河西地区的统一，另一方面着手建立和健全一个封建国家，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军事制度上，有宋一代崇文抑武，推行“将从中御”之法，边帅不能独立自主地指挥战斗，只能依照事先制定好的方略阵图进行部署，这样必然不适用于灵活多变的战事。此外，统兵作战的主帅身边，往往有不懂军事的文臣担当监军，严重地干涉了主帅对军事行动的部署。加之“更戍法”导致西北边帅一年之内更换数人，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兵将之间毫无默契，严重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与宋军相反，西夏统兵将帅都有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他们的最大军事单位为监军司，每个监军司都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作战计划由皇帝和将帅一起商定，虽然是落后的部落兵制，但在实际的作战效果上比宋朝的“兵将分离”要高明很多。

从兵源来看，宋朝军队主要有三个方面：“荒年募兵”，即在灾荒之年招募饥民入伍当兵；配隶，即让罪囚们服军役；抓佚，强征平民百姓入伍。宋仁宗时，陕西募二十营神捷兵，“所募多市井迭软，不足以备守”，即便是京师来的禁军，也不擅长冲锋陷阵。通过以上方式扩充的军队，其战斗力自然无法得到保证。士兵们本身素质就不高，平日的训练多是走走样子，军纪松弛，长期的和平局面又不经战阵，军队普遍腐化。西夏党项族军队长时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恶劣的环境造就“其民俗勇悍”，且人人能战斗，没有明确的兵民之别。最为突出的是，西夏人精骑善射，组成的骑兵“最能倏忽往来，若电击云飞”。宋夏士兵素质的差别，使得两军战斗力高下立现。



军事装备方面，宋、夏军队也有很大的差距。宋仁宗即位之初，基于太平的形势，曾诏令诸路每年削减原武器生产量的一半。而这一时期西夏在西北的崛起，宋朝战马来源被大大压缩，进一步导致骑兵根本无法与西夏抗衡。西夏不仅盛产良马，党项人还能用冷锻法打造出“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的铠甲。威力极大的神臂弓也是党项人的发明，西夏步兵往往“挽彊注射，锋不可当”。

除上述军事、政治等方面原因外，还有一极为重要的原因，即元昊的个人军事才能。元昊自幼熟读兵书，生长于戎马之中，长期的战争环境将他逐渐锻炼成一个杰出的军事人才。三川口一战，元昊成功利用知延州范雍的胆小愚儒，声东击西巧夺金明砦，设伏三川口，以逸待劳全歼宋军。交战时他时刻把握着“以合击分”的原则，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宋军几十万军队分守各处，被动防御，导致全面落败。

二、宋夏永乐城之战

永乐城，宋神宗又赐名为“银川寨”，是北宋元丰四年（1081）宋军收复西夏所据银州后，取代原城所筑的新城。意在实施占据横山，俯视兴、灵的战略方针。《宋史·地理志》记载：“银州，元丰四年收复。五年，即永乐小川筑新城，距故银州二十五里，前据银州大川，赐名银川寨。”横山地区对宋、夏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西夏把横山地区视为生命线，北宋将横山作为防守和进攻西夏的基地。永乐城正处于宋、夏相争的横山山脉东路。

（一）战争的经过

庆历和议（1044）之后，宋夏双方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局面。到了宋神宗时期，西夏国内权力变动，梁太后与其弟梁乙埋姐弟当权，弄得政治腐败，国力日衰。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提高政治威望，梁太后多次发动对宋战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元丰四年（1081）的庆州（今甘肃庆阳）之战，宋军取胜，并占领西夏两千多里土地，极大地鼓励了赵宋统治者。元丰五年（1082）五月，环庆路经略司上奏宋神宗，自三月份以来西夏开始召集人马，聚集在兴州，有寇边的动向。到了四月，西夏军队聚集了近两万之众。宋廷认为这次西夏在兴州附近的主动进犯，正是与之决战的大好时机：“自去岁兴师以来，惟患羌贼迴避官军，致不能大有克获，贼今果如所报，则中国正得良便，机不可失。惟要探报得实，准拟有素，以本路兵马合成大阵，守控要害，伺其深入，痛行掩杀，则我用力少而收功多矣。”

早在元丰四年（1081），经略沈括就曾进言：“既获米脂寨，以横山势蹙，距宥州才三舍，下瞰银夏，平川千余里，皆沃壤，可以耕稼，为屯田之计，今乞于米脂之间城永乐，屯劲兵以抗虏，则河南之地尽可耕种。”这个方案得到了神宗的初步同意，并诏令给事中徐禧、内侍省押班李舜举往鄜延路议边事。元丰五年七月，徐禧与种谔一同上朝陈述自己的筑城方案。种谔并不主张于永乐筑城，认为“横山亘袤，千里沃壤，人物劲悍善战，多马，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据险隘，足以守御，兴功当自银川始。其次，迁宿州于乌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修盐州，以据两池之利，如此，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灵，可以直覆巢穴，又其次修筑兰、会，以尽横山之地”。然而，徐禧与沈括的意见一致，“盖银川虽据明堂州、无定河之会，而城东南已为（黄）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要……已与沈括等定议，自永乐埭、声塔平、移市、石堡、乌延至长城，领置六寨，自背罔川、良乜、孟乜、罗韦、啰泊川、布娘堡置六堡”。最终宋

神宗采纳了徐、沈的建议，诏令泾源、环庆、熙河兰会路诸路兵马声援鄜延路进筑横山。八月，徐禧、李舜举及沈括等率番汉军八万余人自延州出发，是日进驻绥德城。种谔因与徐禧交恶而留守延州，此时他仍极力谏言筑永乐城的弊端，但宋廷并不听取。待徐禧修筑永乐城完工后，西夏立即出兵三十万攻打，直取鄜延。在探知西夏大军动向后，徐禧不为所动，狂言“贼若大至，是吾立功之秋也”。又怕沈括分其战功，于是打发其回延州。不久，西夏骑兵从明堂川入驻米脂寨侧，在无定河西摆开阵势与宋军对峙。徐禧与李舜举亟领二万五千士兵自米脂返回永乐城。随后，西夏号三十万军攻打永乐城。曲珍率兵抵御，与西夏军队短兵相接不堪一击，遂败退回城。夏军乘胜追击，宋军死伤过半，永乐城被围。宋廷令麟、府州二万番汉兵紧急救援永乐城，种谔以守延州为借口拒不出兵。沈括所带军队也因夏军阻隔不得不退守绥德城。



永乐城遗址

永乐城初成，夏军压境之时，沈括曾建言徐禧：西夏兵众，不易抵挡，应退出永乐城，让西夏欲战欲守皆不方便。徐禧并未听从。至西夏全军而攻时，宋将又建议把握战机，趁夏军立阵未稳时夜里突袭，徐禧依然不听。围城的夏军以铁骑冲头阵，开始攻城。徐禧命曲珍率全部士兵列阵于前，又命骑兵突击，三战三败，夏军岿然不动。曲珍遂请命徐禧潜师自西山绕至敌后攻击，然而徐禧闭门不应，曲珍不得不收拾残部入关自保。夏军随即又夺取宋军水寨，永乐城内缺水掘井，过半士卒被渴死。夏军攻城之势越来越急，曲珍等众将请求组织敢死队突围，徐禧依然不从。围城十余日后，永乐城内已全无

饮水。夏军于城下劝降不成，于雨夜奋起群攻，永乐城破。徐禧、李舜举战死，曲珍等逃亡，史称“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永乐城宋军的惨败，宣告北宋收复兴、灵计划的失败。宋神宗听闻宋军永乐战败的消息后，临朝痛哭，宋夏对峙的局面得以继续保持。

（二）失败的原因

宋军永乐之战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西夏军队人数众多，“调民为兵，十丁取九，得三十万人，赍百日粮屯泾源之北，俟官军出塞而击之。既闻城永乐，乃引兵趋鄜延”。西夏军队来势汹汹，大有孤注一掷之势。而永乐守军只有区区三万，十倍之差，胜负立现。其次，永乐城被围，依然是西夏军集中优势兵力专攻一处，宋军诸路没有积极支援。种谔因为私人矛盾拒绝出兵，沈括退保绥德，泾源、环庆等路皆不出兵。再者，宋将帅之间的矛盾，徐禧先是因为意见不一将种谔留在延州，等到永乐城筑好之后又怕沈括分享筑城之功，也将其催促回延州，这样的将帅关系不可能成功抵御西夏的全力进攻。徐禧骄傲轻敌的心理，临战缺少灵活的指挥变化，也导致失败的必然。战初，徐禧仅仅留下四千人守城，自己与沈括屯驻米脂。待夏军大肆来攻，他又率二万五千人回到永乐城。对于夏军动向的报告，徐禧充耳不闻。徐禧主观轻敌，导致延误战机，连战连败，最终战死永乐。



徐禧

三、宋夏战争的影响

在陕西地区，宋夏之间的几场战争都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在于北宋数十万的军队分散防守于数千里长的战线上，而西夏军集中兵力攻其一处，在战役上形成优势。北宋驻守的各个堡寨之间疏于配合呼应，往往抵御不力，蒙受巨大的损失。宋夏之间的一系列战争给陕西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夏军每次入侵都烧杀抢掠，造成陕西沿边地区一片残破。北宋为应付连年战争成倍增加的军费，最终全部落在劳动人民身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繁重的徭役、赋税的征调，也逐渐加深了北宋国内的阶级矛盾，加速了北宋统治危机的到来。作为战胜方的西夏也承受了严重的后果。战争爆发后，宋夏双方的经济贸易停滞，西夏境内生活日用品奇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负担加重。连年的侵宋战争，也使得西夏国内劳动力脱离生产，战争对畜牧业、农业的破坏严重。

四、对今天的启示

在今天看来，宋夏战争依然很有启发意义。当今和平发展的大形势下，如果我们一味地发展经济而忽视了国防建设，就会重蹈宋夏战争时期宋朝的覆辙。一个真正的大国，也应该是各方面建设均衡发展的国家。国家安全是立国的根本，同样也是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的保证。营造一个安定和平的局面，首先需要建立健全军事制度，强化不惧怕战争的意识，不接受也不容忍任何国家的军事挑衅行为。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优势，更是国威的象征。任何时候，我们保卫国家保卫领土的思想都不能松懈。

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的出众，更体现在国内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等方面。像西夏一般为了政治利益而穷兵黩武，对交战双方社会经济都会造成严重影响，只会引起人民的不满，最终加重统治矛盾。通过协议谈判解决地区间的矛盾，从古至今都被证明是最理性、最符合双方利益的方式，和平与发展长期以来都是时代的主题。

（撰稿人　张　明　王翰儒）



宋金富平、和尚原、饶风关之战

一、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

——富平之战

南宋建立后，金朝以摧枯拉朽之势加紧南下，妄图一气灭宋。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始，宋军节节败退，只能勉强抵抗金军的进攻。直到建炎三年（1129）的黄天荡战役，韩世忠的出色阻击迫使金兵铩羽而归，初步扭转了宋军的颓势。这样一来，宋金战争进入了相持拉锯阶段。金朝意识到短期灭宋的想法不现实，便对灭宋的战略做了调整，即放弃原先举兵攻打东南的方案，把军事重心转向西北地区，确立了先取关陕，进而入川，最后沿江而下直捣临安的战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金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富平之战爆发。

（一）战争的经过

陕西地区的抗金斗争开始于建炎元年（1127）冬，当时金将娄室率军大举进攻，京兆（今陕西西安）、陕（今河南三门峡）、华（今陕西华县）、陇（今甘肃陇县）、秦（今甘肃天水）等府州先后沦陷。公元 1128 年，鄜延经略使王庶号召渭河南北的义军豪杰共同抗金，得到各方热烈响应，一时间陕西人民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但是由于泾州统制曲端等宋将对义军采取敌视的态度，并且宋将之间也相互心存芥蒂，使得南宋在陕西的抗金力量总体上呈衰弱趋势。在宋高宗于金军的追击下被迫逃往江南，整个南宋抗金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川陕地区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建炎三年（1129）七月，因平定“苗刘之变”有功的张浚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慷慨请行”，被任命为川陕宣抚处置使，统一指挥川陕抗金斗争。

建炎三年九月，娄室为了配合东线兀术的渡江战役，在陕西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很快京兆陷没。李彦仙举义兵在陕州且战且守，屡破金兵，成为金军后方的一大忧患。可是曲端在是否援助陕州义军抗金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出兵，最终陕州因缺少

后援而在建炎四年（1130）沦陷，义军首领李彦仙壮烈牺牲。陕西义军抗金斗争也自此失败，南宋因为失去了抗金义军的配合而在战场上的主动权进一步丧失。

建炎四年（1130）秋，金军东线将领兀术渡江南下的计划失败，陕西成为金朝极力争取的地区。张浚没有充分估计到金军这一新的动向，以为金朝进攻的重点还是在江南地区，不顾众将的反对与劝告，一意孤行的实施其上任以来就倾向的大举进攻策略。随即筹措军饷，在川陕“贷民赋五年”，兴师动众向金左副元帅粘罕移檄问罪，命吴玠收复永兴军，赵哲收复鄜延诸路。金朝见势随即调兀术入陕进行增援，“富平之战”一触即发。根据敌强己弱的形势，曲端建议不同金兵正面对战。吴玠也建言：“高山峻谷，我师便于驻队，贼虽骁勇，甲马厚重，终不能驰突，我据嵯峨之险，占关辅之势，贼虽强悍，不能据我尺寸地。”张浚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罢免了与己意见相左的曲端，“责海州团练副使，万州安置”。

吴玠与赵哲均顺利攻取永兴军与鄜延诸路后，张浚更加轻敌，大规模调兵遣将，召集永兴军吴玠、鄜延路赵哲、熙河路刘锡、秦风路孙渥、泾源路刘锜五路合兵，共计20余万，集结于富平。张浚本人却在距离富平200里以外的邠县“遥控指挥”。宋军先行到达战地，吴玠提议：“兵以利动，……宜徙居高阜。”张浚对此不屑一顾，屯兵于地势偏低的卤泊川北岸的浮原上，幻想“苇泽”可使金朝的骑兵无法施展。大将郭浩建议“分地守之，以待其弊”，同样被张浚拒纳。

是时，兀术所部正屯驻于距离富平80里的下邽县，而娄室的军队尚驻在绥德军。有人建议趁金兵尚未会合之机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张浚却认为“夫战者，当投战书，约日会战”，于是派遣使者投书与金军约日会战。至九月十四日会战，金兵为了麻痹宋军故意不出兵，张浚几次奉战书约战金军都不予回应。张浚遂骄傲地张榜：“能生致娄室……虽白衣亦授节度使，赏银、绢皆万计。”之后娄室率军急驰至下邽，与兀术军会合，屯驻于地势较高的卤泊川南岸的华阳原上。待到宋军自大丧失斗志之时，金兵方发起攻击。金朝军队先以三千骑兵负土填平了“苇泽”，接着向乡兵小寨冲击，毫无武装的乡民四散而逃，宋军尚未作战已经阵脚大乱。接着娄室、兀术一左一右两路突进。兀术一路遭遇刘锜顽强抵抗，进攻受阻；娄室一路正对环庆路赵哲军队。在无他路增援的情况下，赵哲抵抗不住金军进攻，临阵逃跑，致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宋军丢盔弃甲一路溃败，主帅张浚也“乘骐急奔”，沿着邠州—秦州（今甘肃天水）—兴州（今陕西略阳）—阆州（今四川阆中）一线逃亡。这场以数十万宋军与全陕物力参加的大会战，仅仅半天便以宋军的大溃败告终。“金人得胜不追，所获珍宝、钱、帛如山岳，不可计。”川陕数年之积聚，委弃于一旦。

（二）富平之战的影响

富平之战前，南宋在陕西战场的抗金斗争形势并不乐观，当时南宋处于战略守势。尽管会战之前曲端、吴玠等将领都反对张浚的主动决战计划，但后者却不顾反对，执意大举决战。这样不根据客观情况出发的一意孤行，违背了军事作战的规律，注定失败。而且，作为主帅不听众将劝告的举动也违背了众将领的意愿，军士们作战的决心不够坚定，自然也无法发挥出百分百的战斗力。当决战之势已定，金兵未会合之时，张浚依然没能抓住时机进行出击，而是因循守旧，一直被金兵牵着鼻子走，被动挨打。总之，富平之战中宋军的战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张浚“料敌人之不审，陷无端于无辜，昧左右之谮言，执一己之私，断失五路之地”。张浚的指挥失败，是战败最主要的因素。

富平之战是南宋军队第一次对金军发动的战略反攻。富平之战宋军的溃败，不仅仅限于战争的失败，它进一步给陕西地区的抗金斗争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因为张浚决战的计划而没有做任何应付失败的准备，使得数十万宋兵全线溃败，士气全无，这种失败的情绪让陕西地区宋兵的继续抗金已经不可能。另外，诸将之间矛盾的彻底激化，进一步削弱了陕西抗金的势力。战后张浚为推卸责任，将刘锡贬谪，杀了赵哲，又残杀环庆路的诸将士，逼得环州将官慕容洧投奔西夏，曲端的部下张中孚等人也叛投金朝。

战后，陕西五路丧失，对整个宋金战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雍州之地，古称天府……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此用武之国，非诸夏所同。”陕西地区自五代开始就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泾渭二水而农业比较发达，还是宋朝战马的主要供应地。宋高宗曾经有“陕西五路，劲兵良将所出”的评价。五路之失，使得南宋失去了一个粮食产区和战马的来源地。战前，陕西兵一度被认为是宋朝最精锐的军队，南宋初年诸将如韩世忠、张俊、曲端、吴玠、吴璘等大多是西北之人。“自古中兴之王，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足于复中原而有西北。”陕西的丧失，意味着南宋失去了一个便于收复失地的战略基地。金朝占领了陕西，也就解除了其南下攻宋过程中侧翼的威胁，更加占据了战略主动。



张浚

富平之败和丧失陕西五路之后，宋金双方就沿着秦岭—淮河一线相持，

这也大致是后来双方所划定的分界线。因而，富平之战也是宋金对峙局面形成的一个标志。

二、吴玠的孤军抗金

——宋金和尚原之战

建炎四年（1130）富平之战后，宋朝基本丧失陕西。接下来能否退保四川，成为宋朝战略防御的首要问题。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不肯退入四川，招集散亡的士兵数千人驻守在大散关东边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南）。

自北南下入蜀，大散关是最近的道路。位于大散关东北的和尚原，为宝鸡中部河川低地向南部秦岭山地过渡地带，是大散关的天然屏障。和尚原大散关一线不保，则川蜀岌岌可危。宋军新败，将士皆斗志全无，南宋朝廷也杳无音讯，陕西各地的驻军呈一盘散沙状态。面对极度艰难的困境，吴玠“召诸将歃血盟，勉以忠义，将士皆感泣，愿为用”。同时，吴玠军与当地民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凤翔府一带的民众对吴玠军队“相与夜输刍粟助之，玠偿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杀之，且令保伍连坐，民冒禁如故”。在自身的团结努力与民众的支持帮助下，吴玠军得以摆脱困境稳定下来。

（一）战争的经过

绍兴元年（1131），富平之战半年后，金军开始进攻和尚原。三月，金太宗没立亲自攻打和尚原失败而归。五月，没立与乌鲁孛堇、折合孛堇率领数万军队分兵两路：没立正面进攻箭筈关，乌鲁、折合绕过大散关走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与没立在和尚原会合。面对金军的夹攻，吴玠指挥吴璘等人出战，先后两次击退乌鲁、折合路的进攻，没立路失去呼应亦败。两次干净利落的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和尚原之战就此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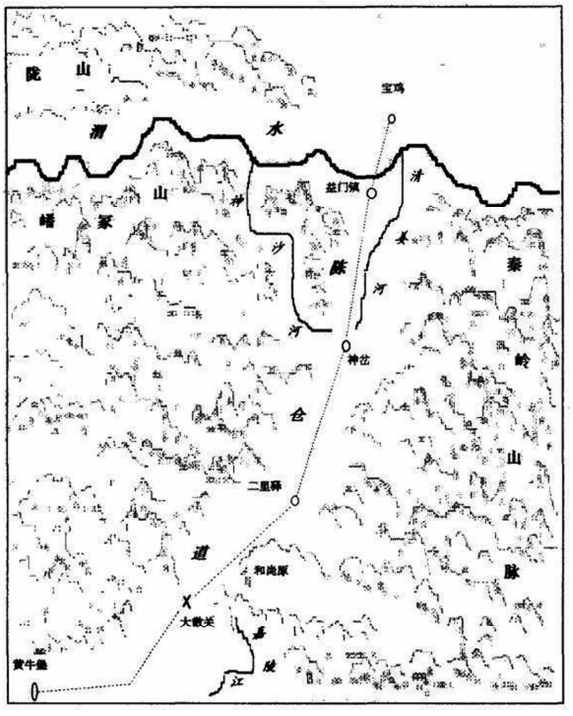
富平之战后，金军主帅娄室死去，另一将领兀术负责川陕战场。绍兴元年进攻和尚原的两次失败使他十分气愤，于是在同年十月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金史》中有相关记载：“及攻吴玠于和尚原，抵险不可进，乃退军，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打败，将士多战没。”实际上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天，“十月九日，金贼伪四太子亲统大军，于凤翔府宝鸡县界渡渭河入谷……初十日午时，直犯驻兵处和尚原。玠遣统制官吴璘、雷仲统率将兵，与贼拒战，展转至晚，杀败三阵……

十一日，金贼欲出宝鸡，前去神岔口，伏兵杀回，……至十二日寅时，贼众拔寨遁走，于二里驿东复来迎敌。自寅至酉，大小凡三十馀阵”。三天激战，昼夜不停，这样的激烈程度在宋金以前的战争中是没有的。两军共计交战三十余回合，最终吴玠部成功抵挡住了金军的进攻，兀术只好率残余军队返回北方。

此后金朝回避了对和尚原的正面进攻，任命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与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合兵攻蜀。绍兴二年（1132），金军自长安出发，先后攻下商州（今陕西商县）、金州（今陕西安康），进逼洋州（今陕西洋县）。吴玠率军于绍兴三年（1133）二月赶至饶风关（今陕西洋县东）拒敌，金军绕出关外夹攻宋军，吴玠部战败失守饶风关，金军遂占据洋州。通过洋州，金军进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直达三泉县东北的金牛镇（今陕西宁强北），四川大震。虽然金军节节胜利，但是其死伤人数也已过半，宋军一直奉行坚壁清野的战略措施，金军给养不足，终于被迫退兵，川陕战局暂时转危为安。

在和尚原之战中成功阻击金军后，吴玠认为“和尚原距川蜀地远，终恐粮道不继，难以持远，遂于川口仙人关侧近杀金平，修置山寨”。仙人关位于凤州（今陕西凤县）与兴州（今陕西略阳）的交界处，吴玠在此布置了第二道抗金防线；和尚原由吴璘率军驻守。绍兴三年（1133）冬，金朝元帅兀术又一次率军南下，和尚原的吴璘以无粮为由主动弃寨而去，金军遂占据和尚原；进而在绍兴四年（1134）继续深入，与吴玠军激战于仙人关。

（绍兴）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金贼四太子与皇弟郎君引领万户、千户七十余人，率大军十余万众，半是马军，前来仙人关对垒，连珠扎四十余寨。……凡三十余战。至三十日，杀退贼众。……三月二日，劫破伪四太子、皇弟郎君大寨……并生擒一百余人，斩获五百余级。金人四太子等因大兵累日剿杀，大败，势已穷蹙，自焚烧寨栅，驱拥败残余党，寅夜移寨退走。



和尚原之战地形示意图

仙人关之战大概分为两个阶段，二月份时金军处于攻势，到了

三月份宋军开始反攻，吴玠发兵追袭伏击，金军开始败逃。

（二）和尚原之战的影响与吴玠的功绩

金军自从灭辽以来势不可当，南宋以淮水为屏障，才能够勉强抵挡住金军的攻势。之前岳飞的建康大捷，韩世忠的黄天荡之战，都以金军的战败收场。然而在规模上，和尚原之战可以称得上是金军灭北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在富平之战击败川陕宋军之后，金军并没有乘机扩大战果。过了一年的时间，金军才开始大举进攻和尚原，这样就给了宋军充分的备战时间。兵力上，金军在数万之多，并且其中一半都是骑兵。吴玠驻守和尚原时，兵力仅仅几千上下，能够抵挡住金军的进攻，实属以少胜多的典范。

和尚原是陈仓道上宝鸡到大散关的一处制高点，其上略平，其旁陡峭，利于据高制下以步兵防守，而不适合骑兵冲击。金军骑兵在山险蜀道上无法施展，吴玠扼守于此具有天然的优势。即便金军绕过和尚原直接攻入大散关，也会因为没有退路而进退两难。可见这样的地形优势是吴玠军获胜的一个重要前提，除此之外，战胜的原因还有主帅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作为驻军和尚原的主帅，吴玠自幼从军，抗击西夏，屡立战功。建炎三年（1129），张浚巡抚关陕，授其为宣抚司统制，建炎四年（1130）擢为秦风路副总管兼知凤翔府。在五路兵败，宋军无人统领的危急关头，吴玠在审时度势后下定决心，执意孤军坚守和尚原。首先，吴玠很好地调动起了士兵们的斗志，使宋军面对所向披靡的金军时，心理上不至于胆怯。在对比分析双方军力的优缺点后，探索出了一套以步制骑的战术：设置要塞，坚壁清野，回避与金军的正面对抗，以此消减对方锐气。其次，吴玠实行纵深防御，使得金军骑兵的战力无法发挥。和尚原战后在仙人关设置第二条防线，也是此战术的进一步应用。加之宋军以强劲的弓弩为主要武器，不论白天黑夜车轮式的白刃近战，这样最大程度地扬长避短，令金军混乱不堪，只能疲于防御。



和尚原之战，是金朝军队主攻方向由江淮地区转移到川陕地区以迂回灭宋战略的继续，也是宋军在川陕地区首次取得的抗金重大胜利。此战重创金朝兀术军队，使其短期内不具备再次南下攻宋的可能。同时此战也稳定住了宋朝川陕驻军自富平惨败以来涣散的军心，对宋金双方以后的战事格局以及川陕政治地理格局的演变，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

吴玠坚守和尚原，付出了血的代价，力保川蜀的安全，稳定住了整个宋金战势，更是暂时保全了南宋政权的存在。然而在吴玠死去的第三年（1142），南宋朝廷一味跟金朝屈膝求和，不仅下令撤去了秦岭北线的抗金军队，更是将和尚原割让给了金朝。这种做法与吴玠坚持抗金力保和尚原的正义之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南宋失去了战略要地和尚原以及整个川蜀的安危，但是留下的是吴玠以生命保卫国土、保卫南宋王朝的不朽功绩。

三、虽入三州，而得不偿失

——饶风关之战

（一）战争经过

和尚原金军战败后，金朝任命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取代兀术全面负责陕西战区。撒离喝驻兵凤翔府，伺机南下再夺和尚原。南宋方面吴玠派遣其弟吴璘驻守和尚原，自己屯兵河池（今甘肃徽县），王彦驻军金州（今陕西安康），关师古驻军熙河。绍兴二年（1132），金将撒离喝与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合兵进攻四川。这次他们吸取了兀术的教训，避免对和尚原的正面进攻，从秦岭东段迂回南下。撒离喝命降将李彦琪驻军秦州（今甘肃天水）牵制吴玠，自己则亲自率主力军自上津（今湖北郧阳）西偷袭金州。驻守金州的王彦军因寡不敌众，致使金军进入汉中进逼洋州（今陕西洋县）。这时宋知兴元府刘子羽急派将领田晟于饶风关（今陕西洋县东）阻击金军，并急招吴玠支援。吴玠亲率精兵，自河池一昼夜急驰三百里奔赴饶风关，结果早于撒离喝半天，即绍兴三年（1133）二月初五到达。其间吴玠派人送给撒离喝一筐柑桔以解渴，震惊的撒离喝以杖击地："尔来何速耶?"

第二天战斗开始，金军强攻，吴玠军矢石俱下依然逼不退金军。惨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六个昼夜。后来宋军中一个因为犯错遭罚的士兵叛降，带领金军经由小路绕至关后高地，居高占优而战。吴玠守军不得不弃关向西退兵，金军破关后占领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进而直达三泉县东北的金牛镇（今陕西宁强北），紧邻四川。兴元守将刘子羽放火后弃城而走，与士兵三百余人据守潭毒山（今陕西宁强县内），利用山势筑垒固守，坚壁清野。吴玠则退回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打算截断金军后路。金朝军队长驱直入，虽然一路连战连捷，但是所部也死伤过半。占兴元后，金军没有得到任何给养，军中发生饥荒，甚至到了杀马为食的地步，最终不得不撤退。刘、吴二军又乘机追击，金军丢盔弃甲仓皇而逃，饶风关之战以金军"虽入三州，而得不偿失"告终。王彦于五月收复金州，至此金军全部被赶到了秦岭以北，川陕战局转危为安。

饶风关之战金军虽胜犹败，十分不甘。于是金朝重新任命兀术统兵，于绍兴三年（1133）冬占领和尚原，绍兴四年（1134）与吴玠军激战于仙人关。经过三十余战，金军于三月二日被迫撤军，退回凤翔。接着宋军于四月陆续收复秦、凤、陇等州，金军战败后基本放弃了南侵四川的企图。

（二）吴氏兄弟的抗金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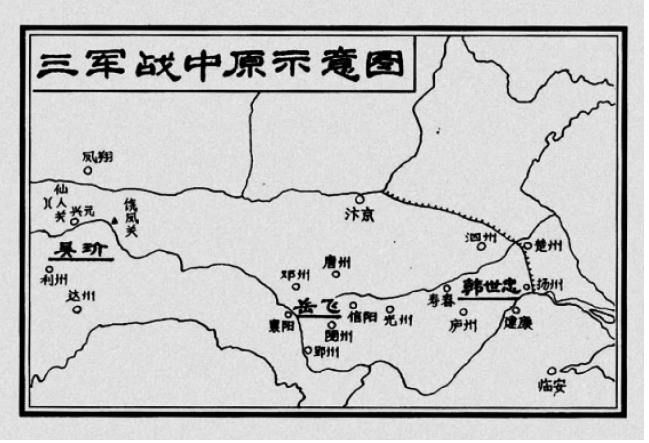
和尚原之战、饶风关之战和仙人关之战，史称“蜀口三战”。这三战的胜利，最终确立了宋金沿秦岭一线对峙的基本形势。吴玠最初以几千人扼守和尚原，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后来打败金军主力完颜兀术的军队，威名大震，使得他本人早于岳飞成为南宋第一个因抗金军功而晋升节度使的将领。仙人关之战后，吴玠被任命为川陕宣抚副使，真正成为川陕地区主帅，全面负责川陕战场。绍兴九年（1139）吴玠又升为四川宣抚使。同年，吴玠积劳成疾而死，享年47岁。对于吴玠的战功，著名史学家王曾瑜先生就评价道：“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



吴玠墓

吴璘为吴玠之弟，和尚原、仙人关之战中均与吴玠合力抗金。绍兴九年（1139），吴璘迁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知秦州。绍兴十年（1140），大败金军于扶风县。绍兴十一年（1141），又大败金军于剡家湾（今甘肃天水附近）。绍兴十四年（1144），身为利州西路安抚使的吴璘负责川陕西线防务，治军严肃，常如敌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军自凤翔取大散关。吴璘被任命为四川宣抚使，全面主持川陕战场。他扼守大散关击退来犯金军，于次年（1162）收复了秦凤、熙河等十六州军，声势大振。吴璘在川陕战场抗金二十余年，于乾道三年（1167）死去，威名仅次于其兄吴玠。

吴氏兄弟成为一代抗金名将，与他们的崇高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是分不开的。吴玠从小“沉毅有志节，知兵善骑射，读书能通大义”，吴璘也是“少好骑射，从玠攻战”，



南宋抗金三军

所以，他们能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忠心朝廷保卫国土。吴玠还善于学习古代优秀的军事思想，在带兵实践中为己所用。“玠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能根据实际战事做出正确的决策。他们带兵素质过硬，“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与大家打成一片，士兵们甘愿为之冲锋陷阵，作战积极性很高。

（撰稿人　张　明　王翰儒）

明末陕西农民大起义

一、澄城民变

1. 早期起义

习惯上，我们将天启七年（1627）发生在陕北的澄城民变看作是明末农民起义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但也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很难说陕西的农民起义是在天启七年才开始的。崇祯初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说过："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杨嗣昌在崇祯十年的一个奏疏里说得更加明确："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1619 年）。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偶（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杨鹤父子叙述的情况是可靠的，在其他一些史籍里面可以得到印证。如戴笠、吴殳在叙述陕西农民起义的开始时就明确指出：

陕西兵于万历己未四路出师，败后西归，河南巡抚张我续截之孟津，斩三十馀级。馀不敢归，为劫于山西、陕西边境。其后调援频仍，逃溃相次，边兵为贼由此而始。天启辛酉（元年），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愿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

在地方志里，也有早期起义农民流动于各地的零星记载。如《汉阴县志》说："（万历）四十三年，流贼劫掠乡村，出没无常，为地方患。"《霍州志》载："天启三年，流寇突至霍州南关，杀数人。"《洋县志》载："天启四年七月，流贼突至斜堰河坝，杀死周之弘，邑为骚动。"《西乡县志》说："（万历）四十八年，流贼俞士乾率众犯境。天启

七年，流贼王魁禄率众犯平地等处。”《国榷》也记载了四川巡抚尹同皋上言：“陕西流盗由保宁入川，蹂躏广元、神宣之间。天启六年八月，神宣指挥吴三桂御之，斩三级，一系贼魁。十二月，又从眉林沟入犯，守备王虎等御之，斩纪守恩等十二人，追至宁羌界。秦蜀两道，事权宜兼制，乞敕陕西各道府多方缉抽。从之。”

这些事实说明，从万历末年起，陕西军民就已经开始了抗暴图存的武装斗争。早期的起义群众虽然人数不多，但活动的范围却相当广，在同陕西相邻的山西、四川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只是由于当时的声势还不够大，首领人物也不为人们所知。关于这些早期的起义队伍，除了一些点滴的记录以外，无从弄清他们的确切情况。

2. 澄城民变

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县爆发农民起义。三月，陕西白水县人王二率领西安府北部的澄城县饥民冲进县城，杀死严催赋税的知县张斗耀，正式拉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明末农民大起义首先在关中爆发，绝非偶然。澄城在当时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县，境内大部分是山谷。史籍记载，这里“土瘠赋重”，本地农民由于负担不了政府的沉重赋税，大多逃亡，丢下大片土地没有人耕种。隆庆、万历年间，还有来自朝邑、郃阳、蒲坂等邻近县份的农民开荒佃种。天启以后，由于朝廷的压榨越来越重，又加上天灾，户口凋敝更甚。“四远之民，望澄以为苦海。”尽管生产的破坏、人民的灾难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明廷不但不设法救济，反而一味追逼钱粮。髓干血尽的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感到与其束手毙命于杖下，不如揭竿而求生。天启七年（1627）二月十五日黄昏时，知县张斗耀正坐堂比粮，义愤填膺的农民们各持利器，从西门拥进公堂。张斗耀见势头不好，吓得躲进私宅，被郑彦夫等人追上乱刀砍死。澄城农民起义的消息迅速传布开来，各地的农民、饥军纷纷响应，一场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燎原大火就这样点燃了。

关于澄城农民起义，有的史籍描绘得非常详细。《鹿樵纪闻》说：“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烈皇小识》写得更是有声有色：“先是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耀采。众遂团聚山中。”

澄城农民起义爆发之后，陕西许多地方的饥民和饥军也闻风而动。府谷县有王嘉胤率领“杨六、不沾泥等群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聚为盗”。白水县王二等人起义后，攻破宜君县城，放出狱囚，随即北上同王嘉胤会合，人数达到五六千名，聚集在延安、庆阳的黄龙山。不久，被陕西督粮道洪承畴击败，转入山谷。安塞人高迎祥在崇祯元年

率众起义，带领一支队伍同王嘉胤会合。

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天扩大，北方官僚们束手无策。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上言说：

全陕地多硗确，民鲜经营。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烈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雒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摽掠，弱血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

农民起义在陕西大部分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二、李自成起义

1. 李自成陕北起义

明末统治者吏政腐败、荒淫无道，因之民不聊生，民变蜂起。陕北向来土薄民贫，加之天启末年、崇祯初年接连数年大旱，群众无法为生，只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澄城起义好像在干枯的草原上燃起一把烈火，顷刻间便成为燎原之势，如王嘉胤起于府谷，高迎祥起于安塞，王左挂起于宜川等。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由于借钱交纳赋税而欠了官债，被逼税逼债，生活无着，便和当时的陕北农民一样，走上了起义的道路，投奔高迎祥。各支农民军起先在陕北转战，以后陆续渡河入山西，由晋北打到晋南；经过几年与官军苦战，于崇祯元年（1628）冬到了晋、豫交界地带。在渡河之时，李自成成立起一支起义队伍，但仍拥戴闯王高迎祥，与其统一行动，共同作战。

始发于陕北的农民大起义，自起义军渡过黄河后便发展成为全国农民大起义。李自成起义军转战于黄河以南、长江南北的广大地域，达 10 年之久。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他多次进入陕西商州。他们或经此迂回出入，或隐蔽对付进剿，或屯兵休养生息，或扎根建立政权。李自成起义军在商州的活动轨迹如下：

崇祯六年（1633）腊月，李自成在高迎祥率领下来到了商州。

崇祯七年（1634）年底，由甘肃到陕西，经商州入河南。

崇祯八年（1635），从凤阳西进，经河南进入商州；端午节前后，在商州打破了洪承畴的围剿，进入关中；秋天，高迎祥、李自成在关中失利，由蓝田进入洛南，东出朱阳关进入河南。

崇祯九年（1636）春，高迎祥、李自成在河南失利，转走湖北，于光化羊皮滩渡过汉水向北，再一次进入商州。李自成从商州穿过，进入陕北延绥；高迎祥在商洛稍停之后，攻向安康方向。

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潼关南原失败，李自成突围入洛南，然后到商州和商南，在金钟山屯兵。经过几次战斗，于崇祯十二年（1639）冬突围进入湖北。这段时间，是他在商州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

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虽未亲自到达商州，但其一支军队占领了商州，建立政权。这个政权坚持了三个年头。

顺治二年（1645）正月，李自成由西安向湖北撤退，最后一次进出商州。

李自成牺牲后，其余部刘二虎于顺治三年（1646）二月由南阳经商南，攻开商州城，开署办事，后从山阳撤出陕西。这是李自成所余的大部队在商州的最后一次行动。

总之，李自成起义军与陕西商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李自成在商州的活动可以概括为七进七出，连其余部则是八进八出。

2. 大顺政权

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克襄阳。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改襄阳为“襄京”，“刱官爵，名号，大行设置”，李自成称“新顺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这标志着农民军基本上建立了与朱明封建政权根本对立的政权。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起义军西破潼关，攻占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进一步健全农民政权，建号“大顺”，建元永昌，并采取了造历书、铸钱币、平物价、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镇压地主豪绅及废八股、改试策论、选拔官吏接管地方政权等措施。



李自成起义军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率大军从西安出发，飞渡黄河，经山西直捣北京，对明王朝发动最后的冲击。三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直逼北京城下。十九日，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于景山；中午，李自成骑着乌驳马，着毡笠、缥衣，亲率农民起义军开进北京城。统治276年之久的明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

崇祯十七年四月三十日，李自成起义军在清军及吴三桂的打压下撤出北京，经山西退向西安。公元1645年年初，李自成放弃西安，退出陕西，由商洛入襄阳，东下武昌。四月下旬，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一带视察地形时，遇难牺牲。

三、明末陕西农民起义的历史启示

明末农民起义是一场极为深刻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首先燃起于陕西，在陕西局部地区呈现一片大好趋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对全国起义的扩大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起义的大好局面也鼓舞了士气，为大顺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起义形势的逐渐好转，领导者被已有胜利冲昏了头脑，加之农民阶级本身存在的局限性，最终葬送了起义的成果，整个起义以农民阶级的失败而告终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它的失败是历史必然，如毛泽东说的，在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撰稿人　张　明　张淑霞）

太平军、捻军在陕的活动

一、太平军在陕西的活动

1. 太平军对陕西的侦查活动

陕西地处西北，而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在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很大，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捻军，都对西北地区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

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后，在进军途中和建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后，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先后多次派出情报人员到陕西探听清军军情并暗中联络反清群众，以配合太平军的活动，太平军派往陕西侦查军情的具体人数不可详考，见于清官方文书记载的，主要有下列几起：

1852 年 12 月（咸丰二年十一月），太平军派杨合亨来陕西刺探留陕清军的数目及布防情况。1853 年 3 月（咸丰三年二月），杨合亨经河南南阳等地入陕，活动于周至一带。同月，太平军又派王芳来陕，王芳于 1853 午 2 月经河南及山西的河津、绛州入陕，活动于韩城、蒲城之间，后又经泾阳往甘肃平凉活动。几个月后，王芳又出甘肃泾川经陕西长武、咸阳到达西安。王芳出发时只领得盘缠 500 文，路途中主要以行乞为掩护，四处奔走，打探消息。半年内他往返数省，侦知不少情报。

1853 年 5 月，太平军攻克扬州后，又派安徽亳州人董中励等五人，装扮成卖线的小贩，来陕探听军情。可惜，当他们经河南入潼关时，不幸为清军查获。同时，太平军北伐途经河南开封时，也曾经派王毓高化装成游医．到潼关一带察看清军布防情形。

太平军接连不断地派情报人员到陕活动，使得陕西当局甚为惊慌，一面令各州县于各关津要隘严密盘诘搜查，一面加紧对捕获嫌疑人员的审讯。凡被捕者一律处死，有嫌疑者则严刑拷打。1853 年春，陕西当局将同情太平天国的群众陈敬邦、杨成教等疑为太平军密探而加以逮捕，经严刑审讯后查不出实据，仍不放过他们，在他们的面颊上刺上“外遣”二字，发配新疆，充作官奴。

2. 太平军首次入陕

太平天国前期，太平军被清军主力牵制在长江流域，一时无法分兵进军西北。1861年9月（咸丰十一年八月），太平天国的军事重镇安庆失守，这不仅使天京在长江上游失去战略上的门户，而且在经济上失去了重要的粮源基地。清军借此可以顺江而下，围逼天京。这种战略上的失利，也使庐州陷于孤立地位，局势对太平军极为不利。为了早日收复安庆，控制安徽，稳定天京局势，陈玉成命令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端王蓝成春等率领两万太平军进攻河南和陕西，一方面“广招兵马”，以图收复安徽；一方面吸引清军的兵力，以减轻长江流域太平军的压力。

1862年4月（同治元年三月），陈得才部经河南新蔡、南阳、内乡进抵陕西商南之富水关。之后，连克商南、龙驹寨、山阳、镇安、孝义（今柞水）、洽商等县。清军闻风丧胆，不战而逃。5月初，陈得才部兵出长安子午峪，突然直逼离西安城南三十里处的尹家卫。陕西巡抚惊恐万状，急忙令副都统乌兰都、马队参将阿扬阿、游击孟柏林等督率镇守省城的官兵并纠集都司张鹏飞等所募团勇，分别从韦曲、三兆两路攻击太平军。5月16日，太平军在三兆之红沟岸，以马队两路包抄清军侧翼，清军一触即溃，伤亡大半，连阿扬阿、孟柏林亦受重伤，乌兰都带残部溃逃入城。当时，陕西清军大部分还在外省，驻西安的官军经红沟岸一仗，已不堪一击。陕西当局只能“勉敷守城，剿办则全恃乡团，而各处纷纷请援，茫无以应。西安城门连日紧闭，陕抚坐困孤城，无计可施，只是日夜飞奏，催请援军驰救。



眼看西安城指日可下，而此时太平天国的军事重镇庐州陷入了清军多隆阿、张得胜等部的重围，陈玉成急调陈得才等部东返解救。此时渭、华一带回民起义方兴，回民义军首领“密遣心腹赴尹家卫输款”，请太平军前往声援。但是为了解救庐州，陈得才等不得不放弃进攻西安和联合回民起义军的打算，率军东返。1862年5月22日，太平军经蓝田厚子镇攻克渭南县城，知县曹七鹤等毙命。23日，太平军又击败尾追之官兵团

练，杀临潼军功安定邦等。接着，又连克华州、华阴，杀死团练头目陈茂经等，击败潼关清军副将哈连升的阻截，出关东去，进入河南。到达阌乡时，太平军得悉庐州失守、英王陈玉成殉难的消息，陈得才等于是率部绕道湖北，再次攻入陕西南部，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3．太平军离陕援救天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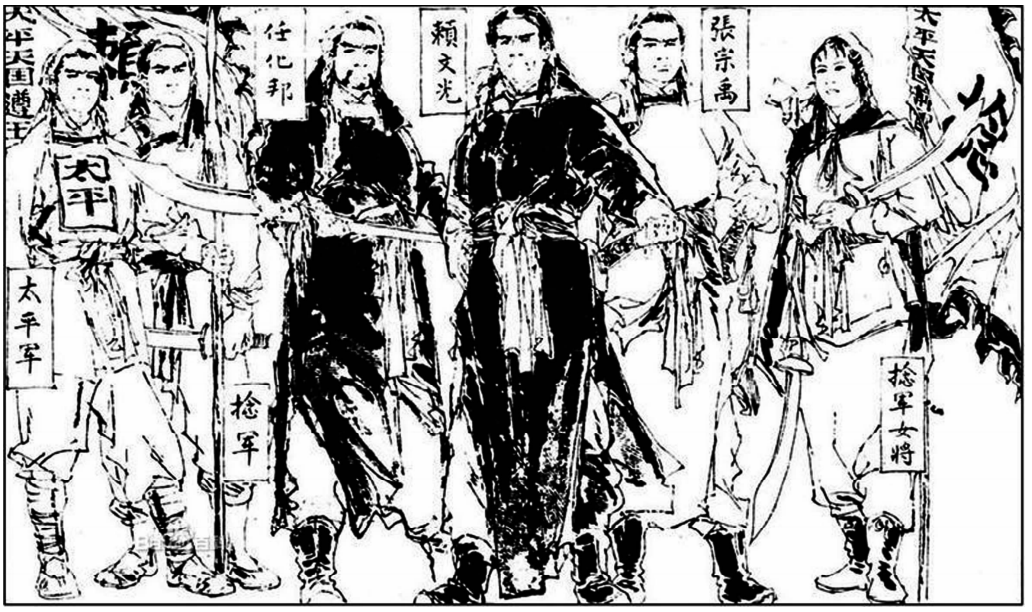
1863 年（同治二年）年底，由于外国侵略者与清王朝相勾结，联合围剿太平天国起义军，致使太平天国的局势更加恶化，天京频频告急，于是，天王洪秀全决定调各处太平军主力回京救援。转战陕西的太平军接到回师援救的命令后，从太平天国大局出发，立即兵分两路出陕。

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端王蓝成春率主力十余万，由宁陕、镇安、山阳、商州出陕，是为北路；启王梁成富率两三万人，由石泉、汉阳、兴安、湖北陨阳一线出陕，是为中路；天将马融和率两万多人，由西乡、紫阳、平利、湖北竹山一线出陕，是为南路。三路太平军约定：“在河南之南阳、湖北之襄阳一带会齐。”议决后各部即赶做布囊，筹集军粮，积极准备行动。

1864 年 2 月（同治三年一月）16 日，陈得才统领主力部队出发，到 27 日，太平军各部按预定路线撤离汉中，中路军和南路军虽遭清军李云麟部阻拦，但太平军并不恋战，先后转由北路相继出陕。

1863 年秋，清廷调四川布政使刘蓉任陕西巡抚，命他率四川清军入陕围剿太平军和已经入陕的李蓝起义军。但慑于两支义军的威名，刘蓉久驻广元，不敢入陕。后闻太平军将东援天京，这才于 1864 年 1 月 15 日移驻宁羌。这时，原石达开部将郑永和率领太平军中路部队和李蓝军曹灿章部也进入陕南，活动于佛坪一带；李蓝军的另一支蔡昌龄部活动于旬阳之蜀河一带，而李蓝军主力蓝朗柱部更是占领了关中重镇周至县城，进逼西安。刘蓉顾此失彼，更迟迟不敢前进。直到太平军全部离陕后，刘蓉才于 2 月 18 日进入汉中，此后又分别进入城固、洋县和西乡，清廷这才逐渐恢复对陕南的控制。

太平军出陕后，于 1864 年 4 月 24 日在河南淅川李官桥与活动于鄂豫陕交界的捻军陈大熹部会合，27 日又与捻军主力张宗禹部会合，三支义军合为一股，势力大增，共同日夜兼程，驰援天京。面对这支援军的到来，清廷十分惊慌，立即调整部署。一方面，清廷认为这支援军“以援救金陵为名，故能号召匪徒，团结不懈。为今之计，若将金陵迅速攻拔，则该逆失所依附，众心涣散，剿灭必易”。于是命令曾国藩、李鸿章所部拼死围攻天京。另一方面，清廷又命令豫、鄂、皖各省清军节节设防，全力堵截这支援军。回师援京的起义军因节节受阻，进展缓慢。但他们仍奋力冲破层层险阻，向东推进，“未尝一日忘授金陵”。7 月 19 日，天京陷落，消息传来，东援各起义军士气大挫，起义军



自己进而也陷入清军的重围之中。为了分散清军的力量，打破重围，8 月间，这支东援部队在湖北鄂城分为两支。一支由陈得才、张宗禹等率领进入安徽，一支由赖文光率部率领转战鄂东。但是，由于分散行动，起义军的力量受到削弱，处境也越发困难。11 月，陈得才部在湖北英山、霍山与清军展开激战，由于部将马融和叛变，将蓝成春出卖并杀害，主帅陈得才自度力不能支而服毒自杀。只有邱远才、张宗禹等率余众突出重围，转战到河南，寻找赖文光部。12 月，赖文光出鄂东也转战入河南，与张宗禹的捻军会合。两军会合后，易步为骑，整顿军纪，充补兵员粮饷，挥师西北，继续展开新的斗争，史称“捻军战争”。

从陕南撤出，回救天京的另一支太平军启王梁成富部，于 1864 年 4 月到达河南镇平时，也被清军优势兵力所阻，无法前进。同时，梁成富部又与陈得才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不得已仍旧折回陕南。至此，太平军东援天京的计划全部失败。

从战略上讲，太平军一部远征西北，牵制了大量清军，并与东南部的太平天国运动相呼应，特别是太平军把反抗的烽火传到了西北内陆，促使西北人民，尤其是陕西人民反清情绪的高涨，这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清廷始终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围攻以天京为重点的长江流域的太平军，因此，太平天国的危急局势始终未因陈得才等部的远征西北而得到缓解。而转战陕西的太平军本来已开创了很好的局面，可是，一次回师解救庐州之围，一次回师东援天京，不但都没能达到目的，反而使太平军丧失了在陕西的主动地位，这对于整个太平天国的事业而言，不能不说是遗憾。

二、西捻军入陕和回民军反攻陕西

1. 西捻军入陕

在陕西回民掀起反清大起义之前，活跃于淮河流域的捻军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由分散到联合，有了新的发展。1855 年（咸丰五年）秋天，捻军各首领在雉河集（今安徽涡阳）会盟，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明命王”，并与太平军取得联系，接受封号。捻军遂成为太平军的得力盟军。

1864 年（同治三年），天京危急。太平军陈得才、赖文光部奉命回师东援，行至河南，捻军陈大熹与张宗禹部加入。同年 7 月 19 日天京陷落，东援之太平军在霍山战役中失利，陈得才服药自尽，赖文光率太平军余部与捻军张宗禹等联合，仍称捻军，转战中原。根据斗争的需要，1866 年（同治五年）10 月，赖文光特命梁王张宗禹等“前进陕甘，往连回众，以为掎角之势”。同年冬，捻军在河南许州（今河南许昌）分军为东西两部：东捻军由赖文光、任比邦率领，转战于苏、鲁、豫、皖等省；西捻军由梁王张宗禹、淮王邱远才等率领，进军陕西。

1866 年 10 月 23 日，张宗禹率领西捻军约六万人在许州遭清军张权珊等部攻击，后由许州向西北的洛阳挺进。26 日，曾国藩急令浙江提督鲍超、江苏臬司刘秉璋、总兵扬鼎勋、刘松山等军分两部追剿，因西捻军行踪飙疾，清军“奔驰千里，未及接仗”。从 23 日至 27 日，西捻军急速西进，经襄城、汝州（今临汝）攻克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取得军需物资补给后，又经宜阳、永宁（今洛宁）、渑池，11 月 3 日到达陕州，西捻军本拟由此渡河入晋，再出晋入陕，因山西布防拦住去路，遂又西进阌乡，逼近潼关。这时潼关守军已经有了准备，设防堵截。西捻军侦悉此情后，从阌乡镇出发，避开正面防守之敌，甩掉尾追之湘军，转而由蒿谷小路，沿秦岭西走陕西。分一路人马“于阌乡商洛西南之大峪口绕道潼关以南”，于 11 月初向华阴方向进发；另一路人马出潼峪口山路，进入陕西之商州一带。出“陕阌商洛万山之中、初冬苦寒”，尾追之湘军粮草不济，不愿深入秦岭山区，驻扎不前。

1866 年 11 月 6 日（同治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张宗禹率军穿秦岭，抵达潼关以西的华阴，华阴知县及千总等弃城落荒而逃，藏匿县西。西捻军在山下华岳庙周围十余里依山为营，驻扎休整。前锋直达华州（今陕西华县）境内，先后在白泉铺和三峡店同清军交战获胜。西捻军入陕后发展很快，兵力迅速扩至数十万人。就地域而言，南至洛南，北至朝邑，渭河两岸东西数十里都有西捻军的“边马”（即骑兵前哨）在活动，顿时陕西“官道不通，贡使、兵差皆取路蒲城”。

西捻军突然入陕，清廷大为震惊，一面急令湘军鲍超率部援陕，饬左宗棠速赴陕甘总督任，并命刘蓉帮办陕西军务，协助新任陕西巡抚乔松年共同对付西捻军，企图将西捻军消灭于陕境。驻守邠陇一带堵防回民军的刘蓉部东撤堵截西捻军。这一行动给已撤往甘肃的回民军重新东下与西捻军联合抗清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十里坡大捷和围攻西安

1866 年 12 月，西捻军由华阴、渭南一线向西安进发。这时，回民起义军正由陇东向陕西发动攻势。留陕帮办军务的原陕抚刘蓉两面受敌，首尾难顾。援陕清军又被东捻军牵制在鄂豫皖战场上，一时不能入关。新任陕抚乔松年与刘蓉钩心斗角，相互攻讦。淮系的乔松年认为湘系的刘蓉“缺乏断制之才，留陕会办，亦属毫无裨益”，请旨饬令回籍，要求清廷派淮系刘铭传或皖军郭宝昌来陕“助剿”。结果清廷却派来湘系刘松山统带的十七营湘军和三营淮军。乔松年“以其为湘军而恶之”，“叠次传见淮营都司李良田，以示亲厚”。湘淮两系将帅和部队的不和与明争暗斗，所有这些都给西捻军的取胜创造良好的条件。

西捻军日益逼近西安。刘蓉明知自己统带的三十营湘军士气低落，不堪一战，但朝命在身，只好孤注一掷。1866 年 12 月中旬，刘蓉率领三十营湘军一万四千余人，陆续赶到华阴前线，与西捻军在敷水镇一带对峙。为了拖垮敌人，西捻军在决战之前，熟练地运用了“以走致敌”的迂回战术，以达最后一举歼敌之目的。西捻军先佯攻西安，刘蓉在华阴尚未站稳，闻讯回奔。1867 年 1 月，西捻军不待刘蓉军迫近，却从灞桥折向东南，作绕蓝田经商州向潼关进军的姿态。清廷即命淮军刘铭传赶赴陕州与山西按察使陈湜夹河设防，以保山西。同时，催令湘军鲍超部迅速入陕赴援。西捻军的这一行动，迫使疲惫的刘蓉所部湘军再次东折。此时西捻军主力已绕商洛，过秦岭，经渭南，已到达临潼之新丰镇一带，而后队还驻扎在蓝田之拽湖镇等地，诱敌追逐。当敌人迫近临潼时，张宗禹又挥军西进。前锋直指西安，扎营韩森冢一带，派步马主力两万多人埋伏于灞桥十里坡一带，准备在此歼灭已被拖垮的刘蓉所部湘军。

1867 年 1 月 23 日，刘蓉率军追到灞桥，西捻军且战且退，刘蓉军各营抢上十里坡争功，全部进入西捻军的伏击圈。这时西捻军伏兵突出，左右包抄，把刘蓉的湘军层层围困。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刘蓉的三十营湘军及副都统西蒙克西克所部骑兵全被打垮，汉中镇总兵肖德扬、提督杨得胜、肖集山和布政使衔候补道肖德纲等均被击毙。清军共死伤三千多人，各营将领不知下落，“唯见浐桥灞桥兵勇尸骸满地，委弃军械甚多”。十里坡一战，西捻军大获全胜之后，移主力至秦渡镇、花园铺、梁家桥一带，准备围攻西安。据方志记载：“东门外之三府洼，西门外之火神庙、南门外之小雁塔，北门外之红庙，皆有贼垒。”西安“文报不通，粮路断绝”。陕抚乔松年无计可施，唯有向清廷飞疏

告急。

灞桥十里坡之战，清军惨败，帮办陕西军务的刘蓉“夺职回籍”。这时，刘松山率领的老湘营十七营及淮军已赶到西安。西捻军一方面以主力围攻西安，一方面分军渡渭水至兴平、礼泉、乾州、泾阳一带，准备接应由陇东东下的回民起义军。1867 年 2 月 4 日，刘松山军至西安鱼化寨，扎营未定，西捻军便给予迎头痛击，阵毙湘军敬字三营统领张锡嵘，大挫敌军锐气。继与刘松山交锋数次，但未能攻下省城。这时，回民军已由陇东东下，李得仓所率回民军已至凤翔。3 月，西捻军主力在张宗禹带领下撤西安之围，沿渭河两岸西进，3 月中旬到达鄠县，准备同回民军联合进行共同斗争。

3. 西捻军与回民军联合抗击清军

1867 年 2 月，西捻军自西安撤围，沿渭河西上，3 月，驻鄠县齐家寨，与甘肃东下至凤翔一带的回民军李得仓部隔河相望。两军派人相互联络，商定回民军南渡共同抗清。清政府认为“捻匪之狡猾，回匪之齐心，均属悍寇”，更害怕二者“勾合为一”。故不待回民军渡河，清军急袭捻军，企图切断回、捻联系。3 月下旬，西捻军主动抢先渡渭河至岐山扶风交界的益店，再次与回民军取得联系。议定由回民军攻打西安，西捻军进军同州、朝邑一带以为掎角之势。两支友军遂并肩东下，西捻军直趋同州、朝邑，回民军逼近西安，由于清军竭力防堵，一时难于攻下西安，随即东下泾阳一带，两军逼近黄河，有入晋之势。5 月初，清军尾追至大荔。5 月 19 日，回、捻军联合同湘军刘松山部战于大荔东北之许庄小壕、晋成堡、姜彦村一带。西捻军首领张宗禹亲自指挥，营垒“横亘二十余里，并以龙车挡牌各队包裹而前”，战事非常激烈，双方互有损伤，捻军损伤近两千人。5 月下旬，西捻军又乘机西进围攻西安，与清军大战于西安城南的山门口、木塔寨、齐王村等处。5 月 27 日，西捻军已逼近西安城垣，但因清军以逸待劳死力固守，故终未攻下。此后，西捻军与回民军时分时合，同清军周旋于渭河南北。

7 月，钦差大臣、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军入陕。他采取“剿捻宜急，剿回宜缓”的方针，企图集中力量先后分头各个击破。左宗棠布置兵阵，妄想先把西捻军消灭在泾、洛、渭水之间的包围圈内。西捻军为了改变被动地位，10 月下旬自白水经黄陵深入陕北，继续与回民军联合抗清。

10 月底，西捻军主力围攻解州，连攻一昼夜不克，清援军至。西捻军在回民军和董福祥等起义军的掩护下，自解州撤围到甘泉，11 月中旬至安塞，不久，往南折向宜川。清总兵李祥和带兵尾追，一支回民军截击李祥和部后与之周旋，并击毙李祥和于洛川。如此西捻军顺利地到达宜川，并在云岩镇建立临时据点。同时，留在耀州附近负责掩护主力北上的一支西捻军也与回民军紧密配合，于 11 月初进攻耀州、同官，牵制清军。后来这支西捻军也顺利进入宜川与主力会合。

西捻军主力进军陕北途中，陇东一带的回民起义军陆续来陕配合作战。如11月下旬，甘肃回民起义军贾米、张非等率部进攻千阳、陇州等地，准备联合西捻军再次围攻西安。回民军冯均福也率部东下。这时的陕甘形势，有如左宗棠所说：西捻军“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民军“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只见“日日警报纷来”，“现在局势艰危，州县城池叠陷”。

1867年11月，西捻军主力由宜川进军延长、清涧。当时，由甘肃庆阳绕道延安而来的一支回民军于11月22日攻克绥德，约请西捻军去绥德共同防守。不久，西捻军入绥德城与这支回民军会合。

4. 西捻军出陕

西捻军进军陕北时，清廷曾有严旨：若西捻军由秦入晋，“惟左宗棠是问”。所以左宗棠一面派兵紧追西捻军，同时商请山西按察使陈湜增兵黄河对岸，加强河曲、保德、兴州、临州一带河防。

这时东捻军正被清军围困于运河、胶莱河、黄河和六塘河之间，形势危急。西捻军首领张宗禹在陕北接到东捻军的求援信后，准备派队东援。由于西捻军与回民起义军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清军的挑拨离间等原因，两军始终未能结成政治上的巩固联盟。而且由于陕北多山，不宜于马队驰骋，因此，西捻军决定全部撤离陕西东援。

1867年12月4日，清军刚奔至绥德城下，西捻军与回民军便分头由绥德撤出。回民军走米脂，牵制清军刘厚基部；西捻军由苗家坪沿瓦窑堡、延安一路南下。清军主力刘松山、郭宝昌部慌忙拔队由清涧、延川、延长、宜川一线与西捻军平行南下，企图沿黄河西岸堵截，以防西捻军东渡。

12月17日，清军赶至距宜川县城二十里之刘管村，被原驻羊献坪一带的回民军狙击，大战一日，回民军击毙清军副将王立洪及兵勇大部后，诱敌南走，清军连夜南追四十里不及。清军南走，当晚西捻军乘机进至宜川，并探得壶口龙王庙冰桥方结，而东岸防守甚严。于是，西捻军大队先结营驻扎，由张禹爵率短刀队五百人乘夜踏冰渡河，焚掉敌人河东营垒。然后，留一支约五千人的队伍扼守西岸渡口，狙击尾追之敌，张宗禹率领捻军主力约二万人顺利地渡过黄河，殿后的五千人除袁大魁带领的一部为清军所截未能渡河外，其他大部也继之顺利到达对岸。这时，专办河防三年，糜饷累万的山西按察使陈湜才大梦方觉，惊恐万状，急忙赶往赵城堵截。

清廷闻西捻军入晋，“忧愤无措”，怒将陈湜革职戍边。左宗棠企图把西捻军消灭于陕境的计划成为泡影，不使西捻军入晋的保证已经落空，即“自请从重治罪”，结果受到革职留任处分。

西捻军出陕东援的战略意图是引兵直捣京畿，迫使清军回军直隶，以达“东（捻军）围不战自解”的目的。西捻军入晋后，清廷一方面饬令李鸿章等派兵在直隶山东一带堵截，一面令左宗棠带兵入晋尾追。左宗棠委陕西军务于刘典，遂于1868年1月亲自督兵自潼关入晋。同时还有一部分清兵在西捻军渡河后即由宜川壶口尾追入晋。西捻军由陕入晋后，避实就虚，绕过敌人的阻击拦截，经豫北进入冀南，1868年2月5日，先头部队已抵离北京仅二百里的房山县境，清廷震惊，京畿戒严，下令各地“勤王”。西捻军虽然吸引了不少清军，但东捻军于1868年1月在扬州最后失败，赖文光就义。西捻军闻信，又南下转战于山东直隶之间，最后被清军围困于黄河、运河之间。西捻军多次突围均未成功。1868年8月16日，在山东平南镇的大决战中，西捻军大败。张宗禹率十八骑冲出重围至徒骇河边。“穿林亮水，不知所终”，捻军战争至此结束。

三、影响与启示

太平军从1862年2月开始远征西北，至1864年11月主帅陈得才殉难止，两次远征，转战皖、鄂、豫、陕、甘五省。两次远征，都是为了“广招兵马”，以图再举，但分别以庐州、天京危急，南下援救而回师失败。太平军两次远征虽然失败，它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太平军第一次和第二次入陕，不仅震动了西安和汉中，而且在与清军交战中，击毙地主、县令、把总等十多个，陕西巡抚等一批官员被撤职。太平军远征西北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摧毁了许多地方的反动政权。这就说明了太平军远征西北的部队的确是太平天国后期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太平军和捻军远征陕西的意义还在于：唤醒了长期沉睡在清朝统治下的陕西人民。当太平军第一次入陕，就将一触即发的回民起义点燃起来，而且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太平军远征陕西的部队后来虽然失败，但并没有被消灭，他们以赖文光、张宗禹为首重整旗鼓，汇入西捻军后继续战斗在陕西境内。而以陈得才、蓝成春、梁成富、袁大魁为首的太平军和捻军将领，在失败后英勇不屈从容就义，这种革命的英雄气概是可歌可泣的，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斗争精神。

（撰稿人　路中康）

辛亥革命在陕西

一百多年之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民主自由的伟大先导，它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上的解放和中国政治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陕西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并成为北方辛亥革命的大本营，从政治、军事上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有力地吸引和调动了清军主力，大大缓解了南方革命政权的巨大压力，并为北方各省起义树立了榜样，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辛亥革命在陕西的爆发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为之震动，各地纷纷效法，从而揭开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序幕。10 月 22 日，陕西革命党人在北方率先响应，很快光复西安和大部分州县，革命烈焰波及河南、甘肃、山西，影响及于青海、宁夏、新疆，拉开了北方各省起义的序幕，奠定了陕西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陕西革命酝酿已久，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很早就在这里开展活动。1905 年 8 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就有井勿幕等十多名陕西学生加入。同年年底，井勿幕奉孙中山之命回陕工作，不足一年，即在陕西发展同盟会会员 30 余人，创建了同盟会陕西支部，奠定了同盟会在陕西的基础。从此，陕西的进步力量“统一组织，然后众流汇合，群情一致。各地青年志士，复风起云从，如春草之怒茁，如初潮之湃动”。

1906 年，井勿幕赴日本和陕西同盟会员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确定分会当前的任务是：广泛联系陕西本省高等学堂和师范学堂学生，和他们互通声气；组织舆论机构，发行刊物，展开宣传鼓动；利用合法途径建议陕西成立教育会、商会等各种民间组织，以保障其所属成员的利益。他们针对陕西的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专论，如《劝陕人急宜自治书》《修筑西潼铁路书》等，带到陕西供人阅读和参考。是年冬，于右任赴东京为《神州日报》筹集资金，加入同盟会，不久，以于右任为会长的陕甘豫晋四省留日学生同学会成立，加强了北方籍同盟会员之间的联系。

留日学生在同盟会陕西分会的领导下，与国内同盟会员的革命活动相呼应，传播民主思想，声援人民的革命斗争，对陕西的革命发展起了推动作用。1907 年，陕甘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刊《秦陇》杂志。1908 年春，又在日本创办了《夏声》，原先的《秦陇》则更名为《关陇》。《夏声》疾呼救亡救国，指斥地方弊端，号召人们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进行斗争。这些杂志还报道了人民抗捐抗税以及收回路权、矿权的斗争。刊物出版后秘密邮寄或由人秘密带回陕西，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与此同时，于右任在上海相继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四报，与《夏声》默契配合，助推着陕西民主革命风潮的掀起。

1908 年冬，井勿幕等人在西安成立了陕西同盟会，将革命工作的重点移向了国内，在陕西建立了许多秘密革命据点，如西安的公益书局、健本学堂、武学社等，渭北三原的勤公社、耀州的庙湾畜牧场、泾阳的柏氏花园以及宜君的马兰山铁矿等。

陕西的反清革命运动并不孤立，它得到了孙中山和同盟会总会的领导，也得到了其他省份革命党人或革命团体的支持和帮助。1910 年四五月间，井勿幕从上海回到西安，根据东南各省革命党人主张在清政府防备薄弱的内地发动起义的意见，“准备在西北发动起义”井勿幕将这一重要建议在陕西泾阳“柏氏花园同盟会会议”上传达给陕西同盟会成员，并在会议上明确了联络陕西新军、哥老会、刀客等武装力量，筹备枪弹，适时发动起义的任务，为起义做了思想、组织、物资和武装力量的准备。

1910 年，陕西同盟会势力不断壮大，并和哥老会和新军建立了紧密联系。1910 年 7 月 9 日，同盟会、哥老会首领和军学各界代表井勿幕、钱鼎、张钫、党自新、胡景翼、万炳南、张云山、马玉贵等 30 多人，在西安大雁塔秘密集会，歃血为盟，成立反清统一组织“三合会”（同盟会、新军、哥老会），史称“三十六兄弟会盟”，使陕西同盟会、哥老会和新军三方面力量的联系更为密切，为陕西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武装基础。1910 年冬，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新军中仇视革命的督练公所总办王毓江及其党羽十多人被清政府免职，使一批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青年军官、同盟会员钱鼎、张钫等掌握了一部分新军的实权，迅速壮大了同盟会在新军中的领导力量，他们在新军中发展会员，传播革命思想，并与新军中的哥老会首领保持密切联系，使新军成为起义的中坚力量。

1911 年夏发生的四川保路运动给陕西革命党人以极大鼓舞，他们摩拳擦掌，预备起事。同盟会本打算于 10 月 29 日举义，因官府有所觉察，决定提前行动。10 月 21 日晚，张钫和钱鼎拜会新军混成协（旅）参军（参谋长）兼第二标（团）一营管带（营长）张凤翔，请张出任西安起义总指挥。张爽朗答：“即干，义无反顾。如果失败，祸我承担，生死与二君共之。”

10月22日上午8时，起义各营和洪门75名代表在西安景教寺右侧之林姓坟园聚会，商议起义事项，规定了“兴汉灭旗”的起义口号、各部队任务、注意事项等等。会后，张钫即于上午十时率领部分炮营士兵占领了军装局，夺取大量武器弹药。张凤翙、钱鼎亦率军向清军发起进攻，很快光复汉城。满城内清兵关闭城门，仓促抵抗。23日，革命军攻入满城，歼灭清军大部，清将军文瑞投井自杀，满城收复。10月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张凤翙为大统领，钱鼎和万炳南为副统领。设立了军政、财政、教育、司法、交通等一系列机构，委派了一批大小官员。西安光复后，各州县纷纷响应，数日之间，关中、陕北、陕南等地五六十个州县也相继光复（汉中除外，第二年5月光复），革命在陕西全省获得成功。



陕西军政府首任都督张凤翙

陕西地处冲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武昌起义后，清王朝本打算以陕甘为基地，重振军力，收复东南，岂知陕西反戈一击，率先反正。清廷深为震惊，遂征调大军从东、西两路杀来，企图一举扑灭陕西革命，稳定西北局势。陕西军政府为了粉碎清军的反扑，在东、西两个战场进行了异常艰苦的战斗，有力地保卫了革命的胜利成果。

二、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陕西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在陕西是一场由同盟会领导发起，革命党人、学界、新军、会党、刀客、回汉人民踊跃参加的革命运动，这是它的显著特点。孙中山先生在论及参加辛亥革命的社会力量时讲：“综计诸役，革命党人以一往直前之气，忘身殉国，其慷慨助饷，多在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新军与会党。”可见，在那个风云激荡，喋血战斗的年代，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的发动，多在知识分子，而冲锋陷阵的主要力量则是会党和新军。

同盟会陕西支部和分会成立后，在井勿幕等人的领导下，首先在陕西学校的师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会员，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同盟会宣传革命思想的主要阵地有：西

安高等学堂、师范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在渭北有三原宏道学堂、同州中学堂、蒲城小学堂等，常自新、高又明等一批知识分子首先加入同盟会，成为陕西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在他们的努力下，1908 年发生的“蒲案”成为教育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次革命运动。“蒲案”是 1908 年陕西蒲城县县令李体仁因仇视革命活动，借故捣毁县教育分会，捕押刑讯县立高等小学堂师生而制造出来的惨案。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省各县学生和知识界人士的义愤，各学堂纷纷罢课，学界人士群起声援。北京、上海等地及留日陕藉学生等立即响应，对清王朝地方官吏的暴行给予强大的压力和谴责。很快“蒲案”演化成陕西学界一次波澜壮阔的反封建运动。“蒲案”影响很大，它锻炼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推动了陕西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是陕西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

1908 年同盟会陕西分会在西安成立时，做出了联络新军、会党、刀客共同反清的决议。陕西新军系于 1909 年由原常备军改编而成，改编后定名为陆军混成协（旅），有步兵两标（团），骑兵、炮兵各一营，工程、辎重各一队（连）。初级军官中已有张作栋（生午）、彭世安（仲翔）、张光奎（聚庭）、朱彝铭（叙五）4 名同盟会员，且都是队官（连长）。1909 年夏季至 1910 年 2 月，陕西选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毕业回陕的 23 名学生，按所学兵科正式分派各营队充任初级军官。其中钱鼎（定三）、张钫、曹位康（健安）、党仲昭（自新）、张宝麟（仲仁）5 人是同盟会员，分别担任队官、排长。1910 年春，具有革命思想的张凤翔（翔初）、张益谦（靖卿）等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返陕，到新军中任职，新军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他们设立“武学研究社”，作为联系军界同志和哥老会的地下工作据点，在官兵中逐渐扩大革命影响，积聚力量，为新军起义奠定了基础。



起义军在战斗

会党的基本群众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陕西会党主要是哥老会，还有三合会及其分支慕亲会等。针对陕西会党“势力及于全陕”及会党人数在新军中占很大比例的情况，同盟会一直很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井勿幕初次从东京返回陕西时，就有联络“三合会”“刀客”及“哥老会”“慕亲会”等会党之意，但当时“一般同志，多系读书人，深恶彼会党中人之行为，不屑与为伍，众情反对之下，井君未再多言”。但时隔不久，高又明即介绍“慕亲会”首领僧人吴虚白和井结盟。随后，井又与“慕亲会”另外两位领导人洪宝臣、唐和尚建立了联系。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时，经井勿幕反复做工作，通过了联络会党、刀客的方针。钱鼎、张钫、张宝麟等新军军官很注意加强与会党的联系工作。他们创办武学研究社，吸纳会党入盟，先后发展了在会党中很有威望的哥老会大哥万炳南和张云山、马玉贵、刘世杰、吴世昌、朱福胜等加入同盟会或武学社，迅速增强了革命势力。1910 年 7 月，同盟会、哥老会首领和军学各界代表在西安大雁塔歃血“会盟”，标志着同盟会、学界、新军和会党联合战线的形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刀客”，有些地方称为“匕首会”“杆子”，是清末民初陕西、河南一带的民间秘密武装，其成员多为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其他城市劳动者和游民，一般有首领人物，成员鱼龙混杂，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与严密的纪律。刀客有反抗统治阶级的精神，也有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他们或占山为王，或混迹民间，每股人数不多，但集合起来则是一只强大的农民力量。由于革命党人井勿幕、张钫、胡景翼、李仲三、寇遐等的宣传、争取工作，刀客绝大部分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反清斗争，一般集体参加军队，被编成标或营的就有好几部分，例如东路节度使陈树藩所属严飞龙、严纪鹏两个标，北路招讨使井勿幕部胡景冀所属王守身、胡彦海、马正德、石象仪等营，主要由刀客编成。刀客不仅成为陕西光复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抵御清军进攻的东西路战场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东部战场，河南王天纵、张治公、丁同升、柴云陞、憨玉琨、赵长荣、杨凤鸣等各路“杆子”闻风而动，皆率部来与东征军会合，壮大了东征军的实力，使东征军屡破敌军。

陕西回族人民踊跃参加辛亥革命，并开展了许多举足轻重的行动，这可以说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又一大特点。参加辛亥革命的回民群众主要来自社会下层，他们一直是革命的直接参加者和依靠的对象。革命爆发前，回民就参加了秘密反清斗争，马玉贵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马玉贵（字青山）早年加入了反清秘密组织哥老会，任陕西新军正目（班长），在新军士兵和回民中很有威望。在同盟会钱鼎等人努力下，马玉贵加入了同盟会。

同盟会员张云山是哥老会的重要首领，他利用与马玉贵和回民群众关系密切的条件，与回民中的哥老会成员金启恒、白玉鳞、海占彪、惠东成、陈百寿等人结为三十六弟兄，

共谋反清起义，团结带领了一大批回族群众参加革命。马玉贵等一大批回族群众参加民主革命，标志着陕西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已经不单单是反对种族歧视了，他们中的先进人物已觉悟起来，接受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奋斗。1910 年 7 月大雁塔“结盟”后，西安回民积极准备起义，马玉贵联络回民杨三组织起一个营 500 名回民队伍，张云山联络回民金启恒、海占彪组织起 100 人的回民武装等。起义爆发后，回民义军一千余人成为攻城主力，在攻占满城的激战中，立下赫赫战功。陕西军政府成立后，马玉贵任总理粮饷兼管军务都督，在新生的革命政权中肩负重任。在省城以外地区光复时，也有回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哥老会秦凤山山主马秉乾参加了凤翔的光复起义，并一度主持县政；平利县的回民马某领导当地群众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并担任了革命军连长。他们后来均为保卫陕西革命政权的战斗献出了生命。在保卫陕西革命政权的战斗中，回族人民也付出了重大牺牲，西路战役中，马玉贵多次率部在战场拼杀，不少回族官兵献出了生命；东部战场，回族骑兵队长马友师及多名战士在礼泉保卫战中英勇献身，回族营长阎洪云、战士马宗麟等在潼关保卫战中壮烈牺牲。广大回民官兵在陕西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辛亥革命在陕西的深远影响

陕西辛亥革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第一，陕西率先响应武昌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在西北的反动统治，拉开了北方各省革命起义的序幕，减轻了清军对其他各省起义的压力，对全国的革命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陕西辛亥革命的爆发，切断了清政府与其西北军事武装的联系，促进了河南、山西、新疆、甘肃革命形势的发展，掀起了北方革命的狂潮。清政府万分惊恐，从甘肃、河南等地调集大军，向陕西革命军疯狂反扑，使陕西革命政权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在严峻形势下，陕西军政府果断应战，以“西守东攻”为策略，派出东西两路大军与清军鏖战。东部（潼关、华阴一带）战场，副大统领钱鼎出师未捷身先死，兵至渭南为乱军所杀。军政府遂授张钫为秦陇豫复汉军（东征军有大批河南人，故称“秦陇豫”复汉军）大都督出征。在中州豪杰和河南革命党人的鼎力支持下，张钫在潼关一带和清军主力鏖战数月，最后于 1912 年 2 月 18 日逼退清军。在与清军相比兵力悬殊、武器装备又很差的情况下，潼关三失三得，东征军竭力苦战，前仆后继，声威寒清廷之胆，大振革命声势。西部一线战况同样惨烈，清军大兵压境，众寡悬殊，复汉军奋起抗击，屡败屡战，最后，秦陇复汉军兵马大都督张云山死守乾州，反败为胜，终使甘军无可奈何，引兵退去。革命军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保卫了陕西的东西两大门，歼灭、调动和吸引

大批清军精锐于自己的周围，大大减轻了南方革命党人和起义各省的压力，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赢得了时机。

第二，加强了回汉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在全国起了表率作用。陕西的回、汉人民在推翻清王朝的大目标下，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革命，不少回族人民参加了革命军，并在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马玉贵等一些回民的代表人物还在革命政权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保证了陕西革命的顺利开展和革命政权的稳固。此前三四十年间，陕甘等省曾经发生过回汉冲突乃至大规模的流血事件，给各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陕西革命党人非常注重民族团结问题，西安举义第二天，刚刚组建起来的起义军临时司令部就发布了第一张文告，强调："各省皆变，排除满人，上征天意，下见人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特此晓喻，其各放心。"文告明确宣布回汉同胞一视同仁，这对加强回汉团结起了重大作用。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后，局势依然复杂动荡，为维护新生的革命政权，马玉贵做了大量工作。在东、西路战役一度失利的情况下，马玉贵还坐镇西安，主持军务，他以军政府"经理粮饷兼管军务军装总都督"的身份，发布了《严禁挑拨汉回关系告示》《动员民团并力攻敌以保桑梓告示》等文告，严厉谴责别有用心的人挑拨汉回关系，重申"此次兴兵举义，宗旨复汉灭清"，"特谕各界人等，无稽之谈莫听"，"倘再谣言生事，拿获立典刑"。从而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

陕西辛亥革命中，回汉民族的大团结，对于反对民族分裂、维护西北政局起了重要作用，也在全国树起了民族团结的典范，扩大了陕西在全国的影响。

第三，启发了陕西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使陕西成为西北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大本营。

同盟会成立后，就派遣井勿幕等人回陕传播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907 年后，陕甘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秦陇》（后改为《关陇》）、《夏声》等杂志，于右任在上海相继主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四报，均在激发陕西人民的民主革命思想方面起了重大作用。陕西革命政权成立后，亦派遣省城革命学生，回各州县宣传革命，促进了陕西人民民族民主意识的普遍觉醒，把革命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发展。因此，从辛亥革命开始，陕西逐渐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北方基地，武昌起义，陕西在北方率先响应；反袁事起，陕西亦有积极活动；护国运动，陕西为北方唯一宣布独立讨袁的省份；护法斗争，陕西在北方各省中表现最为突出，这些都对陕西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撰稿人　路中康）

陕西靖国军

1917 年 12 月至 1922 年 5 月，陕西靖国军是当时北方各省唯一响应孙中山发动的反对北洋政府废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斗争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靖国军和广州的护法政府的密切联系、协调配合，在陕西展开了“反段倒陈”的斗争，史称陕西护法运动。靖国军顺应时势、合乎社会进步潮流，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坚持战斗四年多，是陕西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

一、陕西靖国军产生的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人张凤翙督理陕政，他屈从袁世凯的压力，投靠北洋政府。但是，袁世凯仍不甘心，必以直接控制陕西军政大权而后快。1914 年年初，河南的白朗农民起义军从商洛入陕，袁世凯即以陕西当局“剿匪不力”为名，派其亲信陆建章为“剿匪”总司令，率北洋军第七师入陕。陆建章督陕之后，与陕西巡按使吕调元狼狈为奸，极力排除异己。辛亥革命以来兴起的陕西地方军事力量，除陈树藩旅外，其余均被解散。陆建章还废除了陕西辛亥革命以来的一切新政措施，大肆镇压革命活动、捕杀革命党人。陕西人民同北洋军阀的矛盾日益加深。

1915 年 12 月 13 日袁世凯称帝，全国人民愤怒声讨，护国运动风起云涌。陕西人民和国民党人士策应云南的护国战争，掀起“反袁逐陆”的斗争。他们在西安秘密集会，组织讨袁义勇军，分别以长安、蓝田、乾县、华阴、华县、白水为据点，联络国民党人，积聚武装力量，筹措枪械，待机发难。1916 年 3 月讨袁斗争不幸事泄，王绍文等十八人被捕遇害。康毅如等人被迫离陕，东南西三路举义失败，唯有北路的反袁斗争不断高涨。郭坚、耿直、曹世英、高峻等在山西国民党人李岐山的策应下，于白水树护国军旗帜，通电“讨袁逐陆”。

1916 年 5 月 7 日，陆承武率军到富平。富平驻军陈树藩旅游击营营长胡景翼，与国民党人刘守中、张义安、邓瑜等树旗反陆，在城内外人民的协力援助下，歼灭“中坚团”，擒获陆承武。陆团被歼后，陈树藩于 5 月 9 日由蒲城移兵三原，通电全国就任陕西

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并以陆承武之生命安全为条件，迫使陆建章离陕。陆建章看到全国反袁斗争日益高涨，在陕西已难以立足，遂与陈树藩达成“献城赎子协议”。陈树藩护送陆建章全家离陕，陆建章向袁世凯推荐陈树藩任陕西督军。6 月 10 日，北洋政府发布命令，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

陈树藩掌握陕西的军政大权后，秉承北洋政府的旨意，对陕西人民施行残酷统治。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剥削人民，追索自民国元年以来历年所欠之粮款、税款；多次强制发行所谓“富秦钱票”；发行地方公债数百万两，大肆举借外债达五百多万两。陈树藩在陕西广种鸦片，征收巨税，保护烟贩，牟取暴利；继而“寓禁于征”，苛刑滥罚。在政治上，树党营私，排斥、压制国民党及其活动。陕西人民同北洋军阀的矛盾，日益加深。

二、陕西靖国军的兴起

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的大权后，继续执行独裁统治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二次宣布解散国会，拒不恢复民元约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和反对。孙中山于 1917 年 8 月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成立军政府，宣布护法。在此前后，孙中山委派众议院陕西籍议员焦冰，于 5 月、9 月两次回陕组织护法军，发动反段驱陈斗争，并委任驻防白水的陈树藩部骑兵团团长高峻为陕西护法军总司令，驻西安之陈树藩部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为陕西靖国军招讨使。



1917 年 12 月 3 日，高峻首先在白水起义，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宣布独立，发布檄文，历数陈树藩的罪状。陈树藩急调大军开始围攻白水县城，激战三昼夜，高峻之骑兵团终因孤军无援，弹药缺乏，被迫撤离。白水起义打响了反段驱陈斗争的第一枪，对全省影响很大。1917 年 12 月 2 日，耿直率部在西安起义。刘锡麟率部直驱西安增援。陈树藩布兵抗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死伤甚众。相持至 12 日，陈调之援军相继到来，耿遂下令于 13 日由南门撤退，西走户县、周至。西安举义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对陈树藩则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为之后陕西靖国军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郭坚在凤翔闻西安举义，即率部奔赴西安增援，兵至三桥镇，知起义军已撤退，遂开赴户县与耿直会合。郭、耿在周至召开将校会议，发布檄文护法讨陈，宣布成立陕西靖国军，郭任总司令，耿任副总司令，下设八个支队。通电全国，宣言护法讨陈。随后，郭、耿率部退守凤翔和岐山。

陈树藩一面令王飞虎、李天佐在东路牵制高峻；一面调刘世珑、曾继贤、胡景翼三面围攻岐山。激战八昼夜，岐山仍为耿直部据守。胡景翼部在攻战中因伤亡很大，且感

到陈树藩排斥异己，用打头阵来削弱自己实力。于是乃密约耿直退出岐山，以便自己取得夺城之功，在陈处取得更多枪械后，响应起义。于是，耿、郭便放弃岐山，东去与高峻会合，再度占领白水。1917 年 1 月 8 日晨，在攻占蒲城时，耿直不幸战死。



西安起义领导者耿直

岐山战役后，张义安在三原响应起义，反陈斗争掀起了新的高潮。高峻、郭坚、刘锡麟等反陈起义军渐次云集到渭北地区。1918 年 1 月初，重新占领一度失陷的白水。胡景翼不仅未因岐山之功在陈树藩处得到饷械的补充，反因与靖国军的密谋往来为陈树藩察觉而引起怀疑。胡便以追起义军为名，将部队调往渭北的蒲城、富平、三原等地，与当时驻耀县素为陈树藩所忌的曹世英部秘密联系反陈。三原是渭北的商业、军事重镇，向为革命派频繁活动的地区，且与省城西安相去不远。因此，陈树藩决不容胡部在这时驻留于此，“因令其旅长曾继贤，带同团长严锡龙来三原驻防，而假胡以“剿匪司令名义”，要胡拔队东去与郭、高等起义军作两败俱伤的互斗。于是，一场新的反陈斗争因三原之争而爆发了。

胡景翼率部由岐山到渭北后，派张义安营驻三原，胡驻富平、耀县。张义安乃国民党人，对陈树藩附逆祸陕早已极为愤慨，蓄志起义讨陈。而此时陈树藩又下令张义安部让出三原，由其嫡系接防，张便佯为遵命撤离，而实与董威、邓宝珊等人借换防之机发动起义。1918 年 1 月 25 日大雪之夜，义军突然发动进攻，激战两昼夜，于 27 日晨全歼接防之陈军。张义安举义之日，曾飞骑致函胡景翼，“请火速回师，以善其后”，同时函请曹世英来援。胡景翼、曹世英分别由富平、耀县驰至三原，众议举陕西靖国军旗帜，反段讨陈。旋经会商，达成共组陕西靖国军协议，分军两翼，胡景翼为右翼军总司令，曹世英为左翼军总司令，并于 1918 年 2 月 2 日发出讨陈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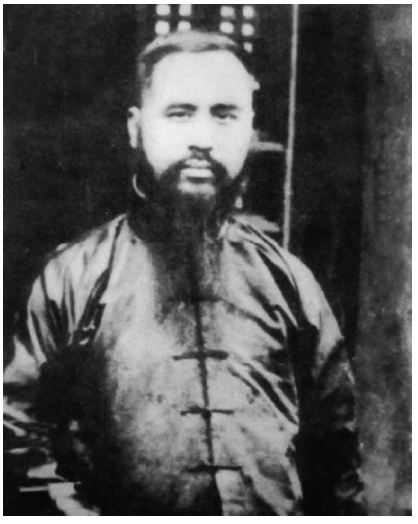
陕西靖国军左、右翼两军组成后，即召开军事会议，共商讨陈大计，决定分东西两路进攻西安。左翼军曹世英、郭坚、高峻等部为东路，由高陵之渭桥渡河进军；右翼军胡部张义安、董振五、冯毓东（志明）等部为西路，经兴平、户县进军。其时陈树藩亦命令刘世珑会同曾继贤，由泾阳进攻三原。胡、曹各军迎战陈军于三原西南城郊，激战竟日，陈军大败，退守泾阳。

陈树藩被靖国军东西两路夹击，难以支持，乃以省长为诱饵，求告豫西刘镇华镇嵩军来援。刘军原为土匪，后被段祺瑞收编。刘镇华率五千之众抵户县，与张义安部对阵。1918 年 3 月 13 日，张亲赴前线督战，不幸中弹身亡。胡景翼令董振五代领其部撤回三原，靖国军两翼围攻西安之役即告结束。靖国军两翼退守渭北以后，陈树藩据省东渭河以南及省西咸阳、兴平等地，重整兵力，向靖国军全面反扑。

1918 年 4 月下旬，陈树藩亲率所属各部及镇嵩军大部，组成东路军，从渭南渡河向三原、高陵、富平等地靖国军发起进攻，与靖国军展开关山之役。陈军于 4 月 16 日首攻界坊，守军杨虎城及王祥生部奉命抗击。李云龙、邓宝珊、董振五、冯毓东及弓富魁等相继增援，陈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被迫于 20 日停止进攻，向下邽、固市退却。关山之役，激战一周，陈树藩精心策划包围消灭靖国军的计划彻底破产，靖国军建立的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得以巩固。

三、于右任归陕后的陕西靖国军

陕西靖国军在四个多月的反陈战斗中，得到发展壮大。但因所属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各自为政，号令不一。有鉴于此，胡景翼、曹世英等高级将领及国民党人士商定，派王玉堂、张庆豫等为代表，赴上海请于右任回陕主持靖国军。



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

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于 1918 年 7 月回到三原，经各部代表开会商讨，决定组成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公推于右任为总司令，张钫（伯英）为副总司令。于、张于 8 月 8 日通电就职，总司令部设于三原，统一改编各部为六路。陕西靖国军的改组对于团结内部，统一指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加强和坚持反陈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军队实权仍分操于各路司令之手，号令不一，各自为政的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在靖国军改组后一段时间，各路军都有较大发展，靖国军的辖区已遍及关中各地，陈树藩被迫困守于西安及东路几个县。

此时全国的形势虽然处于南北对峙状态，但对陕西都势在必争，因此南北双方各派援军相继入陕。11 月以后，援陈的北洋军阀各部相继入陕，各路的援陈军向陕西靖国军

展开分路围攻之势，陕西靖国军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进行了顽强激烈的战斗。兴平、杏林之役，相持两月有余。武功、大王之役，战斗尤烈，靖国军著名将领董振五不幸阵亡。乾县之役历时半年之久。交口、相桥之役，激战月余，双方激战持续不断，直至达成停战协议。当时在陕西之南北各军约计二十余万，兵连祸结，烽烟不断，陕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四、南北和议与陕西靖国军

孙中山先生在西南军阀的排挤下，于1918年5月4日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离开了广州。改组后的护法军政府成了西南军阀与北方军阀钩心斗角、谋求妥协的工具。在北方政府内部，因所投靠的外国主子的不同，反映在对待南北问题上就有直系的“和平统一”与皖系的“武力统一”的斗争。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不能容忍日本的走狗段祺瑞继续其“武力统一”的政策。他们用“劝告”的方式，对南北双方施加压力，促其互相妥协。在国内外情势的逼迫下，段祺瑞辞去内阁总理职。新上台的总统徐世昌继承了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1918年10月25日下和平令，11月16日下停战令。11月23日，南方护法军政府也下了停战令。

在五国公使的干涉下，南北双方接受了当时江苏督军李纯提出的湖南、陕西两省划定南北界限，双方各自在界限内“剿匪”的建议。和会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开幕，和会之后，1919年4月初，陕西划界基本结束。划界停战后，陕西靖国军所统辖的地区，只有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县、同官等八个县的全部或一部，形成隔渭水与陈树藩南北对峙的局面。

1920年春，直皖军阀开战。直奉合作反皖，作为皖系军阀附庸的陈树藩失去了依靠，便使出建议陕西自治，让于右任主陕，释放胡景翼等多项阴谋。胡景翼于7月27日回到三原后，备受欢迎，靖国军各路共推为总指挥。当时全国形势风云莫测，陕西局势尤为复杂，加之靖国军各路将领已各有打算，离心离德，从而使得靖国军陷于动荡飘摇之中。

五、阎相文、冯玉祥督陕，陕西靖国军失败

直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获胜后，调兵遣将夺取原由皖系军阀控制的地盘。1921年5月，北洋政府调陈树藩入京就祥威将军职，令直系吴佩孚部阎相文督陕。陈树藩不服调遣。6月，阎相文率直军冯玉祥、吴新田部先后入陕，就任陕西督军。

阎相文督陕后，为了笼络人心，对各方表示宽大，靖国军各路将领相继被邀赴西安会晤。后阎相文因直军内部矛盾激化而自杀，北洋政府继而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

冯玉祥督陕后，利用驱陈胜利的时机，加紧促使陕西靖国军受编。一时西安与三原间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在靖国军内部，胡景翼、曹世英、高峻等各路将领主张受冯改编，保存实力。于右任总司令则极力反对，并晓谕各方，但终无效用。陕西靖国军原辖各路军之中一、二路早受奉军收编，第六路军随云南靖国军叶荃部入川，其余三、四、七路军皆受冯玉祥改编。在此期间，孙中山曾致函邓宝珊，表示反对陕西靖国军各路接受直系军阀的改编，指出此举“不特败坏纪纲，为西南各省所不容，即于其个人节操，亦有大亏”。

1921 年 9 月 19 日至 21 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代表会议”，9 月 25 日通电取消陕西靖国军。1922 年 1 月 17 日，胡景翼部包围靖国军总司令部，焚毁文书，索取印信，查封了办公室。于右任先闻总部被封，即率少数参佐出走淳化县方里镇，避居于曹世英之部下于鸣岗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从此解体。

在靖国军各路司令相率接受奉军、直军改编的过程中，唯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始终反对受编，坚决表示要把陕西靖国军旗帜坚持到底。阎相文入陕后，曹锟、吴佩孚曾派参议武叔斌到武功游说，以编杨部为一独立旅为饵，诱杨归附。胡景翼受编后亦曾派童蒲生、李香亭等执亲笔信游说杨，曹世英也派王子中劝杨，皆被杨虎城严词拒绝。杨虎城派参谋韩望尘敦请于右任来武功，恢复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1922 年 3 月 23 日，于右任偕李元鼎、茹欲立，由于鸣岗派队护送，杨虎城派队迎接进驻武功，复设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凤翔，并设行营于武功。



此时直奉战争又起，冯玉祥率部出关，刘镇华代署陕督。利用敌军调动之际，于右任令杨虎城、李夺两部协力攻取马嵬，相机谋取兴平、咸阳。杨部于 4 月 22 日一举攻占马嵬，后敌军出动增援，对靖国军形成四面包围之势。于右任与杨虎城相会后，权衡当前形势，商定于取道甘南、四川赴沪，杨率部撤退北山保存实力。于、杨去后，李夺、麻振武部势力孤单，被刘镇华派员收编。至此，陕西靖国运动完全结束。

六、影响与启示

坚持了四年多的陕西靖国军，由于政治上、组织上的软弱涣散和内部的重重矛盾，以及北洋军阀强大的军事围攻和政治分化，终于失败了。但是陕西靖国军在响应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和坚持与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和“护法”战役中，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牺牲精神是十分可敬的。靖国军发展历

程真实地反映了陕西人民寻找革命道路所经历的艰难历程。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近代革命运动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全国也有重要的影响。陕西靖国军中以张义安和耿直等为代表的优秀将领，为争取民主、追求真理奔走呼号，临难不苟、赴汤蹈火、洒血疆场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撰稿人　路中康）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陕西武装起义

一、清涧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最后作出了《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明确提出要求将党的基础建立到农村去，活动深入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发动武装起义，准备总暴动。会后，武装斗争的风暴席卷三秦大地，在陕西近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1927年10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精神，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在清涧县率领我党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部分官兵举行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

1927年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陕西开始“清党”后，盘踞陕北的井岳秀也闻风而动，派人暗杀了共产党人刘含初，借给自己做寿为名将倾向进步的第十一旅旅长石谦诱骗到榆林杀害，并企图解除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的一部分革命武装。石谦被杀引起了石部官兵的极大愤慨，受陕西省委派遣到石部工作的唐澍、白乐亭与李象九、谢子长商议后决定，以“为石谦报仇”为口号，立即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10月12日，清涧起义正式发动，南下攻打宜川。当日下午，起义部队先到延川，与共产党员王有才带领的一个连会合，又星夜赶到延长，收缴了反动武装齐梅卿营两个连的枪械。15日，起义部队与驻守宜川的共产党员李瑞成领导的一个连里应外合，攻打宜川县城，守敌旅长康子祥带残部弃城而逃。起义部队占领宜川后，人员发展到1000余人，起义部队改编为旅，旅长李象九，下辖三个营，谢子长、韩起胜、李瑞成分任营长。

起义部队占领宜川后，井岳秀急令高双成部前来围攻。此时起义部队内部在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唐澍前往西安向省委请示，李象九先是固守宜川，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被迫突围转移到韩城，只剩下谢子长营约三四百人，暂归杨虎城留陕部队王保民部。11月，省委派遣唐澍、阎揆要到韩城，与谢子长、白明善、史唯然组成军委，并

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2 月 30 日部队在韩城举行第二次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1928 年 1 月 1 日，唐澍、谢子长率领起义部队北上，转战宜川、延安、延川、安塞、保安一带，沿途多次受到国民党部队阻击和袭击，等到达陕甘边界的豹子川时，部队仅剩下 10 余人。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其他人员分散隐蔽，清涧起义遂告失败。

二、渭华起义

渭（南）华（华县、华阴）地区，是陕西建立党、团组织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西北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渭华地区的组织、力量基本上保存了下来。1928 年 3 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划党团组织比较健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固市为陕东暴动区，成立中共陕东特派委员会指导工作，策划暴动。4 月下旬，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潘自力到渭南、华县等地，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指导暴动斗争。

1928 年 5 月 1 日，在党的领导下，渭南东原 1000 多群众首先举行暴动，阳郭镇、三张镇、高塘镇等地也揭竿而起，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举行起义，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成立了陕东赤卫队。5 月 10 日，李虎臣部队由共产党员许权中领导的一个旅，在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到达华县瓜坡镇后宣布起义，摘掉了国民党军队的帽徽，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起义部队进至华县高塘镇后，地方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全军近千人，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王泰吉任参谋长，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许权中任总顾问，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工农革命军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渭华地区揪豪绅、斗地主，并处决了其中 60 多名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将其粮食和浮财分给贫苦农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不断高涨，形成了以华县的高塘、渭南的塔山为中心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实际上控制了三个县 48 个区。苏维埃政府办起了农民夜校、平民学校和儿童团组织，提倡妇女解放，禁止强迫女孩缠足，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渭华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统治，并在西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冯玉祥急调三个师及陕东地区的反动民团对起义中心区域实行“围剿”，经过三次激烈的战斗，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虽然予敌以重大杀伤，但终因众寡不敌，退入秦岭山区。吴浩然、廉益民和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英勇牺牲。7 月，唐澍、刘志丹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大部，在洛南县保安镇又遭国民党军李虎臣部围攻，总司令唐澍等英勇牺牲。

许权中、强晓初率领的起义军一部撤退到蓝田县的许家庙一带隐蔽待机。此时，原来由高塘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的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赶到洛南的梁岔河与刘志丹会合，然后率部赶到蓝田的张家坪与许权中、强晓初所部会师，召开会议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旗帜及军事委员会；不开展苏维埃活动；起义部队通过许权中的私人关系暂归李虎臣部的刘文伯师。渭华起义失败。

三、旬邑起义

地处渭北地区的旬邑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土豪劣绅和交农罢耕运动，是陕西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县区之一。1928 年 5 月 6 日，为了策应渭华起义，旬邑县党组织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共产党员吕佑乾、许才升等人在党组织发展较早、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清水原郝村，用鸡毛传帖的形式召集附近 140 余名农民举行起义，以抗粮“交农”为口号，手持农具、梭镖和大刀，向旬邑县城挺进，沿途群众纷纷参加，队伍扩大到 400 多人。5 月 7 日拂晓，在城内党组织的策应下，起义队伍攻入县城，冲进县政府，处决了反动县长李克宣及为虎作伥的恶差数人，打开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与无辜群众，打开粮仓救济正在春荒中煎熬的贫民百姓。5 月 12 日，起义队伍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推选许才升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程永盛为军事总指挥，下设军事、土地、经济、交通、宣传、外交和裁判等委员会，在渭北高原上树起了第一面武装斗争的红旗。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发动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粮食，使革命烈火迅速燃遍旬邑全县地区，并波及彬县、淳化、永寿和甘肃宁县、灵台等地。

5 月 20 日，被国民党地方当局收买的内奸刘兴汉等在县城发动叛乱，逮捕了吕佑乾、吕凤岐、程永盛、王浪波、王廷璧、程国柱，又派人到张家村逮捕了许才升。5 月 31 日，吕佑乾、许才升等七位起义领导人被押到张洪镇杀害。旬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队伍余部由程百卯等人率领，成立了旬邑游击队，转入山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四、淳化起义

1927 年 7 月，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之时，淳化县秘密建立了最早的党组织，并立即投入革命斗争。1928 年 5 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淳化区委以“交农”的形式发动农民起义。5 月 9 日清晨，以共产党员赵新三为总指挥，淳化县东北乡、西北乡、北乡及县城周围的一万多群众肩扛农具，手执大刀长矛，抬着土炮，浩浩

荡荡地向县城挺进，包围了县城的东、南、北城门（县城西边靠山，无城门），高呼：“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吓得国民党淳化县县长段桂田站在城门上不断向围城群众喊话：“你们都回去种庄稼去吧，民国十六年、十七年的粮款不向你们要了。”围城群众也向段桂田喊话，提出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并要求段桂田和保安队离开淳化。在群众的要求遭到拒绝后，11 日中午，总指挥一声令下，围城群众从三面同时向县城发动进攻，首先攻克北门，冲进了县城，段桂田带领随从从南门逃离县城。共产党员田望秀在淳化起义爆发后，率领富平农民武装奔向淳化支援，帮助维持社会治安。6 月 19 日，起义农民代表近六百人在淳化县通润镇聚会，在田望秀主持下成立了淳化县苏维埃政权，公推赵新三为主席。6 月 30 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派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近七百人包围了淳化县城，发起了疯狂进攻。起义群众在田望秀、赵新三的指挥下，顽强抗击，特别是田望秀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最后终因武器陈旧和力量悬殊，起义军被迫退出县城，田望秀在突围中英勇牺牲，赵新三被捕遇害。淳化起义失败。

五、武装起义的影响与启示

在发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淳化起义的同时，为了形成全省总暴动的局面，中共陕西省委还发动和领导了三原、泾阳、礼泉等地开展以“交农”为主要形式的武装围城斗争，组织了麟游、澄城、咸长等武装起义。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中共陕西省委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军队，派遣大批共产党员深入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力量中开展兵运工作，先后组织领导了麟游起义、甘肃两当起义、泾川凤翔路口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蒿店起义、蒲城起义、耀县王泰吉起义、佳县木头峪起义、安康起义、郭宝珊起义、长安引驾回起义等数十次起义和兵变。尽管这些起义与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一样，大部分都失败了，但在陕西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在当时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涧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虽然遭受失败，但在残酷斗争中锻炼了党的干部，教育了人民群众，对以后陕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在全国最具影响的起义之一，在起义中将我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沉重打击了西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斗志。同时促进了陕西党的政治、军事干部的成长，为以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积累了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旬邑起义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蕴藏的巨大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不畏强暴、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在起义中英

勇牺牲的吕佑乾、许才升等“七烈士”被尊奉为人民英雄，形成壮烈感人的革命传说，在旬邑及其附近各县的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渭华起义纪念馆

陕西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以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三大起义为代表大小数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与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的失败一样，在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在当时敌强我弱、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之时，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企图通过发动城市武装暴动、攻占反动力量居绝对优势的大中城市、进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斗争形式和革命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注定要失败的。中国革命必须走毛泽东开创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正确的发展方向，成功推动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转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撰稿人　卢　鹰）

转战陕北与西安解放

一、党中央转战陕北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对全国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以后，改变了战略方针，“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在陕北方向，蒋介石集中了胡宗南、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榆林邓宝珊等部计34个旅，近25万人，企图在政治上一举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以振奋国民党内部低落的士气；在军事上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将陕西变为内战大后方。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军队全面进犯陕北解放区，叫嚣三天攻占延安。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民众奋起抗击，经过三天激烈的战斗，将胡宗南军队阻挡在麻子街、马坊和金盆湾以南地区，粉碎了敌人三天之内攻占延安的计划。为了避敌锋芒，诱敌深入，将胡宗南主力拖在陕北，然后寻机歼敌，鼓舞和支援全国其他解放区的作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中央领导同志从容不迫地告别了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临行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西北野战军的领导干部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并豪迈地预言：“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来的。”3月19日上午，西北野战军主动放弃延安，当天下午，胡宗南部占领了只剩下一座空城的延安。

撤离延安后第十一天，毛泽东于3月29日晚在清涧县枣林则沟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为了打消全党、全军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留在陕北是否安全的疑虑和担忧，毛泽东于1947年4月9日发出通知，告诉全党、全军：“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

完全有保障。”这次会议还决定将中央机关按军事编制组成四个大队，代号三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为了保密安全和有利于战时指挥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化名为“李德胜”“胡必成”，寓意解放战争必胜，革命事业必成。从此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小的司令部”，开始转战陕北1000余公里的行程，指挥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

毛泽东和党中央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至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转战延川、清涧、子长、子洲、靖边、安塞、横山、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等12个县，宿营居住过37个村镇。在371个日日夜夜里，毛泽东和党中央始终镇静从容，临危不惧，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辛严峻、险象环生的日子。1947年8月16日，党中央转移到佳县的曹家庄，前有滔滔黄河，后有10万追兵，只有800余人的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情况十分危急。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彭德怀心急如焚，电令三纵侧击追击堵截党中央的国民党刘戡部队，掩护党中央，并劝毛泽东暂时渡过黄河以解救危急，刘少奇、朱德也急电中央听从彭总意见。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毛泽东和党中央都不过黄河，继续留在陕北与敌周旋，并率领中央纵队转进西北，到达梁家岔，部署了沙家店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也开始转入内线反攻，实现陕北战场的历史性转折。

1948年3月23日，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进入华北地区。4月21日，西北野战军光复延安，实现了毛泽东离开延安时的预言。



二、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

1947年3月16日，在胡宗南军队大举进攻延安之际，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包括第一纵队、第二纵队、教导队、新编第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军，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副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总兵力约2万余人。西北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是将胡宗南所部拖在西北战场，使其不能增援其他战场，并寻机歼灭其有生力量。在撤离延安后的第7天，即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就发起了青化砭战役，集中5个旅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以南地区，埋伏于公路两侧，伏击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当第三十一旅全部进入伏击圈时，随着彭德怀一声令下，西北野战军立即发起攻击，南北堵截，东西夹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陷入一片混乱。经过不到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灭三十一旅2900余人，活捉该旅旅长李纪云，取得了西北战场的第一次大捷。

青化砭战役之后，胡宗南才发现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延安以北地区，即令其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掉头向东，兵分两路经甘谷驿、青化砭向延长方向搜索前进，寻找我军主力进行决战。西北野战军将计就计，仅以两个营兵力伪装主力与敌周旋，诱敌向延安东北方向运动，野战军主力则隐蔽于蟠龙、瓦窑堡地区休整待机。胡宗南军队相继占领延川、清涧后，未见野战军主力，又向西折回瓦窑堡，仍然扑了空，在陕北的大山深壑中东奔西跑，战线延长，兵疲粮缺，不得不留下第一三五旅驻守瓦窑堡，主力南下蟠龙、青化砭集结补给。后来得知西北野战军主力在蟠龙、青化砭以南的李家川地区后，即令其主力北击李家川，同时令第一三五旅南下，配合主力消灭西北野战军。1947 年 4 月 12 日，胡宗南主力北进，遭到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坚决阻击，胡宗南误以为西北野战军主力在瓦窑堡—蟠龙大道以西，急令第一三五旅加快南下速度。4 月 14 日上午，当第一三五旅南下进至羊马河以北地区时，早已在此埋伏等候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教导旅、新四旅全部出击，迅速将敌包围，展开猛烈攻击。战斗至下午 4 时左右，全歼第一三五旅 4700 余人，俘虏其少将代旅长麦宗禹，首创西北野战军全歼国民党一个整旅的范例。

羊马河大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要求西北野战军继续采用“蘑菇战术”，将胡宗南军队“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彭德怀、习仲勋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充分发挥我军擅长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传统，牵着胡宗南部队的鼻子在陕北兜圈子。胡宗南部队在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的行军中，为防止再遭伏击，不敢走大道，每日爬山越岭却处处扑空，结果是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疲惫不堪，士气低落。1947 年 4 月下旬，蒋介石根据其所得到的中共中央及西北野战军主力已开始陆续东渡黄河的情报后，遂令胡宗南主力迅速北上，榆林邓宝珊主力南下配合，企图南北夹击，歼灭我军于佳县、吴堡地区。胡宗南按照蒋介石命令，集结主力兵分两路北上，以第一六七旅（缺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陕西民团第三总队守备重要补给基地蟠龙。4 月 27 日，彭德怀等致电毛泽东，提出围歼蟠龙之敌的作战计划，毛泽东于次日复电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西北野战军主力随即向蟠龙方向隐蔽前进。5 月 2 日，当胡宗南主力到达绥德时，西北野战军于午夜向蟠龙发起突然攻击，战斗持续到 5 月 4 日黄昏结束，全歼守敌 6700 余人，活捉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第一六七旅少将旅长李昆岗，缴获西北野战军急需的大量粮食和军用物资。气急败坏的胡宗南急令主力掉头蟠龙时，西北野战军已转移到安塞修整数天了。

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1947 年 5 月 14 日夜，万人祝捷大会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开始，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习仲勋主持了大会，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发表了讲话，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专程前往真武洞参加了祝捷大会，

在讲话中特别告诉与会军民说：“毛主席和党中央都还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三战三捷’战役就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真武洞祝捷大会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志，沉重打击了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同时也增强了全国解放区军民争取胜利的革命信心。

三、西府战役与西安解放

1948 年 2 月至 3 月的瓦子街、宜川战役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敌我态势，西北野战军在人数上由原来的 2 万余人发展到 11 万余人，在战略上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进攻。当时陕西西府的彬县、长武、陇县、宝鸡、兴平等 14 个县国民党防务十分空虚。特别是川陕公路与陇海铁路的连接点、胡宗南军队的重要供给基地宝鸡，仅有国民党第七十六师师部、第一一四旅新编第四十九团及陕西保安第二十一团守备。1948 年 4 月 13 日，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在马栏会议上决定：主力挺近西府，攻占宝鸡，迫使延安、洛川方向的敌人回防关中，然后在运动战中予以歼灭。会后以王震第二纵队、王世泰第四纵队组成左路兵团，由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统一指挥，南渡泾河，首先攻占永寿、乾县，然后作战略展开，一部进攻礼泉、兴平等地，向咸阳方向佯动，并破坏兴平附近铁路，斩断宝鸡至西安的交通；主力迅速向武功、扶风、岐山、宝鸡发动进攻。以贺炳炎第一纵队为中路兵团，攻占旬邑后经张洪镇渡过泾河，夺取彬县，向麟游、凤翔方向进攻，协同第二纵队夺取宝鸡。以罗元发第六纵队为右路兵团，控制长武，斩断西兰公路，牵制马步芳军队。



西府战役打响之后，仅仅用了 8 天时间，就全歼了国民党青年军二〇三师两个团和许多地方武装，实现了前期作战目标。4 月 23 日，教导旅在长武击退了马步芳第八十二师的进攻，中路兵团攻占了凤翔，左路兵团于 24 日占领了岐山、蔡家坡和虢镇，包围了宝鸡。4 月 25 日夜，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向宝鸡发动了猛烈进攻，经过两天激战，全歼了国民党第七十六师，击毙了为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七十六师师长徐保，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由于胡宗南与马步芳东西对进企图夹击解放军，4 月 28 日，西北野战军主动撤出宝鸡，回师北上。此时延安守敌整编第十七师已弃城南逃洛川，会同洛川守敌第六十一旅一起南逃关中。西府战役历时一月，西北野战军占领了 14 座县城，光复了延安，为进军关中、解放西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 年 2 月 1 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所属各纵队依次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骑兵第一、第二旅改称骑兵第一、第二师，总兵力约 15 万余人。2 月 20 日到 3 月 18 日，第一野战

军发动春季攻势，接连攻克铜川、耀县、淳化、富平、大荔、朝邑等县城，迫使胡宗南集团收缩兵力至三原、蒲城、大荔一线，部署所谓“机动防御”，准备固守西安。为了解放和接管西安，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安地下党组织和第一野战军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3 月 1 日，经西北局决定正式成立了以贾拓夫为主任，16 人为委员的接收西安委员会。5 月 10 日，西北局召开进军西安动员大会，习仲勋书记在讲话中阐明了进军西安工作队的方针、政策和纪律。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除了不断向野战军秘密送出各种情报外，还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和爱国进步人士，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展开护厂、护校、护局斗争，将敌人逃离时进行的各种破坏争取降低到最低限度。5 月 17 日，第一野战军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通报了胡宗南集团企图南逃汉中和西撤咸阳、乾县、礼泉、永寿等地，阴谋联合西北“马家军”待机反扑关中的情况，决定第一、第二、第四军立即向西截击敌人，第六军挺进西安，第三军作为总预备队。

1949 年 5 月 20 日黎明，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强渡渭河，逼近西安城西门，第十七师一部由西郊三桥镇乘火车进至西安城北门和火车站附近,；第十六师一部占领了西安城南门和北门。西安守敌有的被歼灭，有的举手投降，有的仓皇逃命，当日上午 11 时，我军占领了整个西安城，除西京电厂被敌人炸毁、大华纱厂被部分破坏外，其他工厂、学校、城墙民居和文物古迹大都完好无损。5 月 21 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工人、市民和学生都纷纷涌上街头，欢迎人民的军队进入城市，庆祝古城西安获得解放。5 月 24 日，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贺龙任主任。5 月 25 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贾拓夫任市长。5 月 26 日，中共西安市委员会宣告成立，贾拓夫任书记，赵伯平任副书记。

四、转战陕北与西安解放的历史影响

在国民党胡宗南军队逼近延安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12 个县，行程 1000 多公里，在大山深壑中与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斗智斗勇，周旋自如，并指挥了陕北战场和全国其他解放区的解放战争，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勇气和胆略，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陕北解放区军民的革命斗志，并将胡宗南军事集团主力牵制在陕北，有力地支援了其他解放区的军事斗争。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转战陕北的 371 个日夜里，几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得力于陕北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和毛主席的衷心爱戴、大力支援和多方保护，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深厚感情。

胡宗南军队进占延安后，西北野战军以 2 万多人的兵力，与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决



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

战于陕北战场，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亲自指挥下，采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表演了一场“武装大游行”的好戏，将胡宗南军队拖得筋疲力尽后寻找战机予以各个歼灭，在撤离延安仅40天的时间里，接连发动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大战役，三战三捷，歼敌近1.4万人的辉煌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战争范例，稳定了西北战场的局势，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增强了全国解放区军民争取胜利的革命信心。1947年8月，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部署下，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西北野战军又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整编旅计6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从而使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1948年4月间，西北野战军发动的西府战役解放了14座县城，光复了延安，为进军关中、解放西安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5月20日，古城西安及关中42个县的解放，摧毁了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经营了20年的西北反共大本营。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在扶风、眉县发动的扶眉战役，在短短的4天之内歼灭胡宗南集团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九十、第一一九军等4个军4.5万余人，取得了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的空前大捷，不仅粉碎了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反扑西安的妄想，解放了关中全境，而且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和进军大西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撰稿人　卢　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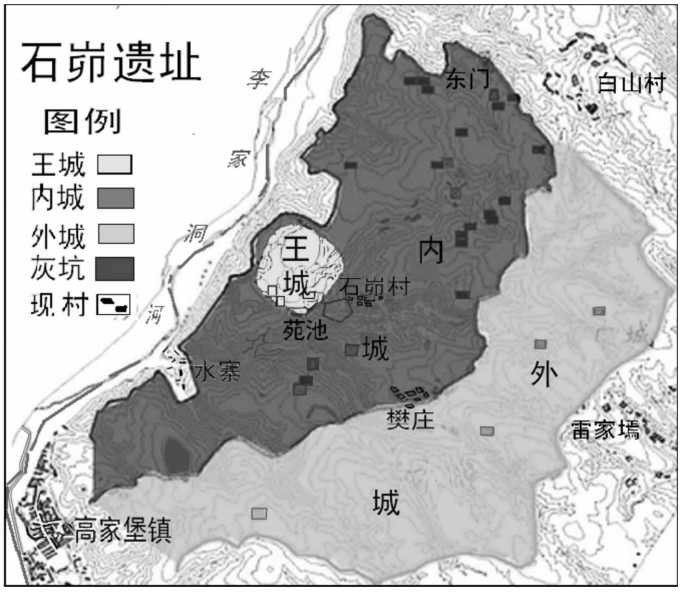
第六编

都邑

神木县石峁古城及其主人推测

神木县石峁古城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史前时期规模最大最古老的古城遗址，入选为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列为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石峁古城遗址在神木县高家堡镇东北侧，以距高家堡2.5千米的石峁村为中心，是一个展布在石峁山南面缓坡上，南北2千米，东西4.5千米，面积（不包括高家镇街区占部分）425万平方米的大型古城遗址，比闻名世界的西安古城134万平方米还大三倍多45平方米。近年来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专家在这里采用现代考古手段，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勘探和研究，古城面纱逐步被揭开，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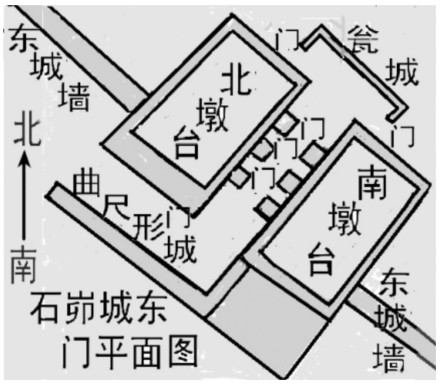
陕北人将村在馒头状的山包处称作石峁村，石峁古城遗址以遗址中村落石峁村得名，是一个中国史前时期最古老、规模最宏大的古城遗址。建造于4300年前，建后保持三百年之久，或到夏朝前期。早在清末和民国时因村民家中常保存一些从田里拾回的古代瓦盆瓦罐和玉器，古董商常来收买，从这里流落到世界一些国家的文物多达四千余件。考古人员在1976年于该村石峁林河发掘勘探，发现这里是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古城遗址，经勘定建造于4300年前，存在历时300余年的一个大型古城。除延伸到高家堡镇街区一



段外大部保存完好。出土了玉器、陶器、骨器和随葬的陶珠等物1000多件，并有铜器和石范。玉器中著名的侧面人头雕像，高鼻、宽腮、大眼，相貌酷似今陕北人，英俊、聪敏、惇厚，是当年佩带的饰物。还有一个鹰首玉佩，上面有四个汉字，是目前最古老的汉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石峁城遗址呈近似四边形分布，北城墙沿李家洞河，由高及低，依次是王城（考古界称皇城台，宫殿筑在巨石围砌的近方形石台上）、内城、外城三个完整而相对独立的石结构城组成，每个城用水由城西北的李家洞河导来，石峁村西南有人工开挖的较大的苑池，城市用水充足。发现疑是城门六座，发掘了位于城东最高处海拔1169米处的东门，发现门外包有瓮城，门内有对峙的两个墩台，上有掩体射箭垛口，防守十分严密，是一座中国龙山文化时期高度文明的大型都城。

根据近年初步考古发掘勘探资料，我冒昧地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供大家研究：

一、石峁古城有哪些特色?



第一，石峁古城的规格高，规模又如此之大，不是当时某一国的军事基地和属邑，而是一个独立的强大王国的都城。它有城墙、城门、部分城河。分王城（皇城台）、内城和外城；城门外有瓮城，内有对峙的墩台和曲尺形辅城墙，城墙上有类似女墙、射箭的垛口，涵盖了中国汉唐至明清大型城堡建筑的要素。特别是这些城墙、宫室的墙体和墩台等建筑，都按东北至西南走向角度设计建造，角度精确，十分规矩，与整个城的分布和谐融合，这就必须有精密的测绘仪器如指南器的条件下、经过设计才能完成，体现出高超的城建规划水平，也是中国最早经过设计施工的城市。同时，这种采光方位日照时间最长，最为合理，古代将这种采光方位叫作昃位。周人在周原今京当镇的大型宫殿就是取西南采光，《诗经·斯干》说："筑墙百堵，西南其户。"周人整个宫殿的门窗面对西南，受到今人重视，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期街道楼群就是按昃位建成的。其实，4300年前石峁城已经用了这种采光方位了。对这座古城古史上有无记载？如《书·尧典》说"尧命和仲城朔方"，即尧王命和仲筑朔方城，而和仲所筑之城不可能是如此宏大的国都规格。《诗·出车》周宣王命南仲"城被朔方"，时间和规格更不符合。从现在的房屋遗址和灰坑估算，城内居民至少有3000人，在当时人口稀少的年代里，必定是一个管辖大片领土的国家都城。

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大的城堡？其功能有哪些呢？这个问题还需从“享”字说起。《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享就是“享用”。轩辕讨伐那些敢不交纳贡赋的部落。在部落时代，战胜者依靠武力命令战败者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将指定的物资送到，供战胜者享用。战胜者必须有一个“享”的地方，于是建造了城郭，“郭”字就是“享”之“邑”两字的组合。也就是建造一个坚固的城郭统治他的臣民。部落领袖与他的部落臣民、军士按不同等级居住在王城（皇城台）、内城、外城，城中的人除自己劳动所得外享用战败者提供的生活资源。



第二，当时处于部落时代，由于农耕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人们有了剩余的粮食和丝麻织品，出现了社会分工，有了专门从事玉工、纺织和金属、陶器制造的人群。部落的领袖人物就有可能建立强大的军队和从事城建的劳工。《史记·五帝本纪》：“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就是说：农耕社会向前发展到深化成熟时，就会出现部落间的侵伐战争。

由于部落的领袖人物与所在部落人民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因此受到部落人民的拥戴，使部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三，这里出土了贵族刻有文字的鹰首玉器佩件，说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国民，以鹰为图腾，与历史上存在于陕北的翟人有共同崇拜。北方，至今仍将大鹰称雕，小鹰称隼，“翟”字与“雕”字远古时几乎是同一个字。翟就是雕鹰的速读。翟字是古人头饰上的鹰羽，以示英武。而鹰首人还使用汉字，崇拜蛇，与汉江、渭河流域的女娲氏、伏羲氏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



第四，他们崇拜蛇，玉佩上雕刻着的四个精美的阳刻汉字，开头𠂤字的字义是蛇，与史书上记载黄河中游的女娲氏、伏羲氏人

首蛇身风姓、大禹的禹是虫、门二字的组合一样，同属于早期的龙文化信仰。古城的主人与黄河中游各民族是一个文化系统。

第五，第二字像两山间的川道里的黄土田地，代表陕北地貌特征，可能是黄字的原形，表示黄土可耕地，与沙漠作强烈区别。城的主人属农耕文化民族，区别于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

第六，传说，黄帝灭蚩尤后，曾在涿州作邑，不是都城。又说黄帝于阪泉（今河南新郑一带）打败炎帝后将都城建于有熊，故他亦姓有熊。有人说有熊在今河南省新郑，即打败炎帝的地方。黄帝是部落联盟时代人物，他不可能将都城建在他的敌对部落中心。周文王在周原称王时，北方的有熊氏部落领袖还来周原参拜文王。与黄帝同出一地的北方匈奴中就保留了有熊的姓。因此传说历史中黄帝建都的有熊，应在今北方的石峁城处。

第七，玉佩上的第三个字可能是“之”字的前身，是助词。第四个字是“土”字下面一个“口”字，字的字义是特定的国名。“口”字如同后、君、商、周下面的口字一样，表示发号施令，大众听从其指挥。“土”表示这个国家的特征，以农耕立国，以土为宗，以土为德。这四个字既不是甲骨文，也不是早期的金文，怎样读目前还不知道，从字义看似“蛇黄之国”。这四字是龙山文化中罕见的汉字，比商代的甲骨文要早了一千年，然而书写流畅工整，相当规范，已经有了从图画中脱胎而出的会意字，成为真正的文字，而玉佩上的这些文字又是今天汉字的鼻祖。当今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都能认出字是“土”字下面一个口字，说明石峁人与后来的夏、商、周以及现代的中国人是同属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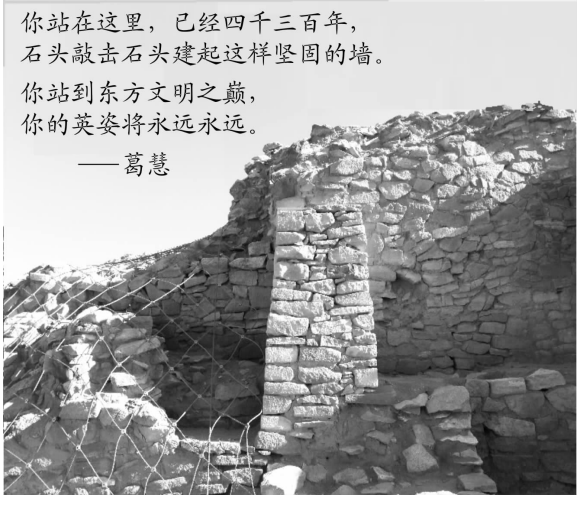


二、石峁古城的主人可能是黄帝?

石峁古城的主人是谁目前还不能确定，综上所述，从种种迹象看，明显地看出像传说中的黄帝都城。古籍记载，轩辕黄帝破炎帝、灭蚩尤，北逐薰育，建立起西起昆桐、东至海的国家。当时是龙山文化时期的部落时代，黄帝必然起身于某部落，背后必定有一个荣辱与共的强悍部落。当时所谓华夏民族还没有融合形成，黄帝起身于陇西的翟国，即后来《史记·匈奴传》所记的：“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铬之戎。”河西走廊东部的陇西，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很古时就有中亚的月氏和龟兹人到达那里。在原始部落时代，文明程度高的地方部落容易强大起来。黄帝起身于泾水上源的陇西，当地人发音急促时将“泾”读为“姬”，他以出生地为姓。《路史·国名记》：白翟五部就包括这一带各族人。因此，翟族是黄帝的基本部族。中国北方山水东西横向分布，炎帝是姜族人，与黄帝结为通婚的联盟。炎帝起身陇西沿渭水

向东发展，到达洛阳、孟津一带建国。黄帝了起身陇西向东发展到达陕北、晋北一带，陕北是广大的翟人天下，他如鱼得水。石峁古城出土贵族佩戴的鹰人头像玉佩，符合黄帝的部落翟人特征，“翟”字和“雕”字几乎是同一个字。古人将大鹰称雕，鹰首是翟族的标志。当时，石峁人能在玉材上刻出如此规范而精美的阳刻文字，证实黄帝的大臣仓颉创造出文字、黄帝已经使用文字的传说是真实的。当时又能在玉材上切割下 2 毫米厚的手掌大的同心圆玉环，他们已经使用了金属和机械；出土的纺织精细的苎麻纺织品衣服，印证了黄帝纺织制衣的传说的真实性。这样宏大的石城，所有建筑都按统一方向设置，各种墙的走向角度如此精确一致，印证了古代传说：轩辕黄帝发明“指南车”的真实性。今天我们揭开夏朝以前的古代史，有哪一位历史人物能有这样高的文化、技术水平和能力，能够建造如此雄伟的城市？只有，也只能有黄帝才有相应的理念、文字、工艺水平和建造这样宏伟城堡的实力。

三、关于《汉书·地理志》等古籍有关黄帝的记载



《汉书·地理志》“上郡”关于黄帝的记载有：（一）肤施县：“有五龙山、帝、原水、黄帝祠四所。”（二）阳周县：“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畤。”（三）上郡有原都县。又《水经注》记：“《地理志》曰县有五龙山、帝原水，自下亦为通称也。历长城东，出于白翟之中。”又说：“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上陵畤，山上有黄帝冢故也。帝崩，惟弓剑存焉，故世称黄帝仙矣。”按此，帝水和原水显然是两条河水，今人《地理志注》：“帝水即今无定河。”如《水经注》所说：无定河“出于白翟之中”，曾名翟水，与帝字有谐音关系。原水应是今秃尾河，古亦名圜水，圜读原（yuán），古人以音纪事，一名多字，圜水当即原水。石峁城与秦汉白土县同在圜水两岸。《汉书·地理志》上郡白土县记：“圜水出山西，东入河。”白土县故城在石峁城西 19 千米大堡当镇东，镇东侧圜水西岸有白土县古城遗址，两米高白色残城墙断续可见，当地人称查干格洛则。既然秃尾河是原水，秦汉原都县应是今高家堡镇，理由是汉上郡

只辖到这里，再东的圜阴、圜阳两县属西河郡，在圜水下游。原都者原水岸上的都城，这个名称值得我们深思。

四、黄帝为什么要将古城修建在黄土高原的最北边?

有些学者认为黄帝不可能把都城建在流沙边疆，五千年文明史的开创者黄帝也不可能出现在公元前4300年前，应更早些，此说值得进一步研究考证。我们从《史记》记载：黄帝进行了三大战役，灭蚩尤于涿鹿，邑于涿鹿。又说，与炎帝三战于阪泉，在今孟津一带，都于有熊，也有说在今新郑一带。当时黄帝处于部落联盟时代，他必然存在于一个特定的部落里，黄帝不可把都城建在灭蚩尤之地或敌对部落势力中心，黄帝建都必然是建在属于自己部落控制范围内，石峁古城贵族鹰首玉佩是黄帝部落民族的特征，鹰就是翟，这里才是黄帝的大本营，既安全又保证物资供应。黄帝进行过的三大战役，破炎帝、灭蚩尤、北逐荤粥（匈奴前身），前两场战役都取胜了，只有荤粥来去无踪，赶跑了还会再来。于是选定高家堡这块宝地建城来防御荤粥。这是因高家堡南面是千里良田，北面是无际沙漠，是北方大门。这样浩大的工程，坚固而周密的战备城堡，起到战略威慑作用。从地理位置看可知必定是防御强大的敌人荤粥的。事后证明，直到周、秦、汉各朝，匈奴一直是华夏人的强大对手。可以理解为什么黄帝要将重城筑在这里，而且筑得如此坚固。所以说，这座大型城堡除作为都城外，还有军事上封锁黄河谷道、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战略威慑作用。



五、关于黄帝时的年代

据《史记·五帝纪》记载：神农氏作为一个部族，除之前有少典等在外，从号称神农起“凡八代，五百三十年，为黄帝所灭”。我们省略历代神农氏帝的人名，最后一位神农氏部落领袖炎帝败于黄帝。这一段历时六百年有余。从黄帝的子嗣到尧，中间出现过颛顼、帝喾等许多杰出的人物，传到尧，足有十多代。两者占有夏以前的千余年时间。我们说，中华文明五千年，黄帝首次统一中华，建立国家，发明文字，创立各种先进的理念和科学发明，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石峁古城可能是黄帝的都城，著名的史前史专家沈长云教授指出，应是黄帝时的都城昆仑城。石峁城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东方文明的摇篮。古城价值不低于西安的兵马俑，有待于进一步发掘考察。

六、黄帝时的部落联军和部落联盟国家

黄帝处于部落联盟时代，华夏族还没有形成，黄帝的部落是陕北的翟族。黄帝统一中华大地后，由翟、羌、黎、华等族融合成华夏族。先进的父系部落出现，而部落中仍然有保留母系氏族形式。参加黄帝联军中重要力量的华族风后，是居住在关中骊山的女娲氏后裔丽山氏的一位领袖人物。骊山南巅有金山神庙风后祠。清《陕西通志》引古志："昔风后逐蚩尤有功，后世封为金山之神，土人立祠焉。"蓝田的两处金山庙和临潼骊山北麓风王村的风皇娘娘庙，都有许多古籍记载，风后是丽山氏的一位女皇，祠庙都塑女姓神像。《史记·五帝纪》载："女娲氏、伏羲氏风姓，人首蛇身。"风后，显然是石峁人鹰首玉佩上所刻字的民族，传说中华胥氏之后。风后继承了女娲氏母系氏族体制为丽山氏族之女王，但她们以先进的父系社会体制为模式调整社会结构。骊山脚下姜嫄村（在临潼区城北部）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已经建立了父系社会。《礼记》记风后的儿子农，种植各种谷物和野菜，人民衣食丰富，以致后代至今将种植业称为农业。陕北也有风后祠，如宜川县城西北侧风后庙等。所以说，黄帝时军队是部落联军，政权体制是部落联盟。我们急切地期待考古界对石峁城有更为丰富、确切的实物证实，将一个伟大古城的面貌展现给世人。

七、从石峁古城看黄帝时的社会结构

从石峁城以父系家庭为主的墓葬，已经建立起男性为主的家庭。就是说：不再是母系社会粗犷的集体打猎和采集野生植物；不再是吃大锅饭和男性集中住在一起。石峁人有明显的一家一户的院落，而是以父系家庭为单位从事农耕。适应农耕发展的先进的父系社会是在母系社会为正统的舆论压力下艰难曲折地成长而被认可的。经过了百万年漫长的母系社会，一旦父系家庭出现，其优越性立刻显示出来。人们拼命给自己的家庭积累财富，社会总体财富迅猛增长。特别是子女得到保护和教育，人们把经验绘成图画传授给子女，形成了文字。

人类文明飞速发展，短短五千年中由石器文明飞跃进入工业文明时代。黄帝是开创石器时代的伟大代表，石峁城或许就是黄帝之都，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代表了当今我国考古研究的最高水平。我们急切期待进一步考古结论，如果她是中国文明的摇篮，那将要比西安兵马俑伟大得多、重要得多。

（撰稿人　葛　慧）

西汉定都关中及京师长安建设

一、采纳娄敬建议，决策西都关中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本是沛县一“中家”地主，际遇秦末乱世，在反秦武装斗争中，由匹夫而为天子。西汉开国大臣，除张良出身高贵外，余则多是秦基层小吏或白徒，甚至贩夫、狗屠一类下层民众。如此一种以平民皇帝和布衣卿相为特点的政治生态，前所未有，为天下一大变局。也许正因为这样一群比较普通的人组成的朝廷，有一种较为平实的新作风，所以就发生了下面的有趣故事。

历史上的任何王朝，把国都的选定，都看成是极其重要的大事。因为国都定在哪里，哪里就是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事关重大，不能不慎重考虑。

西汉王朝的前身汉王国，原都南郑，刘邦还定三秦后迁都于栎阳。西汉的建立，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汉王国的继续和扩大，如果仍以栎阳为都，亦未尝不可。但刘邦却把国都选定在洛阳，其用意是要“与周室比隆”，居天下之中心。不料此后不久，有一位车夫娄敬，竟大胆批评刘邦定都洛阳的想法，并献西都关中之策。



娄敬本是齐人，他在前往陇西戍边路过洛阳时，通过老乡虞将军求见刘邦。娄敬首先针对刘邦要“与周室比隆”的思想，阐述了周、汉两代立国不同而不能简单“比隆”的道理，接着便向刘分析了关中的地理、资源优势，以及在这里建都的好处。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最后娄敬打比方说：“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胜；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搤”就是“扼”的意思，“亢”即喉咙。这就是说，在关中建都，立足于秦之故地，就好比扼住了天下的咽喉。

娄敬的这一番建言，既有道理也很实际。刘邦颇为所动，然而却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问群臣”。“左右大臣皆山东人”，他们坚决表示反对，强调“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背河向洛，其固亦足恃”。尤其他们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且带有煽动性的理由，

即在洛阳“周王数百年”，而在关中“秦二世而亡”，因此“不如都周”。在一片反对声中，唯有张良支持娄敬的看法。他指出：“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张良的分析，终使刘邦下定决心，“即日驾西都关中”，并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其时值高祖五年（前 202）夏五月。

次年，有位名叫田肯的人再次向刘邦阐述了建都关中的实际价值。指出“秦，形胜之国也”，其河山之险，使与诸侯悬隔千里，只需二万人马，即可敌得诸侯百万之众，一旦要对诸侯用兵，“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刘邦听罢连连称“善”，并“赐金五百斤”以为奖赏。

二、高帝、惠帝时期长安城的营建

刘邦决定建都关中后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关中那么大，汉的都城究竟应该建于哪个具体地方？当时，原秦都咸阳早已遍地焦土，而另建新城客观条件又不允许。恰巧渭河南岸长安乡一座秦的兴乐宫，未被项羽的大火烧毁。这里虽在咸阳之东，但秦时仍属咸阳的范围之内，遂被选为新都的基址。

兴乐宫为秦始皇在关中的“离宫三百”之一，“周回二十余里”，规模相当可观。内有始皇二十七年修筑的高 40 丈的鸿台，台上楼观屋宇高耸入云，还有大夏殿及鱼池、酒池等。汉廷派少府阳城延将此宫加以修葺扩建，并更名为长乐宫，作为汉帝处理政务及长居之处，从而开始了汉长安城最早的营建工程。

汉高祖六年（前 201），正式确定以“长安”作为国都的名称。翌年始，长乐宫建成，刘邦在此按照叔孙通制定的朝仪举行朝会，一改过去那种“拔剑击柱”、闹嚷喧嚣的混乱局面，使刘邦叹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可以说，这时长安的首都功能实际上已经开始发挥了。不久，“丞相以下徙治长安”，即汉朝廷的各个职能部门已迁至长安办公。

早期长安城的营建除将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宫外，另一项目则是新建未央宫。工程仍由少府阳城延具体负责，却由丞相萧何主持建造。汉高祖七年（前 200）二月，未央宫初具规模，“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刘邦见这些建筑十分壮丽，甚怒，就批评萧何“治宫室过度”。萧用“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作回答，使刘转怒为喜，于是“自栎阳徙都长安”。从此长安就正式揭开了它作为西汉首都的历史。

高祖九年（前198），未央宫落成。刘邦在宫的前殿置酒，大朝诸侯群臣。刘亲自端起能容四升酒的玉卮为其父太上皇祝酒，并问如今他和哥哥刘喜究竟谁的产业多。结果“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不过从总体上看，当时长安的规模还很小，在长乐、未央两宫以外，基本上是一片旷野，甚至连城墙也没有。

如果把高祖刘邦时期（前202—前195）对长安的营建称作长安建设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惠帝时期（前194—前188）则是其建设的第二阶段。这阶段的营建主要是筑城墙，并建西市。

城墙始建于惠帝元年（前194）春正月。三年（前192）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工程进行了整整一个月。同年六月，又征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筑城。五年（前190）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工程仍旧集中进行了一个月。到这年九月，整个筑城工程全部结束。“其进程大概是从城的西北方起，先筑西墙，再筑南墙，又筑东墙，最后筑北墙”。今考古实测周长为25.7千米，合汉代62里强，与文献记载的“六十三里”说基本相吻合。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城墙因迁就长乐、未央两宫的已定位置，故有多处曲折。北城墙主要由于渭河河道的限制，也有许多曲折、偏斜。为此古人曾有“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以及“斗城”之说。其实，这仅仅是附会，并非筑城时刻意模仿。对此，元代的李好文（河滨渔者）早就指出过了。考古发掘表明，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其坚固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之外。城墙高在12米以上，下部宽为12米至16米，与文献记载颇有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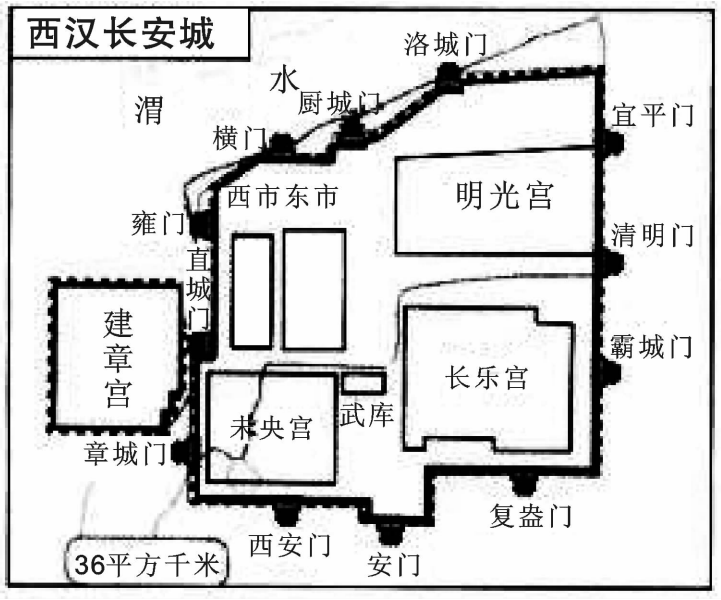
长安城内有九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财货买卖贸易之事”。九市之名，今人考证略有奇异，所得市名计有东市、西市、南市、北市、柳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到亭市、搞市、槐市、四市（或说是东、西、南、北市之合称）等，实际已超过九个。疑“九”是极言其多之意。其中有些市，起始很早，如直市，传为秦文公时所造。至于它如何成为汉长安的市，似不可考，也许只是沿用直市之名罢了。但多数市当为西汉新建，其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起长安西市”，时在惠帝六年（前189）。这反映当时长安的商业贸易已比较活跃，需要建市以加强管理。

三、武帝时期长安城的扩建及其始为丝路起点

长安城建设的第三阶段是武帝时期（前140—前87）。至此，长安作为都城的规模方才大备。

当时，西汉经过60余年的休养生息，已经一扫汉初那种窘境，而呈现出一派繁荣富

庶景象。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武帝开始大规模扩建长安城。其主要工程有，在西面城外建建章宫，在长乐宫北面建明光宫，在未央宫北面建桂宫，增修北宫，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等。



长安城示意图

建章宫建于太初元年（前104）二月。当时柏梁殿发生火灾，武帝听信粤巫之言，按粤俗“复起大屋以压之”，遂有此宫之修造。由于兴建于西汉国力最强盛的时候，故“营宇之制”及豪华程度均在未央宫之上，号称“千门万户”。其正门在南面，名“阊阖”，意即天门，因以玉为饰，又称“璧门”，凡三层。左凤阙，高25丈，上有金凤（实为铜凤），故名。右神明台，为武帝祀仙之处所。台上立铜柱，柱上有一巨大的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清露。宫南有玉堂，其内殿12门，阶陛皆用玉石做成；又铸5尺高的铜凤，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宫中还有许多殿堂，其中奇华殿专门陈列外国奇物及外国使节的贡品。宫北有太液池，即一大型人工湖。“太液者，言其津润所及广也”。池“中起三山，以像瀛洲、蓬莱、方丈，刻金石为鱼龙、奇禽、异兽之属”。整个建章宫，“周回三十里”，有“飞阁”与未央宫相通。遗址在今西安市西郊三桥镇至西柏梁村和孟家寨一带。

明光宫建于太初四年（前101）秋，“南与长乐宫相连属”。桂宫“周回十余里”，“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宫中明光殿，“皆金玉珠玑为帘箔，处处明月珠；金陛玉阶，昼夜光明”。因武帝置四宝物于桂宫，故“时人谓为四宝宫”。今西安北郊夹城堡东有一

夯土台，当地居民叫凤坡或凤圪垯，可能即当年桂宫明光殿遗址。北宫“周回十里”，在桂宫之东。“高帝时制度草创，孝武增修之，中有前殿，广五十步，珠帘玉户如桂宫”。从文献记载来看，这里与桂宫常作皇后“废处”“退居”之处。

上林苑系沿用秦的旧苑旧名。秦上林苑在渭南，范围较小。汉初，曾开放秦的苑囿园池，令民耕种。建元三年（前 138），武帝在秦苑基础上进行扩建，使之成为北临渭河、南依秦岭、东起蓝田、西到周至的一个广袤数百里的古代皇家苑囿。这里既是由宫殿、园林与大自然巧妙结合的帝王享乐处所，也是规模浩大的植物园和野生动物园。文献记载，全苑划分为 36 个小区域的苑囿，共有 12 宫、25 观以及 12 道苑门。著名的建章宫即建在苑中。西汉文豪司马相如曾著《上林赋》，对苑中宫殿及自然景观有生动的描述。

昆明池是上林苑中最大的人工湖，“周回四十里”。元狩三年（前 120），武帝为准备与昆明国（今云南晋宁一带）作战训练水军，并解决漕渠水源和首都供水不足问题，在长安西南沣、滈二水之间开凿此池。“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战”。中置戈船数十艘，楼船百艘，操练水军。又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还置龙首船，令宫女泛舟池中，櫂歌鼓吹。池旁竖立两石人，左牵牛，右织女，以象天河；另还有长三丈的石鲸，传说“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池中矗立着巍峨壮丽的豫章观（昆明观），登观眺望，美景尽收眼底。昆明池遗址在今西安西郊斗门镇东南一带。

除上述各项扩建工程外，自武帝时期开始长安城还新增加了一项功能，即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



大家知道，西汉初匈奴经常侵扰汉边境，成为严重的边患。为了有效抵御匈奴入侵，汉武帝从一个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后，立即决定募使前往寻求与国，以实现其“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

这一募召得到了汉中城固（今属陕西）人张骞的积极响应。当时，从汉到西域需要经过匈奴人控制的河西地区，前进的道路异常艰难。公元前 138 年，张骞率众百余人持节从长安向西域出发，途中被匈奴人俘获，拘留十余年逃脱后继续仗故节西行抵大月氏。

不料大月氏在中亚阿姆河流域定居已久，“殊无报胡之心”，张骞扑了个空。虽然未能完成结交与国的使命，但他终于在公元前 126 年生还长安，给西汉王朝带回了关于西域的最新消息。这更激发了汉武帝西进的热情，此后遂开始了一系列广求西域通路的活动。自公元前 121 年，汉将霍去病大败匈奴收复河西之后，通往西域的道路终告畅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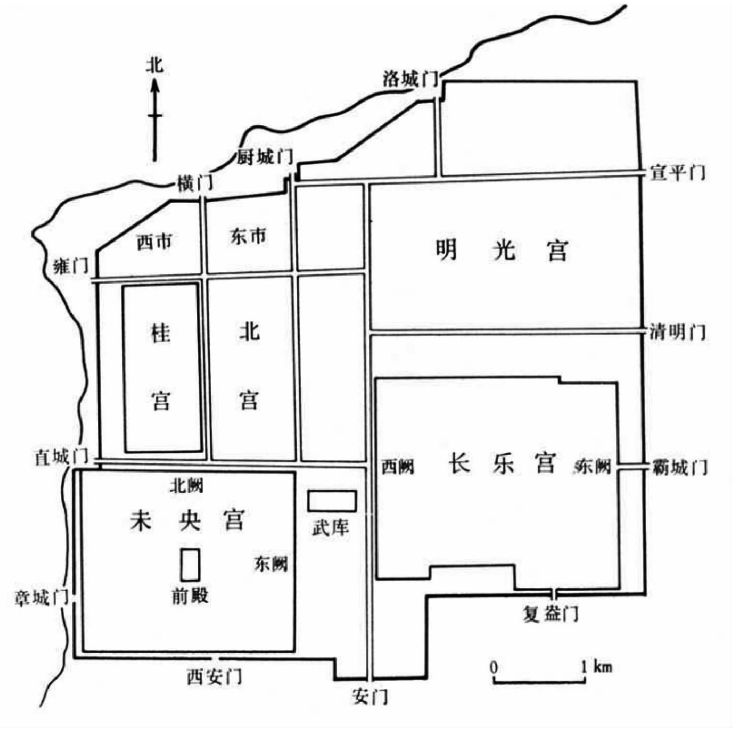
司马迁把张骞的西域之行称为“凿空”。凿空即探险的意思，其意义重大。由此发展而来的丝绸之路，对中西文化经济交流起了重要作用，谱写了世界古代史上绚丽的一

页。而当丝路开通后，京师长安自然便成为它的起点，具有了丝路起点城市的功能。

四、汉长安城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陕西的都城史虽然早自周人建都丰镐已经开始，以长安为都却由西汉拉开帷幕。

从前文所述可知，长安原是秦都咸阳一个乡的乡名。其本意是否就是长治久安的意思，似不可考。西汉统治者选取长安作为都城之名，论者一般都把此举与“长治久安”相联系，认为“长安”即“长治久安”之义。如此美好的意愿，自然是每个统治者都心向往之的。难怪自汉而后，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以至大唐，皆以长安名都，应该说都显示了祈求长治久安的心理。长安长安，长治久安。这当为长安城第一层的重大意义。



汉长安城布局示意图

从中国城市史的角度来看，汉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最大的城市。其总面积30多平方千米，人口50万左右。夯土筑的城墙周长25 700多米，共有12座城门。每个城门上设城楼，下设三条门道。门道宽8米，可并行四辆大车。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

中央大街特别宽敞，是皇帝专用的“御道”。各道路两旁植有槐、杨、柏等树木，蔽日成荫。城中部、南部为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左右；城西北角为东、西市，是商业活动区，并有官府手工业作坊。长安城周边有众多的陵邑（即在帝王陵墓附近建的小城市，实际就是都城的卫星城），与长安共同组成了庞大的城市群。如此一种城市的规模，如此一种市区的布局，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这当成为长安城又一层的重大意义。从世界城市史的角度来看，汉长安城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当时只有欧洲的罗马城可以与之媲美，但罗马城的规模仅为长安城的三分之一尚弱。汉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与西方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长安汇集有大批的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西方客商，以及无数异域的货物，是著名的国际大都会。这些则成为长安城第三层的重大意义。

关于汉长安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中国都城建设所起的奠基作用方面。西汉长安城，以其宏伟的气魄、严谨的风格，奠定了后来都城建设的基本布局，对我国都城建设有深远的影响。至于汉长安城对陕西的影响，是否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即汉长安是陕西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国际性大都会，其开启了陕西与外部世界交往交流的新时代。当然，这一点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也是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对汉长安城作过多次有计划的考古勘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使我们掌握了有关汉长安城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今天在这里已经建立大遗址保护区，对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

（撰稿人　黄留珠）



隋唐两代经营长安城

从古至今，一个王朝在建立初期必然会首先确立都城，王朝都城的选择关系重大。都城因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而存在，也因为它特殊的政治地位而成为王朝的中心，统御着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反映着一个王朝的兴衰。隋唐长安城就是这样一座因为政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城市，那么，在隋唐两代王朝统治者的统治下，长安城是如何发展的呢？长安城对于隋唐帝国而言有着什么样的特殊地位？在世界舞台上又是以一个什么角色出现？

一、隋朝迁都大兴城

大定元年（581）二月，北周静帝禅位于外戚杨坚，隋朝建立。随着新王朝的创建，昔日旧都汉长安城不适应新王朝的要求。首先，汉长安城自汉至隋年近八百，“彫残日久，屡为战场，久经丧乱”，年代既久，宫宇朽蠹。其次，隋文帝借迁都克服汉长安城制度狭小的缺点，可以解决有人家在宫阙之间，不便于事的问题；再者，旧都年深日久，生态环境恶化，“汉营此城，将八百岁，水皆碱卤，不甚宜人”，水源遭到污染。最后，汉城北临渭水，渭河不断南移，面临严重的水患问题，史言“隋文帝梦洪水没城，意恶之，乃移都大兴”。种种迹象表明旧都的居住条件退化，有必要另建新都。朝臣也多有迁都之意，迁都势在必行，可成就千秋伟业。于是，隋文帝于开皇二年（582）六月颁布营建新都的诏令，“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并“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虞庆则、李询、张煚等人也参与其中，建造新都的工程开始启动。

新都的选址，营造诏书称：“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由此可知，龙首山具备修建都城的自然条件。此外，汉长安城北临渭水，存在水患。新都位于汉长安城东南方，龙首原以南，可以免于水淹。

大兴城位于渭河平原之上，地形平坦开阔，适宜建造大都会。依龙首山而新建的都城，其范围是“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灞浐，西枕龙首原”。营建工程有

条不紊，“规建制度，先筑宫城，次筑皇城，次筑外郭城”。这种建造都城的顺序，体现皇权至上的观念。

新都的基本格局匠心独具，“自两汉之后，宫阙之间，并有人家，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私有办，风俗齐肃，隋文帝之新意也”。杂居是隋朝之前都城存在的普遍现象，办公区与居住区并不分开。而在隋朝新建都城的过程中，其建造理念将宫城、皇城、居民区、市场相分离。基本结构的规划是新城正北为宫城，皇帝起居之地。宫城之北为禁苑，属皇家园林。宫城之南为皇城，是百官诸司处理政务之所。都城的对称轴穿过宫城南门承天门，皇城南门朱雀门，以及外郭城南门明德门，连接朱雀门和明德门的街道是朱雀大街，两边依次分布诸坊和两市。诸坊之间分布着 11 条南北向和 14 条东西向的街道，形成棋分畦布的格局。“皇城之南，东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之东、西各一十二坊，两市居四坊之地。”除了诸坊之外，还有东西二市，“京师东市曰都会，西市曰利人”，成为京城中最主要的商品集散地。此外，宇文恺在位于京城东南角之处，以其“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以为池”。此池乃为隋唐时期著名的风景区——曲江池。

都城建造从开皇二年（582）六月到开皇三年（583）三月，用时不到一年，气势雄伟的都城就初具规模。新都建成后，隋文帝开皇三年三月举行入城仪式，“以雨故，常服入新都”，正式迁都新城，并于当年十二月“命新都曰大兴城”。迁都大兴城后，隋朝统治者对于都城的建设依然在进行中。早在开皇年间，除了城市主体建筑如宫城、皇城、里坊两市外，已经建成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等城市引水渠和广通渠等漕渠。隋炀帝时期，修筑外郭城，大业九年（613），“发丁男十万城大兴”，说明隋初营大兴城时，外郭城不具防御能力，至此修筑后，大兴城才堪称完备，唐人孙樵提及“远人入大兴城，茫然自失”。新都给时人带来巨大的冲击力。隋朝时期对于大兴城的建设成为唐朝长安城最为核心的部分。

二、唐朝经营长安城

义宁二年（618）五月，隋恭帝禅位于唐王李渊，唐王朝正式建立，定都隋都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唐王朝继承了隋朝大兴城的整体布局，有“唐人蒙之以为治，更数百年，不能有改”之说法。但是，随着唐帝国的发展，都城的建设工作也在不断开展中，主要列举以下几个大工程。

外城郭建设。高宗永徽五年（654），“筑京师罗郭，和雇京兆百姓四万一千人，板筑三十日而罢，九门各施观”。自隋大业九年（613）筑城墙后，40 多年间风雨侵蚀和人

为破坏，长安外城的防御亟待加强，此次营建不仅针对城墙四周，也增修了城门的门观，其中正南门明德门观为阎立德监修营造，“明德观正门，以工部尚书阎立德为始。”到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旧唐书·玄宗纪》：“筑京城外郭城，凡十月而功毕。”长安外城墙唐代至少经过两次大规模的重修，其工程量堪称浩大。

宫殿的建设。长安城内有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谓之三内，西内即隋代大兴宫，唐代改名为太极宫。李渊于太极殿即位建唐，从此太极宫成为唐前期皇帝的主要居住和政治活动场所，其主殿有太极殿、两仪殿等。唐高宗身患风疾，嫌太极宫湫湿，于龙朔二年（662）选择城东北爽垲之地另建新宫，“龙朔二年，大加兴葺，曰蓬莱宫，咸亨元年，曰含元宫，长安元年，复曰大明宫。初，高宗染风痺，以宫内湫湿，屋宇拥蔽，乃此置宫。司农少卿梁孝仁充使制造。北据高原，南望爽垲，每清天霁景，视终南山如指掌，宫城坊市，俯而窥焉”。大明宫位于长安城的东北角，位于太极宫东面，又称东内。其主殿有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等。长安城南内是兴庆宫，唐玄宗开元二年，以兴庆里旧邸为兴庆宫，“于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起初是唐玄宗李隆基作为亲王时的府邸，前身为隆庆坊，因位于太极殿以南，又称南内。到天宝十三载（754），《唐会要·城郭》记：“和雇华阴、扶风、冯翊三郡丁匠，及京城人夫一万三千五百人，筑兴庆宫城，并起楼，四十九日毕。”兴庆宫以兴庆殿、大同殿、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等建筑为主体，又有城墙围护，一度也成为行政中枢。长安城中有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三大宫殿区，成为唐朝的政治中心，见证着唐朝不同时期的政治风云。

交通设施建设。一为夹城的建设，唐玄宗开元年间，修建从兴庆宫通往芙蓉园的夹城，唐宪宗元和年间又建城郭通向修德坊的夹城。二为城中道路的建设。玄宗天宝三载（744）“京兆尹萧炅奏请于要道筑甬道，载沙实之，至于朝堂”。此处所建为官员上朝的官道，方便朝官上下朝之用。此外，在开元十九年敕“两京城内诸桥及当城门街者，并将作修营”。由此可知，城中的桥梁建设亦是道路建设的重要工程。

长安城中寺院道观的建设数量也相当多，早在隋代长安城内有僧寺 120 所，谓之道场，有道观 10 所，谓之玄坛。据龚国强实际统计，隋代长安城内有寺院 113 所，唐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崇尚宗教，更是大兴土木建造寺观，前后共有 127 所寺院，超过了隋代。如今名满中外的大慈恩寺就是唐朝时期所建，而其中的大雁塔成为现今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

引水漕渠建设。先后新开和疏通了龙首渠、黄渠、永安渠、清明渠和漕渠，保证城市的生活和生产用水。如高祖武德年间，引南山水入京城。玄宗先天中“姜师度于长安城中穿渠，绕朝堂坊市，无所不至”。玄宗天宝年间，“引渭水入金光门，置潭于西市，

以贮材木”。代宗大历年间，又从南山开漕渠抵达景风、延喜门，进入宫城中，作为薪炭的运送渠道。由此可知，唐朝时期的漕渠建设大多是为解决城中饮水和运送物资的问题而建，这也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发展。

曲江的建设。唐朝时期，对曲江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凿黄渠，从大峪口引水注入，增加水源，扩大水池的水域面积。并对池畔亭台楼阁有所增修，使得沿岸的芙蓉园与杏园与曲江连成一体，共同构成东南角独特而怡人的风景区。

城市绿化建设。长安城作为一个王朝的象征，统治者十分关注城市的形象。玄宗开元二年“大风拔树发屋，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颎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由此可见，早在隋朝初建长安城时，对于城市的绿化已经有所规划和实行。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对长安城中的道路绿化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文献记载称“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应该说，长安城的绿化工程得到不错的效果。

隋唐两个王朝的建设与发展使得长安城进一步完善，长安城的建筑风格与文化不仅影响着后代王朝都城建设的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会。



唐长安城模型

三、传奇帝都及其影响

隋唐民众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创建了长安城，也成就了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古代城市。

（一）宏伟建制——都城典范

隋唐时期的长安城，作为都城，基本建造格局独具特色：一是敢于打破传统。杂居是隋朝之前都城存在的普遍形式，办公区与居住区并不截然分开。而在隋朝新建都城的过程中，其建造理念将宫城、皇城、居民区、市场相分离。二是严格规划城市基本结构。其以宫城位于全城对称轴的正北，为皇室所居；宫城之南为皇城，乃百官诸司处理政务的衙署；皇城之南则为外郭城；宫城之北别为三苑；以皇城正南门朱雀门向南直通外郭城正南门明德门的街道，即朱雀门街，当时也称天街，为全城的中轴线。整个长安城内有 14 条东西大街，11 条南北大街，这些纵横交织的街道将长安城分隔为很多方形的区域，称之为“坊”，其中有两个区域专门设置为“市”。“坊市：总一百一十区，万年、长安以朱雀街为界，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万年领之，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长安领之。”整个长安城的规划犹如棋盘，整齐划一。

这种建造格局开创了都城建设的新格局和新模式，对后世和周边政权的城市建设风格产生影响。隋唐时期的全国各级行政中心城市建设模式以都城为蓝本，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东都洛阳城。洛阳城的建造格局与长安城如出一辙，宫城、皇城均位于城北，二者周边有坊，南边有坊市，且布局极为规整。这种建造模式也影响到其他朝代的都城建设，如北宋汴京、元代大都、明代应天府等。此外，长安城独具一格的建筑模式对于周边民族也有显著影响，如日本的平安京、平城京和藤原京，其都城的建造风格都有参考长安城的设计布局。

（二）繁华气象——经济之都

长安城地处渭河平原，水资源丰富，农业发达。隋唐两代对于都城水利工程建设的改善和发展，尤其是漕渠的大量建设使得当时隋唐王朝的都城成为全国交通网的中心地，全国各地区的物资集中到长安城，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中心。长安“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由此可见，长安作为全国重要交通枢纽，在工商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长安城中东、西市的繁华局面成为长安城工商业繁荣的反映，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除此之外，各个坊内的商业活动也逐渐出现，

宣平坊小曲内“有卖油者张帽驮桶”，长兴坊内的毕罗店，延寿坊有“鬻金银珠玉者”，长安城内无固定地点的卖药翁。与东市相邻的崇仁坊多有进京赶考之人留宿，旅店是其主要经营方式，“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繁华之盛，其他坊望尘莫及。有的坊则以某种消费商品而闻名，“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丰邑坊“多假赁方相輀车送丧之具”，此坊专营丧葬物品。人流量大的城门也是工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在城门附近经营店铺十分流行。如长安城西路侧有客店，春明门有店“鬻饼饦饦者”等等。工商业的发展促使新的行业邸店和柜坊的产生，使得货币交易量剧增，是商业繁荣的又一佐证。同时，长安城内突破坊市时间局限的夜市将长安繁华之气展现得淋漓尽致。长安崇仁坊“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于比”，又有“长安坊中有夜阑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可见夜市之盛。虽然，一度开放的夜市也曾遭到唐政府的干预，在文宗开成五年，敕“京夜市宜令禁断”，但是，却也抵挡不住长安城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一次次禁令下，长安城的繁华之气仍然在蔓延，摆脱封建教条的枷锁，成为开放发展的经济新都会。

（三）璀璨明珠——文明之光

隋唐统治者两朝君主开创和发展了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科举制的发展，使得全国各地有志之士负典上都，云会京师。京师长安设有六学二馆，地方也有州、县、乡学，“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由此专门设置留学机构。从文学创作看，唐朝诗歌享誉海内外，长安城中涌现出大批有才华的诗人，如孟浩然、李白、杜甫、王昌龄、王维、高适、孟郊、李贺、元稹、杜牧、李商隐等，都在长安城中留下绝美的诗章。唐时兴起的古文运动，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流弊，开启了散文创作的新局面。隋唐歌舞、书画等艺术作品，吸收全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艺术作品，创造出独具特色鉴赏价值颇高的艺术珍品。这些惊人的文化盛举造就了盛世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



此外，隋唐统治者对于宗教的大力倡导，长安城的寺观数量庞大，宗教文化日益突出。长安城成为佛教宗派的创立、经典翻译、僧侣俗讲、佛教传播的文化中心；也成为道教发展、传播的中心。长安城丰富的文化氛围与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还成为宗教传教士的天堂，祆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传教士在长安的自由天空下传播自己的宗教思想，长安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的精神圣地。

（四）大国风范——国际都会

隋唐帝国以其繁荣的经济、强盛的国力、灿烂的文化，以及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着全国全世界的商人、学者、僧人。一方面，隋唐统治阶级奉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突厥、薛延陀、回鹘、昭武九姓、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都

曾与中央政权共存互动。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各少数民族的使者、商人、百姓大量聚集于长安城，在长安生活、学习、定居，由此而带来的“胡化”之风盛行，为汉民族的文化增添了多民族色彩。另一方面，新长安城位于汉长安城的东南方向，处于关中平原中部，向西为著名的汉唐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可以到达西域、中亚乃至欧洲等国，向西南可以到达东南亚诸国。对于由海路而来的周边各国使者或商人而言，长安城无疑是中国之行的终点，体现长安城在国际交通中的重要地位，隋唐长安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枢纽作用。与唐有交往的邦国达到70多个（或说3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人员给长安城注入别样的新鲜血液，多元文化在这座城市中交流碰撞，长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会。

隋唐两代经营长安城虽然只有几百年，但随着隋唐帝国的声威远播，长安文化也名扬海内外。当然，隋唐长安在留给我们心灵震撼的同时，也让我们若有所思。经历一千多年的洗礼，隋唐长安成为代表辉煌历史的符号，它的宏伟、它的美丽、它的繁华都成为激励三秦子弟再创辉煌的强大动力。每每走在古老的西安城墙上，静静眺望和冥想，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个盛世长安所留下来的气魄和魅力。

（撰稿人　刘　烁）

帝京长安孕嘉名

千年古都西安，现在是陕西省的省会，西北地区最大的都市。而明清长安城为中心的城郊六区，即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灞桥区、未央区连成一片，构成了西安市的核心和主干。

在古代历史上，西安本名长安。长安这个名称始自何时，因何而来，已难详考。但至少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中曾记载，早在秦朝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前，秦始皇就有一个弟弟被封为长安君。秦朝末年，反秦起义军首领项梁拥立的楚怀王，也曾封其次将项羽为长安侯。秦朝灭亡，项羽和刘邦相争之际，汉王刘邦的亲信大臣卢绾又被封为长安侯。这都说明，当时就有一个以长安为名的居民点，成为邑、聚或乡级的政区，存在于秦朝首都咸阳县的辖境之内了。因为秦都咸阳是“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辖境包括渭河南北两岸，也就是说包括了西汉长安在内的今西安市城郊大部分地区的。

汉高祖刘邦灭项羽，由于秦都咸阳被项羽焚毁的缘故。在到达栎阳的当月，刘邦就令萧何在咸阳县渭河南岸，修宫殿，建衙署，为新兴的西汉王朝营造首都。至于长安城四周城墙的修筑，则是在汉高祖死后的惠帝元年（前 194）开始的。距现在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长安”是个有美好含义的“嘉名”。“长治久安”，长年安乐、永远平安、安康、安宁，既是一般平民百姓，也是各代王朝的统治者心所向往的。从西汉到隋唐，在西安建都的王朝和政权多达十多个，西安被定为首都的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位居全国七大古都之首。即使是五代以后，首都东移，长安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而其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重要作用仍然十分明显。因为它始终是中原各王朝控制、联系广大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重镇，地方各级政区的治所。由于历代地方行政制度有沿有革，地方政区调整更改频繁，县级以上地方政区的分级和名称既多变化，县级政区的管辖范围亦多伸缩分合。所以从西汉以来，长安作为全国的首都，作为县以上地方各级政区的治所，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了诸多不同的名称。根据笔者粗略统计，数目竟多达 80 多个。其中作为首都的名称 13 个，地方第一级政区名称，即相当于今省级政区的名称 23 个，相当予地区

级的政区名称14个，相当于县级政区的名称20个。另外还有监察区名称6个，军事区名称6个。

在这诸多名称中，从其得名的缘由来看，除了以秦、雍、陕西、渭南等自然社会实体或与这些实体的相对位置而来的几个，以及芷阳、塞匡、第一行政督察公署等3个名称外，其他约60多个名称都是与长安这个嘉名，与长安曾经长期作为封建帝王的都城作为全国首都这个历史事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或者也可以说，它们都是由“帝京长安”这个词、这个四字演化、派生而来的。

与长字有关的名称有六个：长安县、长安城、常安县、永平军、永兴军、万年县，长安是本名。常与长字同音，意思也有相近之处。永是由长引申而来。万又是由永引申而来的具体数字，用来显示时间长久，久至成千上万，永永不已的。

与安字有关的名称有十七个：长安县、长安城、常安县、饶安县、大安县、安西路、西安府、西安城、西安市、成宁县、永平军、永兴军、大兴城、大兴县、晋昌军、光尉郡、烈尉郡。其中前九个名称都含有安字，后几个名称中虽然没有出现安字，但都包含着与安宁相似、相近或有关的含意，应当说是由安字引申、演化而来的。如宁、平两字与安字含义相同、相近。兴字、昌字、光字、烈字则显示希望在平安、安宁、安乐、安康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发扬光大，走入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境地。

古人称帝王所居之地、王朝的首都为京师、京都、京城或京兆。而京城周围方千里之地传为天子的直辖区，被称为畿内或甸服，因而又有京畿之称。这些作为皇帝、王朝、政府首都的一般名词，具体到某一个朝代，就成为一个具体地点所特有的名称、专称，从而排除了其他地点与之同时分享的可能了。在长安作为全国首都的汉唐各代，情况就是如此，它们都成为长安的专称。在当时，只要一提到京城、京师、京兆或京都，指的就只是长安一地。唐朝也曾因此而把长安周围的关中中部地区划为全国十五道之首的京畿道。按照古人的解释：京，大也；师，众也；兆，亦众也，多也；都，人所聚会也，先王宗庙神主所在之地也。根据这种解释，又为首都长安引申出一系列的名称。如与京相联系的有汉唐时期的西京、中京，新莽时期的京尉郡；与师相联系的新莽时期的师尉郡；与都相联系的有汉唐时期的西都、上都；与兆字相联系的有京兆尹、京兆国、京兆郡、京兆府；与大字相联系的有隋代的大兴城、大兴县，五代后梁时的大安府、大年县；与多字相联系的有新莽时期的饶安县。由众多又引申到万，又进而引申到包括所有数字的成，遂又有万年县、成宁县等名称的出现。

京字的引申范围并未就此为止。以京为中心，还可以由内而外，向上下、左右以及东西南北各方面扩展。于是长安又有了与这些字相联系的许多名称。如与中字联系的有唐代的中京和民国时期的关中道。关中是说都城所在的长安附近，处于二关（函谷关和

陇关）或四关（函谷关、陇关、武关和萧关）中间。其实长安周围的关隘数目比四关要多得多。仅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就有潼关、武关、库峪关、子午关、骆峪关、斜峪关、散关、大震关、安戎关、安夷关、合岭关、龙门关、蒲津关等十多处重要关隘。中京则是唐代为了相对于东京洛阳、西京风翔、北京太原、南京江陵而设立并命名的。内是与外相对而言的，专指皇帝和首都的中央直辖区。如秦和西汉初年的内史及其以后分设的左内史和右内史。左右是和中相对而言的，如汉朝的左内史、右内史、左冯翊、右扶风。与上字相联的有唐代的上都，意在显示首都长安的地位凌驾于东都洛阳和其他各陪都之上。由于古代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处于黄河中下游，而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居其西部，所以长安的名称又与西字结下了因缘。从而获得了西京、西都、关西道、陕西路、安西路、西安府、西安城、西安市、西京市等名称。所以，西安市城郊六区在古代与京字有联系的县以上政区及其治所的名称，其数目就达三十五六个之多了。

除了与京，与帝王生前的住处、王朝的首都有联系的名称以外，西安城附近还有四个县名来源于帝王后妃死后的葬地，即以帝王及其后妃的陵墓名称为县名。这就是以西汉文帝灞陵为名的灞陵县，以文帝母薄太后南陵为名的南陵县，以宣帝杜陵为名的杜陵县，以宣帝父母葬地奉明园为名的奉明县。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霸城县和杜城县，其得名也分别与灞陵县和杜陵县多少有所联系。

另外还有一些政区的名称与皇帝本人有关。据《三辅决录》的注释说："京，大也；天子日兆民。"所以"京兆"一词的得名，可以说是与皇帝有直接的联系，或者就是指皇帝本人。西汉时期的京兆尹和与之共治于长安城中的左冯翊、右扶风，合称三辅。据《三辅黄图》的解释说："冯，依也；翊，辅也；翊辅京师也。""扶，持也，助也；言助风化也。"所以，它们的命名，都透露出希望辅助天子治理、教化当地平民百姓的意思。王莽设立的六尉郡又是三辅的扩大，其命名取意，也与三辅相似。此外，王莽时期的水章县、唐高宗设立的乾封县和明堂县，其得名也与某个帝王的具体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如乾封县和明堂县的设置，是唐高宗为了纪念其刚刚在泰山举行的封禅大典和接着颁发明堂制度，决定在京城长安兴建明堂以祭祀皇天上帝这两件大事的。而水章县的取名，则是由于王莽不愿沿用西汉灞陵县的旧名，而用秦穆公改滋水为霸水以彰其霸业的典故而改置的。五代后晋改后梁时期的大安府、后唐时期的京兆府为晋昌军，是用其开国皇帝石敬瑭的国号，同时也是其未当皇帝以前的封号，来预示其新建立的王朝繁荣昌盛的。元代中期改安西路为奉元路，则基于其开国皇帝忽必烈在蒙古帝国时期曾被封于京兆，并以京兆为基础，积极吸取汉族封建统治经验，逐步扩大其政治军事力量，最后建成元朝的历史事实。因而西安地区与封建帝王有关的县级以上政区的名称，也有十多个了。

综上所述，与"帝京长安"有联系的西安市城郊政区及其治所的名称，除去重复者



西安碑林博物馆

外，仍有 50 多个。另外还有司隶校尉、司隶台、南台，佑国军诸名，也与帝王或首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如西汉的司隶校尉部和隋代的司隶台，都是负责皇帝所居、首都附近诸郡治安和监察事务的监察区的名称，与唐代的京畿道的性质有某些相近之处。而前秦苻氏政权的司隶校尉，则当是地方最高一级政区的正式名称了。十六国时期匈奴族赫连氏大夏政权的南台，是作为陪都，与其处于北方的首都统万城相对而言的。盖以秦汉时期游牧于大漠南北的匈奴首领称为单于，其居地称为单于庭。汉末魏晋时期，中原动乱，匈奴各部逐渐南移，后在黄河流域建国称帝，组成与汉族封建王朝相似的政权。



大明宫御道斜视全景

而其在中央政权机构中仍设有以皇位继承人主持的单于台，作为专门管理汉族以外各少数民族事务的重要政权机构。唐朝末年的佑国军节度使，则是唐昭宗被权臣朱温迫迁洛阳时特设于长安，以负责故都京兆府附近军政要务的大员。以佑国为军名，显示了这个军政区域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所以这些名称也都与当时的或以往的帝京有关，并分别表示其祈求、向往、祝愿其政权、王朝长治久安，长盛不衰或衰而复兴的美好愿望。如果再加上这几个地方，则西安市城郊六区古代县以上政区及其治所名称之与“帝京长安”一语有联系的，就将达 60 个，要占其名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了。

西安自古多嘉名，二这些嘉名不仅多缘于“帝京长安”一语而来，其命名方式也多依“帝京长安”一语而拓展开去，用各种方式来表现、来凸显“帝京长安”。例如，它们有的紧扣住“长”，有的紧扣住“安”，有的兼顾“长安”，有的兼及“帝京”。有的是借用职官名称，有的就是地理实体，有的铭记当时政事，有的化用历史典故，有的是美好祝愿，有的是诚意渴求。手法各异，寓意深远。突出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共同向往。所以，“帝京长安”可以说是西安市城郊六区县以上政区及其治所得名缘由和命名规律的集中体现，而由长安演化来的“西安”一名，则是我们全市、全陕西省以至全国人民值得自豪、应予珍视的一笔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撰稿人　李之勤）



西安鼓楼与钟楼

一、西安鼓楼

西安鼓楼位于西安市西大街北院门南端，处于城内南北中轴线中心偏南，建于明代洪武十三年（1380），比北京城还早建 40 年，迄今已有 633 年历史。它在我国现存同类古建筑中年代最久，保存最完好，且无论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方面，都属同类建筑之冠。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乾隆五年（1740）先后两次重修。据乾隆五年《重修西安鼓楼记》载，因上年陕西小麦丰收，“陇有赢粮，亩有遗秉，民不俟命”，出现了“男娶女归，礼兴讼息”的太平景象，故效法古事，重整鼓楼。由长安县县令王瑞具体负责修缮事宜。

西安鼓楼的建筑形式是歇山式重檐三滴水。高台砖基座东西长 52.6 米，南北宽 38 米，高 8 米，南北正中辟有高和宽均为 6 米的券洞门，北通北院门，南接西大街。楼建筑在基座的中心，呈长方形，正面（向南）为七开间，进深三间，四周回廊深度各为一间，按楹柱距离计算，正面则为九间，古代建筑术语为“七间九”。第一层楼身上置腰檐和平座，第二层楼重檐歇山顶，上覆绿琉璃瓦。楼的外檐和平座都装饰有青绿彩绘斗拱，使楼的整个建筑层次分明，雄浑博大。登楼的青砖阶楼设在砖台基两侧，在第一层楼的西侧有木楼梯可登临楼的第二层。凭栏而望，远处的终南山渺渺相存，古城西安尽收眼底，使人顿有“王气千年绕鼓楼，登临极目白云悠”的爽朗感觉。

鼓楼的南北两面楼檐下，各悬巨型匾额。南面匾文是“文武盛地”蓝底金字匾额，为清代陕西巡抚张楷摹仿乾隆御笔所书。西安地区最早渊源于西周文王、武王所建的丰、镐二京，《史记》云：“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所以张楷书匾以志西安古往今来的发达昌盛。北面匾文是“声闻于天”，出于咸宁县名士李允宽之手，典故来源于《诗经》中“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二句，此匾笔力劲挺，出乎“御笔”之上。南北两幅匾额与鼓楼一同饱经风雨的历练，不仅说明了鼓楼的意义，而且犹如画龙点睛，使楼生气盎然，更显得宏伟壮丽。

西安鼓楼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增加了它的多种实用价值。清代一段时期，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共同驻节西安城内，称为“督抚同城”。总督驻南院（今西安南院门市委和陕西省图书馆院内），巡抚驻北院（今西安北院门市政府院内），藩、臬二司和各道台衙门云集辐辏，都离鼓楼不远。首县长安县府和咸宁县府也在鼓楼附近。因此，鼓楼成了各级官员议会和宴享的理想场所。鼓楼内厅堂轩敞，装潢典雅，楹梁油漆彩画皆显得雍容大方；朱槅门窗剔透精致，在西安可谓首屈一指的大厅。所以，明清两代鼓楼也常作接待省外官员游览的处所。更兼这里接近清真大寺，两座辉煌的大型建筑珠联璧合，相映弥彰。

鼓楼一层北侧，立有两通石碑，一为《秦简王诚泳鼓楼记》碑，一为《重修西安鼓楼记》碑。两碑分别记述了鼓楼明初营建与清代重修的历史。《秦简王诚泳鼓楼记》碑，为明第七代秦王朱诚泳于弘治（1488—1505）年间撰写，碑文如下：

予间阅始祖憨王起居注，内载一事，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一日，长兴侯耿炳文、左长史文原吉、右长史汤诚之，偕陕西布政司左布政王廉、西安府知府王宗周于东殿启知起建鼓楼。是日微雨。噫！自始建逮今盖百十余年矣。考之长兴侯耿炳文，当时盖为王相，而左右长史则其参佐也。文原吉未知终何官，汤诚之后改吉安知府。王廉，会稽人，所谓交山先生者也，有文名，不知所终；而王宗周亦无从参考。噫！诸君子皆百余年人物，而此楼乃岿然独存。予每过其下，不容不为之太息云。

《重修西安鼓楼记》碑，为清乾隆五年（1740）陕西巡抚张楷所撰，碑文云：

今上御极之三年，楷奉命移巡关中。始至之日，军旅甫息，岁比不登，民无盖藏，官无储积，乃课农功，禁糜耗，省苛累，一以休养为务。其秋，禾小稔，逾年，麦禾皆大稔。陇有赢粮，亩有遗秉，民不俟命而趋完官逋粟百数十万。农用足而贮蓄饶，男娶女归，礼兴讼息。于是进有司而启之曰：古者兴作之事，必于岁丰农隙之时，今所举宜奚先？皆曰鼓楼久不修将坏。爰与方伯帅公念祖计度财用，以授长安令王瑞集工而营之。腐者易以坚，毁者易以完，崇隆敞丽，灿然一新。登楼一望，则近而四郊万井九市百廛，烟连尘合，既庶且富之象毕陈于几席；远而终南、太乙、二华、九嵕，云开雾隐，献珍效灵之致群聚于户牖，其观览之盛可谓壮矣。而寝兴有节，禁御以时，奸慝不生，民安其居，则又为政之要务也。工成之月，楷荷恩赐御书，遂摹而奉悬于其上，俾民世世蒙天子之福，以与斯楼并，永永无穷也，爰勒石以记其事。

自 1956 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把鼓楼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鼓楼受到国家的保护并被充分利用。它曾作为展览大厅、文物贮藏机构和游览场所，日复一日地展示着它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西安市人民政府曾多次修缮鼓楼。80 年代后期，鼓楼周围



西安鼓楼

由于旅游业迅速发展，城市规划旧房拆迁，老住户们陆续搬离了那熟悉的鼓楼。90 年代开始，西大街拓宽及鼓楼周围改造工程都严格遵循了中式古典建筑风格布局，尊重历史原貌的要求。1996 年，西安市决定重制鼓楼大鼓，目的在于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文物资源，促进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恢复“晨钟暮鼓”。重制的大鼓高 1.8 米，鼓面直径 2.83 米，系用整张优质牛皮蒙制而成。鼓腹直径 3.43 米，重 1.5 吨，上有泡钉 1996 个，寓意 1996 年制，加上 4 个铜环共 2000 个，象征公元 2000 年，催人奋进。该鼓声音洪亮、浑厚，重槌之下，十里可闻，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鼓。典雅的鼓楼与雄浑的钟楼相邻而置，两楼犹如两尊擎天而立的神柱撑起了西安的汉唐风骨，又如两颗晶莹剔透的珍珠嵌在八百里秦川沃土之上，散发着凝聚历史烟云的光彩，彰显了古城西安的神奇与辉煌。

二、西安钟楼

与鼓楼媲美的姊妹建筑是西安钟楼，它的初建时间晚于鼓楼。明洪武十七年（1384），西安钟楼始建。原址在广济街口，后迁址到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汇处，是“绾毂东西、呼应南北”的轴心建筑，纵横干道贯穿四面城门，在城中形成一个十字交叉点。

关于钟楼迁址有一段美丽的传说。万历年间，关中地震，道士高承之断言，有万年

鳌鱼在地下作怪，于是知府将钟楼迁到现址以震住妖孽作祟的穴口，从此西安太平，万民乐业。实际上钟楼的东迁是与西安城市发展的东移直接相关的。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在陕西巡抚龚俄贤的主持下，钟楼整体拆迁。据碑文记载，移建工程除重新建造基座外，本质结构的楼体全是原样原件，所以耗资不多，工程迅速。完成这样一座庞大建筑的拆迁装建，即使在现代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它既需要高超的建筑安装技术，又需要严密精细的工程组织，这项完成于16世纪的特殊工程，实在是我国建筑史上值得自豪的创举。

钟楼整体为木质结构，楼的建筑为生檐三滴水。楼分两层，下层为一重屋檐，上层有两重屋檐，四角攒顶覆盖碧色琉璃瓦，各层有斗拱凿景彩绘。两层楼四周均有名柱回廊。登高望远，西安壮丽的市容一览无余。钟楼金顶原来是铜皮包裹，木质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换成了用真金锤成的金铂薄顶。钟楼的结构，反映出了帝王权威，具有明显的政治性；社会的统治思想和典章制度对它的布局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皇家建筑风格。



清代西安钟楼

钟楼的门扇窗雕精美繁复，表现出明清盛行的装饰艺术。仔细欣赏门扇上一幅幅浮雕，它们会告诉你古代许多饶有趣味的典故轶闻。第一层北门，自西向东依次为虬髯客、木兰从军、文姬归汉、吹箫引凤、红叶题诗、班昭读书、博浪沙椎秦、唱筹量沙。第一层东门，自北向南依次为长生殿盟誓、连环计、黠鼠夜扰、挂角读书、卞庄刺虎、嫦娥

奔月、东坡题壁、李白邀月。第一层南门，自东向西依次为文王访贤、伯牙鼓琴、画龙点睛、斩蛇起兵、伯乐相马、柳毅传书、舜耕历山、把桥授书。第一层西门，自南向北依次为枕戈待旦、李陵兵困、由基射猿、龙友颂鸡、黄耳传书、孙期放豚、陶侃运砖。第二层楼南门，自东向西共八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画面，依次为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曹国舅、铁拐李、蓝采和、韩湘子和何仙姑。第二层北门，自西向东共八幅勺“仙醉酒”画面，依次仍为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曹国舅、铁拐李、蓝采和、韩湘子和何仙姑。第二层东门，自北向南依次为单刀赴会、击鼓金山、岳母刺字、孟母择邻、子路负米、画荻教子、温娇绝裙、闻鸡起舞。第二层西门，自南向北依次是写经换鹅、茂叔爱莲、灞桥折柳、踏雪寻梅、陶潜爱菊、寻隐不遇、孤山放鹤。

在钟楼一层西墙上镶嵌着三通石刻，一为《钟楼东迁歌并序刻石》，一为《重修西安钟楼记刻石》，另一为1954年西安市人民政府撰写的《重修西安钟楼碑记》，记述着钟楼迁建、维修情况和轶闻故事。《钟楼东迁歌并序刻石》碑，嵌于钟楼一层西墙北首，为明万历十年（1582）正月初七日陕西巡抚龚懋贤主持东迁建钟楼时，作此歌与序以记其事，并刻书于碑。碑刻高约40厘米，宽约360厘米。文由序言、歌词、作者签署和附记四部分组成。前三部分为作者手书，附记系他人所作。文从右至左横排竖写，云：

西安钟楼，故在城西隅，徙而东，自予始。楼惟筑基外，一无改创，故不废县官而工易就。无何，予告去，不及观其成。漫歌手书，付咸、长二令，备撰记者采焉。歌曰：

羌兹楼兮谁厥诒？来东方兮应昌期。挹终南兮云为低，凭清渭兮衔朝曦。鸣‘景阳’兮万籁齐，章木德兮奠四隅，千百亿祀兮钟簴不移。

万历十年岁壬午春人日，蜀内江病夫宁澹居士龚懋贤书。

客有谓余：《歌》可作《钟楼铭》者观。铭，非予敢任也，故仍以《歌》铭。

《重修西安钟楼记刻石》，为清乾隆五年（1740）正月陕西巡抚张楷撰。碑高70厘米，宽约120厘米，文二十三行，行十二三字不等，楷体，苍劲有力，现嵌于钟楼一层西墙南首。文云：

自鼓楼东半里而近，有楼岿然立于四衢之上。居人耳传，谓明时建是楼，以徙景龙观钟。既悬，扣之不鸣，乃返其故所，而“钟楼”之称至今不改。

余考《铭》志，钟铸于唐景云之岁，历世久远。神物有灵，迁其地而不宁，理或有然者。及登其上，隆中而广外，龠阿杳窈，重檐周俯，阳藏阴翕，纳而不出。余曰：此钟之所以不鸣也。夫声以旷、水以浅者宣也。故单穆公曰：“无射有林，耳不及也”。置钟于深隐之区，犹谓之大林也。戴瓮以呼，而欲其声之及远，必不能矣。

楼既灵，昔人以祀文昌，盖即《周礼》之“司命”，其典秩自古为隆。而楼之瑰伟雄杰，亦与鼓楼相颉颃。既修鼓楼，并与方伯帅公谋而新之。尸其工者，咸宁令陈齐贤

也。是为记。

乾隆五年正月，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助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鹤城张楷题。



西安钟楼

以钟楼为中心辐射出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并分别与明城墙东、南、西、北四门相接。钟楼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许多钟楼中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它无论从建筑规模、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各方面衡量，都居全国同类建筑之冠。

钟楼始终处于西安交通地理的中心位置，其在古代的主要用途是报时的。晨钟暮鼓成为西安的标志之一，但是过去报时并非清晨敲钟，黄昏击鼓。据考证，老西安报时的其实是钟鼓并用。这口钟名曰景云，铸成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钟高 2 米，直径达 1.5 米，重达万斤，钟身鹤飞龙翔，钟鸣声扬数十里。该钟起初置于广济街口钟楼内，明朝钟楼迁址后置于钟楼之上。真品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内，每天西安报话大楼上洪亮的报时钟声，就是这口钟的录音。

钟楼是古老的，亦是年轻的。它与鼓楼晨昏相伴，与西安四门遥相呼应。由此东去，是西安最繁华的商业大街，由此北行，是西安充满希望的未央新城，往南去，是名楼林立的科技文化区。

西安钟鼓楼见证了历史，也将见证着未来。

（撰稿人　张　明　张淑霞）

西安城墙

一、西安城墙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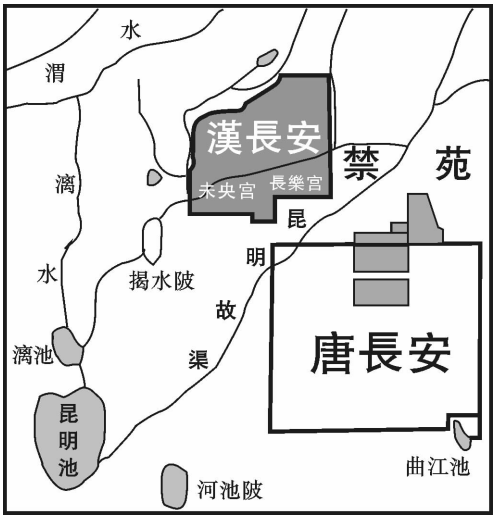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城墙既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在战争中抵抗外敌最重要的城市防御系统，也是古代城市等级、规模、形制乃至城市特色的重要体现。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垣。其建筑高大坚固，形制宏伟，功能设计周密，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和人类共有的财富。

城墙不仅构筑了我国传统城市的外观，界定了城市的范围，而且标明了城市的属性，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西安城墙是在唐长安皇城的基础上，经过五代、宋、金、元等时期，于明初修建而成。深入了解西安城墙的历史，不仅是传承和发展西安城墙文化的基础，而且是保护和开发西安城墙资源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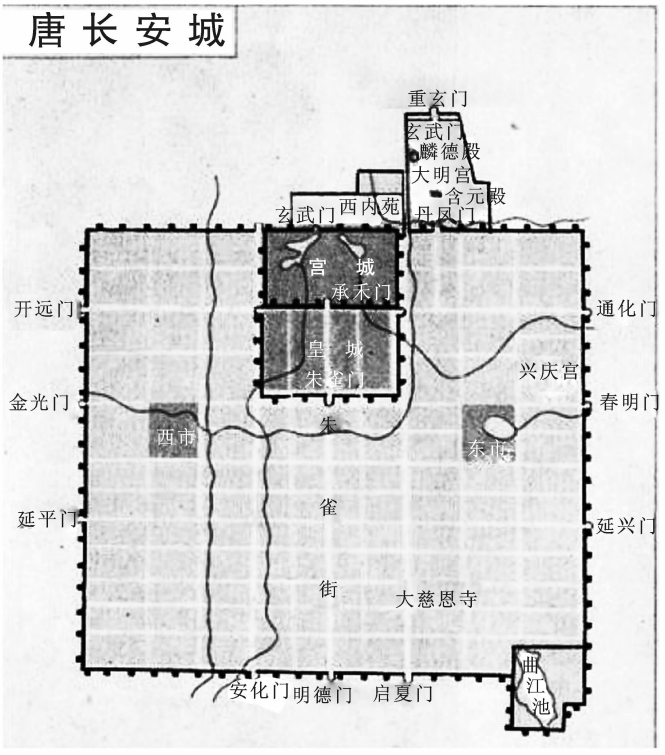
（一）由唐长安皇城发展而来的西安城

唐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大部分组成。外郭城亦称罗城或罗郭城，是长安城的外围城。宫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是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皇城俗称子城，是唐朝中央军政机构和宗庙的所在地。

今天的西安城，即主要是由唐长安皇城直接发展而来。皇城东、西、南三面筑有城墙，共有七座城门：东面二门，北为延喜门，中为景风门；西面二门，北为安福门，中为顺义门；南面三门，东为安上门，中为朱雀门，西为含光门。城墙顶部内外沿皆筑有低矮的女墙：建在城顶内沿



汉长安与唐长安城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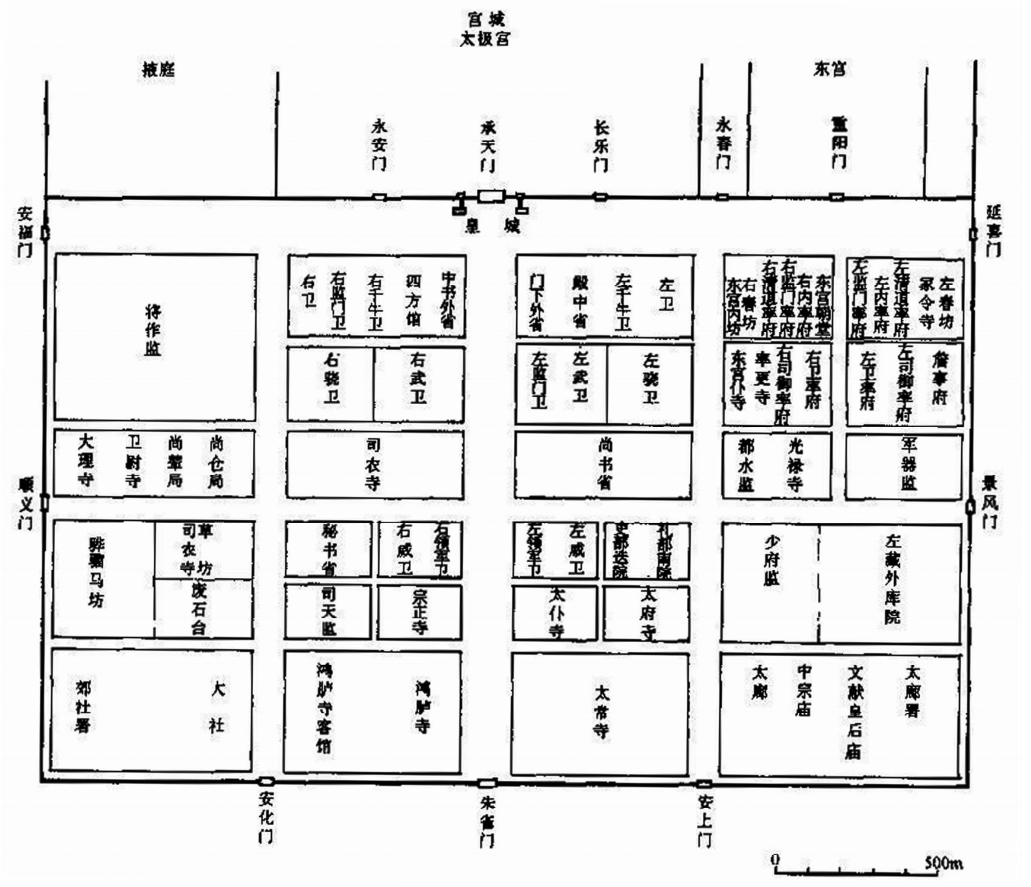
唐长安城

的女墙不设垛口，也称宇墙；建在城顶外沿的女墙设有垛口，也称垛墙。女墙作为城顶防护和御敌屏障，是古代城墙必备的传统防御建筑。皇城的东南隅、西南隅城角，皆筑有角台，其上建有角楼。而东北隅、西北隅城角，因皇城东墙、西墙的北端，分别以延喜门、安福门与宫城东西城墙相接，故无角台、角楼之类的建筑。

唐中后期，宏伟壮丽的唐长安城，由于唐王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中央政权力量的削弱，遭到了多次严重的破坏。唐哀帝天祐元年（905）三月，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韩建对长安进行了改建。史称：

新城，唐天祐元年匡国节度使韩建筑。时朱全忠迁昭宗于洛，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舍，长安遂墟。建遂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即皇城也），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门、安福门，北开玄武门，是为新城（即今奉元路府治也）。城之制，内外二重，四门，门各三重。

韩建此次改筑，放弃了原长安的宫城和外郭城，保留了皇城，从而大大缩小了城区的范围。新城即原长安皇城的面积，仅及原隋唐长安城面积的十六分之一。原隋唐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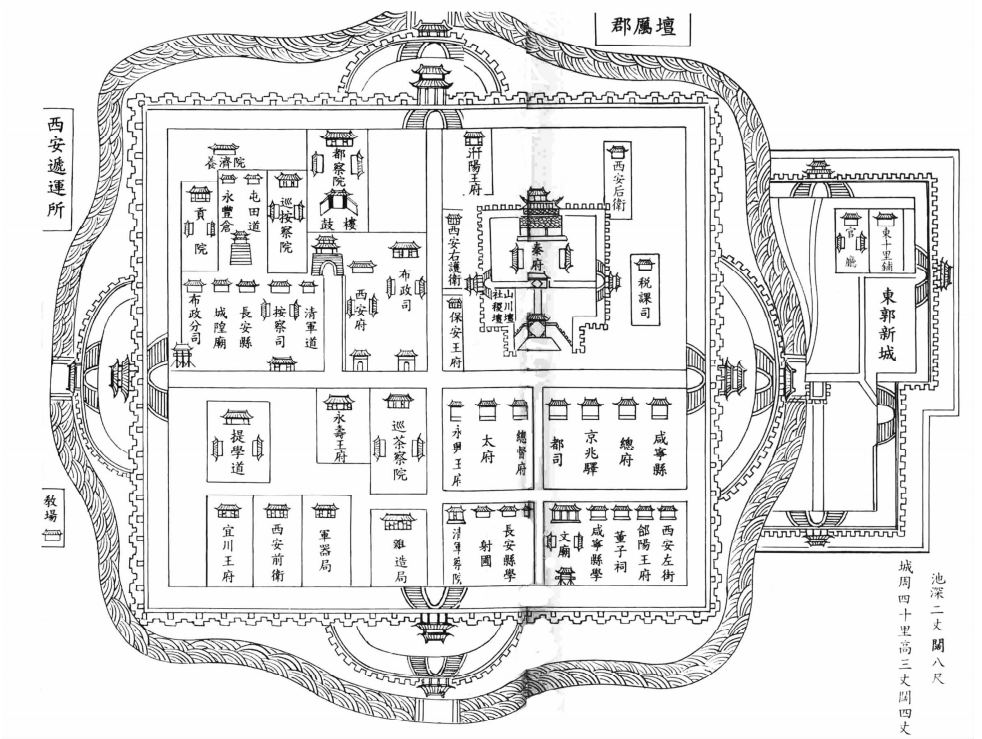
唐长安城皇城

皇城的东、西、南三面筑有城墙，北面无墙，以横街与宫城南墙相接，城墙外围无护城壕。出于城防的需要，韩建去宫城时，只拆其东墙、西墙、北墙，而留下南墙，使之连接为新城的北城墙；按照城池互防之制，始于新城城墙外围环挖了护城壕。这样，韩建以隋唐长安皇城为基础的“重建子城”，筑成了一座四面环有高城深壕的坚固新城。

（二）明初西安城

唐以后，历经五代、宋、元，长安的建置屡经变革，名称亦多有变化。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大将军徐达率军攻占关中，改元时奉元路为西安府。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封次子朱樉为秦王，坐镇西安。为了迎秦王就藩，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命宋国公冯胜赴陕督修城池，开始重建西安城，至洪武十一年（1378），工程完工，历时8年之久。

明初重建的西安城，是以唐末新城为基础。西、南两面城墙维持原址不变，东、北两面城墙位置则各向外延伸约四分之一。其中，南城墙由原来皇城的2820.2米，向东延



明西安府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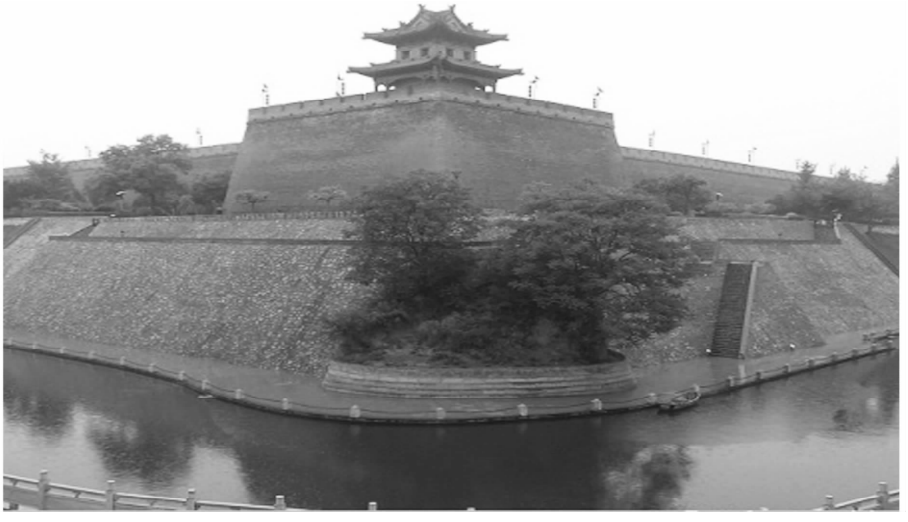
伸了1435.8米；西城墙由原来皇城的1843.6米，向北延伸了864.4米。拓建后的西安城墙，考古实测东城墙长2886米，西城墙长2708米，南城墙长4256米，北城墙长4262米。全城面积11.9平方公里（含墙体外围），较之隋唐皇城（即唐末新城）面积5.2平方公里，扩大了6.7平方公里。

重建后的西安城，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厚15—18米。城墙用黄土分层夯筑，每层厚度为10—12厘米，最底一层用石灰、黄土和糯米汁混合夯打，厚45厘米，非常坚固。城墙的四角各有一座角台，角台之上建有角楼。明初拓筑西安城墙时，拆毁了原长安皇城的东城墙，因之也就拆除了原皇城的东南城角和角台，仅余原皇城的西南城角和角台。这就是保留至今西安城墙的西南城角的角台。故西南城角的角台形制为唐皇城时的圆形，不同于明初新建的其他三个城角的方形角台。此外，沿城墙外壁，每隔120米建有一伸出城墙的敌台（亦称马面），长12米，宽20米，高与城墙齐，上建敌楼，共98座，起三面御敌的作用。同时，在城墙顶部外沿建有垛墙，上有垛口5984个（现有5858个）。

明初西安城墙四面各一门，东为长乐门，西为安定门，南为永宁门，北为安远门。



西安西南城角



西安东南城角

城门洞之上建有正楼，外筑瓮城，上建箭楼。明思宗崇祯九年（1636）又于四门瓮城外加筑月城，上建闸楼。瓮城、月城皆开城门洞，从而每座城门都形成城三重、楼三重、门三重的建制。正楼在内，距地面高约 32 米；箭楼在中，距地面高约 33.4 米，主要起以密集火力消灭攻城敌人的作用；闸楼临于护城壕，内驻士兵，置放火器火炮，掌管护城壕上吊桥起落，扼守入城通道。



西安城墙敌台、敌楼



西安城墙箭楼

如前所述，唐末韩建改建新城之时，始于城墙外围环掘了护城壕。明初西安城扩建，城墙外移，其四周的护城壕亦随之扩长。史载，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正月，“宋国公冯胜往陕西修城池”。可知明初不仅扩建了西安城墙，而且扩挖了护城壕。这些城防工程，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明初的此次重修，奠定了今天西安城墙的基本形制和规模。



西安城墙闸楼

（三）明清以后的西安城墙

明清时期，陕西地方官府出于军事防卫的需要，十分重视西安城的修葺。如，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明思宗崇祯九年（1636）、清世祖顺治十三年（1656）、清圣祖康熙元年（1662）、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督抚多次对西安城墙进行了维修与加固。其中，最为重要的大整修有两次。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陕西巡抚张祉主持修城，首次改变了土墙的面貌，在城墙外壁和顶面砌筑青砖，既抵御了火器的进攻，又阻挡了风雨的侵蚀，使城墙更加牢固、雄伟。这是西安城墙历史上的第一次砌砖，也是城壁上的第一层砖。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对城墙进行了全面整修，采取窄处重筑、宽处削切的办法，对城墙宽窄进行了统一处理：墙根向外延伸，城顶向内收缩，城墙剖面呈现梯形；在明代包砖基础上，整个城墙外壁增砌了 3 至 5 层包砖，城顶平面辅砖 2 层；城墙内壁每隔 40 至 60 米砌筑青砖溜水槽一道，以利于排除顶面雨水。这次大维修，对保护城墙起了重大作用。

经过明清时期的多次加固修葺，西安城墙在明初重建的基础上，更加雄伟坚固。这就是隋唐长安城经唐末韩建以皇城为基础缩建为新城，后又经明初扩建重修、遗留至今的西安城。

西安明城墙在近现代史上屡遭破坏，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城墙已因各种自然、人为破坏而残破不堪。从 1983 年起，西安市对明城墙进行整体修复。今天的西安城墙景

区，从整体上讲，是以城墙为主体，城河、林带、环城路为依托而形成的一个立体景观带，古朴典雅、雄浑博大。古城墙、园林与城市风貌，组合成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类型。

二、西安城墙的保护

西安城墙是明代洪武年间在唐长安皇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是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城垣，并且有着少见的“明墙包唐墙”现象。其功能与价值经历了由昔日“实用型”到今天“文化型”的重大转变。西安是我国最早开始对城区古城墙遗址进行全面保护的城市之一，积累了大量关于古城墙遗址保护的实践经验。

在西安市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中，确定西安为轻型的精密机械制造与纺织工业城市；城墙被列入中心保护项目，确定城墙之内为行政商业区，而在文物古迹较少的旧城外4—4.5公里的东、西郊布置工业区。1957年，西安城河改造工程开工。1961年，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至20世纪70年代末，西安城墙四关土墙早已荡然无存，垛墙大部已毁。除东、西城门较完好外，南、北门均仅存正楼或箭楼。角楼、墩楼也多残垣破壁，城门洞也多遭毁坏，护城河多为淤泥堵塞或夷为平地。1979年，西安城墙管理所成立，有计划地着手对城墙进行修缮。前后彩绘油漆了西门，整修了北门、南门和东门。

在西安市第二次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中，提出保持古都风貌，保持明城严谨格局，将明城墙、四城门楼、护城河、环城林带构成一个完整的保护区，保护城墙的完整性。同时，根据规划又编制了“市区建筑高度控制要求规定”。国务院批复该规划时，要求西安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反映古都的独特风貌，尽量利用明代城墙、城河以及环城绿地建设环城公园。1983年，西安市即根据第二次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制定了西安环城规划：建设城（城墙）、河（护城河）、林（环城林带）、路（环城道路）“四位一体”的绿环，并综合考虑城墙保护、园林绿环、休息游览等。1983年4月，环城建设开工。环城建设包括维修城墙、整治城河、改造环城林带、打通环城路四大项目。1983年6月，东城门楼修复工程开工。至1985年12月，完成了西安城墙修复和部分改建。1986年至1990年，完成了环城北路火车站地下隧道工程、南门月城及闸楼吊桥复原、长乐门·安定门·文昌门·建国门等券洞工程、含光门新建工程、墙顶12座敌楼和1座魁星楼复原工程。其中，1987年12月，西安火车站广场地下隧道工程竣工，环城路全线贯通。至1996年，城墙全部豁口券洞的修建工作完成。2004年年底，西安火车站广场城墙连接完成，标志着城墙修复工作完成。这些工程对西安明城墙进行了整体修复，使得西安城墙的历史原貌得以重现。



在西安市第三次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中，以“中心集团，外围组团，轴向布点，带状发展”作为城市空间形态，并对西安市域编制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划对明城墙旅游区的建筑高度、色彩、体量都做出了明确规定。2003 年起，西安市又启动了城墙内顺城巷改造工程，对控制城墙内侧景观、提升明城墙的文化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西安市第四次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重新定位城市性质：“西安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古都、旅游名城”；确定发展外围新区，降低中心密度，保护古城风貌的城市布局思路；强调九宫格局、棋盘路网、轴线突出、一城多心的布局形态；在老城保护上，采取“只拆不建、多拆少建”的措施，逐步降低明城墙以内的居住人口密度，外迁行政机关。2004 年 9 月，西安城墙管理所、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西安环城公园建设管理处等 6 个单位合并成立了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对城墙景区进行统一管理。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集纳了对城墙管理、经营、保护维护的权限和责任，将分散的责、权、利集中起来，致力于挖掘内涵，传承历史、塑造人文，促进西安城墙景区的保护和进一步开发。

西安市历次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墙的保护，从实体保护过渡到包括环境风貌的整体保护，从物质保护发展到历史文化内涵的保护，其所体现的城市用地向外扩展的思路，特别是对内城的功能定位，对城墙宏观层面的保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西安城墙的文化价值

西安是我国旅游资源极为丰富且具有古都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是跨越五千年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天然历史博物馆”。深度挖掘并充分发挥其独特潜在价值的旅游品牌资源，对发展西安旅游经济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作为一座完整严密的古代城市军事防御体系，西安城墙是世界上历史最悠远、形制最壮观、保存最完整的城墙。196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AAAA 级旅游景区”。城墙是最具个性的西安城市品牌，其资源要素价值、独特性、认知度极高，是可转化为物质财富的精神热点。可以说，城墙是历史文化价值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是西安独有的最具竞争力的文化资源，是西安旅游形象的真正主导者。

西安城墙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各朝历史变迁，在其沿用、修建、改造过程中，形成了多样文化的叠加，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西安城墙遗址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西安城址的区位、规模和基本形制格局，是现代人认知西安城市变迁的重要历史坐标。西安城墙是古城复兴计划的载体、西安历史文化的核心板块，体现着人文西安、

古都西安的特色。西安城墙内如珍珠般散落的文物景点，如钟楼、南门、城墙、湘子庙、宝庆寺华塔、关中书院、三学街、府学巷、西安碑林、魁星塔、柏树林、骡马市、卧龙寺、下马陵、南城清真寺等，以城墙为纽带关联起来，形成一条旅游观光链，形成具有古都特色的大旅游格局，充分体现内城文物旅游资源的“丰裕度”“多样性”，使游客在单位旅程中感受更为多样、丰富、连绵的历史人文景观，增加游客逗留时间与旅游感受质量。

西安城墙承载着多种传统文化元素。从文化层面上讲，城墙文化包含有物态文化层的名胜古迹、景观建筑；制度文化层的礼法规范、制度约定；行为文化层的风俗民情；心态文化层的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宗教等。从文化的兼容性讲，城墙文化既有高层次学术文化的切磋，又有民俗文化的展示；既有中原文化的陈列，又有异域风情的对照。作为现代都市的一部分，西安城墙又融合了当代文明元素。游客观览城墙，是对传统文化、历史沧桑、都市演变的认知；在古老与现代、厚重与时尚之间，引发其对历史与文明的深入思考。

从传统时代精密的城市防御体系，到现今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西安城墙记录着历史，也造福于当代。作为先祖的遗产，城墙具有建筑上的研究价值，文化上的文物价值，艺术上的审美价值。对城墙的利用，都必须考虑它的价值所在，不能随意开发，从而损害了它。对于城墙的利用，有人认为：1. 保守利用。保守利用优于积极利用，甚至认为不利用才是最大的利用。2. 因势利用。所谓因势利用无非是根据西安城墙的现状而利用，这也是文物保护法则的要求，要防止简单利用和粗蛮利用。3. 动态利用。西安城墙还有动态利用的巨大潜力，地域文化专题展览，以节令为主旨的系列活动，都是充满智慧的建议。保护西安城墙就是保护西安，而保护作为古都的西安则是保护一种历史，甚至是保护作为文化的中国的柔性实力。

（撰稿人　张　明　张淑霞）

陕、甘分治与再度携手

一、陕甘分治局面的形成

元代以前，陕西和甘肃地区的行政区划复杂多变。到了元代，中央政府分别设立了陕西和甘肃行省。元代的政治中枢称中书省，在各地的分设机构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现在“省”的称谓便是从元代的“行省”演变而来。陕西行省的辖区包括今陕西全境、甘肃兰州以东、内蒙古伊克昭盟中部以南各地。甘肃行省的辖区包括黄河以西的七路二州。

明代废除甘肃行省，在元代陕西行省的基础之上设立陕西布政使司，俗称仍为陕西省，管辖的范围“东至华阴（与河南、山西界），南至紫阳（与湖广、四川界），北至河套，西至肃州（外为边地）”，管理今陕西和甘肃各地的行政。又设立陕西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管理陕甘地区各卫所军政。但是，在位于西安的陕西都司控制遥远的河西诸卫，不免鞭长莫及，所以公元 1379 年便在甘肃镇（即甘州，今甘肃张掖）设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行都司），辖境基本上相当于元代甘肃行省的主要地区，从而开陕甘分治之端倪。

“巡抚”是中央派往各地监督和指导军政事务的大臣。明中叶以后，巡抚逐渐由临时之职变为常设之职，并逐渐凌驾于布政使与都指挥使上，成为地方军政大权的实际主持者。明代中叶，由于陕西布政使司（即陕西省）的管辖范围较大，所以，明中央政府在陕西省设立了四个巡抚，分别为陕西、延绥、甘肃、宁夏巡抚。其中甘肃巡抚管理公元 1379 年建立的陕西行都司（即元代的甘肃行省地区）。后来，统一的陕西布政使司逐渐失去作用，甘肃地区和陕西地区由于隶属于不同的巡抚，从而使陕西和甘肃的分治局面初步形成。

清初，由于陕西的边防问题已不复存在，宁夏、延绥二巡抚先后被裁革，而甘肃巡抚则移驻兰州。到康熙二年（1663）始设甘肃省，“析临洮、巩昌、平凉、庆阳四府置甘肃省，移右布政使治之”。左布政使仍驻西安，管理西安、延安、风翔、汉中四府及兴

安州。于是形成一省二治的局面，史称陕甘分治。而陕甘军队的领导机关——陕西提督署也迁到位于左、右二布政司之间的固原地区（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至此，陕甘实际上已经分治，但名义上仍属一省，这在当时的行政区划中是个特例。

康熙六年（1667），陕西右布政使司改为巩昌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司改为陕西布政使司。康熙七年（1668）巩昌布政使司移驻甘肃巡抚所在地兰州，并改称甘肃布政使司，通称甘肃省。至此陕甘分治的过程最后完成，历史上与陕西联系密切的甘肃分出去了，而与陕西原来一直不相属的汉江流域（汉中、安康地区）则逐渐归属陕西，近代陕西省的疆域至此固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在清康熙五年（1666）陕、甘未分治以前，原无省志。因当时陕甘为一省，故今甘肃省志皆总载于《陕西通志》。但是由于《陕西通志》是以陕西为主，所以在记述边陲之地的甘肃地区时，不免会出现简略记述，甚至漏列的缺点。直至雍正六年（1728），清王朝下令各省编修通志，并正式任命太子少保文华殿大学士仍管川陕总督印务查郎阿、吏部尚书署川陕总督兼甘肃巡抚刘于义、甘肃巡抚许容纂修《甘肃通志》。迄今共编有乾隆《敕修甘肃通志》、宣统《甘肃新通志》、民国《甘肃通志稿》、《甘肃乡土志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纂修的《甘肃省新志》等五部甘肃通志。

二、关中—天水经济区



自陕甘分治局面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割断了双方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严重影响了各自的发展。为了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贯彻国家号召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全国范围的人民“共享改革开放之成果”。2009 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将甘肃省的天水市与陕西省的关中地区组合成为一个大的经济区统筹发展，成为近来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西部地区发展的特别重视，标志着关中—天水经济区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三大重点区域之一，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此，又将陕甘连接为一体。

关中—天水经济区地处我国内陆中心，是亚欧大陆桥的重要支点，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西部大开发三大重点经济区之一，也是西部地区连通东中部地区的重要门户。按照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有了新的战略定位：将建成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

该区规划范围包括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宝鸡市、商洛部分县

（商州、洛南、丹凤、柞水）、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处于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战略要地，是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好、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深厚、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区域面积79 800平方公里，2007 年末总人口为2842 万人，直接辐射区域包括陕南的汉中、安康，陕北的延安、榆林，甘肃省的平凉、庆阳和陇南地区。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包括发展基础、总体要求、空间布局、构建创新型区域、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改革开放、政策措施等 11 个部分。

在空间布局上，构筑“一核、一轴、三辐射”的空间发展框架体系。“一核”即西安（咸阳）大都市，是经济区的核心。“一轴”即宝鸡、铜川、渭南、商洛、杨凌、天水等次核心城市作为节点，依托陇海铁路和连霍高速公路，形成西部发达的城市群和产业集聚带。“三辐射”即以包茂高速公路、福银高速公路、西康铁路等为轴线，向北、西北、南辐射，加强与辐射区域的经济合作。加快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建设，着力打造西安国际化大都市。2020 年，都市区人口发展到1000 万人以上，主城区面积控制在 800 平方公里以内。支持宝鸡等条件较好的城市率先发展，将宝鸡建成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经济区副中心城市。

在构建创新型区域上，支持西安在统筹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大学科技园区等，大力扶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积极承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在产业发展上，依托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重点发展大型运输机、涡桨支线飞机、通用飞机等主干产业，航空发动机及配套产业、机载系统等分支产业，航空关键部件、专用设备、维修业务等配套产业。以西安、咸阳、宝鸡、天水为集中布局区域，加强重点产业集群建设，强化区域整体实力和竞争能力，全面提升重大装备制造水平。以西安为中心，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加快西安国际港务区、咸阳空港产业园、宝鸡陈仓、商洛等重点物流园区项目建设。积极研究设立西安陆港型综合保税区，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的会展经济圈。

在新农村建设上，加快发展杨凌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加快建设宝鸡—蔡家坡、铜川—富平、渭南—华阴、杨凌—武功—扶风、彬县—长武—旬邑、韩城—蒲城、天水—秦安、礼泉—乾县、商州—丹凤等城乡统筹重点示范区。

在基础设施上，构建以西安为中心的发达的铁路网络。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进一步强化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枢纽功能，建设好西安灞桥热电厂、渭河发电厂改扩建、秦岭电厂“上大压小”扩建、韩城二电厂二期、蒲城

电厂三期。有序开发旬（邑）耀（州）、彬（县）长（武）、麟（游）陇（县）等地煤炭资源。加快实施渭河流域重点治理工程。积极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加快西安（咸阳）地铁建设。

在生态环境上，建设秦岭北麓、渭北山地生态屏障。加快推进渭北、天水等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强西安、宝鸡、商洛、天水等秦岭山地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推进韩城等城市和蒲白、澄合等矿区实施资源型城市转型，搞好铜川资源枯竭城市可持续发展试点，抓好杨凌、韩城以及商丹等循环经济园区试点建设。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为：综合经济实力实现新跨越。到2020年，经济总量占西北地区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翻两番以上；创新能力有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领先地位，基本建成以西安为中心的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新材料基地、新能源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有新突破。交通、水利、市政、信息等基础设施得到根本改善，覆盖经济区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基本建成；城镇化水平有新提高。实现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形成国际现代化大都市，城镇化率达到60%；公共服务达到新水平。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森林覆盖率达到47%以上，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60%以上。渭河干流达到Ⅲ类水质，城镇污水、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批准与实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造西部大开发战略高地的重大举措，对于发挥该地区的优势和引领作用，推动西北地区经济振兴，深入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具有重大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陕甘携手，再创辉煌

天水市与关中山川相接、渭河相连，其丰富而神奇的旅游产品和旅游资源备受国人关注。作为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重镇，关中、天水联合发展旅游业前景良好。面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带来的发展机遇，天水市积极倡导筹建经济区域内的旅游经济合作组织。据悉，目前天水市正按照把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成国内外有较强吸引力的旅游功能区的目标，主动寻找发展切入点，努力对接关中旅游市场，共同打造追远怀古旅游线、休闲观光旅游线、佛教文化石窟艺术走廊旅游线和高新农业观光旅游线。

天水与关中毗邻，有良好的历史基础，也有许多方面的发展共性，这一区域既是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聚集区，也是新中国陕甘两省工业发轫早、基础较雄厚的工业优势圈，

这一带人力资源丰富，科教发达，商贸活跃，战略区位重要，又有农业生产的共性特征，只要抓住时机，充分开发利用，一定会产生较好的经济社会效应，对于带动辐射，拉动中西部的振兴、崛起必将起到重要作用，意义和影响将是长远的。

关中—天水经济区内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杨凌、宝鸡和天水，几乎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区内历史文物遗址密布，品位之高、造型之奇、意境之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它以其完整性、丰富性和至高性闻名于世，例如：秦始皇兵马俑、秦始皇陵、西安半坡遗址、西安碑林、西安城墙、大雁塔、乾陵、昭陵、茂陵、黄帝陵、司马迁祠、法门寺、炎帝陵、周原遗址、诸葛亮庙、麦积山石窟、仙人崖、伏羲庙、玉泉观、卦台山等，还有华山、骊山、洽川湿地、终南山、太白山、关山牧场、麦积山这些自然景观。东起华山，西到麦积山，延伸到陇南和九寨沟，像一串神奇的明珠璀璨夺目。天水既有北国之雄奇，又有南国之秀丽，如果天水地区开发建设速度加快，我国中东部省份的大部分旅游者将直接走西安、宝鸡、天水路线，从天水进入陇南和九寨沟的旅游者将成倍增加。丰富的旅游资源赋予了关中—天水经济区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所以，要以产业化观念开发旅游资源，以项目化手段培育旅游产业，以一体化战略延伸旅游产业链，提升旅游文化软实力，构筑旅游竞争新优势。要按照基础在文物、做强在文化、扩张在会展，做大在旅游的思路，努力打造关中—天水经济区内寻根祭祖和周秦汉唐特色旅游文化品牌。

关中—天水经济区处在陇海铁路线上，南面是秦岭北麓，北面是渭河流域，是经济区发展的重要天然屏障和自然条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盛唐时期陕、甘的发展情景时写道：“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后来由于战乱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滥砍滥伐以及现代工业污染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应该认真贯彻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建设秦岭北麓生态功能保护区，打造秦岭北麓百家植物园，加强秦岭北麓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湿地保护。渭河上游水土流失严重，下游工业污染严重，要加快实施渭河综合治理工程，限制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在渭河流域布局，加强湿地保护，增加渭河生态水量。大力开展以植树造林为重点的生态建设，在秦岭北麓增加绿色植被，在公路铁路沿线建设绿色林带，在渭河沿岸发展绿色农业，按照规划和目标，努力打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关中—天水经济区。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发布，是重大的历史机遇，希望关中—天水经济区能支撑和带动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引领大西北，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们也相信，陕甘携手，一定能再创辉煌。

（撰稿人　张　明　张淑霞）

桥山黄帝陵

一、黄帝的传说

据传大约5000年前，有蟜氏族一个叫附宝的姑娘嫁给了少典氏族的首领，怀孕24个月之后生出一位神童，这便是黄帝，他一落地便能说话，复姓公孙，号轩辕。

《国语·晋语》记载，黄帝生于姬水之旁，长于姬水之旁，以姬水成，故以姬为姓。据学者考证，姬水就是今陕西岐山县境内的岐水或者武功县境内的漆水河，以后建立西周王朝的周族也发祥于此地，也以姬为姓。这里距离炎帝故里姜城堡仅100多华里，如此近的距离表明黄帝与炎帝可能有着近亲血缘关系。据说黄帝与炎帝都是少典氏之子，他们都是从少典氏族中分化出来的，都是源自于少典氏族。如果更确切些说，黄帝与炎帝应该都是崛起于渭河流域的关中西部的部落首领，而且最初他们有着紧密的联系。

黄帝号为轩辕，是因为率领氏族曾在叫轩辕的地方活动或居住过，而今天在黄河流域以轩辕丘为地名的地方多达六处，遍布黄河流域，可见黄帝和他的氏族在当时活动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足迹遍及大河上下。战国时邹衍创立了五德终始之说后，以土、木、金、水、火为次，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应有土德，而土色黄，故称黄帝。

传说中的黄帝不仅是一位部落首领，一位英雄，一位领袖，而且是智慧的化身，文明的使者，中华民族结束蒙昧时代迈进文明门槛的许多发明创造，都与黄帝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传说皇帝令他的部下仓颉创造了文字，隶首创造了数字，大挠创造了甲子，容成创造了历法，伶伦创造了音律。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制丝，黄帝本人和岐伯、雷公发明了医学等。

当黄帝部族从炎帝部族中分化出来后，最初可能也是从事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生业，由于黄土高原腹地的环境条件有利于游牧业的经营，自他们迁往黄土高原以后，其生产经济中游变得比农耕重要了，初级的农耕虽然还存在，但它在生活中已不似炎帝部族那般是生死攸关的产业，而农牧经济相结合的特性决定了黄帝部族迁徙往来动荡不定的特征。不久以后，黄帝部族又开始向东迁徙，来到华北平原。传说黄帝有4位妻子、25个

儿子。黄帝的正妻，名叫嫘祖，是西陵氏族的姑娘。据说嫘祖很有才能，为成就黄帝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她生了两个儿子，青阳和昌意，青阳后来带领一部分人迁到江水，昌意则迁移到若水。

黄帝部族东迁之前，活动范围在陕西和山西北部的黄土高原上，其北界大致在后来的长城沿线。游牧为主的经济形态决定了这一部族的军事实力较强，氏族成员视战功为最高荣誉。传说黄帝部族“习用干戈，以征不享”，“修德振兵”，治五气，种五谷，抚理万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族东迁后的足迹，“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最后在“涿鹿之阿”建都。他们过的是“迁徙往来无常处”的动荡生活，部族内部是“以师兵为营卫”的准军事化组织。“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派遣有贤才的人到各部落中去监督管理，从而达到“万国和”的目的。他还“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采取适宜生产的政策发展强大了部落经济。

传说炎帝部落壮大以后，为了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沿着渭河向东迁移，然后又沿着黄河向今河南西南部发展，最后到达今华北大平原。此后黄帝部落也离开了黄土高原，沿洛河南下，到达今天的陕西的大荔、韩城一带，然后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和太行山麓向东北方向挺进，也到达华北大平原。据著史学家徐旭生先生考证，今天的陕西关中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河北一带，在西周以前就分布着大量的姬姓诸侯，他们当是黄帝部落向东迁移时沿途留下的部族成员。

部族间的冲突与战争在炎帝和黄帝部族东迁过程中和东迁后常常发生。传说中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蚩尤部族之间发生了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是龙山文化时代规模最大的原始战争。

炎黄部族的阪泉之战发生在它们各自东迁到华北大平原之后。史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传说当时炎帝来到新地方后，一改过去温良恭俭让的本性，专横跋扈，施暴于氏族内部，人心离散，各氏族之间相互侵凌，社会大乱，炎帝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徒唤奈何。而黄帝部族团结一致，上下同心，实力进一步壮大起来。黄帝首先对炎帝部落的内乱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征服了那些施乱的氏族，使他们归化到黄帝部族之后，才大举向炎帝部族发起总攻。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以至血流飘杵，黄帝率领以熊、罴、狼、豹、貙、虎等凶猛动物为图腾的氏族联合军队，挥舞着用雕、鸢、鹖、鹰等鸟类羽毛装饰的旗帜，经过几次战斗，炎帝兵败投降。战争结束后，炎帝部族被融合进黄帝部族，形成了炎黄联盟。由此奠定了中国文明形成的基础。

炎黄联盟成立以后，迅速发展壮大成为黄河流域实力最为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进

一步向东方扩展，与东夷部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东夷部族活动在黄河下游和江淮流域，著名的首领先有太昊、少昊，后有强悍的蚩尤，沿着黄河向西扩张，两大部族为了争夺中原，爆发了著名的涿鹿之战。传说蚩尤长得兽身人首，铜头铁额，并有81个兄弟（氏族），个个食砾石，手持长戟巨弩，以凶悍好战威震天下。蚩尤先向炎帝部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炎帝大败，求救于黄帝。黄帝指挥部落联盟在涿鹿与蚩尤展开决战。据《山海经》等书记述，黄帝任命水神应龙为主帅，打算水淹蚩尤。但蚩尤也从天上邀请来风伯和雨师，一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黄帝在危机之际，请来目生于顶的女神旱魃助阵。据说这位旱魃行走如风，所到之处赤地千里，江河断流，天绝雨水，终结了蚩尤的狂风暴雨。蚩尤又兴起弥天的雾霾，使炎黄联盟迷失了方向。黄帝又命令风后制造了指南车，辨明了方向，最终擒杀了蚩尤，打败了东夷。东夷部族一部分归顺了炎黄联盟，一部分南下荆楚与苗蛮部落会合。从此炎黄部落成为黄河流域实力最为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四夷宾服，天下归心，成为华夏族的前身。

黄帝部族之所以能从隅居陕北的农牧部族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势力最强的华夏集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黄帝特别重视以德治天下，以德教化氏族成员。黄帝懂得如何与新拓展地区氏族之间调整关系，相互安居。黄帝曾说：“予居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至夕。”所以“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制定了“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之合”，使人人各明其责，各安其位。“一道修德，惟仁是行”，不仅行仁政于内部，还“圣德光被”。“四夷之民有贯匈者，有深目者，有长肱者，黄帝之德尝致之”。传说黄帝曾在海边和北方沼泽地找到两位贤才名士风后和力牧，委任他们为相为将；任用沮诵、仓颉为通古知今的史官；任伶伦为乐官；宁封子为陶正；马师皇为牧正。让这些贤士各尽其长，各施其能，“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阘，辅佐公而不阿……”这些理想化的描述，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



黄帝部族战胜蚩尤部族后，对它也实行了一贯的怀柔政策，“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分而治之。这样各自原有的文化传统在战争之后仍然得到继承与发展，实际上，黄帝部族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领，他对各自征服部族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统辖。这种状况直到西周才有所改变。

传说的炎帝、黄帝大体肇始于仰韶时代末期，终于龙山时代中期。这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发生大变革的时期，随之而来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之花就盛开在炎黄开垦的沃土上。崛起于渭水中游和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炎、黄部族，经过融合形成了炎黄联盟，又整合了其他部族的文化形成了华夏集团，促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

出现。

传说黄帝活了110岁，做了100年的部族首领，死后被埋葬在今陕西省黄陵县桥山。

二、黄帝陵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轩辕氏的陵墓，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桥山，沮河水由西向东呈“U”形绕此山而过，站在山上朝下看，东边有河，西边亦有河，就像水从山底穿过，故此山名曰桥山。陵因山而得名，曰桥陵。史书记载黄帝死于荆山，葬于桥山，又相传黄帝得道升天，此陵墓为衣冠冢。从公元前开始，“桥陵”即成为中国历代帝王和著名人士祭祀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的场所。《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唐大历五年（770）建庙祀典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大祭的场所。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于陵前题碑“古轩辕黄帝桥陵”。1942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题写“黄帝陵”三个大字，匠人勒石成碑，置于黄帝陵墓之前。1961年，国务院公布黄帝陵为全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一号”，号称“天下第一陵”。

黄帝陵由登山陵道拾阶而上步入陵园区，一座明朝嘉靖年间竖立的下马石上刻“文武百官到此下马”八个大字，令人恭敬肃然。从西门而入，步行数步，左侧是一座高24米的夯筑高台，台旁立一石碑，上书“汉武仙台”四字，此台始建于汉元封元年（前110），为汉武帝祭祀黄陵时祈求长寿成仙，下令士兵起土成台。黄帝陵冢位于桥山山顶正中，坐北面南，高3.5米，周长48米，面积约200平方米。陵冢为椭圆形土冢，直径为16米。土冢下部筑方形墓台。方台与圆冢相结合，上圆下方，具有“天圆地方”“天地相合”的象征意义。黄帝陵前立有一块石碑，上书“桥山龙驭”四字，陵前的“黄帝手植柏”树龄高达五千年以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柏树，见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还有一棵古柏周身上下，斑痕密布，纵横成行，柏液中出，似有断钉在内，枝干皆然。这就是桥山柏树中著名的“挂甲柏”，相传为征讨朔方归来挂过盔甲的柏树。

黄帝陵区东侧碑廊珍藏历代帝王御制祭文碑57通，陵区西侧立有香港回归纪念碑和澳门回归纪念碑；“人文初祖大殿”系供奉黄帝的正殿，内有墨玉刻制的黄帝浮雕像，设有神龛，神龛四周饰以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四灵；纪念亭内陈列有中国近现代领袖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题词。

近现代以来，每年清明节公祭黄帝陵成为国家第一祭祀大典；近年来，公祭活动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省级领导主持公祭。参加祭祀活动的有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兄弟省市代表以及陕西各界代表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等。民间对轩辕黄

帝的祭祀活动一般在清明节前后和重阳节期间，北宋以来，民祭则多在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举行。传说这一天是黄帝乘龙升天的日子，故举办“民祭轩辕黄帝逸仙盛会”，方圆数百里成千上万的群众，端着贡物，抬着祭品，翻山越岭，齐聚桥山脚下。只等时辰一到，击鼓鸣钟，古乐齐奏，举行盛大隆重的祭奠祖先、祈福祈祥的活动。



黄陵祭祀

三、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2015 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陕西视察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此话言简意赅，准确概括出了黄帝陵的意义和实质。

大家知道，历史上对黄帝的敬仰起始很早。据《国语》记载，虞舜时便已经对黄帝进行禘祭。自司马迁《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以黄帝居五帝之首以来，黄帝更是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桥山黄帝陵作为黄帝陵寝，自然就与黄帝联系在一起，成为黄帝文化具象化的载体，也就自然成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一种象征、一种文化符号。经过五千多年的历史沧桑和历朝历代不断祭祀、交往、认同、融合，黄帝陵不只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符号，而且也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象征，成为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轩辕黄帝既是中华文明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更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肇创者。黄帝时代结束了混沌蛮荒，开启了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先河，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在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心目中，黄帝陵是圣陵、神陵、魂陵，

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

中华民族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始祖——黄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也是中华民族的血亲始祖。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有大批港澳台同胞及海外的华侨华人回国祭拜黄帝陵，其情其景十分感人。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和夫人1984年专程拜谒黄帝陵并留言："世界各族皆兄弟，黄帝子孙独人杰。"1988年，中国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团"一行25人拜谒黄帝陵，他们身穿特制套服，胸前印有"想家、想家、想家"的字样。美籍华人张良州1993年专门从美国赶赴黄陵参加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大典，声泪俱下地诵读了亲自撰写的祭文。2005年4月5日，国民党中常委蒋孝严专程来陕参加清明公祭黄帝大典。2009年4月3日，马英九在台北遥祭黄帝陵，后任内六度参加中枢遥祭黄帝陵典礼。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连战及夫人、吴伯雄、江丙坤、林丰正，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也先后来黄帝陵谒陵祭祖。显然，黄帝陵不仅仅是海内外华夏儿女祭祀的场所，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情感、精神、心灵的寄托，成为维系、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这是悠久历史积淀的结果，是亿万华夏儿女长期追寻、认同的结果。随着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提升，尤其在世界局势激荡、风云变幻的今天，黄帝陵作为文化符号、民族象征、精神纽带，愈来愈显其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慎终追远的传统。黄帝陵祭祀自秦汉以来，历两千余年而不衰。另方面，随着国家统一日久，通过规范对先代帝王的祭祀制度来强化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就非常必要。唐代宗大历五年（770），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书："坊州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方享祭，列于祀典。"得到了代宗的批准，从此，隶属于坊州的陕西桥山黄陵便成了皇家致祭的对象，正式进入了朝廷的礼制系统。宋太祖承唐末及五代十国丧乱之余，一即位便频下诏书，为黄帝陵置守陵五户，命"春秋祠以太牢"，凡有"隳毁者"，皆"修葺之"。同时规定朝廷每3年祭祀一次黄帝陵庙，为了祭祀方便，将唐代宗大历年设置的黄帝庙从桥山西麓移至今址。元朝对黄帝陵的祭祀也很重视。明朝建立，朱元璋更于洪武四年让礼部"定议"，将全国的"合祀帝王"减少到35位，并按一人一处的原则，明确上陵祭祀的地点，其中，黄帝的致祭场所被确定在当时的中部县，即今黄陵县。除此而外，他还特下诏旨，规定在每年仲春和仲秋的朔日，遣使致祭，每三年则由皇帝"出祭文、香帛，传制遣太常寺乐舞生赍往所在，命有司致祭"。为了保证规定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又要求陵置一碑，"刊祭期及致牲帛之数"。同时，为黄帝陵专置了五品护陵官。至清代，祭祀黄帝陵仍是国家的一项政治制度。除朝廷祭祀外，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也常到黄帝陵祭拜。如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北宋名臣范仲淹三上黄帝陵；宋仁宗降旨黄帝陵栽植柏树，泰定帝颁发保护黄帝陵庙令，嘉靖帝

免除黄帝粮税；元末著名道士张三丰上桥山，瞻仰轩辕黄帝陵庙并留诗篇；李自成回师陕北祭拜黄帝陵；台湾著名诗人邱逢甲祭拜黄帝陵并留诗篇。

由此可见，祭祀轩辕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盛事，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的民族盛典。历朝历代对黄帝陵的祭祀和保护整修，不仅说明中华民族的绵延、壮大和强大，而且充分说明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象征。

现今，习主席要求把黄帝陵看作“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正是对中华民族始终围绕一个中心的演进过程所做的明确肯定。这样做既体现了对历史的敬畏，也体现了对过往王朝理性政策的充分尊重，更顺乎潮流，合乎民心。当今世界的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要发展，要建设小康社会，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统一和安定。统一必须有一个中心，绝不能多中心。所以，以黄帝陵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巩固和发展历史形成的伟大统一，进一步凝聚全国各族人民，这是大局所在。任何与此大局不符合的行为，都是要不得的。

（撰稿人　邵介闻　何先绵）



骊山秦始皇陵

秦王朝时期，在陕西大地上，修造了规模空前的骊山陵墓。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件害民极甚的事。但秦代劳动者所创造的这一秦文化瑰宝，在时过2000年之后，却把当年秦王朝的历史面貌再现出来，使世人得以一睹秦皇雄师的风采。如今，骊山秦陵及以兵马俑、铜车马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已经使之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旅游胜地。

一、秦始皇帝陵园

秦始皇陵园即骊山陵园，又称“丽山园”或“丽山”，位于今陕西临潼东5公里的骊山北麓。其以始皇陵墓为中心，由城垣、寝殿与便殿、园寺吏舍、陪葬坑、陪葬墓等文化建筑群体构成。它们有机地组合排列在一个5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并与周围的山、原、河等自然地理环境融为一体。陵园的设计思想，与阿房宫的设计思想完全一致，也体现了《吕氏春秋》所建构的宇宙图式的原则。



秦始皇陵园

始皇陵修建历时 38 年（前 246—前 209）。统一前的工程主要由相国吕不韦主持。统一后，秦王朝竭全国之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更大规模的营建，由丞相李斯主其事。当时征发了 70 万刑徒，参加修陵及造阿房宫。近百万的劳动大军云集在沿渭河一线的工地上，“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其场面之壮观，是不难想见的。

陵墓上筑有高大的封土堆，高“五十余丈”，约合今 115 米，现实测高度为 87 米。墓内情况，史书记载称：“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这就是说，墓穴穿越三泉（即潜水层），以铜液铸塞棺椁，墓室内造有咸阳宫殿模型并设百官位次，上绘天文图，下具自然地理景象，用水银制成可以流动的百川江河大海，装有触发式自动暗弩和长明灯，埋藏大量珍奇异宝。今考古勘察表明，墓室地宫筑有宫墙，墙周有斜坡门道，地宫平面近似方形，面积为 18 万平方米，中心点深可能在 23—30 米。

陵园城垣有内、外之分，均为南北长、东西窄的竖长方形，两城组成一“回”字。内城占地 78 万多平方米，南、西、东面各 1 门，北边 2 门，均筑门阙，城垣转角处筑有角楼。外城占地 203 万多平方米，四面各有 1 门，均筑门阙。始皇陵位于内城南部。

根据“事死如事生”的思想，始皇陵附近筑有寝殿和便殿，这是供墓主灵魂日常起居饮食及休息宴享的处所。在始皇陵封土以北的内城垣内，考古工作者发现多处建筑遗址，其中北距封土 40 米处的方形建筑遗址，人们一般认为即当时寝殿遗址，而由此再向北 75 米处的另一建筑遗址，则被认作便殿遗址。



在陵园内外城西垣之间，考古发现有三组建筑遗址，据出土器物并参照汉代有关资料分析，人们一般认为这里便是园吏寺舍——主要应是掌握陵寝日常祭祀的食官的寺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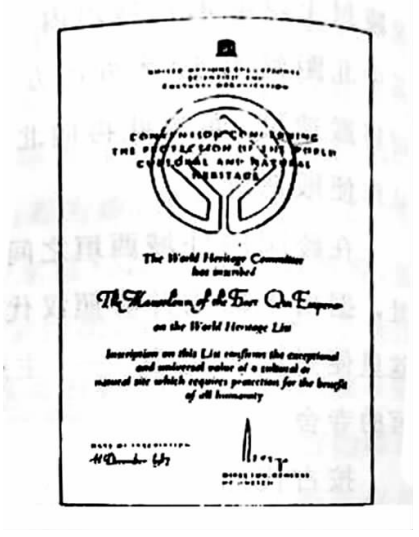
按古代的葬俗和葬仪制度，始皇陵建有大量的陪葬坑。现已被发现的主要有：（1）铜车马坑。（2）马厩坑。共发现两处，一在陵东侧上焦村一带，西距陵园外城东墙 300 米，疑为象征宫廷厩苑的地下马厩；二在内、外城西垣之间的南半部分，为一平面呈曲尺形的大型马厩坑，内有密集排列的马骨和大型陶俑。（3）珍禽异兽坑。位于陵园内外城西垣之间的西门大道南侧，共 31 座，分作南北向的三行排列，疑为模拟地上苑囿以供死者灵魂游猎之用。（4）兵马俑坑。（5）石铠甲坑。（6）百戏俑坑。（7）铜禽坑。以上铜车马、兵马俑、石铠甲、百戏俑、铜禽诸坑，后面将还有专门介绍。

始皇陵还有许多陪葬墓。经考古调查及发掘，可知这些墓主要分布在内城垣内北部，内、外西城垣之间，外城垣的东侧。从已发掘的外城东上焦村陪葬墓来看，葬者可能是被杀之始皇诸公子及公主。其他陪葬墓的情况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在

始皇陵西南约 1.5 公里处，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两处修陵人的墓地。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文献记载的秦王朝征调数十万刑徒修建陵墓的历史事实。

另外，今天仍可见到的与始皇陵园相关的遗存还有：陵园南骊山脚下的防洪堤遗址，外城垣西侧北端的石料加工场遗址，陵园以北的鱼池遗址等。

始皇陵园是保存至今的规模最大的古代帝王陵园。尽管它的创造过程中充满了暴虐与苦难，但它毕竟给陕西大地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是陕西历史的骄傲。1987 年 1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秦始皇陵列入“世界遗产”保护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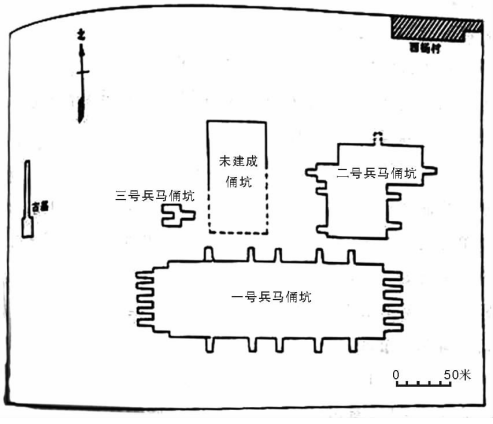


《世界遗产》证书

1987 年 1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列入“世界文化清单”

二、秦陵兵马俑

始皇陵虽是秦代劳动者创造的文化瑰宝，但由于文献记载的限制，人们对其真实情况及价值的认识，是很不够的。1974 年 3 月，临潼县晏寨乡西杨村村民打机井时，偶然发现了兵马俑坑。这一秦陵的重要陪葬坑，在文献上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一下子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1、2、3 号兵俑坑位置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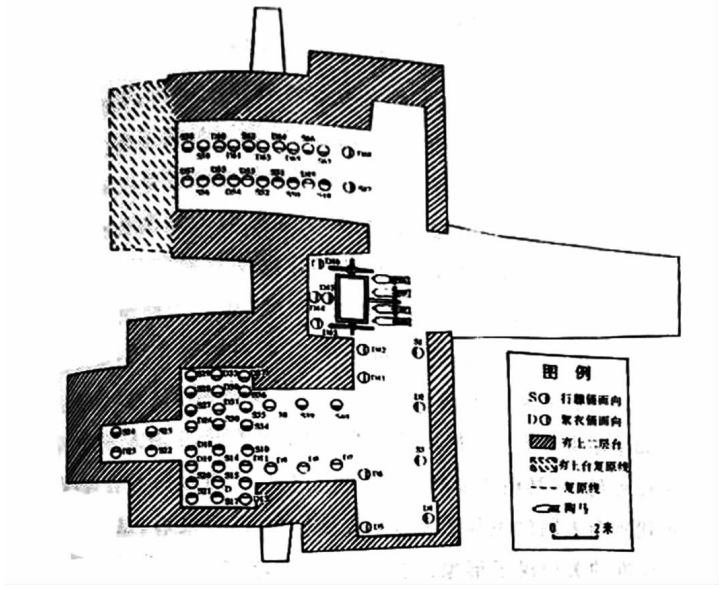
兵马俑坑共4座，考古工作者将其编为1、2、3、4号坑，其中第4号坑空白无俑，是一个未建成的坑。1、2、3号俑坑，成倒“品”字状分布，西北距始皇陵外城垣1.5公里。其所表现的对象，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中统帅的秦百万雄师。

1、2、3号俑坑均系地下土木结构建筑。其构筑为“架构法”，即在立柱上置纵横交错的梁枋，密排棚木于梁枋之上，棚木上铺席，席上覆盖胶泥土，最后盖以封土。封土上究竟有无其他设施，因文献失载和2000多年来地面的变化，已不可考知。

1号俑坑规模最为壮观。它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4.5—6.5米，呈长方形，四面环以边廊，并各有5个斜坡门道，正门居东。坑内有长180米、宽3.5米的东西向过洞9条，过洞间隔以夯土墙。边廊内整齐排列着面向外侧直立的步兵俑，过洞内密集分布着战车与步兵相间的纵队。该坑共有陶俑约6000件。

2号坑位于1号坑东端北侧，南距1号坑仅20米。其平面为曲尺形，面积约6000平方米。坑内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为立射式、蹲跪式弩兵俑，第二单元全是木质战车，第三单元是车、步、骑三兵种混合军阵，第四单元均为骑兵俑。该坑共有战车89乘，驾车陶马356匹，陶鞍马116匹，武士俑900余件。

3号坑位于1号坑西端北侧，南距1号坑25米。坑平面呈“凹”字形，面积仅约520平方米，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其东边有一斜坡形门道，进门后正面有间车马房，内有战车1乘。两侧有南北向长廊，长廊两边分别连接南厢房与北厢房。长廊及厢房内共站立武士俑64件。



3号兵马俑坑形制及陶俑、陶马排列位置示意图

所有陶俑身高在1.75—1.96米之间，容貌神态各具特色，均有彩绘。从兵种看，分作步兵、车兵和骑兵3种类型。步兵中包括作跪射和立射式的弩兵和一般武士俑。车兵包括御手和车士。从职务分，有将军俑、武官俑和武士俑。俑的穿戴和兵器配备，随职务和兵种不同而有差异。所有陶马，均与真马大小相似，分为车马和乘马，其体型不大，腿短，与今甘肃河曲马种相近。



制作数以千计的大型兵马俑，是项巨大的工程，同时也是一次特殊的艺术创作。由于兵马俑制作于陕西，安放在陕西，从而为陕西的历史增添了光彩。尽管当时秦王朝会从全国各地调集来大批工匠从事制作，但终究还需要以所在地陕西的人力、物力为基础，需要以秦地原有的制陶技术和艺术水平为前提。在兵马俑身上发现的刻画或戳印的文字，就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这些秦俑陶文，基本为制俑的陶工名。其中相当一部分陶工来自秦中央官府制陶作坊，显然这些工人当以秦地工匠为主。另有相当多的陶工则来自地方制陶手工业作坊，其中又以首都咸阳的工匠占绝大多数。由此可见，兵马俑主要体现了古代陕西劳动人民的智慧，是古代陕西人民的杰作。其实，从秦俑的



跪射俑（二号俑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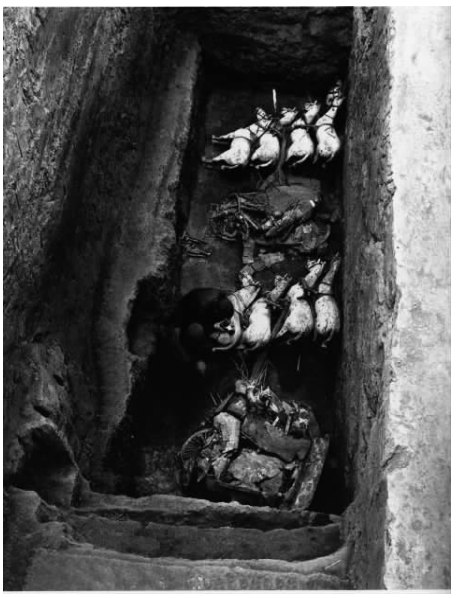
造型来看，基本上亦是标准的关中汉子形象。这之中，就已经透露出许多重要的信息。

关于秦俑的性质，曾有过争议。但其陪葬性质，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肯定。有关秦俑坑军事学内涵的认识，目前也已基本明朗化。俑坑展示给人们的，是秦军在实战中使用的具体军阵。至于秦兵马俑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地位，则是显而易见的。秦在雕塑与彩绘方面的辉煌成就，已将中国美术推进到发展的第一次高峰。秦俑艺术无可争辩地推翻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落后的观点，否定了秦文化落后的偏见。秦俑的艺术风格特征和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严格的写实性，强烈的逼真感；鲜明的主题，博大的气势；凝练的造型，入微的刻画；传神的个性，协调的类型；绚丽的彩绘，浓郁的秦风。

三、秦陵铜车马

始皇陵陪葬的青铜车马亦是文献失载而经考古发现的秦文化瑰宝。如果说秦兵马俑以其磅礴的气势、宏大的规模而轰动了世界的话，那么，秦陵铜车马则以其精湛的工艺技术、逼真华丽的造型而再次让世人倾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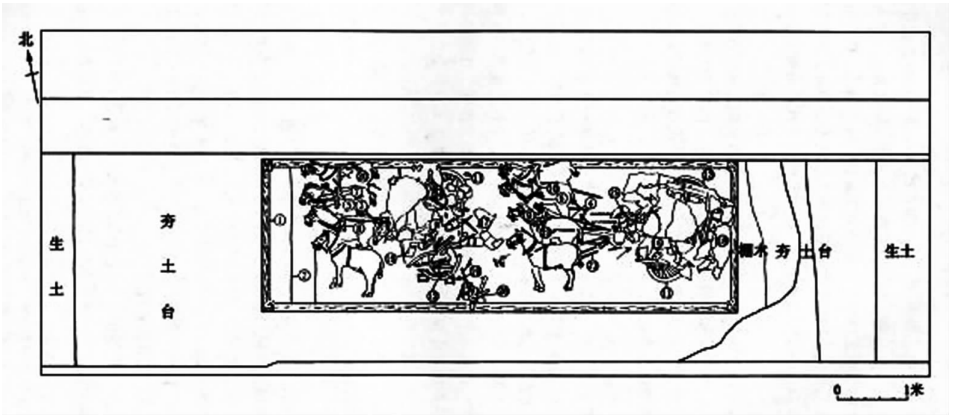
埋藏铜车马的陪葬坑位于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平面呈“巾”字状。出土的两乘大型彩绘青铜车马系秦始皇生前乘坐的车驾的真实模拟，其分别由数千件零部件组装而成，总重量近2.5吨，按排列前后顺序被编为1、2号铜车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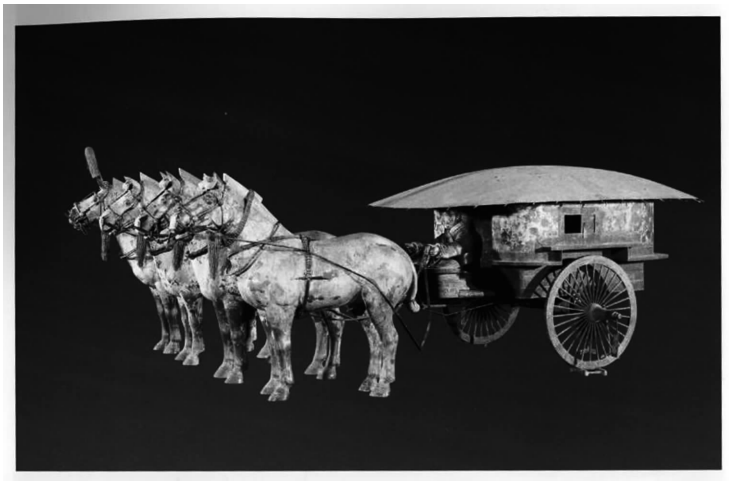
铜车马坑试掘方出土情况

1号铜车马定名为高车，是单辕双轮四马驾车，属于为秦始皇“大驾卤簿”开道、警戒的卫车。其车体较小，舆箱平面为横长方形，车马通长2.57米，宽0.955米，高1.68米，设计极为精巧。舆内右侧站立一位双手持辔、头戴鹖冠、后佩长剑、全神贯注的御官俑。车上竖立一把由22根青铜伞骨支撑的、伞盖直径1.22米的圆盖车伞，并装备有弓弩、箭镞、盾牌等武器。

2号铜车马定名为安车，属于秦始皇“大驾属车八十一乘”中的一种大型安车，即史书上所称的“绎缴车”。亦为单辕双轮四马驾车，通长3.171米，高1.062米，总重1241公斤。舆箱平面略呈“凸”字形，分割为前窄后宽的二室，上有面积达2.3平方米



铜车马坑试掘方出土情况平面图



的椭圆形篷盖。封闭式后室面积78厘米×88厘米，为皇帝乘卧之处，设计舒适而高贵。左右两侧均有可随意开合的窗子，后边安装单片门扇。开放式前室面积35厘米×36厘米，实际是安车的驾驶室。其以彩绘阑板与后室相隔，板上有一小窗供通话使用。室内跽坐一头顶冠、身着长襦、腰挂短剑、双手平伸揽辔、目视前方、面带柔顺谦恭微笑的御官俑。驾车的四马昂首向前，欲奔且止。马脖子下挂着用铜丝纽结的璎珞“繁缨”。右侧骖马额前饰有古代天子之舆特有的马饰件“纛”。值得注意的是，铜车马奔驰的方向，与隔冢相望的兵马俑阵的方向恰恰相反。这其中包含了秦人深刻的宗教意识与信仰习惯，表示落叶归根，日落西方，死者灵魂乘华丽之车回返秦人初始勃兴之地，驰归秦嬴列祖列宗神灵居集的西天。

从秦陵铜车马可知，秦代马车依然采用商周以来传统的轭軏系驾法，这比欧洲古代马车的颈式系驾法更为科学。铜车马的面世，也解答了中国古代车制中许多令后人迷惑



1 号铜车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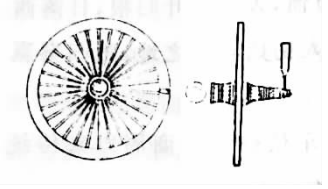
不解的难题。

就制作技术讲，铜车马铸造工艺先进，技术难度极大。它运用铸接、焊接、镶嵌、套接、扦接、活铰连接、子母扣接、销钉固定等多种方法，把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零部件灵巧完善地组装成大型青铜艺术品。据统计，仅青铜安车的多种接口就达 3962 处。铜车马埋在地下 2000 余年，已被压挤成千余块碎片，修复时发现，其绝大部分接口居然都牢固如初，制作工艺之精，令人叹为观止。铜车马的实物证明，秦代工匠已经掌握了先进的红套技术。

铸造出薄如纸、细如丝的青铜部件，是铜车马制造技术中最为惊人的绝活。高车的圆形伞盖，安车的椭圆形顶篷，厚度仅 2—4 毫米，面积则均在 2 平方米左右。要浇铸如此轻薄宽阔的青铜物件，必须有极丰富的铸造经验和高超的工艺技巧，青铜液体必须保持均匀的流动性和相应的温度及压力，火候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八匹铜马头部的璎珞用铜丝来表现，丝丝如缕，令人叫绝。这充分体现出秦代青铜制造所达到的登峰造极之境界。

秦代技术人员对青铜器内含的化学元素的认识和比例搭配关系的把握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工匠们根据不同零部件的性能要求，调整青铜的铜、锡、铅三个基本化学元素的份额比例，从而铸造出强度相宜的器物。另外，所制的零部件具有相当严格的规范性和互换性，说明当时已出现了某种标准化意识。铜车马还使用了高超的防锈技术，至今其表面磨蚀深度仍在 $1000A^0$（$1A^0=10^{-8}cm$）以下，保持着较好的机械性能。

从造型艺术水准来看，铜车马超过了秦兵马俑。由众多普通工匠大规模集体协作完



秦陵2号铜车车轮结构

成近8000件兵马俑，难免有个别制作粗糙、神韵不足、造型呆滞的作品；而出自人数不多的优秀工匠和制作专家之手的两乘铜车马则完全是上乘精品。其塑造的车、马、人物，不仅细腻逼真，而且具有很强的美感。与兵马陶俑一样，铜车马的表面也绘有一层厚实的彩色颜料。其颜色有朱红、粉红、绿、粉绿、翠绿、深蓝、天蓝、褐、黑、白等种，皆为天然矿物质颜料，与兵马俑彩绘颜料相同。不过，彩绘铜车马难度较大，需要先在铜车马表面均匀涂上一层天然胶，然后再平涂敷色。铜车马的彩绘采取铸绘结合、以绘补铸的原则。浓厚鲜艳的彩绘既遮掩了冶铸纹痕，简化了青铜铸件的表现（如跽坐御官俑所佩短剑剑身仅以彩绘虚示），又减缓了青铜氧化过程，并使铜车马华彩四溢，金碧辉煌，起到了遮痕、省铸、防锈、溢美四大积极作用。

由秦陵铜车马，可以佐证史书关于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宫廷中”记载的真实性。尽管12铜人后来被董卓、苻坚相继销毁，但秦陵铜车马的出土，则足以弥补这一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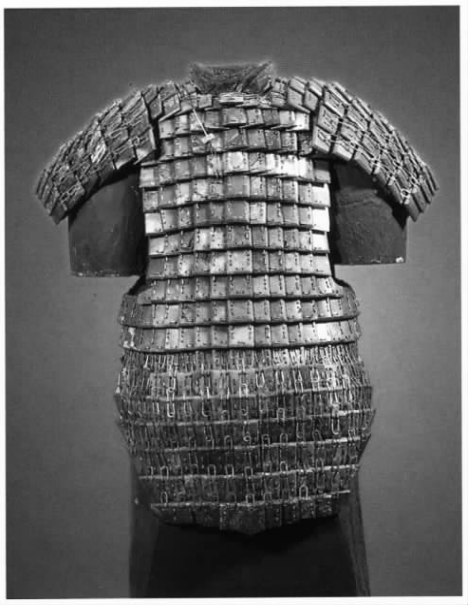
四、不断的考古新发现：石铠甲、百戏俑、铜禽

自兵马俑、铜车马问世以后，秦陵考古又不断有新发现。其主要是石铠甲、百戏俑和铜禽。

始皇陵陪葬的石铠甲坑，位于始皇陵园东侧内外城垣东门间的东司马道南边、始皇陵现封土东南200米处。经试掘出土一批石铠甲、石胄以及石马甲等文物。石铠甲大致可分为三类：筒子甲，双肩有披膊之甲（据甲札形制的不同分作Ⅰ、Ⅱ、Ⅲ型），鱼鳞甲。现提取并修复的一顶石胄，由74片扁铜丝编缀而成，通高和底部宽约31.5厘米，重3168克。石马甲由颈甲、当胸、身甲、搭后等部分组成，残长约1.8米。这批石质的甲、胄、马甲，虽系陪葬的明器，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当年秦军在防护装备方面的珍贵资料。另外，之所以使用石甲、石胄一类石制品从葬，似也还隐藏有某种神秘的文化内涵。研究者或认为，始皇陵园出土的石甲，是供始皇贴身的卫队使用的，在幽冥的世间身穿石甲、胄的卫士，可以起到避恶鬼的作用。此虽为推测，但足可备为一说。



正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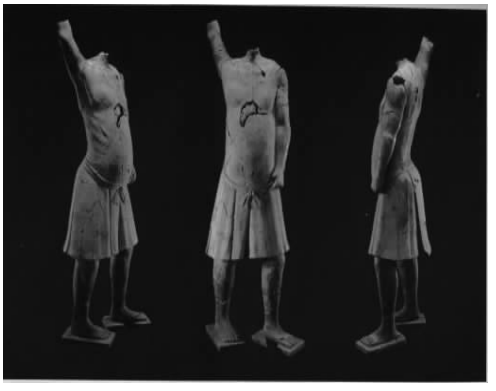
正视

百戏俑坑位于始皇陵封土东南部的内外城垣之间，北距石铠甲坑 39 米。在试掘方内出土与真人大小相似的百戏俑 11 件，现修复了 6 件。这些俑上身及四肢赤裸，下身著短裙，体型和姿态各异。其中扛鼎俑膀宽腰圆，双足一前一后略呈丁字形站立，左臂自然下垂，手握腰带，右臂向上作举物状。都卢寻橦俑体魄健硕，四肢粗壮，立如铁塔，双手紧握腹前系结的前搭（小裙）；左侧臂胁间原抱持一直立的高竿，因俑坑经火焚，竿已不存；竿的顶端还应有一横竿，演员缘竿上下及在横竿上做各种动作。旋盘俑身材修长匀称，一腿后曲，一腿柱立作金鸡独立状，右臂向外曲折上举，食指与拇指上指；食指顶端有一径 0.4 厘米、深 12 厘米的直孔，孔内原插有一细长棒状物，左臂下垂；仰首



1. 正视　2. 左视　3. 后视

K9901T1G3 出土的 5 号陶俑



1. 右视　2. 正视　3. 左视

K9901T1G3 出土的 3 号陶俑

挺胸，目视前方。角抵俑呈大力士典型形象，作立姿，双手置于腹前作用力握物状。百

戏在秦时主要是宫廷的娱乐活动，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该时代的游艺水平。



铜禽坑位于秦陵东北角约900米处，与始皇陵中心相距1.5公里。坑内出土的20只铜天鹅、20只铜鸿雁、6只铜仙鹤及15件陶俑，有机地组合成象征宫廷禽苑的一组大型群雕。禽坑北部有条长约60米的坑道，其底部有条象征河流的沟槽，槽的底部有淤泥，说明槽内原有水。46只铜禽分布于小河两岸，头向水面，或觅食（嘴里叼着小鱼），或闲步，或卧息，或举颈昂首，或颈微侧转举首张望，神态各异。禽坑南部有条南北向的坑道，两边共有11个象征着禽圈的壁龛。那些陶俑是饲禽的仆役，白天把水禽赶到小河放养，夜晚驱禽归舍。如此一批与真禽大小相似的铜禽之发现，填补了秦飞禽造型艺术的空白。从鸟禽雕塑史的角度去看，它开创了独立鸟禽造型的先河，意义很不一般。

（撰稿人　锺　铢　王　麒）

西汉帝陵

一、西汉帝陵概述

西汉 11 座帝陵，均位于今西安市附近。北部咸阳原上埋葬了 9 位汉帝，自西向东由一字排开，依次是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和阳陵。东南部仅埋两位汉帝，分别在浐河东西：东为霸陵，在白鹿原东麓，面对灞水，有“武关大道”南去；西为杜陵，位处鸿固原（原称“杜东原”）的最高处，临浐河，东对白鹿原，西近宜春下苑。

汉的每一座帝陵，实际上是一位皇帝与皇后异穴同茔的合葬陵园。帝后各有四棱台体的陵墓，外围以方形的“周垣”。在四面垣墙的正中辟有阙门，四向的“神道”直对陵墓的“羡道”。

纵观西汉帝陵的位序，基本是“择地而葬”，至于帝、后二陵的相对位置似也没有限定。只有陵墓的方向朝东，这在西汉陵园制度上是一致的。当时的帝陵制度，在陵墓形制、周垣规程、寝园便殿、陵庙规制、陪葬墓地、从葬设施、陵园管理、设置陵邑等等，都基本具有统一性。下面将西汉 11 陵的基本情况，按帝序简介如下：

长陵，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又名长山。合葬的吕后墓位于帝陵东南，陪葬墓区在帝陵东，陵邑在陵北。整个长陵陵园所在地为今咸阳市窑店三义村北。

安陵，汉惠帝刘盈的陵墓，位于今咸阳市韩家湾白庙村。合葬的张皇后墓在帝陵西北，陪葬墓区在陵东，陵邑在陵北。

霸陵，汉文帝刘恒的陵墓，位于今西安灞桥区毛窑院村（或说杨圪塔村，其实两地相距很近，两说均可），当地人称“凤凰嘴”。合葬的窦皇后墓在帝陵东南，陪葬墓区在陵西南，陵邑在陵东南。

阳陵，汉景帝刘启的陵墓，位于今咸阳市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为咸阳原汉帝陵最东的一座。合葬的王皇后墓在帝陵东北，陪葬墓区和陵邑均在陵东。

茂陵，汉武帝刘彻的陵墓，位于今兴平市南位镇策村，是咸阳原汉帝陵最西者。合葬的李夫人墓在帝陵西北，陪葬墓区及陵邑均在陵东。

平陵，汉昭帝刘弗陵的陵墓，位于今咸阳市大王村、互助村之间。合葬的上官皇后墓在帝陵东南，陪葬墓区在陵东及陵北，陵邑在陵东。

杜陵，汉宣帝刘询的陵墓，位于今西安市雁塔区三兆村南。合葬的王皇后墓及陪葬墓区均在陵东南，陵邑在陵西北。

渭陵，汉元帝刘奭的陵墓，位于今咸阳市周陵镇南新庄。合葬的王皇后墓在陵西北，陪葬墓区在陵东北，陵邑位置不清。

延陵，汉成帝刘骜的陵墓，位于今咸阳市周陵镇西南马家窑村。合葬的班婕妤墓在陵东北，陪葬墓区在陵东，无陵邑。

义陵，汉哀帝刘欣的陵墓，位于今咸阳市周陵镇东之南贺村。合葬的傅皇后墓在陵东北，陪葬墓散布陵周，无陵邑。

康陵，汉平帝刘衎的陵墓，位于今咸阳市周陵镇西大寨村。合葬的王皇后墓在陵东南，陪葬墓、陵邑均无。

二、西汉帝陵个案之一：阳陵

当我们鸟瞰式地概述了西汉帝陵基本情况之后，有必要再选取若干帝陵个案做些较为详细的介绍，以便进一步了解其具体情况。

阳陵，前面已说过它是咸阳原上汉陵中最东的一座，高距原巅，靠泾面渭，俯视长安故都，气势非凡。帝、后二陵形状为“覆斗”状（即四棱台几何体），高及 29—31 米，威威赫赫。各有周垣，阙门四面，基址犹存。两座陵冢作西南—东北向排列，间隔 450 米。在陵园外围，原来有一道外围墙，四面开门。所以，汉阳陵陵园实际是大城套着两座小陵城的特殊“重城”。

原来的陵园建筑早已毁坏，至今留下多处遗迹，其中应包括寝殿、便殿、神庙与园吏寺舍。陪葬墓园主要分布在东门司马道的两侧，两座陵墓基部的四周布满御府从葬坑。刑徒墓处在陵西的后部，而阳陵邑城放在陵东千米之外。

在帝后陵墓周围分布有“御府坑”，条状的诸坑都对着方形的陵基，而每面的坑又都同墓道平行。帝陵有 85 个，后陵有 39 个，“栗姬冢”有 75 个。发掘帝陵从葬坑中，有原大木车、大陶仓、羊群、木马、各式陶俑、宦官俑等。出土“太官之印”“宗正之印”“东织令印”“宦者丞印”“导官令印”“永巷丞印”“甘泉仓印”“别臧官印”“徒

府”“仓印”等多枚铜章与封泥，说明“御府”所藏的物资都是经过汉中央政府有关机关的检验并钤封的，而且也见证了中央多部门参与了陵墓工程的事实。

阳陵外区（帝后分陵园之外）的从葬坑有两处，一在帝陵之西偏北处，称之为“西区从葬坑”（或称“北区”，是方向性错误）；另一处在帝陵东南，当后陵正南，称之为“南区从葬坑”。每区的从葬坑都由条形坑组成，计 14 排共 24 个坑。最短的坑长只有 25 米，而最长的可达到 291 米。

经过探测与部分发掘的南区从葬坑，每坑的文物布置都有一定的讲究。内容包括车马队列与粮仓、方队与兵器库、家禽与杂器、骑兵与主车、屏障与车行等等。从出土的“左府”“军大右仓”“军武库丞”“军武库兵”等铜印，特别是“车骑将军”金印看，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仓”“库”“府”按照军队组织编制，都是常备军中的储备，同野战军的临时之设不同。将军统帅之军在担任屯卫任务中也要按军队组织编列。若比对陵周御府坑出土的“太官之印”和宦官俑，就可看出陵城内外俨然有别。所以外区从葬坑的兵马俑群，正是中尉掌握着“内卫京师，外备征伐”汉北军的缩影。

公元前 153 年，汉景帝在陵园里起造“德阳宫”。因为这是皇帝在世修建而专为后人墓祭时用的礼制性建筑，实际叫作“德阳庙”。但因为它是皇帝在位时预作的“寿陵”，出自避讳，就取了个吉祥而含有祝长寿的名词，不叫“庙”而叫“宫”。那么，在景帝入葬阳陵之后就应该称之为“阳陵庙”了。

阳陵庙位于帝陵园外东南 420 米的地方。这一建筑基址平面近于正方形，边长 260 米，占地面积67 600平方米。平面构筑有似一个“回”字形，外圈是回廊式的建筑，在东、南、西、北的四边中心部分是通道，有门庭建筑。四门之间，连同四隅有四个曲尺形的配房，外侧有鹅卵石铺的散水。再向外，有沟隍环绕，在四边中部断开的地方正对门道。门两侧各有水井一口，计 8 井；内圈是个高起的方形夯土台基，边长 54 米，同样是回廊建筑，以回纹铺砖墁地，但卵石散水散落在外侧。四边各有三个门址，计 12 个门。还出土有“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空心砖。在内圈的方形夯土台基上，估计原来的建筑具有四阿式的屋顶，形成整个建筑的主室。中心地面有一块被称作“罗经石”的柱础石，属于黑云母花岗岩质，呈四棱柱几何体。上部是圆盘状，光平洁净，平面如砥，直径 140 厘米，边长 180—183 厘米。表刻一“十”字垂直相交的阴线。作为中心柱础，庞大如此，不难想象阳陵庙建筑雄伟的气势。

景帝阳陵从葬坑出土的陶俑，是最具特色的艺术品。其通体全裸，肤色橙红，装上带有转轴的木质双臂，再外穿葛麻绵薄类的彩衣。因深埋地下的关系，木臂与衣服腐朽无存，出土时成了缺双臂的裸体陶俑。这是与过去常见的汉俑不同的一种新俑式，故称

之为“著衣木臂陶俑”。而过去的俑式，称之为“塑绘衣饰陶俑”。

“著衣木臂陶俑”虽然只有62厘米高，但基本合乎人体结构比例。男阳、女阴、肚脐、窍孔无一不备。从艺术角度讲，不但是一批写实主义的佳作，而且蕴含喜色、表情丰富、各具个性的面容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同样，动物俑中像牛的憨厚、马的骏逸、狗的机灵、羊的温顺、公鸡的得意、母鸡的闲散，都刻画得活灵活现。应该说，阳陵汉俑是继承了秦俑的雕塑技法，又在人体比例掌握上前进了一大步。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之前，土生土长的艺术。在中国乃至世界雕塑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历史意义。

而出土于建筑遗址和陪葬墓里的“塑绘衣饰陶俑”，无论是男是女，或立或坐，无论是伎乐姿或舞蹈姿，个个面相姣好、色彩艳丽，都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稳定、闲适的一种艺术反映。

除过接近帝、后陵北侧有几座高大的封土堆属于嫔妃墓之外，陪葬阳陵的家族墓园都分布在东司马道的南北两侧。在20世纪70年代，地面上还存留有陪葬墓冢34座，至今已残存无几。

已经探测出由兆沟划分出的家族墓园107座，里面有自景帝建陵到东汉中期的200多年的5000余座墓葬。经发掘的汉墓280多座，文物内容丰富。“般邑家”铜器精致，周应墓陶俑华美，价值极高。

今依托阳陵及其考古成果建有规模宏大的汉阳陵博物馆，其主要展厅三个：南阙门遗址保护展示厅，外藏坑遗址保护厅，考古陈列室。尤其外藏坑展厅，是在帝陵封土东北10条外藏坑上构筑的全地下建筑，是世界上第一座采用最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建成的全地下遗址博物馆。



阳陵博物馆

三、西汉帝陵个案之二：茂陵

汉武帝的茂陵，历时53年才建成，是西汉诸帝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其封土呈“覆斗”状，底边长230米，顶部边长40米，高46.5米。墓形用最高等级的“亚”字形，四面各有墓道。武帝最宠幸的李夫人之“英陵”，位于帝陵西北。

茂陵陵园有内、外两重园墙。外城内包括了帝、后两座方形的分陵园，长2000米，宽1400米。帝陵内城每边长430米，垣墙四面正中辟门，建置三出的双阙。茂陵的礼制性建筑基址，包括寝殿、便殿、陵庙在内，探出有15处。其中“白鹤馆”是个高台基址，西北距帝陵350米，曾出土过玉圭、玉璧等。武帝的陵庙在茂陵园东北，称作“龙渊宫”，或“龙渊庙”。龙渊宫与寝殿之间的“衣冠道”，是专供祭祀时的“衣冠所出之道”。茂陵邑面积约280 000平方米，位于茂陵陵园以东司马道北侧。

陪葬茂陵的宗亲大臣，据载有卫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董仲舒、公孙弘、李延年、上官安、上官桀、平阳公主等。陪葬墓分布在陵园东司道两侧，已探明的大中型葬墓多达120余座。地面上，残存的封土还有12座。而修陵人的墓地，面积约40 000平方米，估计埋葬尸骨在2万具以上。

在茂陵墓内随葬品极多，《汉书·贡禹传》：“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生禽，凡百九十物。”据说，墓内盛不下，都移到了墓外。经探测，茂陵从葬坑有400多座。这么多从葬坑，应该说既有原规划中的，也有墓内放不下而外移的。

茂陵陪葬墓中，霍去病墓因墓前的石刻而最享盛名。

霍去病是汉武帝的妻外甥，同大将军卫青（霍之舅父）一起领兵抗击匈奴，屡建奇功，封“冠军侯”。死时只有24岁，陪葬茂陵。其墓在茂陵东，西邻卫青墓。出自纪念，霍去病墓的封土修成祁连山的形状，上面多植树木、堆放巨石，并以巨石雕刻成各种动物形状，陈列墓前。在霍去病墓园，已建起“茂陵博物馆”。

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是一批大型的圆雕艺术品。雕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牛、伏虎、石猪、石鱼、人熊搏斗、猛兽食羊等形象，手法简洁，线条粗犷，构图明快，从表现形体到性格刻画上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对后代陵墓石象生的形成都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中国石雕艺术史上也留下光辉的一页。

茂陵陪葬墓中以“阳信家”铜器最具特色。茂陵东有并列的五座陪葬墓。其中最西最大的一座被称作“羊头冢”的就是汉武帝姐姐、卫青的妻子阳信长公主的墓葬。1981年，探测出阳信长公主墓南北有从葬坑39个。发掘墓南的一个从葬坑，出土文物包括铜

器、铁器、漆木器在内，计230多件。阳信家铜器华贵珍奇，既是西汉王室贵族生活的反映，更是当时工艺制作水平的代表。像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取立姿静态，各部合度，但昂首、竖耳、扬尾的细节已显示待令欲驰的神情。鎏金银竹节铜熏炉，通体修长，高58厘米。圆盘龙座上竖起竹节形柄，顶端又以三条蟠龙托起博山熏炉。造型别致，光辉灿烂，不难想象青烟缭绕、燃香盈室，主人在梦幻欲仙心境中的享受。还有提链铜炉、温手铜炉、温酒器、鼎、盆、匜、甑、甗、灯、钟、虎镇等，既适用，又艺术，都是研究西汉上层社会生活不可多得的物质文化资料。



茂陵

四、西汉帝陵个案之三：杜陵

宣帝杜陵和王皇后陵的位置，呈西北—东南向，间隔575米。各为“覆斗”形陵冢，又居方形陵城中心。帝、后陵园，各自设立寝园与陵庙。陪葬墓在杜陵之东，星罗棋布，残存62座。杜陵邑位于杜陵西北。

帝陵陵园的平面呈方形，边长430米，门开正中。陵墓居中，冢高29米，墓有四出墓道。对门址已经发掘，知其由门道、左右塾和左右配廊组成。王皇后陵园规模小于帝陵，边长330米，对东门址已经发掘。后陵冢高24米。

杜陵寝园位于陵园外东南角，贴南墙东段而建。单独筑有围墙，东西两面各辟一门，南面三门。寝园内的格局，分成两部分，西为寝殿，其中心建筑是长方形台基，东西长74.3米，南北宽37.5米。台基外设回廊一周，南北各有三阶；寝园内的东部为便殿建筑群，由堂、室和6个院子组成。王皇后寝园的位置和帝陵的寝园正相反，位于陵园的西南角。其内部组成和帝陵寝园相同，只是位置相反，即寝殿在西、便殿在东。



杜陵

杜陵南北分布5个从葬坑，出土的著衣木臂陶俑，高度基本和阳陵俑相同，但形体瘦削、表情木然，艺术性远不如前。

（撰稿人　何　夫　王文君）

唐十八陵

中国古代是等级社会，生而不平等，甚至死也不能相同，皇帝称死为崩，葬于陵，百姓死后埋入坟墓。古人相信，人死后的生活与现实生活是一样的，故而产生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在人间威严无比的帝王，死后的生活同样要与众不同。因此，历代帝王们的陵寝均不厌奢华，许多帝王从即位起就为自己开始修建陵墓。关中曾是周秦汉唐的定都之所，帝王陵寝、将相坟茔随处可见。其中唐朝 21 位皇帝中就有 19 个葬于关中，分布于渭北第二级台地，与京城长安形成伞形，其中武则天与高宗李治的是合葬墓，是为关中十八唐陵，不仅见证了唐朝的兴衰成败，也成为皇帝时代留给民主时代的礼物。

一、因山为陵的选择

什么是因山为陵？就是开凿山峰，将玄堂开在山体中部，陵墓封土是自然山峰，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敞，墓主人安置于山体下巨型石室中。

唐建国初期，君臣们意气风发，尚未把墓葬提上议程。唐高祖李渊去世之后，太宗开始思虑如何置办高祖的葬礼。大臣虞世南曾向太宗建议：因山为陵，陵内不藏金玉铜铁，一以瓦器，刻石于陵侧，书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陵中无可欲之物，显示皇帝天下为家的气量，也防止盗贼们对陵寝的侵扰。太宗与群臣们商讨，认为这样的做法有些标新立异，应该遵循先例，堆土成陵，若要防盗，尽量做得简约即可。太宗最后虽然听从了群臣的意见，但因山为陵的想法也在他的脑海里扎下了根。

有人说因山为陵的直接推动者是温柔婉约的长孙皇后。36 岁的长孙皇后不幸染上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对前来探望的太宗说：“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唐朝流行的是夫妻合葬的风俗，如果皇后葬在山中，那么太宗死后也应同样葬

在山中。看到皇后如此为自己着想，太宗含泪应允。

太宗早年曾多次在长安附近的九嵕山上伏击敌人，他即帝位以后，也经常来此游猎，他说：“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于是就选择九嵕山作为安葬长孙皇后以及自己的地方，并命当时有名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主持修建。当年的六月，长孙皇后病逝，太宗命人加紧了陵墓的修建，次年，将长孙皇后葬于九嵕山新凿的玄宫中，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山陵毕，与长孙皇后合葬于九嵕山，取名昭陵。陵在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因九嵕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玄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葬礼完毕后，山陵使阎立德将栈道拆除。昭陵不仅将因山为陵制度确立下来，也开启了唐皇帝陵的陪葬制度和陵前石刻制度，太宗生前下诏允许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陪陵赐茔，形成帝陵陪葬制度。同时，唐高宗“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于是，在昭陵北司马门之内，九嵕山之阴刻 14 尊诸番君长像，还以浮雕的形式将生前破敌所乘的六匹马刻于石上，形成著名的昭陵六骏，即青骓、什伐赤、特勒骠、白蹄乌、飒露紫、拳毛騧，后二者今藏美国。这种陵前立石刻像影响到之后的诸陵。

关中十八唐帝陵中，有十四位皇帝的陵墓采用因山为陵之建制，只有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和僖宗靖陵四座使用堆土为陵法。



昭陵六骏介绍

二、乾陵与无字碑

在陕西省乾县城北的梁山上，有一座无与伦比的合葬陵，名为乾陵，因为位于八卦之乾位而得名。陵的主人是唐朝第三个皇帝高宗李治以及一代女皇武则天。这一对夫妻先后成为皇帝，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乾陵的南二峰东西对峙，浑圆如乳，远眺酷似一尊“睡美人”，传说这是女皇武则天仰卧大地的美好形象。

唐高宗死后，乾陵的选址、设计以及营建，都是在武则天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古代，凡是有身份的人死后都会立有碑文，用来记载自己的生平以及功德等，皇帝的陵墓前更是如此。高宗的碑文是由武则天所撰，文中以日月金木水火土来隐喻高宗的文治武功如七曜一般光照天下，因而又称七节碑，歌功颂德的八千字碑文，由他们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亲自书写。

武则天自己的石碑与高宗的记述圣碑分立司马道两侧，比肩而立。它是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碑头刻有 8 条互相缠绕的螭龙，东西两侧则刻有飞龙图，显示着主人无与伦比的身份。



无字碑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块石碑上竟然一文不铭。千百年来，引发了人们无尽的推测。有人认为，武则天临死之前留有遗言，让自己的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因此不撰碑文。

也有人主张，武则天觉得自己功高德重，非文字所能形容。另一种说法则是，武则天死后，究竟是在碑上刻则天大圣皇后，还是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呢？其子中宗李显难以定其称谓，所以干脆一字不铭。

最新的说法是这样的：武则天即位后，曾经大肆炫耀自己，依她的性格，按理不会放弃在碑文中对自己的称颂，并且，在无字碑的阳面上布满了均匀的方格，应该是同时期刻上的，由所刻格数推测，她为自己准备的碑文应有3000余字。至于最后为什么会成为无字碑，要从武则天死前的形势说起。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等人率500多御林军发动兵变，杀死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迎中宗李显入朝，逼武则天退位，恢复唐朝国号。

武则天退位之后，境况今非昔比，她早年为了权利，曾先后毒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李弘，又废太子李贤，中宗李显也险遭毒手，曾即位一年就遭废黜，这样的母子关系使得中宗对武则天的感情十分复杂，他既不能公开表明对武则天的不满，但也不愿为她称功颂德，因此，在武则天死后，干脆一字不铭。

种种的猜测终没有定论，武则天的行为不管受到世人怎样的评论，都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了。只有那无字碑，依然静静地立在她的墓前，向世人默默述说着千余年前无尽的往事。

三、唐陵被盗发



唐十八陵大都规模宏大，选择山势不厌其高，陵园占地不厌其广，修造玄宫不厌其深，镌刻石像不厌其烦，与原来之俭薄背道而驰，实际上是深埋密封，出于防盗考虑者多，出于安养之意者少，故厚自封树未能使奸盗息心，唐帝诸陵多被挖掘。尤其在唐末五代，有人竟敢公然盗掘先世帝陵。

温韬年幼之时做过盗贼，在五代时期的混乱中，他左右逢源，竟也弄了个节度使的头衔。身为节度使的温韬整天作威作福，按理说，他衣食无忧，可以不再做偷盗的勾当，可是他的本性依旧不改，居然把主意打在他管辖区域里的唐朝皇陵上。

古时候历代统治者对于盗掘前代墓葬都是极为痛恨的，可那时却是兵荒马乱，无人管束，温韬于是大肆盗掘。他假借筹集军费，公然发动军队，光天化日之下盗掘唐陵，并将陵墓中的金银珠宝都搬了出来。其中，他所挖掘的最为坚固的一座要数唐太宗李世民所处的昭陵。这位英明神武的皇帝虽然说是节俭，但是对书画以及战马痴迷，据说他死时曾下遗诏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枕于自己的脑下，昭陵前面也陈放着他珍爱的六

匹骏马的石像。温韬从埏道下入墓室，只见唐太宗的墓室极其的恢宏，与人间的皇宫没有什么不同，中间的一间为正寝，左右两边的厢房里设有石床，床上放着用石头做的箱子。温韬将石箱打开，只见里面又有一做工精致的铁质盒子。他本以为内藏稀世珍宝，不料打开后却是前世的典籍，未免有些失望。但其中又有著名书法家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真迹，仔细一看，崭新如故，仿佛还能闻到笔墨的清香。温韬不论优劣，将所有的书画典籍全都搬了出去，不久就流传到民间。可惜唐太宗生前愿望“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被温韬所打破了。

温韬一口气掘了十几个皇陵，一向不信鬼神的他，却在乾陵面前停住了脚步。唐高宗下葬时，就有价值全唐三分之一的随葬品带进乾陵，武则天下葬乾陵之时，也带进了同样丰厚的随葬品。如此巨大的宝库摆在眼前，温韬自然不会错过。可是，就在他兴冲冲地带大军队来到乾陵，一镢头下去的时候，哪知晴空万里的老天忽然变了脸。一时间，雷电交加，风雨大作，没有办法进行挖掘，只得作罢。人们都说乾陵有鬼神保佑，动触不得，但温韬不信这邪，过了几日，他又率人前来，但好好的晴天又降暴雨。温韬试了几次，都是如此，不由得心里发毛，不敢再掘。时至今日，乾陵被认为是唯一一座没有被盗墓贼光顾过的唐皇帝陵墓。

四、影响与启示

唐代帝陵逐渐形成固定的模式，其依山为陵、陵前石刻群、陪陵之制、陵园建制、巡陵祭祀等内容对当时和后世都造成明显影响，不仅改变了自秦汉以来日益繁缛的帝陵营造模式，也改变了皇帝厚葬的传统观念，虽说唐代帝陵存在表面务从俭薄，实际厚葬密封的现象，但都是在追求简约节俭的名义下而施行的自欺欺人之法，而这种观念停留在口头也是一种进步。退一步说，唐代关中十八陵的存在，无论从文化价值，还是经济价值来看，都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唐陵复杂的礼制结构，浓缩了主持者和建设者明显的传统观念，渗透着唐人独特的精神文明，是了解唐代社会的一扇窗口，也是沟通历史、现在和将来的一座桥梁，其存在既以无与伦比的艺术形态展现风采，又以气势雄伟的建筑形态卓然而立，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传承都有任何历史文献都不具备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不仅要求现在以最认真的态度保护之，也要求世人以发展的眼光宣传之，更期待着历史文化的价值因此而大放光彩。

（撰稿人　贾志刚）

后　记

《陕西故事》是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策划出资的一部书，列入陕西地情丛书。其目的就是想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奉献一份陕西力量。

全书的故事主要来自我以往主持的项目“陕西历史大事研究”，其次则是省方志办组织的补充文稿，以及我们针对性补写的内容，总计 82 个故事。显然，这远不是陕西故事的全部，而只是一种“辑萃”。不过这样的辑萃之作，毕竟还是反映了陕西自古以来故事的主体和主流的，所以我们最初设计的书名便老老实实叫做《陕西故事辑萃》，但后来总觉得如此命名太直白了些，故而改用四字的现名。

在此，衷心感谢秦向东主任、雷湛主任，正是他们的大力支持，才有如今这部《陕西故事》的面世，才在陕西文化建设史册中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页，才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舞台上增大了陕西声音。

在此，还要向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处表示感谢，是他们的全力支持、密切配合，才使本书得以迅速顺利出版。

在此，还要向三秦出版社特别是李郁副总编表示感谢，《陕西故事》一书，曲折颇多，是他们始终以宽容待之，方得绝处逢生，绽放异彩。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起初本书由省志办李川处长负责筹办，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后李处不幸遭遇车祸，使筹办工作一度停顿，造成了太多的遗憾。现本书终于付梓，应该说也是了却了李川处长的一桩心愿。我们谨以此书祭奠李处的在天之灵，寄托我们深切的悼念之情！

七七叟　黄留珠

草于西大南校区望山居

2018 年 10 月 12 日